



上 篇

台 湾 宗 教



总 论

一、概 况

台湾省总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到1990年11月时统计为20,337,110人。其中汉民族占98%,少数民族主要是山地同胞,占总人口的1.64%。从语系上划分,闽南籍人士占71.37%,客家籍占13.0%,其他省籍的占14.0%。

台湾是一个多宗教的地区,其中大多是从大陆传入的,也有从欧美及日本等地传入的。在开发台湾的初期,移民多来自闽、粤地区,于是就有大量的民间宗教信仰从大陆南部传入台湾。17世纪荷兰占领台湾时期,天主教和基督教传入。到明清时,除对天主教和基督教限制外,各种宗教均可自由传播。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天主教与基督教各派再度在台传播,发展较快。日据时代,因日本统治者采取“独崇神道”的策略,不仅限制中国传统宗教文化,还控制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各派的活动,一些日本宗教的派别乘机传入台湾,台湾固有宗教的发展受到遏制。直到台湾光复后,各种宗教的活动才恢复。大陆解放后,随国民党来台的人员又将大陆的

宗教组织重新恢复设置，使得台湾的宗教获得较大发展。台湾各教派及宗教团体在社会活动中不断发挥其社会功能，成为有相当社会影响的民间团体。

目前，台湾正式登记的宗教有 12 种，即：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天理教、轩辕教、巴哈伊教、天帝教、一贯道、理教和天德教。台湾不仅人口密度高，而且其寺庙教堂的平均密度也是世界之冠。据台湾“内政部民政司”的统计，到 1991 年底，台湾共有寺庙教堂 16,667 座，平均每一个村里有 2.3 个。其中，以道教宫观最多，有 8,084 所；其次为佛教，有 4,020 所；基督教有 2,422 所；天主教有 1,761 所，其他宗教共有 380 所。

据台“民政司”的统计，1992 年登记或成立财团法人的宗教团体有 11,327 个，其中道教的团体占总数的 60%，其次为基督教，占 18%，佛教占 15%，天主教占 6%。各宗教团体的全年总收入达 227 亿元新台币，其中 58% 来自捐助。宗教团体不仅有宣教、组织的功能，而且积极参与社会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的活动，对台湾的政治及民众的日常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

1994 年 5 月 30 日，台湾“内政部”又发布最新统计报告，台湾的总人口有 2,100 万，其中半数有宗教信仰。根据这一统计报告，目前台湾宗教徒有 1,050 万，其中佛教徒最多，约有 4,856,000 人，占教徒总数的 46.25%；道教次之，有 3,637,000 人，占教徒总数的 34.64%；基督教徒有 421,648 人，占 4.02%；天主教有教徒 295,742 人，占 2.82%；一贯道有信徒约 90 万，占 8.5%；其他各教约占 5.9%。不过，台湾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一统计数目不够准确，因它未包括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若将民间信仰者也计算其中，台湾的宗教徒就几乎占到总人口的 90%。从这些数字可看到宗教在台湾非常兴盛，而且影响广泛。

表1 台湾地区各宗教教务发展统计表(1981—1991)

年底及 宗教别	寺庙及 教堂数	神职 人员	信徒数	外 传教士	神(佛) 学院数	大学	专科学校	中学	小学	幼稚 园	养老 院	育婴 堂	医院	诊所	出版 社	年刊	季刊	月刊	周刊	其它
1981年	10495	26702	2724360	1579	45	5	4	56	11	2011	14	20	44	41	76	7	17	79	28	55
1983年	10653	26850	3102128	1604	46	5	4	56	11	2023	14	20	44	42	75	7	19	83	29	58
1984年	12428	30620	4391233	1353	47	5	4	48	11	551	16	45	35	93	38	10	20	83	22	62
1985年	13701	31111	5981025	1419	40	5	4	49	11	544	18	53	37	113	31	9	12	55	18	73
1986年	14149	32652	6054350	1531	42	5	6	40	11	593	19	53	32	100	28	10	11	87	352	75
1987年	14333	36107	6547520	1573	66	5	10	42	10	572	17	58	35	108	115	4	5	135	6	111
1988年	14620	149617	8195866	1595	70	7	13	42	10	491	22	59	57	123	143	6	9	173	6	120
1989年	15838	158753	9124876	1586	73	8	12	54	10	459	20	18	56	65	145	8	59	140	6	130
1990年	16597	159534	9732211	1550	81	5	8	51	10	445	22	15	54	56	144	8	13	192	6	140
1991年	16667	162663	10343940	1555	76	8	12	51	10	450	21	17	56	57	145	9	15	136	7	255
佛教	4020	9130	4856000	-	32	-	-	8	-	70	10	5	6	3	-	-	-	-	-	-
道教	8084	29150	3270000	-	2	-	1	-	-	41	-	-	1	16	6	3	5	43	-	104
天主教	1761	1958	304432	674	2	2	1	36	10	296	7	6	16	17	8	-	-	13	2	-
基督教	2422	2399	421605	853	35	6	10	7	-	8	1	6	12	12	96	2	2	53	4	32
回教	5	10	52000	-	-	-	-	-	-	-	-	-	-	-	-	-	1	1	-	-
轩辕教	19	113	172000	-	1	-	-	-	-	-	-	-	-	-	1	-	1	-	-	3
理教	113	467	127093	-	3	-	-	-	-	1	-	-	-	1	1	3	-	-	-	12
天理教	126	630	28000	28	-	-	-	-	-	-	-	-	-	-	-	-	2	1	-	-
巴哈伊 教	2	-	14000	2	-	-	-	-	-	-	-	-	-	-	1	-	-	-	-	-
天帝教	35	17	114000	-	1	-	-	-	-	-	-	-	-	-	1	-	-	2	-	100
一贯道	64	118620	878710	-	-	-	-	-	-	34	3	-	21	30	30	1	3	23	1	4
天德教	16	169	106109	-	-	-	-	-	-	-	-	-	-	-	1	-	-	-	-	-

注：本表引自台湾“《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92年，第208页。

表2 台湾宗教学发展统计表

年代	1900	1970	1975	1980	2000					
种类	信徒数	信徒数	信徒数	信徒数	信徒数					
	%	%	%	%	%					
中国民间宗教徒	2193000	75.6	7208900	51.4	7806330	49.9	8458240	48.5	10016000	40.6
佛教徒	580000	20.0	5750000	41.0	6569000	42.0	7492000	43.0	11592600	47.0
基督教徒(新教)	6000	0.2	360000	2.6	422300	2.7	487800	2.8	807000	3.3
罗马天主教徒	3000	0.1	350000	2.5	406700	2.6	470400	2.7	838600	3.4
中国本地化教会	0	0.0	220000	1.6	265900	1.7	313600	1.8	764600	3.1
边缘教会	0	0.0	10000	0.1	11200	0.1	12600	0.1	75000	0.3
圣公会	0	0.0	3000	0.0	3360	0.0	3740	0.0	6000	0.0
回教徒	6000	0.2	60000	0.4	71800	0.5	84500	0.5	150000	0.6
部落宗教徒	110000	3.8	20000	0.1	18000	0.1	16000	0.1	10000	0.0
非宗教徒	0	0.0	20000	0.1	26000	0.2	34000	0.2	220000	0.9
无神论者	0	0.0	10000	0.1	14000	0.1	20000	0.1	100000	0.4
巴哈伊教徒	0	0.0	3000	0.0	4000	0.0	5000	0.0	10000	0.0
犹太教徒	0	0.0	100	0.0	110	0.0	120	0.0	200	0.0
其他宗教信仰者	2000	0.1	20000	0.1	22300	0.1	25000	0.1	75000	0.3
总人口	2900000	100.0	14035000	100.0	15641000	100.0	17423000	100.0	24665000	100.0

说明：

表 2 引自 1982 年出版的英文版《基督教百科全书》(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表中将道教归入中国民间宗教中，民间宗教的成分复杂，始于 6、7 世纪，历史最悠久，包括多神崇拜、祖先崇拜、及受儒释道三教影响而产生的教派，其中也包括了一贯道，信仰者则几乎占总人口的半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削弱。佛教受大陆传统的影响，以净土宗为主，民间则以斋教的形式流行，受儒家及道教思想影响深刻。近年来佛教的发展呈上升趋势，并且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日广，其信徒人数与民间信仰者几乎相近，还成立了众多的组织。此外，藏传佛教还在台北设立了一个中心，不断有一些来自蒙古及西藏的喇嘛到此处做法事。基督教新教派别众多，主要是长老教会及来自大陆的聚会处；中国本地化教会在 70 年代大约有 60 多个组织，最大的是基督徒聚会处（即小群教会），其次为真耶稣教会，另外也有一些韩国本地化的基督徒；80 年代以来以长老教会为主在台湾掀起“倍增”运动，大规模传教，促进了台湾基督教的发展，但教徒增长的实际数字并没有表中所列出的那样高。天主教会在台湾一直稳步发展，在 80 年代中期后因香港面临回归，一些教会机构如耶稣会等将迁往台湾，这会促进台湾教会的发展。回教徒的数目与实际相差较大，据台湾回教组织自己的统计，台湾的回教徒仅有 5 万。非宗教徒主要是青年人，放弃了其家庭成员所信奉的宗教。“部落宗教徒”主要是台湾山地同胞，他们大多信仰原始宗教。巴哈伊教在台湾发展很快，1964 年时仅成立了 2 个地灵体会，到 1973 年时就已发展到 17 个。“其他宗教”主要指一些新兴的教派，也包括少量的印度教徒。

二、宗教的社会影响

从表 1 及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到，宗教在台湾的确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首先，宗教徒（包括民间信仰者）占人口总数的九成，换句话说，台湾有 90% 的人是用宗教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的，宗教伦理在台湾民众中有相当的约束作用，即使在大学里也可处处“闻禅”，

陪上司去教堂也被视为一种时髦，可见宗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台湾“内政部长”许水德就曾以“沿门托钵为治安”的心情，拜访各宗教界的领袖，“请求他们发挥宗教的力量，共同响应‘不犯罪运动，配合政府致力于治安的维护’”。

其次，宗教组织在社会中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教会及宗教组织不但开办学校、慈善机构、医院等，还创办了大量的社会服务业、房地产，如饭店、宾馆等等，各宗教团体本身也须在当局申请登记为财团法人，宗教已走向世俗化，成为拥有巨大财富的社会团体。据台湾《善导周刊》1992年5月24日的报导，台湾“内政部”首次作的调查中发现，台湾宗教徒在1990年5月到1991年4月共捐献了130亿新台币，不过这仅是对正式登记的12种宗教的一部分宗教团体所作的抽样调查而得出的捐献数字，而台湾未办理登记的寺庙教堂多达5000家，再加上数以万计的神坛及各宗教团体所办的社会服务业、慈善业、学校、医院等收入，估计总金额在千亿元左右，可以和台湾任何大财团相抗衡。在各宗教收入的排行中道教居第一位，年收入达106.33亿元，佛教第二，每年有62亿元，基督教50亿元，天主教是6.7亿元，一贯道0.69亿元，天德教为0.37亿元，天理教有0.26亿元，轩辕教有0.12亿元，理教有0.076亿元，天帝教0.033亿元，巴哈伊教是232.6万元，回教有109万元。另外，在地产方面，道教也居首位，自有土地为460万坪，房产占地面积有100多万坪；其次是佛教，自有土地约300万坪，房产占地有55万坪，基督教居第三，自有土地65万坪，房产占地64万坪；天主教自有土地32万坪，房产占地15万坪；一贯道有土地8.8万坪，房产占地有1.4万坪。

第三，台湾宗教在社会工作方面的分量很重，影响也很大。主要有四个方面：

1. 教育事业：从表 2 中可以看到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不但开办了众多的宗教院校,还创办了普通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小学及幼稚园,并在台湾社会中广泛开展社会成人教育及肢残智障的教养事业。台湾“教育部”不允许成立独立的宗教学院及以某一宗教为特定对象的科系,因此,台湾各个宗教团体所办的宗教教育有三种形式,一是合乎正式教育体系规定者成立的宗教系所、职业及补习学校;二是不合规定者成立的财团法人形式;三是各宗教团体开办的宗教院校,规定不许收费、不准授大学课程、不准授学位,这些院校招生的主要对象是神职人员、信徒,也有非信徒1989年在台湾辅仁大学法学院成立了宗教研究所,由天主教耶稣会士房志荣神父任第一任所长,招收研究佛教、基督教、道教、民间宗教等方面的硕士研究生,1992年秋还首次开设了“宗教学系”,课程则由辅大神学院、“中华民国现代佛教学会”、“中华道教学院”、“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共同拟定,体现了多元化的特色。

2. 慈善事业:台湾各主要的宗教团体都开办有老人院、育婴堂、残障人服务机构、“平安居”流浪者之家等,还开展急难救助、国际赈灾等活动,连台湾地方当局也求助于各宗教团体,投入社会的慈善事业。所以,多年来各宗教所办的慈善业在台湾整个慈善事业中占有很大比重,最著名的有佛教证严法师所主持的“慈济功德会”。

3. 医疗事业:各主要宗教团体在医疗事业方面也颇具规模,到1991年底,共开办了56家医院、57个诊所,另外,还有残障康复中心、启能中心、医疗院校等等,并且收费低廉,直接服务于一般大众,社会声誉较高。

4. 文化事业:各主要宗教都开办有各类的文化中心、研究机构及各种文化基金会等,以吸引社会的高层次人士,扩大自身的影响,同时借助开办出版社、杂志、图书、报纸,甚至是影视媒体等方式来传教,并显示自己的实力。

三、台湾的政教关系

(一)主要宗教的政治倾向

台湾各主要宗教均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近年来宗教界关心时事、介入政治更成为一种潮流。如在 1991 年 12 月 21 日“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的投票中,台湾主要的宗教团体均推出候选人参选助选,结果有四名当选,分别为基督教的郭哲(教徒,基督教协会理事长)、佛教的明光法师(大雄精舍的住持)、道教的高忠信(道教会理事长)和天主教的胡侨荣(教徒,新光纺织总经理),他们均为国民党籍。在 1992 年底的台湾“立委”选举中,六大宗教的代表破天荒地聚居一堂,在“中华文化复兴总会宗教委员会”的发起下,共同发表一项被称为“干净的选举,不贿选、反暴力、反金权、选贤与能”的声明,希望借宗教力量影响台湾 90% 以上的信徒。宗教界联合参政的这一新举动,也可谓台湾各宗教的政治新走向。但由于各宗教的时代背景不同,它们所代表的政治利益及观点也各有不同。我们可以从它们的历史发展来剖析其各自的政治走向。

1. 佛教界

佛教是全台湾影响最大的宗教,有 485 万多教徒,“中国佛教会”长期掌有特权。国民党来台之前,佛教力量可分为以圆瑛为首的保守派,以太虚为首的改革派。来台后,圆瑛的弟子白圣得到国民党的支持逐渐入掌“中国佛教会”,台当局一面拉拢台湾原有的斋教,一面将太虚的弟子印顺挤出中国佛教会。任国民党中评委的白圣及其徒弟辈近 40 年来一直是佛教界的头面人物。而国民党也一直介入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的选举,影响这个全台佛教的最高领导机构。但近年来由于台湾佛教内部发生分裂,形成四种势力:一是白圣(中佛会)系统,也被称为北派;二是星云(佛光山)系统,

或称为南派；再次为第三势力系统，各寺的主持多为台湾省人；四为印顺系统，以佛学研究为主。而印顺的弟子证严在花莲以社会福利工作为主的慈济精舍和慈济医院等，却以独立姿态出现。白圣死后，同样作为国民党“中评委”的星云成为颇具实力的僧人，第三势力与北派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印顺一派完全与中佛会权力无缘，证严的慈善事业却已跃居全台之冠。

在台湾公众的眼里，佛教界一向是“遭政治势力驯化的”，像“中国佛教会”就一直受国民党的控制。一方面有些佛教界上层人士去依附政党，以期获得保障，结果落下不好的名声；另一方面有些传统派则标榜“出世观念”，不问世事，远离民众。而近几年来，随着宗教世俗化潮流的发展及台湾多党参政的变革，台湾佛教界少壮派势力应运而生，并逐渐取得稳固的地位。他们以当年印顺的“人间净土”的思想为根基，成立各种新兴的佛教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各个层面的活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

例如，以台佛教界为首发起的“净化选举”活动中，“净化社会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释净耀发布“佛道教净化选举联合宣言”，净耀年仅39岁，号称是台湾佛教界的“青壮领导干部”，他已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组织并成立了“中华民国佛教青年会”、“普贤中医联合门诊中心”、“观音线协谈中心”、“净化社会文教基金会”及“佛教音乐推广协会”。在1992年底的“立委选举”中，净耀提出一份为端正选风而拟就的“佛道教净化选举签署联合宣言”，事先已获得佛光山星云、“中国佛教会”理事长悟明及台湾省佛教会理事长圣印等人的支持，并请让多次表示“不介入政治、选举”的慈济功德会创办人证严率先在“宣言”上签了名。签署这份“宣言”的人除证严外，还包括台湾佛、道教界的星云、丘道得、净心（“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分会理事长）、菩妙、刘国珍、圣印、高忠信、褚一飞、净良等十余人的联署，并公开致信给李登辉和许信良，主旨与台湾基督教界

“反贿选”一样,希望藉宗教的道德感化与说服力,去影响选民,真正做到“选贤与能”。

台湾的佛教界表面看来不关心政治,实则依附政党。由于组成成分非常复杂,各自所持的政治观点也大相径庭。台湾佛教徒大体可分两部分:上层出家僧侣、在俗弟子与下层出家僧侣、平信徒。从他们各自的政治倾向看,上层佛教界一直与政治暧昧,依附政府,以期多获保障。国民党也自称“是佛法的守护神”,大力支持40年代末从大陆来台的一些僧人,以“中国佛教会”为代表,在台湾长期握有特权。而许多上层的僧人也径直加入国民党,甚至担任一定的职务。蒋经国晚年时就曾延揽“中国佛教会”的白圣、悟明,及佛光山的星云进入国民党的领导核心——“中央评议委员会”,而“中佛会”的净心则有着国民党的区党部书记之衔。另一方面,佛教界近年来在台湾政坛上影响力的大增,也是与台湾当局一些高官的纷纷皈依及支持分不开的。然而,下层的佛教徒却有着“出世”的传统,很少过问政治,有些人甚至不满上层佛教界暧昧不明的政教关系,认为参政与助选有悖于佛理。

不过,台湾新生代佛教僧侣的政治活动能力不容低估。他们参政意识较强,且政治立场上也不同于传统派,一贯反对当局的腐败;由于大多出生在台湾本地,其“寻根”意识较淡薄,所以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有浓厚的“台独”思想,或鼓吹“一中一台”,只是有碍于佛教界传统的“统派”势力的强大,才没有像基督教长老会那样赤裸裸地宣传。最近几年有几个佛教新生派的组织在台湾社会比较活跃,逐渐地改变台湾佛教的政治走向。其一是“中华民国佛教青年会”(简称“佛青会”),会长宏印是当年印顺的弟子,前面提到的净耀也是该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佛青会”中台籍僧尼占压倒多数,鼓吹要“开拓出具有本地台湾特点的佛教”,并“鼓励年轻弟全面参与社会,包括参与政治在内”,据报界披露像陈仪深(台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副研究员)那样主张“一中一台”的人在该会中也大有人在。1992年的“立委大选”,“佛青会”领先出面组织各种活动,参选、助选,异常活跃。其二是“真理党”,1992年由“万佛会”总裁宗圣创立,这是第一个由宗教团体组织的政党。关于组党的动机及其政见,宗圣曾明确地表示:“过去我们长期支持党外运动,但民进党成立后并没有回馈基层,我们才另外组党。”可见,“真理党”与民进党的政治主张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分歧,在政治上是支持和主张“台独”或“独台”的;1992年底的“立委”选举,“真理党”曾推出了5名候选人。由于“万佛会”的成员多来自农工阶层,在具体的社会事务中它更关注下层社会,强调福利制度,例如争取为僧人设立保险制度等。其三是“慈济功德会”,号称有250万的信徒,会员中70%是女性,有“家庭主妇王国”之称。因其创始人证严的名望,它在台湾社会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据称证严一贯奉行“从不谈政治”,始终把“关心世俗与造福人间一直奉为宗旨”。事实上,政教关系在世俗社会的具体事务中并不泾渭分明,在1991年大陆赈灾中,慈济功德会筹得的财物多达三、四亿,令海内外人士震惊,这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在1992年的“立委选举”,证严改变了一贯的做法,表示支持“净化选举”,这也使慈济功德会的成员不自觉地介入了政治。但是,慈济功德会在政治立场上严守中立,不与政府作对,其本身的组织也不严密,所以“政治左右不了慈济会员”。

以上三个佛教新生派组织在政治上的举动,对各政治党派均具有一定的冲击力。“真理党”的成立对于民进党来说不啻为一个离心力,同时它的鲜明的抗争意识及民众属性,也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佛青会”的反传统既招来佛教界传统势力的反对,也引起国民党的反感;而慈济功德会成员如此众多,也让拥有240万党员的国民党倍感这台湾第一大民间团体的地位所带来的压力。

2. 基督教会

台湾的基督教新教教派成分复杂，各自的背景不同，其政治倾向也有差别。一些势力较小的教派，尤其是从大陆迁来的教会团体，与台湾当局能保持密切的联系。而长老教会则是台湾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大的基督教新教教派，信徒约占全台基督徒的一半，在台湾政坛上一向很活跃。他们鼓吹教会的本地意识，尤其是与民进党一起主张“台独”，积极参政而屡遭当局的压制，同时也遇到台湾广大民众的反对。尽管如此，其政治立场丝毫未有改变。1971年，长老会曾发表“国是声明”，1975年发表了“我们的呼吁”，1977年发表“人权宣言”，到1991年公开提出所谓“台湾主权独立宣言”，在同年底台湾“国大代表”的选举中，更进一步提出其具体的政见主张，包括“建立台湾为主权的独立的新国家”“制定台湾新宪法”“以台湾名义进入联合国”“总统由台湾人民直选”等等，这些观点虽像民进党的党纲那样遭到台湾公众舆论的反对，但在台湾青年人当中并不无蛊惑作用。1991年11月长老会还开始筹组一个跨宗教的“台湾宗教联盟”，以扩大其“台独”的声势，声称要促进台湾各宗教的联系及宗教的台湾化，并迈向世界化等。1992年的“立委选举”，长老会更不甘落后，只是台湾佛教界的声势逼人，转移了人们对它的注意力。1993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权日”，由长老会发动组织23个学术界和宗教界的团体，联名签署了所谓的“两国两制、和平共存——台湾人民对台湾与中国关系基本主张”，鼓吹“台独”，并提交联合国。

教会聚会所是台湾的第三大新教派别，但因以堂为单位，互相独立，之间并无统一的组织，其政治倾向也呈现多元化，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

3. 天主教会

台湾的天主教徒仅有30多万。较之基督教长老会而言，天主

教会参政的意识更为淡薄，其政治态度一向保守，与政府的关系也若即若离。一方面教会主张“不与任何政治体系纠缠在一起”，同时坚持“不对不同的机构或宪政方案表达其偏向”，反对“台独”，但在当今宗教世俗化的台湾，教会当局在政治生活中的默默无闻已引起教会上下的不满。特别是从1986年台湾“解严”以来，社会的政治与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禁”“报禁”及对大陆政策的开放，给天主教会一个很大的冲击。台湾天主教会改变了一贯的策略，开始关注政治，并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此外，在1991年台湾的“国大代表”选举中，台天主教会的“主教团”积极鼓励信徒参选，并推出数名候选人，最终有一名叫胡侨荣的教徒当选，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天主教会在台湾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但其“中立”的政治立场并未有所改变。1992年“立委选举”，台湾天主教会步佛教界后尘，由担任“中华文化复兴总会宗教委员会”主席的罗光主教发起并组织了六大宗教代表联合声明的活动，显示了天主教会介入政治的积极性。

4. 道教组织

台湾道教自称拥有的信徒最多，实际上把大多数的民间信仰者也算在内，因此其组织系统较佛教更涣散，信徒的凝聚力不强，在台湾政治生活中也不活跃。但是一些道教界的上层人士也像佛教界一样，与国民党有着密切的联系，或加入国民党籍，支持台湾当局，在地方上靠拢地方派系，而与其他党派的关系较为疏远。据传，1992年底，“中华民国道教总会”董事长高忠信当选为第二届“国大代表”，这与国民党的提名不无关系。而台湾当局对道教界也颇施笼络手段，甚至直接介入道教界的事务。例如，在台湾“国家发展策进会”（简称“国策会”）的主导下，成立一个“道教宏扬中心”，目的是要“整合台湾的道教势力”，并且“国策会”还要“擎起弘扬道教的大旗”。可见，在国民党的眼里台湾道教信徒还是一股大

可利用的有生力量。不过，在1992年选举时，台湾道教界也加入了“净化选举”的行列，表面上和其他宗教界联合起来，高喊“反贿选”“肃贪”的口号，而实际上其基本的政治立场并未多大改变。

5. 一贯道

过去，一贯道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在取缔之列。尽管坚持保守的政治立场，对国民党当局采取“抬轿”的姿态，但在其他宗教团体的强大压力下，一贯道长期遭禁。1988年解禁以来，它终于来到“地上”，迅速组织起来，接受国民党的“指导”，成立全省各坛道亲的总会，并且走到政治的“台面”上。近年来，台湾一贯道发展迅速，虽未正式统计信徒人数，但据称其数目紧随佛、道教之后。在选举中，除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外，还推出自己的候选人，目的是与在野的反对势力抗衡。鉴于一贯道的强大势力和参政的强烈愿望，台湾朝野两党一方面对它怀有戒心，另一方面也都希望得到它的援手。

6. 新兴教派

台湾的新兴教派数量较多，势力较弱，且组织松散。但它们在政治舞台上由于“反对政府”和激进的主张而在社会中颇具影响力。如“新约教会”，这是60年代由香港长城电影公司的女演员江端仪创立的一个新兴宗教，台湾的领导人是台南的洪三期。洪将信徒带入高雄的甲仙山区，共辟乐园，这甲仙山被称为“锡安山”。自8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以“妨碍治安和国家安全”为由，严禁教徒入山朝拜，遂发生“锡安山事件”，一新约教会的信徒自此开始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长期斗争，颇令台当局头疼。有些人把新约教徒同反政府的政治人士相比，认为：“锡安山的基督教徒，比党外还要党外。”可见新约教会与国民党的对立程度。另一个新兴教派“天帝教”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它由李玉阶创立于1980年，与台湾当局关系十分密切，李玉阶还是“立法委员”，主张“三民主义”，反对共产

主义,也反对“台独”,有的报纸上称其为“反共宗教”或“国民党外围宗教”,“是一个政治野心极强的新兴教派”。据说在天帝教的庙宇里不供奉任何神像,而到处挂满了蒋介石、蒋经国或现任政要的巨幅照片。

台湾社会近年来还出现了许多的新兴教派,如统一教会、《新雨》杂志社成员、现代禅、佛教文化等等,一般组织较零散,相对于传统的几 宗教影响力较小,但其在政治生活中所掀起的阵阵冲击波却不能不引起各党派的瞩目,并对台湾的青年一代有相当的蛊惑力。

以上介绍了台湾几种主要宗教的政治倾向,因台湾最近几年政治上实行多元化,也势必影响到宗教团体政治走向的多倾向性。宗教界参政一方面打破了国民党及民进党独霸的局势,另一方面也是台湾宗教传统形象的重大改变。而各政党在大选之际都想借宗教一臂之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宗教界在目前政坛上的影响力。当然,台湾宗教界在政治上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还是一个未知数。

(二)台湾当局有关宗教的法律规定

台湾当局将宗教事务归于“内政部民政司”有关教会的教育则归“教育部”管辖。国民党一直企图控制宗教势力,从以上我们分析的各教的政治倾向中也略见一斑,台湾当局对传统宗教采取拉拢手段,而对与其政见相悖的宗教派别如长老教会及新约教会等则采取制约的策略,甚至派遣所谓的“宗教第五纵队”渗透到各教派的内部,目的在于制造矛盾,便于控制,以达到以政御教,扩散影响。1989年因国民党“影响教会”的机密文件泄漏的“宁静专案”被曝光,使公众了解到台湾当局在“中央社工会第一室”设有“宁静小组”,长期专责转化长老教会与新约教会的不妥言行,并防

止其与“台独”分子勾联，加强争取天主教和基督教人士对国民党的向心力，加强对宗教刊物的疏导作用等²。除此之外，在行政管理方面还有种种有关宗教的法律规定。

1. 有关宗教事务的法律条例

台湾当局40多年来始终想控制各宗教的传教活动，却未能制定一个有关宗教的法案。为了加强对宗教的管理，国民党当局曾于1969年、1979年和1983年分别制定了“台湾省寺庙管理办法”、“维护寺庙教堂条例”、“宗教保护法”三个草案，但因遭到各宗教团体的反对而胎死腹中。有关宗教的管理办法仍遵循着1929年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制定的“监督寺庙条例”及1936年公布的“寺庙登记规则”。而这两项行政法规只适用于佛教、道教等中国传统宗教，对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等则不适用，因而长期以来遭到佛道教人士及学者们的抨击与反对。

有关宗教事务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各项法规及条款中。关于信教自由的法律规定，如“《中华民国宪法》”中第七条规定：“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十三条有：“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对“污损祠宇墓碑或公众纪念之处所或设置，尚未构成犯罪者”，则按“违警罚法”第六十五条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30元以下罚金；如对坛庙、寺观、教堂、坟墓或公众纪念处所，公然侮辱或妨害丧葬、祭礼、说教、礼拜者，则依“刑法”第二四六条之规定处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另一方面，所有的宗教活动，不得违反“国家政令”，如人民不得以宗教信仰而拒受军训或拒服兵役；人民不得因宗教信仰而拒向“国旗”敬礼；不得因宗教信仰而为犯罪行为，因此若有教人犯罪的邪教，将予以取缔（参见“刑法”第三〇二、三〇四、三〇五等条款）；礼拜及传教自由不得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也不得违反国家利益（参见“刑法”第三三九条及“违警罚法”第六十四条），等等。有

关寺庙教堂及宗教社团的登记则另按“寺庙监督条例”和财团法人登记法办理。

1991年5月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台湾“内政部”公布《宗教法人法草案》,共有八章 38 条款。第一章为总则,包括立法的目的、宗教团体的定义、教化设施之定义、宗教法人的界定及其主管机关、宗教法人的权益及责任等,共十项条款;第二章是有关宗教法人的设立,包括设立之手续、章程许可之申请和许可的范围及时间;第三章是管理部分,涉及了宗教法人设置的董事或理事制度及其财产管理的条款;第四章是有关宗教法人之章程变更的规定;第五章为宗教法人之合并的条款;第六章为宗教法人之解散的规定,包括裁定解散及清算财产等条款;第七章是关于在“内政部”设立“宗教法人审议委员会”的内容,规定该审议委员会由 10—15 人组成,由“内政部”在宗教从业人员、学者专家及主管机关人员经选举后任命,并实行无给职,但该委员会不得对宗教团体之信仰、戒律、习惯等宗教之事项进行干涉;第八章是罚则,即对宗教法人施行的处罚条款。但这一草案公布后遭到许多宗教团体的反对,未获“立法局”通过,该草案对新兴宗教团体规定过严,对传教活动也限制过多,台湾学术界讨论至今仍无结果。然而,台湾各个宗教团体,以及学者和政要人士都一致认为,要使寺庙教堂之组织和管理走上法制化,修订不合时宜之法令、新定宗教法实为当务之急。

2. 有关两岸宗教交流之规定

随着海峡两岸民间交往的日益扩大,尤其是 1987—1989 年妈祖信徒大规模到福建湄洲岛朝拜,早已突破了“三不政策”³,使台湾当局不得不默认这种民间交往方式。

1989年6月台“内政部”境管局及民政司联合拟出“民间宗教团体及人士赴大陆访问实施作业要点”,将台湾宗教团体及个人赴大陆访问合法化,但规定不可“直航”,“要经第三地区”,并且这一

开放还只是“单向”的。1990年10月29日,台“内政部”正式宣布自即日起开放岛内各宗教团体派员到大陆地区从事朝圣、迎香等宗教活动。按这一“现阶段宗教团体派员赴大陆地区从事宗教活动作业规定”,凡已依法立案或登记的宗教团体(包括寺庙、教会团体及财团法人),自即日起得向“内政部”申请派遣其所属人员赴大陆地区从事宗教活动,经许可后再向“内政部境管局”申请出境手续;并规定民众赴大陆地区从事宗教活动不限次数,每人每次停留时间不得逾两年;在大陆期间,不得从事“妨碍国家安全或利益活动”,回台后应于一个月内向“内政部”提出活动经过的简要报告;还规定了公务人员、现役军警及军警院校人员、大专院校校长、独立学院院长、从事国防或机密高科技研究人员,不得申请赴大陆从事宗教活动,同时也不宜派在校学生前往。

直到1991年台“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召开的第十次委员会议中,首次“允许大陆杰出人士来台参观访问,其中文化人士包括宗教界人士”。以后,又制定了“大陆地区人民来台参观访问申请作业要点”。次年9月23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及“内政部”联合发布“大陆宗教人士来台参观访问申请须知”,规定大陆的寺庙、教会(堂)等宗教团体之负责人、传布教仪之神职人员及宗教学术研究人员在经台湾地区依法设立有案之宗教团体邀请后,得向“内政部”提出来台的申请;申请方式:个人应提前2个月,团体要提前3个月,还要填写参观访问书一份、旅行证申请书一份、保证书一份,并出具申请人的资格证明文件;还规定申请者在来台之前要取得第三地区有效期为6个月的签证,或在抵达前取得,等等。可见,这一“开放”还是极为有限的。

1993年12月8日,台“内政部”公布了“大陆地区宗教人士来台从事宗教活动许可办法草案”,明定大陆寺庙、教会或宗教团体之负责人等,可以到台湾从事与宗教相关的活动。该草案将“宗教活

动”定义为包括与宗教有关的学术研讨、布道、弘法、演讲、参观访问、参加会议、展出或其他公益性的活动。

台湾当局中的某些人近年来企图利用宗教为其大陆政策服务,以影响大陆的民众,台湾《联合报》1991年1月2日的社论曾宣称“统一的远程目标,必须经由一种非属直接诉诸政治的手段,从文化、宗教、艺术等人文思想的倾力灌输,益以强势的经济操控入手,使海峡对岸的同胞在强有力的宗教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人本思想的启迪之下有所觉醒,从根本上瓦解共产主义对人心与人性的控制,这是在文化强势灌输之后继之以宗教‘强行登陆’的一个双管齐下的新的大陆政策”。

事实上,加强包括宗教界在内的海峡两岸广大群众的相互交往,是大势所趋,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四、台湾宗教的发展趋势

自1986年台湾在政治上开禁以来,宗教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1. 中国传统宗教的复兴。佛教及道教在台湾各地纷纷建立各类组织,80年代末在全台兴起一股佛道热,并广为台湾知识分子所接纳,逐渐成为一种思想和生活方式,出现了官员集体参禅、佛教青年夏令营受到大学生的热烈欢迎、佛法演讲座无虚席等现象。一些新兴的宗教派别亦打着中国传统宗教的名义采取合法的登记手段而广为传播,如天帝教、天德教、一贯道等等,这一切更带动了全台的“宗教热”,并将持续下去。如最近台湾各地的校园弥漫一股宗教旋风,在各地“教育局”的倡导下纷纷举办“中小学校长禅修班”,还组织学生搞“无尘营”活动,一时各校争相效仿,请和尚诵经念佛,以求得“普渡众生”。

2. 外来宗教在中国传统宗教复兴形势的影响下出现了本地化及原教旨主义的倾向。主要是基督教新教各派和天主教在采取各种现代化的传教方式及关注社会生活的同时，注重灵修，如基督教的数次大规模的传教运动时提倡的“灵恩运动”，真耶稣教会及新约教会的信徒尤为重视透过直接的祈祷，确信圣灵降临的重要标记即为口说异语（指有格式韵律的各地方言）、高唱灵歌（赞美诗）等。另外，天主教的神恩复兴运动也正在兴起，并建立种种基层组织。为配合这一形势的需要，天主教及各新教的教会团体利用出版及视听媒体大量发行以灵恩为主体的书籍和音像制品，并已广为畅销。

3. 宗教世俗化趋势明显。一方面，宗教走向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宗教团体关注社会生活、成立各类的社会团体，庙宇管理采取董事会制，各宗教组织开办的教育、医疗、文化、慈善事业、社会服务性的实业等均显示出宗教在台湾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如星云的佛光山、证严的慈济会、北港朝天宫、台北的行天宫、木栅指南宫等实际上是企业化的大财团；另一方面，宗教组织近年来直接参与社会的政治生活，如参选、助选活动，有的教派如基督教长老会人士等还直接参加政党，发挥其政治影响力。连一向视为“神秘”、属灵、高雅的宗教音乐，如佛教和基督教的音乐也被转化为世俗的歌曲，“六字大明咒”等佛教箴言经重新创作编曲，以“新世纪音乐”的方式在台湾流行，福音歌曲还被拍摄成MTV的形式免费赠送给戒毒所。

4. 各宗教组织出现联合化的倾向。过去，各个宗教互相独立，甚至互有摩擦，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台湾几种中国传统宗教有合流的趋向，尤其是佛教、道教、儒教及民间宗教的神在许多寺庙里常被供奉在一起，这在大陆内地比较少见。中国传统宗教之所以能在台湾复兴，其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几种宗教出现的合流趋势

形成了更强劲的影响力，社会的知识分子及高层人士则会取佛家“人生无常”的思想、道家“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世界观，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于是，才会使一向出世的宗教走向世俗化。同时，各宗教之间在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中也有着越来越多的联合行动，如天主教与佛教人士联合起来“反贿选”行动，新兴宗教如天帝教、轩辕教、天德教、理教等也出现要求整合的呼声。另外，还成立了一些跨宗教的、联合性的机构：

（1）“中华民国教会合作协会”：成立于1963年的“中华民国教会合作委员会”在1991年1月24日向“内政部”正式登记为“中华民国教会合作协会”（NCC），并选出了第一届理事15名和监事5名，天主教单国玺主教任第一届理事长，杨启寿牧师、商正宗牧师、俞继斌监督、张幸助为第一届常务委员。该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教会间的关系，促进有关教会事务的合作，及办理社会公益慈善和教育事业，沟通信息，参与世界宣教事工，以“实现在基督里合一”为宗旨。

（2）宗教研究委员会：设在台湾辅仁大学的“文化复兴总会”内，于1992年初成立，特聘天主教罗光总主教为主任委员，悟明法师、周联华牧师、星云法师任副主任委员，天主教单国玺主教、圣公会简启聪主教、佛教圣言法师、道教张桎、一贯道张培成、回教买德麟等人为委员，并于1992年3月23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确定了四项主要工作：两岸宗教文化的交流、净化人心、婚丧礼仪改革及生态环境重建。

（3）大同党：1992年成立，据称各大宗教的有影响的人物均为该党成员，约有一万多成员，其宗旨是要借民间及宗教团体的力量促成台湾与大陆间的“三通”，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

（4）“世界宗教博物馆”：这一计划是佛教灵鹫山心道法师提

出的,号称是“全球首座世界宗教博物馆”,1993年10月开始设立“筹备处”。这一计划已经获得了台湾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巴哈伊教、天帝教、轩辕教、一贯道等教派的支持和响应,馆址设在台北市东北角海滨的一处风景胜地,预计将耗资5亿元新台币,占地20公顷。该馆将建成具有宗教咨询、视听、文物、文献及生活创作等五大特色,经由多媒体及高度科技化的多元展示,结合影像与声音,使观赏者具有横越时空的知觉感受,对宗教做更广义的“诠释”。

5. 台湾的宗教团体积极促动两岸的交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倡导对台湾实行一国两制,得到台湾有识之士普遍欢迎,台湾宗教组织更不断以各种方式前往大陆各地参观访问,加深了对大陆的了解,促进了两岸人民的沟通与亲情,如台湾民间到福建湄洲朝拜妈祖活动等。另一方面,台湾有些宗教团体借各种方式到大陆传教,企图恢复各种旧有的关系,如天主教会建立有专门的“桥梁教会”,基督教一些福音组织还设有专门的向大陆各地传教的机构,一贯道也派人到内地的一些地方借投资机会传教,这与大陆的法律及宗教政策是相违背的。最近19年间,在台湾逐步放宽与大陆交往的渠道后,台湾宗教人士来大陆访问的人逐年增加,从1990年到1992年11月,台湾方面前往福建从事宗教活动的教职人员(不包括一般香客)就超过了1,000人次,他们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天主教方济各会”、佛教、道教、罗马教廷驻台办事处、台湾新约教会、圣公会、福音证主协会及一贯道等教派。而大陆的宗教人士直到1993年底才有基督教会的两名牧师受到邀请,正式前往台湾进行双向的交流活动。随后,大陆的佛教界及道教界人士和学者们相继赴台,促进了两岸宗教方面的友好交往。

注释：

1. 台湾沿袭大陆的传统,习惯将伊斯兰教称为“回教”。
2. 参见香港《广角镜》月刊1989年总第197期任海旌的文章:“国民党‘影响教会,的机密文件外泄——‘宁静小组,的‘宁静专案,。”。
3. “三不政策”为 1979年元旦蒋经国在国民党内部的一次会议上,针对中共倡导的“三通四流”方针而提出与我“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立场,“三不政策”在台湾不得人心,实际上在民间早已打破“不接触”的界限。

第一章

佛 教

一、历史与现状

（一）佛教在台湾的发展史

台湾佛教最初是由大陆的移民传入的，其主要特点是：以闽南一带的正统佛教为主流，也夹杂了民间斋教的成分。台湾的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而福建省在五代时就有佛国之称，民间信仰流行崇拜观音菩萨。到明末，大约有25,000户大陆移民来台，这些人多为福建和广东人，大多忠于明朝，迁来台湾时也带来了佛像，随后可能还建起了佛寺，这只是一种猜测，缺少考证。不过，那时的台南是台湾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佛教首先传入台南也是可能的。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又有许多大陆的移民来台，建立了台湾已知最早的寺庙，即台湾南部的竹溪寺、弥陀寺和龙湖岩，前两座寺庙均位于当今的台南市，而龙湖岩则位于当今台南的六甲，这三座佛寺中又以竹溪寺为最早，建于1662—1665年之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所建的佛寺大多供奉观音，如观音亭、观音宫、龙湖岩等。到了清代，因大兴佛教，台湾的佛教也有相

当的发展，许多明郑时的官邸被改为寺庙，如郑家宅邸被清总兵王化行改为海会寺、李茂春的梦蝶园被知府蒋毓英改为法华寺等。清朝派往台湾的官吏也建立很多寺庙，如黄檗寺即是左营守备孟大志于康熙二十七年建立的。在康熙年间仅台南县内就有佛寺15所。到了清末，佛寺遍布台湾全省，尤以开元、竹溪、法华三寺最为著名，保存至今。这一时期还形成了四大派系，即大岗山、观音山、大湖山和月眉山。18世纪20、30年代，随着台湾政治、经济中心的北移，佛教的流传也到了台北，台北著名的龙山寺、剑潭寺就是在这时期建立的。1887年清政府定台北为台湾省会之后，台北更成了全台的佛教圣地。因清政府向来实行崇尚和保护佛教的政策，也由于大陆向台湾的移民日益增多，台湾佛教在19世纪后半叶比较繁盛。台湾民间多信奉观音菩萨，至清末佛寺中奉祀观音为主神的就有304所，以释迦牟尼为主神的有56所，以地藏王为主神者有13所，以阿弥陀佛为主神者6所，以三宝佛为主神者6所，共有385所¹。另外，清代台湾佛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各地著名的庙宇甚至一些妈祖庙及道观也多请僧人出任住持，例如台北新庄市天后宫、嘉义市朝天宫、台南市普济殿等。尽管民间佛教信仰繁杂，但总的来说，清代台湾佛教是以临济宗为主流。

日据时代，日本佛教随着日军的入侵而传入台湾，开始主要是一些随军的布教和尚，以后日本佛教各派相继传入，主要有日莲宗、真言派、天台宗、真宗本愿派、净土宗西山派、曹洞宗、法华宗、华严宗、临济宗、大谷派、木边派等八宗十二派。这样在台湾就形成了两大佛教系统，一是日本佛教，信徒主要是日本人，另一个就是台湾传统的佛教。然而，日本人在台湾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积极推广日本佛教及神道教自然成为这一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尤其是在台湾的抗日活动被镇压后，日本佛教各个宗派就以台湾人为传教对象。1917年还由日本人发动成立了“台湾佛教青年会”，

会长由日本人大石坚童担任,并于次年成立了“台湾佛教道友会”,发行《道友会报》月刊。中国传统的佛教也受到压制,归属于日本佛教之下。1921年由日本人发动成立了具有全台湾代表性的“南瀛佛教”,这个佛教组织完全由日本人操纵,总部就设在台湾总督府内务局社寺课,虽然台湾各大佛寺、斋堂的领袖有13人分任干事,但正副会长皆由日本人担任。日本政客还借该组织每年举办两次讲习班,召集台湾各大寺院、斋堂的和尚、尼姑及教徒前来受训,以接受“皇民化”的“思想改造”;该组织还出版会报,后发展为月刊,最初是用中文,从第四卷第四号起逐渐加入日文,最后全部改为日文。而台湾佛教从服装、法会、礼仪上也要采用日式,斋堂亦如此,连开山祖罗清的神像也被禁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更规定台湾佛寺的法器、制度、僧服等都要仿效日本。到1940年,“南瀛佛教会”改名为“台湾佛教”。这一时期台湾寺庙还有一大特点,即和尚可以同时收男女弟子,而在这之前,多数佛寺只接收同性别的僧人。到1941年底,日本佛教的12个派别在台湾拥有寺庙达65个,但中国人的皈依信徒只有28,000多名,还开办了一些社会慈善事业。到日据末期,日本人为了迅速同化台湾人,强迫传统的祠庙与日本佛教的某些宗派合并,还要在各祠庙大门上悬挂佛教某宗派布道所的招牌,否则将强行拆除。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恢复了中国传统佛教在台湾的地位。台湾光复后,日本佛教各派先后撤离,其组织也被1945年成立的“台湾省佛教会”所取代,但数十年的日治,日本佛教的传统也在台湾佛教发展史上留下了许多陈迹。日本佛教不重戒律,出家人可妻生子,不戒荤腥,在寺内着袈裟,出外则西装革履,这在战后台湾一些佛寺里依旧存在;另外,日本佛教真言宗、净土宗、临济宗、曹洞宗、真宗本愿寺派、日莲宗等均在台设立了布教机构,还开办了各类的教育事业,如由曹洞宗开办的私立台北中学、净土宗设立的私立台南商业

影、真宗本派创立的私立台南家政学院等；同时，台湾如今的一些佛寺在建筑风格上亦有日本寺庙的特点。

历史上，斋教在台湾的下层社会影响很大，被称为“在家佛教”，创始人是明代的罗清（明正统七年至嘉靖六年，即1442—1527年），实际上它是混合儒释道三家的民间宗教，逐渐发展成龙华、金幢、先天三大派，且各派组织严密，教徒等级分明。这三派教理、经典互有出入，各立佛堂，为人做法事，佛教特征日益突出，但其不圆颅、方顶、非僧非道的特性不变。斋教在教义上揉和儒、释、道三家思想而成，其外貌似佛，内持似儒，科仪则近道。斋教传入台湾，以康熙年间金幢派蔡文举门下为最早，龙华派则于乾隆二十年（1756年）在台南安平海头社设立化善堂。斋教徒都是俗人，但又遵守严格的戒律，组织严密，信徒多为农、工、商人，信徒间发起各项慈善事业，互帮互助，并形成一個内部互相交易的圈子，一时间吸引了很多下层的百姓加入。但是，清朝时对斋教施行查禁，认为斋教并非正统的佛教。不过，佛教在台湾流行很广，至日据初期，斋教最大的龙华派就有佛堂200多座。到日治时斋教也受到限制，甚至改斋堂为神社，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抗。1912年台南龙华派斋堂七堂即联合成立“斋心社”，以同心抗日。1915年斋教徒余清芳、罗俊等人号召台湾人民抗日。后来，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台南的斋教三大派14堂还联合组成了“爱国佛教会”，向“正统佛教组织”靠拢，但斋教在民间佛教中的影响力一直很大，且发展很快。据统计，台北市有25座佛寺建立于日治时期，其中大多为斋教。

台湾光复以后，佛教也开始进入复兴阶段。1945年由善慧法师组织成立了“台湾佛教会”，本圆法师被推举为第一任理事长。1949年大陆解放以后，有大批的大陆僧人随国民党一起到台湾，使台湾的佛教有了更大的发展，短短几年就兴建了多间寺庙，并在台湾恢复了“中国佛教会”。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台湾正统佛教有四大

派，即月眉山派、观音山派、法云寺派和大岗山派。除日本佛教和正统佛教以外，斋教有龙华等派的各地斋堂，多流传于民间，也有一些其他宗派的零星寺院。但在 1951 年以前，台湾的佛教寺庙从传承上看基本有两大系统：一是中国传统的佛教，一是日本佛教，也有不属于这两个系统的其他寺庙。为了恢复和发扬中国传统佛教的精神，同时“中佛会”更为了将台湾各派佛教势力统一到自己的范畴之中，由“中佛会”理事长白圣发动，于 1952 年在台南大仙寺依照“中佛会”自行制定的传戒规则，召开了台湾佛教界第一届传戒大会，有 500 多人受戒，自此，“中佛会”一直控制着台湾佛教界。同时，台湾佛教在寺庙的兴建、文化慈善事业、僧侣的教育、弘扬佛法、国际交往等方面开始了有系统的发展。40 年代末期，大陆僧人涌入台湾，在各地建立了大批的寺庙，使台湾的佛教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当局对佛教等传统宗教的管制并未改变，长期以来对宗教采取的是管制与利用的两手政策，并沿袭 1930 年（民国十九年）颁布的《监督寺庙条例》，对佛教等中国传统宗教加以限制。1953 年更发生了印顺法师所著的《佛法概论》被认为是“为匪宣传”的事件，一度影响了佛教的发展，不过，整个 50 年代，台湾佛教还是在稳步发展。据 1960 年台湾省民政厅的统计，全台佛教寺庙 1,392 座，教徒 823,123 人，佛学研究机构则有“中国佛教研究院”等 10 个单位，佛教团体所开办的普通中学有 4 所，佛教刊物有《中国佛教》月刊、《海潮音》月刊等 11 种，各大学也相继成立了佛学研究团体。60 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科技的应用，使传统的佛教有了改革的转机。在传教弘法方面采用了现代的电视、广播布教。并大量印刷佛教书刊，佛学研究也较兴盛。到 1974 年，据台湾官方的统计数字表明，“台湾有 2,520 座佛寺，7,450 个僧人，5,759,000 名佛教徒”²。近十余年来，一些类似佛教的新兴宗教及其它地区的佛教派别也传入或产生，如西藏的藏传佛教、

本的创价学会、灵仙宗等,吸引了不少青年人。

(二)现状与特点

1. 台湾佛教现状

据台湾“内政部”1988年统计,至1987年底,在台的佛教寺庙总数达3,265座,宗教职业人员5,860人,信徒人数3,561,300人,佛学院21间,佛教中学8间,佛教界兴办的幼稚园有82个,养老院9间,育婴堂5个,佛教医院6间,诊所3个,出版社有9家,佛教月刊有39种,佛教成为台湾信徒最多的一种宗教。

根据“《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92年)数字,佛教是台湾十几种宗教中最大的宗教,约有佛教寺庙4,020座,另有数千个佛堂精舍,号称有僧尼4,000多人,信徒有4,856,000(一说1,000万)。

2. 台湾佛教势力

台湾佛教大致分为四大派别,在国民党来台以前,台湾佛教存在两大派,一是以太虚为首的改革派,另一个是以圆瑛为首的保守派。国民党来台后,保守派得到台当局的扶持,圆瑛的弟子白圣掌握了“中国佛教会”,并排挤了太虚的弟子印顺一派。这样,台湾佛教40余年来就以“中国佛教会”为代表,充当了保守势力,与台当局关系亲密。白圣还担任了国民党的“中评委”,而国民党也一直介入“中佛会”领导层的选举。近年来随着台湾政治形势的变化及佛教自身的发展,内部发生了分裂,逐渐形成四种势力:一是“中佛会”白圣系统,也称北派,在台北有了中的善导寺、成一的华严莲社、悟明的临济寺、净心的高雄兴德寺、悟智的十普寺等;二是佛光山星云系统,也称南派,有高雄的佛光山寺、宜兰的雷音寺、圆明寺、台北的普门寺等;三是被称为第三势力的系统,也称“元宿派”,既有大陆的僧人,也有台湾本省的僧人,彼此较独立,有台中圣印的万佛寺、慈明寺,台北的法光寺、桃园圆光寺,这一系统名义上是在

“中佛会”之下,在实际上与其若即若离,在台政界也缺少代言人;四是印顺系统,主要以佛学研究为主。另外,印顺的弟子证严在花莲办的慈济精舍和慈济医院等在台湾的影响最大。白圣圆寂后,“中佛会”的势力已削弱,星云的势力正大大加强。不过,各派皆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来影响民众,扩大自己的力量。

3. 台湾佛教弘法及研究状况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台湾各佛教团体、佛寺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弘扬佛教,如使用广播、电视、电影、文艺演出、出版发行等传播媒体,举办各种佛教法会、演讲会、弘法游行、宗教旅游观光、佛教圣地朝拜等活动,来吸引人们,招募信徒。例如在 1987 年花莲和南寺的僧人传庆首创“多媒体”的弘法传教法,即利用现代声光科技、透过幻灯片、佛教音乐来解说佛祖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向公众宣讲深奥的佛学哲理,以现代科技来诠释传统的佛教教义。1992年在和南寺建成世界首座佛教多媒体的视听馆——般若文化讲堂,以吸引更多的信徒。此外,“中国佛教会”利用台湾“中国广播公司”(台湾第一大广播公司)每月一或二次向大陆传播佛法,还以英文讲经说法。另外,佛教界内部也不断改革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旧制度,大兴传戒传法、印经办报,以提高信徒的佛学修养。

台湾近年来因佛教界的大力弘法,佛教的社会影响力日增,佛学研究成风。首先,开办了许多佛学研究所,如有中华学术院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光山中国佛教研究院、灵山佛学研究所、净觉佛教研究所、华冈佛教文化研究所、华梵佛学研究所、圆光佛学研究所等等。此外,还在一些高等学校如中国文化大学、台大、政大、辅大等均设立了佛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并成立了各种大专佛学社团,开展各类的佛学讲座,聘请博学的僧尼讲学。台湾大专青年研习佛教始于50年代,发起人是台大教授周宣德,他是一位佛教居士,最初印发佛经赠阅大学生,后又创立“中国佛教国际文教奖学金

会”，1962年在台大首次成立慈光学社，后改名为晨曦学社，以后有台湾师大的“中道学社”等30多所大专院校相继成立佛学研究团体共60余个，拥有的会员近10万人。其次，佛教出版事业发展迅速。1949年以前，全中国的佛教期刊共有70种，而在1977年时台湾的佛教刊物就有25种；主要的佛教刊物有《中国佛教》、《狮子吼》、《菩提树》、《中华佛学》、《海音潮》、《光明》、《现代佛教》、《觉世》、《新觉生》、《华冈佛学学报》等。“中华学术院佛教文化研究所”所主编的《清凉》杂志及《佛教文化学报》影响最大，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地位。台湾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佛教书籍也颇为可观，从1956年开始修订《中华大藏经》，到1975年时出版了两辑，1981年台湾佛教书局又出版了《佛续藏经》。所以，目前台湾仅《大藏经》就有《中华藏》、《大正藏》、《高丽藏》、《嘉兴藏》、《碇砂藏》、《大藏经补编》，另有日文版的《南传大藏经》与《日本国译一切经》等十种之多，甚至一般的信徒都拥有一部《大藏经》也并不少见。鉴于近年来在台湾兴起的佛教热，社会上的一些出版机构也印制佛教图书，以迎合公众需要。几十年来台湾出版的佛教书籍、刊物，种类达千种，如慧炬出版社出版的佛书有四十多种，菩提树杂志社出版的佛学丛书有20多种等等；在台北还成立了“民国高僧传编纂委员会”；“中华学术院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的《20年来佛教经书论文索引》、《中国佛教艺术探源》、《中国佛教音乐之研究》、《佛教文化论集》、《敦煌壁画佛像图研究》；由张曼涛从1975年开始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共有100册，是一部集现代中国佛教学者及名僧佛学研究成果的总汇；由杜洁主编的《中国佛寺史志汇刊》，共80册，两辑，是第一部寺志的汇编，等等。这些佛教书籍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促进了台湾社会佛教研究水平的提高。同时，台湾佛教界还加紧将佛教经典译成英文等外文，如“台湾国际译经院”在1979年时将《大宝积经》译成英文，后又陆续英译了《圆觉经》、《楞严经》、《楞伽

经》。

台湾各个大的寺庙都比较重视培养佛教人才，早在1948年中坵圆光寺的妙果法师首先聘请慈航法师来台，创立了台湾第一间佛教学院。从60年代以后台湾各地相继兴办了佛教教育事业，不过最初大多是初级佛学院，60年代中期后开始发展为高级佛学院；到1977年时台湾共有37所佛学院，也兴办了各类佛学补习班，有的还办起了佛教大学。如佛光山于1973年开办的佛教大学是一所丛林大学，除招收和尚、尼姑外，也准俗人入学，学生均中学毕业，需修满180学分后方可毕业。一些佛教研究机构还招收研究生，以培养佛学高级研究人才，如“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在1981年就招收了10名研究生，学制三年，要修完20多门课程，其中既有佛学及佛教历史，也有一般的哲学和宗教理论，还要选修藏文和梵文。80年代以后，台湾佛教界还选派僧人到日本、泰国等地深造。目前佛教界年轻一代的佛教领袖，几乎都有高等学历。

4. 台湾佛教的特点

台湾佛教与大陆汉地佛教的传统略有不同。如前所述，从传承上讲，它既有东南沿海一带斋教的成分，也受日本佛教传统的影响，所以，台湾佛教呈现以下特点：

(1)受斋教的影响，“在家佛教兴盛”。所谓“斋教”即为佛教临济宗旁出的一支，福建、广东一带最为盛行，明末时传入台湾，因它可以不出家、不着僧衣、不落发修行而得以在民间广泛流行。斋教敬奉佛祖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信徒可经营家业，但要恪守佛戒，食素戒荤，不赌博、不饮酒。因教徒以蔬菜为主食，又被称为“菜教”，教徒互称菜友，男的称为斋公，女的称为斋姑。斋教内部又分为龙华、金幢、先天三派，在台湾的传播过程中又吸收了儒教、道教的成分，因此有“道冠儒履释袈裟，三教原来共一家”的说法。

(2) 受日本佛教的影响,表现在佛寺的建筑风格上及教徒的生活习俗方面。台湾在1895—1945年的日据时代,日本的佛教新净土宗(又称佛教净土新宗)或真宗传到台湾后,受到日本占领者的极力推崇,其教义、教规和习俗与中国传统的佛教有很大不同,男女信徒可以过一般的家庭生活,不禁婚姻、不食素。虽然自抗战胜利后日本佛教在台湾的影响大大削弱,甚至销声匿迹,但留下了许多日式的佛寺,至今仍可见到。另外,在当今台湾一些寺庙里,允许僧尼同住在一个寺院,这是受了日本佛教的影响。

(3) 台湾佛教尤其敬奉观音,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究其原因,大概因为最早移居台湾的闽粤先民,传去了南方佛教禅宗分支临济宗和曹洞宗,而这两支皆供奉观音,特别是泉州的移民,还将原籍佛寺中供奉观音菩萨的香灰带到了台湾。至今,台湾许多佛寺里都把观音菩萨摆在显著的位置。台湾的妇女对观音也特别敬奉。

所以,台湾的佛教鉴于以上的历史原因,其占有主导地位的传统佛教既有斋教的影响,又有日本佛教的痕迹,而在系统上,则多属禅宗的临济系,但在宗教仪式上却有明清以来禅净密等互相融合的特点,而一般的信徒则以信奉观音菩萨的居多数。在礼仪上,台湾佛寺大多是“禅净双修”。1973年“中国佛教会”出版了《佛教朝暮课诵》,该书取材于净土宗印光法师认可的灵岩山寺念诵仪规,却声称是“综合各宗所习用者”,可见,净土宗对台湾佛寺礼仪有着强烈的影响。在佛寺建筑方面以歇山式最为风行,但建筑规模较小。一般寺庙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式配置歇山式屋顶,而歇山式又以北方式最多,其次为南方式。台湾佛教近十余年来发展迅速而又显著,尤其是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以后,各种佛教团体、佛学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佛教寺庙纷纷修复或设立而许多佛教宗派也将台湾视为新的发展基地,竞相传入。如藏传

佛教近年来就有一些喇嘛来台频繁传法，吸引了大批的听众，甚至建立寺庙，有了活佛转世，一时间信仰藏传佛教的人趋之若鹜。其次，日本的日莲正宗在台湾的发展也很迅速，因其传教方法独特，只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主张“唱题成佛”而快速蔓延，还成立自己的佛教组织，与“中华佛教居士会”结盟，以扩大影响。而像灵仙宗这样的佛教新兴派别虽然得不到正统佛教的承认，但在年轻人中间逐渐得到认同。灵仙宗由移居美国的卢盛彦创立，其著作颇多，也很畅销，内容既说禅又谈密，深入浅出，据称目前信徒已有十余万。这些佛教派别的传入，在台湾掀起不小的佛教热。

5. 佛教界兴办的社会慈善事业

近年来台湾佛教界也办起各种弘法活动和慈善事业，在社会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佛教信徒成为台湾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其佛教的一大特点是积极入世，参与社会活动。而台湾寺庙的经济来源及从事社会福利事业所需经费则靠信徒的捐献，尤其是富商和工业界人士，数目很大，台湾的佛寺均较富裕。但对于这些捐献，大多数寺庙除日常开支外，均用来开办社会福利事业。早在1947年5月，“中国佛教会”就在南京会议上正式设计了社会福利及救济方案，而今台湾各派佛教组织和寺院均办有社会福利设施，大力开展佛教文化教育和福利事业，如兴办幼儿园、普通中、小学，还有许多高等佛教院校、众多的出版机构和图书馆，发行了大量的佛教经书和报刊，到1987年底，台湾有佛教出版社9家，有佛学院数十间；社会福利事业主要有孤儿院、养老院、诊所、医院、宾馆和公墓等100余个。另外，在平时各个寺院对学校、救灾、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也多有捐献，还在各大寺庙前设立广场，供人们娱乐或作市场、庙会。1976年，台湾当局还表彰了44所寺院为社会福利事业所作的贡献，其中静思精舍捐献了300万元新台币。

6. 佛教界与台政界的关系

随着佛教在台湾的迅速发展，台政界人士很重视佛教的影响，甚至皈依了佛教，如前“国防部长”陈履安几年前就开始参禅食素，全家皈依了佛教；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司法部长”林洋港、“监查院长”黄尊秋、“内政部长”吴伯雄等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台中的玄类寺位于日月潭畔，其中有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的匾额及社会名人书写的对联；高雄的佛光山在1971年观音殿落成典礼上，当时的国民党之“内政部长”主持了仪式，蒋纬国还曾签名为该寺修造佛像捐款；佛光山多数的建筑物如育幼院、大门等据称是民意代表、银行经理或工业家及富商们捐献的，佛光山举行大的法事时，地方官吏及高级将领也前去捧场，可见佛教界与政界及社会上层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佛教界也积极介入政治活动，有的还担任了国民党的“中央评议员”“国大代表”等职务，对台湾社会直接发挥作用。例如，在国民党的第十三届代表大会上，白圣、星云被任命为“中央评议委员”；“中国佛教会”的理事长悟明则被推举为“中央候补委员”。

7. 国际联系

台湾佛教各派均十分注意发展和联络广泛的国际关系，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东南亚和欧美许多国家都有台湾僧人兴建和住持的寺庙，吸引了许多华人。另外，台湾的佛教界在国际性的佛教组织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如台湾佛教界在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总部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世界佛教僧伽协会总会就设在台湾，台湾佛教界在该组织领导层中占有一定比例。台湾各佛教派别经常举办定期或不定期的国际性佛教学术会议，开展佛教国际间的学术交流。1981年在台北及高雄召开了第三届大会；1992年11月还首次在台湾召开了“世界佛教友谊会第十八届大会”，聘请了佛光山星云为该会唯一外聘永久荣誉会长，佛光山的慈惠获选为副会长，“中华佛光协会”秘书慧群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世界佛教育

年会里,台湾的佛教界也很有影响,佛光山的心定法师及黄书玮^①被任命为副会长、明光为该组织的社会经济发展常设委员会主席。同时,台湾佛教界还向非华人区域布教弘法、建造寺庙,如帮助日本建立世界上最高的佛像,还在俄罗斯捐资帮助恢复佛教。台湾佛教界还与日本及南韩的一些佛教组织建立密切的关系,三方的佛教交流非常频繁,如从1978年起,三方佛教界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佛教学术大会。台湾的白圣还曾担任“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

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与发展,许多台湾的佛教界人士到大陆探亲与访问,或直接拜会大陆的佛教界人士,使两岸佛教界增强了了解与友谊。其实,目前台湾佛教界的一些实力派人物大多是大陆去的僧人或是他们的传人。所以,他们在政治上多属“统派”,并积极捐助大陆佛教界修缮寺庙。

二、主要寺庙

由于台湾的佛教与大陆的佛教一脉相承,所以其大部分的佛教寺庙也与大陆的佛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有许多寺庙的名称即是仿效了大陆佛寺之名称,如台北的龙山寺就仿效了泉州的龙山寺、台南的开元寺仿效了西安和泉州的开元寺;其次,许多佛寺的开山祖师就来自大陆,尤其是福建和广东两省。因此,台湾寺庙的建筑布局、寺院的制度也与大陆的佛寺十分相近。以下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佛寺。

1. 十普寺

位于台北市,原名“了觉寺”,创建于1929年,1945年才改为现名,1948年冬白圣法师在此创办了“中国佛教藏学院”,还创立了慈济会等机构。

2. 龙山寺

位于台北市西南广州街，临淡水河，是台北寺庙中最古老的。始建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越年建成，这主要是华南汉族移民为奉祀“安海观音”而建立的，多由福建泉州的移民捐资建筑。因该庙与台北市早期移民有关，一向被视为福建泉州龙山寺的分支及祖籍的象征。到目前龙山寺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其间曾多次遭台风、地震或炮火的毁坏，经历了四次大修，1920年第三次大修之前是木结构，以后改为砖石结构，请了福建的和尚来做住持，还请来了泉州的建筑师。寺的山门之上饰以两龙，中间是一火珠，据说可以防火，内部有观音殿，两旁分设一钟楼和一鼓楼，观音殿前有石雕盘龙柱，殿内的雕刻及绘画均十分精美，所供奉的神像颇多。龙山寺一直是台北最大、香火最旺的寺庙，曾一度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中心，所供奉的神像颇多，除主神观音佛祖(也称安海观音)外，还有文殊菩萨、韦驮、文昌帝君、福德正神、城隍爷等，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有盛大的神诞祭典；若从供奉的神像中可知该寺并非一纯粹的佛教寺庙，它是一座佛、道及民间信仰相混合的寺庙，在大殿里还供奉妈祖，被视为海上圣母。据说，在寺庙初建时并没有妈祖，是后人增设的。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元宵节时，这里都举办盛大的花灯竞猜会，热闹非凡。龙山寺建筑风格典雅，内部装饰华丽，匾楹有清光绪帝的“慈晖远荫”、明代张居正的“海藏华殿”、近代国民党元老、书法家于右任的“光明净域”等等。

3. 慈云寺

在台北县的中和乡，因位于石壁湖山上又被称为“慈云岩”。原寺建于清朝咸丰时期，即1851至1861年间，后被废弃，迁往板桥，改名为接云寺。1954年在原址上开始重建慈云寺，得到民间的大力捐助，1974年才完成。该寺依山而建，建筑风格也采用了中国寺庙的传统形式，只是正殿为两层楼建筑，底层内奉观音大士，右边是

一巨大的铜钟,二楼是佛殿,主祀的佛像是一白色大理石雕刻的释迦牟尼像,前面置木鱼和磬各一。该庙的第一任住持是达进,她12岁时开始吃斋,30岁削发为尼,1962年创立了佛学院,1974年还在该寺的正殿旁建起一小型图书馆,重视其弟子的佛学修养。

4. 狮头山

位于新竹县与苗栗县之间,其所在的山峰如狮子状,故称此名。狮头山上佛寺很多,大部分是天然岩洞建成的,有“台湾佛地”之称。因山状如狮头,因而得名。如山上有三狮朝阳、两狮伏地,形成五狮弄球之势。但日据时,这里才有一座佛寺,后来寺庙逐渐增多,游人及香客也大大增加,到80年代初已有9座寺庙。山腰有狮岭佛洞、开善寺、金刚寺、万佛庵等,其山门状如古城,上书“狮头山”三个大字。进入山门,只见古木参天,晨钟暮鼓,游人可见灵塔、望月亭、狮岩洞、金刚寺、水帘洞,海会庵等,其中最富有特色的是海会庵,内设有四大天王堂,建筑风格模拟了大陆一般佛寺的式样,这在台湾佛寺中是不多见的。其次,灵霞洞与金刚寺的石窟与石刻也很著名,利用现代建筑材料做装饰,以石窟为佛殿,在其中雕刻佛像。整个狮头山的佛寺建筑朴素典雅,并与雕刻混为一体,既是佛教圣地,又是台湾著名的风景名胜。

5. 开元寺

原名“北园别馆”,位于台南城东北。此庙修建于明末清初,其前身为郑成功之子郑经为其母董太妃所建的别墅,名“北园别墅”。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台湾巡道周昌将其改建为佛寺,取名“海会寺”,后一度又改称“榴禅寺”“海靖寺”,1859年才定名为“开元寺”,这是台湾现存寺庙中最古老、最著名的佛寺之一。该寺位于台南,曾经多次修缮,得到地方官府及民众的资助。国民党到台湾后,该寺又经过几次大修,重修了主殿、观音殿和灵骨塔,使之成为台南最大的佛寺。此庙的第一任住持名为志中,来自福建泉州,后

任的数位住持中有六位曾到福建学习佛法，可见，开元寺与福建佛寺的渊源关系。寺院呈四合院式，殿堂配置颇有大陆佛寺的风格，只是在观音殿的左侧设有南山堂，以纪念南山律宗开创人道宣。

6. 圆通寺

位于台北，创建于1926年，第一任住持是妙清法师，1955年圆寂。其建筑也成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式，四周为殿堂，中间是空地，主殿是石质架构，三面为走廊，还有一西式石柱，大概是日据时代留下的；在正殿的入口之前，有一石像炉，作焚香之用，在正殿之后，还置一石灯，为无上智慧之象征，这在日本的寺庙里也较流行。正殿内供奉的是作禅定状的释迦牟尼像，在山门的中央还塑有释迦牟尼佛的幼年像，这是台湾20世纪初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

7. 永明寺

座落于台北阳明山的半腰处，建于1942年，创建人为玄妙法师，他也是内湖的圆觉寺的创始人。该寺建成后，玄妙自兼第一任住持，后又命其女弟子信定住持。永明寺的规模较小，建筑风格也是台湾传统的平民式样，较简朴，但极重视佛教教育，1971年晓云法师在此庙内设莲华学佛园，成为台湾北部最有名的佛教教育中心，主要培训女尼。

8. 佛光山

位于高雄县大树乡，原称麻竹园，建立于1967年5月16日，开创者为星云法师，其建筑规模在台湾属最大，主要包括观音殿、朝山会馆和佛教大学，所建费用多为信徒捐献。其建筑均为钢筋水泥构造，建筑风格采用了中国传统佛寺的模式。山门被称为“不二门”，在山门的后面是朝山会馆，大殿内的佛像也均为钢筋水泥所造，这代表了台湾现代佛像雕塑的风格。佛光山口是一尊笑脸迎人的弥勒佛，其后是三角形的佛光山开山纪念碑。整个佛寺包括大雄宝殿、大悲殿、大智殿、大愿殿四个主要建筑。该佛寺改革了

中国传统佛寺的管理体系，建有一套全新的管理佛寺体制，设立“佛光山宗务委员会”，下设“五堂”、“二会”，五堂即宗务堂、教育堂、文化堂、赐善堂、福利堂；二会即计划工作会、策进工作会。各堂及两会之下还设立众多的部门，如宗务堂：有僧众及信众两部组成，僧众部下设法务处、人事处、总务处、会计司库、福利设施、僧籍资料等；信众部负责信徒资料、功德资料、布教等。教育堂：分为专门教育、信徒教育、大专教育、社会教育、儿童教育五个部分，专门教育下有“中国佛教研究院”，内有研究部、专修部、外语部、东方佛教学院；信徒教育负责佛学讲习、佛学讲座、朝山、在家戒会、念佛会、法会座谈会等事务；大专教育有夏令营、冬令营、大专青年佛学辅导中心、社会弘法习会及专题演讲；社会教育有监狱布教、公司布教、学校布教、游客布教、电视弘法、老人夏令会等；儿童教育有星期学校、儿童夏令营、托儿所、幼稚园、幼儿教师资训练班。文化堂：有佛光出版社（出版佛教词典、佛光学报、佛学丛书、佛学名著、佛法手册、每月印经）、觉世旬刊社、普门杂志社、佛教文化服务处（佛经流通、佛书法器、佛像文物）、中英佛学丛书（翻译英语佛学名著、编辑英语佛学丛书）、图书馆。慈善堂：包括大慈育幼院、兰阳仁爱之家、佛光精舍、佛光慈善基金会、普门医院、佛光诊所、冬令救济会、万寿花园公墓及观音放生会。福利堂：创办工厂（僧伽被服工厂、素食工厂、法器工厂、佛教纪念品工厂）、经营农场（培植苗圃、种植蔬菜、开辟果园）、举办餐旅（设立会馆、素食餐厅、代办旅游、交通运输）、设立书局（流通佛经、供应佛书、佛教文物）。计划工作会：设有秘书处，制定各种计划、各种设计、研究办法，还负责经费筹措。策进工作会：有工程处，还负责工作考核、业务推动、人事制度、进修制度。可见，佛光山的体系开始走向俗世化、现代化和企业化。

除了佛光山“本山”以外，分支机构还有台北的普门寺、高雄

贤寺、宜兰雷音寺、彰化福山寺、嘉义圆满寺、台南福圆寺、善化慧慈寺、澎湖信愿寺等；另外在台湾本岛以外开设了海外分支机构，如美国洛杉矶的西来寺、白塔寺、莲花寺，马来西亚的青莲堂、鹤鸣寺，香港的佛香精舍等。在佛光山及其分院经常举办定期的佛学讲座、念佛会、法会等，一些政要也前来参加；还经常举办夏令营，吸引青年人学佛；在佛光山内设有东方佛学院及“中国佛教研究院”，专门培养佛教人才，另外还设一所私立的普门中学，及大慈育幼院、佛光精舍等社会福利机构。目前，佛光山已经发展成为全台湾势力最大的佛寺。

9. 玄奘寺

座落于日月潭畔，创于 1964 年，得到台当局的支持，也是台湾唯一供奉唐代高僧玄奘的寺庙。寺内藏有一片玄奘的头骨，这块头骨是日本人占领南京时从大报恩寺中盗走的，后经台湾佛教界的要求而得以将其中的一块归还，台当局批专款专地建立寺庙加以供奉，寺内还留有蒋介石所赠的匾额。该寺的建筑富有唐代的特色，中间的主殿位于高台之上，高台的四周是阶梯，代表四方佛，正殿内玄奘像为泥塑，左手持梵文经卷，右手持一戒刀，背上还负有经卷，这大概是玄奘从印度取经返国的情景。这里因环境优美，也吸引了许多的香客和游人。

10. 法华寺

原名“梦蝶园”，位于台南市永康里，是明末时李茂春所建。李茂春字正青，系福建省龙溪人，清康熙三年（1664年）受郑经之请到台湾，后定居台南市永康里，构筑草庐，陈永华将此草庐题为“梦蝶处”，并作《梦蝶园记》。1683年郑氏归顺清朝后，“梦蝶园”改名为现名，寺内设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大神庙、关帝庙、法堂、客堂、方丈等。寺前有南湖，湖畔建有半月亭。

11. 妙法

位于桃园县大溪镇的永福里,只有 20 年的历史。在山门的入口处,有两只巨大的石狮子,脚下踏着地球,据说象征了世界大同与天下为公。该庙依山而建,山门下是弥勒佛笑像坐镇,顺斜坡而上是大雄宝殿。这是一座三层的建筑,有中国传统寺庙的风格,屋顶是金色的琉璃瓦,殿内还有朱红的石柱。这里的长住都相当年轻,人数有二、三十人。寺庙的第一层供奉西方三圣,二楼供奉着五尊金身并坐一排的佛像,三层是大雄宝殿,供经常举办法会之用,特别是旅美的高僧宣化每次回到台湾时,都要到妙法寺来讲经,吸引不少的香客。

12. 弘法禅院

位于苗栗县狮潭乡竹木村,住持是香港的觉光法师,但真正负责禅院内外事务的是禅慈法师。禅慈在香港珠海书院进修时曾担任觉光法师的助手,负责社会福利工作,1982年时回到台湾,负责该禅院的事务,并成立了养老院。该庙原是日据时留下的建筑,距今约有七、八十年左右。大殿里供奉二十四臂的千手千眼的观音菩萨,右面是知客室、寮房及仁爱之家咨询处,左面是1982年才增建的普济讲堂。

13. 临济护国禅寺

位于台北圆山,是一所融中日两国建筑风格为一体的寺庙。该寺已有 85 年的历史,原初的大殿只剩下大雄宝殿,其他建筑均为后建,包括新建的弥陀殿、华藏殿等。此庙乃日据时代总督儿玉源太郎所创建,开山祖是日本人梅山玄秀和尚,属临济宗。现寺内灵塔里塑有梅山玄秀的雕像。台湾光复后,该寺由观音山凌云寺住持本原法师接管,白圣曾任该寺的董事长,目前的住持是明田法师。在白圣时代,寺内开办了临济幼稚园、佛学研究院、戒光佛学院等。

三、主要组织

1.“中国佛教会”

其前身为“中华佛教总会”，1911年4月成立于上海，1947年5月在南京改组为中国佛教会。1949年该组织随国民党当局由大陆迁往台湾，于1950年3月14日在台北重新登记、复会。1956年6月创立会刊《中国佛教》（月刊），这是由“台湾佛教编审委员会”出版，以佛教佛学研究为主的综合刊物，原发行人一直是前“中国佛教会”会长白圣，社址在台北南昌街2段140号十普寺。“中佛会”自称是台湾佛教的最大的机构，实际上它是靠着国民党当局的支持来操纵台湾佛教界的。1979年“中佛会”成立“电视弘法委员会”，由净心任主任委员，负责在台湾“中华电视台”开播“光明世界”电视弘法节目，扩大了“中佛会”的社会影响。目前，该组织在台湾省、台北市、高雄市设有分会，并在21个县、市设有支会，吸收寺庙斋堂为团体会员，僧尼为当然会员。另外，“中佛会”在海外华侨居住地区还设有直属支会。总会设秘书处及总务、会籍、法务、议事、财务、联络六个组。现在，“中国佛教会”的团体会员达1,430余个，个人会员有41,680人³。现任理事长为悟明法师。

2.“中华佛教居士会”

成立于1969年1月5日，设在台北，创办人是李睿担，他还担任了首任理事长。下属有台湾省分会和一些县市分会，在海外还聘有委员。该组织“为在家佛教信众修持佛法之道场”，所信奉的宗旨为“承佛教三藏经典，对显密八宗一律平等，分别依各宗教义弘扬佛法，并配合社会需求，发扬国伦理德，倡办社会福利事业，以净化人心为目的”。现在，该会有团体会员77个，个人会员384个，会员的总数多达2,100多人。另外，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还设立了直

属分会。

3. “台湾佛光协会总会”

创始人是佛光山的星云法师，也是在佛光山的基础上成立的。1976年，星云在台湾创立佛光山，标榜佛光山有十大性格，即“佛光山是人间的、大众的、有文化性、教育性、有国际性、慈济性、菩萨性、也是融合的、喜乐的、包容的……”⁴。佛光山虽然是一僧团，但因为建立“人间净土”而倡导“人间佛教”，积极关注社会，大力兴办各种实业，服务社会，或用以佛教教育。其次，佛光山还办有慈善机构，如“大慈育幼院”、云水医院、佛光诊所，为无依老人兴办的“仁爱之家”等。

佛光山的组织较健全，采用了世俗的建制，通过各种会协调解决问题，设有宗务委员会，下设四院六会，如督监院、教育院、文化院、长老院，与传灯会、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佛光山净土文教基金会、佛光山大学教育筹建委员会、国际佛光会推展委员会、国际佛教促进会等，还有各种董事会、信徒会，并已向台湾政府登记，具体有“普门中学董事会”、“佛光山慈悲基金会董事会”等。1993年10月，由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创办的佛光大学已在宜兰礁溪破土动工。

佛光山在台湾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一个佛教组织，入会的会员据称已逾百万。佛光山有自己的出版系统，即佛光出版社，还成立了“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重新编修了《大藏经》，出版《佛教史年表》，印行了《佛光大辞典》、《普门杂志》等，设立了佛教文物陈列馆。在佛教教育方面，从开山以来就经常在各大学、各工厂举办教育性的佛学讲座，还大力培养佛教专门人才，开办了中国佛教研究院、东方佛教学院、台北女子佛学院、福山佛学院、都市佛学院及国际佛学院的英文佛学班、普门中学等。

4. “国际佛光会”

是以台湾星云法师的佛光山为主体的国际性佛教组织

1990年8月10日,由星云倡导,首次在台北召开了佛光会发起人座谈会;1991年2月3日,台湾“中华佛光协会”最先成立,同年5月31日,美国佛光协会在洛杉矶西来寺成立,6月27日,香港佛光协会也举行了成立典礼。从1991年7月至1992年5月,星云法师在世界各地联络,筹备成立世界性的佛光会。1991年9月星云还派高雄县大树乡佛光寺的僧人慧礼到非洲弘法,后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设立了两个讲堂。1992年5月16日,国际佛光会(Buddha Ligh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美国洛杉矶音乐中心及西来寺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51个地区会员的代表、共4,000多人出席了成立大典。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的会址设在美国的洛杉矶西来寺,总会长是星云,副会长有6人,代表台湾地区的副会长是台现任“内政部长”吴伯雄,代表日本地区的副会长是前日本佛教大学校长水谷幸正博士,代表巴西地区的副会长是有“巴西王永庆”之称的华侨黄豆大王及石化巨子林训明,另两名分别是美国佛教徒严宽佑、澳大利亚的佛教徒安那鲁达;大会还选出了16名理事,大多为华人。在台湾,佛光山的势力正在迅速扩大,1993年台湾立法委员的选举中,佛光协会的会员多达26人,而在星云影响之下的立委还有40名,并且这些立委是跨党派的。到1993年2月,全球的佛光会分会及协会已有63个,会员总数达50万人,据称还有许多正在筹备中。1993年2月13日,该组织还自创了佛光纪元年号,以佛光山开山的1967年为佛光纪元一年,至此,佛光山寺已在全世界7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派下道场。为了使该组织发展成为国际性的、世俗性的机构,目前,国际佛光会正在筹备改组内部的组织,建成一佛光事业机构,总部计划设在香港,它所承揽的项目包括百货、食品、文化、教育、出版、印刷、贸易、旅游、建设、金融,其市场则看好了中国大陆,盈利则用来补贴世界各佛光分会。这实际上是将佛教彻底世俗化,将国际佛光会企业化。

1993年10月，“国际佛光会”在台湾召开了第二届代表大会，来自世界五大洲的2万多名会员出席了大会，其中大部分是华人。在开幕典礼上更邀请了台湾“总统”李登辉到会祝词捧场。这次大会计划推动一个净化人心运动，以“国际佛光会”为组织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开展。

台湾佛光协会总会的成立，标志着佛光山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佛教组织，它先后在美国洛杉矶建立了西来寺、在旧金山有三宝寺，在圣地亚哥有西方寺。此外在夏威夷和关岛等也有佛光会的分会。佛光协会总会还通过举办各种世界性的佛教会议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如世界佛教青年学术会议、世界显密佛学会议、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十六届大会、美国宗教比较研究会议、世界佛教禅学会议等。目前，国际佛光会正参与了联合国一个特别委员会与尼泊尔政府共同签订的建设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园的发展计划。

5. “中华民国佛教青年会”

1989年6月17日成立于台北，创始人是净耀法师。其成员是一群年轻的出家人或在家的佛教信徒，年龄限定在18—50岁之间。该组织主要进行弘扬佛法、参与社会活动等工作，以扩大佛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它宣扬“人间化、社会化、民主化、制度化、专业化”，主张应发挥佛教徒的社会力。目前，佛教青年会内共设有13个委员会，其中以大专青年委员会与社会服务委员会为直接参与社会工作的单位，并可直接接触青年；前者主要负责加强大专院校佛法弘扬、培养佛教青年人才等，后者负责各种社会慈善事务，如设立观音线协谈中心、监狱布教组等，在社会上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6. “慈济功德会”

1966年由静思精舍的法师证严创立，原名“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初期以救助贫民和病人为主。为解决台湾东部医疗水准的落后状态，证严法师发动信徒捐款，经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986年建

立了一间高水平的慈济医院。这所医院从 1984 年开工,经两年五个月后建成一座现代化的综合医院,对改善台湾东部地区的医疗水平起到很大作用。目前,该医院各科齐全,设备精良,有普通病床 590 张,特护病床 136 张,员工 971 人,另有 1,000 多志愿的佛教徒前来做义工。这所医院是台湾佛教界所承办的最大的医院。1989 年,证严法师又创建了慈济护专,继续以“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四大原则服务人间。现在,慈济功德会的主要精神是慈悲济世、救助贫苦众生,在台湾社会各界得到极高的评价。该组织主要以社会救济为主,资金大多靠社会捐赠,设立有“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随着近年来台湾佛教的兴旺与发展,慈济功德会的会员也多达 250 万人,委员 3,000 多人,荣誉董事 100 余人,遍及海内外,募集的基金则超过了 15 亿元,其捐款收入每年有十余亿元。该组织救济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台湾,还泽及大陆、孟加拉、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另外,该组织还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到 1991 年上半年已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设立了支会,已走向国际化,并成立了国际基金,影响扩展到世界范围。

“中华民国日莲正宗佛学会”

台湾的“中华民国日莲正宗佛学会”源于日本护持日莲正宗信徒的创价学会,早于台湾光复前就已传入。但在台传教 30 余年后方依法登记成立。这期间,该组织主要以“教育、文化、和平为精神指标”,一直处在“地下活动”的状态。其创始人是现任的理事长朱万里。1960 年,当时在台湾水泥公司任职的朱万里赴日考察时,对日莲正宗兴趣浓厚。回到台湾后就开始联络在台的创价学会的信徒,并皈依了日莲正宗。1963 年,朱着手为成立合法的团体提出立案申请,但因当时同“非常时期人民组织法”抵触而遭拒绝。以后,台湾的日莲正宗佛学会一直无法成立。直到 1990 年台湾“解禁”不久,有关的条文修正后,“中华民国日莲正宗佛学会”才正式成

立。目前，该组织已加入“国际创价学会”(SGI)，有会员十几万。会员不分男女老少，每天早晚都要诵读法华经，每月定期举办佛法教学及座谈会。另外，佛学会还成立了白鸟、白桦、雄风、雄狮等合唱团，及黎明、朝阳、紫阳花舞蹈团和清光国乐团等，1992年还主办了台湾的青年文化晚会，以扩大其社会影响。

四、主要人物

白圣 生于 1904 年，湖北应城人，原名胡必康，字洁人。18 岁时在安徽九华山祇园寺出家，他曾从度厄法师学法、慈舟律师修律、智妙禅师习禅，后毕业于上海法藏佛学院，还出任过浙沪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杭州凤林寺住持、静安寺监院兼静安佛学院院长，兼任过“中国佛教会”浙江、上海两分会的常务理事。1948 年冬天去台湾，不久即组织恢复“中国佛教会”，还担任“中国佛教三藏学院”、“中国佛教研究院”的院长，从 1962 年起历任“中佛会”的理事长或名誉理事长。他在任期间一直得到国民党的支持，他本人还是国民党的“中央评议委员”，1981 年出任了世界佛教僧伽会的会长。1983 年 2 月在台北联络日本及韩国的佛教界人士召开了“中韩佛教学术研究会”。他还任十普寺、临济寺的住持，同时兼任马来西亚极乐寺及泰国佛光学苑住持，还出任过“中国佛教三藏学院”院长等职，著有《什么是佛教》、《寺院住持手册》、《楞严经表解》、《学禅方便谈》、《禅宗寺论集》等。1989 年 4 月 3 日逝世。1994 年 10 月，其舍利塔在河南省汝南县新建的南海寺正式落成。

圣严 俗姓张，生于 1931 年 12 月 4 日，籍贯江苏省常熟县，1943 年在江苏南通县狼山广教寺出家。1975 年曾获得日本东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1977 至 1978 年在美国佛教会任副会长兼大觉寺住持，1978 至 1987 年任“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1980 年还创

办了美国纽约禅中心,1985年创立了“中华佛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他还是台湾中国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中华佛教青年会”名誉会长和农禅寺的住持。他也是台湾东初出版社的发行人、人生杂志社的发行人,在台湾佛教界有一定的威望。近年来,他一方面重视佛教学术研究,同时又传播禅法,还积极推广环保,以净化人心运动,建设人间净土;为此,他还获得了台湾第三届和风奖的杰出社会运动领袖奖。1990年,他在台湾主持召开了“中华国际佛学会议”,主题是“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学者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

净心 俗姓萧,名鸿川,台湾台中人,1929年生,20岁出家。1977年修完日本佛教大学函授部课程,后历任台北十普寺监院、佛教三藏学院督学、“中国佛教”杂志主编及社长、高雄佛教分会理事等职,并任光德寺、高雄佛教莲社、林溪禅寺等住持。早在1964年就创办了净觉之声电台,在台北、中、南部进行空中布教。1979年“中佛会”成立“电视弘法委员会”时,因他有电台布教的经验便任命他为主任委员,负责在台湾“中华电视台”开播“光明世界”电视弘法节目,每星期播出半小时的佛教电视弘法节目。此外,他还兴办了净觉佛学院、净觉佛教研究所、净觉月刊等,担任“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台湾分会理事长、“净觉佛教研究所”所长等职,还任世界僧伽协会副会长。

净空 俗名徐业鸿,安徽庐江人,1927年出生。1959年出家,法名觉净,字净空。他早年曾研究哲学,后修学佛教教育十余年。1960年后历任讲师、教授,在港台各地举办佛教讲座,宣讲大乘佛学教义,还担任“华藏法施会”会长,并将“佛教”正名为“佛陀教育”,指出大乘佛学的真义即在于彻底破除迷信、启发真谛、使人获得幸福圆满的教育目标。

慈心 台湾大光明寺及启明佛教住持,还是台湾慈航基金会

董事,他曾于1991年向大陆灾区捐资160万元人民币。

明乘 台湾大香山观音寺负责人,曾率台湾斋僧团160人,于1992年7月来大陆厦门访问。

星云 俗名李国身,笔名摩迦,生于1927年8月19日,祖籍江苏扬州,目前是台湾最大的寺庙佛光山寺的住持。1939年,他在南京栖霞山出家,后入栖霞山律学院学习佛法,取法名彻悟,号今觉。1941年15岁时受了三坛具足大戒,1945年入镇江定慧寺焦山佛学院。1947年回宜兴大觉寺任监院,创办《怒潮》月刊,1948年任南京华藏寺监院。1949年到台湾,当初,他一贫如洗,幸得中坜圆光寺的妙果法师收留,以后又得到一些老兵的救助,并利用各种关系,逐渐在高雄建起一间较大的寿山寺,收了七、八十个和尚和尼姑。以后他逐步发展自己的势力,还主编过几种佛教的通俗杂志,并于1962年开始担任《觉世旬刊》发行人。从1967年5月开始兴建佛光山寺,60年代末建成,又设立了“中国佛教研究院”,后又成立了“台湾佛光协会总会”,并在台各大城市设立十余个佛光山的别院。经过近20年的经营,星云把原来的荒山野岭建成了台湾最大的佛教圣地。还在美国、马来西亚、香港等地也建立佛光山的下属寺庙。例如,1988年11月,在美国洛杉矶建立了规模宏大的西来寺。1991年初,又在香港佛光山驻港联络站——“佛教精舍”的基础上筹备建立“香港佛光协会”,于当年6月27日正式宣告成立。目前,佛光山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宗教实业团体,据说其资产总值多达100亿元新台币⁵。佛光山集团也因此跻身于台湾十大企业之林。

星云一贯主张“人生佛教”,他本人早在中学时就曾加入国民党,还曾被任命为台湾国民党十三届的“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党党务顾问,被人称作“政治和尚”,佛光山也接待过许多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台湾“省主席”邱创焕还曾率领全台湾21个县市长集体上山

一参拜。另外，他把佛光山的势力发展到世界各地，1992年在南非设立了非洲第一座寺庙，使目前佛光山在海外的据点遍及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五大洲。1988年11月在美国的西来寺召开了第十六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及第七届世界佛教青年友谊会，星云以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倡导“立足台湾，心怀中国，放眼世界”。大陆佛教界6位代表也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样海峡两岸的佛教界人士借此会议，首次走到一起，促进了友谊。1989年3月，星云曾到大陆探亲。

近年来，星云在台湾的佛教界异常活跃，其“入世”的思想已经成为台湾佛教界最具影响力的主流。他著作颇丰，主要有《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传》等；并拥有许多头衔，他是“台湾汉藏文化协会”理事长、“中佛会”的常务理事、世界佛教僧伽会的副会长、美国佛教青年总会和国际佛教促进会会长，也是“中华民国蒙藏文化中心基金会”会长，等等。他还于1990年在台北筹办建立西藏佛寺，接待了流亡海外的达赖集团中的僧人。

悟明 白圣的弟子，任“中佛会”理事长，也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得到了台当局的大力支持，1990年还被选为台湾“国是会议”的代表，这也是全台宗教界的唯一代表。他本人是台北临济寺的住持。

圣印 台湾本地僧人，台中人，是台佛教界第三势力的主要代表，任“中佛会”的理事、“台湾省分会”常务理事，先后创立了台中慈明寺、万佛寺，还创建了慈明商工职业学校、中华佛教学院，在台湾僧人中有相当的势力与威望。他曾多次到海外弘法传道，扩大影响，在台湾也多次请高僧传戒，吸引了万人入教，为此他还获得了美国东方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

印顺 生于1906年，浙江宁海人，太虚法师的弟子。解放前在大陆曾著有《印度之佛教》，到台湾后继续从事佛教教育与研究，并

创立了福严精舍、慧日讲堂,但受到白圣一派的压制,排挤出“中佛会”。但他一直被公认为台湾佛学研究的专家,出版了许多佛教专著,提倡在“人生佛教”的指导下发扬“人间佛教”的思想,这一理论对台湾新一代僧人影响极大,因此,他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国际上都享有很高的威望。

证严 俗名王锦云,1938年生于台中清水镇,1960年出家,1963年在台北临济寺受戒,是印顺的女弟子。1966年创立了“慈济功德会”,始名“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以济助贫民、病人为主,她自任会长;1968年在花莲开办一间佛教慈济医院,为台湾东部60多万人提供了最先进、最完善的服务,并以设置医疗专业而打破了台湾私立医学院专业的限制。1989年她又创立了慈济护专,继续以“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四大原则服务人间。因她多年来开展诸多的社会救济事业而闻名海内外,为此,她于1990年获得了台“总统”李登辉的表彰;另外还荣获了菲律宾1991年度“麦格塞塞奖”(即社会领导奖),及美国得克萨斯州政府颁发的“圣安东尼荣誉市长证”,因此她更赢得了国际声誉,她在台湾社会中的影响据称已达上百万人。1991年大陆发生特大水灾时,证严法师在台湾积极发动民众,筹资筹款,赈助安徽、江苏及河南的重灾区,并在安徽的全椒县、江苏的兴化县、河南的固始县和息县重建了中小学及敬老院等,建立了4,000多间两层式的民房,还设立多个慈济社区和慈济新村。目前,证严主持的慈济功德会是台湾最大的民间团体,该会主要以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如办医院、学校等,在台湾拥有近250万信徒。

晓云 俗名游云山,广州市人,生于1913年。她是“中华学术院”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以终生不盖庙、不作住持、献身教育而闻名于台湾佛教界。早年她曾毕业于广东文理学院、南中美术学院,还拜岭南画祖高剑文门下。1946年留学印度,曾被泰戈尔大学聘为

研究员，教授中国绘画学。不久她游历了欧美各地，于1950年返香港。居港期间(1950—1968年)创办了云门学园、佛光小学、原泉出版社，并刊行《原泉》杂志。1958年拜天台宗淡虚法师习禅，法名“能净”，字“晓云”。1968年她赴台湾，1971年应永明寺的住持之邀在该寺创立莲华学佛园，并兼学佛园主持人；学佛园的学生有尼姑及受教育的年轻妇女，常于课余到佛教文化研究所协助编辑校对。晓云法师始终致力于佛教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学的女尼及佛教人才，同时也强调翻译及文化活动，能用流利的英语讲授佛法，在台湾佛教界颇享盛名。另外，还创办了《中国佛教文化学报》，并发行了《清凉月》刊物，有很高的佛学造诣。另外，她的中国绘画艺术也有较高声誉，在台湾她是艺术家——“游云山女士”，并以“岭南女画杰”享誉海内外。近年来，她还以80岁高龄创立了“梵华工学院”，以佛教教理结合现代尖端科技知识，培育人才。其主要著作有《般若禅佛心宗》、《天台止观及其思想》、《禅林教化对现代教育之启示》、《佛林园林思想》、《印度艺术》等。

慈航 太虚法师的弟子，又被称为中国曹洞宗第四十七代祖师。他主张“文化、教育及慈善事业为佛教的三个救生圈”，开展佛教教育及慈善事业，被誉为台湾佛教改革的代表人物。台湾有慈航堂，其下有慈航中学，均为纪念他而设立的。

净良 福建省福安市坂东乡人，在福安的福庆寺出家，曾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1949年春去台湾。他也是国民党党员，担任世界僧伽协会的执行委员、台湾“中国佛教会”的常务理事、台北市佛教分会的理事长。1990年召开第十七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时，他还曾代表台湾的佛教界出席了大会。近年来，他本入曾多次到福建或大陆的其他地方参观访问，与大陆佛教界增进了了解与友谊。

净耀 俗名徐明辉，是台湾佛教界青年中的代表。台报称，少年时代较玩劣，服兵役时开始习佛，退伍不久在发生了一次车祸后

决定皈依佛门。他初在高雄的美农雷音寺，追随广化法师，1984年又到了台中跟随印顺法师学习佛法。近年来他在台湾佛教界比较活跃，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于1989年创办了“中华民国佛教青年会”，并任该组织的秘书长，还创立了“普贤中医联合门诊中心”、“观音线协谈中心”、“净化社会文教基金会”等佛教社会服务机构，于1992年11月24日创办“佛教音乐推广协会”，用音乐推广佛法，这在台湾佛教界还是“新生事物”。因而，净耀在台湾青年佛教徒中近年来名声鹊起，但恪守传统佛教的老一代法师对他的做法则不以为然。

南怀瑾 台湾著名的佛教学者、居士，另外还有许多头衔，如“教授”、“宗教家”、“禅宗大师”、“国学大师”、“哲学家”等，曾被列为“台湾十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他本人出生于浙江温州的乐清，自幼读私塾，抗日战争时入川，曾任教于当时的中央军校，后专门研究佛学，还远走康藏，拜访过密宗高僧。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家乡，不久在江西庐山的无池寺附近清修，1949年春到台湾，先后执教于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和其他院校及研究所，并创办了东西精华协会、老古出版公司等。他写了不少佛教通俗读物，很畅销，并已经在大陆出版，较受欢迎。1988年春，南怀瑾移居香港，还经常到大陆参观访问，集资在内地办实业，先投资上海联盈塑料化工有限公司，后又兴办钢铁、生化、化工、贸易等合资项目，1992年他投资浙江金温铁路，自任“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还在大陆二十所高等学校设立奖学金。

了中 台湾“中国佛教会”的秘书长，台湾佛教刊物《海潮音》杂志社的社长。

圣名 台湾蓬莱普陀山的开山祖，现任住持。1989年10月曾到上海龙华寺参加“中华民族众僧祝愿两岸和平统一祈福水陆大法会”，努力为祖国统一作贡献。

慧严 俗名黄依妹,生于 1946年,18岁时就开始信仰佛教,皈依了凤山佛教莲社住持煮云法师。曾到寿山佛学院念书,二年级时遂遁入空门,1980年东赴日本求学,进入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先攻读大学学位,后获得了硕士,1990年5月又获得了博士学位。不久,凤山佛教莲社财团法人基金会聘她接掌该组织的住持及基金会董事长职位。她便成为台湾临济宗第三十三代弟子、凤山佛教莲社的第二任住持。目前,台湾佛教界只有三位博士出家人,慧严就是其中之一。

药慧 台湾佛陀照明功德会的理事长。俗姓李,1936年生于新竹县新丰乡。幼年时因母亲病逝而决心学医,20岁时出家,但因家人反对又还俗。以后经营医药,逐渐发达,便进一步跨入广播界,主持了数十年的“神话古谈”节目。到1986年,该节目开始增播佛教内容。药慧本人也在1991年重新出家,专事佛法。1993年11月,由佛陀照明功德会出面邀请了大陆佛教高僧明旻法师到台湾访问,促进了海峡两岸佛教界的交流与友谊。

五、台湾佛教发展的动因及趋势

以上介绍了台湾佛教的历史与现状,可以窥见其一斑。近十年来台湾佛教的发展非常迅速,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究其原因,根据台湾报刊文章的介绍与分析,可归纳出以下几点:

1. 80年代台湾政治和经济环境宽松的影响。1972年中美建交后台湾退出联合国,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境地。那些靠外国教会支持的外来宗教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而客观的政治环境的变迁使本土意识大大深入人心,这为本土的传统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80年代台湾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这为佛教提供了经济来源。台湾佛教的经济主要是靠信徒的捐献,城市经济的繁荣,

也为一向位于偏僻山区的佛教寺庙做大型的道场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城市信徒对寺庙的捐献。

2. 台湾佛教界近年来大力兴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在社会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更进一步吸引了人们信仰佛教。例如创办“佛教慈济功德会”和慈济医院的证严法师，1990年11月出版了《证严法师静思语》，到隔年的6月间就印行了140版，共售出28万多册；1991年她又获得了被称为“亚洲诺贝尔奖”——“麦格塞塞奖”的“社区领导奖”，在台湾社会以至世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其皈依信徒据称已超过了250万。另外，星云法师的佛光山自60年代末成立以来，现已发展为国际性的佛教组织。他除了靠台湾当局的扶持外，也大力兴办实业，并利用现代传媒弘法布教。

3. 作为本土的传统宗教，佛教界人士高扬本土文化的旗帜，同时大力宣扬“人间佛教”的思想，使佛教的各项活动及思想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内涵相结合。其次，1987年台湾解严后，台湾佛教界人士与大陆的交流日益增多，本土化与寻根意识深入人心，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台湾佛教的发展。

4. 台湾佛教界无论是在家的或是出家的，女性占有很大的比例。女性信徒一般比较虔诚，并且在各个寺庙里均为主要力量，是管理寺庙的专家。这其中也有许多杰出的人物，证严法师就是一个代表。大概是因为台湾近几年子女数减少，男性出家阻力增大，同时因台湾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使女性出家者具备了吸收佛教知识的基本能力。另据台湾《联合报》1990年9月2日报导，佛光山寺的天琴法师一家竟然母女五人齐入空门，被誉为“模范妈妈”。可见她们对佛教之虔诚，同时也说明佛教在台湾现代社会的影响力之大。

5. 近年来佛教在台湾发展迅速与台政界的支持不无关系。台湾政界人士对佛教大力扶持，有些人还经常出席佛教界的重要活

动：这对社会公众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台湾的传媒对政界人士参与佛事大肆宣扬，而一些影视红星也竞相皈依佛门，人称目前台湾佛教与政界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但这段蜜月能持续多久，还未可知。另一方面，佛教界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有些还界入选举，参与政事。这种“人间佛教”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吸引了大批的人皈信佛教。

目前，台湾佛教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令其他宗教“刮目相看”，不但佛门之内度人无数，香火之盛为数十年所未见，而且佛教界所创办的慈善事业已让海内外所瞩目，并已形成一股庞大的社会势力。20年前，“佛书”与“耶书”一样均为乏人问津的天书，“佛门”与“耶门”一样是门可罗雀的空门，而如今台湾各地的书店里到处是满橱满架的佛书，佛教文物也成了热门的商品。1990年在台北的闹市区设立了一家“佛教文物中心”，经营的尽是与佛教礼俗有关的各式祭器、文物、图书等，另外还开设了多家佛教百货店，佛像、法器、供具、佛书、佛教录音带、素食品、佛教家具摆设等等，都成了商品，其中最畅销的是念珠，非宗教徒也带上一串当做装饰品。其次，佛教界内部注重培养人才，各个佛教组织积极筹办佛学院，或出版经书、佛书，以提高佛学素养及佛教在一般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例如1987年由文殊出版社负责出版一套当代中国佛教大师全集，共十册，25开本，每册约150万字，全部电脑排版，书中选取杨仁山、太虚、欧阳竟无、虚云、弘一、印光、圆瑛、吕澂、法尊、慈航等十位当代佛学大师的著作。再者，随着传统的佛教在台湾的“复兴”，藏传佛教、南传小乘佛教、日本的佛教系新兴宗教如创价学会等外来的宗派也相继传入或崛起，而一些貌似佛教的派别如灵仙宗等新兴宗教也在台湾流传，这一方面刺激了传统佛教的发展，同时也冲击了佛教保守的一面。例如，近两年兴起的密宗热，一些报刊上大登“人人可学密宗招财术”、密宗“助我中大奖”之

类,还出版了《密宗招财改运秘典》这类的书籍。另外,台湾与达赖喇嘛近年来联络频繁,到 1993年,已有698人次的藏传佛教活佛及喇嘛来台,台“蒙藏委员会”还在南印度帮助藏人兴建了当地最大的水塔;同时,台湾报纸也接二连三地报导藏传佛教活佛在台湾转世,仅 1989年到 1992年的三年间,就有三位“西藏活佛”在台湾转世,一是桃园藏人罗桑吉美(发现时 3岁)一是台南的魏呈祥(发现时已 32岁,法名洛本仁波切)以及 92年才认定永和的一名叫卓佳汉的 7岁男童(法名康珠仁波切),一时间台湾公众对藏传佛教活佛在台湾纷纷转世颇生疑惑,对此,达赖集团中一名叫赤柱仁波切的喇嘛解释说,这是“因为台湾弟子善良,法缘盛”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其中政治上的原因是主要的。尽管如此,台当局明确反对西藏独立,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佛教在台湾的兴盛却是人们有目共睹的,而且已扩展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影响也越来越大。1992年 10月在台湾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上,台湾“总统”李登辉亲致贺词,台“行政院长”郝伯村、“内政部长”吴伯雄、“国防部长”陈履安等政要都亲自到会祝贺,佛光山星云在大会开幕词中大力倡导“互助、融合、发展”的佛教“新”思想,这也代表了当前台湾佛教界发展的一大趋势,一些人正在把台湾佛教推向世界。

台湾佛教近年来随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而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①佛教界出家人的素质大大提高,信徒中的知识分子比例大幅度上升,僧人中出现不少大专毕业生,甚至博士、硕士,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同时佛教界大力兴办佛学院,注重提高佛学素养,而大专佛学社也遍布全台。

②采用现代化的通讯及传媒手段进行多媒体的弘法传教,如广播、电视弘法,听众可达数千、数万人;同时“人间佛教”的思想深

入人心，佛教的世俗化色彩日益明显。

③佛教影响的社会面更加广泛，佛教的慈善事业、社会教育事业近年来迅速发展；同时上至高官要员，下到黎民百姓均兴起佛教热。

④佛学研究兴盛，一方面佛教界印刷出版的经书及佛教书籍充斥社会，另一方面各种的佛教研究机构如大专佛学社团、佛教研究所、佛教研究中心等纷纷出现。

⑤虽然台湾当今佛教呈现一派复兴之势，但各宗各派及各大寺庙之间缺少统一的组织协调，且彼此多有微词。

⑥随着海峡两岸佛教界的不断交往，台湾佛教界对大陆的归属感日益加强，纷纷到大陆寻根、认祖庭。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预计，台湾佛教在今后会有较快的发展，一方面加速世俗化的成分，另一方面有可能将成为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又一个汉地传统佛教兴盛的地区，也将是一个佛教文化研究水平较高的地区。同时，一些外来的佛教宗派，如日本的日莲正宗、藏传佛教、佛教系新兴宗教等也会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但正统的佛教派别将在相当期内仍起主导地位。

注释：

1. 参见蔡相辉《复兴基地台湾之宗教信仰》，正中书局印行，1989年，台北市，第75页。
2. 《台湾的佛教与佛寺》，第6页，邢福泉著，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1年5月。
3. 《台湾事典》，第62页，唐漫珍、王宇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
4. 香港《广角镜》月刊，星云著：“佛光山的性格”，1989年5月。
5. 《宗教工作基础知识》，第553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91年。

第二章

道教与民间信仰

一、历史与现状

(一) 道教及民间信仰在台湾的发展史

1. 道教在台湾的历史

台湾道教最初是随大陆移民到台开发而从闽粤一带传入的。道教属多神信仰，尤其是在民间，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民俗神以及历史人物均被神化，纳入道教系统，如福建、广东一带特别崇拜妈祖、保生大帝、关帝、土地、开漳圣王、三山国王、岳飞等等，大陆的移民来到台湾以后，将家乡的神灵也带来，筑庙供奉。《台湾通志》上称：“台湾之道教来自内地，其与移民相始终”。因此，台湾道教最初是以民间宗教的形式存在。大陆道士来台正式传教的最早记载是在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即福建漳州的闾山三奶派的道士首先来台南传教，清乾隆五年（1740年）茅山、正一派（又称符篆派或天师道）传入台湾北部；道光三年（1823年）正一清微派也传入台湾¹。其实，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大批的移民来台时，各派的道教信仰随之传入，不过，那时因战争不断，民众以保平安为重，所

以当时台湾道教多以崇奉北极真武玄天上帝、武当山派为主，而且普遍供奉关帝。例如，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台湾的大陆移民建立了许多关帝庙，有的至今还保存着。另据陈文达所修的《台湾县志》中记载，当时台湾的寺庙有 75 所，其中奉祀玄天上帝、保生大帝及东嶽大帝等确为道教宫庙的就有 20 所之多²。到了清朝，因崇奉佛教，忽视道教，许多道教宫观沦为兵营，道士们为生活所迫而流落民间。所以，清代台湾道教的发展受到抑制，实际上处于日渐衰落之势，无论在思想或是在礼仪上均无重大建树。以后，因大陆道教南方正一派的兴盛，而台湾的移民又多来自福建及广东，因此，台湾道教在传承上转到南方正一派系统，但也是继承了大陆道教的传统，法天祭祖，深入民间各阶层的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对婚丧喜庆、祭祀朝拜等的影响尤为明显。

在 1895—1945 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台湾期间，因道教属于中国传统的宗教而大受摧残和破坏，道教尊神和庙宇多被毁，道庙中财产遭没收，道教信徒多被迫改信他教，道教活动几乎处于停顿。据 1919 年台湾“总督府”的调查，台湾道教当时分为灵宝、老君、瑜伽、天师、三奶等五派，道士有 1,103 人，只有 11 人为庙宇的住持，1 位斋堂的住持，其余均居于民间；有道教寺庙 3,062 座，但实际数目要少得多，因为日本人将不属于佛教的寺庙皆归为道教之列³。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台湾的道教进一步受到压制，更不许道教建寺观或成立道教组织，也不许人们信仰道教，连户口册上宗教一栏里也一律改为佛教，还令僧尼们迁入道教寺庙里。1945 年日本投降后，台湾道教不但恢复了活动，而且广为延揽，把积善、经典、丹鼎、符篆、占验诸派都纳入道教系统，一时间台湾道教显得十分庞杂。

1949 年大陆解放后，道教各派在台湾都有传播，主要有积善、经典、丹鼎、符篆、占验等五派。江西龙虎山正一教首领第 63 代大

师张恩溥也迁到了台湾，并在1951年发起成立了“台湾省道教会”，还设立了“嗣汉天师府驻台办公室”，传篆授牒。张恩溥得到台湾当局的支持，于1957年在府内设立“道教居士会”及“道教大法师会”，以期统帅台湾道教各派。同年，张恩溥自愿退位后，由台湾前“立法委员”赵家灼继任为“台湾道教会”的理事长。1958年7月由张恩溥及江伯彰等人发起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道教会”，并依法立案，其总会设在台北，由张恩溥担任第一任理事长。到1960年底，全台的道教宫观有2,305座，信徒有1,228,303人，但大部分的寺庙内容仪式较杂的民间宗教信仰者。1962年12月25日，张恩溥去世，由其堂侄张源先摄理第64代天师位。近几十年来，台湾道教因社会经济的发达而香火鼎盛，发展也很快，道教宫观纷纷建立，还建立了一些道教团体。自高忠信担任“中华民国道教会”的理事长后，不断维修“道教会”的会馆，并经多年的筹划，终于在1989年10月创办了“中华道教学院”，现已招收学员从事道教研究，以弘扬老庄哲学、道教文化、经典、礼仪为宗旨，聘请知名学者为教授，与佛教、基督教的学院相同，学生一律住宿，设备一流。近年来，台湾道教还开展了归教运动，也是因为台湾的民间宗教种类繁多，且多与道教有关，归教运动在于用道教思想来统领各派宗教，结果，理教、德教、斋教、天德圣教、轩辕教等多归向道教，这也说明了道教作为中国传统的宗教在目前的台湾社会还是大有市场的。近年来道教宫观的数量在民间也增长迅速，信徒的数量大大增加；同时，道教宫观的建立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偏僻的山区，早期可以以道教宫观为中心形成集镇，而现代则可以结合旅游，吸引大批的游客。

2. 民间信仰在台湾

台湾民间信仰种类繁多，数量可观。这里我们把除正统道教以外的产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之下的宗教信仰形式视为民间

信仰。

因与大陆存在人缘、地缘及神缘的关系,台湾的民间信仰大多是从大陆传入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其中又多具有闽南及广东一带的风格,这大概是因为台湾的先民多来自这些地区的缘故。另外,台湾汉民族中的宗教信徒除少数人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等外,大多数人信仰佛教或道教,而台湾的佛教与道教往往与民间信仰密切联系,所以在一般居民中,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密不可分。在一些佛寺及道教宫观中也往往供奉民间宗教的神灵。不过,民间宗教多数既无经书、统一的仪式,也没有创始人、中心组织和系统的伦理说教。民间信仰者大多基于功利因素,到庙里参拜的目的是能祈福保平安。

现代社会随着人们追逐物质利益及社会贫富差距的悬殊,民间信仰更加兴旺,信徒烧香拜神大多是为了金钱、生意、考试合格或逃避厄运等,若崇拜的神灵不灵验,信徒就会改拜另一种神灵。据1960年台湾出版的《台湾省寺庙教堂调查表》中记载,台湾共有4,220座寺庙,其主祀之神中大部分为民间信仰中的神灵,属地方及乡土之神的占大多数,属灵魂崇拜的有195种,属自然崇拜的有20种,庶物崇拜的有1种,而佛教及道教的神佛共有32种(其中道教13种,佛教19种)。民间信仰中这些诸多神灵,为台湾赢得了“神的联合国”的称号,同时在台湾这样发达的社会里有如此多的民间宗教信徒,建立如此众多的庙宇,在华人地区也是居首位的。如今,更发展到算命风风靡全台的情景,如咖啡厅请算命师驻店以招徕顾客;各种社团中心因生员不足也开办起紫微斗数、八字等“技艺班”;大小书店更陈列着各类的命理书籍;连一些企业家也迷信风水、请相士指点迷津;建筑师也为迎合顾客的需要研究起风水;更有甚者,据称有人竟然请算命师作证券预测,等等。这一切现象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卷入,反而更带动了民间信仰的热潮,

致使一些政界、社会名流也常请“高人”指点。可见,民间宗教在台湾当今社会影响之大。

据台湾“内政部”于1994年7月24日发布的最新统计资料称,台湾2,100万人口中有一半有宗教信仰。有的学者提出这一数字有很大的偏差,它没有包括众多的民间信仰者,若加上民间宗教信仰者,那么台湾宗教信仰者“将达到1,800万,换句话说就是有90%的台湾人有宗教信仰”⁴。其实台湾的民间信仰非常普遍,庙宇的数量也很大,但因其难以归类及信徒数量难以统计,多数学者和台湾当局并不将它作为正式的宗教来看待。然而,毕竟其信徒众多,即使有正统宗教信仰之人也常到庙里朝拜或参加仪式等;并且各种民间信仰历史悠久,伴随着台湾的开发史及发展史而在民间流传,成为台湾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些演化为台湾的民俗及节日的庆典。当然,这些民间信仰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宗教如佛教、道教的影响,有些神灵直接从佛道儒三家演义而来;另外,有些民间信仰的崇拜之所以流传甚广也与历代统治阶层大力提倡分不开,如妈祖崇拜、关帝崇拜等都与历朝皇帝不断加封密切相关。所以,台湾的民间宗教的庙宇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在历史上曾是社区结社力量的象征,并兼具宗教、经济、社交、教育、娱乐等功能,在现代社会中,其文化、社交及娱乐的功能更为突出。随着海峡两岸民间往来的不断加强,民间信仰也是其中的一个中介,如护送妈祖到湄洲“省亲”、护送肖太傅等回乡谒祖的进香团都打着民间信仰的大旗,也成为两岸骨肉同胞相互交往的一种形式;同时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政治影响,对台湾当局开放台湾民间赴大陆探亲的渠道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也从另一方面助长了台湾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有日益兴旺之势,而且从民间下层百姓向上层社会延伸,甚至有些地方官员及政界要人也以出席或主持民间宗教的仪式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所以,民间信仰在台湾社

会中有相当的影响力。

（二）台湾道教及民间信仰的现况及特点：

1. 道教在台湾的现况与特点

现况：

近年来台湾道教发展较快，呈迅速增长之势，据统计，1984年台湾的道教宫观有6,900多座，神职人员有10,500多人，信徒达1,658,000人。1987年底，已登记的台湾道教宫观有7,353座，神职人员23,430人，信徒有2,059,000多人。到1990年底，道观的数量增加到8,084座，神职人员达到了29,150人，信徒则增加到3,270,000多人，所占比例超过了台湾总人口的15%。不过，台湾官方这个统计数字只限于登记的宫观及信徒，但道教往往与民间信仰混杂，尤其是在民间，几乎每家每户皆设神龛，小的道教庙宇也难以计数，有的学者估计台湾的道教信徒大约占台湾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另外，道教界还兴办了2所道教学院、1间专科学校、41间幼稚园、1家医院、16间诊所，还创办了6家出版社、出版3种年刊、5种季刊、43种月刊等，如《道教》、《圣道》、《中国道教文化》等刊物⁵。

在政教关系方面，过去像“中华道教总会”等道教组织一直靠台湾当局的扶植，与国民党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这仅限于台湾道教的上层，如龚群等人，本身就是国民党的元老。下层的道教信徒对政治并不关心，大多数道教活动都是纯宗教的行为。台湾社会的上层人士信仰道教的也为数很少。不过，由于近年来道教在台湾的兴盛，也引起政界人士的注意，例如，台“国家发展策进会”的领导邱创焕则宣扬“国策会要擎起弘扬道教的大旗”，还要成立一个“道教弘扬中心”。道教拥有广大的下层信众，有些政界人士更看重了道教各派在当今的选举中会是一股有相当能量的势力，因此也大力拉拢。这也说明今后的台湾道教将不自觉地介入世俗

的政治生活，并对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台湾的道教人士不断组团到内地探亲、参观及旅游，或以道教文化交流的名义与大陆的有关机构往来，增强两岸彼此的了解。1988年10月13日台湾的商人吴大江受台湾“中华道教总会”的委托到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正式揭开了两岸道教界交往的序幕。1989年8月8日台湾“道教总会”的副秘书长张桎率团访问北京白云观及“中国道教协会”，还参观了崂山道观、吕洞宾修道成仙的八仙宫、陕西老子讲经台楼观台、杭州的抱朴道院、苏州的玄妙观等。以后，两岸的交往不断加强。1993年底，大陆武当山道教协会应台湾省宜兰县城镇外澳接天宫的邀请到台访问，盛况空前，并成立了“海峡两岸玄天上帝宫观联谊会”。促进了两岸道教界的友好交往。

特点：

(1) 崇奉的神灵众多，民间信仰的诸神明也归于道教之列。在台湾，大凡对人类做过贡献的历史人物，多被奉为尊神，建祠庙以祀，立香火以供，同时多与民间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信仰者也多为社会的中下层人士。然而，大多数的神明与宫观均秉承了大陆道教的传统，并自认为是大陆故乡的分炉、分庙。如彰化的关帝庙相传是明代永乐中(1403—1423年)所建，称为“开基武庙”，其香火是由泉州土门关帝庙传入的。台湾盛行武庙，奉祀关公，全台的武庙到本世纪80年代末时统计有158座。台湾人将关公视为团结、忠义的典范，并享有众多的封号，如武圣、伽蓝爷、关圣帝君、伏魔大帝、恩主公、协天护国大帝等等，各地还有专门的祭祀关公的组织“关圣帝会”，可见关帝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除关帝外，台湾道教还崇拜元始天尊、称玉皇大帝、三清天尊（指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与太上老君三者的合称）、三官大帝（为天官、地官及水官，分别主降福、生财、解厄）、太上老君、张天师、九天玄女（即

女娲)、天上圣母、三奶夫人(古代马、陈、李三姓妇女)、吕洞宾、三山国王、开漳圣王等等。

(2) 受三教合一的民间信仰影响深刻。在台湾单从宫观里供奉的神像来判断教派往往很难,除少数几座庙宇外,儒释道所有民间信仰中的神明几乎都可供在一个庙里,这是台湾道教最突出的特点。自明郑时期,台湾就流传诸如白莲教、斋教、洪门会等仙佛合宗的秘密宗教,最初是为了反清复明,后来与道教相混杂,成为民间信仰。这些民间信仰,往往是三教合一。所以,台湾的道教宫观里往往前殿是祀道教的神仙,后殿或侧殿里供儒家的先人和佛教的菩萨。如观音菩萨属于佛教的神,但常常供在台湾道教的宫观里,被称为“观音妈”,且受酒肉之供,服饰也改变了。受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台湾的道教与大陆的传统相去甚远,其经典与咒语的内容也庞杂得多,道士们在做法时更附会了儒家及佛教的教义。

(3) 对台湾民间生活的影响广泛。台湾道教系统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民间凡遇红白喜事皆请道士来主持。在台湾不但道教各种尊神的诞辰、祭日要举行祭祀,而且民间的婚丧喜庆,逢年过节和朔望等,都要对神仙进行祭拜,即使平时,也多设道场为道教信徒们进行消灾祈福等。这些场合,多要道士到场念经、摇铃、吹角,参与祭典仪式。即使在现代经济发达的台湾社会,到庙里占卜求签之人还是络绎不绝。凡遇到婚姻、事业、健康、财利等生活上的问题时,信徒都会去求神问卜。

台湾的道士通称司公(或师公),与中国大陆北方的全真派道士有着明显的不同,主要职能是做醮,分阳醮和阴醮,也就是“度生”和“度死”。做阳醮叫“度生”即活着的人为求平安及祈福,通过道士向神灵供奉牺牲,烧香、燃烛等。做阴醮叫“度死”,乃为死去的人超度,即为葬仪和做功德等。做阳醮的司公以红布缠头,称“红头司公”,也有称为“法官”、“法师”或“符师”,所办的度生的事

称为喜事,包括驱邪、招福、补运、祈平安等。“红头司公”主要是三奶派的道士,专行度生。做阴醮的司公以黑布缠头,称“乌头司公”,受佛教影响较多,大多是从大陆南方传去的正一派道士,办的主要是“度死”事,即主持死人葬仪,做功德等。此外,道士也有驱邪的职能,即驱走邪恶之鬼神,形式各种各样,一是由道士画太极图或八卦于门头;二是画狮头或虎头的木牌,由道士开眼后挂于门上,亦可以太阳牌挂于门上;三是由道士书写“天官赐福”一类吉祥字句贴在门上,四是插刀枪于门上或以吉竿立于门前,上悬灯笼;五是以瓦制武人像坐于屋顶或以倒影(称龙虎镜)悬于屋檐上。在民间还有请道士来招福的,即招来福寿或祈求五谷丰登之意,其形式有用红纸写福字或寿字贴于门上,或画有人像的红纸贴于门上,称福禄全寿,等等;还有遇疾病或天灾人祸时,请道士来补运的,请道士称做法,包括走文书、翻土押煞,祭五昌、送火、收魂、送神等。以上各种道教祭典大多是在道士参加下进行的,现代台湾社会有些庆典、仪式等也会有道士们前来参加,可见,道教在当今台湾的兴盛之势,对民众的影响之广。

(4) 道教的世俗化。因以上的各种民间祭祀活动都要由道士参加,而道士的程度不齐,平时仅忙于应付各种活动,有些人科仪不修,只图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致使台湾道教仅停留在民间活动的表层境界,没有更深层次的道教文化的研修,更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台湾的道士都有家室,同时也从事其他职业,没有专业的道士,这些居家的道士可在自家的堂屋里设道坛,庙里只有卖香蜡钱纸及守门的俗人。许多宫庙的住持平时即着便装,甚至可由女性来担任。道士平时居家设坛以应人之请,但缺乏组织性。

(5) 道教组织较松散。“道教会”实质上是一个联谊性的组织,更缺乏像天主教会那样的实体机构,与各地的道教宫观没有形隶属关系,也没有形成像佛教那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团体,虽

然道教信徒众多，但缺乏社会凝聚力。从现今台湾道教的派别来看，天师道势力最大，分布最广。其派系中又以正一派的弟子最多，台北多数宫观的祭典与斋醮、科仪大多由正一派的道士包办。其他的宗派如武当派、茅山派等势力较弱，不为民众所熟悉。

(6) 道教经典缺乏。由于历史原因，清代以来台湾道士私藏的经典十分有限，只有一些《道教源流》的抄写本、《北斗经》、《南斗经》、《五斗科仪》、《玉枢经》、《太上感应篇》等书。即使现代台湾，道教的书籍也并不多。

2. 台湾民间信仰的主要种类

(1) 仙人崇拜

这一类大多受道教思想的影响较为深刻，有的学者也将此类崇拜归于道教之列，但严格来讲，它与传统的道教又有许多差别。的确，有许多庙里所供奉的神灵往往将道教的神仙同列在一起，但也有的庙宇连佛教里的神一起供奉，不好归类，这里单列。此类崇拜多来源于大陆的文化传统，并在台湾开发初期就随开台的大陆移民一起传到台湾。所崇拜的对象往往是将历史人物加以神化，并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神奇的法力，具有崇高神的地位。这些神灵有保平安、保民生等功能，是民众生存与生活中最为需要的，所以得到人们的普遍供奉。最为典型的是拜妈祖、保生大帝及关帝崇拜等，这也是当今台湾民间信仰中最为兴盛的。

①妈祖信仰

妈祖崇拜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沿海各省居民都有妈祖信仰者。在台湾对妈祖的崇拜更是民间的主要信仰之一，据称信徒多达 1,000 多万人。

据学者考证，妈祖确有其人，是五代时闽王统军马使林愿之第六女，姓林名默娘，生于五代建隆元年（960年）3月23日，于宋雍熙四年（987年）重阳日升仙。传说有一老道士玄通，授林默娘以玄

微秘法，能通变化，扶危济险，能乘席度海，平波息浪，舍己为人。后被人供为“天上飞仙海上神”，有千里眼和顺风耳，能救人于海上，成为我东南沿海一带出海渔民及航海之人的保护神。

不过，也有的学者对上述看法持不同看法，认为妈祖未必有其人，所谓天妃、天后都是水神的本号。另有学者认为妈祖信仰可能来源于观音菩萨的灵迹，佛教徒移“观”于“林”，其目的是为了纪念禅宗六祖慧能的再传弟子“马祖道一禅师”，而在“马”字边加了“女”旁，成了“妈祖”。其立论的根据一是马祖的弟子怀海，再传弟子灵佑都是福建人；二是湄洲妈祖庙历来由禅师作为住持⁶。

但不论学术上如何争论，历代朝廷对林默娘不断加封却是不争的事实，如宋代赐“顺济”庙额，后封“显济妃”，元朝时再不断加封为“护国明著天妃”、“辅圣庇民明著天妃”，到明代再追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等等。历代统治者对妈祖信仰的推崇无疑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妈祖崇拜大行于民间。据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台湾县志，关于妈祖的记载有4条，一为大妈祖庙，即宁靖王故宫改建的妈祖庙；二是小妈祖庙，建于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间，在西定坊水仔尾，其三为鹿耳门的妈祖庙，建于康熙五十八年，前殿祀妈祖，后殿祀观音；四是澎湖的妈祖庙，那时该地区各港口几乎都建有妈祖庙⁷。根据各种史料，可知在康熙五十年以后，台湾的妈祖庙多分布在水路要道，尤其是各个港口十分普遍。日据时代，虽然日本统治者对宗教信仰严格控制，但妈祖信仰早已深入民间，并流传海外。1949年大陆解放后，台湾居民倍增，妈祖信仰也持续在台湾各乡镇中发展。据说目前全世界的妈祖庙有上千座，台湾有800多座，其中仅台南一地就有116座⁸。从全岛的妈祖庙宇分布来看，构成了一条妈祖信仰的中心线，由南向北中心点分别为台南市的天后宫、云林县的北港朝天宫、彰化市的南瑶宫、台中县的大甲镇澜宫。妈祖庙宇各地名称不一，如有称天

妃宫、天后宫、妈祖庙，也有称天后寺、圣母坛、文元堂、朝天宫、天后祠、安澜厅、双慈亭、纷阳殿等等。各地因所奉祀的妈祖像来自大陆不同的地方而又有不同的称呼，如来自湄洲的称为“湄洲妈”，来自泉州的称“温陵妈”，来自同安的称“银同妈”。

从妈祖信仰在台湾的发展历史来看，台湾民众中信仰妈祖的人越来越多，且祭祀的仪式也越来越隆重，仪式也愈加繁复；妈祖庙宇从清代的数十所，增加到如今的800多所，而且数量有增无减，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民间信仰的小寺小庙而成为颇为壮观的宫院，并且名称各一，带有浓厚的本土意识；妈祖在台湾被尊为“天上圣母”并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东方的维纳斯”。此外，台湾林姓人口占总人口的8%，因妈祖也姓林，便被尊为林氏祖姑，其实台湾许多妈祖庙均为林氏子孙所建。妈祖信仰是台湾典型的民间宗教，并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因此有些妈祖庙也被用作会馆，据说此传统是从清代流传下来的，多为福建会馆，以后形成了由各商人及地方势力来共同管理庙宇的形式。在现代社会一般信徒的心目中，妈祖是一全能之神。在百姓家里的神龛中常挂有“家常五神”，妈祖画像就在其中，仅位于观音菩萨之下，在关公的右侧。

自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台湾与大陆人民之间的交往被隔绝了30多年，妈祖信徒更无法回乡朝拜。在80年代初有两艘台轮首次冲破险阻，来福建湄洲岛朝拜妈祖，随后在台湾掀起妈祖热。近年来，随着两岸民间交往的不断增多，许多台湾的妈祖信仰不顾种种阻力，直接到福建湄洲祖庙来进香、分神，促进了两岸民间的交往，也加深了台海两岸人民民族文化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早在1987年10月14日台湾当局“开放回大陆探亲”之前，就有许多台湾居民甘愿冒政治风险，到妈祖祖庙来朝拜，并从祖庙再迎请妈祖像回家供奉。如1986年到湄洲岛朝圣旅游的台胞从秘密到公开的有1,000多人；1988年台湾就从湄洲祖庙请去了1,000多尊妈祖像，从1989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又被请去了 529 尊,同年 10 月 8 日来参加妈祖羽化升天日纪念的台胞达到 3,000 多人,其中台中县大甲镇澜宫组织了一个 2,400 多人朝圣团。另外,每逢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妈祖庙进香佳日,各庙的香火更是日夜不绝,尤其是农村及渔村还要举行“大拜拜”,即向妈祖祈求保佑,时间多则三日,少则一天,届时要举行集体祈祷,并开台演戏,举宴庆祝,可见妈祖信仰在台湾之兴盛。1990 年 4 月 21 日至 25 日在福建省莆田市召开“第一届妈祖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海峡两岸的学者以及宗教界人士共达 122 人。

不过,台湾的妈祖庙均采用董事会的管理方法,信徒们也都以各自供奉的宫庙为单位组织祭祀活动,各庙之间缺乏统一的组织及联络,并且各庙为了争当台湾第一还产生了许多矛盾,学术界也对此各执一词,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②关帝崇拜

关帝本是道教的神,但在台湾却将关帝单独供奉,认为他是团结、仁义、忠诚于友谊的楷模,是三大慈航之一(三大慈航分别为观音菩萨、吕祖和关帝),建立了许多关帝庙。关帝在台湾有许多别称,如称关帝爷、帝君爷、协天大帝、文衡帝君、恩主公等等,在民间威信很高。据说当年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为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首先在台湾倡导崇拜关帝,以团结群众。同时,关帝还作为武神而受到供奉。大概这是因为开发台湾的先民们常遭受原土著民的劫掠,并且各地各乡之间也常发生械斗,百姓为保安全就拜关公保佑。所以,拜关帝在台湾也很兴盛,庙宇众多,全台约有 190 多座,其中心庙宇在台南的祀典武庙。这座庙宇又称“大关帝庙”,位于台南市。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庙门正面的匾额上书“大丈夫”,左有“天柱地维”,右有“浩气凌云”两匾,庙内还有“文武圣人”、“至圣至神”、“口星河岳”等多块匾额。此庙曾遭地震毁坏,后

重修。

③保生大帝崇拜

每年农历的三月十一日，通常都要举行上白礁谒祖祭典的盛大活动，而上白礁即指福建省白礁乡，这是开发台湾的先民们追怀故土的又一例证，一方面缅怀在大陆上的祖先，另一方面则是遥拜福建省同安县白礁乡慈济宫祖庙。慈济宫供奉的是保生大帝，其本名叫吴本(音浩)，是宋朝时福建省同安县白礁乡人。据称他上通天文，下晓人文地理，并精通医术，常为家乡的父老解危释难，赢得人们的爱戴与敬重，死后其家乡人认为他已成仙，还在乡里建了慈济宫祭祀他，希望他永远保佑世人。在宋朝时，宋高宗敕封他为“大道真人”，以后人们又称他为“大道公”。明末随郑成功去台的军民中也将保生大帝的神像迎请到台湾，建庙供奉，即是如今的台南学甲的慈济宫。在开发台湾之初，生活及生存环境较为恶劣，各种病害及瘴、瘟疫肆虐，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但当时又缺医少药，只好求助于家乡的医药之神保生大帝来保佑。在台湾，保生大帝又俗称为“大演公”“花轿公”“吴真人”等，建有许多庙宇，其中供奉着保生大帝的分身像，全台共有 140 座庙宇，尤以学甲慈济宫最为著名。

近年来，台湾同胞不断组团到福建来进香谒祖，到白礁拜慈济宫的祖庙。1990年5月“台湾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大陆进香团”一行438人(代表了台湾200多座庙宇)来福建访问，并与大陆学者一起召开了有关保生大帝的学术研讨会，既密切了台海两岸骨肉同胞之情，也促进了民间交往及学术的交流。

④肖太傅崇拜

肖太傅即“肖府太傅”，东汉人，名望之，字长倩，博学多闻，曾于东汉宣帝时官拜太子太傅，宣帝临终前受命为元帝的顾命大臣，辅佐幼主。但后来被奸人石显陷害，饮毒自尽。以后，人们在泉州

建庙供奉,祖庙称富美宫,他亦被世人奉为神名,尊称“肖太傅”或“肖府王爷”。台湾的聚宝宫等祭祀肖太傅的庙宇主要分布在云林县,有麦寮乡的聚宝宫、泰安宫、和台西乡的泉和宫等,多为泉州籍人士崇拜。据说,在全台有 700 余处分坛。1989 年 5 月云林县麦寮乡光大聚宝宫组织了一个 200 多人的赴大陆进香团,在台湾首次通过合法途径经澳门转往大陆,实现了到泉州祖庙进香的愿望。

(2) 先人崇拜

这类崇拜主要受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其崇拜的先人也多是儒家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杰出人物及开发台湾的英雄,如黄帝、尧帝等传说中的人物,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及孟子、朱熹等,也供奉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祖孙三代。这类庙宇多是注重在崇拜对象的道德人格力量方面,宣扬他们的高尚品德。历代统治者往往利用这类崇拜来警示百姓,效法先人的行为,以三纲五常来约束自身,成为忠于朝廷的顺民。这类崇拜在现代台湾的社会中只起道德约束的功用。

(3) 乡土神崇拜

这类民间信仰崇拜起于开发台湾的先人们,历史也最悠久,当然,其根源也是在大陆。台湾的开发史已有 1000 多年,最初的开台先人多来自大陆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福建与广东的移民占绝大多数。而那时生活条件非常艰难,先人们便从各自家乡带来各地的神灵加以供奉,成为各族、各乡民的保护神。这些神灵往往带有浓厚的原始崇拜及自然崇拜的色彩,其功能复杂,既是地域神明,也是政教合一的地方保护神。如三山国王、福德正神、开漳圣王、王爷、城隍、土地神等等。目前,这类庙宇规模一般较小,但数量很大,有些还是跨地区的,极富地方文化特色,往往成为乡镇地方文化及经济的中心,有的则演变为家庙,将某一个或一些神灵供奉在家中。主要介绍如下:

王爷又称千岁爷、某府千岁、将军、王公、大人、老爷等，原是一瘟神，因早年开发台湾时流行各种疫病而崇奉它，以祈求得到保佑，属人鬼崇拜。但在台湾王爷发展为具有神通广大的保护神，面貌被塑成白、赭、黝三种颜色，以五个土头铁身或木头竹身为其特征，并不可畏，在台湾被认为有治病、消灾及海上保护等功能。根据1959年的调查，全台王爷代天巡狩神的庙宇共有613座。也有的学者提出，“王爷”身分复杂，历史上曾赋予它众多的身分，甚至有人认为郑成功、郑经及郑克塽祖孙三人也是王爷的化身。据统计，在台湾王爷被赋予了20多种姓氏，其中以朱、池、李三姓王爷最多，寺庙里往往将数尊王爷合祀，所以有二王爷庙、三王爷庙及五王爷庙等等。目前，王爷庙在台湾的寺庙中数量最多，共有680多座，多分布在澎湖、台南、高雄、屏东等县的海边，而以台南最多，达113座。

福德正神也是土地公的别称，在台湾受到广泛的崇拜，几乎每家都设有其神像，所建的庙宇多达327座，祭祀仪式多在春播秋收之际，与闽粤地区的赛社活动很类似，但在台湾更发展为影响广大的民间信仰形式，属自然崇拜。土地公被认为是村落及家宅的守护神，也是财神、山神及农业等保护神。

开漳圣王是漳州籍人士的乡土神，传说他是唐代开拓福建漳州的辅助将军陈元光，曾率领中原十八姓族开发漳州，以后他被福建民间奉为漳州人士的保护神。明末清初漳州人士移民台湾时也将开漳圣王的香火随行带来，并建庙供奉，作为他们的乡土神。在台湾，开漳圣王庙有50多所，中心庙宇是基隆的奠济宫，信徒多为陈姓族人。

三山国王是广东移民供奉的神灵。相传三山国王是潮州揭阳县的独山、明山、巾山一带的保护神。三山国王庙在台湾有124座，主要分布在桃园、苗栗、彰化、高雄、屏东等粤籍人的村落，是广东

、梅、惠州籍人的乡土神。其实三山国王属于自然崇拜,后被信徒拟人化,成为有求必应的地方保护神。在台湾著名的三山国王庙有彰化永靖乡甘霖宫、社头乡枋桥头镇安宫、鹿港镇埔仑里霖肇宫、宜兰县员山乡三山国王庙等。另外,值得说明的是在福建籍移民中也有奉三山国王的,但其庙里的神像却改换为刘备、关公和张飞,其原因相传为闽粤籍移民间曾发生械斗,粤籍移民他迁后闽籍人士便将庙里的神像改头换面加以崇拜。

广泽尊王又称保安尊王,本姓郭,祖庙在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在台湾主要是南安县人士供奉,并视为保护神。

拜城隍在大陆较为流行,城隍被认为有统治城镇、监察民情的责任。每当民间有天灾人祸,地方长官均要先拜城隍。在台湾民间,朝拜城隍也十分普遍,尤其是清代,台湾官方对城隍推崇倍至。每逢城隍祭祀之时便成为民间百姓的节庆日,自农历的五月十一日城隍爷诞辰日开始,但各地不同。香火最旺、庙宇最大的是台北霞海城隍庙,建于清咸丰九年,是当时淡水厅的县城隍,在道光元年由福建同安奉请赴台,该庙于1934年重修。在农历五月十三日要举行盛大的城隍爷出巡仪式,也被称为“五月十三大拜拜”,引来数十万人参加聚会,热闹非凡。另外,台南府的城隍庙及新竹的城隍也很著名,全台共有城隍庙44所。

清水祖师,原名陈应,福建人,生于宋仁宗二十二年(1044年)。他在台湾受到福建籍人士的崇拜,以祈求平安、健康。全台共有63座庙宇,其中以台北市的艋舺清水岩、台北县淡水镇的清水岩、台北县三峡长福岩等。

中坛元帅俗名李哪吒,即李靖的第三个儿子,又被称为“哪吒三太子”,在台湾民间信仰中他被尊为“中坛元帅”,广受百姓敬奉,在全台以其为主神的寺庙就有94座,以台南县为最多,据说是乩童的守护神。

有应公崇拜是台湾民众特有的信仰，也是典型的鬼神崇拜，它是“无缘鬼魂”，祭祀不知姓名的、不知籍贯的枯骨，并建庙奉祀，这庙又被称为“千家庙”、“万家庙”、“万人庙”、“万堂”、“真灵庙”等，全台有 45 座。

（4）佛教及道教神的崇拜

台湾的民间宗教受佛教及道教的影响极深，许多佛教及道教的神灵也都成了民间信仰的神明，其崇拜形式也往往借鉴佛、道教的仪式。有些寺庙是将佛、道及民间信仰的神供奉在一起，只是主祀神属民间信仰；而有些则把纯粹的佛教或道教的神作为主祀之神，如观音佛祖、玄天上帝、玉皇大帝、弥勒佛祖、文昌帝君等，这类神灵具有综合的功能，法力无边，更体现了台湾佛、道教与民间信仰相互混杂的特点。如真武玄天大帝是道教里的神仙，在民间信仰里也受到特别的推崇，他又被称为玄天大帝、北极大帝、上帝公等等，在台湾将他作为主祀神的庙宇多达 266 座，其中心庙多为各地的北极殿。再如佛教中的观音菩萨也在台湾民间宗教中作为主祀之神加以供奉，其地位被抬高到无上的位置，成为万能的神，受到百姓的广泛崇拜，以观音为奉祀主神的庙宇在全台湾共有 440 多座。

另外，由佛教、道教衍生的一些“秘密宗教”形式大多也属民间宗教信仰的范畴，如斋教、罗祖教、大原灵教、三一教等等形式，它们所敬奉的神也多来自正统的佛教或道教，但又不被正统宗教所接纳，所以成为民间秘密流行的教派。一般的信徒却对这些教派并没有太大的成见，他们只拜神，相信神的灵验，而不是看人、看教派，有些“秘密宗教”实际上在民间广泛流行，如三一教。因此，这里的民间信仰的范畴也包括了这些所谓的“秘密宗教”。

除上述所列的四种崇拜外，台湾民间信仰还有其他形式，如祖先崇拜，即将自己祖先的灵魂视若神灵供奉，其实在多数的佛寺及

道教宫观里也专设有“思亲堂”一类的灵堂，供人们拜祖祭祖之用，许多人更将祖先的灵牌供奉于家中。在台湾的山地同胞中则非常盛行自然崇拜。山地人是台湾的少数民族，人口大约有40多万，他们是台湾的土著居民，其所信奉的神灵既有宇宙主神，也有自然神、精灵妖怪等；举行各种形式的祭祀仪式是山地族人宗教信仰中的基本活动，但大多属于自然崇拜形式，如农事祭祀包括开垦祭、播种祭、收获祭等，祖灵祭即祈求来年丰收和子孙繁荣，渔猎祭祀包括狩猎祭和渔祭等等。另外，还有大量的行业神崇拜。再者，就是鬼灵崇拜、巫术及迷信广为流行。认为人生病或遇灾是有厉鬼缠身或居住的风水不好，这就要请专门的巫覡、巫师来替人占卜、测字、作法驱邪、赶鬼治病等。近年来因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问题也冲击着传统的道德人伦，人们在无法改变现实的情况下，纷纷去卜卦、算命、摸骨、安斗、收惊、盖运、看风水等，使台湾的迷信大行其道。不过迷信虽与民间信仰有密切联系，却并不是宗教。

二、重要的宫观

台湾道教庙宇特别多，据1987年1月台湾“内务部”统计资料，台湾共有各种宗教寺庙11,757座，其中属于道教系统的达6,955座^③，占一半以上，大多数为台湾光复以后建立的。在台湾的中部及南部地区，道教的影响很大。因道教崇拜众多的神灵，所以，修建的道庙也有许多种类，如有供奉玄天上帝、张天师、关帝、吕祖等纯道教尊神的；也有供奉民间信仰里的神化的人物，如保生大帝、妈祖、临水夫人、三山国王等等；还有一类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寺庙，三教的神明供在一个庙里。据统计，供奉玄天上帝的庙宇全台有260多座，奉关帝的武庙有158座，而供奉吕祖的仙公庙有30多座；民间

信奉妈祖的庙宇更不计其数,大约有800多座,奉保生大帝的庙堂也有200多座。以下介绍一些台湾著名的庙宇:

1. 台北木栅指南宫

该宫位于台北市木栅区东郊的指南山麓,为台北市最大的道教庙宇之一,供奉吕祖,也是台湾奉祀吕祖庙中规模最为宏大者,有道教圣地之称。过去因山上的猴子多,被称为“猴子山坑”,如今改称指南山。该庙前临台北盆地,附近有多处游览观光的好去处。登上指南宫的大接引台,即可远眺淡水河畔的观音山及景美和木栅的全景,视野开阔,景色迷人。指南宫除正殿外,还有凌霄宝殿、大雄宝殿、大成殿等多处建筑,并附设有观光乐园、露营场所。

指南宫主殿供奉吕祖,最初于清光绪八年由大陆分灵而来,先供奉于艋舺(今万华)的玉清斋。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现在的位置上兴建一所道庙,但规模较小;到1921年才大兴土木,建成如今的颇为壮观的殿堂,1966年又扩建了六层建筑的凌霄宝殿,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道教信徒。1973年开始兴建大雄宝殿,其正殿于1984年落成,为七层建筑,供奉佛教诸神。而该宫内的大成殿则为孔庙。所以,指南宫实际上是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寺庙,不过道教的色彩更浓一些而已。因为,该宫主奉吕祖“性命之理,三教同体,门户大开,任其择取”的教义,认为儒释道三教同尊。

指南宫每年有五次大的祭典,一是农历的正月初一至初九,为庆祝玉皇大帝圣诞节;二为农历的三月三十至四月初六,庆祝释迦牟尼佛圣诞及浴佛大典;其三为农历的四月十二至十四恭祝孚祐帝君圣诞的大法会,并在十四日这天举行道教信徒皈依大典;四是纪念孚祐帝君成道日,在农历的五月初十至十八日举行大法会;其五是在农历的九月初一到初九,为纪念圆明斗母诞辰所举行的九皇礼斗法会。其中以纪念吕祖得道日的祭典最为隆重,其盛大的场面不亚于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祭典。平时到指南宫烧香朝拜的信

徒及旅游者也多如潮涌。该宫内部组织设有管理委员会，由高忠信任主任委员，还设有监事制度，雇佣的职工多达近 300 人。指南宫还开展一些慈善服务，如设置奖学金，救济贫寒学生。近年来，指南宫正拟建道教学院及职业专科学校，一方面培养道教人才，另一方面服务于社会；另外，还办有指南宫客运公司，道教宫观已采用企业化的管理方法。

2. 台北行天宫

位于台北市民权东路，主祀关帝。该宫创建于 1943 年，第一代主持为郭得进居士，原址在台北市的延平区，初名“行天堂”。1949 年迁址于台北市的中山区，始称“行天宫”，还于 1957 年 5 月开始兴建北投分宫，1956 年 6 月建成。第二代主持黄朴居士自 1949 年开始在三峡白鸡山修建行修宫，1965 年 11 月独资建成；他担任行天宫的主持后于 1963 年在台北的民权东路上筹建新的道教宫观，并于 1967 年 12 月落成。1968 年黄朴引退后捐献了三峡行修宫，合并行天宫及北投的分宫成立财团法人，选任郭得进的长子郭清辉为首任董事长。该宫的正殿供奉五圣恩主，以南天文卫圣帝关公为主神，南宫孚祐帝君吕祖、九天司命真君张恩主、精忠武穆王恩主分祀左右，并配祀关平太子、周仓先师及三教圣贤仙佛。

行天宫还创办有一所现代化的图书馆，兴建于 1977 年，免费提供各项服务，藏书量多达 10 多万册；1988 年还在北投的分宫设立了图书室。

3. 保安宫

位于台北市淡水河与基隆河的交界处，俗称“大龙峒大道公庙”。据称该庙早在清嘉庆十年（1805 年）即开始修建，历时 25 年才建成，宫貌建筑壮观而富丽，为台北最大的道教宫观。该庙历史上曾分别于 1898 年、1917 年及 1967 年经三次大的修建，1981 年又扩建，始成今日的规模。

该宫内主奉保生大帝老祖、二祖、三祖至六祖，以及平安祖和白礁祖等神明，后殿奉神农大帝，1981年落成的凌霄宝殿内供奉玉皇大帝和无极天至尊，同时落成的邻圣苑里则供奉孔子。每年最大的盛典是在农历的三月十四日保生大帝的圣诞庆典。届时信徒们要举行盛大的游行表演，并拥有13个祭祀团体的“大道公会”，还要演出极富台湾特色的“家姓戏”，即在三月初五到二十日，由同安籍的大族姓依张、陈、黄等的次序每天演戏一天，以示祝诞。

4. 北投关渡宫

这是一座妈祖庙，位于台北市西北角的淡水河入海处，初创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台湾民间盛行崇拜妈祖，所以在台湾各地妈祖庙也彼彼皆是，但又往往与道教的神灵一同供奉，所以妈祖庙在台湾的民间往往归于道庙之列。北投的关渡宫相传是当年由福建省莆田县湄洲岛的天后宫分得两尊圣母的金像，在今址建庙以供奉，始称“关渡祖宫”。日据时代的1922年，此宫曾被焚毁，后又重建，并更名为“关渡宫”。1953年又大事重修，才成如今的宫貌。

该庙的正龛供奉妈祖，右殿奉菩萨，左殿奉文昌帝君。关渡一带民众的宗教活动多以妈祖庙为中心，但凡婚丧喜庆，都要请妈祖降临，平时也举行一些消灾祈福、驱魔避邪的活动。这所妈祖庙是台北市历史悠久、规模也较大的一座，据说蒋介石曾于1967年和1968年两次到这里参观。

5. 松山慈佑宫

位于台北市松山区顶锡里八德路，创建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该庙原名“锡口妈祖宫”，主祀的神明为天上圣母妈祖。据传说，这座妈祖庙的创建是一名法号叫“衡真”的和尚发起的，他是福建泉州籍人士，在锡口泉州籍同乡的聚居地于乾隆十八年开始兴建妈祖庙，四年后建成。此宫在嘉庆六年（1801年）、道光六年

(1826年)、1917年三次大修,1963年又增建一佛祖殿,1981—1985年再次扩建,庙貌宏伟壮丽。

慈佑宫每年最大的祭典是在农历的三月二十三日庆祝妈祖圣诞礼,届时祝寿大典要举行妈祖出巡十三街庄的祈安绕境活动,俗称“迎妈祖”。善男信女们排成队伍,舞狮摆龙,锣鼓宣天,甚为壮观。另外,在每年的联考前夕,还要为学子们举行文昌梓潼君安升学法会,等等。再者,宫内保存了许多清代的珍贵文物,并于1976年修建了一座五层的图书馆,还经常为社会做一些慈善事业。

6.彰化元清观

这是台湾道教寺庙中唯一称为“观”的一座,又俗称“天公庙”、“玉帝庙”等,初建于清代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是由福建泉州籍群众出资修建的。如今的元清观是在清嘉庆年间重修的。当初的建筑材料大多由大陆运去,连建筑师、工匠、雕刻师等也是从大陆聘请去的。建筑的外观宏伟壮丽,是彰化县较为著名的道教庙宇。

该观的大门上除刻有“元清观”外,还挂有“温陵福地”的匾额,而“温陵”是旧日泉州府的雅称,可见,元清观在泉州籍人士的信仰中的重要地位。元清观的正殿供奉着玉皇大帝的巨大塑像,这也是台湾道教宫观中绝无仅有的,因在一般的宫观里,只设玉皇大帝的神位。最大的盛典为农历正月初九玉皇大帝的圣诞庆祝,方圆几十里的善信们届时都要来朝拜。在元清观大门外的广场上有一“龙潭”,内有一石雕的卧龙,潭内还有放生的乌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

竹山慈惠堂

位于南投县的竹山镇。该堂原属一座私家寺庙,第一代堂主是林火岸,开始供奉开漳圣王,本世纪60年代改奉西王金母为主神,在主殿里设有金母圣像一尊,并改作募建庙。经1960年、1964

年及1973年三次大的扩建，庙堂规模大增，无极宝殿富丽堂皇。

1986年又开始翻修本堂的正门通道。由该堂直接分灵而出的道堂有十多座，如南投、溪湖、林内、花坛、义和等，间接分灵出去的有日本、冲绳、永靖等。现任第二代堂主为林国雄居士，他本人为台湾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研究所的教授，曾获得了法学博士、工学硕士学位。

8. 北港朝天宫

位于云林县北港镇义民路，是台湾规模最大、现存历史也最悠久的妈祖庙。它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当时有位名“树璧”的和尚从福建莆田县的湄洲岛奉妈祖像到台湾，在北港建立了一座小祠供奉妈祖。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修建了一座砖瓦祠堂。雍正八年（1730年）重修，渐成规模。乾隆十六年（1751年）再翻修一次，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修建了两栋佛殿，亭阁两栋，正殿里奉天上圣母，后殿里则奉祀佛祖。咸丰五年（1855年）有将此庙扩建为四进、七殿，又建东西两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4月，朝天宫毁于嘉义大地震。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民国元年（1912年）修复完善，当年的妈祖像仍供奉在正殿里，庙里还保存了雍正皇帝、光绪皇帝敕赐的御笔匾额及一些古碑，全庙占地约1,000多坪。该庙因历史悠久，自称在台湾享有妈祖“总庙”之称。

目前，全宫布局和建筑风格为中国宫殿式，有山门、正殿（圣母殿）、中室（观音殿）、圣父母殿（供奉妈祖神眷）。圣母殿的正面神龛内供奉着主神妈祖，后排列有镇殿妈、中排分列二妈、三妈、四妈、五妈、六妈，前排列祖妈；观音殿除中室供观音外，东西两侧还有十八罗汉，圣父母殿神龛中央供的是神父积庆衍泽公、圣母积庆夫人，左右两侧配祀神姐慈惠夫人、神兄灵应仙官，此殿是台湾妈祖庙中所独有的。另外，宫内还有注生娘娘殿、境主公和上地公

殿、三界公殿及五文昌殿等。宫内还存有雍正皇帝、光绪帝敕赐的御笔匾额及石碑数种。观音殿位于中殿，奉观音，还塑有十八罗汉。圣父母殿位于后殿中室，奉神父积庆衍泽公、神母积庆夫人；注生娘娘殿，位于正殿的右厢房，供奉临水夫人陈靖姑。每逢妈祖生日、元宵佳节、九月九秋祭时，都举行盛大的庆祝祭典及妈祖绕境仪式，各地香客云集这里，祈求妈祖保佑平安。

朝天宫内部的管理与其他道教庙宇一样采取世俗的办法，自1922年起就实行了信徒代表大会制度，并订有《北港朝天宫管理章程》，实行委员会的管理办法，还设有住持。但实际的权限掌握在委员们的手中，而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是地方有势力的政、军、商界的人物，这也是台湾道教宫观的一般特点。1972年，台湾省政府指定北港朝天宫为台湾省宗教纪念观光区。目前，朝天宫仍由佛教临济正宗僧侣管理，现任住持为释常定法师，并实行董事会制，经济来源除一小部分香火收入外，多半是财团、商行及私人捐献。该宫是台湾妈祖庙中香火最旺的一座，每年要接待600多万信徒，已成为全台妈祖祭典的中心，每逢妈祖诞辰日及升天日，都要举行盛大的妈祖绕境的仪式，进香的人更以百万计。1987年10月3日（农历八月十一），由该宫董事会发起组织了浩荡的妈祖环岛绕境弘法大游行活动，有3,000人一直护送着载有妈祖神像的圣驾车，从北港朝天宫出发，经过了全台21个县市及台北和高雄两市，历时21天，再返回原地。1969年还将该宫的妈祖像迎到日本的岐阜市，几年前又迎到巴西，成为华侨中妈祖信徒的朝拜之地。

此外，因这座妈祖庙是由福建湄洲的妈祖庙分灵而去的，近年来随着两岸民间交往日增，大批的台湾香客便到湄洲来进香朝拜，北港的朝天宫还组织专门的朝拜团来迎请妈祖像到台湾，祭典仪式盛况空前。

9. 三山国王庙

台湾建造最早的一座奉祀三山国王庙是潮汕会馆。在台湾道教寺庙里大约有 120 多座是三山国王庙，而三山国王主要是广东潮、汕一带移民的地方保护神。“三山王”是指独山、明山及巾山的山寨大王，传说曾为民做过许多好事，后被尊为山神，并曾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褒封，因而在随移民传到台湾后广受崇拜，庙宇的数量也很多。这座潮汕会馆建于清乾隆七年（1742年），是由台湾县的知县杨允玺等人率广东籍移民在原台湾府小北门内镇北坊兴建的，以后经多次重建和扩建。现存的这座三山国土庙为清乾隆四十一年扩建的模式，1976年还经一次大的修缮，为一典型的广东风格的寺庙建筑，其雕梁画栋皆出自广东潮州籍的工匠之手。

10. 哪吒庙

这也是台湾道教中香火比较旺盛的庙宇。哪吒庙又称“中坛元帅庙”，而“哪吒”之名源自《西游记》与《封神演义》，也称为太子元帅、三太子爷、太子爷等，在台湾的寺庙里其形象仍是脚踏风火轮、手持乾坤圈，可降妖伏魔，又有李罗车、罗车公、大罗仙、罗车太子、金环元帅等俗称。1989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台湾的哪吒庙多达 114 座，其中台南有 37 座，台中有 16 座，屏东有 23 座、台北与澎湖各有 4 座¹⁰，其名称也不尽相同，如有称中坛元帅庙的，也有称太子帝庙的，还有慈运宫、保安宫等不下十几种。

目前，台湾最著名的哪吒庙为位于高雄市的三凤宫。这座道庙建于清朝咸丰年间，至今有 100 多年的历史。每年农历 9 月初三到初九，都有哪吒圣诞庆典，届时这里的香客如云，仪式隆重。

11. 台南天坛庙

该庙主祀玉皇大帝，创建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称“天公坛”，后改名为“天坛”。在天坛庙的原址上是郑成功祭天的地方，称“天公埕”。在道教里，玉皇大帝是统领九天的最高的神明，备受民间信徒的崇拜，每年的玉皇大帝圣诞日时，在“天公埕”都要

举行盛大的祭典。清代初期，“天公埕”也因郑成功提出过“反清复明”的口号而停止了祭典活动，仅将圣炉轮流供奉在自己的家中。

“天公埕”一带也逐渐地变成繁华的闹市。到了咸丰四年，经地方乡绅的，请，获批在原址上建庙，经本地官民集资，很快建成“天公坛”，主祀玉皇上帝的圣牌，同祀福德正神及文武判神等。次年，又增建后殿，塑三清道祖、三官大帝、张天师、南北斗星君、天上圣母等等道教神明加以供奉。后来，又增建如兰堂会，作主持庙务及祭事之用。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再重修该庙，并更名为“天坛”；1949年又开始再次修缮，蒋介石还题“义格苍穹”一匾相送。1932年建成成武圣殿，塑岳武穆王、延平郡王两神像供于殿内。目前，整个庙貌的建筑为华南宫殿式，肃穆庄严。正门有左右石狮镇护，偏门有造型质朴的石鼓，大殿的飞檐上则以双鱼双龙点缀，显得古朴而形象。正殿里供玉皇大帝，后殿里主奉三清道祖，左厢的武圣殿奉祀关帝。该庙里保存许多古物，如前殿里的龙柱是咸丰五年（1855年）的作品，正殿拜亭旁的龙柱是同治年间的作品，还有乾隆年间的四脚古香炉及几副名匾、三个古碑等，都十分珍贵。因天坛是台湾最早的官民合建的寺庙，故在1983年第三届信徒大会上，将此庙又更名为“台湾首庙天坛”。每逢玉帝诞辰日（农历正月初九），这里将举行盛大的祭典，还组织有专门的诵经团。

12. 文昌庙

在台湾有近30座供奉文昌帝君的庙宇，遍布台湾各个县市。文昌帝君系道教中主宰功名禄位的神明。文昌帝本是人们对张亚子的神化，张为西晋人士，生于越隽的一户士大夫家庭，后迁到蜀地。生前信奉道教，并著《明丽浩荡》一书，阐明道教要义，还做过晋朝的官员，平时对父母非常孝敬，后战死于沙场。死后，其家乡的人们仰慕他的人品，并在梓潼县建造了一座道教清虚观供奉他。

后来,人们对他不断神化,唐、宋、元代也对他累加封号,元仁宗延佑三年(1314年)将他封为文昌帝君,以后更得到天下百姓尤其是学子们的敬拜。福建、广东的移民到台湾后,继承了大陆的传统,将文昌帝君与孔子一样作为读书人的守护神而加以崇拜。

台湾的文昌帝君庙中最富盛名的是新竹县关西镇的文昌祠,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由当时关西镇的秀才刘跃黎等人发起建立,供奉文昌帝君和孔子。因这里风景秀丽,每年都吸引了大批的香客,特别是在农历二月初三纪念文昌帝君诞辰时,或在台湾联考的前夕,这里便云集了各地的读书人前来朝拜,祭典仪式也颇为壮观。

13. 鹿耳门圣母庙

据说这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妈祖庙。相传,明末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率兵25,000人、战舰350艘,横渡海峡,赶走占领台湾长达38年之久的荷兰侵略者,当水师航行到鹿耳门港时妈祖显灵助战,而后在港口兴建一座天妃庙。不久,郑成功招募许多福建、广东一代的百姓到台湾来垦植开发,这些大陆移民便将妈祖视为保护神。庙中供奉的妈祖像也是由福建湄洲迎去的“湄洲妈”,因常年受香烟熏烧而成为黑色,又被称为“香烟面妈”,曾受历代帝王的敕封,其地位也较高。

14. 澎湖天后宫

位于澎湖马公镇,一说始建于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年),一说建在明初。持“元朝说”的学者考证,认为在元朝的至元十八年朝廷曾发兵征讨日本,因遇台风而受挫,官兵们被妈祖救往澎湖(当时称平湖屿),自此元朝朝廷册封妈祖为“天妃”,并在澎湖建天妃宫。到了明嘉靖年间,俞大猷剿倭寇获胜,重修了天妃宫,并改名“妈娘宫”,万历二十年(1592年)再重修“妈娘宫”。不过,宫内现保存有一块石碑,上刻“沈有容渝退红毛蕃韦吗郎”字样。据《澎湖厅志》记载,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北师将领沈有容曾率兵驱逐了犯

我澎湖的倭寇。1604年，沈再次赶走了侵占我澎湖的荷兰殖民者，石碑中记载的就是这件史实。这从侧面印证了该妈祖庙的历史之悠久。如今的澎湖天后宫是在康熙年间(1664年左右)重修的，迄今也有300多年历史，也算是全台湾最古老的妈祖庙了。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进攻澎湖时，据说妈祖显圣助战，因而得康熙帝敕封“天上圣母”称号，颁赠“神昭海表”的匾额一方。以后，妈祖才被奉为“天上圣母”，成为有求必应、神通广大的天后。该宫中止殿所供奉的妈祖金身则是来自福建的湄洲，据说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虽然经过多次的修建，宫内仍保存了大量的古碑、古匾、古联等文物。附近还有万军井，原名为“妈宫大井”，还有一段神奇的传说，至今仍清泉汨汨流淌，更象征了妈祖的恩泽沐浴了台湾世代民众。

15. 开台妈祖庙

原名为“安平妈祖庙”，据称是清康熙七年(1668年)为从福建省莆田湄洲岛妈祖庙迎取妈祖的神像而建立的。它座落在台南安平港一所荷兰人所建造的基督教堂的遗址上。据考证这是台湾岛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妈祖庙，在这之后才有凤山、台南及北港的妈祖庙。1683年妈祖被加封“天后”以后，安平的妈祖庙便改名为“开台天后宫”。台湾各地天后宫所供奉的妈祖像也是从这座“开台天后宫”中分灵而去的。

16. 新港奉天宫

位于嘉义市西北16公里，北港东南3公里处，是新港的市中心。该宫也自称所供奉的为“开台妈祖”。据说新港的妈祖曾佑护过“开台先贤”颜思齐及其众人，是湄洲祖庙中最早到台的妈祖像，时间是明天启二年(1622年)。当时有一船户刘定国为航海安全特从湄洲祖庙迎请了妈祖神像，在笨港奉祀，称为湄洲五妈或船仔妈；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十寨的人民在原始笨港街合建天妃

庙，后称天后宫。但在嘉庆四年，笨港的妈祖庙遭溪水冲毁，一切文物均移到笨港辖内的新港，到嘉庆十六年在新港重建了妈祖庙，并得嘉庆皇帝敕封为“奉天宫”，而原来的妈祖神像等也移到了这里供奉，现宫中另外保存有一笨港天后宫时代的香炉。该宫庙貌富丽堂皇，共四进分三殿，其中大殿奉祀主神天上圣母，中殿奉观音，旁边祀孔子等道家神灵。

17. 学甲慈济宫

据说在跟随郑成功去开发台湾的先民们，为祈求沿途平安，特地从家乡白礁乡的慈济宫中请出保生大帝的神像，随行护驾，并在学甲镇的中心建立一座庙宇加以供奉，成为台湾慈济宫中最早的庙宇。在大陆时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要举行保生大帝的圣诞祭典，但在去台后因从大陆到台湾的行程须四日，于是为了让保生大帝有足够的时间渡海回乡，所以要提前四天，在农历的三月十一日举行“上白礁祭典”。传说，这种祭典从去台的第一年起一直举行，代代相传，至今这在学甲镇仍是一重要的节日。每逢祭典这天，在外谋生或读书的学甲人都要返乡参加祭典，还有来自台湾其他各地的保生大帝的信徒，抬着载有保生大帝分身神像的神轿，敲锣打鼓来参加祭典。该慈济宫中保存有许多古物，如保生大帝神像前的三个石雕香炉就是当年从大陆带来的，还有大量的民俗艺术品，如装饰在屋檐、墙壁上的上百件交趾烧，在台湾即是很珍贵的民间艺术品；另外在庙的两侧分别放置着皮雕大鼓及一口钟。这些文物及艺术品有许多在台湾都是绝无仅有的，而该宫也因而称为台湾保生大帝的开基祖庙。

18. 孔庙

即祭奉孔子的庙宇。孔子是儒家思想的缔造者，自汉代以来历代均崇奉他，到宋代以后，各地州府及县镇纷纷建庙祭祀。不过，台湾的孔庙并不多见，每个县市只有一座，目前全台大约有30

多座，其中最著名的是台南孔庙。

台南孔庙又称文庙，位于台南市中区南门路二号。它建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正月，庙旁设明伦堂，作为官学。当时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为发展教育特设孔庙。孔庙建立之初很简陋，但它是台湾历史上第一座纪念孔子的寺庙，也是首所公立的学校。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新修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再次重修。该庙门上有“全台首学”的匾额，庙内大成殿祀孔子、四配、十二哲，东西两侧奉祀先贤先儒；后面为崇圣祠，棂星门的东面是名宦祠、乡贤祠，西面是孝子祠、节孝祠。正殿的东侧为明伦堂、文昌阁和朱子祠。这是台湾最大的孔庙。另外，彰化的孔子庙也很著名，这两座孔庙还同时被列为台湾的重要古迹，受到保护。

在台湾，孔庙内没有一般寺庙中所供奉的复杂的神像，亦无香炉，只在正殿正中南堂设置孔子的牌位，上书“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可见，孔庙在台湾并非供一般百姓参拜的。祭祀分春、秋两祭，祭奠仪式必须依照“释典之礼”，丝毫不得任意改动，往往要由地方长官来主祭，相关官员来陪祭，非常隆重，历代如此，而民间百姓则不可用其他方式庆祝孔诞。后来祭祀大典改为每年的9月28日孔子诞辰纪念日时举行，典礼以鸣炮开始，祭祀人员要身着古代礼服列队而入，有迎神、请祭文、初献、亚献、终献、送神等仪式，并以圣乐伴奏，被称为“孔子遗乐”，所使用的乐器、乐谱都很古老。另外，历史上孔庙往往与正统的儒学教育紧密结合，孔庙旁即是府、县学之所在，孔庙的维修也要由官府筹措办理。不过，目前孔庙已失去了这些职能，大多成为旅游观光的景点，但祭孔大典仍照常举行，台湾当局还定举行大典这天为“教师节”，以示尊师重教。

1960年成立了“中国孔孟学会”，会员有数千人，多为台湾政界的遗老遗少，蒋介石及蒋经国曾先后任“名誉理事长”。

19. 二王庙

郑成功是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百姓为纪念其功绩，特建寺庙供奉他及其后人。有的学者认为台湾各地的“二王庙”自清代以来改祀郑成功父子，原来的“二王庙”供奉的是文武二王，因郑成功及其子郑经的功绩将他们像神一样供奉，并逐渐代替了文武二王，也可说是文武二王的化身，而供奉郑氏父子的寺庙也被称作了“二王庙”。

1959年据台湾“省政府文献委员会”的调查，全台有郑成功的庙宇达58座。其中清同治十三年以前的有18座，以后的有35座，而其余为年代不明者。

三、主要组织

台湾的道教严格来讲组织较松散，基本上以宫观为单位，各自独立，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目前台湾道教界有以下几个组织：

1. 道教居士会

为台湾道教界纯宗教性的一个组织。50年代初由大陆迁往台湾的江西龙虎山“第63代天师张恩溥”等道教徒发起创立，并通过会章及活动方案，规定在每年农历的二月十五日即太上老君诞辰那天举行一次年会，会址设在天师府内。但在1957年6月该组织进行了整顿。对会员严格审查。该会的居士称大居士，实行聘任制，还按道教的宗派分设积善、经典、丹鼎、符篆、占验等五道院，每院设住持一人；居士会每三年改选一次，可连选连任。该组织还聘请了若干顾问，有些台湾当局的高官也被聘为“顾问”，以扩大该组织的政治影响。

2. “中华民国道教会”

该组织是台湾道教界最大的组织。由“第63代天师张恩溥”发起于1958年7月正式成立，总会设在台北。属下有台湾省道教会、

台北市、高雄市 3 个道教分会及 21 个县市支会。到 1990 年,该组织的团体会员有 7,384 个,个人会员 39,726 人。该会现任理事长为高忠信。

3. 台湾省道教会

这是目前台湾道教界成立较早的一个团体。大陆解放后,有许多道教信徒迁到台湾,尤其是大陆的道教各派在台湾均有传播。为协调各派的关系及促进道教在台湾的发展,1951 年由“第 63 代天师张恩溥”发起成立了“台湾省道教会”,最初的会员以正一派道士为主,理事长由张恩溥担任。1957 年 11 月 29 日还通过了该会的章程,成为政治性的宗教团体。60 年代开始赵家灼被选为理事长。该组织有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之分,道教宫观可以团体会员的资格入会、道士及信徒则可成为其个人会员。个人会员又分为道士会员、居士会员、信士会员三种。会员入会时要先到地方各个分会填写申请,经审查通过方成为会员。该会还设名誉理事长及名誉理事,张恩溥生前曾担任名誉理事长,“道教居士会”的各道院的住持也均为名誉理事。目前,该组织作为“中华民国道教会”的下属组织,与各地的宫观联系密切。

4. “中华道教学院”

由台湾“中华民国道教会”于 1989 年 10 月正式创立。首届学员 30 名,另有一专修班,学员 50 名,其研究所还招收了 8 名研究生。这所道教学院以“阐扬道教精义、培育道教专才,以学术观点整理道教义理、规范道教仪规、整备道教经典、确立道教范式为目的”,学员限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学制二年;研究生则限大学或三年制专科史哲系毕业生,并分经典、教史、威仪、文学、方技各组研究。学员结业后,如果经传度宝牒及授职证书,将册报“中华民国道教会”及“道教世界总庙”。目前,台湾道教还没有一所大学,“中华道教会”拟将此学院发展成为一所道教大学,以培养更高级的道教人

才。

该校设在台北市指南宫凌霄殿的楼下三层，由“中华民国道教会”的理事长高忠信兼任院长，淡江大学中文研究所所长兼中文系主任龚鹏程任教务长，并聘请台湾各大学的著名教授及道教界的著名人士来校授课。如聘淡江大学教授刘翰平讲授易学、“中华民国道教会”常务理事龚群讲授符书等。该学院将大力推动台湾道教的研究，也是目前台湾培养道教人才的最高学府。

5. 高雄修真学院

这是一所道教专修学院，地址设在高雄道德院。而“高雄道德院”创立于1960年11月，开宗道师为郭胜芳。因培养台湾的道教人才，郭胜芳与各方联络，得到“道教会”台南支会、《道教文化》的创办人及天师府的秘书长龚群、成功大学的教授丁煌等人的大力支持，遂于1988年10月23日正式创立了“修真道学院”，并招收了第一期约240多名的学员，一年之后，约有110名取得了结业证书。这是台湾道教创办最早的道学院，学院为学员请来了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开办了丰富的道教讲座，为台湾培养道教人才开了一个先例。

四、代表人物

张恩溥：江西龙虎山正一教第63代天师，字瑞龄，张元旭的长子。光绪三十年（1897年）9月5日生于江西龙虎山。1924年他继承天师位，1949年大陆解放后迁到香港，第二年到台湾，住在台北大龙峒觉修宫。他在1951年发起成立了“台湾省道教会”，设立“嗣汉天师府驻台办公室”，传策授牒。张恩溥得到台湾当局的支持，于1957年在府内设立“道教居士会”及“道教人法师会”，以期统帅台湾道教各派。同年，张恩溥自愿退位。1958年7月由他和江伯彰等人发起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道教会”，其总会设在台北，并由

他本人担任第一任理事长。1962年12月25日，张恩溥羽化于台北市，时年65岁，后由其堂侄张源先摄理第64代天师位。

龚群 原籍江西吉安，国民党党员，解放前在长沙任第三战备司令部王从伍的副官。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到台湾，后因其叔（龚前开）追随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一同入台，故弃军随天师从事道教。60年代离开天师，出任“台湾中华道教会”的主任秘书。现任台湾中华道教总会常务理事，台湾天师府秘书长，《道教文化》杂志创办人、“中华民国道教会”的常务理事。他曾多次来大陆，1988年10月首次与我中国道教协会进行了两岸道教界经书会刊、资料的交流。他还创办“道教学院”，在许多国家设有代办处。现在台湾“道教学院”任教，传授符法，主张统一，反对台湾独立，提出宗教不介入政治的主张，并认为正统道教在大陆，道教中兴的力量支柱也在大陆，对江西龙虎山很关注。

赵家灼 台湾“道教世界总庙”的总主持。道号存神，出生于1902年，系湖南桃源县人。他早年曾就读于湖南建国法政专门学校、民国大学政经系、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一期毕业。1949年前曾担任过国民党湖南荣陵等县县长、福建省研究院社科所的所长、湖南省政府参事顾问等，军阶曾达国民党的中将。到台湾后，他曾担任“中华民国道教会”台湾省道教会的理事长，还曾被选为台湾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在台湾道教界有较大的影响力。

高忠信 生于1933年，台湾台北市人，现任台北市道教协会理事长、台湾“道教总会”的理事长、台北木栅指南宫（为台北大庙之一）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曾任过台湾“立法委员会委员”之职，1987年卸任。1988年开始与大陆“中国道教协会”发生联系，同年10月26日随旅游团到北京的白云观参访。

王寿 生于1912年，为台南玉山宝光堂、关帝圣堂、天士圣堂、天彰圣堂、宝莲圣堂、宝生圣堂董事长，同时还是“中华民国一

贯道会”的理事。此外,他也是商人,同时兼任天源营造厂、天法酱菜厂、中庸针织厂及大侍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炳南 生于 1934 年,曾任“中华民国道教会”台湾省分会理事长,“中华民国道教会”台湾省宜兰县支会理事长,台湾省“宗教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任罗东玉尊宫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还是“经济部”金属公司工程师,旭东测量有限公司董事长。

邱道得 生于 1917 年,为高雄市三凤宫名誉董事长。他曾担任高雄市参议员、“中国国民党”高雄市党部考纪委员等职;同时也是一个大商人,为王大饭店董事长、高雄东区扶轮社(世界性的社交团体,有基督教等宗教背景)前社长。他还兼任多种社会职务,如高雄区“总监代表”、高雄市“警民之友会”常务理事、高雄市“三民合作社”理事主席等。

杨清钦 生于 1934 年,分别担任了沙鹿三山国王庙、青山宫、化进宫、保宁宫、后龙北极殿及北门蚵寮保安宫建醮主任委员。他还历任“中华民国角力协会”理事长、“中华民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世界董杨宗亲会副理事长、味丹企业集团副会长、东龙建设公司董事长。

张桎 台湾道教总会副秘书长,他也是台湾“中华道教学院”的执行长。1989 年 8 月曾率台湾道教台龙旅游团来大陆,访问了大陆的许多道教圣地,促进了两岸道教界的交流。1991 年 12 月又应邀参加了“两岸宗教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并以“两岸道教文化交流的回顾与前瞻”为题发表论文。

丁煌 又名丁君涛,出生于本世纪 40 年代,祖籍江苏泰兴县,曾迁居上海,现居台南市。他 60 年代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后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修。目前兼任台湾“中华道教总会”理事、国际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日本道教学会(中国学会)海外会员、南朝鲜退溪学会会员。另外,他还在台南

组织并主持国内外道教学者的学术调查研究活动。现为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创该校文学院道教研究室，讲授“道教神学”“道教史专题研究”等，与台南道教支会合作编印《道教学探索》（丁煌总编，郭瑞雪副总编），多年来收集了许多道教书籍及资料，先后发表了 40 多篇的论文，如《唐高祖太宗对符瑞的运用及其对道教的态度》、《唐代道教太清宫制度考》、《唐叶法善在道教地位上的探讨》、《汉末三国道教发展及其与江南地缘关系》、《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明宣德八年刊本上清灵宝济度大成全书四十卷研究》、《唐末五代道教宗派研究》、《台南道教世家陈、曾二姓初探》、《韩国的道教文献》等等，他还主编了《道教文献集成》¹¹。这些文章及书籍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丁本人也成为台湾道教方面研究的权威。

五、发 展 趋 势

台湾道教的发展近年来有膨胀之势，宫观庙堂越建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道教信徒也迅速增多。但新建的道教宫观多与民间的信仰混杂，五花八门，有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民间信仰中的所有神明似乎皆可以道教的名义出现，致使道教世俗化色彩日益明显，杂而不纯。其次，物质文化生活上的富裕，也使宫观的财源滚滚而来，不但宫观建得愈加富丽壮观，而且祭典的仪式也愈加隆重，且各个宫观竞相攀比，并借助寺庙的收入大力兴办社会慈善事业或实业，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第三，虽然道教宫观大大增多、信徒也日益增加，但台湾却没有住庙的道人，也缺乏经书，更不懂道教礼节及道教音乐。所有的道教宫观都由在家的居士们管理，采用董事会，或成立管理委员会，宗教完全世俗化，这大概也是为了适应现代台湾社会发展之需。第四，近年来，因与大陆存在着人

附录: 表1: 1959年台湾“省政府文献委员会”调查及统计奉祀于两县市以上寺庙主神如下:

主神	基隆(市)	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台北(县)	宜兰(县)	桃园(县)	新竹(县)	苗栗(县)	台中(县)	彰化(县)	南投(县)	雲林(县)	嘉義(县)	台南(县)	高雄(县)	屏東(县)	澎湖(县)	花蓮(县)	台東(县)	阳明山管理局	合计
王爷	6	5	1	45	30	14	1	6	30	13	45	47	4	54	84	127	56	52	53		4		677
观音佛祖	7	18	11	15	6	33	22	17	26	29	18	26	21	13	46	25	55	31	13	5	1	3	441
天上圣母	4	4	6	12	12	18	13	7	7	21	37	38	12	25	26	54	37	36	5	2	4	3	383
福德正神	9	15	1	12	4	22	35	3	18	3	15	38	26	3	16	32	17	48	2	1	3	4	327
释迦佛	14	11	19	9	11	26	12	10	28	15	13	16	16	9	16	10	23	19	3	9	7	10	306
玄天上帝	1			10	9	7	12		2	9	13	23	13	18	44	34	30	27	13		1		266
关圣帝君	3	4	4	8	13	8	17	4	4	16	7	10	10	15	9	16	12	10	11	6	5		192
保生大帝	1	1	1	19	9	4	4	1	3		2	5	2	7	21	38	13	6	4				140
三山国王				1	2	1	27		15	3	8	19	2	6	7		7	25			1		124
中坛元帅	1	1	1	4	4	2	4	1	2	2	8	4	2	3	2	26	4	21	5			2	94
神农大帝			1	2	3	5	5	3	2	12	3	1		1	7	12	7	12		1	1		80
清水祖师	2			1	3	6	2	2	1		1	4	1		2	19	10	6	2	1			63
三官大帝			2	1	1	3	6	14	15	1			1	3	6	5	1		1				60
开台圣王	1					6	15		4	6	4	4	3	5	1		4	4	1	6			57
开漳圣王	2		2			8	21	10			1		1	1	2	1	1	1		1		1	53
元帅爷				1	1	4	1				1	1		6	8	11	6	6	1				47
三宝官	3	1	1	5		4	4	2	4	2	2	4	2	3	2	8	2	2	1			1	46
有应公	1	1	1	1	4	1	1		9	7			4	1	4	6		2		2		1	45
城隍	1	4	2	3	3	1	3	1	1	3	2	2	2	8	3	4	2	2	2	1			44

以上表格仅是一个节选12, 台湾民间宗教中的神灵多达数百种, 这里不可能一一列出。仅列了位于前十几名的受崇拜最为普遍的神灵, 以供参考。

缘、地缘及神缘的关系，台湾许多大的道教宫观便纷纷到大陆来寻源归宗，这一方面密切了两岸人民的关系，促进了道教在台湾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有些宫观也由此增加，自己的影响，提高了它们自身的地位。

当前，台湾道教最迫切的问题是要培养道教人才，加强信徒更高层次上的道教修养，并要大力开展道教文化的研究，挖掘道教文化的精髓。台湾已有许多学者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一些重要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

表2.

此表是1981年的调查情况，资料来源为余光弘：“台湾地区民间宗教的发展——寺庙调查资料之分析”，刊登在台湾《中研院民族所集刊》第53期，1983年，第81页¹³。该表中仅列出了位于前十名的民间信仰中的神灵，比较上述两表即可发现，近年来民间信仰在台湾日益兴盛，庙宇也越来越多¹⁴。

所奉主神	寺庙总数
王 爷	753
观音菩萨	578
天上圣母	510
释迦牟尼	499
玄天上帝	397
福德正神	392
关圣帝君	356
保生大帝	162
三山国王	135
中坛元帅	115

注释：

1.《宗教工作基础知识》，第546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91年。再请参见 ①

- 本学者窪德忠所著《道教史》一书。
2. 参见《台湾的祠祀与宗教》，第200页。
 3. 蔡相辉：《复兴基地台湾之宗教信仰》，第69页，（台北）正中书局印刷，1989年。
 4. 见《台湾教会公报》1994年7月24日报导。
 5. 参见“《中华民国统计年鉴》（台湾，1992年）”。
 6. 见陈耀庭“北港朝天宫和妈祖信仰”，《当代宗教研究》（上海）1991年第1期。
 7. 《台湾的祠祀与宗教》，第123页。
 8. 此为1988年的数字。
 9. 林其泉：“台湾的道教”，《上海道教》1991年第2期。
 10. 盛仰红：“台湾哪吒庙”，《上海道教》，1992年第2期。
 11. 张志哲：“丁煌与成功大学道教研究室”，《上海道教》1990年第3—4期合刊。
 12. 转引自《台湾的祠祀与宗教》，第43—49页。
 13. 转引自林胜俊著《台湾寺庙的职权与功能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印行，1989年6月。
 14. 有关台湾民间信仰的书籍，台湾的学者们近年来出版有大量的著作，其中刘枝万所著《台湾民间信仰论集》一书，汇集了作者历年来发表的有关台湾民间信仰的九篇论文，主题各一，包括了台湾民间宗教的各个方面，是一本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

第三章

天主教

一、历史与现状

(一)天主教在台湾的发展史

台湾的天主教最初是由西班牙道明会传入的。当时，正值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台湾北部，道明会的传教士就随军来到台湾，开始传教。可见，台湾天主教是随西班牙在台湾的殖民活动而开始传播的。西班牙天主教会在台活动之初就与其殖民侵略相结合，坚守“我教、我国、我王”之信条。天启六年(1626年)，西班牙人为与荷兰人争夺对台湾的统治权，派重兵入侵台湾北部的基隆，建筑“圣萨尔瓦多城”，并设置了教堂，西班牙道明会的传教士到台湾的北部及东北部传教，同时推广西班牙语，并建立传统之教会。崇祯元年(1628年)，西班牙人占领淡水，后进入台北盆地等地方，与军队同行的神父马志烈(Bartolome Marti, nez)等四人一边学习台湾土著语言，一边向当地人传教。两年后，受洗的人数达到300多名。到崇祯九年(1636年)，天主教在台湾向东传至噶玛兰、向南传到彰化县。因荷兰人于1642年将西班牙人

打败,一些神父也被捕,天主教在台湾传播16年后被迫中断,当时有4,000多教徒,他们在荷兰人占领下不得不改宗基督教新教。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天主教完全绝迹。

清朝咸丰八年(1858年)时,中英、中法签定《天津条约》后,中断了近200年的天主教在台湾成为通商口岸后又重新传入。咸丰九年,西班牙道明会的传教士郭德刚(Fernando Sainz)及洪保禄(Angel Bofarull)等人从菲律宾的马尼拉来台传教,他们于1859年5月18日抵达台湾,并在高雄前金建立第一所教堂。后来,又到屏东赤山间平埔族中间传教。1862年,郭德刚被委任为菲律宾玫瑰省的副省长,负责台湾的教务。自同治五年(1866年)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天主教分别在台南市、彰化县、嘉义县大林、云林县的斗六、西螺、斗南、台南县的永康、新化等地设立了教堂或布道所;其间(1883年时),台湾教务划归厦门教区管辖,至光绪十五年,天主教在高屏地区已建立了7所教堂,教徒共有2,570名。天主教以高雄为中心,一面向南传到屏东,一面沿台湾西岸的主要城市如台南、彰化、台中、台北、基隆一路向北发展。此外,台北地区原为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范围,后因内部发生矛盾,天主教乘机传入。1886年何安慈(Celedonio Arranz)北上传教,次年分别在和尚州及台北大稻埕建立教堂。何氏还到淡水传教,但受到长老会的排斥,后改向基隆传教,1893年设立了教堂。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后,天主教会表面仍维持原状,西班牙多明我会仍继续向台湾派遣传教士,教会也不断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彰化罗厝教堂的马守仁(Manuel Prat)神父在教堂内设置传道师养成所,招生12名,肄业年限为4年,这是天主教会在台湾开办的最早的教会学校。不过,在日据时代,日本人推行皇民化,所有教会“日本化”,台湾天主教教会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至民国二年(1913年)7月,全台共有教堂18座,

传道所21个,传道师养成所一间,传教士8人,修女3名,教徒共3,438人,其中高雄地区有630人、屏东万金赤山地区760人、台南地区93人、云林及埔姜地区367人、彰化地区276人、埔心罗厝地区436人、台北454人、淡水88人、斗六树仔脚地区328人¹。此前,台湾天主教的事务原隶属于福建省的厦门教区管辖,1913年7月,罗马教廷传信部决定成立台湾监牧区,并派遣林茂才(或称林牧才、林启明, *Clemente Fernandez*)为第一任监牧。第二年在台北市民生西路建成规模宏大的蓬莱天主教堂。1917年4月台湾“天主教教会财团法人圣徒会”开始筹办静修高等女子学校,林茂才任第一任校长,招收台籍及日籍女学生。同时,天主教会在台湾各地也不断设立布道所。1920年至1941年,西班牙道明会士杨多默(*Tomas de la Hoz*)继任台湾监牧。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加紧了对台湾天主教会的控制,勒令与外国宣道会断绝关系,后又迫使全部西方传教士离开台湾,由日人里协浅次郎代理台湾地区的监牧,天主教会的发展严重受阻。不久,天主教会开展了对抗日本的青年运动。当时,台湾的教堂有18间、宣教师18人、教徒9,737人²。

台湾光复后,日本代理监牧被遣返,改由台湾籍神父涂敏正临时代理监牧,1948年5月,罗马教廷改派陈若瑟(*Joseph Arregui*)为监牧。1949年大陆解放时,内地的天主教会开始转移到台湾,并开展有组织、有规模的传教活动,教会发展较快。罗马教廷于1949年12月30日宣布设立台北和高雄两个监牧区:台北监牧区辖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宜兰、花莲、基隆及阳明山管理局,其余属高雄监牧区。陈若瑟为高雄监牧、郭若石为台北监牧。1950年10月6日罗马教廷从高雄监牧区中划出台中、彰化、南投三县及台中市增设为台中监牧区,并于1952年1月26日委派美国人蔡文兴(*William F. Kupfer*)为首任台中监牧。同年,天主教罗马教廷将驻华大使馆由香港迁到台湾,同时宣布将台湾分成台北、台中、嘉义、高雄和

花莲 5 个教区，并将台北教区设为总主教区。这样，台湾天主教会正式纳入罗马教廷的圣统制，成为中国第 21 个省。台北监牧区也升格为总教区，郭若石任总主教。随后，天主教会在台湾大力修建教堂，外籍传教士也纷纷来到台湾，发展教徒。1956 年后，台湾的天主教会发展迅速，教堂及教徒数目激增，尤其是在山地的教会发展很快。到 1960 年，全台大小教堂共 809 间，教徒为 200,110 人，神职人员共 2,341 人，其中外籍人员 628 人³。

60 年代是台湾天主教发展的高潮期。1961 年增设了新竹、台南两个教区：新竹教区所辖新竹、桃园、苗栗三县都是从台北教区分出的，杜宝晋为主教；台南教区所辖台南市、台南县和澎湖县都从高雄教区分出，罗光为台南教区的主教；同时将高雄监牧区升为主教区，任命郑天祥为主教。据香港《公教报》1961 年 9 月 1 日报导，十年间台湾天主教徒由 2 万增加到 20 多万，神父由 40 人增加到 588 人，其中 171 人为国籍神父，修女由 100 人增至 459 人，其中 274 人为国籍，有修士 72 人，其中 20 人为国籍；并建立 7 所教会医院、5 所教会中学、1 所专科学校。次年，嘉义及台中两个监牧区升为教区，1963 年还将花莲监牧区提升为教区。1967 年 4 月 11 日，台湾天主教会正式组成“中国主教团”，罗马教廷任命中国籍主教田耕莘为“主教团”的首任主席兼总主教，每届主席团任期 4 年。1968 年、1970 年又分别建立金马、澎湖宗座署理区。教区的连年设立，说明台湾的天主教会增长迅速，据称到 1970 年时，教徒总数达到了 30 多万人。随着 1965 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结束后，国际天主教会大力推行“本土化”，台湾的天主教会在完善组织体系的同时，教会的“本土化”也在逐渐推进，大部分的主教改由华人担任，华籍神父的总数逐渐占优势。其实，自 50 年代开始，台湾的天主教会即逐步实行了本土化的策略，如可在教堂内供奉祖先的牌位、行弥撒仪式时的语言也不必仅限于拉丁语等。渐渐地，这种“中国化”的做

法已成为一种潮流，也是台湾天主教会能获得稳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70年代，台湾的天主教会加强了与世界各地教会组织的联系，并在台湾召开了一系列的国际天主教会议，以提高台湾天主教会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例如：1971年2月10—13日在台湾召开了第五届亚洲天主教教育会议，主题为“天主教学校对国家进展有何具体贡献”，从此天主教会在台湾非常注重发展学校教育，借教会教育影响社会及政治；1972年6月21日，“国际天主教广播电视协会中华民国分会”成立，从此台湾天主教会与国际天主教会的传教机构密切了关系；1974年4月22—27日，亚洲主教团协会第一届全体代表大会在台北召开，讨论“现代世界的传播福音及亚洲教会在普世教会中的角色及使命”，等等。梵蒂冈罗马教廷还与台湾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设立了“大使代办处”。据法国《十字架报》1978年2月7日报道：到1976年，台湾的天主教徒有284,012人，占全台总人数的1.7%，有神父764人，其中华人395人，外籍神父369人，修女1,256人，有教堂850间。外籍神父主要来自法国、比利时、瑞士和加拿大等国；仅“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台湾的传教士就有24名。另外，台湾的七个教区中的六个教区由来自大陆的主教和一些神父主持。教会所面临的困难有两个：一是语言难题，因台湾的土著居民大多说台湾方言，而大陆来的神职人员就要求过语言关；另一个难题是培养当地的神职人员，1976年时台湾有6所小修院和2所大修院，小修院有修生160名，大修院有90名学生。为解决神职人员缺乏，台湾天主教会从西方引进教士。1978年爱尔兰的哥伦班传教会开始向台湾派遣传教士，在新竹地区传教，并计划五年后在台组成一个12—15人的神父团。

从70年代中期以后，因台湾的经济迅速发展，世俗物质利益的强烈刺激，使得中国的传统宗教及民间信仰开始复兴，尤其是佛教

及道教近年来在台湾勃兴，反而使天主教这样的“洋教”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一些教徒移民到其他国家，也使信徒的总数日趋减少。除上述两个原因外，教会内部因神职人员的老迈、圣召的缺乏、修生人数不断递减，天主教礼仪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也使人们难以接受，这都是阻碍当今台湾天主教发展的因素。为了进一步传教，“中国天主教教友传教协进会”于1974年7月27日正式成立，宋长治任第一届理事会主席；1976年11月12日“中国主教团”向台湾国民党第11届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建言书，请准教会学校向学生介绍天主教，获得通过。另外，还不断加强基层教会的组织，如成立许多“基层信仰小团体”（简称“基信团”），开展各种灵修、圣化、传教等活动。

80年代后，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天主教罗马教廷及其他国际天主教组织也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大陆，并成立各种传教机构，或制定各样的“福传”计划。1984年2月，台湾的天主教会成世光、狄刚、单国玺、刘献堂赴罗马，7位台湾主教及旅居罗马的台湾神父、修女和教徒百余人一起受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接见，教皇指示说：“你们在台湾和海外的天主教教友，你们美妙的任务便是在做大陆教胞的‘桥梁教会’。”⁴据此，罗马教廷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桥梁教会”的“桥梁小组”，就设在台湾“主教团”之下，成员有罗光（总主教）、张春申（台湾耶稣会会长）、房志荣、李震（又名李振英，现任辅仁大学校长）、王愈荣、韩承良、韩德力（比利时人），还成立了“关怀大陆教会委员会”。以后，便有一些“桥梁小组”的成员借到大陆探亲的机会到大陆活动、或调查大陆教会的情况，甚至插手大陆一些教会的内部事务。另外，还成立了一些辅助机构，以配合“桥梁教会”的工作，如在辅仁大学有天主教资料中心、圣母圣心会的Chine Desk、“关怀中华教会福音传播小组”、“中华福音工作团”、台湾牧灵研习中心等。1988年2月8—

13日在台北辅仁大学召开了首届“福音传播大会”，会议代表除大部分来自台湾外，其余来自香港、澳门、菲律宾、马来西亚、美国、巴西、意大利、英国及南非等地。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加强传播福音的问题，会后还发表了“告中华天主子民书”，确定了台湾天主教会以后的传教策略。12月，“关怀大陆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桥梁教会”的使命及工作，并就“中共政情、宗教政策与现状、大陆教会现状”等问题作报告，台湾“主教团”做出决议，向大陆教会提供教徒灵修、牧灵生活、传播福音及培育传道人员的书籍，加强对大陆的福音广播，利用到大陆探亲和旅游的机会有计划、连续地进行传教，注意收集有关大陆教会的资料，及时总结“桥梁教会”的经验，“努力为大陆教会作物资捐献”。同时，台湾“主教团”召开全体会议，特意做出决定将每年台湾教徒为“主教团”捐款日所得款项的1/3作为给大陆教会的购书款项。这些措施说明，台湾天主教会已将大陆作为其传教的主要目标，并付诸行动。

（二）台湾天主教现状

1. 概况

截止到1989年底，台湾共有1个总主教区、6个教区、2个宗座署理区，下辖48个总铎区、407个堂区、618个兼管区，共有教堂769座，神职人员2,235名，其中华人神职人员1,527名，包括5名总主教、6名主教、414名神父，还有修士47人、修女860人、大修生63人、小修生132人；外籍的神职人员708名，其中神父355名、修士35人、修女318人⁵。目前，台湾天主教徒约30万，分7个教区和澎湖、金马2个署理区，有大小教堂900多间，其中高雄教区的万金庄圣母无原罪大教堂被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敕封为“宗座圣殿”；有主教13人，神父721人，修士114人，大修生35人，小修生96人。

(1) 台北总主教区

1949年12月30日设立台北监牧区,辖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宜兰、花莲六县。1952年8月7日罗马教廷设立台湾教省,同时将台北监牧区改为总教区,从此建立台湾天主教的“圣统制”。教廷任命当时任台北监牧的主徒会士郭若石为台北第一任总主教。那时该教区的教徒只有4,860多人,教堂仅华山一处、一所静修女中。该总教区下辖台北市、台北县、基隆市、宜兰县。历任总主教:郭若石(1952年10月26日—1959年3月1日)、田耕莘(1959年3月1日—1966年2月25日)、罗光(1966年2月15日—1978年8月5日)、贾彦文(1978年11月15日—1989年2月11日)、狄刚(1989年2月11日—今)。

总主教区内所设的直属机构有:总主教公署(现任总主教:狄刚,辅理主教:徐英发,兼公署署长)、教区法庭、教区参议(主席:狄刚)、司铎谘议会(主席:徐英发)、教区圣职灵修工作委员会、圣召推行委员会、牧灵福传委员会、礼仪委员会、经济建筑委员会等。另外还有男修会如主徒会、方济会、道明会、鲍思高慈幼会、耶稣会、玛利诺会、圣言会、遣使会、圣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等;女修会如社会服务修女会、耶稣宝血修女会、圣母无原罪传教女修会、拯望会、普照修女会、仁爱修女会、主显传教修女会、中华圣母会、圣道明传教修女会、本笃修女会、母佑修女会等等;还有众多的善会团体,如普世博爱运动、圣德兰文教团等。台北总教区下还有其它一些文教及社会事业,如天主教台湾总修院、辅仁大学及多所中学、小学和幼稚园等。

据《1992年台湾天主教手册》的统计,到1990年台北总教区有教徒76,641人、主教5名、神父有284名(其中会士206名,国籍神父172名)、修士34名(国籍的14名)、修女381人(其中国籍的249名);大小修院各一所(大修院的修生17名,小修院的修生14名)、总铎区

9 个、堂区 96 个、兼管区 27 个、教堂 123 座；开办 1 所大专院校、1 所传教学校、2 所语言学校、3 所职业学校、9 所中学、4 所小学、76 间幼稚园；出版社 4 家、周刊 1 种、月刊 4 种、电台 1 座、医院 5 间、诊所 1 个、安老院 3 间、启智中心 4 家、育英室 4 间等。到 1992 年，该教区的教徒发展到 77,000 多人，教堂 128 处，并开办了一所大学、12 所中学⁶。

(2) 新竹教区

该教区成立于 1961 年 3 月 21 日，下辖新竹市、新竹县、桃园县和苗栗县，现任主教为刘献堂。

教区内的机构有：主教公署、教区参议、司铎谘议会、教区财经委员会、牧灵传教委员会、圣召委员会、普爱会、礼仪委员会、女修会联合会、教友传教协进会、祈祷宗会、神恩复兴运动、圣母军、基督活力运动教区中心、圣经协会、基督生活团等；修会组织：男修会有耶稣会、方济会、玛利诺会、圣高隆会等，女修会有圣母圣衣隐修会、圣神婢女传教会、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耶稣孝女会、圣母无原罪传教女修会、普慈方济修女会、奥斯定修女会等等，还有一所修院即四维备修院，教区也开办了许多文教及社会事业。

据《1992 年台湾天主教手册》统计，到 1990 年新竹教区共有教徒 50475 人，主教 1 人，神父 103 名（其中会士有 74 名，本籍的 67 人），修士 8 人（其中本籍的 2 人），修女共 151 人（其中本籍的有 117 人）。总铎区 5 个，堂区 84 个，还有 50 个兼管区，教堂 150 座。该教区开办了 1 所传教学校，1 所职业院校、3 所中学、2 所小学、61 间幼稚园，设有 1 家医院、5 间诊所、5 家启智中心。

(3) 台中教区

1951 年 1 月 26 日成立监牧区，1962 年 4 月 16 日正式设立教区，下辖台中市、台中县、彰化县及南投县，现任主教为王愈荣。

该教区内的机构设置与其他教区相似，但除设有主教公署、教

区法庭、教区参议会等组织外，还设立了山地总铎区、天主教中区大专同学会等。修会：男修会有玛利诺会、圣卫道会、耀汉小兄弟会、耶稣会、严规熙笃隐修会、圣母圣心会等，女修会有主显修女会、圣母圣心修女会、玛利诺修女会、耶稣圣心修女会等。

据统计，到1990年台中教区共有大主教徒31,681名，设主教1人，有神父70人（其中会士有50名，本籍的41人），修士23人（本籍的有19人），修女143人（本籍的有125人）。设总铎区5个，堂区43个，兼管区78个，有教堂92座。该教区开办了1所大专院校、1所语言学校、1所职业学校，还办有3所中学、1所小学、23间幼稚园及托儿所，有出版社2家、发行1份月刊，有1家电台，负责制作1套视听节目，还开办了1家医院、3间诊所、3间启智中心。

（4）嘉义教区

1952年8月7日设立监牧区，1962年4月19日正式设立教区，下辖嘉义县及云林县。现任主教刘振忠。

该教区的内部组织与其他教区类似。修会组织：男修会有圣言会、本笃会、遣使会、耶稣会，女修会有中华圣母会、主显传教修女会、中华道明修女会、圣母圣心修女会、嘉而默罗传教修女会等等。

据统计，到1990年该教区有教徒17,095人，主教1人，神父有65人（其中会士23人，本籍的有51人），修士3人（本籍的只有1人），修女有77名（其中本籍的有66人），小修院1所，修生24名。教区设总铎区7个、堂区44个、兼管区40个，有教堂84座。教会还开办了一些文教与社会事业，如办有2所职业院校、5所中学、36间幼稚园、6种月刊、3所医院、1间诊所、1间安老院和1所启智中心。

（5）台南教区

成立于1961年3月21日，下辖台南市及台南县。现任主教为

郑再发。

该教区内部的组织与其他教区类似。修会组织：男修会有道明会、遣使会、耶稣会、鲍思高慈幼会、方济会、玛利诺会、圣言会、灵医会、若望使徒兄弟会及耀汉小兄弟会等；女修会有母佑修女会、玫瑰道明传教修女会、仁爱修女会、耶稣宝血修女会、圣佳兰隐修院、主显传教修女院、圣母圣心会、仁爱传教修女院等等。

据统计，到1990年台南教区共有教徒15,439人，主教1人，神父共60人（其中会士23人，本籍的48人），修士共11人（其中本籍的5人），修女67人（其中本籍的45人），有大小修院各1所。总铎区7所、堂区35个、兼管区18个，教堂59座。该教区也开办了一些文教和社会事业，如有1所职业院校、3所中学、1所小学、26间幼稚园、2家出版社、1种月刊、2套视听节目、1家医院、1间诊所、2间安老院和3所启智中心。

（6）高雄教区

1949年12月30日成立高雄监牧区，1961年3月21日罗马教廷宣布成立高雄教区，任命当时为道明中学校长的郑天祥神父为首任主教，下辖高雄市、高雄县和屏东县。1975年4月4日，教区召开了首届教区会议，1979年12月10日，郑天祥主教被罗马教廷提升为总主教。1981年11月22日，教区召开大会，决定向外传教；次年12月万金圣母堂重新修缮完毕，并举行盛大的感恩圣祭。1988年郑天祥主教任命林吉男为该教区的副主教，1990年8月19日郑天祥病逝后，选举林吉男为教区署理主教。1991年6月17日，教区第二任主教单国玺就任。1994年6月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天主教入台135周年纪念典礼。

教区内的组织除与其他教区相似的机构以外，还设立了青年使徒工作委员会、圣体军及儿童要理委员会、山地教务委员会等。修会组织：男修会有中华道明会、道明会、遣使会、主徒会、重整

奥思会、耶稣会、玛利诺会、宗座外方传教会、慈幼会、圣母昆仲会、白冷外方传教会等；女修会有圣功修女会、圣道明传教修女会、圣保禄孝女会、耶稣孝女会、圣道明隐修会、仁爱修女会等等。

至1991年底,该教区教徒有45,600多人,占当地人口的1.4%,有主教1人、神父90人(包括68位修会会士)、会士8人、修女138人、修士6人、修生14人、传教员38人;有总铎区6个、堂区55个、兼管区91个、教堂146座;男修会16个、女修会18个,修院2所(圣若瑟修道院、圣道明修道院);开办学校5所、幼儿院43所、7个学生宿舍、2个活动中心、4个文教中心,还办有《善导周刊》社、天主教文物服务社、天主教图书室、《活力通讯》月刊、《宝岛行踪》(季刊);医疗事业3个:圣功综合医院、圣若瑟诊所、海星诊所;社会服务事业13个:普爱会、高雄市天主教社会服务协会、孝爱仁爱之家(安老院)、少年城、少女城、撒玛黎雅之家(未婚妈妈之家)、乐仁社会服务中心、旅南青年活动中心、文藻储蓄互助社、天主教火车站服务中心、天主教海员服务中心、天主教高松公墓;善会组织10个:教友传教协进会、圣母军高雄督察区团、基督活力运动高雄分会、道明第三会、天主教大专同学会高雄分会、高雄教区圣经协会、高雄教区中学生联谊会、天主教职工青年会高雄分会、高雄教区妇女会、天主教学校校长暨训导主任联谊会。

(7)花莲教区

1952年8月7日,罗马教廷设立花莲监牧区,辖花莲、台东两县,由费声远兼任代理监牧。1963年3月1日成立花莲总教区,费声远主教为教区代理主教,他于1973年辞职退休,1974年12月27日,教廷任命贾彦文为花莲教区的主教,1978年贾升任台北总主教,1979年11月15日,教廷任命单国玺为该教区的主教,1991年4月20日,单出任高雄教区的主教,直到1992年2月22日,钱志纯到该教区任主教。

该教区内部的机构与其他教区相似，此外还设有传教员辅导委员会、要理讲授辅导委员会、向教外传播福音委员会、教育文化传教委员会等；修会组织：男修会有巴黎外方传教会、圣奥斯定咏礼会、白冷外方传教会；女修会有圣玛尔大修女会、沙尔德圣保禄修女会、圣母圣心修女会、圣十字架修女会、仁爱修女会、灵衣修女会及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等。

1992年统计，该教区天主教徒有 56,698 人，占辖区人口的 8.64%，是全台各个教区比例最高的；主教 1 人、神父 54 人（其中会士 35 人）、修士 4 人、修女 113 人（其中外籍 33 人）、大修生 16 人、小修生 36 人、传教员 69 人；总铎区 10 个、堂区 44 个、兼管区 210 个、教堂 186 个；有男修会 3 个、女修会 9 个、修院 1 所（圣若瑟修道院）；开办有学校 3 所、幼稚园 24 所、学生宿舍 2 所，文教中心 5 个、出版社及节日中心 2 个，还办有 5 个社会慈善事业、1 间医院及 4 个诊所。

（9）金门、马祖宗座署理教区

该署理区成立于 1968 年 9 月 25 日，下辖金门及马祖岛等。

2. 政教关系

台湾天主教徒目前虽然不足总人口数的 1.5%，但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较大。教会与当局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与台湾当局保持密切的关系，但近年来这种关系开始发生裂痕。

在国民党逃往台湾的初期，曾鼓励人们信奉天主教。台湾天主教会对于国民党政权也十分“忠诚”，始终表示与台湾当局的政治立场保持一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后，台湾枢机主教于斌曾一再主张教徒要关心政治，以便更好地为国民党政府服务。尤其是中日、中美建交后，台湾天主教会曾借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拯救”台湾的外交困境。同时，国民党当局也笼络教会，如台湾

的枢机主教于斌被委以“国大代表”“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理事长等身分，通过他在海内外各种讲坛上充当台湾当局的吹鼓手。1978年12月6日，当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时，台湾天主教会发表了题为《天主教中国主教团谴责美匪建交声明》，表示“坚持反无神共产主义信念，扫除分化人民之谬论，贡献心力，使全国上下，一心一志，突破艰险处境，完成反共复国之神圣使命”。台湾政府对天主教也宽容以待，双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鼓励教会及教徒个人参与社会的政治活动，教会可参选、助选，支持教徒步入政界。但近年来，这种“互相利用、互相支持”的关系随着台湾社会政局的变迁而发生了一些变化。1988年以后，随着台湾政局的更迭、政治形势的自由化及国际天主教势力对华策略的改变，台湾天主教会与政界的关系，开始有了新变化。教会上层人士试图彻底改变人们心目中天主教会过去那种紧随政府的形象。1988年2月，台湾天主教在辅仁大学召开“中国天主教福音传播大会”，呼吁使福音精神与信仰生活配合时代的需要，要求教徒关怀台湾大选，鼓励教徒从政，参加竞选，担任政职，注意培养愿意献身改革社会、从政的教友。大会的宣言中明确指出，一旦发现政府违背人性尊严与宗教自由，藐视正义和生命，教会便不能缄默……此外，自于斌死后，因梵蒂冈一直想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再没从台湾主教中选一位枢机主教，而是在1988年5月将香港主教胡振中升为中国籍的枢机主教，这无论对台湾当局还是天主教会都是个难堪的消息。1989年3月，台湾的“中国主教团”因“马赫俊事件”首次公开与政府对立，就天主教权利和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马赫俊（Rev. Neil Magill）是驻台湾的爱尔兰高隆庞修会神父，由于他创办“天主教爱主务工中心”，直接参与劳资争议、干预台湾社会政治生活而触怒了台湾当局，被押解出境。这一事件大大影响了台湾天主教会与当局的关系，台“主教团”甚至指责当局的做法给教会与“政府间的

坦诚合作关系划下一条极深的创伤”，给“台”梵关系也“蒙上一层阴影”等等。1990年5月8日，台北总主教狄刚与教会领导人举行座谈会，提议教会鼓励教友筹组新的政党。5月12日，台湾天主教杂志《教友生活周刊》编辑部组织了一次座谈会，提出台湾天主教会应对国是会议有所回应，台湾虽一直效法西方文明，但只重科技却忽略了精神层面，尤其是主要内涵——基督信仰……教会应补助这一弊端，不能再做一个“没有声音的教会”。

1994年4月，因台市政规划要拆毁历史悠久的西螺湾教堂及其他教堂的“都市规划”而引起台湾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大约有500多名的天主教徒，包括教士及修女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台湾当局拆除像西螺天主堂这样历史悠久的教堂，并得到其他宗教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据统计，根据台湾市政部门的“都市计划”将有70多座教堂被拆毁，这引起了天主教会的普遍反对。教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总是附合台湾当局，如今也敢于与当局对抗，以维护其自身的利益。种种迹象表明，台湾的天主教会与台当局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台湾天主教会积极介入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在政治领域里发挥教会的影响。1991年台湾竞选“国大代表”时，“福传大会”明确做出决议，支持教徒参选从政。“福传大会”的宣言中说：“大会鼓励教友从政，不论参加竞选，或者担任公职，使福音精神更深入政界……教友为了更能造福人群，有加入符合福音精神之政党的自由”；“教会各阶层应鼓励教友以福音精神积极从政”。1992年1月有4位天主教徒在台湾天主教会的大力支持下当选为台湾“国大代表”。

(2) 随着两岸民间交往的日益发展，台湾天主教会两岸关系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1990年5月底，台湾“中国主教团”正式提出《“国是会议”建

言》，在有关对大陆的策略上，要求台当局尽速订定主动的、周全的、以中国之统一为目标的大陆政策。主张积极支持民间的接触与对话，特别是文化、学术、文艺、宗教、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在开放两岸文化交流范围中，促进两岸宗教界人士的交往，而不必担心大陆的统战作法。

在大陆政策和两岸关系上认为，未来两岸的趋势可能是在民间自立动机形成的接触，经由经济的整合而达成统一，主张台当局的“三不政策”可以放宽，两岸可加强学术、文化、宗教等交流。

(3) 台湾天主教会极力充当大陆教会与罗马教廷合一的“桥梁”。

1984年2月，罗马教皇在接见7位台湾主教和旅居罗马的台湾神甫、修女、教徒时，公开要求台湾和海外华人天主教会充当“桥梁教会”，以便促使大陆的天主教早日纳入由罗马教廷控制的轨道。近年来，台湾天主教会一直关注大陆天主教的发展情况，并收集大陆教会的资料，极力向大陆传教。为此，台湾天主教主教团成立了“关怀大陆教会委员会”，通过组织访问、教友探亲、输送书刊、加强广播、传达罗马教廷指令等，鼓吹在中国广传福音，促进中国向民主制的转变，达成大陆天主教与“普世教会”的共融。

1990年12月15日，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接见台湾主教团时公开希望台湾天主教能充当其代言人，为大陆天主教与普世教会及罗马教廷早日合一起到桥梁作用。

3. 教会教育

台湾的天主教会一向重视教会教育，不但培养了教会人才，也大力兴办社会教育，本着以天主教、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教育为主导思想，为社会培养基督徒。到1989年底，台湾天主教会兴办的幼稚园有299所，小学10所，中学27所，还有9所职业学校、6所语言学校3所大学即辅仁大学、静宜女子大学、私立文藻外国语文专

科学校。另据台湾报纸报导，目前台湾主要大学的哲学系大多是由天主教徒来掌握的，可见天主教的势力在台湾普通大学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4. 慈善及文化事业

除了兴办教会学校外，台湾的天主教会还大力兴办慈善与文化事业，开办了耕莘、圣母、崇爱、惠民等医院17家，乐仁、露德等诊所31间，还有多所安老院、仁爱之家、育婴堂、启智中心、复健院，以及专为儿童、妇女、老人、青少年开办的各种中心、俱乐部、宿舍等，还有急难救助、难民、移民安顿服务等慈善机构多处。

教会也投资文化事业，一方面是为了社会的需要，更重要的一面是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势力。例如，教会创办有光启、真福、慈幼、闻道等8家出版社、书局，不但经销天主教的丛书、文物，还制作音像成品及宗教用品。另外，定期出版和发行《铎声》、《恒毅》、《主教团月志》、《点滴》、《普爱》等13种月刊及《教友生活》、《善导》两种周刊。设立了“中声”、“益世”两家广播电台及数家电视制作中心，有“关怀”、“空中神学”、“喜讯”、“请跟我来”等多种节目，还组织有各种文艺团体，借戏剧、合唱、电视、电影、文艺创作等形式来扩大天主教会的影响。这些文化事业已在台湾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5. 国际关系

台湾的天主教会非常重视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首先竭力保持与梵蒂冈的关系。梵蒂冈城国是目前欧洲地区唯一一个与台湾还保持“邦交”的国家，所以台湾当局也一再强调要借台湾天主教会的力量竭力保持与梵的“外交关系”，并鼓励台湾的天主教会积极参与教廷举办的各种国际活动，扩大台湾的影响。台湾“主教团”定期要到罗马教廷“述职”，受教皇的接见，并且台湾多数主教在意大利或梵蒂冈的神学院学习过，或在教廷内部供过

职,1962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时,台湾还派出庞大的代表团,仅国籍主教就有10人;并且,田耕莘与罗光被选为传教组委员。其次,台湾的天主教会派代表经常到梵蒂冈、意大利、法国、菲律宾、泰国、日本、南朝鲜、肯尼亚、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出席各种国际会议或进行工作访问。例如,1979年12月1—7日召开的“国际传教会议”“世界主教会议”“国际圣体大会”及天主教国际大众传播会议、亚洲主教团协会召开的各种会议等等,台湾的天主教会均积极参加。从1981年开始,台湾天主教还组织若干次朝圣团前往耶路撒冷、罗马、法国等地朝圣。再次,台湾的天主教会在本岛举办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如亚洲的主教会议、亚洲的修女会议、中西文化交流学术会议等等,还邀请国际天主教的著名人士来台湾访问,如菲律宾枢机主教海梅辛、印度的德肋撒修女、原西德的贺夫奈等人。第四,台湾的天主教会筹建或参加国际性的天主教会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如建立“国际天主教广播电视协会”“国际天主教电影视听协会”,加入了国际善会组织的分会等。第五,台湾历来接受外国修会的修士加入其教会的工作,如有美国、法国、德国、芬兰、加拿大、菲律宾、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等国的传教士在台湾相继建立组织,或加入主业会这类的机构;另外,台湾还有一些国际善会组织如方济会、耶稣会、道明会等20多个男修会及圣母圣心会、普照修女会等50多个修女会,这些机构大多直辖于各个教区,多从事堂区、教育、社会及医院的服务工作。通过以上五种方式,台湾的天主教会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天主教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在国际天主教势力范围内占据一定的地位。

台湾天主教之所以有所发展,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 一向注重传教,并得到梵蒂冈及世界各地修会的支持,设有出版机构12所、发行季刊1种、月刊11种、周刊2种,还成立一座广

播电台，制作宗教广播或电视节目。

2. 开办慈善事业，以吸引人们信教。如共设立医院21家、诊所38所。这些医院的设施先进，在台湾较著名。

3. 大力兴办各类学校教育，扩大教会的社会影响力。目前，天主教会开办的神学院有3所、大学2所、专科1所、中学36间、小学10间，还有330间幼稚园。

4. 重视培养教会的人才，整合教会组织。如开办传教院校12所，男修院7所、修女院32所，还有男修会44个、女修会72个；近年来成立各类的善会组织，协助教会传教。

5. 推行“本土化”的策略，以便适应中国教徒的心理需要。罗马教廷早就指示台湾天主教会在传教中可以采用本地语言或符合本地风俗的仪式。1988年12月，台湾三所基督教大学东吴、东海、中原举办了“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的国际研讨会，其中也邀请了台湾天主教人士担任主持人或评论员，如罗光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说明台湾天主教上层一直很注意本土化的策略。此外，借鉴佛教及道教的建筑风格，教堂的建筑外观中国化，或者采取中西合璧的形式，以增加人们的亲近感。

二、主要教堂

1. 万金圣母圣殿

该堂座落于屏东县万金村，由西班牙道明会士郭德刚创建于1861年。当时，传教士们在高雄先建立了玫瑰堂，吸引了许多来自屏东一带的教徒，为了解决这些教徒因做礼拜而须长途跋涉的辛劳，便在屏东的万峦乡万金村另批新的教堂，起名为“万金圣母无原罪堂”，堂内存有一纪念碑。万金村有2/3的村民是天主教徒，因教徒多，星期天做弥撒时要分三次举行。

传说清同治年间，沈葆楨来到这所教堂时，发现这里的神父身着清服，说中国话，他便上奏清廷，同治皇帝亲赐了“奉旨”与“天主堂”两块圣石，再由沈葆楨带到这所教堂，悬挂在教堂的门顶之上。此后，官兵路经此堂都必须下马以表敬意。在日据时期，像高雄的玫瑰堂及其他一些教堂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但因该教堂位于乡村却避免了几次战火的浩劫。现成为台湾最古老的一座天主教堂。

2. 基隆圣心天主堂

原来的基隆圣心天主堂建于1956年，座落于安乐区的云源巷，当时由郭若石主教以7万元购买了一栋楼房作为教堂，姚宗鉴为本堂神父，辖中山、安乐两区。随着教会的不断发展，教徒人数的增多，教堂已无法容纳。后来于斌主教等向台湾当局申请建立新堂，获批准，在如今的西定路建立了新的圣心天主堂（现址），1963年经田耕莘主教祝圣后正式启用。该堂附属的机构有圣心幼稚园、圣心小学、圣心高中，目前的高中部（还包括工商科）有学生2200多人，另外，补习学校有600多人、小学1,200多人、幼稚园500多人，形成了一整套的教育机构，现任圣心学校董事长为钱志纯主教。

3. 中华圣母主教堂

位于台南市开山路，因教堂建筑与装饰极富中国化而著称。该座教堂是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举行期间，为响应本土化的倡议于1964年建成的，并作为台南教区的主教座堂，台湾的学者认为它虽非台湾第一座中国式本土化的教堂，却是最彻底的一座。其外观具有中国北方宫殿的式样，没有一般教堂的尖塔，所见到的是如中国一般寺庙式的建筑，红砖绿瓦，只在门楣上中国式的横匾上标有“天主堂”三字，凭此可分辨出这里原来是一座天主教堂。教堂内部的装饰也完全中国化：如中国式的廊柱、花格子大门、门廊，

门柱上像其他中国庙宇一样刻着一副对联，“中华大孝尊天存诚起敬，圣母一心济世护国安民”。堂内设有屏风，平时只开侧门，天花板绘有中国传统式的云饰彩绘，祭台上还设有香烛，所供奉的圣母玛利亚与耶稣的磁砖贴画，其称号如同妈祖一样为“天上圣母”，两旁的对联上写着“慈母心肠垂怜众生疾苦，圣子体恤养育信者灵魂”，对联明确了这座天主教堂的本质。此外，在祭台前的红柱上有一则联文写着“至诚祀神明神怪非神明求神莫忘勤修德，上帝即天主天公亦天主敬天还须兼爱人”，以与中国传统道德相近的表达方式来阐明了天主教的教义。这里做弥撒礼时也采用一些中国式的礼仪，可在教堂内上香。这只是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心理需要。

4. 潮州圣若翰天主堂

位于屏东县潮州镇新生路13号，建于1953年。当时，潮州镇已有五户教徒，但没有教堂，做礼拜时要远涉到10公里之外的万金庄天主堂。后经申请，由西班牙籍的道明会士陆理德神父奉了高雄教区陈若瑟兼牧的命令来潮州开教，在此建立了教堂，首批领洗的教徒有24人。次年，又有大批的道明会士来台，并以此堂为中心，展开传教工作，后来还成立了潮州总铎区。1955年，原福建省汀州教区的雷新基主教到潮州担任潮州总铎区的总铎，同年8月14日，许思孟修士在潮州本堂被祝圣为该堂的第一位神父。1956年6月，现教堂建成，以后历任的本堂神父分别由李美禄（1958—1963年）、孔德禄（1963—1976年底）、郭世光（1977年—今）。近年来，道明修会未派新会士来台，鲍思高慈幼会接替潮州区的传教工作，首任慈幼会士马永定神父已于1991年被任命为该堂的主任神父，并任高雄教区第七总铎区的总铎。另外，该堂还设有海星幼稚园、教友传教协进会（前身为教友代表会，现任会长郭参宜）等附属机构，许多修女也参与服务。到1983年中该教堂有1,500名教徒，40年来先后在该堂领洗的教徒有2,250人。该堂的教徒还组织了一些善会组

织,如圣母军、职工青年会、中学生同学会、儿童道理班、普爱组等。

5. 高雄玫瑰主教座堂

该教堂又称“玫瑰圣母堂”,是由道明会郭德刚神父于 1859 年在台传教时建立的最早的天主教堂,至今已有 135 年的历史,第一位接受洗礼的教徒名叫方达,由郭德刚于 1859 年 11 月 13 日施洗。该堂外观庄严,后来成为主教座堂。到 1994 年 1 月在该堂受洗的教徒已达 10,000 名,领洗册已有 13 大本,并特为领洗的第一万名教徒周林美英女士制作了一面纪念牌。但到 1994 年 1 月,登记为该堂教徒的只有 2,000 多人,有许多分散到其他堂区,也有的属于自然递减,教徒的数目已明显减少。

三、主要组织及机构

1. “中国主教团”

1967 年 4 月 11 日设立,是台湾天主教会的权力机构。“主教团”任期四年,首任主教团主席是田耕莘主教,首任团长为郭若石、副团长罗光,团员有 16 人,常务委员 5 人。

“主教团”最初下设 11 个委员会:一、教义委员会:下设神学及教理组;二、传教事业委员会:下设传教、牧灵、宗座传信善会、研设组;三、圣召委员会:负责圣召推行等;四、司铎委员会:负责司铎福利组、《铎声》月刊等;五、礼仪委员会:负责编译、礼仪、研究、圣乐、圣艺组;六、教育委员会:负责教育、文化、大众传播、合一组的工作;七、社会工作及教友传教委员会:负责联系教徒进修、教徒的家庭、青年及经济组等,也开展正义与和平、社会问题研究与发展、资料翻译新闻、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协调、难民与移民、方案评议、医务组及“全国社会教育推展组”、教区普爱会等;八、大众传播委员会:负责宣教;九、基督徒合一委员会:推动基督教各派之间的合作与

联系;十、非基督宗教联谊委员会:注重发展各种宗教间的联系;十一、修院委员会:负责修院教育;后来,又设立牧灵委员会,在教徒中开展灵修。

1971年4月13日,“主教团”改选,于斌当选为团长,郭若石为副团长,贾彦文为秘书长。5个常务委员为于斌、郭若石、罗光、成世光和杜宝晋。其下属机构也进一步改组,将12个委员会合并为7个:牧灵委员会、教义委员会、圣职委员会、礼仪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社会发展及教友传教委员会、大众传播委员会。另外,还设有一秘书处。

1975年5月“主教团”再度改选,于斌和郭若石蝉连正副团长,狄刚被任命为秘书长,同时又增加了一个宗座传教善会委员会。从1975年9月开始发行其机关刊物:《“中国主教团”月报》。以后,各个委员会中又分出一些小组。1979年该组织改选时,贾彦文任主教团的主席,成世光任副主席,王愈荣任秘书长。1983年改选时,罗光当选为主席;1987年换届时,单国玺被选为主席,保留7个委员会:教义委员会、礼仪委员会、圣职委员会、教育文化委员会、传教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又称“普爱会”)、教友委员会。

1991年台湾“中国主教团”再度召开大会,决定从此届大会开始只有在职的主教才能成为“主教团”的成员;新的“主教团”中单国玺蝉连主席,副主席:狄刚,秘书长:徐英发。常务委员会的成员有:单国玺、狄刚、王愈荣、刘献堂、郑再发。下设10个委员会:教义委员会(林天助任主任委员)、福传委员会(单国玺任主任委员)、圣职委员会(刘献堂任主任委员)、礼仪委员会(王愈荣任主任委员)、教友委员会(狄刚任主任委员)、教育文化委员会(罗光任主任委员)、社会发展委员会(徐英发任主任委员)、关怀大陆委员会(徐英发兼任主任委员)、大众传播委员会(郑再发任主任委员)及宗教合作委员会(罗光兼任主任委员)。同年11月25—28日“主教团”召开

年底大会，将其内部的委员会调整为 12 个，即教义委员会、福传委员会、圣职委员会、礼仪委员会、教育文化委员会、宗教交流与合作委员会、桥梁教会服务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教友委员会、大众传播委员会、圣经委员会、家庭委员会。其中“圣经委员会”加入了“世界圣经协会”，主任委员由徐英发主教担任，以推广台湾的圣经研究。该组织的附属机构：一、“中华圣经协会”：由各教区圣经协会的主任及 5 位常务理事组成，推动各教区的圣经主日活动、发行《圣经》双月刊及举办圣经讲习会等；二、华语爱播乐推广中心：由美国爱播乐中心基金会支持，设立培训班，推行生活圣经。

“主教团”负责全台天主教会的教务，策划各种活动，如 1984 年“主教团”为纪念利玛窦来华 400 周年而召开了“福音传播工作策划会议”（简称“福传会”），通过社会调查，对台湾天主教会未来的差传提供决策依据，并汇集成《天主教在台湾现况之研究》一书，于 1987 年出版。

在政治观点上，“主教团”过去一贯支持台湾当局。“梵二”以后，即号召教徒关心台湾的政治前途，督促神职人员参与台湾的社会事务。在中美建交后，该组织即发表了“天主教中国主教团谴责美匪建交声明”，公开表示“抱定和国家生死与共的决心”。1984 年 2 月，“主教团”在接受罗马教皇的指示后即成立了“桥梁小组”，要充当大陆教会与海外天主教会的“桥梁教会”。之后，设立了一系列的辅助机构，开展各种活动，如在 1988 年 12 月，通过“关怀大陆教会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桥梁教会”的使命与任务。1991 年 2 月 15 日，“主教团”发表题为“共融与福传”的牧函，其中的第五部分为“中国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共融”，声称“台湾、港澳和大陆的教胞，共同组成一个中国地方教会”，“台、港、澳以及海外的华人教友，均有义务协助并促进大陆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共融。”⁸ 1992 年 7 月该机构还在《善导周刊》上发表了题为“天主教中国主教团

对改革现代社会的建言”，对当今台湾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大加抨击，并宣称要用宗教道德来挽救社会。

2. 台湾天主教的修会组织

在台湾活动的天主教男女修会组织大约有七、八十多个，修士及修女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主要从事教会及堂区内的教育、社会及慈善机构的服务工作。下面介绍一些主要的修会组织。

男修会：

(1) 耶稣会台湾省会

这是台湾最大的一个修会，主要负责传教，也开办一些社会慈善服务业，并利用现代通讯传播技术来传教，扩大教会的势力。其下设有传媒中心，还制作一套英语电视片，曾向大陆播放，自称吸引了 2,000 万人。另外，“光启文教视听节目服务社”是耶稣会在台北开设的一个视听中心。1991 年因耶稣会内部改组，新成立了“耶稣会中华省”，宣称负责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及台湾等地的教务，张春申就任“中华省”的省会长，他还专责“中国大陆”的耶稣会的工作。台湾为新的“中华省”辖下的一个区会，并任命张宇恭神父为台湾的区会长。

(2) 遣使会与仁爱会

两个修会是由同一个会祖圣文生创立的。“遣使会中国省会”的总会长马乐义也是仁爱会的总会长。两个修会主要的工作是协助各教区进行教区服务、慈善、教育等工作。1994 年 3 月，马乐义神父率领遣使会及仁爱会的会士及修女访问了大陆，加强了对大陆社会的了解。仁爱会在台北还设有露德之家。

(3) 严规熙笃隐修会万福圣母院

该会是天主教会内一个颇注重纯默观的修会，修士们生活简朴、一心寻找天主、恒常祈祷、刻苦静默，同时也特别崇拜圣母，世

界上每一座隐修院都奉献给圣母，以圣母命名。第一座会院建于1883年，是由法国七泉修院在原中国大陆察哈尔省杨家坪创办的“圣母神慰院”，后来在日本、香港、菲律宾、印尼等地相继建立会院。“万福圣母院”座落于台中教区南投县的水里乡，建成于1994年2月，并得到香港圣母神乐院及美国加州新明谷母院的大力支持，已投入使用。

该院是台湾天主教会首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男性隐修院，是现有亚洲第六座男性熙笃会修院，附属于法蒂玛圣母朝圣地。1994年2月2日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台中教区的主教王愈荣、罗马教廷代办尤雅士、香港神乐院院长赵本笃及台湾多名主教都出席了揭幕礼。

女修会：

(1) 道明传教修女会

该会因道明会玫瑰省在远东地区传教的需要而设立的。1887年首批修女加入道明会的传教之列，曾先后到达中国大陆、日本、菲律宾等地。1916年有数位修女随道明会的神父一起到台湾传教，1934年罗马教皇批准正式成立“道明传教修女会”。目前总会院设在罗马，分会有4个，分布在台湾(包括关岛、冲绳岛)、日本、菲律宾、西班牙(包括葡萄牙)，及4个直属总会治理区：罗马、智利、美国及南韩等。

该组织在台湾设有5个分院，分布于台北直的道明外侨学校、静修女子高级中学、泰山道明幼稚园、佳琳女生宿舍，高雄有道明小学、幼稚园、儿童课后托育中心，屏东还有托儿所、少女城等。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借学校教育、教理讲授、育儿院、安老院、诊所等来传教。

(2) 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

1994年3月25日正式成立台湾新省区，其实它在台湾的历史

已有 40 年。此修会在 1886 年创立，九年后即派修女到中国传教，1954 年由中国省区派修女到台湾建立分院。如今，台湾省区正式与设在港澳的中国省区分开，成为一新省区。第一任会长李碧圆修女在 1994 年 3 月 25 日成立大会上就职。她在大学时就已了解该会，并于 1972 年加入此会，1981 年誓发永愿，并一直从事青年工作。新省的中心设在台北市信义路三段。

（3）台中圣母圣心修女会

“圣母圣心修女会”最初在 1932 年 7 月 5 日创立于沈阳，其宗旨为“以内修成圣自己，外显天主光荣，淑世救人”，并获得罗马教廷的批准。1948 年在当时的会长祁志英的带领下迁到台湾，开始服务于各个堂区。1959 年又获准成立“初学院”，培育修女。目前，该会的修女分布在高雄、台中、台北、花莲、澎湖、嘉义等 6 个教区，有 13 个分院、18 个工作单位。另外，在海外如罗马、马来西亚也设立了分院。主要从事慈善、教育、社会文化事业等服务。

（4）主顾传教修女会

1992 年该修女会举行六年一度的大会，选举新会长及谘议，李惠兰修女当选为新会长。她出生于 1952 年，1978 年加入该修女会，是护专毕业，曾在耕莘医院、静宜大学、旅北教友中心及一些教堂服务。该会的总会院位于新店，修女们在台湾各个教区服务。

（5）善牧修女会

此修女会的前身是一法国神父于 1641 年创立的“仁爱庇护修女会”，专门照顾那些不幸少女。后来，罗丝·维京妮 18 岁时加入该修女会，成为于法西亚修女，28 岁时当选为该修女会的院长，四年后即 1828 年她正式创立了“善牧修女会”，并在世界各地推广，很快在欧洲、非洲、亚洲及美洲建立多个善牧修女会，到 1855 年时建立了 54 所会院；到 1868 年于修女去世时，全世界共建立了 110 座会院，而最后成立的修院是在中国的上海。目前，善牧修女会有 612 所

会院,53所隐修院,7,000多位修女,数万名义工。

台湾的“善牧修女会”开始于1987年,当时正直台湾雏妓问题最严重之时,善牧修女会一面推动少年福利法的宣传,一面建立相应的机构,如少女中途之家,包括德莲之家I、德莲之家II、信心之家,专门收容安置雏妓、被乱伦的少女及未婚妈妈,并给予辅导教育;另外,还设立了妇女紧急庇护中心,提供以家庭辅导为中心的服务;在提供服务与救助的同时,也举办寒暑假的生活营活动,宣讲宗教道德教育等等。据统计,1993年度其少女中途之家共收容安置了54人、妇女紧急庇护中心共收容安置了84人,而接受各种服务及教育的共有2,244人。

3. “中国天主教教友传教协进会”

1974年7月27日正式成立,宋长治当选为首任理事会的主席,是一传教机构。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动员教徒、协调天主教各个善会的工作,共同发展天主教。1988年12月31日召开第十届教友代表大会,选举了本会第八届理事会,孙惠康当选为主席,台湾天主教各主要善会组织的代表当选为理事,当时任台湾“中国主教团”教友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狄刚总主教也参加了大会。1990年12月30日,举行教友代表大会,选举第九届理事会,并制定工作方案。大会决定加强传教使命的宣传,推广建立基层信仰团体,参与社会活动;新的理事会主席为吴武雄。目前,会址设在台北市。

4. 天主教妇女会

成立于1984年1月8日。其宗旨是联络各教区的妇女以配合堂区的教务,并举行各类联谊活动,促进社会服务及“加强灵修、圣化家庭”,协助传教。会员要求在20岁以上,并能热心为社会服务,目前有会员约150多名。下设财务组、灵修组、总务组、活动组和社服组,会长是丁惠琴。

5. 教会大学辅仁大学

台湾天主教会开办的综合性大学。该校原创立于1929年，大陆解放后才迁到台湾。现有学生18,000多名，其中210名为天主教徒；虽然辅大有约600名基督徒学生，但因他们分属不同的教派，难以委派牧师。目前辅大拥有文学、理工、外语、法学、管理、神学及艺术等7个学院及20个研究所，设立近40个系、166个学科，拥有约2,000名教授，是台湾最知名的综合性高等院校。

作为教会大学，该校设有神学院，现由伦理学教授詹德隆神父任神学院的院长，并聘请台湾各个教区或修会的神职人员前往担任教授。辅大神学院号称“小梵蒂冈”。最初名“徐汇神学院”，1929年由“中华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创办。第二年获得罗马教廷的承认，得授神学学士及硕士学位。1952年迁往菲律宾的碧瑶，直到1967年才由菲律宾迁到台湾，并设在辅大之下，可以容纳各教区的修生、各修会的会士及教徒。但这所神学院的学生还不满百人，分神学系及教义学系，招生的条件也较为严格；学制三年，课程有新旧约导论、信理神学、教会法、初期教会史、以及文学总论、西洋哲学总论、西洋近代哲学史、大公主义、比较宗教史——天主教与佛教及道教、教会管理学、传播媒体理论及牧灵应用、拉丁文、圣经希腊文、圣经希伯来文等等。目前，台湾“教育部”还没有承认该神学院的学位，但罗马教廷承认其学历，从该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到世界135所神学院入学。1992年该大学又设立了宗教研究所，获得台湾“教育部”的批准，于1992年7月决定设立台湾大学中第一个宗教系科，培养宗教方面的研究人才。该宗教学系教学内容不仅限于天主教，除基督教课程外，还有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及原住民宗教等，从内容上将涵盖宗教学术理论、中华人文思想、西洋人文思想、宗教发展历史与现况等范围。另外，由耶稣会主办的一份双周刊《中国新闻分析》也迁到了台北，成为该校“社会及文化研究中心”的一部分，这份刊物原是在已故耶稣会士劳达一主持下

的反华杂志，但现在的编辑南耀宁已表示要尝试以“更学术的方法”处理题材。此中心主要研究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社会发展，探讨这四个地方经济、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台湾天主教会极力向学生及教职员传教，以在学校中扩大教会的影响。据说，最近台湾“教育部”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宗教课程问题，委员会中有三名成员是辅仁大学的神父。现任辅大宗教辅导中心的主任是耶稣会士康思高(F. Conn)。

6. 天主教之声传播协会

1986年，一位名李富雄的天主教徒自己买了一个广播电台的时段，播放李哲修神父的宣道录音带，不久，在教会内部产生一个“天主教之声后援会”，其会员很快遍布台湾各个教区，并在全台七家电台上利用宗教节目进行传教，1989年底开始利用电视传教，每周六在“中视”播放电视节目“一家之主”，到1994年初已播放了200多集。“后援会”于1993年经台湾“中国主教团”的批准成为“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大众传播委员会”的成员，并更名为“天主教之声传播协会”。到1994年初，该会成员已达7,000多人，“天主教之声”播出的电台有中广第三广播网、台北民本电台、台中中声电台、台中正声电台、台林虎尾正声二台、基隆天主教益世台。所播的节目有：闽南语天主教之声、国语天上人间、“中国电视台”的“一家之主”等节目。

该组织在台湾各个教区设有分会，如1992年5月31日“天主教之声高雄分会”宣布正式成立；1993年12月12日该会的台北总教区分会也宣告成立。

7. 闻道出版社

台南教区闻道出版社于1967年8月由现任辅仁大学校长李震（又名李振英）创立，发行人是当时台南教区的成世光主教。到该社成立25周年时已出版了400多种图书。1970年李震离开台南教

区后改由李蔚育神父负责，直到现在。最初数年，该社坚持每月出版 2 本小册子，后改为每月一书，但销路并不多，订户从未超过 600 户，书库里也堆满了未发行出去的书籍。近年来，该出版社利用机会向各文化中心及学校赠送大批图书，作传教的“抛砖行动”。

8. 圣母军：台湾分团及高雄督察区团

“圣母军”是天主教会的善会组织，即平信徒的组织，于 1912 年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产生，组成一个以军人方式的教徒组织，奉圣母为主保，并在教会圣统制的领导下，以“光荣天主，孝爱圣母”“传扬福音、圣化人灵”为宗旨，自愿协助教会，做传教工作，最初称为“仁慈圣母会”，又称“圣母军”。这种善会形式后来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在教会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得到了罗马教廷的大力推崇。1933 年 9 月 16 日，首先得到教皇庇护十一世颁赐的祝福状，1953 年 7 月 22 日再得到教皇庇护十二世颁赐的宗座祝福，1960 年 3 月 19 日又得到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宗座祝福，1965 年 1 月 6 日教皇保罗六世肯定圣母军“显示天主教会的真正面目”，并赐福于全球的圣母军团员。到 1990 年全世界共有 11,000 多个支团，其团员的身分分布于社会的各阶层。

台湾的圣母军是在 1950 年由菲律宾首先传到台北的，并在台北的教会中很快成立台北圣母军区团，首任神师莫克信、区团长孙健（女）。目前，圣母军台湾分团的团长是张旭兴、副团长为周传光（女）。

1952 年在高雄教区也成立了圣母军的第一个支团组织。高雄的圣母军是由当时玫瑰圣母堂主任戴刚德创立的，首批团员为 35 名女性教徒，1952 年 4 月 24 日正式成立，命名为“玫瑰经之后”，由戴刚德神父任指导神师、钟素月为首任团长。同年 11 月 6 日成立男子成人支团，取名为“上天之门支团”。不久，圣母军在高雄教区成立了多个支团，还发展到屏东、万金、潮州，其团员参与教区内的

各项辅助工作，如传教、堂区服务、查经等教务，还进行慈善服务等。到1963年高雄的圣母军发展到最高峰，全教区共有29个支团，工作团员有430人。但到70年代以后，因教会发展停滞、堂区的人事变动及新兴善会的不断涌现，致使有的圣母军支团纷纷解体。至1992年高雄教区圣母军成立40周年时，直属高雄督察区团的支团共计17个，直属屏东区团的有4个支团，共计21个支团，工作团员有230人。

9. “中华民国护士协会”

这是台湾天主教徒护理系统的一个组织，成立于1972年10月15日。该机构强调“信仰与工作合一”，并“藉着圣神的推动号召教徒中的护理人员归队”。目前，“护士协会”的会员约200人。新任理事长是辅仁大学护理系的主任崔如铄，她曾任美国纽约市 *St. Cabrini Hospital* 的院长十余年，1989年回到台湾，开创了辅大护理系。在她出任“护士协会”的理事长后，积极筹组人事、财务、文书等，并聘请了台湾护理界的知名人士担任顾问，举办了一系列的北中南区天主教护士及护生的学术活动。

10. 碧岳神学院

这是一所直接培养神父的神学院，位于台南市。该神学院创立于1962年，那时罗光刚被任命为台南教区的第一任主教，便开始筹划建一所神学院，以培养成年的神职人员，同年9月正式开学。不久，台南神学院建成，任命杨成斌神父为院长。当时的修士多是解甲还乡的壮年修士，而今修士的年龄多为18、19岁，30岁已算高龄。入学的资格为必须是天主教男性教徒，并且愿意独身，高中毕业后经本堂神父推荐方可，不须考试。1971年4月20日，该院的学制由7年制改为5年，前两年读哲学，后三年学神学。1973年11月24日该院以“碧岳神学院”的名称在台“内政部”登记。1990年时，神学院有47名修士，1/4是原住民，其中有15人在服兵役。教

授除本院的几位神父外，还要请学有专长的神父到院授课。现任院长是孙静修神父，他是位法学博士。毕业生经过祝圣，即成为神父。

11. 天主教北区联合备修院

1991年底台湾“中国主教团”决定将台北教区的台北小修院及新竹教区的四维备修院联合成立一个“天主教北区联合备修院”，院址设在新竹教区的四维备修院内，1992年8月正式成立。

台北小修院早在1951年台北教区还是监牧区时就已建立，名为“主心修院”，地址设在剑潭天主堂，1958年迁到新庄，改名为“若瑟修院”。1967年修院除本院教区修生外，还有主徒会及新竹教区的修生，但近年来却生源短缺，1993年时只有5名修生。新竹四维备修院成立于1961年3月21日，此后的20年间修生们先后在台北及台中小修院就读，直到1978年才正式在新竹教区设立修院，并将院址暂时设在桃园市振声中学，1984年迁到新竹磐石中学旁的现址，即位于新竹市西大路681巷1号，命名为“四维备修院”，以后又不断修缮，成为一现代化的修院，1991年有10位备修生，到1993年时仍只有5名修生。

成立联合小修院后，要求入院的学生必须是男性、13岁以上的青少年教徒，并征得家长及本堂神父的同意。备修院的工作人员均为天主教徒，院长为李克勉神父。

12. 台湾修会会长联合会

这是台湾天主教会各个男女修会会长参加的组织，以协调各个男女修会的工作。实际上分为两个组织，一是天主教男修会会长联合会，一是天主教女修会会长联合会，因两个组织成立年代相近，又多次同时召开年会，每年还共同举行两次执委会，并经常开展合作，所以也常把它们看作一个组织。

男修会会长联合会成立于1964年，当时受梵二大公会议的影响

响，在台湾成立一个修会的联合组织，以加强彼此的联系，第一届主席是林德明神父，每两年选举一次。1963年由圣心会院长康恩德姆姆及其他几位修女发起，于1964年5月15日正式成立女修会会长联合会，当时有28个修会的代表参加，圣母圣心会的祁志英为第一任主席。自成立以后，两组织与其他天主教机构密切配合，如与台湾“中国主教团”、各教区的修女联谊会等合作，共同举办活动。

1994年4月11—14日在花莲保禄牧灵中心举行男女修会会长联合会庆祝成立30周年年会，选举新执委，并要求台湾“主教”从台籍神职人员中选出继任已故嘉义教区的林天助主教的人选。林天助是首位台籍主教，他于1994年3月4日因脑出血去世。虽然在台湾大部分人口是台湾本地人或台湾出生的大陆人的后代，台湾天主教会中还没有第二位台籍主教。联会的此次会议还要求通过让已婚男教友任执事职，并为堂区服务的修女争取合理的薪酬。大会选出联合会的新主席为方济各会会士黄敏正神父，39岁，他表示，联合会将协助教会于1994年10月23—25日举行国际家庭年庆祝活动，并将支援联会的“正义和平小组”，以加强天主教会在对信仰与公义、基督精神、环境、劳工等方面的社会影响力。该组织在台湾天主教会中有一定的势力，近年来更是关注台湾的社会政治活动，如1992年年初与台湾“中国主教团”的社会发展委员会提出五点联合声明，支持天主教徒当选台湾“国大代表”等，发挥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力。如今，“台湾修会会长联合会”共有57个成员，包括16位神父。

13. 天主教基督服务团

这是一个天主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已有30多年的历史，创始人是郑爵铭，1964年去世。在纪念其创始人逝世30周年时，召开了“关心教育研讨会”，主题是“从师资培育法看天主教教育事业”。

注重台湾的社会教育。该组织现任团长是李文瑞。

14. “中华福音工作团”

简称“中福团”，成立于1988年12月30日。当时，台湾“中国主教团”的“关怀大陆教会委员会”在台北的圣若瑟灵修中心举行为期两天的研习会，筹组“中华福音工作团”，成员均是平信徒；“凡是赞同该团组织的就可算作其成员”。该组织主张“立足台湾，推行门徒训练；胸怀大陆，多元联系访问；放眼世界，服务华人教会”。组织培训“基信团”，大力传教，并采用基督教浸信会的“门徒训练”教材，开设培训班，训练教会的领袖人才；另外，借外国教会组织的捐助，组织修女及神父们到大陆参观访问，以加强与大陆教会的联系。

15. 圣心修院

1968年由嘉义教区首任主教牛会卿创立，当年他在斗六正心中学旁购地兴建一所小修院，奉耶稣圣心为主保，命名为“圣心修院”。从小修院成立到1980年接受该修院培训的计有百余人，其中有6位已登上祭台，并担任了教区内的重要职务。但因圣召培育的困难，修院于1980年6月经教区公署同意，改作它用，即做为教徒灵修活动中心，仍保留一部分作为“修士之家”和“圣召中心”，并将当时在该院的修生送往台南教区达义修院继续深造。到1986年，送往达义修院的修生共计35位，而到1992年时只剩下4位仍坚持在修院，可见，台湾圣召之困难。林天助主教接掌嘉义教区后，于1986年6月决定恢复该所修院，并招收了首批修生，到1992年共招收了38位修生，最后有2位进大修院念哲学，在院的修生有11位。

16. 台湾总修院

又称“联合总修院”。原来台湾有南北两大修院，后来台湾天主教“中国主教团”于1991年4月16日复活节后的常务委员会中

通过决议,将南(碧岳神学院)北(多玛斯神学院)两座大修院合并成“台湾总修院”,由刘献堂主教任总修院的院长。总修院分成两部:神修及哲学部设在台南,神学部设在台北。1992年4月23日在台南碧岳神学院召开的会议中,通过决议决定联合总修院设在台北。1994年4月4日至6日在主教团常年大会上宣布:南北修院于(1994年)9月合一,地点在圣多玛斯修院。

17. 基督活力运动

严格说这是在台湾天主教会内部推行的传教活动,并没有完整的组织系统。此运动最初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西班牙,以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如在中南美洲及菲律宾非常盛行。台湾的“基督活力运动”就是由菲律宾的一些菲籍及华人教徒传入的,在罗光等人的大力倡导下,于1968年2月25日在台北板桥光仁中学举办了第一届活力运动实习班。这种实习班,除祈祷训道外,还加入一些歌唱、合奏、慢舞等形式以激起“活力员”的传教热情及“对基督的爱”。许多台籍主教及神父们都曾参加了这一运动,如狄刚、郑再发等。目前,台湾各个堂区的“教友传教协进会”及各种善会多以活力员为骨干,大力推动台湾天主教的传教工作。近年来这一运动还在狄刚总主教的直接推动下传到了北美,并在洛杉矶等地举行了三届男女实习班,有100多人参加了培训,旨在推动北美华人的传教工作。

四、代表人物

田耕莘 生于1890年,字聘三,山东省阳穀县人。他于1901年受洗入教,1904—1910年进小修院学习,1910年—1916年在大修院学习神哲学。1918年6月9日晋铎。最初在山东的巨野、单县、诸城等地传教。1929年加入圣言会,受训二年,又在嘉祥和郛

城传教。1932年12月阳毅等六县改成监牧区，次年他任监牧。1939年7月被任命为阳毅的“宗座代表”，1939年11月29日被罗马教廷祝圣为主教。1942年任青岛主教，1945年12月24日被天主教罗马教廷任命为中国第一位枢机主教，这也是远东第一位红衣主教。1946年罗马教廷将中国的天主教会划为20个教省，他被任命为北平的总主教，主持全国的教务。大陆解放后，田经香港去美国，后到台湾。1959年12月被罗马教皇委为台北的总主教，同时还担任了台湾“辅仁大学”的董事长。他于1966年退休，1967年7月24日病逝于台湾。

郭若石 1906年2月11日生于河北省藁城县，1931年12月28日晋铎，1950年1月13日任台北监牧，1952年8月7日被选为台北教区的总主教，同年10月26日祝圣。1959年12月19日他曾转任萨拉弥纳的总主教，但第二年的3月就宣布退休，后定居在台北的阳明山。

于斌 生于1901年，字冠五、希岳，后改名野声、洗声，教名保禄，黑龙江兰西县人。他毕业于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海震旦大学。早在1914年就受洗入教，先后在吉林小修院及大修院肄业，并于1924年赴罗马传信大学研读哲学、神学，获得传信大学宗教学博士、罗马圣多玛斯学院哲学博士、意大利国立伯罗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晋铎，1929年在罗马传信大学任中国文学教授。1933年回国，曾历任“中国公教进行社”总监督兼罗马教廷驻华代表公署秘书、涿沽大学教授、中国公教学校视察主任、《益世报》发行人等职。1936年7月，他被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委为南京教区主教，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曾赴罗马与教廷接洽，回国后在重庆主持难民救济工作，并任国民政府一、二、三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东北救济会的主任委员等，1941年在重庆担任天主教文化协进会的理事长。1942年任东四省抗战协会的名誉理事，1946年

当选为国大代表，次年被委为南京教区的总主教。1949年9月赴美，1952年在纽约创办“中美联谊会”，任理事长，1954年创办“自由太平洋协会”，协助台湾当局开展外交活动。在美期间还创办了英文《中国日报》、《双圈周报》及双圈出版公司及亚东问题研究所等，同时致力于在台湾恢复辅仁大学，据称通晓英、法、德、意、西、葡等七国文字。1959年被罗马教廷任命为台湾辅仁大学第一任校长，次年回到台湾。1962年他出任拉丁美洲协会的理事长、“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1966年任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1967年任“中华学术院哲学协会”的首届会长、“全美中华文化会”的理事长。1969年3月他被教廷提升为枢机主教。1971年4月被选为台湾“中国主教团”的团长。1978年8月16日在赴罗马参加教皇保罗六世的葬礼时突发心脏病去世。

罗光 1910年生于湖南省衡阳，1931年去罗马学习神学，大学毕业后即在梵蒂冈供职，与教廷上层关系密切，1961年晋升为主教。他到台湾后从1966年至1978年期间，担任台北教区的总主教。1978年罗马教廷又任命他为台湾辅仁大学的校长，1983年台湾“中国主教团”改选时当选为主席。他还积极贯彻罗马教皇对“桥梁教会”的指示，带领传教人员前往美国等地争取海外华人教徒的支持，并著文讨论台湾“桥梁教会”的作用。1992年2月2日正式宣布离休，任辅仁大学的名誉校长。他平时对中国哲学史及中国教会史颇有研究，并有数十种著作出版，如《中国哲学大辞典》、《七十年自述》等，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台湾天主教会中较有影响的人物。

狄刚 现任台北教区的总主教。1928年5月7日生于河南修武县，1953年12月20日在罗马被圣为神父，1975年6月21日当选为台湾嘉义教区的主教，同年7月22日在台北祝圣，1985年5月3日开始担任台北总教区的助理总主教，到1989年2月11日经罗

马教廷提议继任台北总教区总主教，其前任贾彦文总主教因健康原因退休。他还兼任辅仁大学的总监督。

贾彦文 1925年1月17日生于河北省元氏县，早年曾在罗马传信大学读书，并加入耶稣会，1951年7月在罗马被祝圣为神父。不久，到比利时鲁汶大学学习，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1961年出任台南副教区主教，1970年被任命为嘉义教区主教，1975年转任花莲教区主教。1978年11月又被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委任为台北教区总主教，接替罗光。1989年2月11日宣布退休。

杜宝晋 1911年生于河北的赵县，曾在北平石门大修院读完一年哲学后入罗马传信部大学学习，1937年晋铎，次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及教会法、罗马法的硕士学位。1939年在教廷传信大学秘书处任职，1942年任该校的秘书长，1961年5月21日被教皇圣为台湾新竹教区的主教，同年8月回台湾就职。

单国玺 1923年12月2日生于河北省的濮阳县，1955年3月18日在菲律宾碧瑶晋铎，1979年11月15日当选为台湾花莲教区的主教，1980年2月14日在花莲举行祝圣礼并就职。1987年台湾“中国主教团”改选时当选为主席。1990年4月20日被罗马教廷任命为高雄教区主教。1991年“主教团”改选时，再次当选为主席。

蔡文兴于1909年1月28日生在美国的纽约，1933年6月11日在纽约的玛利诺被祝圣为神父，1951年1月26日被罗马教廷任命为台中的宗座监牧，1962年被委任为台中教区的主教，一直到1986年9月6日宣布退休。

方豪 台湾天主教会的著名学者。生于1910年，杭州人，字杰人。他出身于基督教圣公会家庭，11岁时在杭州天主堂受洗，取教名“茂禄”。次年他即入小修院，在19岁时又入大修院，该修院是遣使会开办的，管理甚为严格。26岁时被圣为神父，第二年就发表了第一篇专著“我国圣教二十二种名称之考释”。抗日战争爆发后不

久他到浙江各地传教,1938年10月到云南,在昆明协助于斌复刊《益世报》,后又一起转往重庆。1941年8月应国立浙江大学之聘到贵州遵义担任史地系的教授,两年后又担任在重庆复课的复旦大学的教授,还组织天主教同学会,任辅导司铎。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继续任教,此外,他还担任了南京《中央日报》的主笔。1946年应田耕莘(北平总主教)的邀请出任上智编译馆的馆长。1948年出版《方豪文录》,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并组织“师生教友联谊会”,后改名为“台大天主教同学会”。从1953年起他开始担任台北各大专院校的天主教同学会的指导,1954年成立了“台北教区天主教大专同学会”,他任总辅导,直到1961年。1966年担任“中国历史学会”的第三届理事长,并连任三届。1969年出版250万字的《方豪六十自定稿》,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次年还获得罗马教廷颁赐的蒙席衔。1979年退休,1980年12月20日去世。方豪在台湾史学研究上享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中西交通史、天主教史等方面,成绩卓著。

郑再发 台南教区第三任主教。生于1932年7月4日,福建省厦门人。1945年进入厦门教区圣多玛斯小修院,1950年到香港华南总修院攻读哲学,1951年入罗马传信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于1954年获得哲学硕士学位,1957年12月21日晋铎,1958年6月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同年10月到比利时鲁汶大学读教育系,于1962年6月获教育硕士学位。1963年春到台南教区大湾堂区任本堂神父,并曾在台南县永康乡大湾村等地传教。1965年春出任台南教区达义修院院长兼碧岳神哲学院的副院长,曾任教于成功大学及文藻女子外语专校,1972年担任德光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1990年12月22日,他被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任命为台南教区的主教,次年2月2日在台南市德光女中祝圣就职。

钱志纯 台湾花莲教区的主教。1926年生于浙江省玉环县坎

门镇,教名安德肋。1939年秋进宁波市类思备修院,1941年升入宁波市增爵小修院,1947年入嘉兴市浙赣文生总修院攻读哲学及神学。1949年到意大利热那亚市布理学院攻读哲学及神学。1953年6月29日晋铎。同年入米兰市圣心大学攻读哲学,196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到台湾,先后任新北投堂助理司铎、基隆西定路堂助理司铎、台北总主教座堂助理司铎、代理主任司铎、三重市圣母圣心堂主任司铎,还兼任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的教授及所长、文学院教务主任、总务主任等。1980年11月29日兼任新庄市圣保禄堂主任司铎,1984年出任辅大艺术学院首任院长,1992年2月22日被教廷任命为花莲教区的主教,4月11日行祝圣礼。

李震 又名李振英,台湾辅仁大学的现任校长。辅大的校长历来由主教担任,1992年1月,罗马教廷却首次任命了身为台湾的国籍神父的李震接替已81岁的罗光总主教,为辅大的校长。他生于1929年10月14日的天津一个天主教家庭,10岁时就入小修院,高中时由修院保送到教会办的“法汉中学”读书。大陆解放后他作为罗马教廷最后一批在大陆招募的6名赴意大利修士中的一位,在罗马宗座传信大学攻读,并获得神学及哲学两个硕士学位,1955年12月21日晋铎,1961年又在意大利的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罗光是他在传信大学时的老师,当罗光任台南教区的主教时,便招他到台湾教会中服务,曾先后担任过台南教区的秘书长、德光女中校长、“中国主教团”的秘书长、“桥梁教会小组”的成员之一,等等。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他还多次回内地探亲、参观访问,并考察宗教问题,在了解到大陆的多所大学已设立了宗教学科后,便多次向台湾当局争取在辅大也设立一宗教系;同时,他还与大陆多所大学保持关系,并应邀在南开大学作哲学演讲。1994年6月还应邀到北京参加哲学讨论会。在被任命为辅大校长后,他非常重视学生世界观的教育,认为在当代世风日下的台湾社会,唯有宗教

才可以拯救。同时他还在东吴大学、政治大学、文化大学、静宜等校教授哲学，注重学校的行政管理。因他对台湾天主教会的贡献，而获得罗马教廷颁赐的“蒙席”衔位。另外，他连续发表文章，论述有关“桥梁教会”及两岸文化交流等问题，力主台湾的天主教会要充当大陆教会与普世教会的桥梁。因对中外哲学颇有研究，已出版了 20 多本哲学著作，1986 年—1990 年还出版了《人与上帝——中西无神主义探讨》（三卷本），这是一部百万字的讨论中外无神论哲学的巨著，在台湾学术界占有—定地位。

刘献堂 新竹教区的主教。1928 年 12 月 21 日生于河北省献县，1956 年 11 月 30 日被圣为神父，1980 年 10 月 24 日当选为新竹教区的助理主教，次年 1 月 1 日祝圣。1983 年 6 月 29 日被任命为新竹教区的主教。现任台湾天主教会总修院的院长，也是台湾“中国主教团”圣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王愈荣 台中教区的主教。1931 年 4 月 27 日生于上海，1955 年 12 月 24 日在西班牙马德里晋铎。1975 年 7 月 1 日在台北被任命为辅理主教，同年 7 月 22 日祝圣为主教。1986 年 9 月 3 日当选为台中教区的主教，并于 11 月 12 日就职。

林天助 前嘉义教区的主教。1935 年 1 月 7 日出生于台湾省云林县的埔羌仑村，是天主教世家。幼年曾入高雄圣若瑟小修院，毕业后于 1955 年到香港华南总修院（圣神修院的前身）攻读神哲学，1958 年赴罗马传信大学学习，1961 年 12 月 21 日在罗马被圣为神父。1966 年获传信大学伦理神学博士学位，随后回到台湾。曾先后任教区主教公署秘书、圣若瑟修院院长兼救世主堂主任，其间还曾在台南碧岳神哲学院教授信理神学。1976 年奉调玫瑰圣母主教座堂任主任司铎，直到 1985 年 12 月 14 日被提升为主教。1977 年时他曾任高雄主教座堂主任司铎、教区总铎、司铎谘议会议员、教区参议会议员、教区经济委员、圣召推行委员会委员及圣母军高雄督察

团的辅导司铎等。1985年12月11日当选为嘉义教区的主教，次年1月12日在嘉义辅仁中学大礼堂祝圣就职，成为台湾省第一位本地主教，也是高雄教区神父中第一位晋升为主教的人，同时也是台湾最年轻的主教。1994年2月27日因突发脑溢血去世。

成世光 台南教区的主教。1915年9月15日生于山西省的孝义县。1943年6月29日被圣为神父，1960年5月28日当选为台北辅理教区的主教，1966年6月28日当选为台南教区第二任主教，同年7月24日祝圣就职。1990年12月22日正式退休。

郑天祥 高雄教区的主教。1922年6月28日生于福建省的福州，16岁即入修道院，学习拉丁文及哲学，后成为道明会会士。1952年8月28日被圣为神父。1955年到台湾任教会中学“道明中学”的校长。1961年3月21日出任高雄教区的第一任主教，同年5月21日在罗马祝圣，受教皇接见，并被赐予金质十字奖章一枚。1979年12月10日被升为总主教职。1990年8月19日去世。

甘霖 法国人前台湾澎湖宗座署理、主教。1905年生于法国，1923年9月加入方济各会，1930年在法国被圣为神父。1935年到中国大陆传教，1950年1月在上海被委为威海卫监牧主教，1951年曾被我公安机关监禁，直到1954年被驱逐出中国大陆，返回法国。1959年他到台湾杨梅一带传教。1970年2月24日升任为澎湖宗座署理。1976年4月13日辞职后一直在杨梅静养。1994年5月20日去世。

张春申 现任耶稣会“中华省”的省会长，同时任台湾辅仁大学神学院信理神学的教授。1986—1989年间曾连任了两届台湾“男修会会长联合会”的主席，他积极响应罗马教皇有关“桥梁教会”的指示，提出作为“桥梁教会”的行动准则，并负责在中国大陆的耶稣会的工作。他本人与罗马教廷的关系较为密切。

白正龙 1939年9月7日生于台湾省的高雄市，1969年5月

4 日被圣为神父。1976年 9 月 20 日被提升为澎湖宗座署理主教。1991年 2 月 26 日由于澎湖宗座署理区并入台南教区，他便辞去宗座署理主教的职务，转入新竹教区，现负责辅仁大学宗教辅导职。

林吉男 台湾天主教的辅理主教。生于 1943年 5 月14日，台湾屏东万峦人，教名鲍思高，现任高雄教区的副主教，他的两位弟弟也是高雄教区的神父。他于1959年 9 月入高雄圣若瑟修院，并就读道明中学的高中部，中学毕业后在修院专修拉丁文，并选修辅仁大学哲学系一年。从1964年 6 月服兵役两年，之后到罗马传信大学深造。1973年 1 月 6 日在罗马晋铎，他还在慈幼大学研究教育心理学。1974年10月回到台湾，先担任高雄主教座堂副主任，后代理主任。1977年 7 月任“中国主教团”的副秘书长，1981年 2 月任高雄教区主教公署秘书长兼教友传教协进会的辅导，1985年 2 月始任“天主教中心及牧灵中心”主任，同年底任圣母军督察团的神师。1988年 5 月任圣若瑟修院院长兼救世主堂主任，同年 10 月被任命为教区副主教，1990年 8 月还曾被选为辅理主教，1991年单国玺任高雄教区主教时再被任命为副主教，1992年10月 8 日被罗马教廷任命为高雄教区辅理主教，1993年 1 月 2 日祝圣就职。

刘振忠 嘉义教区新任主教，现年42岁，是日前台湾最年轻的主教，第三位台湾本省籍的主教。以往，台湾的主教人选年龄偏大，而对刘振忠的任命出乎许多人的意外，他因而被称为“年轻有为的黑马”。他是嘉义大林人，先后毕业于台卫道中学及台南碧岳大修院，1970年被圣为神父，曾于1985年赴梵蒂冈深造，攻读教会法，获得罗马传信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1987年返台。在嘉义教区，他担任斗六圣心小修院的院长及斗六正心中学总务主任。1994年 7 月 16 日，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任命为嘉义教区的新主教，以填补前任林天助主教去世后的空缺。

尤雅士 (Mgr. Juliusz Janusz) 梵蒂冈罗马教廷派驻台湾的

代办。波兰人,1944年3月17日生于波兰的里克沙纳。1961年入克拉科夫的宗座神学院攻读哲学与神学,1967年3月19日在当地晋铎。以后就在堂区服务,直到1969年赴罗马深造,在拉特朗大学专攻教会法与国际法,1973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派往泰国。到1977年又改派驻北欧国家的教廷大使馆服务。后又到德国、巴西、荷兰、匈牙利。1992年8月25日被教皇任命为驻台湾代办。

赵一舟 台湾新竹教区的神父、天主教神学及礼仪学专家。他原属河北献县教区,在天津津沽大学附属高中毕业后入读北平的辅仁大学。1950年转入菲律宾“中国若石大学”攻读哲学与神学,1955年晋铎后赴法国公教大学深造,以后开始转入有关天主教礼仪的研究,毕业后又回到菲律宾,执教于“远东牧灵学院”,后应当时任台湾“中国主教团”团长的郭若石之邀到台湾,为“中国主教团”礼仪委员会服务,被任命为执行秘书。他曾先后参与修订台湾教会所用的礼仪、经书,如台湾及香港教区所用的《感恩祭典》即是由他编辑的,还曾出版《家庭礼仪》、《大众神学》等多种著作。1994年,获得罗马教廷颁赐的“蒙席”衔位,以表彰他在天主教礼仪方面的贡献。

五、发 展 趋 势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知,台湾天主教会近年来的发展虽然处于停顿状态,但毕竟在台湾社会中因它庞大的教会财产、众多的慈善事业、自成体系的教会教育、医疗卫生系统等,仍有强大的影响力;同时,教会与西方国家长期保持的密切关系,也在政治上以“民间外交”的形式使台湾当局认为有很大的利用价值,所以,天主教会在今台湾的社会生活中仍有相当大的实力。

但是,天主教会正在呈下降趋势发展,尽管从80年代以来教会

采取了各种传教措施，并大力号召教徒响应圣召，然而收效甚微。据台湾《善导周刊》1992年10月25日报导，经1991年统计，台湾共有天主教徒295,686人，主教12位，神父有740人，攻读神哲学的大修士及会士约有110余人。显然，教徒的总数远不如60、70年代，并没有随着台湾总人口的增长而增长，仅占总人数的1.35%。另外，教会的神职人员正面临老化与青黄不接的状态。在现有的740位神父中有200多位是在大陆传过教的外籍会士，目前大多已七、八十高龄；在大陆解放后来台的神父中有百人在70岁以上，60岁以上的有200多位，而60岁以下的神父还不到200人。虽然这几年各个教区竭力号召教徒响应圣召，但总共只有百余名大修士，离实际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台湾“中国主教团”正计划谋得海外华人及世界各国教会的广泛支持，建立一所“救世之母大修院”，以培养神职人员，但目前这一计划还未付诸实施。另一方面因为神职人员的缺乏，也使得台湾教会更无能力出外传教。据《一九九二年台湾天主教手册》刊载，台湾教会有440位华人神父及300位外籍神父，有830位华人修女及290位外籍修女。因人才缺乏，教会还没有能力向外发展自己的势力。不过，司铎荒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台湾教会的这一难题恐怕在短期内不会解决。第三，实现天主教会的本地化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期，尽管教会早已意识到培养台湾本地教会人才的重要性，但收效甚微。在台湾7个教区12位华籍主教中，其中4位已退休，他们当中的11位是在1949年大陆解放后陆续来到台湾的，而目前台湾2,000多万人口中，72%是台湾人、14%是客家人、12%是在大陆出生的中国人，另有1.7%是部族人。不过，自梵二大公会议以后，“教会本土化”（也有称“本位化”）就已成为台湾天主教发展的一个趋势，无论在礼仪、神学、修行及教会领导阶层等方面都开始本土化，寻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并在仪式上寻求“中国式的包装”。例如：祖先的牌位不仅可移入教堂内

供奉，而且前枢机主教于斌还提倡祭天敬祖；教堂的建筑采用了中国式的飞檐、牌坊等，教堂内还有对联，山水画及盆景等，出现了一些外观似中国庙宇的教堂。但毕竟这是一种“外包装”上的中国化，天主教的伦理及教义如何迎合中国人的内心需要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注释：

1. 参见蔡相辉《复兴基地台湾之宗教信仰》，台湾正中书局出版，1989年，第98页。
2. 同注1，第100页。
3. 参见《台湾的祠祀与宗教》，第227页。
4. 参考黄陵渝：“台湾天主教”一文，《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3期。
5. 《宗教工作基础知识》，中国旅游出版社，1991年，第557页。
6. 台湾《教友生活周刊》，1992年8月20日。
7. 参见台湾《善导周刊》，1991年12月8日。
8. 同上，1991年2月10日。

第四章

基督教新教各派

一、历史与现状

基督教是17世纪中叶随着荷兰的占领而传入台湾的。台湾基督教的发展历史可划分为以下四大阶段：

（一）荷兰占领时期的台湾基督教

16世纪后欧洲各国纷纷向海外扩张，在以武力征服殖民地的同时，全力推行以基督教的教义来柔化被占领民族的反抗力量。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军队占据台湾南部外海的沙丘（今台南市的安平区），于附近建筑城堡。但遇到早就定居在这里的汉人及土著人的反抗，荷兰人遂于次年以布15匹换得新港溪沿岸的土地，构筑房屋与仓库，定居下来。天启七年（1627年），设在荷兰巴达维亚的宗教会议派传教士甘迪究士（G. Cardidius）来台湾传教，先在新港学习当地的语言。1629年巴达维亚宗教会议又派传教士尤纽士（Robertus Junius）前来帮助，次年传教工作获得很大成功，使新港的全部人口1,047人都施了洗，并于崇祯四年（1631年）在新港

建立了台湾第一座新教教堂。这是基督教新教传入台湾的肇始。最初,传教进行得很顺利,在萧垵、麻豆、大目降、目加溜湾等社也有数百人受洗。但因尤纽士迫使新港社人放弃传统的祭祀,而引起这些新教徒的反抗,传教受到阻遏。不过,荷兰殖民者很快用武力讨平了各社,土著们被迫改宗。荷兰驻台湾督办也积极协助安置传教专职人员。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台湾信教人数计有1700多人,其中新港社1,047人,大目降社209人,目加溜湾社261人,萧垵社282人,麻豆社215人,信徒人数占五社总人口的20%;同时还办有主日学,就读的学童共有440人¹。

后来,荷兰殖民者为了攫取更大的商业利益,用武力赶走了在台湾北部及西部的西班牙人,使得台湾几乎全部落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为了使台湾居民归顺,就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可见,台湾早期的基督教带有显著的殖民地色彩。传教士在台湾传教14年,以罗马字音拼写成新港的上语,并用新港语编写了祈祷词选集,还办主日学,教化土著青年,并培养土著做传道人。至永历五年(1651年),传教士的足迹遍布台窝湾(今台南市安平区)、麻豆(台南县麻豆镇)、华武垵(台南县境内)、淡水(台北显淡水镇)、基隆、诸罗山(嘉义市)等地。永历十二年(1658年),台湾荷兰督办颁布“鞭打逐出偶像者令”,加强排斥异教,放逐女巫,以武力传教,大失人心。又由于传教士与荷兰督办等矛盾重重,传教亦大受影响。到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打败荷兰人,收复台湾,传教士也纷纷撤离。此后,基督教在台湾的发展中断。

(二)清末的台湾基督教

19世纪中期,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与西方列强签定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西方传教士得以大批来台传教。

清末传入台湾的基督教主要以长老教会为主,从地理上以合

中大甲溪为界，分为南北两大派，南部属苏格兰长老教会，北部属加拿大长老教会。最先到达台湾的是英国长老会的传教士马雅各 (James L. Maxwell)，他于1865年来台，借行医来传教，在台南市西门外租一幢民宅，前部为布道所，后面作诊所。但由于当地人反对洋教，他不得不迁到高雄。1867年李麻 (Hugh Ritchie) 牧师来台一同传教，马雅各将高雄旗后堂交给他，再赴台南传教并建立新楼医院，这是西方传教士在台湾建立的第一间医院。到同治八年 (1869年)，教徒有50多人，传教范围扩展到东港、琉球、竹子脚、里港、高雄、坤头等地。同治十年 (1871年) 甘为霖 (Rev. W. M. Campbell) 与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马偕 (G. L. Mackay) 来台传教。甘为霖与马雅各在台南及高雄一带活动，马偕与李麻到淡水，并以此为开始传教。自此，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便分成南北两大系统。以后来台的传教士不断，相继在台湾各地建立教堂。这些传教士的传教手法不再像早年荷兰传教士那样以高压手段强迫人们入教，而代之以医疗、教育或办其他社会福利机构来吸引人们入教。例如，甘为霖除创办嘉义教会外，他还创建盲人教育，并发明点字印字机，编印点字圣经与相关的教材，创办盲人学校；长老会另一传教士巴克礼 (Rev. Thomas Barclay D. D.) 于1875年到台湾，次年创立了神学学校，共培育了240多名传教士及牧师，并于1885年创刊《教会公报》。到1905年，台湾南部的受洗人数达到2,211名，教堂50多间。在台湾北部，马偕于1873年建立淡水教堂，并将罗马字的《新约圣经》翻译成闽南话。马偕本人还娶当地人为妻，夫妇两人一起传教，1880年又在淡水创立了马偕医院；1882年建立理学堂大书院 (Oxford College，今淡水工商管理专科学校的前身)，以培养传教士；1884年又创立女子学院 (今私立淡江中学)。到光绪三十一年 (1905)，台湾全岛长老会的教堂共有92间，传教士113人，信徒约15,000多人。

(三)日治时期的台湾基督教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之后的50年间,台湾的基督教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进一步发展。就在日本人占领台湾的第二年5月,日本河合龟辅牧师到台湾北部长老会艋舺教堂聚会,这是日本基督教在台传教的开端。1903年,日本圣公会入台传教,1912年日本组合基督教会传入台湾。但因日本的基督教会多在日人中间传教,与台湾传统宗教及西方传教士并无关系,所以,日本系统的基督教并不像佛教那样迅速在台湾扩充势力,而仅限于为日本裔人士服务。虽然,日本统治者对基督教也采取了压制政策,但并不像对待中国传统宗教信仰那样绝对禁止,所以,台湾的基督教各派在日治时期仍有较大的发展。

由于台湾基督教会与西方各国教会关系密切,世界基督教主流教会的发展与改革也不断地影响台湾教会的形势。在日本人占领台湾不久,南部的基督教会就开始了本土化。1896年,“南部中会”成立,18个教会的长老参与了该组织,并按立了6名台籍牧师,到1900年又新增了11间教堂。民国元年10月,由甘维霖等人发起筹建“台湾基督教南北联合总会”,并在彰化召开了第一届大会,甘维霖被选为首任议长。此时全台共有基督徒3万多人,北部教会有54所,南部有94所。1915年,随着大陆基督教会本色化及自治运动的影响,南部教会亦开始倡导“自立、自养、自传”,并以屏东教会的吴喜荣和廖德为代表。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许多传教士被召回国,经费紧张,教会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此时日本教会势力乘机而入,1921年后有拓植、植树、山室等日本传教士来台传教,1924年圣洁教会传入台湾。1926年1月,“台湾圣教会”在台北成立,该教会也属日本系统。两个月后,由中国本土人士创建的圣灵降临节运动的产物“真耶稣教会”开始在台湾活动。1927年,

长老会南部中会召开第 58 届大会，决定将南部教会分为高雄、台南、嘉义、台中四个区议会，并各设教务局，分为传道、教育、事务、编辑、财务等 5 个部门。至 1930 年，南部中会进一步改组成四个中会，教会势力不断扩展。据当时统计，南部教会共有教堂 107 所，台籍牧师有 30 名，传教士 56 名，参加主日学的学生达 9,142 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实施加速同化台湾人的政策，极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外籍传教士受到排挤，各级学校的校长也要由日本人担任，基督教所办的学校也不例外。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传教士撤离，教会逐渐落入日本人的手中；1938 年后，全台的教会开始受到迫害，如在聚会及礼拜式前，要举行“国民仪礼”，包括向皇宫（日本）遥拜等礼。1940 年日本人更决定将所有外国传教士遣回原地，同年“台湾基督教长老会”被“日本基督教联盟”合并。此前，在日本人的授意之下，台湾的基督教还曾组织了一个传道团，后改名为“东亚传道会”，由日本人日匹信少将任会长。1941 年“真耶稣教会”被改组为日本真耶稣教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台传教士被迫参加“练成会”，接受洗脑，并参拜台湾神社，在各教会中还强迫使用日语。到 1943 年 4 月，由日本人决定将台湾南、北基督教会合并，成立“台湾基督教团”，之下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东部五个区。同年 4 月 29 日，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被迫与日本的美以美教会、组合教会、救世军及圣公会联合组成“日本基督教台湾教团”，由日本人上与二郎任团长，传教士被迫成为日本侵略的工具，不从者受到监视，教堂被日本军占据，至此，台湾基督教完全沦入日人手中，教会的发展呈倒退之势。直到台湾光复，日本教会势力撤离，“日本基督教台湾教团”也宣布解散，各教会财产纷纷退回，南北教会又各自独立，各教会恢复了与外国教会关系，西方传教士再度来台，台湾基督教慢慢恢复发展。据统计，到 1949 年台湾长老会的信徒人数（包括儿童）共 30,429 人。其他教派在日据时代也在缓慢

发展，如真耶稣教会于1945年公布受洗的信徒人数有5,050人，其中3/4为平原地带信徒，其余为山地教徒；台湾的圣洁教会公布1940年时该会领圣餐的人数为2,000人；救世军、日本人的圣教会及另外几个教会在1940年时信徒共有500名²。

(四)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基督教及其现状

这一时期台湾基督教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列表如下：

年 代	1949	1964	1979	1989
成年信徒	46,000	153,500	250,000	340,620
信徒总人数	70,000	278,700	360,000	448,220
教会数目	350	-1,796	2,303	2,666

从上述表格中可以发现，自1949年到1964年间台湾的基督教增长最快，年增长率平地教会是26%，山地教会更高达32%。因为这一时期各教会刚从日本的重压下解放出来，迅速恢复，外国传教士重又回到台湾，而国民党来台后，又有大批的教会组织迁来，许多外国的差会及传教士也从大陆转到台湾，使台湾的基督徒猛增。因台湾的基督教组织从1954年开始大力向社会传教，吸收信徒，也促使各教会的人数迅速增加。同时，圣经学院与神学院也相继成立，先后创办了10所。但从1965年起，这种增长的势头逐渐停顿下来，到1978年时，平地教会的年增长率只有3%，山区教会的增长更少，仅1%。增长缓慢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台湾社会此时正处于工业都市化时期，人们的价值体系已世俗化，家庭的影响日益减少，个人的选择度扩大，同时因为推行本地化，外籍传教士退休回国后，台湾本地教会的教士无论从素质上或是人数上都不能满足需要，以至于直接影响了教徒人数的增长。

1. 教派传入及教会迅速发展期

抗战胜利后，台湾的基督教开始全面恢复，同时随着大陆移民

的大量涌入,尤其是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以后,大陆的传教士及西方各教会纷纷转向台湾,这极大地刺激了台湾教会的发展,形成了台湾基督教史上的又一个高潮期。另一方面,台湾本土的教会要求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1951年3月,成立了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总会,选举黄武东(代表南区)和陈溪圳(代表北区)为正副会长,但南北教会仍貌合神离。在1957年2月召开的第四届总会上,进一步整合,将各自的业务移交给总会,总会之下设议长、副议长及书记各一人,还有六个处,十个委员会,五个董事会等机构。此时信徒有5万多,教堂及布道所178间,传教士225人。此外,1949年从大陆传到台湾的聚会所不断在难民中网罗信徒,很快发展为台湾第二大基督教组织。同时,山地教会也开展了大规模的传教运动,并通过集体改宗的方式发展教徒。长老会则从1954年开始推行长达十年的带有政治性的“教会信徒人数倍增运动”,至1964年时教堂及布道所增加到856个,传教士678人,信徒近8万。在教会增长的同时,新的教派也不断传入。除了在日据时由吴道源传入的真耶稣教会及由日本人传入的圣洁教会外,从1947至1949年间浸信会、神召会及福音会等相继传入。据统计,到1961年底,台湾的基督教派已达60多个,全台共有教堂1,054间,教徒约229,702人。

在50到60年代的20年间,基督教随着台湾经济的腾飞而不断发展壮大,新的教派不断传入或建立,并组成各种教会组织。如50年代由大陆传入的组织与教派有中华基督教信义会(1950年)、中国基督教信义会(1951年)、中华福音道路德会(1952年)、台湾信义会(1954年)、台湾圣公会(1953年)、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1953年)、中华循理会(1952年)、中华宣道会(1953年)、德国妇女祈祷会(1952年)、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1950年)、基督教内地会(1951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951年)、基督教闽南堂等等;另外从西方各国也传入一些教派及组织,如由美国传入的基督教信正长

老会(1950年)、基督教改革宗教会(1955年)、台湾浸信宣道会(1952年)、浸礼圣经会(1952年)、福音浸信会(1955年)、以马内利浸信会(1956年)、台湾贵格会(1952年)、福音贵格会(1955年)、远东宣教会、中华基督教行道会(1953年)、基督教拿撒人会(1956年)、基督教协同会(1951年)、中华基督教便以利会(1958年)、基督教圣经教会(1956年)、中华基督教复兴会(1953年)、五旬节会(1958年)、基督教环球布道团(1953年)、基督教通圣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1954年)、耶和华见证人会、中国海员布道会等;另外,还有中华福音信义会(由挪威传入)、基督教芬兰信义会、芬兰行道会及基督神召会(分别于1957、1953年由芬兰传入)、信义会丹麦差会(1954年由丹麦传入)、中华基督教圣洁会(1954年由瑞典传入)、基督教喜信会、台省宣道福音会、基督教中华圣召会(分别于1952年、1957年由加拿大传入)、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会(1970年)及大韩耶稣长老会台湾宣教会(均由韩国传入)、基督教中国布道会(1957年)、远东中华路得会及新约教会(均由香港传入)、亚洲基督教传教道会(由日本传入)等;同时,在台湾本地也建立了一些新的教派及组织,如中国平信徒传道会(创于1953年)、台湾宣道长老会(成立于1956年)、万国浸信会、基督教传道会(1955年)、基督教救恩会(1958年)、台省基督教道生会(1955年)、基督教新生教团(1960年)、基督教崇圣会(1968年)、中国学园传道会等等。

请参见表 1“战后传入台湾或在台创立的基督教各宗派”。

表 1:

宗 派	英 文 全 名	创立传入地 年代创立地	创 立 人
基督教信正 长老会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1950 美国	安笃思 牧师
台湾独立长 老教会	The Independen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Taiwan	1952 台湾	王守勇 牧师

宗 派	英 文 全 名	创立年代	传入地 创立地	创 立 人
中国基督教 长老会	China Presbyterian Church of Christ	1952	大陆	Dr. Aibert B. Dodd
基督教改革 教会	Taiwan Mission of the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1955	美国	白爱德
台湾宣道长 老会	Evangelical Presbyterian Church of Taiwan	1956	台湾	王彼得 牧师
中华基督教 信义会	China Lutheran Church	1950	大陆	聂和慈 牧师
中国基督教 信义会	Norwegian Lutheran Mission	1951	大陆	俞柳生 牧师
台湾信义会	Taiwan Lutheran Church	1954	大陆	金仲庵牧师
中华福音道 路得会	China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1952	大陆	艾碧莲 教士
中华福音信 义会	Norwegian Evangelical Lutheran Free Church		挪威	
基督教芬兰 信义会	Finnish Missionary Society	1957	芬兰	王为义牧师 白光明牧师
信义会丹麦 差会	Danish Lutheran Mission	1954	丹麦	尤汉森 牧师
挪威协力公 会	Norwegian Alliance Mission	1952	挪威	富绝兰医生 (牧师)
台湾圣公会	The Episcopal Church in Taiwan	1953	大陆	叶祖耀牧师
中华基督教 卫理公会	The Methodist Church of China	1953	大陆	黄安素 会督
中华循理会	China Free Methodist Church	1952	大陆	司崇德教士
基督教门诺 会	General Conference Mennonite Church	1948	美国	高甘霖 牧师
浸信会台湾 省联会	Taiwan Baptist Convention	1948	大陆	杨美齐 牧师
台湾浸信宣 道会	Taiwan Conservative Baptist Church	1952	美国	柯饶富 牧师
福音浸信会	Gospel Baptist Church	1955	美国	刘俊才牧师

宗 派	英 文 全 名	创立年代	传入地 创立地	创 立 人
浸礼圣经会	Baptist Bible Fellowship	1952	美国	罗惠霖牧师
以马内利浸 信会	Emmanuel Baptist Mission	1956	美国	卜利登 牧师
基督教救恩 会	Group Christian Church of Salvation	1958	台湾	扬彼得 牧师
中华基督教 复兴会	China Christian Revival Fellow- ship	1953	美国	赫路得 教士
基督教内地 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1951	大陆	戴德生 牧师
基督教传道 会	Christiano Misson	1955	台湾	江牧羊 牧师
基督教中国 布道会	Evangelige China Fellowship	1957	香港	计志文、 沈保罗
五旬节会	Pentecostal Church	1958	美国	荣耀秀教士
基督复临安 息日会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	1951	大陆	柯尔义 牧师
基督教环球 布道团	Worldwide Evangelization Crusade	1953	美国	魏好人 牧师
台湾基督教 道生会	Taiwan Christian Tao Seng Mission	1955	台湾	李帮助 牧师
中国平信徒 传道会	Chinese Laymen's Evangelistic Movement	1953	台湾	黄约翰 牧师
全备福音宣 道会	Full Gospel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Rev. Felix M. Vandeway
喜音宣道会	Liebenzeller Mission			郁德凯牧师
便以利宣道 会	Peniel Gospel Missionary Society		美国	金大卫 牧师
基督教通圣 会	World Gospel Mission		美国	唐约翰 牧师
基督教台湾 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in Taiwan	1966		
基督教崇圣	Christian Chung Sheng Church	1968	台湾	田雅各

宗 派	英 文 全 名	创立年代	传入地 创立地	创 立 人
会				牧师
基督教新生 教团	Hsing Sheng Christian Church	1960	台湾	黄逢时
中华海外宣 道会	China Christian Overseas Mission	1968	台湾	吴勇
基督之家	House of Christ	1969	台湾	寇世远
基督教芥菜 种会	The Mustard Seed Inc			
远东中华路 德会	Far East Chines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香港	张得胜 牧师
基督教中华 圣召会	Pentecostal Assemblies of Canada		加拿大	
新约教会	New Covenant Church		香港	江端仪
万国浸信会	Baptist One Hundred Crusade		台湾	温野青
台湾贵格会	Taiwan Friends Church	1952	美国	慕德牧师
福音贵格会	The Gospelaires Missionary Association	1955	美国	尚恩溥 牧师
中国神召会	China Assemblies of God	1948	美国	霍赉诗牧师 班概明牧师
台湾神召会	Taiwan Assemblies of God	1953	芬兰	Miss E Anna
远东宣教会	The 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		美国	高满牧师
中华基督教 行道会	Covenant Missionary Society	1953	美国	聂国华 牧师
芬兰行道会	Finnish Covenant Mission	1953	芬兰	艾可慕
基督教拿撒 人会	Church of Nazarene	1956	美国	梅瑞仪 牧师
中华基督教 圣洁会	Swedish Holiness Mission	1954	瑞典	文博牧师
基督教协同 会	The 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	1951	美国	庄逊吾
基督教喜信	Glad Tidings Missionary Society	1952	加拿大	Rev.

宗 派	英 文 全 名	创立年代	传入地 创立地	创 立 人
会				Erick son Raymond
韩国基督教 会	Korean Church in Taiwan	1949	韩国	桂华三 牧师
台湾福音会	Taiwan Gospel League	1949	美国	孔彼得牧师
国际福音会	International Gospel League	1949		傅金生
台省宣道福 音会	Apostolic Church of Pentecost Canada	1957	加拿大	马德生 牧师
基督徒聚会 处	Christian Assembly Hall	1949	大陆	李继圣
聚会所	Christian Assembly Church	1949	大陆	倪析声
中华宣道会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53	大陆	欧粹教士
德国妇女祈 祷会	German Women's Missionary Prayer Union	1952	大陆	贝灵恩 医师
台湾基督教 女教师差会	The Taiwan Fellowship Deaconry Mission	1956	德国	谢存慈
中华基督教 便以利会	China Peniel Church	1958	美国	苑恩溥 牧师
基督教圣经 教会	Christianity Bible Church	1956	美国	查培理
中华基督教 妇女祈祷会	Chinese Christian Women's Prayer	1950	大陆	宋美龄
耶稣基督末 世圣徒教会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	1954	美国	Joseph Smith
耶和華见证 人会	Jehovah's Witnsses		美国	Milton G. Henshel
世界基督教 统一神灵会	World Christian SpiritUnity Association	1970	韩国	文鲜明
基督教会	Church of Christ			
基督教三爱 会	Three Love Church			

宗 派	英 文 全 名	创立年代	传入地 创立地	创 立 人
基督教闽南 堂	Amoy Christian Church		大陆	
大韩耶稣长 老会台湾宣教会	Korean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Taiwan		韩国	金应三
亚洲基督教 传道教会	Asian Christian Mission		日本	星野荣一
中国海员布 道会	Mission to Chinese Seamen		美国	
基督生命团 契	Christ Life Fellowship			
基督教归主 协会	Overseas Crusades Inc.			
逐家文字布 道会	Every Home Crusade			
中国学园传 道会	China Students Mission			
校园福音团 契	Students Gospel Fellowship			

2. 教会持续增长期

由于教派的传入及建立，传教活动极见成效，1964年时教堂及布道所有856所，传教士有678人。到1975年时，台湾的基督教派更多达76个。这些教派活动的形式各异，它们或不设自己的教会，只与长老教会合作传教，如美国的南长老教会及联合长老教会、归正教会，有的在与台湾长老教会合作的同时也建立自己的教会，如圣公会、卫理公会及信义会等；有些独立传教、建立教会，如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摩门教），有的则完全协助其他教派传教，如中国内地会、远东归主协会、佩带圣经会等。

整个70年代,台湾各教会不断探索新的传教方式,以求教会迅速增长。如为解决台湾教会人才之需于1970年成立了一所超宗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1971年11月台湾举办了首届“教会增长研讨会”,1972年又成立“台湾教会增长促进会”,1973年还发行《宇宙光》杂志,开始注重文字传教,1975年11月在台湾展开“葛培理布道大会”,1977年在台湾各地由“中国学园传道会”开展“我找到了”新生命运动,宣扬基督教义,1978年10月由“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主办了台湾第一次国际性的教会增长研讨会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台湾的基督教发展进入另一个旺盛时期。1979年后,教会的增长加快,教徒总数达到了36万。另外,据“台湾教会增长促进会”于198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除主流教会及平地教会发展迅速外,教会聚会所、真耶稣教会及安息日会也占相当的比例,这三派的信徒占全台湾信徒的百分率依次为15%、11%及1.7%,这些教会彼此独立而又封闭,也很少同其它教会来往,在行政、组织及经费方面完全自立而具有本色化,并自称是最纯正的教会。单从领圣餐的人数上讲,聚会所在当时的台湾各教派中仅次于第二位,约45,000人,真耶稣教会处于第三位,达24,000多人,而真耶稣教会还特别注重在山地民中传教,几乎有一半的教徒是山地民族。可见,台湾基督教中福音派占重要比例。

3. 缓慢增长期

80年代以后,各教派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宣教运动,但教会发展的速度缓慢下来。据“公元2000福音运动”所作的调查显示,1980年到1989年的年增长率是4.09%³同时,台湾神学院为台湾教会培养了一大批教牧人员,为发展教会而在各大学中推广学生福音运动,并推动教会走向世俗化,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尤其是长老会,已成为政治性的宗教派别,借政治的影响来扩大教会的势力。

台湾的基督教虽然教派林立，但长老会占有绝对的优势。教会势力持续增长的原因在于各教会竭力推行本地化策略，使用地方语作祈祷语，礼拜仪式本地化，教牧人员本地化，并出版山地语、闽南语或客家语的《圣经》，注重在少数民族人中传教。据称，80%的山地居民信了基督教；另外，台湾300万客家人中仅有6,000多名客家新教信徒，50名神职人员，多为长老会、路德会及福音派的教士，客家语基督教堂创立于1973年，它是由香港崇真堂的客家基督徒来台建立的，目前还建有“台北客家话基督徒组织”。其次，在基督教早期传播史中就开始注重利用教育来吸引信徒，以后各教会广设学校，以使青少年接受基督教教育，进而影响家庭、社会及政治生活。教会在台开办的综合性大学有东吴大学、东海大学等。东海大学创办于1953年，是由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拨款建立的，1955年开始招生，也是台湾最早设立的一所私立综合性教会大学，现设文、理、工、商、法、农、管理7个学院，连同夜间部共33个学系，9个研究所，有些学系被认为是台湾私立高等院校中最好的系科；东吴大学原是卫理公会于1954年创办的，最初是一法学院，如今发展为拥有文、理、法、商及外国文学5个学院、连同夜间部共28个学系的一所综合性教会大学；中原大学始建于1955年，前身为长老会和台湾地方士绅所创办的私立中原理工学院，现有理、工、商3个学院，连同夜间部共24个学系，10个研究所。现代台湾的基督教各派均热心教育及公益事业，借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并吸引人们入教。如在学校方面，比较出名的基督教中学有：淡水中学、卫理女中、静修女中、恒毅中学、道明中学、长荣女中等；而基督教人士创办的大学有：东海大学、东吴大学、中原理工学院等。再者，教会大力兴办各种社会福利机构，如开办医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用社会服务来吸引人们入教。据统计，到1985年底，台湾共有教堂2,403间，信徒总数约476,000多人（包括慕道友），神职人员2,236名，其中

外籍传教士有600人,开办了21所神学院校,3所大学,2所专科学校,5间中学,1所小学,79间幼稚园,还办有9间医院,4家诊所,1间养老院,并且各教派有自己的出版刊物,其中包括7份年刊、8份季刊、15份月刊及16份周刊⁴。另据《今日华人教会》1991年第3期根据《台湾基督教会1989年教势报告》的统计资料报导,截止1989年年底,台湾地区共有基督教会2,666所,主日崇拜的平均出席人数为244,179人,教徒总数为448,220人;按总人口来计算,出席主日崇拜的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1.02%,基督徒占人口总数的2.25%;1989年台湾平地教会有2,057所,山地教会有609所。由于台湾基督教会派别林立,各种教会组织也很多,主要有51个教派,还有一些独立教会。与1985年的统计数字相比,教徒总数递减,有些教会呈现衰落之势。

从8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基督教各派联合发动“2000年福音运动”,大力传教。这一运动是受北美富乐神学院世界宣教的影响,台湾教会中一些年轻的传道人有许多就是从该校毕业的。根据“公元2000年福音运动推行委员会”的统计,1990年1—10月台湾教会共增加约200间堂会,其总数已达2,800多所。另外,90年代初统计,台湾的基督教徒约42万多(包括慕道友),传教士3,000多人,其中外籍教士800余名,教会办有神学院35间、教会大学6所、医院12家等。增长的比例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这一数字也不容忽视。1991年统计时,教徒总数约为443,996,占当时台湾总人口2,040万的2.18%,共有堂会数为2,927间。“公元2000运动”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使台湾的基督徒增长至200万,堂会增至10,000间,差遣200位宣教士往海外传教。目前,台湾一些传教机构正向外派遣传教士,到亚非许多地区甚至欧洲去传教,扩展其教会势力。最近还兴起各种传教活动,发展教徒。1993年8月在台湾东海大学举行了题目为“迎向2000——妇女宣教大会”,来自台湾各教派

2,500 多名基督徒妇女出席了大会,分“妇女与宣教”、“妇女与家庭”、“妇女与教会”、“妇女与社会”及“妇女与成长”五个主题来讨论。可见,台湾的基督教各派非常重视妇女问题,同时妇女也在教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另外,各教会传教的手段也各种各样,如在现代的电视、广播中都有基督教的团体买下的时段,运用音乐或戏剧形式的节目,传播基督教的教义,每年还定期组织布道团,请来演艺界的教徒到海外布道,主要是到华人中间,用歌曲、舞蹈、民谣、短剧及诗歌演唱等来吸引人入教,扩大教会的影响;或者召开大型的布道会,通过卫星或电视转播到其它地区,成千上万的人都可听到;一些文字布道机构如“基督教文字中心”、“道声百合文库”、“宇宙光出版社”等也出版大量的基督教图书,同时还组织了一批华人圣经学者,翻译新版圣经,以配合台湾基督教的发展。

目前,基督教在台湾仍是极少数人的宗教,更谈不上文化“基督化”。但由于近年来不断推广传教,教会增长的速度也不容忽视,而基督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更日益壮大。据分析,台湾基督教会势力大增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传教策略的灵活、大力实行本地化政策及受世界基督教“奋兴运动”的影响,吸收台湾本土人入教,加强其认同感。二、极力推广教会教育,借吸引青少年入教进而影响其家庭和社会,同时也培养了服务教会的人才。三、广设医疗及慈善机关,以赢得民心。四、教会内部组织的严密,传教士深入到社会的下层。五、台湾权贵们信仰基督教的人很多,并以此为时尚。这大概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如蒋介石一家、张学良等人信奉基督教有关,一时台湾有争相陪上司上教堂的景象。另外,台湾当今“总统”李登辉、“总统府”资政张群、已故“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委何应钦、台“中央银行”总裁张继正、前《中央日报》董事长曹圣芬、前“中央通讯社”社长马星野、台湾红十字会理事长蔡培火、前“经济部长”张光世、台湾交通大学校长阮大年、前“调查局”局长阮

成章、前国民党中常委陶希圣等都是基督徒据称台湾上层社会大约有20%的政要人物是基督徒，这无疑扩大了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日益发展，台湾基督教会人士不断到大陆旅游、探亲或参观访问，最近大陆的牧师也应邀到台湾访问，相互的交往与沟通加深了彼此的友谊，这无疑有益于促进两岸的和平统一。如1991年台湾基督教由7个教派联合组成的访问团首次访大陆，成员包括台湾长老会、信义会、卫理公会、圣公会、圣教会、门诺会及天主教的代表，圣公会的简启聪主教任团长，这次访问在台湾基督教界以至台湾社会中反响很大，促进了海峡两岸基督教界的了解。另一方面，台湾一些福音教会对大陆展开大规模的传教运动，并不断改变传教策略，向内地派传教人员，或培训传道人，这违背了大陆的法律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利于两岸的友好交往及和平统一大业。

二、主要教派

(一) 长老宗

1. 历史与现状

长老宗是台湾基督教中教徒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派。它是在1865年由英国长老会首先传入台湾，其后加拿大长老会来台，两教会以大甲溪为界，以北属加拿大，以南属英国。

英国长老会接受的是加尔文思想的影响，推行“一元化的神权政治”，而加拿大长老会则坚持政治与宗教分离的态度。由于两派政治主张的分别，所以两派教会特色各异。南部长老会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北方教会只注重传教。1876年英国长老会创立了台南神学院(简称“南神”)，这是台湾第一所采用西式教育的学校，第一

任校长是英国传教士巴克礼，为台湾教会培养了大批的教士。加拿大传教会在 1892 年由马偕在台北北郊阳明山创办台湾神学院（简称“台神”），重视神学研究，在教义上属于“福音派”。两教派遵循各自的传统，在台湾居民中传教，建立教会，发展教徒。其间两教派曾数度合并与分裂，经数十年的努力，到本世纪初，已发展成台湾最大的教派。据英国长老会 1907 年“百年传教大会”前的报告：南部教会到 1905 年 10 月止教徒总数为 5,304 人，受餐者 2,942 人，教会 28 处，布道所 58 间，还培养了许多华籍传道人。北部教会于 1904 年 10 月成立区会，据其“百年传教大会”前的报告称，共有传教师 6 人，其中牧师 3 人，医生 1 人，女传道 2 人，未按立的华人助手 55 人，教会 5 间，支站 60 个，受餐者有 2,181 人，神学生 41 人⁵。1912 年两个教会联合召开台湾大会，结为友好团体。次年，这一大会正式采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名称。

在日治时期，长老会同样受到压制，发展缓慢。1915 年长老会举行了庆祝传教事业 50 周年的盛典，同年以吴喜荣为首开始领导长老会开展摆脱母教会的经济自立活动。1916 年，出版了台湾方言的新约圣经，这是由巴克礼牧师在高金声的协助下完成的。1931 年，南长老会召开南部大会。1933 年巴克礼在杨士养的协助下翻译出版了台湾方言的旧约圣经。此时，正值日本侵略我国东北，长老会也组织青年运动，一方面对抗日本的国家主义，另一方面开展大规模本地化的、群众性的传教政治运动。为此，许多传教士被逐，有的甚至殉道。1943 年，以二郎牧师为首的台湾日本基督教会强令两大长老会合并成一个组织，为其殖民统治服务。

战后，长老会各个教会逐渐得以恢复，如被日本人关闭的教会印刷所恢复后命名为“光复印书局”。为适应教会在新时期的需要，1951 年南北两支长老会再度合并。到 1954 年又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带有政治性的“教会信徒人数倍增运动”，当时该派已发展到

233 个教会,信徒人数近 6 万。另外,教会还委任牧师到学校任教,并推行“特职传教士”的传道计划,目的在于培育台湾人的教会。十年后,长老会的教徒成倍增长。70 年代末,长老会教徒总数达到近 20 万,约占当时全台新教徒总数的 80%,其中少数民族教徒约 6.7 万,分布在 10 个山地部族中。此外,台湾长老会一直重视发展台语教会,以吸引台湾土著加入教会。据称长老会中有 90% 以上的教会在推广台语,甚至在其《台湾教会公报》上亦用台语发布消息。

1989 年长老会已拥有 20 多万教徒,几乎占全台新教人数的一半,共有 962 间教会,是当今台湾有相当实力的宗教派别。长老宗内部除最大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外,还有一些小的教会组织,如“基督改革宗长老会”、“台湾基督道生长老会”、“中国基督教长老会”等。1989 年 3 月“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还改选了内部组织,原议长杨启寿接替了高俊明,出任“总会”的总干事。1990 年选举时台中市民族路教会牧师孙武夫被选为总会议长,副议长是花莲市信义教会牧师池汉銓,书记是台南市南门教会牧师孙鸿镇,副书记是桃园市迦南教会陈道雄。该教派到 90 年代初已有 1,081 个基层教会、牧师 1,000 多,办有神学院、学校、医院等,出版《台湾教会公报》。其下有 19 个常设机构,并加入了“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与加拿大、美国及英国长老会关系一直很密切。1994 年台湾长老会召开了第 41 届总会,选出新任领导,议长陈三胜(台北中会文山教会的牧师)、副议长吴和隆(彰化中会彰化教会的牧师),书记罗联升(七星中会大安教会的牧师)、副书记李不易(高雄中会冈山教会的牧师),总干事杨启寿获连任。

台湾长老会还在世界其他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美国及日本均有其“中会”,如在日本成立了“日本台湾教会中会”,所属基层教会有东京台湾教会、池袋台湾教会、川越台湾教会和宇野佐仓传道

所。这些教会的成员大多是台籍华人,支持长老会的“台独”立场,同时与所在国各大教会加紧联络。因此这些教会也是台湾长老会为寻求美日等国支持的中介。另外,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台湾长老教会的教徒也不断到内陆参观访问,1989年台长老会牧师还组织了访问团考察了内蒙古、新疆及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2. 长老会的组织结构

台湾长老教会制定有自己的“宪法”,其第一条中就开宗明义地说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系基于圣经,相信耶稣为救主……而依本宪法组织的教会”,第二条规定了长老会的组织形式,“各教会系由中会设立的团体,组织小会,举行礼拜及圣礼典,连于基督,培养信德、宣扬福音”,可见,其宪法是该教派的教会大法。

根据教会宪法,长老会组织了比较严密的、以总会、中会和小会的三级代议制度形式。总会是最高的代表机构,设正副议长、正副书记、正副会计各一人;议长任期一年,每年改选,可连选连任。总会闭会期间以常设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下设传道、教育、文宣、人事、财务、山地宣教等干事,并由总干事负全责。总会直属机构有医院、中学、神学院及《台湾教会公报》等。各地区教会组织分为16个中会,即东部、七星、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寿山、屏东、太鲁阁、排湾、阿美、布农及泰雅尔。中会的结构仿照总会,议员则由所属各堂会的长老、执事和宣教师组成,是长老会的中坚骨干。中会以下是小会,即地方教会,各地教堂按规模分为堂会、支会、布道所等,分别由宣教人员驻会布道或巡回讲道。各教堂由教徒推选长老、执事,与传教师组成小会,是长老会的基层组织。依靠基层教会,长老会可以在台湾各个乡镇角落传教及投入社会服务,影响社会的基层。另外,为了便于统筹整个年度的传教进度,则在总会成立“事工委员会”,在中会一级成立“部会”,在小会一级则成立传教“小组”。在中会以上的委员会,部会主要由

专职传道人及部分地方教会的长执或平信徒组成。同时，总会还成立了“2000年福音推广中心”，将其宣教任务作长远规划，并引导各级传教组织的运作。

此外，台湾长老教会为培养神职人员和传道人而设立了4所神学院。其一是由巴克礼于1876年创立的台南神学院，因其师生常参与游行示威等政治活动而在台湾以“反对运动者”著称，台湾最大的反对党民进党的主要领导人和一些“台独分子”均出自这所神学院；其二是1884年由马偕创立的台湾女子神学院，专门培养女传道人；其三是马偕于1892年创建的台湾神学院，政治上持中立态度；其四是1947年由高俊明创立的玉山神学院，培养原住民，并鼓励学生为原住民争取权益。这些神学院为台湾长老会神职人员的更新换代提供了保证，并且它们的政治影响在台湾的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大。

3. 政治与社会活动

长老会“名声大振”的原因与其政治色彩密不可分。70年代随着中日及中美关系发展，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继续保持已不可能。长老会根据其一贯坚持神权政治、积极介入社会与政治生活的立场，面对台湾外交上的空前孤立，连续在其会刊《教会公报》上发表三篇主张“台独”的声明：1971年发表《台湾基督教会对于国是的声明与建议》中，鼓吹“一中一台”，要求台湾独立自主，并举行大选；1975年11月发表《我们的呼吁》，再次重申“国是声明与建议”，并抗议当局没收台湾语圣经；1977年8月发表第三个声明《人权宣言》，当时正值美国国务卿万斯来大陆访问，长老会在“宣言”中呼吁美国总统卡特“本着人权道义的精神”，尊重1,700万台湾住民的“人权”，敦促台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这些主张因违背了国民党“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纲领而遭到台当局的反对，但却得到了美国及日本一些极右

势力的支持。1978年3月长老会在台南神学院召开了第25届大会，通过了上述“宣言”的决议案，美国基督教联合会就发来了贺信，日本基督教联合会的总干事东海林勒还亲临大会，并公开致词表示支持。其他新教教派也纷纷要求台当局给予传播福音的自由。整个70年代，长老会是台湾政坛上反对派的重要支柱。到80年代，其政治主张丝毫未有改变，“台独”立场愈来愈明确，并举行了一系列的抗议示威活动。如1986年的“二二八和平日运动”、1987年的“五一九反对国安法运动”，该年底，长老会的牧师及教徒为了声援因主张台独而被当局扣押的蔡有全和许曹德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台北街头示威游行，100多名教会牧师率领游行队伍在台北市的快车道上与警方发生冲撞与追逐，他们手上拿着的大幅白布条上写着：“人人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自决作主人”“台独无罪”等口号，公然叫嚣台独。1988年11月再次发动游行，并高喊“释放蔡有全、许曹德”及“独立救台湾”等口号。1994年3月其总干事杨启寿在“历史性普世国际研讨会”上发表题为“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对台湾前途的主张及信仰根据”时再次强调：“我们强烈的断言，台湾人有追求自己尊严与主权的权利。”另外，由长老会及医界联盟等团体共组的“一台一中行动联盟”也于1994年4月15日正式宣布发起“台湾人觉醒运动”，公开搞台独活动。但在长老会内部并非所有人都支持台独，有些有影响的信徒及牧师的立场是保守的，甚至支持国民党，反对台独，如台湾“基协”总干事康峻壁、理事长陈溪川，翁修恭等人。多数信徒对他们领导人上街喊口号也是不满的。一般认为，台湾北部教会政治态度较温和，以“台神”为中心；南部教会以“南神”为中心，其“草根性”、主动性、台独意识要强烈得多。

除直接参加政治活动外，台湾政界人士与其关系也非同一般。一些长老会的教徒还直接介入政坛，影响社会舆论。从1979年之

后,信徒洪奇昌、张俊雄、翁金珠、周清玉、许荣淑、牧师黄昭辉陆续当选台“国会议员”,使长老会势力渗入“国会”。其次,长期以来因长老会主张参与政治及本土意识,台湾反对党如民进党对它极尽拉拢,长老会与民进党的关系非常密切。自 1986 年民进党正式成立后,上述诸人及其他长老会信徒就跻身该党中央委员之列,直接影响该党的政治取向。长老会发动的历次示威游行均有民进党人参加,民进党中间有许多人是长老会教徒,如该党主席姚嘉文及夫人周清玉都是此派的信徒,而民进党的“主权独立运动委员会”也是在长老会教徒的主导下运作的。同时,一些“台独”组织或有“台独”倾向的团体如“新国家联盟”、“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台湾国际关系基金会”、“台湾人公共事务台湾总会”、“台湾人权促进会”等都是长老会参与组织的,或由该教会直接派人进行控制。另外,台当今“总统”李登辉也是长老会的信徒,据说早在他任职“农复会”时就常去参加聚会,任台北市市长时常去济南路的教堂做礼拜。他从不掩饰其基督徒的身分,并愿公开做见证。据台湾报刊报道,关于长老会的“台独”倾向,他认为“台独只是少数人的声音,台独未来前途要以全体人民的意见为依据。”可是,长老会中的一些人仍我行我素,甚至参加大选,明确支持主张“台独”的候选人。再次,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名称里也可看出强烈的本土独立意识,其教会名称的原名是台语自话字(TAI-OAN-KI-TOK TIU-Lō KAUHOE)。

长老会中的一些人把他们的台独政治倾向与其所信仰的“介入神学”相联系在一起,加尔文神学的中心思想是“主权在上帝”,教徒没必要服从世俗的政府,教会更有义务参与世俗的社会政治生活。在 1979 年 1 月 22 日《台湾教会公报》上同时以台语汉字及中文发表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明确表明本地化及参与世俗的“介入神学”思想,其中说“我们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

是普世的,又根植于本地,借着礼拜、交谊、教育、宣道与服务来成就上帝的旨意。”“我们信上帝赐给人有尊严、才能、责任以及乡土,以便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并与他一起管理世界。也因如此,人有社会、政治、经济之制度,亦有艺术、科学,更有追求真神的心,可是人有罪,误用了这些,以致于破坏人、万物和上帝的关系。所以当倚靠耶稣的救恩。他要使我们由罪恶中得自由,使被欺压的重见天日,使凡在基督里的成为新造的人,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循着以上的信仰告白,长老会近年来逐步介入台湾的政治生活,一些人的“台独”意识也得以贯彻。

长老会参与社会生活早在1951年第一届总会年会召开时就已展开,当时决定设立一特别救灾委员会,救济因台风而受灾的百姓;1964年总会召开第十三届年会时正式成立“社会服务委员会”;1984年合并总会“社区发展委员会”,并在第三十一届年会上改组为“社会服务发展委员会”;第三十六届年会又将此组织更名为“教会与社会委员会”,并成为台湾街头的常客,经常发起示威游行。长老会自称“教社”(“教会与社会委员会”的简称)的成立,“不是对政治关怀的启发,而是去执行教会对政治、社会关怀主张的执行。”1990年至1992年罗荣光担任“教社”的主任时,其台独色彩更为浓厚。在1991年台湾“国代会”选举时,“教会与社会委员会”组织动员牧师参与助讲、助选,并提出候选人,还多次发“呼吁文”,提出“新宪法”、“新台湾”、“新国家”等台独主张。长老会所宣扬的“台独”主张并非是其全体教徒的意愿,多年来更遭到台湾社会舆论的批评。

1994年1月24日,台湾长老会召开宣教大会,这是长老会有史以来举行的首次宣教大会,其目标是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建立上帝国”,大会还确立了三大主题:“建立合乎上帝主权的国度,广传福音、见证基督,参与普世教会”。近来,还正式向台“立法院”

提出“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请愿案,虽被搁置,但在台“立委”中持支持态度的人也为数不少。

台湾长老教会作为台湾基督教的最大的一个教派与国际主流教会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它是“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成员之一,争取“普世教协”对其“台独”主张的支持,经常派人出席国际宗教会议,并参加世界或地域性的宗教活动。另外,它也像主流教会一样,反对当代一些新兴宗教的出现,认为是异端,如1994年5月由教会主持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指责韩国的“统一教”为异端。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知,台湾长老教会之所以成为台湾基督教中最人的一派,原因有四个,一是历史悠久,一直得到西方教会的支持;二是组织严密、系统,便于推行其内部制度及传教计划;三是与政治关系密切,并已成立政治性的宗教团体,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四是它长期以来推行“本地化”策略。一百多年来,台湾长老教会始终注重教会的本地化,采用台语布道,其教会章程也采用台语拟定,并出版台语《圣经》,连台南神学院招生“会台语”也作为一个必备的条件。以至于长老会的教徒大多为台湾本地的土生人,他们与大陆人关系疏远。这大概也是台湾长老会容易受“台独”意识影响的一个原因。

(二)教会聚会所

也称“基督徒聚会处”或“小群教会”,1926年创立于大陆,创始人是倪析声。该派于1948年大陆解放前夕传入台湾,并在台湾独立发展,注重个人的灵修、祈祷,建立小规模的家庭聚会处,逐家传教。该派教会在台湾发展较快,教徒人数持续增长。到1985年时已发展为台湾基督教第三大教派,拥有121间堂会,到90年代初拥有教徒总数为37,440人,堂会数达228间。但该派教会保持独立发展、不与其他教会往来的策略,所以在台湾社会政治生活中影

不大。

(三)真耶稣教会

真耶稣教会由卫保罗于1917年创立于北京，在台湾也是一个较大的宗派。早在日据时代的1926年就传到台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该派教徒在台湾有5,000多名。目前，“真耶稣教会国际总会”就设在台中，以台湾为其传教中心，还设有五个区会，开办有神学院、研究教义、组织传教活动、每四年举行一次世界性的代表大会等。

到80年代初，台湾的真耶稣教会总会已拥有200多处堂会，教徒4万多人，会址设在台中，工作人员有80多名，总负责人是陈克忍长老。据称台湾的真耶稣教会总会经济实力雄厚，每年向其国际联合总会上缴的经费也最多，因此，台湾的真耶稣教会在“国际联合总会”中的地位也较特殊。到1991年统计时，真耶稣教会共有堂会总数256间，教会持续增长，为台湾第二大教派。

(四)浸礼宗

浸礼宗在台湾也是一个较大的宗派，内部主要教会组织有“中华基督教浸信会”、“中华基督教浸信宣道会”、“基督教浸礼圣经会”、“福音浸信会”，其中以“中华基督教浸信会”势力最大。到1985年统计时，浸礼宗堂会的总数为195间，占基督教堂总数的8.9%；到1991年统计时，堂会总数达223间，教徒总数为2,200多人，平均年增长率高达8%，是目前台湾第四大教派。

(五)新约教会

新约教会是由长城电影公司的女影星江端仪于1963年在香港创立的。1966年江去世后其女张路得就接替她的职务，成为该教

会的领袖，并被誉为“上帝的女仆”。她将总部设在香港九龙，之后周游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传播其教义。

台湾的新约教会始自 1965 年，当时张路得亲自带领信徒来传教，将台湾视为新约教会极为重要的基地，并宣称：“上帝将在 1966 年使台湾复兴。通过台湾，上帝的真理将传遍世界，使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复兴起来，废除所有其他的宗教派别。重建世界的重大责任落到台北身上，台北是世界复兴的起点。”这样，新约教会很快在台湾传布开来，在头两年里，就建立了 29 处教会。由于长城公司的左倾立场，台湾当局对该派采取压制态度。因此，在台湾的宣教工作逐渐掌握在台南基督徒聚会处信徒洪三期的手中。洪三期原在高雄甲仙山区垦荒牧羊，在他领导台湾新约教会后不久，将信徒带入此山中膜拜，开辟乐园。1967 年洪三期宣称高雄的双连崛山为圣山——“锡安山”(Holy Mountain of Zion)，鼓动台湾和海外信徒千余人前去“朝圣”，还建立了一个“天国教会”的组织，声称“上帝已指定台湾的锡安山为圣山”⁶。此后，这里成了该派教徒朝拜的圣地。洪三期自称“洪以利亚”，是列国的“先知”，是“神的君”。以至新约教会的教徒身穿印有“万王之王”字样的白上衣，宣称洪三期与“耶和华”一样是“万王之王”。

到 1976 年，新约教会内部发生分裂，这直接影响了其发展势头。当年 4 月，张路得指派台北的牧师洪三期修订该会的教义及传道方法，但遭到洪的反对。洪还联合台湾其他教会的牧师，联名写信指责张背叛了她的同伴及信徒，并宣称自己教会的立场才是正统的，反对张的领导。自此，新约教会分裂为两派，一派继续在张的领导之下，另一派则是在洪三期的领导下，改名为“台北教会”，洪本人自称“先知”，并称锡安已不在耶路撒冷，而要建立在台湾高雄双连崛山上。

在台湾,因新约教会强烈的排他性而遭到其他教派的反对,同时也遭到台当局的压制。新约教会特别注重末世学的宣传,认为其他教派及宗教是异端,标榜自己的教会是“上帝在末世世界建立的教会,是时代的要求,代表了上帝的意志”,还宣扬“新约教会不是人为宗教,乃信仰、敬拜、侍奉独一无二的真神救主,坚守神的至圣真道”,“远超过人国的宗教系统”⁷。1987年9月罗马教皇访问美国时,新约教会休斯顿分会的教徒就在教皇做弥撒礼时高举“撒旦的工具”的牌子示威,并称“天主教教皇所传的是异端”“天主教的教义不合圣经的真理”等。另外,因为该派教徒常举行抗议活动而遭到台警方的镇压。台当局从1979年开始对“锡安山”这个“看似共产社会”的山地社区展开调查,曾多次到“圣山”驱散朝拜的信徒。次年,“锡安山”的入山证停发,山上房舍及产业全遭夷平。其教徒曾多次举行示威及静坐,并在山下河滩搭棚居住达三年之久。1983年,台警方再次捣毁住棚,并以“窃占河川地”的罪名判处15人。另外,在1985年12月7日还发生了“新约教徒机场滋事事件”。当时,台新约教会锡安教徒到桃园中正机场迎接到台活动的海外新约教徒,因当局拒绝一名马来西亚教徒入境而引起机场滋事事件。结果有9名教徒以“滋扰机场”罪被判5个月徒刑,并课以罚金。为此,新约教会的信徒多次走上街头抗议,还买下美国的巨幅广告声讨“暴君蒋氏父子”,台湾报刊称,其反对台当局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民进党。

随着台湾政治上的开禁,对宗教问题也采取了较容忍的办法来处理的手段。这样,国民党对新约教会采取了让步,准许新约教徒回锡安山。李登辉上台后,持末世论的新约教会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而改变原有的立场,用该教会牧师张耶利米的话说:“先知(洪三期)在等待圣灵的进一步启示,但李登辉已变质了,为了选举,偶像也承认了,我们仍会声讨他。”不过,新约教会不像长

老会那样热衷于政治活动，对政治生活毫无兴趣，张耶利米对这方面的看法可以说具有代表性，他说：“对选举我们不讨论，大部分的人不会去投票，这是人国的事，而人国快要过去了。”但新约教会在政治上却支持民进党，如 1988 年初台湾法庭审判蔡有全、许曹德“台湾独立”案时，民进党有 300 多人到法庭外示威，一批新约教会的信徒也前去声援。另外，因新约教会是一种现代的新兴宗教，对其教会领袖的崇拜及服从、严格的组织制度、末世学及神秘主义等在台湾受到基督教主流教会的谴责，被认为是异端。

新约教会在台湾发展已近 30 年的历史，到 80 年代末已在台湾设立有 29 个分会，另在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也设立了分会。大陆改革开放后，该派教会的成员也曾借到大陆探亲、旅游、参观、访问等机会企图向大陆传教，并称“要推翻人的国、建立神的国度”；“要把新约教会传遍全中国……”。

（六）统一教会

该教派是一种新兴的宗教，全称为“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会”，产生于 1954 年的汉城，创始人是韩国的文鲜明，宣称在 1936 年的复活节时曾目睹耶稣基督的显现，以后就由他确立了一套新的对世界和平的看法，作为统一教会的教义而到处传播。

1967 年由一名日本信徒将该教派的教义传入台湾。四年后该教会向台湾当局注册，并开始招收教徒，其中包括大学教授及大专学生。但该派的教义却因提倡性爱自由、让教徒的所有财产上缴教会等遭到台湾基督教主流教会的非议。1975 年，台湾当局也接到多项报告，指责统一教会使一些青年学生放弃学业而离家出走，等等。台湾当局便于同年 2 月下令禁止该教会活动。1986 年台湾政治上“解严”后，统一教会开始不断向当局陈述报告，恳请对统一教会的解禁。直到 1990 年台“内政部”才以“政府尊重宗教自由”的

理由宣布对统一教会解禁，但同时警告该教会不得招募学生担任传教士及安排集体婚礼。

除上述介绍的六种主要宗派外，台湾基督教新教还有许多其他宗派及教会组织，如信义宗的“基督教台湾信义会”“中华民国台湾基督教信义会”“中华信义会”等，循道宗的“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基督教中华循理会”“基督教台湾圣教会”“基督教台湾圣洁会”“拿撒勒人会”等，五旬节宗的“中国神召会”“台湾基督教神召会”“基督教锡安堂”“基督喜信会”等，还有一些福音派及独立教会，详见表 2。

表 2: 台湾 51 个主要教派状况表

教派名称	主日出席人数	教徒人数	堂会数	出席 / 堂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94352	208249	1126	84
教会聚会所	18720	37440	228	82
中华基督教浸信会联合会	11537	18881	177	65
台湾圣教会	3974	19400	83	48
基督教中华循理会	2885	4898	53	54
台湾信义会	2326	3911	46	51
基督教台湾贵格会	2272	3183	35	65
基督教协同会联合会	866	1523	33	26
中华福音道路德教会	1145	2290	32	36
基督教会拿撒勒	1526	1737	30	51

人教会				
独立教会	2169	3136	29	75
中华基督教行道 会联合会	1809	2346	27	67
中国神召会	1340	2380	25	54
中华基督教浸信 宣道会联合会	1430	1672	25	57
基督教锡安堂	2000	4000	24	83
基督改革宗长 老会	621	661	23	27
中华民国台湾基 督教信义会	589	1484	22	27
基督教宣道会 敬拜中心	926	1421	21	44
基督教门诺会台 湾教会联合会	864	2118	21	41
中华基督教卫理 公会	1000	1415	20	50
中华基督教圣洁 会	1332	2543	20	67
台北地方教会	450	650	18	25
圣公会	2727	5454	18	152
中华基督教信 义会	477	921	17	28
中国基督教信 义会	628	1008	17	37
台湾基督教浸 礼圣经会	495	562	15	33
基督喜信会	800	1200	15	53
中华基督教福音	636	802	10	64
	185	662	9	21

信义会				
基督教中国布 道会	1240	1620	9	138
基督教中华圣 召会	322	503	9	36
灵粮堂	3070	8140	8	384
台北新生教团	523	700	8	65
台湾基督教道生 长老会	274	381	7	39
基督教福音浸 信会	210	320	6	35
基督教路德福 音会	110	169	6	18
基督教救世军 台湾区总部	69	121	5	14
崇真堂	200	400	5	40
基隆教会	212	316	5	42
台湾复兴神的 教会	160	320	4	40
基督之家	460	575	4	115
中国基督教长 老会	90	150	4	23
台湾基督四方 教会	160	320	4	40
福音贵格会	85	164	3	28
中华基督教便 以利教会	226	343	3	75
中华基督徒恩 惠福音会	191	191	3	64
远东福音宣扬会	52	59	3	17

中华基督教长老 教会信友堂	570	1140	2	285
伊甸基督教会	280	500	2	140
基督教台北真道 教会	770	1540	1	770
中华神的教会	97	153	1	97

资料来源:《台湾基督教会1991年教势报告》,基督教归主协会、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2000年福音运动)联合出版。

三、主要教堂

1. 淡水礼拜堂

该堂是台湾北部基督教的发祥地,最初由马偕创立。1872年,马偕来台后即在淡水登陆,在此租屋传教,后购屋改造为教堂,即现在马偕街八号原址。到民国4年(1915年)改建为一所白色教堂。1932年为纪念设立教堂60周年,将其改建为富有中欧建筑特色的教堂,并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即成目前的面貌。

2. 凯歌堂

这座教堂是仿照南京凯歌堂的样式建造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庆祝胜利并作为一个基督徒,特在南京明孝陵对面批给教会一片山林,盖了一栋红砖瓦的教堂,蒋介石及其夫人每星期都要到该堂做礼拜。国民党来台后,便在士林官邸重建了凯歌堂,来此做礼拜的大多数人是台湾政要及其家人,包括蒋氏家人,偶尔也接待外国的贵宾。据说蒋氏家族的重要仪式及典礼也都在该堂举行,如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均在此受洗。此外,从50年代以来,张学良也来该堂做礼拜。台湾政要如张群、马纪壮、俞鸿钧、王叔铭等也常在此堂聚会。不过,从外观上看,该堂并没有什么特

殊之处，内部装璜也很普通。但因为它是台湾政要人士经常光顾的教堂，所以显得较特别。

3. 洲里教会

最初由马偕牧师创办于1873年，开始只是借一商人的住屋来布道，在第二年的11月，在这里举行了圣餐礼，马偕为10人受洗。1877年3月6日洲里礼拜堂正式建成，但不久这所礼拜堂即毁于中法战争中。1886年，马偕再到洲里重建了教堂。不过，这所教堂在日据时期改名为“和尚洲教会”，如今称为“芦洲教会”。

4. 光复教会

位于花莲县光复乡的大马村。该教堂于1965年开始兴建，教徒及驻堂牧师都亲自动手，历时5年才建成，可容纳1,000多人，是山地教会中最大的一间教堂。此教堂座落于半山上，周围是槟榔、桑树及圣诞红等树木。礼拜时山地教徒使用雅美语唱自己谱成的赞美诗，牧师布道也用雅美语，使用的《圣经》及诗歌本则是罗马拼音的雅美语，但崇拜仪式与平地教会并无多大的差别。这所教堂可以说是台湾山地教会的一个典型。

5. 怀恩堂

位于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台湾大学的对面，其主任牧师是周联华。该教堂建筑优雅质朴，来礼拜的教徒多半是青年学生。这所教堂最有特色的是音乐崇拜，有素质很高的琴师及唱诗班，会众的歌声也很标准。因教徒较多，每周日有四堂礼拜，其中有一堂还是英语崇拜，该堂所得的奉献也较多，并支持了几个布道所。

四、主要组织与机构

1. “中国学园传道会”

该组织于1992年7月25日公布了“92台北新生命总动员布道”，

来自香港、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及加拿大等地的教徒参加了总动员会。大会呼吁东南亚华人基督徒回应“十万基督徒，十万精兵”的口号，要向中国大陆布教。

2. “中华民国基督教会协会”

成立于1954年，是台湾基督教各派的联合组织，对外代表各教会，也是台湾宗教团体中规模较大、活动较多的团体。目前台湾各大教派如卫理公会、圣公会、台湾长老会、循理会、公理会以及“中华民国福音联谊会”、“护教反共联合会”、“中国主日学协会”等均为其成员，但各教会内部事务仍由自己管理，与“基协”没有隶属关系。其次，该组织与美、日等国的宗教界有广泛的联系，还联合召开过“反共”会议。

3. “台湾基督徒争取自决协会”

这是一个以宗教活动为名而进行政治性活动的“台独”组织，又名“台湾人民自决运动”，1972年圣诞节成立于美国，会址设在纽约教会街站。该组织是“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在海外的机构，鼓吹“台湾人民的命运必须根据人权原则自主自决”，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其主要负责人均为台湾长老会的前负责人。该组织还设有5个分支机构：加拿大“多伦多台湾基督教会”、“芝加哥台湾基督教会”、“纽约台湾基督教会”、“旧金山台湾基督教会”及“安雅堡台湾基督教会”。出版季刊《出头天》，主席是黄彰辉(牧师)。

4. 血水圣灵全备福音布道团

该组织是一传教团体。其创立者左坤为江西人，1930年10月26日出生，1949年到台湾。他原为台湾基督教“新约教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因该教会内部发生纠纷，他于1988年分裂出去，自创了“血水圣灵全备福音布道团”，总部设在台湾省台北市石牌东街一段。该教会内部设有使徒、牧师、教士、同工、长老、执事等职

务，最高的职务使徒即由左坤自己担任。他还编写一些属灵的小册子，如《全备福音》、《生命之光》、《使徒职分》等，到处散发。该组织曾派人到大陆传教，发展教徒，建立组织，被我公安部门取缔。

5. 南台湾普世宣教协会

这是台湾基督教长老会总会的下属传教机构。主要由南区包括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地区的教会机构及个人参加，于1994年2月18日正式宣告成立。该会规定凡认同普世教协“公义、和平及受造物的整全”的人均可参加，旨在拓展地区性的普世关系，加强与第三世界如非洲的萨伊、拉美的巴西、南亚的印度等地的交往。此会设有7人委员会，会长是陈博诚牧师，副会长是孙源镇牧师。

6. “中华海外宣道协会”(Christian Missions Overseas)

该组织是台湾基督教成立的跨文化的宣道机构，1968年由吴勇长老等人发起成立，主要负责差派宣教士到海外传教，传递各地教会的信息、协助海外其它传教机构。目前，该机构正在泰国、印尼等地活动，在台湾设有通讯处。

7. “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Ling Leung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这是一传教组织，其策略上是优先考虑在大城市中植堂，发展教会。目前，该组织有派往泰国及日本等服务的宣教师。

8. “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

这是台湾各基督教派参加的一个传教机构，1990年7月2日在台北的灵粮堂正式宣布成立。在这之前，台湾各教派的领袖及机构代表总共举行了14次筹备会议。该组织的宗旨是以公元2000为目标期，联合台湾各宗派教会，推动台湾的“福音化运动”，到2000年时能使台湾的基督徒达到200万(约占总人口的10%)、1万家教会的目标。成立大会选出了第一届理事共15位，周联华牧师担任理事长；另有5位监事，廖明发任常务监事，夏忠坚担任秘书

长。此外，大会还通过了 40 条章程草案及 90—91 年度的工作计划，该计划包括在台湾各地设立办公室、推行教会概况统计、组织各种布道团、印刷及散发《二〇〇〇年福音运动教会手册》、《二〇〇〇年祷告使命团手册》、《二〇〇〇年布道使命团手册》等，还要用卫星转播美国布道家葛培理的布道大会、举办“迎向 2000——台湾福音会议”、分期在台湾各主要都市举行“分区总动员布道”等。目前，这一组织虽然在台湾推行了一系列的传教活动，从一些统计数字上看教会的数目在不断增加，但就目前的速度来看其原来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9. 台南神学院

这是一所由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创办的神学院，1865 年创立，第一任校长是英国传教士巴克礼牧师，当时只有十几名学生。

这所神学院是台湾第一所采用西式教育的学校，因巴克礼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所以他也采纳了其母校的一套管理制度及自由的学风，学生可以参加学校的管理。“南神”的学生也有许多被送往欧美一些著名的大学深造。所以，长期的治学方针也培养了自由的学风，学生的思想也较激进。1949 年黄彰辉接替满雄才，成为第一位台湾人院长。黄在任内不但扩大了学校的规模，完善了该神学院的各项制度，而且还引导学校走向“台独”，同时也受到台湾当局的责难。在当今台湾政界许多“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就出自这所学校。1971 年底基督教长老会“国是声明”在“南神”得到响应，是由该院英国籍牧师弥迪理提议发表的，他因此在第二年被迫出境。前两任院长黄彰辉，宋泉盛于 1973 年在美国发起“台湾人自决运动”，从此台湾长老教会便一步步走向“台独”。1979 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南神”的毕业生高俊明、蔡有全、林弘宣、赵振二、黄昭辉、吴文、许天贤等均被判刑，此后台南神学院的学生成了台湾街头的常客，发动一连串的抗议活动，游行示威及罢课，以至

于在台湾人的眼里，“南神”与反对运动牵扯太深。到民进党成立时，许多毕业生更加入该党，成为重要的活动分子。

“南神”分大学部和研究部，大学部有4个系，研究部只有神学系。大学部的学生自费就读，但校方设有奖学金；对那些有志念神学、将来献身教会工作的学生，可享受公费待遇，毕业后由长老会总会分配到教会工作。另外，规定入学者必须是基督徒，同时要会台语。学生采用小班制，男女不限、也不分党籍、省别、族别。到1990年时该学院共19个班级，198名学生。还规定教师全体住校，若学生外出参加政治活动必须请假，学校并不禁止。100多年来，“南神”为台湾长老会培养了一批人，同时也因其政治倾向而“各声”远扬。

10. “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

1950年由宋美龄创立于台湾。当初，国民党退据台湾，大批的基督徒随之而来，其中有许多女信徒，对未来的前途顾虑重重，生活上又遇到许多困难。于是，借祈祷来安抚内心。开始参加的人员仅有少数，后来逐渐增多。到复活节及圣诞节时还领导全台祷告，并在各医院、孤儿院举办庆祝会，将其成员分成小组前往各医院慰问，培训传道人四处传教。该组织在台湾基督教界影响较大。

11. 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 (The Reformation Translation Fellowship)

这是一间台湾基督教的出版发行机构。据称其宗旨是将基督教的神学书刊译成中文，或以中文发表有关基督教的文章，出版中文神学书刊、出售或赠阅中文基督教改革宗的书刊、利用广播及电视传教。该机构原执行干事是赵查理 (Charles H. Chao, 香港“中国教会研究中心”主任赵天恩的父亲)，并曾得到美国及英国教会的大力支持。

五、人物简介

甘迪究士 第一位到台湾传教的基督教西方传教士。明天启七年(1627年),他受荷兰巴达维亚宗教会议派遣到台湾传教,先在新港社学习当地土语,于1631年在新港建立了台湾第一座新教教堂,使新港社全部人员1,047人皈依了基督教,还办起了主日学,教化上著青少年。

尤纽士早期来台的荷兰基督教传教士。1629年受荷兰巴达维亚宗教会议的派遣,来台帮助甘迪究士传教。他在台湾传教14年,曾以罗马字音拼写新港土语,还以新港语编写成祈祷词选集、教义简本、教义问答等书,并用荷兰文印成《基督教入门》一书,用来教育土著儿童。他还培养土著传道人,帮助他到各地传教。

马雅各英国长老会来台的传教士。1865年5月被派往台湾,先在台南借行医传教。后转往高雄旗后传教,在那里创建了新楼医院,此为西方传教士在台设立医院之始。

马偕 加拿大长老会的传教士。1871年来台,次年到淡水一带传教,并购屋建立台北最早的教堂——淡水礼拜堂,使5名当地人受洗。以后再设五股坑、新港社、狮潭底、和尚州(芦州)教会,他还将罗马字的新约圣经翻译成闽南话,以便传教。1875年,他娶了五股坑人张聪明为妻,一同传教。1880年在淡水创立一所医院,1882年建立学堂大书院,越年又建立了一间女子学校,开办女子教育(首批新生有35名,1958年该校改名为台湾妇女圣经书院,1974年又更名为台湾女子神学书院,1988年再易名为台湾女子神学院)。到1892年,他到台北北郊阳明山仰德大道旁向阳坡上创建“台湾神学院”,后发展为台湾一大著名的基督教神学院。1901年6月2日马偕因喉癌病逝,享年58岁。他本人在台湾传教30年,共设立

了60多所教会,施洗信徒达3,000多人,对台湾北部基督教的传布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巴克礼 长老会的传教士。于1875年到台湾,次年创立一所神学校即“台南神学院”,经其培养的传教士及牧师多达240人,他还翻译新、旧约圣经,改写为白话罗马字,并于1885年创刊《教会公报》。他在台湾传教60年,最终卒于台湾。

甘为霖 英国传教士,1871年来台传教。他与马雅各在台南一带活动,并创嘉义教会,还首创了台湾的盲人教育,发明点字印字机,编写点字圣经与教材,开办盲人学校。1911年,他发起成立了“台湾基督教会南北联合总会”,还被选为首任议长。

芝苑 台湾基督教山地人女传道。生于1872年,1923年时在花莲港教会开始慕道,1924年受洗入教,成为山地太鲁阁的第一位基督徒。1929年她入淡水女子学校,毕业后返乡,以加湾地区为中心开始传教。当时,日本人对山地人控制严格,不许她传教,她仍然坚持,聚集信徒到山洞里查经并祷告。台湾光复后,她已经年过70,仍积极传教,吸引了大批的山地人入教,教会增加到300多个。1946年芝苑逝世,山地人为纪念她特在她讲道的山洞旁建一所“芝苑纪念教堂”,每逢周日引来许多教徒前往礼拜。芝苑成为台湾山地基督教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

翁修恭 台湾长老会的牧师,也是台“总统”李登辉的家庭礼拜牧师。他与民进党主席姚嘉文及其夫人周玉清(台“国大”代表)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但他不支持长老会的“台独”立场。他是台湾基督教长老会济南教会的驻堂牧师,这间古老的教堂就位于台“立法院”群贤楼的隔壁,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的基督徒虽政见不同,但常在此教堂一同参加聚会。所以,翁本人与台两大党的关系都很密切,但他表示“尊重每位信徒的政治立场”,并相信“有信仰的基督徒会把耶稣基督的精神应用到自己选择的政治立场中去”。

高俊明 台湾长老会前总干事。1929年出生于台南，父亲是位医生，他因从小多病，在上完中学后就进了神学院，并到山地传教。四年后即1947年，他在花莲县寿丰乡鲤鱼潭边创立玉山神学院(简称“玉神”)，一直在神学院13年，其间他曾到加拿大研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学，积极主张教会要投入社会运动，尤其是有关原住民的运动。1970年他当选为长老会总干事，自此后连选连任，掌握该会实权长达19年之久。在他担任总干事职位后，先后以教会名义发表了三篇政治性的“宣言”，长老会打破了百多年来保守政治中立的原则，日益成为一个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宗教派别，使长老会的政治主张彰然于世。1980年4月24日，他因涉嫌“高雄事件”，藏匿施明德的罪名而被判列8年，于1984年8月获假释出狱后仍任长老会的总干事。1986年在民进党成立后召开的第一届代表大会上，他是该党仲裁委员会的委员；1987年3月7日他又与其他人共同创立了“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这是一个受民进党支持、由一些“政治犯”组成的组织。他与1989年3月辞去长老会总干事一职。李达曾在《台湾宗教势力》一书中指出：“长老会的组织结构，以及宗教传教的精神，因高俊明的领导，逐渐转化为复杂的政治团体，则是不争的事实。”⁸另外，1991年成立的“台湾保卫委员会”中，高还是21名筹委之一，与民进党的领导人一起鼓吹台独。

杨启寿 台湾长老会总会前议长，也是玉山神学院的院长。他生于1931年，毕业于台南神学院，曾到屏东九如教会服务两年。1989年3月长老会举行第36届年会时改选了总会的干部，他接替高俊明出任长老会的总干事，连选连任至今。

周联华 系台湾凯歌堂、怀恩堂及艺人之家三个教堂的负责牧师，也是当年蒋介石及蒋经国的顾问牧师。他于1920年3月7日生于浙江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原为慈溪县)，1945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旋入浸信会神学院，后去美国深造，毕业于美国美南浸

信会神学院，并获哲学博士学位。1954年到台湾任教会工作，曾在台湾浸信会等神学院任教数十年，主持了多项《圣经》翻译事务，任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的负责人；他还是东海大学的董事长、台湾基督教福音协进会(即“2000年福音运动”)的主席，在台湾的基督教界是颇有影响力的领袖及神学家。“2000年福音运动”是台湾各大教派联合组织的一个传教机构，还成立了“2000年福音运动网络”，以统一各种福音传教运动及机构的步调。周在1991年首次回大陆访问时，曾向大陆的教会详细介绍了“2000年台湾福音化运动”的情况。1993年8月他还出任亚洲浸信会神学研究院院长，这是一所由东亚区九所浸信会神学院组成的。因他所主持的教堂是蒋介石一家、张学良、李登辉等台湾上层人士常去做礼拜的地方，所以他与台湾政界人物的关系较为密切，还应李登辉之请主持了1990年纪念“二二八”事件和平祷告礼拜。周自1991年后多次到大陆访问，经常发表文章肯定大陆教会的三自方针，并兼任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董事会的董事，1993年底，还邀请了南京金陵神学院的汪维藩牧师及《天风》杂志主编沈承恩访问了台湾，这是大陆基督教人士首次访台。周联华牧师身兼数职，积极参与台湾的各种公益活动，如为配合“国际家庭年”他担任了台湾“爱家行动促进会”的会长，从94年5月到11月结合“世界展望会”、救世传播协会、“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等，以及许多企业界一起赞助，在台湾推动“爱家行动”，另外，在多年前他就以宗教者的身分加入“扶轮台北社”，还担任“扶轮社”刊物的主编，为地方和国际的“扶轮社”成员作沟通，并为社会服务做出自己的努力。

郭子严 台湾真耶稣教会国际联合总会的负责人。生于1910年，福建省闽侯县人。其父即为真耶稣教会的传道人，其兄也是真耶稣教会的负责人。郭本人于1948年到香港传教，1954年到印尼，1979年才转到台湾，在台中台湾神学院任教，他的妻子及三个女儿

均在福州工作。1982年,他回乡探亲并养病,还参观了一些基督教堂,对大陆的教会及宗教政策增进了了解。

六、发 展 趋 势

台湾基督教从人数上讲并没有像佛教或道教那样达到上百万的规模,但由于各个教派特别是长老教会的严密组织,且积极介入社会的政治生活领域,因而它的影响力及能量却是无法忽视的。如长老教会因与民进党的密切关系,以至可以在选举中投票而使其成为台湾最大的反对党。新约教会屡屡上街也颇使台当局头疼。随着台湾政治上解严以来,台湾基督教各派纷纷转向世俗社会,大力推广各色的传教活动,扩大社会影响,尤其注重吸收青年入教。

然而,在过去的20年间,台湾基督徒的增长数目并没赶上台湾社会总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尽管从1977年以来先后发动了“什一增长运动”、“2000年福音运动”等大型传教活动,但教会的发展并没有很大进展。台湾的学术界在分析其原因时认为有以下三方面:其一是由于近年来台湾经济的增长给教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人们追求物欲,精神世界空虚。其二是由于中国传统宗教的兴旺对西方传入教会的冲击。其三是教会自身的原因,诸如西方教会提供的经费逐年减少,教会人才的缺乏,教会教育的误导等等。

面对以上困境,台湾教会也采取了种种措施,目前教会的发展已开始出现以下新的趋势:

1. 崇拜方式的属灵化,开展各种形式的灵恩运动。由于受世界福音派的影响,属灵的敬拜方式被大力宣传,尤其是韩国的赵镛基牧师在台湾教会中影响很大,吸引了大批的信徒,教会的增长速度也加快,还设立一些灵粮堂、和撒那广场、敬拜中心等。

2. 大力开展宣教活动,成立各种宣教组织。为使教会迅速增

长，各教会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传教活动，以吸引教徒。如在1990年底掀起的“公元2000福音运动”，联合了台湾许多基督教派，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宣教活动。该运动的委员会还请一些经济学家及社会学家预测台湾到2000年时的经济、社会状况，然后对传教活动统筹计划，按地图分区域使每个村镇都有教堂；还采取各种传教方式，如动员大批教徒，身穿2000年福音运动的服装到某一区域密集传教，电视、广播或录像布道，组织15,000个家庭邀集其亲友一同观看，以扩展教会。这个大型宣教运动计划至少在台湾17个县市地区、联合14个教派，成立“2000年福音运动推行小组”，在至少17个县市地区成立祷告使命团团部，并在各个教会设立联络人、订定具体计划，进而在1991年成立了“2000年福音运动网络”，直接纳入世界华人基督教的宣教计划中。另外，在传教方面，每年都选定一对象群体集中传教，如1991年是儿童和少年布道年，1992年是青年布道年，1993年是老人布道年，1994年是妇女布道年；同时从1991年6月开始举行第一波布道会，以后每三个月举行一次，直至公元2000年；为扩大台湾教会的影响，逐渐加强给教会灌输海外差传的观念，各堂会要加强合作，并激励青年献身。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台湾的很多基督教组织将中国大陆作为传教的重点场所，借旅游观光的机会到处传教；有的传教机构甚至将主要目标转向大陆。如早在70年代末，台湾就利用“远东广播公司”的圣诞节时向大陆传教，还成立一个“推进委员会”及顾问委员会，连李登辉的夫人、何应钦、张群等政界要人也被聘为顾问，极力推动向大陆传教；而“中国海员布道会”更将其重心转向中国海员。此外，像长老教会还制定了一整套的、长远的传教计划，并与全世界30个国际宣教合作教会及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正谋求向海外发展。

3. 世俗化日益浓厚。各教会近年来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号召教徒参与社会政治，教会甚至直接参选助选，教士成为政界

人士已屡见不鲜。尤其是长老教会，更逐步变成一个政治化的宗教团体，往往利用宗教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另一方面，台湾政界也不断介入教会事务，利用教会势力或树立形象，或赢得教徒的信赖。例如，1991年台湾“庆祝建国八十年基督徒感恩大会”时，李登辉亲自书面致词，张学良还到大会做见证。台湾长老教会近年来随着“台独”势力的不断嚣张，也借教会名义成立各种“台独”组织，如1994年4月15日由长老教会、台湾教会及医界联盟等团体共组的“一台一中行动联盟”，宣布成立“台湾人觉醒运动”，鼓吹“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这样，在各个教会大搞“福音化”的同时，教会正一步步政治化、世俗化。

4. 走向联合的趋势。如1990年7月成立的“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即联合了台湾各大教派领袖及机构的代表参加，这在台湾基督教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连台湾长老教会也参加了“2000年福音运动”，被称为“空前未有的合作”。

5. 加强教会的教育及社会服务功能，以扩大教会的影响力。各教会在现代社会里均认识到教会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教会要“引人入教”，并加强对教徒的属灵教育，近来有许多教会开始聘请教育干事或教育牧师。另外，各教会加强了社会服务的功能。如长老教会的“教会与社会委员会”属下就设立了8个机构，分别对妇女、残障、劳工、渔民、原住民、雏妓……等人群服务，扩大教会的势力。

注释：

1. 参见蔡相辉《复兴基地台湾之宗教信仰》，台湾正中书局印行，1989年，第106页。
2. 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基督教论文集》，史文森、罗曼华编译的“基督教在台湾”一文，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12月。

3. 表格及以上数字请参见赵天恩“从基督教的发展、现状看两岸宗教政策与交流”,香港《中国与教会》(双月刊)1992年7 8月。
4. 同注 1,第121、141页。
5. 参见《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台湾基督教长老会的历史与现状”,雪松著。
6. 见《纽约时报》1984年11月21日有关台湾新约教会的报道。
7. 参考台湾“基督灵恩布道团”印发的宗教单张宣传品。
8. 参见李达《台湾宗教势力》,香港广角镜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第44页。

第五章

伊斯兰教

一、历史与现状

伊斯兰教在台湾又称回教,何时传入台湾,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说最早可以上溯到元代:据称元代穆斯林官员纳绥拉丁的后裔阿里曾到过台湾经商,如今台湾著名的风景地阿里山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说在明永乐七年至宣德六年(1409—1431年)间,穆斯林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途经台湾时,随船就有不少穆斯林的船员或士兵,还传说郑和本人将一植物栽在台湾凤山上,被后人称为“三宝姜”。这两种观点虽说都有可能,但缺少史料的考证。不过,在明代以后,大陆移民台湾的人越来越多,福建闽南一带的穆斯林就有不少迁往台湾,但他们只是一般的信徒,并没有有意识地传播伊斯兰教。至明末清初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的时候(1661年),有许多福建、陕西的回族官兵来台,据称穆斯林的数目有上万人,大多为福建泉州地区的回民。因郑成功将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这些穆斯林就定居下来,并建有最早的清真寺。这是穆斯林大规模来台的第一个高潮,伊斯兰教也正式在台湾传播

开来。台湾的定中明在其“台湾的回教”一文中说：这些回族官兵“分别驻扎在鹿港及淡水等地，并建有清真寺，而且是仿照福建省泉州清真寺的模式建筑而成。后来子孙繁衍，人口众多，遍布台湾两岸各处，而以鹿港郭氏一族人数最多。”¹自此，台湾伊斯兰教的发展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人数据说最多时达 2 万，至今还能找到当年清真寺的一些遗迹。在台湾南部的一个渔村，如今仍居住着当年郑成功入台时穆斯林的后裔 1,000 多户，虽然现在他们已被汉化，如求神拜佛、祭祀祖灵等，但每逢斋月仍坚持把斋，并供奉视为“天书”的《古兰经》。另外，在台湾最早的港口鹿港也居住着 300 多户的穆斯林后裔，他们是由泉州来的郭姓穆斯林的后代，并成立有“郭氏宗亲会”，逢主麻日时要用清真食品。

清朝以后，台湾与大陆的往来加强，大陆的居民不断前往台湾定居，到乾隆十八年，回民马大用还被任命为镇守台湾的总兵，并负责治理台湾达四年之久，是郑成功以后 70 年来第一位负责台湾事务的穆斯林。光绪年间(1885 年)，台湾正式划为一行省，首任巡抚刘铭传到任后为开发台湾，广招福建及广东沿海一带的渔民到台湾。当时，闽、粤一带的渔民纷纷迁居台湾，其中就有许多回民，他们为当年开发台湾做出了贡献。这是大陆穆斯林向台湾移民的第二个高潮。但是，到了日据时代(1895—1945 年)，台湾伊斯兰教的发展遭到遏制。在长达半个世纪里，日本人独尊神道，伊斯兰教的礼拜、封斋也被勒令禁止，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在长期压迫下逐渐衰弱。又因台湾与大陆隔绝，阿訇、教长人才绝迹，加之不准建造清真寺，不允许聚礼过宗教生活，以致台湾的穆斯林后来就丧失了某些传统信仰，到抗战胜利时，连一座完整的清真寺也没有，伊斯兰教在台湾更趋于衰落状态。但他们仍保留了一些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如每星期五为礼拜日，不吃猪肉，祭祖不供猪肉，不拜偶像菩萨，不养猪，人死了不请和尚、道士诵经，不火化等。1948 年大阿訇

王静斋在台湾光复后首先来台传教，并在台北设立会所，向穆斯林宣讲伊斯兰教的教义。

1949年前后，随蒋介石国民党迁台的大陆穆斯林，据统计大约有2万多人，他们的迁入使台湾伊斯兰教的发展进入了又一个高潮期。这些穆斯林既有上层的军界、政界、工商界的人士，还有学者或社会名流，也有下层的一般士兵、船员及其家眷，其原籍遍布大陆的各省市，分布在台湾各地，并沿袭了在大陆的信仰和生活习俗，甚至将大陆的一些穆斯林的组织也搬至台湾，如“中国回教协会”、“中国回教青年会”，重新组成穆斯林的群体。这些直接来自大陆的穆斯林努力从台湾原有的一些遗迹中挖掘伊斯兰教在台湾的历史，并帮助早期入台的穆斯林加强对本民族的体认，还陆续修建清真寺，使台湾的伊斯兰教得以稳步地发展。这样，台湾的穆斯林就分成两大部分，一是台湾原住穆斯林，人数很少，其宗教意识及民族意识均已淡薄，生活习惯也有所改变；另外就是大陆籍的穆斯林，宗教观念及民族意识都很浓厚，并且因与社会上层有密切的关系，如穆斯林中的政界要人有国民党的元老白崇禧、马步芳，也不乏“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所以其社会地位也较高。因穆斯林民族的特殊性，伊斯兰教在台湾几十年来一直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扶持，虽然台湾的伊斯兰教规模较小，但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不过，最初因穆斯林组织的财力与人力的有限，并没开展正式的活动，直到1958年白崇禧因病退出，时子周被选为“中国回教协会”的第二任理事长后，教务才慢慢展开。

台湾的穆斯林因人数少，长期以来也没有积极对外传教，所以发展缓慢。据台湾“内政部”1991年统计，台湾现有穆斯林52,000多人，只占总人口的2.6%。目前，台湾的回教徒大多说汉语，全部属于正统派，即逊尼派哈乃斐学派，原籍多在大陆，台湾本土的回民较少；还有来自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巴基斯坦、伊拉克、土耳其、

伊朗及沙特阿拉伯等国的穆斯林，他们大多为商人或政治避难者；有 5 座清真寺，10 名教长²。台湾的穆斯林主要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城镇，如台北、台中、南部的高雄等，清真寺和穆斯林的组织也多设在城市。虽然在教派上多属逊尼派哈乃斐学派，但因无经学院，各地的教长、阿訇人才缺乏，懂伊斯兰教法的人更了了无几。为了培养穆斯林的专门人才，各伊斯兰教组织及穆斯林的家庭不断派人去世界各伊斯兰国家学习，以增强本民族的活力。同时，在各清真寺分别设有董事会，负责监督及处理寺务，并设有一位伊玛目或阿訇，专责宗教事务。寺里还办暑期阿文讲习班，聘阿訇讲授教理及阿文，组织有“回协青年队”，举办赞词班，以使伊斯兰教徒人人会念颂赞词。在社会生活方面，台湾的穆斯林已打破族内通婚的习俗，但坚持非穆斯林的一方必先皈依伊斯兰教为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因长期缺乏教职人员，大多数人已不懂伊斯兰教的教礼，更不会念《古兰经》，也很少去参加礼拜。在北投鹿港一带原住民中发现的千余户郭姓穆斯林后裔，生活习惯有许多已汉化，但在丧葬期间（40天）坚持不吃猪肉，妇女做月子期间也不食猪肉；他们不随便到寺庙里拜神，但常到祠堂（保安宫）去拜祖先；婚姻关系也早打破了传统，且仪式也与教外人相同；但他们将《古兰经》当做“天书”“圣书”一样代代相传。不过，来自大陆的移民仍遵守穆斯林的生活习惯，如殡葬习俗即净水洗后用白布裹尸，施以土葬，丧葬事宜由清真寺负责，设有回民公墓，《中国回教》杂志上也常公布殡葬消息，但与大陆的传统相比改变许多，如有些台湾穆斯林在节日时才吃清真，礼拜也不严格等。

近年来台湾的穆斯林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政治活动，如第二届“国大”代表选举中，推出回民代表后选人，在 1992 年度国民党“立法委员”的选举中，与其他各教一起掀起“净化选举”的高潮。另外，为扩大穆斯林在台湾社会中的影响力，还创办了两种穆斯林的刊

物,一种是《中国回教》(后由季刊发展为双月刊),是由海内外的穆斯林赞助出版的;一种是《伊斯兰文化》,由“中国回教青年会”主办。近年来,台湾的回教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及让公众有更多地了解,也开始公开传教。如台北清真大寺的教长定中明阿訇于1990年7月在“世界回盟全球清真寺最高理事会台湾分会”主办的回教讲座中,用题为“以回教的观点对宇宙人生的探索”向社会首次公开宣讲回教的教义,并决定以后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下午定期举行这类的讲座,欢迎社会人士参加。此外,一些回教徒中的知名人士参加了“中华民国阿拉伯文化经济协会”,旨在发展与回教国家的文化与经济交往,在台湾社会中发挥了较大影响,1991年底“回协”的武宦宏理事长、定中明及石永贵两位常务理事还当选了该协会的理事。再者,1992年12月成立了“伊斯兰青年服务队”,旨在加强回教的宣传,并深入回民家庭,从事具体的服务工作,这也充分说明了如今的台湾回教团体已开始重视传教的工作。

在国际交往中,台湾的回教组织重视发展与伊斯兰各国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回教协会”充当了一个半官方的机构,对内可以联络各个回教组织,对外则可利用“民间外交”,为台湾当局造声势。其次,台湾的回教组织也加入了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世界联盟和东南亚暨太平洋地区伊斯兰宣教理事会(1980年成立),并与之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台北清真寺大教长定中明还担任了“伊盟”的“全球清真寺最高理事会”的理事,同时也是东南亚暨太平洋伊斯兰宣教组织的第一届执行委员。台湾与中东各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比较密切,尤其是中国与沙特未建交之前,台湾通过各回教组织与中东国家保持联系,而自沙特与我建交后,台湾驻沙“使馆”更名为“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使台湾回教组织在台湾当局推行的民间“外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台湾的穆斯林组织及团体也经常邀请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到台湾访问,或主办一些国际的穆斯林

会议,如1993年10月22—24日在台北的清真大寺召开了“亚太伊斯兰宣教研究会”。此外,台湾居住着来自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及沙特阿拉伯等国的穆斯林。同时,有一些台湾穆斯林学生被派往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及约旦等国培训。随着大陆与台湾民间交往的不断发展,台湾穆斯林中已有许多人回大陆探亲旅游,关注大陆的改革开放。

二、主要的清真寺

台湾的清真寺主要有5座,台北两座,台中、高雄、桃园各一座。台北的一座清真寺是“中国回教协会”和“伊斯兰教育文化基金会”的会址,另一座是“中国回教青年会”的会址,80年代末还计划在台北建造伊斯兰文化中心和傅赛尔王国纪念馆,以及台中、高雄两市的清真寺。1994年初,在台南新落成了一座清真寺。主要的清真寺有以下五座。

1. 台北清真大寺

位于台北市大安区新生南路,初建于1958年,由台湾回教协会集资购地兴建,在1960年完工启用。原址在台北市丽水大街,当时大陆来台的穆斯林因没有做礼拜的清真寺,常子春弟兄及郑厚仁等人将丽水街十七巷2号一幢日式房屋,捐作清真寺之用。50年代后期,台北的回民日增,原寺不敷应用,后迁到现址。该清真寺具有阿拉伯建筑风格,座西面东,可供1,000多名穆斯林礼拜。正门呈拱形,门内是一南北向的甬道,甬道的尽头是清真寺的门楼,寺的主体是一大圆顶,顶端有异常鲜明的新月标志,整个大寺的外观气势磅礴。寺内还建有两座宣礼塔,不过,这宣礼塔本是召集教徒前来做礼拜之用,但由于穆斯林在台湾居住分散,往往将宣礼塔只当做一种装饰。寺内还建有净水房,并附设有豪华的贵宾室、办公室。

伊斯兰著名学者王静斋、马松亭曾在该寺主持过教务。该寺现由台湾回教协会直接管理，日常事务由董事会负责，并因“中国回教协会”设于内部而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清真寺。平时这里接待来访的海内外穆斯林贵宾及其他各界人士，每逢古尔邦节及开斋节，都举行盛大的会礼活动。另外，台湾的“译经委员会”（成立于1954年）也附设在该寺，1959年还翻译出版了《〈古兰经〉国语译解》一书。1994年初开始筹办一阅览室，并拟将对外开放，其最初的捐赠人为“亚太宣教总会”阿不都塔义布会长，他捐赠了50万新台币。现任清真寺大教长为定中明，董事长谢松涛。该寺也是外国人士及外籍穆斯林经常访问和礼拜的场所，是台湾第一大寺。

2. 台北文化清真寺

位于台北市古亭区辛亥路，原来很简陋，是一栋改造过的楼房。1953年重建。1985年又在原址上建成一座现代化的清真寺，宣礼塔楼有绿色的圆顶，礼拜大殿也装饰得典雅而优美。“中国回教青年会”就设于此。萧永泰曾任该寺的伊玛目。

3. 台中清真寺

位于台中市南区忠孝路，1951年将一日本式的木结构建筑改作清真寺，并成立了董事会，由柴紫镜任阿訇。1953年从香港聘请虎绍林任第二任阿訇。由于原寺破旧，于1988年由沙特阿拉伯出资援建，台湾当局特在台中南屯区拨地800坪，重新修建台中清真寺。1988年5月27日，伊斯兰世界联盟秘书长纳西夫（Abdullah Omar Nasseef）及台湾回教组织的负责人一起参加了新寺的破土典礼。1990年8月建成一中东式的清真寺，具有中东阿拉伯的建筑风格，大殿之上有一弯顶，大殿两侧各有一座小圆顶的尖塔式的宣礼楼。寺内有宽敞的礼拜大殿、贵宾室、会议及教义宣讲室、办公用房、浴室等附属设施，而且寺名改为“舒海尔清真寺”，以酬谢捐赠人。清真寺建成后，在第六届董监事会上选出新董事长，由马品孝担任；

现任伊玛目金玉泉，1980年接任，为台湾政治大学阿拉伯语的教授。

4. 龙冈清真寺

位于桃园县中坜市龙东路，又称中坜清真寺。原为云南穆斯林老兵的礼拜殿，1967年是用募集的捐款筹建的。1987年11月集资重建，并得到一部分来自利比亚的捐赠。主体部分于1989年底落成，该寺的董事会在新建的大殿里举行了伊斯兰教圣纪会。这座墨绿色的礼拜大殿分为两层，上层可供300人做礼拜，下层则可供教徒举办各种活动。现任阿訇是马赛位。

5. 高雄清真寺

原设在高雄市新兴区，是日本式的平房建筑。初创于1949年1月，是当时台湾第二座清真寺，也是台南唯一一座回教寺庙。后因场地狭小，无法容纳更多的教徒，曾三度易地。1988年该寺的董事会在苓雅区集资购地800坪，拟建新寺，1990年底开始重建，1992年4月完工，建成一现代化的楼层建筑，有礼拜、观光、文化教育、慈善、安养服务等完善设备，既具有清真寺的传统功能，也具备现代化观光的饭店的条件，是台湾几座新建清真寺的典型建筑。该寺占地2,657平方公尺，地上三层和圆顶尖塔，地下一层，分礼拜部（男大殿在二楼、女大殿在三楼）、办公部、文教部、客房部、公共活动场所、餐饮部等附属设施，采用企业化的管理方法，并以企业来支持宗教的发展，使该清真寺成为一现代化的穆斯林活动中心。此外，在1993年4月25日正式成立了“高雄清真寺妇女学进会”，组长是明雁忠女士，旨在推动穆斯林妇女的工作。该寺的伊玛目为宗建元、马福先。

三、主要组织

台湾伊斯兰教的组织主要有以下几个：

1. “中国回教协会”(Chinese Muslim Association, CMA)

简称“回协”。其历史可上溯到1938年白崇禧在汉口成立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由白崇禧任第一任理事长，后改名为“中国回教协会”。1949年该会由大陆迁到台湾后，因人员不足和经费的缺乏，始终未正式活动。直到1958年白崇禧因病退出，时子周被选为“中国回教协会”的第二任理事长，该会才得以发展，1960年将总部移到台北清真大寺，并一直得到台湾政府的支持，成为台湾最主要的穆斯林官方机构。1969年时子周去世后由赵明远代理理事长职务，1974年赵归真后，该组织将理事长一职由协会的常务理事们按月轮流担任。直到1976年在台北市召开了第四届代表大会（前三届均在大陆召开），选举产生了31人的理事会，其中有9名为常务理事，理事长为安徽籍大士许晓初，总干事为王农村³。内部设有教义、文宣联络、活动、妇女、国际事务、行政财务六个小组，以促进台湾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及加强台湾穆斯林与外界的联系。该协会还负责修建清真寺、管理穆斯林公墓、处理教务、选派穆斯林的朝觐工作等，并设有“教育经书整理委员会”，负责印行《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书籍，重印了刘介廉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至圣实录》、马复初的《四典要会》、《大化总归》等，还出版了时子周的《古兰经国语译解》等。该组织的机关刊物《中国回教》(Islam in China, 后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在大陆时原名《中国回教协会会刊》，每月出版一次；1952年7月在台湾复刊，先后由谢松涛、孙绳武负责主编，到1969年12月已发行135期，但此后停刊；到1970年再度复刊，更名为《中国回教》，仍由孙绳武负责主编，并改张为册，每月出

版一次；1974年6月起，定中明任该刊总编辑，直到1980年3月。现在，该刊每期发行2,000册，免费赠送。1990年9月该组织改选理事会，武宦宏当选为新任理事长，许晓初被聘为名誉理事长，秘书长为买德麟。另外，还选有10名常务理事、35名理事、11名候补理事、11位监事、3位候补监事⁴。1993年9月5日召开了“回协”第5届会员代表大会，武宦宏蝉连理事长一职。协会还重整了内部机构，分为七个组：即教义组、文宣组、活动组、生活服务组、国际事务组、财经福利组及妇女组。另外，该组织还加入了“伊斯兰世界联盟”，但自1992年我大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加入“伊盟”后，原台湾代表定中明即以“中国台北穆斯林”代表的名义继续留在该组织内。

2. “中国回教青年会”(Chinese Muslim Youth League)

原于1949年7月在广州成立，名叫“中国回民青年大同盟”，不久即迁到台湾，改为现名。1950年在台北创建文化清真寺，并成为其主要的活动场所。到1957年时会员发展到560人，还吸收了台湾本地的青年加入该会，皈依伊斯兰教。目前，该组织已成为台湾第二大穆斯林社团，会址设在台北文化清真寺。其活动的主要宗旨是联合穆斯林青年，借加强伊斯兰文化和宗教的交流，与世界穆斯林组织发展联系，以促进世界穆斯林之间的真诚友谊。该组织近年来在台湾穆斯林中影响日益加大，发行不定期的小型刊物《回教文化》(The Islamic Review)，免费赠阅。萧永泰阿訇曾兼任该会的主席。

3. “中国回教文化教育基金会”(The Islamic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of R.O.C.)

1976年成立于台北，创办人是常子春、常子萱兄弟，经费也主要由他们捐助，其他穆斯林也有捐助，还成立了财团法人，首任理事长为常子春(1989年12月归真)。现任理事长石永贵，他也是台

湾《中央日报》的总编及发行人。此会的总部设在台北大清真寺里，其主要目的是接受海内外的捐赠，定期为在大专院校学习的穆斯林青年或学者提供奖、助学金及专项奖金，并鼓励他们毕业后为伊斯兰教服务，还奖励编译、出版伊斯兰教的经典，并负责编辑出版伊斯兰文化丛书，与世界伊斯兰教组织合作，在台湾举办国际伊斯兰青年夏令营，组团出访等等。1977年，基金会在台北建立了一家回教福利院，后来并入了官方的军人福利院。另外，该基金会还拥有一座由沙特阿拉伯费萨尔国王捐赠的图书馆，藏书数千册，对公众开放，并附属于“中国回教协会”。该会从成立到1994年的17年中，颁赠奖学金的人数有1,500余人次，其中大多数为在台的研究生、大专生及高中（包括职高）学生，还有保送到海外的留学生（主要是伊斯兰教国家），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服务于外交、教育、经贸等各行各业。

4. 伊斯兰服务社

1987年1月成立，原名“伊斯兰教文化苑”(The Islamic Cultural Institute)，由叙利亚籍商人马乐旺(Mohammed Marwan Fattal)创办，社址设在台北市建国南路，由台北大清真寺教长定中明兼任社长，其主要宗旨是公开在清真寺外宣传伊斯兰教教义，关注对穆斯林儿童的宗教教育，并面向社会讲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的知识，定期举办各种讲座，以吸引学者，同时也努力消除社会上对伊斯兰教的误会与偏见，并增强教徒的信仰和联系。该组织直接受“中国回教协会”管辖。

5. 台湾省回教会

成立于1953年，会址设在台北文化清真寺内，原理事长为萧永泰阿訇。到80年代末，该组织的会员达5,000人，多为台湾军政界的人士。每年台湾组织的朝觐团的成员中有一半是该会的会员。

6. “中华伊斯兰姐妹会”

该组织于1988年2月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成立，创办人是8位女穆斯林，她们均出生于回教家庭，并翻译出版了《四十条神圣的圣训》一书。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要举行定期的聚会，研读《古兰经》及《圣训》等，以提高台湾穆斯林妇女的宗教修养。“姐妹会”设有主席、总干事等职位，还设有公共关系、总务等部门，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过去，台湾女性穆斯林的地位一直不高，甚至没有进礼拜寺做礼拜的资格，而这一组织的成立，表明了在现代社会的里，台湾穆斯林妇女的地位开始受到重视。

以上几个台湾穆斯林的组织中，“中国回教协会”势力最大，“中国回教文化教育基金会”和“伊斯兰服务社”均是“回协”的附属机构，“中国回教青年会”也是它的团体成员。

四、代表人物

时子周 台湾“中国回教协会”的第二任理事长。他生于1879年，又名时作新，天津人，曾毕业于清末保定优级师范学校，后转入南开。1917年4月曾赴日本考察，回南开后任教务主任，并积极投身“五四运动”，还被推选为国民大会的委员。北伐时期曾就任天津河东中学的教务主任，后任天津市立师范学校的校长。曾步入官场，担任过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委员，发起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和“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国民党CC集团的外围组织），1935年被选为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先后担任了宁夏、湖北省的教育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重庆与白崇禧一起成立了“回教救国协会”，并任副理事长，负责日常事务。抗战胜利后，回到天津，任国民党市党部的主任委员及天津市临时参议会的议长⁵。大陆解放前夕，他随国民党来到台湾，从事译经及研究伊斯兰文化等活动。1958年2月由台北中华学术回教研究所理事

会出版了他的《〈古兰经〉国语译解》，这是首部以白话国语翻译的《古兰经》版本，后来广泛流传于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侨穆斯林中间。同年，他还接替白崇禧就任“中国回教协会”的第二任理事长。1969年归真，是台湾很有名望的穆斯林学者。

定中明 现任台北清真大寺的教长，同时也担任了“中国回教协会”的常任理事、“伊盟”的“中国理事”、“伊斯兰服务社”的社长。他出生于1912年6月3日，湖南人。早年曾毕业于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后担任了台湾政治大学阿拉伯语文学系的首任主任（任职8年），曾任《中国回教》杂志的总编，发表过许多介绍伊斯兰教及文化的文章。1993年1月他代表台湾出席了“伊斯兰世界联盟”在沙特召开的第32届年会。另外，还担任了“中国回教文化教育基金会”的顾问、“中阿文经协会”的常务理事、世界宗教徒协会的常务理事、湖南常德同乡会的名誉理事长等，并拥有过台湾外交界的高级职位。他对伊斯兰文化有较深的研究，精通阿文，通晓英文、法文及波斯文，经常在《中国回教》上发表文章，设释经文或讲解教义，曾在各种社会团体及大学里组织的讲座中宣讲回教的教义。其代表著《雪泥鸿爪》，厚达500多页，分国际篇、宗教篇、言论篇、社论篇、追怀篇、文学篇撰述，可谓是他50多年来的心血结晶。他是当今台湾穆斯林的领袖。

许晓初“中国回教协会”的前任理事长，安徽籍人士。1976年“回协”改选时，他被公推为理事长一职，后连任三届。1990年“回协”再改选时，他因年龄关系被聘为名誉理事长。

武宦宏 台湾“中国回教协会”现任理事长，《中国回教》杂志的发行人。生于1918年9月9日，南京人，政治大学毕业。曾为台湾国民党三军大学政战部的中将主任，并曾任职于台湾装甲兵司令部（已退役）。1992年10月他率领一个5人的台湾回教访问团到大陆，促进了两岸穆斯林之间的交流与了解。

石永贵 台湾“中国回教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同时也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社长兼发行人。他别号明强，于1933年8月14日生在辽宁省复县一个穆斯林家庭，1949年5月随家人来台。在大陆时就曾入读伊斯兰学校，后在台湾建国初中部及师大附中高中部就读，1962年获得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硕士，1967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新闻及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回台后任教于台湾各大学，不久，出任国民党的“中央文工会”的总干事。1975年到1981年间出任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新生报》副社长兼总编辑，而后升为发行人兼社长；1981年7月开始担任台湾电视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电视公司——台湾电视公司的总经理，这家电视公司是台湾银行界及日本四大商社投资组成的，他就任总经理后使这家电视台的利润大增，他本人也成为台湾传媒界的明星人物。1988年4月5日，被任命为台湾《中央日报》的发行人兼社长，并经常在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除了在商业上获得极大成功外，在台湾国民党举行的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也是台湾回民所得的唯一席位。同时，他在回教团体中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1980年曾代表台湾出席在印尼雅加达由伊斯兰世界联盟主办的第一届世界伊斯兰大众传播会议，并提出论文“现阶段伊斯兰大众传播策略之研究”；“回教基金会”的前任董事长常子春归真后由他接任董事长一职；还曾任“东南亚暨太平洋区伊斯兰宣教组织”的台湾代表。另外，他的著作也较多，如《人才，教育，传播》（1969年）、《红海新娘》（1971年）、《大众传播短筒》（1971年）、《无花果》（1979年）、《人生的明灯》（1984年）等等。

萧永泰 曾为台北文化清真寺的阿訇，同时任“台湾省回教协会”的理事长、“中国回教青年会”的主席。他是辽宁人，生于1917年，还曾被选为台湾“国大”代表，1990年1月23日归真。

买德麟 台湾“中国回教协会”的现任秘书长、《中国回教》杂

志的总编辑。他是名学者，并译著了许多有关伊斯兰文化的书籍，如《古兰经索引》、《伊斯兰的基本》等；曾担任台湾“经济部国贸组”第四组组长等职，并服务于台湾外交界40余年。

马明道 台湾穆斯林的著名学者。生于1907年，为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法学院伊斯兰教法学系的留学生，后转入土耳其军校，四年后毕业，长期服务于台湾的外交界，还担任过台湾政治大学的教授、《中国回教》杂志的总编。平时，他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很有成果，发表过如《伊斯兰教法之研究》、《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中华文化之影响》、《至圣穆罕默德传》、《明朝皇家信仰考初稿》等专著。

谢松涛 台湾穆斯林的著名学者。他曾担任过《中国回教》的总编，还是《中阿文经》的主要撰稿人，主要著作有《回教概论》等。

海维谅 台湾穆斯林的著名学者、阿訇。191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15岁时随朝覲人士到新加坡，后入读于印度国立穆斯林大学，1933年毕业。次年赴埃及入艾资哈尔大学，1942年到中国驻伊朝使馆服务，后调往利比亚使馆。1966年到台湾“外交部”任职，于1969年底升任参事，被派往驻沙特使馆任职，直到1981年2月退休。主要著作有《中国穆斯林》（乌尔都文，印度，1933年）、《中阿关系史》（阿拉伯文，开罗，1950年）、《中国穆斯林史，过去与现在》（黎巴嫩，1974年）、《有先知身分的伟人——穆罕默德》（1973年）、《伊斯兰人权论丛》（1978年）、《穆民教义指南》（1986）、《认主独一》（1987年）等⁶。

张兆理 台湾穆斯林学者。早年曾服务于台湾外交界，1957年弃官求学，先后就读于加拿大米吉尔大学的伊斯兰学院、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并于1968年获得博士学位，曾用英文发表了多篇有关伊斯兰教的文章，1992年将 these 文章汇辑出版，名《中国回族千年演变发展史》。

马品考 原台中清真寺的董事长。河南人，测量学校毕业，自

1950年起与萧永泰阿訇协力创办台北文化清真寺及“中国回教青年会”，撰写了多篇有关回教教义的文章，并参与编译出版了这方面的多种书籍。70年代中曾随工程人员一起在沙特工作，其间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80年代返台后任工程师，1990年12月当选为台中清真寺的董事长，当时正值维修该清真寺期间，他忙于筹集人力、物力及财力，为工程做出了较大的贡献。1990年12月9日因病归真，享年67岁。

张文达 前台北清真大寺的阿訇。字思明，山东人，生于1914年2月2日，早年毕业于成达师范及埃及艾资哈尔大学，曾先后在台湾驻外“使馆”中服务，1962年8月奉调台湾“外交部”，同年9月被聘为台北清真大寺的教长，同时还兼任台湾政治大学的教授。四年后，即1966年5月再被调往台湾驻利比亚的“使馆”任一秘。退休后，他侨居美国的夏威夷，并任夏威夷大学的阿文教授，后迁到德克萨斯州，1990年12月11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77岁。

常了春 台湾“中国回教文化基金会”的创始人、台湾穆斯林的著名人士。生于1890年，北京人，6岁开始学经，后因家境贫寒改学琢玉手艺，并精通绘画及雕刻钢板艺术，出师后先在北京创业，成立永宝斋玉器厂，工人多为回民子弟。不久，生意兴隆，还到南京及上海开办分号，又创办了福生回教西餐厅及洪福中餐厅等。抗日战争期间，曾奉“回教救国协会”之命到上海策动抗日，遭日宪逮捕。抗战胜利后被选为国大代表。大陆解放后去台，不久就与其兄常子萱、郑厚仁一起创立了台北丽水街清真寺，成为台湾现存历史最早的一座礼拜寺，使得初到台湾的大陆穆斯林可以重新过正常的宗教生活。其实，台湾其他几座清真寺也得到了常氏兄弟的大力支持，如龙冈及高雄的清真寺是由常氏兄弟出资购地得以建造的。1975年在他80岁华诞之际与其兄及其他回教人士捐资300万，筹办了“中国回教文化基金会”，同时还设立一图书室，以保

存并发扬回教文化遗产。1976年12月常子春还被选为台湾“全国好人代表”，以表彰他为社会做出的贡献。1989年12月归真。

闾湘帆“中国回教协会”常务监事，原台湾陆军中将、“国民大会”代表、“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南汇县人，生于1898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1936年曾赴陆军大学深造，1938年“中国回协”在武汉成立时他是发起人之一。1942年11月入国民党“国防研究院”第一期学习，曾到广州投在同乡钱大钧的门下，服务于黄埔军校教导第三团。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任市府会计长，1948年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大陆解放后来台，在1960、1970年两次日赴麦加朝觐，其夫人全道云曾为台湾“立法委员”。1989年8月15日归真，享年91岁。

马凯南 台湾“中国回教协会”的名誉理事。出身于西北回教家庭，1978年参加朝觐时担任外文秘书，1983年在伊斯兰世界联盟全球清真寺最高理事会上担任“中华民国分会”的干事，1985年赴美迈阿密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读博士学位，1988年夏获得博士学位。他经常出访伊斯兰教国家，频频在《中国回教》上发表有关观感，是台湾穆斯林的中年骨干。

以上大致介绍了台湾回教的基本情况。目前，台湾穆斯林中存在的主要难题是培养宗教教职人员，其次是加强一般穆斯林的宗教修养。现在台湾的伊玛目及阿訇多已年老，很难找到年轻一代的接班人。回教青年一般来说所受教育水平要高于台湾的平均数，也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留学海外的学子，但他们对回教的教义、伊斯兰文化、礼仪、宗教的服务等都缺乏兴趣与热情。所以伊斯兰教教务急需人才的培养。台湾没有培养教职人员的经学院，也没有回民的中、小学校，大多数的穆斯林子弟都上公立学校或基督教所办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这大概也是回教子弟对本教教务缺乏热情的一个重要原因。台报披露台伊斯兰教人士的话说，目前，

“台湾看守各地清真寺,终日力行五功、执行婚丧等宗教事务者,仍靠几位接受经堂教育的‘穿衣阿訇’和一些老人来撑持,前景堪忧。”⁷近年来,台湾的各个回教团体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加强了对回教青年的培养,如因阿訇年老体弱,台北清真寺及高雄的清真寺里开始雇佣小阿訇,负责监督牲畜的屠宰等。同时,“伊斯兰服务社”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即是加强对穆斯林子弟的教育,各清真寺也在寒暑假时为青少年及成人举办阿语颂经班、教义学习班、阿文经义讲习班等,以使教徒能用阿语念赞词、可进行教门对话等。据悉,台湾各大清真寺正在筹建回民幼稚园,计划在台北、龙冈、台中、高雄各办一所,从幼儿及小学抓起,再到回民小学、中学,以至大学,逐步发展。另外,伊斯兰教团体也加强了对外的宣传,如开办讲座。1994年4月20日“回协”还举办了一个以介绍回教生活文化与发展概况为主题的教学观摩展,包括世界穆斯林、台湾与大陆清真寺的分布图、回民的宗教生活用品等内容,以加强教外人士对伊斯兰教文化的认识,尤其是从青少年开始,消除他们对伊斯兰教文化的误解。通过宣传,可以让大众对伊斯兰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宣传自己的同时,也加强了伊斯兰教徒自身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上的体认。最近,台湾“回协”还制定了具体的宣教计划,如组训青年义务宣教队、利用传媒宣扬伊斯兰教的教义、到医院及监狱探访等。可见,台湾的穆斯林已重视传教的问题,并付诸行动。

另外,随着老一辈穆斯林的故去,台湾新一代穆斯林参政的了了无几。当初随国民党来台的穆斯林中有不少是军政要人,如国民党元老白崇禧、马步芳,“立法委员”白建民、丁守中、王曾善、阿不都拉,以及后来的“国大代表”马绍武、常子春、许晓初、萧永泰等人,穆斯林各团体的政治主张也极附合台湾当局的立场,但元老们现大多已归真。而现代台湾政界中处于上层的穆斯林为数极少,

难于对社会的政治生活发挥影响,大多数的穆斯林处于中层社会,因人数较少,也没有形成一股有能量的社会势力。目前,台湾“国大代表”中只有两名穆斯林,一是现任欣雄石油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马绪援(甘肃临夏人,曾任台湾“国防部”的常务次长),一位是台北市立芳和园国中教师焦再娜甫(原籍新疆,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哈萨克族);另外台“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马恕基、“侨选立法委员”马国祥、石永贵,“内政部”次长马镇方、台湾省议员刘文雄也算是台湾穆斯林在政界中的凤毛麟角。不过,因台湾当局竭力想借伊斯兰教的力量来维持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等的“外交关系”,所以对仅有5万多的台湾穆斯林也不得不重视,许多“外交活动”都要借助穆斯林团体去完成,所以在某些条件下也给予回民特殊的“关照”。近两年伊斯兰教信仰在台湾社会开始受到重视,尤其是1992年4月,高雄、台中、桃园、龙冈的清真寺相继迁建落成,4月18—19日依次举行了落成典礼,参加这一“吉庆专案”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领袖及各种宗教团体的代表、台湾政界人士、地方官员、及各界名人和台湾本地的伊斯兰教徒,一时造成了社会轰动。再者,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发 展,台湾的穆斯林也组团到内地探亲与访问,增进了了解,改变了过去对大陆的看法。相信在今后,两岸穆斯林会不断促进沟通,加深友谊。

注释:

1. 参见台北《中国回教》杂志,1988年第201期。
2. 参见《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92年),有关回教的统计。
3. 参见张志诚:“台湾的穆斯林/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社团”,《阿拉伯世界》(季刊),1990年第1期。
4. 参见黄陵渝:“台湾伊斯兰教”,《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1期。
5. 请参考林松:“海峡彼岸信息新成果,港台教亲争相传”,《阿拉伯世界》

1992年第4期。

6. 同注4。

7. 台北《中国回教》杂志,第215期,第26页。

第六章

一 贯 道

一、历史与现状

一贯道原是流传于中国大地的一种封建“会道门”，由山东人王觉一在清代康熙年间创立。王继承了江西人黄德辉的先天道，并加以改造，独树一帜，也称天道。而“一贯道”的名称则是其继承人刘清虚取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意义而定的。刘之后传位给路中一，他再传给张天然，张是一贯道的最后一代祖师。其主要教义有三教（儒、释、道）合一；信奉主神“无生老母”，全称为“明明上帝无量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也简称为“明明上帝”“无极老母”“瑶池金母”等，认为无生老母因世界无人类，为繁衍人种，乃命其众多子女（原子）来到人间，行前付以八宝，即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嘱任务完成后速返真空家乡母子团圆（龙华会）。但诸原子下凡后迷失了本性，忘了回乡大道，故老母派弥勒佛下凡度 92 亿原子，并以三教诸圣仙佛协助度化。一贯道的活动场所称为“佛坛”，道徒吃斋，仪式有度原子回乡、龙华会、对信徒点传等。解放前，一贯道以山东为大本营，并在华东、华北、东北、华中等地广泛流传。

在一贯道第十八代祖师张天然掌教时，他自称师尊，其妻称师母，下分宝光、基础、法一、文化、金刚五组，每组由一位道长负责，分赴各地传教。在各组道长之下有前人、前人之下是点传师。1947年张天然在成都去世后，一贯道由师母孙慧明接掌，这样在一贯道内部就分成两派，一是随师尊学道的，一是随师母学道的。一贯道内部派组众多，成分也很复杂，抗战时期就有一些支线在敌战区与日伪政权勾结，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效力，张天然本人也出任了汪伪政权的“外交部参事”，所以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大陆解放后，一贯道作为反动会道门被镇压，孙慧明逃往香港。

台湾的一贯道是在光复后不久由大陆直接传入的。据说，一批来台传道的是苏秀兰、郑德祥、张德福等四人，接着是孙路一、陈文祥、张培成、刘彩臣等人。他们先学习闽南语，以消除语言障碍，再深入民间传教，最初在中南部农村传道，信仰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下层人士。一年之后，在台北、苗栗、布袋、北门、台南、苑里等均有一贯道的道徒。不久，华东地区如江苏、上海、宁波、天津一贯道的“基础坛”“宝光坛”和天津的“文化坛”的道徒分别到台湾传道，先后在台北、台南建立了佛坛。不久，组成了“基础”“宝光”“慧光”“明光”“紫光”“文化”等支线。1947年东北解放后，来自长春、哈尔滨等东北一带的一贯道徒也辗转来到台湾，后发展为“兴毅”“安东”“天祥”三支线；1949年天津解放后，一些天津总坛的“法一”“浩然”等坛也传到台湾。因一贯道“天生老母”的信仰与台湾原有斋教的一支龙华派教义相近，又提倡素食，故传播较快，并按斋教的习惯将佛坛改称为“佛堂”，坛主改称“堂主”，甚至一贯道也被称为“天道”，并由三教合一发展为五教（儒、释、道、耶、回）合一，及至万教合一，以至于后来逐步取代了斋教，在台湾广泛传播。

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后，一贯道在大陆的各组和支线更纷

纷传入台湾,如基础组、发一组、宝光组、明光组、慧光组、紫光组、常州组、安东组等,道徒也大幅度增加。不过,传到台湾的一贯道各组大多属于师母派,只有一小部分是尊师派。一贯道在传入台湾的最初,注重在社会的下层发展教徒,并提倡素食,但为了补充营养却允许吃鸭蛋,所以被民间俗称为“鸭蛋教”。另一方面,一贯道组织系统严密,且活动诡秘。1953年2月12日,台“内政部”引用“查禁民间不良习俗”的办法,将一贯道列为邪教,予以查禁。1958年4月19日,“内政部”再度下令,取缔一贯道。到1963年,对一贯道的取缔政策更变为严厉扫荡,其道徒也经常与台警方发生对立。为此,该教领袖陈志浩、张培成与郑邦卿等人便联名在《新生报》上刊登声明,要求一贯道的道徒自动解散。同年6月10日,宝光、基础、发一、文化各组的领导人,也分别宣布自动解散。但该教一直没有停止活动,一部分佛堂加入了合法的道教会和佛教会,有的还与轩辕教结盟,而更多的是长期坚持秘密传教。1963年底,一名一贯道的负责人与另两位道教领导人共同筹组了台湾省道教会,获得台湾当局允许登记,次年6月14日,“台湾省道教会”在《中央日报》上刊登启示,呼吁一贯道的信徒归回道教会。很快,就有大部分的一贯道佛堂加入了道教会,其余小部分则加入了佛教会,宝光组陈志浩支线则依附于轩辕教。当时,全台的一贯道共有佛堂490处,前人19名,点传师132人,堂坛主350人,道徒约5万,负责人陈志浩称“司纽”,而实际的领导人是郑邦卿¹。

据台湾“警备总部”于1971年编印的“为什么要查禁一贯道”的“○八一五号文件”中所述,取缔一贯道的理由共五条,一、妖言惑众,腐蚀群众心理;二、作奸犯科,从事不法行为;三、操纵教徒,干扰地方选举;四、邪行诡异,败坏善良风俗;五、为共产党利用,掩护“统战”活动。另外,台湾的儒、佛、道、耶、回五教人士还曾联手出版了一本《中国邪教祸源考》,认为一贯道与中国历代阴谋造反的

邪教同出一源。1976年底，台警方逮捕了台南宝光组的领导“前人”王寿，以叛乱罪移交军法单位，但因罪证不足，判三年感化教育。然而，即使如此，一贯道仍屡禁不止，并随着台湾经济的繁荣，社会问题突出，道徒的数目也大幅度增加，新建的大庙日益增多，到80年代初就有50多间，但仍以家庭佛堂占多数，所有的公开的庙宇也均加入了各地佛教会或道教会。另一方面，在信徒结构上，从1968年起注重吸收大专学生及知识分子入道，以提升一贯道徒的文化素质。日后，这些知识分子便成为一贯道组织的骨干，同时也影响了大批的官宦及商人入道，改变了以往一贯道仅吸收下层人士入道的形象；在信仰方面，也注意将外人攻击的属于“巫术”的扶乩等迷信仪式逐步放弃，如基础组、宝光组、发一组等相继放弃这类仙佛灵验的仪式，而开始注重研究经典及训练人才。就这样，一贯道多年来反而势力大增，连国民党当局的一些重要人物也被发展为“道亲”，如国民党前“中央社工会”主任萧天赞、原“内政部”部长吴伯雄的夫人及一些“立法委员”等。一贯道的“前人”张培成就曾告诉记者说，“他们抓，我们就暂时停止，等情势松了再传，谨慎一点就是”²。这也正说明了一贯道在台湾多年来一直在地下状态仍有很大发展的原因。实际上，到70年代后期，一贯道要求登记的呼声不断加强，社会各阶层对一贯道的看法也在逐步改变。1978年10月高雄地方法院推事苏鸣东编著了《天道概论》一书，介绍了一贯道，引起了“中国佛教会”及“中国孔学会”的反对，这是首次公开向台湾社会公众正面介绍了一贯道；1980年他又向“行政院”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将一贯道尽快合法。后来，又有“国大代表”王兰的调查报告，建议当局使一贯道公开登记。迫于各方的压力及本身的实力，一贯道此时在台湾已处于半公开的地位。

相反，一贯道数十年来始终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对国民党可谓百般顺从，甚至在教义上除自己教内的传统外，常强调所谓“尧。

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一道统，经由国父和先总统（蒋介石）而传至蒋经国先生”云云。此外，一贯道还大张旗鼓地为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候选人拉票助选，以表忠心。因此，早在70年代，地方上的政治人物与一贯道就开始了一些接触，到1980年台湾进行“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时，双方的关系就已非同一般，到了县市长和省议员选举时，部分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还亲至一贯道的道院，要求给予支持；1986年新当选的“立委”中至少有13位直接得到了一贯道的有力支持才能入选。而另一方面，在1971年后，台湾的国际政治环境突变，一贯道趁机复出，在大专学生中间传道，进行礼仪等训练，吸引知识青年入教。80年代以后，一贯道信徒加速了为争取合法化的步伐，纷纷投书报刊，针对外界批判一贯道诸如“教义斜而不正”、“裸体膜拜”、“对政治有不良企图”等提出解释与说明，努力争取大众的理解与认同，使道徒剧增，有些道徒还跻身于社会的领导层，甚至被选为“中央民意代表”。据估计，到1983年时其道徒总数就已达50万，而受其影响的人更广。因长期不能向台湾当局合法登记，一贯道内部发生了分化，1986年底，教内新生代廖木贤等人开始筹组“一个护持真理的卫道协会”，标榜“以道为经，以德为纬，联手组成一个大公无私的中介集团……”，这一举措引起一贯道老一代领导人的忧虑。但一贯道中还是传统派占绝对优势。80年代中20多位处于领导层的“前人”里，只有一两位后继者是台湾本省人，其余全是外省人士，他们在政治上反对台独。而另一方面，在一贯道的高层领导中，也有很多是当初国民党派进去作为渗透的，日久、天长他们却迷上了一贯道的教义，成了该教的道亲，他们更不愿一贯道与台湾当局分裂，极力扮演双方和解的桥梁。

鉴于一贯道在台湾的庞大势力，使台当局不能不视而不见，同时因国民党的统治内外交困，也不得不在选举中依靠一贯道信徒的支持。例如，曾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台“中央社工会”主

任的萧天赞，就曾依靠一贯道道徒的支持以最高票当选为“立法委员”，他本人也加入了一贯道。1983年2月由“国大代表”裴鸣宇领导的一贯道分支“中华圣教会”更直接向台湾“内政部”申请登记，但遭否决。原因是当时台湾当局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一贯道内部还有种种矛盾等，便责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宋光宇作两年的调查，于1983年提出一个长达200多页的报告，详细地、论证了一贯道以往在台湾发展的成因，以及遭取缔的原因，终于改变了台湾当局及社会上一些人对一贯道的看法。另一原因是，1986年因成立了反对党民进党，国民党的统治地位面临新的挑战，当局不得不在政治上逐步解严。在1987年新年过后，40名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联合“呼吁迅准大道之立案合法传布”，使之成为“拥戴政府的资源”，这其中的若干名“立委”就包括领衔提出质询的萧天赞。1987年1月13日，台“内政部”宣布对一贯道解禁，使它成为台湾当局宣布解严后第一个改变非法地位的民间团体。但禁令解除后，立即引起一贯道内部的分裂，“师母派”与“尊师派”为争夺“正统”地位开始互相攻击。

据台湾《联合月刊》刊载的一贯道解禁之初时各组派系的情况，现转载如下：

组别	负责人	重要庙宇	规模
基础组	张培成	总堂在台北先天道院，另在	点传师300人
	黄自然	桃园有天真道院	
文化组	周益深	总堂在台北古亭区	点传师数十人
	王树金		
	孙路一		
浩然组	梁华春	桃园育德讲堂、树林慈恩宫、	点传师数十人
	金宝璋	新竹玉皇宫	
天祥组	刘懋忠	新竹明伦讲堂	点传师20人
宝光组	陈文祥	新店大香山慈音岩、佛山观	点传师数百人

	施庆星	音岩、台南玉井宝光圣堂	
	周素玲		
	王 寿		
	侯伯虎		
发一组	祁玉镛	木栅天恩宫、三峡济公庙、	点传师数百人
	刘振魁	清水观音堂、斗六崇修堂、	其中以陈鸿珍支线
	张玉台	草屯灵隐寺、屏东慈法宫	的大专生最多
	陈鸿珍		
	崔盛德		
兴毅组	何宗浩	有公共佛堂百所	点传师数百人，是信 徒最多的一个组
	薛福三		
正义辅导组	张德福	台中三佛院	
	(尊师派)		

注:其他还有一些较小的派组,如金光、慈光、紫光、常州、安东、天津等组,另有自称第十九代祖师的中华圣教,但不被承认;各组的名称大多仍延用在大陆时期佛堂的名称³。

1988年3月5日,一贯道在接受国民党的“指导”后,将全省各组、各坛的道亲串联起来,在台北宣布正式成立了“一贯道总会”,并声称代表了台湾93%的道徒,“基础组”的70岁“老前人”张培成被选为第一届理事长。在成立大会上还确立了一贯道的宗旨为:敬天地、礼神明、孝父母、重师道、守信义、和乡亲;其主要教义为“以儒家思想为主,实行纲常伦理,己达达人,己立立人,修心养性为主,弘扬中华文化,遵守五伦八德,启发善良本性,安定社会为副”。不过,以郑邦卿为首的“尊师派”的一贯道徒,以“一贯道佳音中心”的名义在报上发表声明,反对成立总会,“独揽本教法律地位”,更反对“孙师母曾继承道统,执掌天命”的说法。虽然,一贯道总会在台湾只是起到联谊的作用,但代表了台湾大多数一贯道支

派。1990年9月2日,由总会出面,组织了盛大的庆祝“师尊、师母传道60周年”的纪念活动,邀请了海内外3000多信徒参加,这也是白一贯道在台湾解严后首次公开的大型纪念活动,台当局一些政要也应邀出席了纪念会,会上“老前人”韩雨霖在致词中一再强调“道徒要以正心修身为本,阐扬一贯道的修道精神,并以实事求是主张为世界和平努力”⁴。一贯道被解禁后,成为台湾国民党在日益激烈的政争形势下可资支持的一股强大的势力。1989年底台湾三项公职人员选举时,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宋楚瑜就曾亲自到一贯道大会上去拉票,结果立委中有10余名是靠一贯道的支持才当选的。

日前,一贯道在台湾有14个组,其下有18个分支,大多属于师母派。每一分支都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教团,即由前人、点传师、坛主、讲师、办事员、三才、道亲等组成,可以独立办道及传道。前人,是开创分支的领导人;点传师为代表祖师点道传法的人,新人入道都要由其主持入道仪式,授予三宝;坛主即佛堂的负责人;讲师是向道亲讲经说法的人;办事员是佛堂协办教务之人;三才即天、地、人,是一贯道举行法会时与仙佛沟通的三个扶乩的人。另外,在前人之上,还有老前人、道长。老前人是指在他辖下有人出去开创分支,而他则成为前人的资深前人;道长则是传道数省、建有大功的元老,此职须由祖师授予,台湾现只有一位被尊为道长者,即已90多岁的发一组老前人韩雨林。各派组的发展规模,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大的包括张培成的基础组支线、陈鸿珍的发一组(原法一坛)支线、宝光组王寿支线、吕树根和王耀德支线、兴毅组何宗好支线;中型的有浩然组陈耀菊、梁华春支线等;小型的包括文化、金光、明光、慧光、紫光等组。其中,以兴毅组道徒最多,自称有60万,并且与台湾企业界结合最为紧密,势力也最大,许多大企业家、大老板均是该组的道亲;其次为发一组,自称30万道徒;宝光

组自称有20万;基础组则号称有10万信徒。另据《亚洲周刊》1990年8月5日的报导说,一贯道在台湾的民间宗教中人数居首位,到1990年中,“参加一贯道入道仪式的至少有四百万,其中经常上佛堂的虔诚信徒至少有一百万。至于在海外,包括日本、南韩、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印尼、香港等国家及地区的道亲大约在二百万以上。”显然,这些数字有很大的水分,甚至也大大高于一贯道各组所公布的数目。但因一贯道长期以来处于“地下”活动状态,有许多还加入了佛教或道教,所以其道徒的数字难以统计。而据“一贯道总会”的估计,在解严之初约有50多万信徒⁵,这一数字比较可信。另外,由于一贯道主张不受供养,商教并重,道亲均须自食其力,从事工商业谋生,故一方面发展为一个名为“商贸合一”的经济模式,而另一方面也将其教义扩散到企业阶层,使一些大企业的管理哲学深受其影响,台湾主要的航运企业长荣集团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据称,长荣海运董事长张荣发曾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场合强调,他今天小有成就,是因为笃信天道(即一贯道)。其员工也在他的影响下常去听道,并设立了近百坪的道场⁶。发一组是吸收大专学生最多的一支,到80年代末,全台各大学几乎都有该组的成员,并在每一大学里附设“伙食团”,让信道的学生共同住在一起,吃素、读经、习道,全台共设置了90多个伙食团,入道的学生有四、五千人。据称,因一贯道提倡素食,台湾90%以上的素食店均为一贯道的信徒所开。

与大陆传统上的一贯道相比,台湾当代的一贯道有很大变化,如打破了只在家庭设立佛坛的规矩,而在各地兴建了数十座庙宇,佛堂更以万计,向社会开放,并宣扬不敲打念唱、不画符念咒、不烧纸、不迎神等,给人以不同于一般迷信及会道门的印象;另外,在台湾一贯道的神祇中,将济公的地位提升得很高,尊他是无生老母派来掌理教务的祖师,并相信师尊张天然就是济公的化身,还尊弥勒

为祖师，而事实上，无极老母才是一贯道的主神，认为它是天地万物的真源，但因是无形无象，所以在一贯道的佛堂里仅设一“明明上帝”或横写的“母”字。在一贯道内部，男女道徒界线分明，男称乾道，女称坤道，分列两侧，烧香礼佛时，先由乾道礼拜，之后坤道才可上前，没有一般寺庙里男女并列拜佛的情形。亦商亦教的发展策略，不但使兴毅、法一、宝光等支线在台迅速扩张，也使得这几支派的基本信徒的成分发生了根本改变，从下层百姓，升为中上层社会的教门，其中不乏有大企业家、大商人，也有众多的白领阶层及知识青年加入。台湾一贯道中妇女的地位较高。到80年代末对一贯道解禁时，道徒中主要以妇女及老人居多。这些女性道徒中，最初是农村妇女及工厂的女工占多数，近年来更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在18个支派中，女性主持道务者较多，尤其是点传师几乎均为女性，她们被称为“姑”，还有许多坛、宫，都是由女讲师带领妇女信徒们读经的。此外，女讲师可以公开传道，并宣扬尊重男女平等。而在台南更有一些由一贯道教徒开办的工厂明确提出要照顾女工。传三宝及扶乩是一贯道内的主要宗教活动内容。“传三宝”即是由点传师为求道者点“玄关”在入道者两眉之间一点，授“合全印”、传“五字真言”。“三宝”是一贯道最珍贵的“真传”与“法宝”，是天人合一的桥梁，可据此“断轮回、返本还原”，所以被一贯道徒视为“天机”，决不可外泄；而“扶乩”并非一贯道所独有，民间信仰中也常借助它，但乩文内容因历史上常与政治相关，给一贯道带来诸多麻烦，如今更被有些人视为迷信或巫术，所以，一些大的组派已放弃行“扶乩”。

据台湾《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92年的数字，一贯道在全台建立了64座庙宇，道徒总数为878,710人，传道人员有118,620人，已成为台湾仅次于佛教与道教的第三大宗教，占有宗教徒的8.46%，多分布在云林、彰化、桃园、台南、嘉义等地；另外，各地的一

贯道派组也积极投入社会生活，开办了各类的社会服务事业，以发挥其社会的影响力，同时也开始塑造新的社会形象，如办有 34 所幼稚园、3 所养老院、21 家医院、30 家出版社，出版 1 种年刊、3 种季刊、23 种月刊、1 种周刊和 4 类其他刊物。兴毅组还成立了台湾一贯道自总会设立以来的第一个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开办这些众多的社会实业，说明一贯道在台湾有着相当的物质实力。据台湾《财讯》1992 年 4 月 30 日发表有关台湾各宗教财富排行榜上，台湾一贯道无论在收入或是在地产方面均位居第五，1991 年的全年收入达新台币 6,049.2 万元。

在国际联系方面，台湾一贯道近年来也有较大发展，来自台湾的华侨道徒将其教义传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目前以日本、南韩及东南亚地区及国家的信徒最多。1990 年 4 月，“发一组”在泰国斥资兴建一所“天道大学”，韩雨林亲赴泰国出席奠基礼，估计泰国现有道徒十万，佛堂在 300 以上；“兴毅组”在南韩建立了“孔孟圣道院”，据说当地的佛堂也有 300 多，道徒多达 60 万；日本在 40 年代末就已传入一贯道，如今据称有上百座佛堂，70 多万道徒；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也有许多道徒，估计在 20 万以上，当地许多素食餐馆都跟一贯道有关；另外，印尼、缅甸、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巴西等国的华侨中也都有一贯道的道徒⁷。据一些资料表明，台湾一贯道在海外大多采用投资或义诊的方式来进行，若在天主教地区，则要采用天主教的方式传道。

二、一贯道的寺庙

一贯道因长期处于取缔、禁传状态，其寺庙也大多归属于佛教或道教，佛堂的数目并无确切的统计，估计达数百个。但一贯道禁而不止，在佛教与道教的掩护下继续传道，所建的庙宇单从外表上

来看与佛、道并无多大差别，所以教外之人并不知这些就是一贯道聚会的庙宇，其主要区别表现在布局上将佛堂一定要放在顶层。到1992年统计，全台已公开登记为一贯道的寺庙共有64间，如先天道院、全真道院、天恩宫、天元宫、元德宝宫、明善寺、华山至堂、宝光圣堂、新店大香山的慈音岩、南投的灵隐寺、台南的天帝圣堂等等。寺庙内部在公开之前，其陈设与一般的佛教与道教寺庙有一定的差别，如在下层的布置与民间信仰接近，供奉弥勒、观音与济公等，但在佛堂里的布置就颇具特色，如在供桌上摆放有佛灯及茶杯，在正中挂有一横写的无极老母的“母”字，这代表了一贯道主神的牌位。

由于缺乏资料，这里无法详细介绍一贯道的主要寺庙。

三、主要组织

1. 一贯道总会

1988年3月5日在台北新店大香山慈音岩举行成立大会，自称代表了台湾93%的道徒。张培成被选为第一届理事长，并设常务理事25名、常务监事7名，任期三年。该组织成立的章程中指出，“以复兴中华文化、宏扬儒家精神，达成天人合一为目标”，并要“联合各宗教，共同促进社会和谐，兴办社会公益，及教育、文化事业，协助政府推行政令，及配合政府从事社会风气的改善”。总会负责该教的会务、会员与会费，而道务、点传师及公德费则由各分会自行处理。总会以会员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则是执行机关，理监事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任期三年；还聘有顾问，并设置了各种委员会。出版传道刊物《天道世界》，该杂志社社长为康宝善，发行人为邹炯俊。1991年一贯道总会改选时，李玉柱当选“总会”秘书长。在1994年台湾举行的宗教关怀“国际家庭年”的系列

讲座中，李玉柱曾谈台湾一贯道的传道宗旨，一是要长保善良之心，迈向家庭温馨、社会祥和；二是要充实生命，重视人间三才之一的德才；三是应具备进取精神；四是拥有关怀慈爱的胸怀，多积善行。

2. 兴毅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

这是台湾一贯道18个支线中兴毅组所设立的一个社会慈善事业，它也是自“一贯道总会”成立以后开设的第一个慈善基金会。正式成立于1993年，秘书长为江朝松，其服务的主要项目包括举办或捐助老人、儿童、残障福利事项等12种，初期以中医义诊、急难救助、老人福利、生活辅导及宣扬伦理等五项工作为主，会址在台北市师大路，是一幢六层楼的建筑，全部为道徒们捐献所建。

3. “中华圣教”

在一贯道解禁后不久，大部分的派组参加了“一贯道总会”，但另有一部分的尊师派一贯道教徒却反对“总会”的成立，指其为“旁门左道”，自称为正统，并另以“中华圣教”的名义在台活动。1992年6月在台中县的后里乡举行了“中华圣教筹备会”，拟向台湾“内政部”登记为宗教法人。但此派人数较少，力量也较弱。

四、代表人物

韩雨林 他是当年将一贯道由大陆传至台湾的、目前道内辈份最高、年纪最大的一位道长，已90多岁。1948年抵达台湾，原属天津“发一组”成员，未入道之前，是一家制染厂的老板。到达台湾之后，他一面经营小生意，一面传道。在他的领导下，“发一组”在台湾各地发展很快，目前成为各支线中吸纳知识分子最多的一支。他还经常到海外传道，将“发一组”的势力推广到世界。他主张一贯道应奉行中国的传统道德，一贯道的组织也应与政治相分离，

至于政党在选举中拉道亲投票，则是道徒个人的事情。

张培成 上海人，1943年就加入了一贯道，1946年到台湾，曾担任台湾地区一贯道各组之间的副联络人，他所在基础组较大的佛堂以“先天庙群”名义加入了道教会，1963年他本人则参与发起了“中国道教会”的成立，并出任常务理事。1988年3月，被选为“一贯道”的第一任理事长。

张荣发 为台湾最大的航运集团长荣海运公司（长荣）董事长、一贯道“兴毅组”的理事、点传师。他在1968年以一艘二手货船创业，在20多年间发展到拥有载运量达13万只标准货柜的船队，成为台湾的巨富之一。他认为其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以一贯道为精神支柱，以至于在长荣的总公司和各处的分公司都设有一贯道的佛堂，每星期还聘请一贯道的讲师来讲道。据说，在长荣集团5,000多名员工中，有一半是一贯道的道徒，这多半是由于张荣发个人提倡一贯道的结果。但是，一贯道保守的一面也在长荣企业中体现出来，如采用上层实施权威式的管理，属卜要绝对服从等。

刘心玉 现任《一贯道总会会讯》的总编辑。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曾在台“法务部”、法务通讯社、《中国时报》等处任职，在台湾的法律界及新闻界有一定的名气。在他担任《一贯道总会会讯》的总编后，注重研究和传播一贯道的教义与教理，从正面去扩大一贯道的社会影响力，努力改变社会公众对一贯道的传统看法。

五、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台湾政治上的解严与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台湾一贯道的发展过程可说是“历经沧桑”，从被视为“匪谍”、“叛乱团体”，到可“教化社会”、“帮助政府办好选举”，甚至成为国民党“社工会”可获得支持的“铁票”，这对台湾一贯道来讲，不能不说是一

个戏剧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从帮助国民党的候选人参选、助选开始的，它显示了一贯道的实力与策略改变，使台湾当局自此对它再不敢小觑。如今，一贯道的势力不断增长，并已成为台湾主要的宗教及民间团体，而且，其道徒遍布台湾社会的各个阶层，可上至达官显要、中到企业家、学者等，下至农工阶层。近年来更积极地注重在大专青年及知识分子中间传道，例如，仅发一组在大专院校举办的每周一次的讲习会，参加者多达四、五千人以上。可以说，台湾一贯道已渐渐地将一贯道民间的低下色彩抹除，而日益将其提升为以中产阶级人士为主要信徒的宗教。一贯道在台湾之所以能有数十万人的道徒，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它集儒释道三教于一体，甚至还吸纳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某些教义，其宗教观念及信仰方式可以迎合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需要；二、标榜奉行儒家文化，坚持中国传统，这不仅可获得台湾当局的肯定，而且对海外的华人也极具吸引力；三、一贯道的教团组织皆由俗家人士构成，道徒可不必出家，还可结婚生子、经营各自的产业，这样并不影响世俗的生活，甚至还可促进信徒的事业；四、行“秘传三宝”“扶乩”等特殊仪式，可借神秘的力量来对信徒产生很大的感染力，这也是其他宗教在历史上所使用过的，一贯道在现代社会里仍借助这一形式，并且成为传道的一种重要仪式，同时也说明了对“灵验”“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深信不移仍是当今台湾许多人的一种心态。

另一方面，台湾一贯道的发展也遇到了许多阻力，主要是传统的宗教团体如佛教与道教对它的攻击。因为，原寄身于佛、道教名下的许多庙产一旦登记独立，归属于一贯道之后，势必影响了佛教与道教的利益，遭到二者的强烈反对。如佛教批评一贯道“教义杂驳”“违反道统”，大量引用佛教经典，却自有一套歧异的解释，等等。而据了解，目前一些建筑规模宏大的庙宇，表面上属于道教，实

则是当年一贯道徒所建。另外,其教义大肆宣扬各教归一,并借各教经典以印证其道,这也遭到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等各方的批判,因其“归一”的终点在一贯道本身,这是各宗教所反对的;更有甚者,有的庙宇里供奉着“穆罕默德像”,还自称是弥勒信仰的正统,称一般佛教为“过气”的宗教。鉴于台湾各大宗教对一贯道的反对,台湾当局也对其迅速膨胀的势力开始担心,故有时着意冷落它。李登辉上台不久召见台湾各宗教团体的代表座谈时,唯独没有请一贯道的代表。面对各宗教的非难与台湾当局的冷落,因其有强大的社会力量,似乎并没有放在眼里,反而用抵制选举、游行、抗议来要挟。此外,一贯道内部自解严以来,各派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如属于尊师派的一贯道系统不承认“一贯道总会”的代表性,还有其他派组也没有参加“总会”。内部组织涣散,各派组之间、同组内的分支之间都少有来往等。总之,内外的阻力将会影响台湾一贯道的发展,再加之其教义理论的不完善,至今没有一部自己的经典,有些派组仍因循守旧,并举行秘密结社、行“开沙”“借窍”等巫术,这些均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宗教要素,因此,其暂时的发展势头,也将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

随着两岸民间交往的不断发展,台湾一贯道徒也曾多次以各种途径到大陆或旅游、或探亲,有的还投资办厂。有些一贯道的教务人员来大陆借探亲及旅游之机搞非法传教,私设道坛,或散发一贯道的道书及表文等,这是中国政府所不允许的。也是影响两岸人民正常交往的行为。

注释:

1. 蔡相辉:《复兴基地台湾之宗教信仰》(台湾)华侨协会总会主编,正中书局印行,第91页。
2. 见《亚洲周刊》1990年8月5日:“神秘教派重见天日”。

3. 参见台湾《联合月刊》1987年3月：“解铃还需系铃人——一贯道是如何‘改邪归正’的？”
4. 台湾《联合报》1990年9月3日报导。
5. 参见《宗教工作基础知识》，中国旅游出版社，1991年，第578页。
6. 李达编：《台湾宗教势力》一书，第75页。
7. 同注2，第32页。

第七章

其他教派

一、天帝教

这是台湾正式登记的 12 种宗教中成立最晚的一个,由曾任台湾“立法委员”的李玉阶于 1980 年正式创立。

李玉阶生于 1900 年,“五四”时期曾在上海参加学运,是上海学联的负责人之一;北伐战争时曾为北伐军做联系杜月笙的工作,以后到财政部任宋子文的机要;曾出任西北盐务管理局西北四省的总视察、“财政部”特派员等职,并起草了中国第一个税务法案。据称,他曾在南京拜天德教教主萧昌明为师,成为其首座大弟子,1937 年 7 月还曾到华山修炼,1942 年写成被后来称作天帝教教义的《新境界》一书(原名为《新宗教哲学思想体系》)。1949 年他随国民党一起到台湾,于 1950 年创办《自立晚报》,1962 年退出报社。到 1980 年冬,他宣称正式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天帝教,1982 年春获准自由传教,但直到 1986 年 7 月才经当局核准登记为财团法人。另外,他还是台“立法委员”、兼“宗教哲学研究社”的理事长。

天帝教将其教主尊为“天帝”,即“中国古代及整个人类共同信

仰的上帝”，而人间不设教主，创教人李玉阶是“驻人间首任首席使者”，负责教务；每个教徒都有教名，相互称“同奋”，即共同奋斗之意。该教宣扬它与宇宙相始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圣均是天帝教各代的教主，所以，天帝教徒仍可信奉原来的宗教。该教强调先尽人道再修天道，救世度人，性命双修；还宣称其最高理想是实现天人大同，而走向天人大同必须先实现宗教大同，而后达到世界大同，所以宗教不分儒、释、道、耶、回等，都是一脉相承的；人通过立功、立德、立言就可成神，所有的神也是人修成的，因而可达“凡圣平等”；但要实现“凡圣平等”，人们还要经过三种奋斗，一是向自己奋斗即自我修持，二是向自然奋斗即征服自然，三是向天奋斗即向神要求平等地位。

在组织系统上，天帝教的机构称为“教院”，共有五级，最高为“始院”，设在台北市，并作为全球的弘教中心，次为洲级的“统院”，再次为国级的“主院”，再下为省级的“掌院”，最低是县级的“初院”。到1990年时，天帝教有2个主院，一为“中华民国主院”，位于台中市，一为日本主院，设在日本三重市，这是李玉阶于1983年8月亲自到日本传道时设立的；掌院有3个，分别是台湾省掌院、台北市掌院和高雄市掌院；还在台南市、县、桃园、彰化、花莲、宜兰、台东等地设有12个初院。1987年李玉阶到美国弘道时在洛杉矶设立了一所初院。该教将其基层活动场所称为“堂”，在台湾有11个堂；另外还在台中县清水镇青云岭设有培训教徒的最高训练中心，被称作“天极行宫”或“极院”，也是其“首席使者”驻人间行使职权的最高机构。另外，在南投县的鱼池乡镡力阿建有修持圣地。信徒皈依该教后，仍可保留原有的信仰。教徒平日的功课有反省、忏悔、祈祷、及填写奋斗卡等，各教院及堂每周还要举行亲和集会，每年在天极行宫分期传习“正宗静坐”。

天帝教自产生后即得到台湾当局的大力扶持，有着浓厚的政

治色彩。其教主李玉阶本人是国民党的“立委”，并且与蒋氏家族关系密切。另外，在天帝教的教院里不挂神像，却到处挂满了孙中山、蒋介石和蒋经国的画像，并称天帝封孙中山为“中山真人”，封蒋介石为“中止真人”，让二人“长期执行”反共任务，“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¹。1990年初，台湾“总统”选举时，李玉阶以天帝教的名义在《中央日报》等几家大报上刊登整版的广告，宣称“天帝”已下令全力支持蒋经国参加竞选。因该教一贯的政治倾向而被台湾的一些学者斥为“反共宗教”“国民党的外围宗教”，同时也是“一政治野心极强的台湾新兴宗教”。

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与两岸交流的日益发展，天帝教的教徒也借各种方式到大陆探亲、旅游或参观，对大陆的情况有了切身的了解，其反共的声势表面上有所减弱。李玉阶还捐资25万美元作为“统一奖学金”，用以“援助”在美国的大陆留学生；云南发生地震后该教还捐赠了许多药品，并派专人运往昆明。1992年8月21—24日，其骨干分子组成一代表团参加了在西安召开的“海峡两岸道家思想与道教文化研讨会”。台方参加者共有25人，其中天帝教信徒约占一半。代表团的团长李子弋即是李玉阶的儿子，他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中华宗教哲学研究社”的理事长，曾于1989年5月来大陆访问，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介绍了一些有关“天帝教”的情况。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均是大学教授或“中华宗教哲学研究社”的成员。

1990年天帝教教徒达数万人，大部分为台籍人士，且70%以上为中青年人，其中知识分子占有很大比重。1993年5月，“极院系统”正式设立，包括台中县清水镇的天极行宫、南投县育池乡的镡力阿道场及天安太和道场等。另外，还设有天人研究院极忠文教基金会、帝教出版社和教讯杂志社，并主办“中华民国宗教哲学研究社”和“红心字会”慈善机构。到1991年底的正式统计，天帝教在

台湾登记的“堂”有35所,神职人员有17名,教徒有114,000人,设有一所大专院校,发行2种刊物及其他上百种的书刊²。作为一种新兴的宗教,天帝教坚持崇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道德,在台湾扩展其影响力,尤其是在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中间,另外与台湾其他奉中国传统道德及文化的宗教如天德教、理教、道教等也不断加强联系,并积极向海外发展势力。

二、巴 哈 伊 教

“巴哈伊教”在台湾又被称为“人同教”。原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在翻译该教的著作时,因其主张人类一家,世界大同,而将其名称译为“大同教”。该教在1947年传入台湾,亦被称为“巴海大同教”,但很少为人所知,教徒也很少。1949年一位赴美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皈依了巴哈伊教,后回到台湾定居。1954年原在上海定居的伊朗籍苏洛曼夫妇来到台湾,于当年的10月22日抵达基隆港,正式在台湾传教。其实在他们来台之前,已有一些外籍的巴哈伊信徒先后在台湾经商或做长期访问,约有10位信徒散居在台北、台南、桃园、左营和嘉义等地。苏洛曼夫妇定居在台南,并开始传教工作。到1955年,巴哈伊信徒已达21位,1956年在台南建立了台湾第一个巴哈伊教地方灵体会。这些早期的台湾巴哈伊信徒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的还是在美国受过军事训练的空军军官。他们还派人参加了东北亚的区域教徒代表大会。后来,许多有关巴哈伊教的书籍在马来西亚和台湾被译成中文出版,以吸引更多华人入教。1957年东北亚总灵体会成立后,台湾的巴哈伊教事务即归属于它的管辖之下。同年9月28—30日,在台南举行了首届台湾巴哈伊夏令营活动,来自台北、台南、左营和嘉义的近20位教徒参加了活动。1958年,又成立了台北地方灵体会。但因教徒的流

动性较大，使台湾巴哈伊地方灵体会组织极不稳定，且发展缓慢，到1958年4月，全台只有22位教徒。1959年10月台南巴哈伊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该中心是苏洛曼夫妇捐资建筑的，大大促进了巴哈伊教在台湾的发展。

据1965年4月的统计，全台的教徒有100人，分别散居在25个地方。另外，每年通过举行夏令营来吸引青年人入教，还向山地民族传教。一年之后，即1966年4月，屏东与花莲的地方灵体会相继成立，此时全台共有4个地方灵体会，教徒人数共有485人，其中青年人占有一半的比例。1967年“台湾总灵体会”在台北成立，会址设在台北市新生南路的一幢大楼内，但未获得台当局的承认，此时，全台教徒人数近500人。在1970年巴哈伊教在台湾完成社团法人登记(当时以大同教登记)，成为当时全台九大合法宗教之一，并曾在林口乡获得一处拨地，作为建造“灵曦堂”的堂基。1972年，台湾巴哈伊出版社成立；次年巴哈伊婚礼的法律效力也得到台当局的承认。自此后，巴哈伊教在台湾稳步发展，新加入者多为大学生。

巴哈伊教信徒的生活原则为“工作就是崇拜，服务就是祈祷”，信徒每日祈祷，每年斋戒19天，要以礼待人，保持清洁，教育儿童，效忠政府并服从当地的法律，重视婚姻及家庭生活，禁止赌博、饮酒、乞讨、使用暴力、说谎及偷窃。但不设专职的传教人员，每位教徒都有义务传教。

到1985年，台湾的巴哈伊教徒数已达千人，地方灵体会会有20个。从1986年开始，巴哈伊教在台湾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另外，在台北的总灵体会内，台湾的巴哈伊教徒经常举行各种聚会，其信徒大部分是中国人，还有来自美国、伊朗、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教徒。1987年时，“总灵体会”下辖21个地方灵体会。另外，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屏东及花莲设有6个中心，教徒的活动点有150多处，

教徒有2,310人³。到1990年时全台有26个地灵体会。各地的地方灵体会每年要举行一次选举,所有的成年教徒均可参加,选出九位委员;每年的4月21日至5月2日间还要举行台湾总灵体会的九位委员的选举。

巴哈伊教没有专职的传教士,但传教是每个信徒的义务,在台湾还设有“宣教委员会”,并于1988年11月,在台北召开了总传导委员会的研习会,探讨如何利用多种方式传教。1990年围绕其“天下一家”的核心教义,总灵体会下特设立了“环境保护处”,开展环保问题的一系列的教育工作,与其他部门合作,推出“自然教室”儿童户外教学课程,并制作环保短剧,向全台中小学生广播,还举办了“国际儿童环保艺术展”,受到公众舆论的广泛注意;另外,还经常举办深造班、夏令营及冬令营等活动,既密切了教徒之间的关系,也扩大了社会影响。再者,利用设立基金会的形式,参与社会服务,如从1980年开始,每年都举办“服务人群奖”,以奖励那些对台湾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并请台湾政要人士前来颁奖,如前台北市长李登辉、前“内政部长”邱创焕、林洋港等,还在台湾各大专院校设立奖学金,为台湾的社会教育尽一份力量。同时也开展了一系列的传教活动,如1991年9月在台南的巴哈伊中心举行了传教老师的训练营;同年10月又举行了巴哈伊的拓荒者大会;1992年初,在台北总灵体会的办事处开办了地方巴哈伊新闻代表人员训练会。近年来,台湾的巴哈伊地方灵体会也逐渐地加强了与地方民间团体及台当局的关系,参与了环保、教育、幼教、妇女等方面的活动,这既起到了社会宣传作用,也大力推动了巴哈伊教在台湾的发展。

据台湾“《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92年)的数字,巴哈伊教在台湾的教徒数成倍增长,已达14,000人,散居在台湾150多个城市及乡镇之中,有2个聚会中心向台湾当局申请了登记,有2名外籍

教务人员，还有一家出版社。巴哈伊教在台湾发展很快，到1992年中已有62个地方灵体会，由“台湾总灵体会”负责教务，并将“大同教”的名称于4月27日正式改为“巴哈伊教”，这与全球所有华人区所使用的名称相统一。4

台湾的巴哈伊教与世界其它地区及国家、尤其是港澳的巴哈伊教组织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如1991年9月邀请新加坡、菲律宾及日本的巴哈伊洲际顾问到台湾访问、1992年2月在高雄举行了第一届东南亚中文青年大会、同年5月派出19位代表赴以色列海法参加该教创始人巴哈欧拉逝世100周年的纪念大会等。

三、理 教

理教最初称为“在理教”，始于明末清初，由山东即墨县进士杨泽创立。杨泽字廷贤，道号来如，明朝灭亡后他即隐居而不问事情。后创立该教，被信徒们尊为“杨祖”。此教入教称“在理”，信奉“圣宗古佛”——观音菩萨，日行五十三参，经典有《无字真经》、《在理真经》、《心经》、《道德经》、《参经》、《金刚经》等。其教义为“崇尚五伦，实践八德”，要求信徒“忠君爱国，孝顺双亲，尊敬长上，和睦乡邻”，还要遵守戒律，有戒淫、戒盗、戒烟、戒妄、戒酒等，教徒应广结善缘，普度八方。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成立了全国性的机构“在理总公会”，1935年还成立有“中华理教总会”。据说，该教在日本占领台湾时就已有正式的传教活动，但规模较小。

理教有复杂的教职体系，其教职人员中最高的首领称为“总领正提点大法师”（或称“大宗师”），以下还有15级法位，最低为“办道”，第7级为“护座法师”，可以宣道，不能传教，到12级时称“副领正法师”，可传教，但不可传法位，能传法位的必须在“领正”以上的级别。

1949年,“总领正”赵东书来到台湾,才将此教正式传入,并逐步召集在台教徒复教,遂于1950年春在台北市设立总公所,推举赵东书任第二十二代总领正提点大法师。该教的基层活动场所称为“堂”。该教义强调“性命双修,内功外果,循儒家教条为入世规范,参佛法道功为出世修程”。到1987年底,台湾的“中华理教总会”辖有368个堂,拥有教职人员66名,信徒2万多人。此外,根据《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92年)的记载,理教到1991年底在台湾共设立了113所寺庙,共有467名神职人员,教徒达127,093人,还开办了3所培养宣教人员的学校,也兴办了一些社会服务机构,如幼稚园1所、诊所1家,还有1家出版社,出版3种年刊及其它12种刊物。理教还有自己的节日及斋期,并形成了独特的婚丧寿诞仪式,但与其它大的宗教派别相比,教徒人较少,社会活动也没有在台湾造成多大的影响力。现任总领正陈志泉,1989年1月上任。

四、天 理 教

天理教原属日本的神道系统,1838年由日本农妇中山美伎创立,是日本的一种新兴宗教。该教声称,透过教祖中山美伎之口,启示“父母神”天理欧诺弥格多的教导,父母神也即“天理王命”神,它“创造人类的目的,是要看人类过康乐的生活,而达到神人共乐之目标”。该教的主要教义有敬天地、孝父母、重信义、讲廉耻,愉快地从事日常的“圣劳”,最终达到“康乐世界”。所奉行的经典是中山美伎所写的《神示集录》。

天理教于1889年传入台湾,那时,日本刚刚占据台湾,天理教先是在台北、嘉义等地活动,信徒多为日本人。该教曾遭日本政府的取缔,到1908年才解禁。后来经过大力传教,才有一些台湾土著居民入教,但数量很少。台湾光复后,日本人纷纷离去,该教教士

也被遣返，天理教在台湾的教务陷入停顿状态。直到1962年，该教才重新由日本传入台湾，并恢复了传教工作，逐渐地有些中国人也入了教，信徒增长较快。1971年12月还正式成立了“中国天理教总会”，该组织名义上是天理教在台湾的领导机构，但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在80年代末，台湾天理教共有教堂4所，布道所100多处，信徒近万名。

在台湾，天理教是一种外来的新兴宗教，带有浓厚的日本文化色彩，其经典除1956年翻译成中文的《天理教教典》外，还有大量日文书籍。日本天理教总部在台湾设有“台湾传道厅”，其厅长等主要领导职务由日本天理教总部派人充任，现任厅长中田，实际负责台湾的教务，出版《台湾传道厅通讯》（月刊），可见该教与日本有密切的关系。1986年中山美伎“百年祭”时，台湾约有600名信徒前往日本总部“归参”；日本的天理教组织及教徒也经常到台湾参加活动，如1991年8月日本大理大学台湾传道班的学生还到台湾访问等。据《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92年）的数字，天理教到1991年底在台湾共登记了126所教堂，有630名传教人员，教徒28,000人，另有26名外籍传教人员，除出版《台湾传道厅通讯》外，还有2种季刊。不过，天理教在台湾由于人数过少，其社会的影响力较小。

五、轩 轅 教

1957年3月1日由王寒生发起创立了轩辕教，并在台湾“内政部”登记认可，被吹捧为恢复中国传统道德的“民族化”的新兴宗教。它标榜以“继轩辕黄帝道统，恢复中国固有宗教”“启发中华民族魂”为目的，以“尊天法祖”为信条，以“儒、墨、道三家同源”为理论基础，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的思想境界，以“光大民族文化、净化现实生活，提高精神生活境界，促进世界大同”为使命。

该宗教奉轩辕黄帝为宗主，相信宗教与伦理乃合而为一，尊天法祖乃中国传统的基本信念；还相信“黄帝统一了中国，创作各项文物制度，继承伏羲氏、神农氏道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已发展为宗教……”，等等；自称该教是由黄帝而下，横连三家定说，纵贯五千年，重建宗教思想体系，广大悉备，有天道，有人道，合为一体，则是天人合一，体用兼施。该教的信条是“尊天”、“法祖”、“孝亲”，所以，祭天、拜祖、孝亲之日也即成为轩辕教的重要节日，尊天是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九，是日要举行祭天大典；该教规定4月5日黄帝诞日为法祖日，并倡导是日为民族纪元节，举行三献礼大典，使用黄帝纪元，但1987年时又改为农历的三月初三；从1982年起定农历的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为“孝亲”日，该教要举行孝亲大祭。

其创立人王寒生为国民党的 C. C 系的老成员、台湾的“立法委员”。他生于1898年，在1949年12月随国民党到台湾后，先在台湾竹南第一银行分行供职，后著“台湾民俗改进当议”一文，很得蒋介石的嘉许。他创教时还请来台湾当局的一些政要如严家淦、王世杰、陶希圣等做辅导。可见，此教与台湾政界关系密切。1968年，王寒生先后到台东、台南、花莲、台中等地布道。1983年2月亲赴香港讲道三次，并著书立说，到处宣讲该教教义。其主要著作有《中华民族新论》、《寒生讲稿》、《心斋入门》等等。王寒生本人还领导成立了“中国易经学会”。

轩辕教在1969年4月5日在台北市建成归绥街大同神宫，分两层，一层为办公厅，楼上为大殿，这是轩辕教的第一座神宫；1970年台北的富安里布道所及淡水布道所相继成立；1972年10月1日第二座神宫在关渡建成，同年底动工兴建淡水神宫，并以此为该教的总庙。1977年又分设了台北市社子区宗社、松山区宗社及台中市宗社，教务稳步发展。到1978年该教在全台共设有8个宗社，直属总部的黄帝神宫有大同、淡水2座，属教区的神宫有关渡、新竹

2 座。到 1982 年该教创立 25 周年时,已发展有 18 个宗社、6 座神宫、168 座神庙及 10 万信徒⁵。传教所称为“宗社”,信徒皈依称为“归宗”,首领称为“大宗伯”,各个宗社内设有太祝、宗正、司铎、执事等教职;使用儒、墨、道三家经典,例如有《孝经》、《易经》、《墨经》、《道德经》、《南华经》、《冲虚真经》等。总部就设在台北市归绥街,称“黄帝神宫”,有大宗伯 1 人、副宗伯 2 人,并设有弘道部、武道部、礼制部、妇女部等。在总部之下分三个教区:台北市教区、台湾省教区和港九(香港和九龙)教区;三大教区各辖若干宗社,每一宗社有宗正一人、副宗正 1—2 人、讲师 1 人,每周讲道 1 次,还有祝师 1—2 人,负责祈祷及布道。教徒的宗教活动场所称为黄帝神宫,各神宫均设太祝、经理、礼正、乐正、主司和太祭等职。每年农历 3 月初三黄帝圣诞及 9 月初九黄帝升天日都要举行盛大的祭典仪式。另外,在台北、阳明山、花莲、台东还有 10 多个宗社。1987 年底,轩辕教在台湾的宗社发展到 14 个,教职人员 156 名,信徒自称有 10 万。但实际的人数据说只有 4 万,且多年迈⁶。到 1990 年底,宗社增加为 16 个,信徒据说达 15 万多,但据台湾有关部门于 1991 年底的调查数目,轩辕教在台湾登记的信徒只有 4,507 人⁷。1991 年 7 月在凤山市设立了一个宗社,并成立“轩辕教高雄市管部”,每逢节假日都举行纪念庆典,1992 年 3 月,成立了“轩辕教社会工作服务团”及“轩辕教兼爱会”。

根据台湾《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92 年)的数字表明,到 1991 年底,轩辕教在台湾共登记有 19 个宗社,有 113 名传道人员,有 172,000 名信徒,办有 1 所大专院校、1 家出版社(龙华出版社)及 1 份季刊。

六、犹太教

犹太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宗教,虽然它的信徒并不很多,但它却随着犹太人的迁移而传到了世界各地,是教徒分布最广的宗教。因而,世界上只要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就有犹太教的传布,台湾也不例外。据称,50年代就形成了台湾的犹太社团,成员主要集中在台北市。

目前,在台湾长期留居的犹太家庭大约有50个,70年代中期曾成立了台湾犹太教协会,1978年还正式成立了犹太人的组织,登记为“财团法人台湾犹太人社区”。另外,在台北市亚都饭店设立了专门的犹太会堂,以供在台的犹太教徒礼拜及聚会时的需要,还派有犹太拉比,每星期五定期为来台从事商务或旅行的世界各地犹太人举行宗教仪式。会堂有80个座位,约柜中存放有两卷《托拉》经卷,另外还备有希伯来文—英文对照的祈祷书。无论是长期留居还是做短期留居在台湾的犹太人,他们中多数是商人,也有工程师、知识分子及记者,以及因短期合约在台的技术人员等;这些犹太人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的犹太人最多,据称美籍的犹太人是从事台湾纺织品输美的最大买主,如现任台湾犹太人社区的会长沙荡(D. Shapiro)先生,他从1969年起就居住在台湾,目前是美国《时代》杂志驻台的特派员,并兼营商业出版社。大多数犹太教徒坚持族内通婚,即使要和非犹太人结婚,对方也要接受犹太人传统文化如希伯来文、犹太教教义及经典、犹太人的历史文化等,直至成为犹太教徒。但在台湾的现时生活中,曾出现犹太人与台湾本地的女子结婚,却未要求妻子皈依犹太教的事例。从近年来台湾的犹太教发展状况来看,教徒的数目始终未有大的增长。因而,台湾犹太教的团体迫切要吸收更多的新成员,以扩大台湾犹太教团体的社会

影响，同时也为其组织提供更充足的经费。自台湾的犹太教团体登记成立以来，即坚持为在台的犹太人提供各种社交及宗教活动，如庆祝犹太新年、举办儿童的主日学等。不过，有少部分的犹太人对宗教活动并不感兴趣，只参加社交聚会，以至台湾的犹太教因人数较少、宗教组织的规模太小而没有多大的社会影响，这大概也是因犹太教本身不注重传教的原因。“台湾犹太教协会”加入了“亚太犹太教联合会”，并通过该组织与世界其他犹太社团加强联系，这一组织的总部设在澳大利亚。

七、东 正 教

台湾有极少数东正教徒，他们属于俄罗斯正教，仅有二、三十人，大多为原籍俄罗斯人或中俄混血儿。另外，在1979年美国与台湾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之前，美国军事顾问团经常为军队里的俄罗斯正教徒安排宗教活动，并派有主持拜占庭礼仪的神父。但随着美军的撤离，这部分东正教徒已离开了台湾。目前，台湾这些俄罗斯正教徒并不是全部参加教会的活动或每个主日的弥撒，但他们定期在台北的圣本笃修女院参加聚会。这所修女院原为耶稣会神父邓勤(J. Duncan)主持，他是东方礼仪的博士，不过，在他离开修女院去进修之前只有3名俄罗斯正教徒定期参与拜占庭礼仪。每逢圣诞节及复活节，有十余名教徒来参加庆典，并安排长达2个小时的俄文礼仪。由于居住分散，大部分的俄罗斯教徒都到临近的天主教堂过宗教生活，台湾并没有一座东正教堂。

因历史原因，台湾这些俄罗斯正教徒与俄罗斯正教会并无直接的联系，反而与美国有一些联络，能收到一些寄自美国的俄文版的《今日美国》及其他俄文书籍。再者，蒋经国的遗孀蒋方良女士虽未参加过他们的聚会，但她出生在俄罗斯，据称她可能是俄罗

斯正教徒。

八、天 德 教

天德教在台湾又称“天德圣教”、“德教”，由萧昌明在1927年创立于大陆。萧是四川省乐至县人，他“以三才骨干，用以立天道、立人道、立地道，使三才有其所宗”，标榜“秉上天好生之德，继黄帝以德为教，创行天德圣教为三才共有之教”。1930年时该教曾向南京政府备案，定名为“天德圣教”，并成立了“宗教哲学研究社”，先设在南京，不久即在上海、北平、汉口及湖南、广东、安徽、江西等地设立分社。到解放前，该教主要流行于华南、华中一带，分化为几个支派，其总社迁到黄山。天德教很注重神秘的心理体验，并声称能直接看到“宇宙之光”，这光就传达了神的旨意。该教的教义称要复振道德，挽劫救世，强调“以人为仁，仁者道之骨，万事之基”。创始人萧昌明自称“大罗金仙”，所崇拜的主神较为复杂，分上中下三代。该教比较重视教徒的道德修炼，遵循20个字：即忠、恕、廉、明、德、正、义、信、忍、公、博、孝、仁、慈、觉、节、俭、真、礼、法，并视之为“本教之骨”。

1942年萧昌明去世后其妻接掌道务。大陆解放后，天德教的总社迁到香港新界的青山，后又传到台湾。但最初在台湾由于自称“有道无教”，即只讲宗教道德而不重视宗教组织的完善，而且台湾当局也不准它公开活动，1953年该教由香港刚到台湾时只好用“中国精神疗养研究会”的名义活动，所以发展较慢，人数较少。传入台湾的天德教大概有四、五个分支，1974年时曾任台湾“内政部长”的王德溥与王笛卿等人联合，成立了“天德圣教台湾区委员会”，还在一些县市设立分会。但不久，该组织发生分裂，王德溥另立“天德圣教中华民国总会”，但没有能获准登记、台湾“解严”后，

天德教也和其它宗教一样迫切要求社会的承认。1989年6月25日,17个天德教团体以“中华民国天德圣教总会”的名义获准在台湾“内政部”登记立案,会址在台北县深坑乡,现任理事长为萧楚乔。1990年3月开始在台湾各地筹组该教的分支会,如“台北市支会”、“台中市支会”、“彰化县支会”、“基隆市支会”、“高雄市分会”等,不久就设立了30多个道院,并且都得到了台湾当局的许可。另外,还成立了“中国精神疗养研究会”等组织。至于该教的信徒数目却说法不一,从数千人到数万人不等,不过大多为退職官员,老人居多数。

随着近年来台湾传统宗教的复兴,天德教在台发展很快,并使台湾成为该教的一个最重要的传播地区,1991年7月还在美国纽约设立了一所天德堂,将该教的教义传播到西方。此外,天德教的教阶分为总开导师、开导师和皈依弟子等,其组织一般分为道务、服务、总务、秘书等;还出版《觉明》、《明德》等杂志,也出版像《玄天大道》这样的典籍,另外,还有由秦淑德主持编撰的《德藏经》,共4类8部28卷。根据台湾《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92年)的数字,到1991年底,天德教在台共登记了16座传教场所,神职人员共有169人,信徒有106,100人,还开办了8家诊所,1家出版社。但毕竟天德教在台湾还是一个小的宗教派别,社会影响很小。

注释:

1. 参考《宗教工作基础知识》,中国旅游出版社,1991年,第575页。
2. 台湾《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92年),第209页。
3. 参见《宗教工作基础知识》,中国旅游出版社,1991年,第570页。
4. 以上数字请参考《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92年),第1348—1349页,208页。
5. 见《当代宗教研究》1991年第2期,吴亚魁著“台湾的‘轩辕教’概观”一

文。

6. 参考《宗教工作基础知识》，中国旅游出版社，1991年，第 572 页。
7. 见《世界宗教资料》1994 年第 2 期，心影著“台湾宗教识略”一文。

第八章

新兴宗教

目前,学术界对“新兴宗教”概念尚未统一,本书中界定为传统宗教以外的、本世纪初前后产生的宗教派别。这一概念较为宽泛,也包含了上述一些基督教和佛教系统的新兴教派,还有一些独立的宗教派别,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遭到主流教会的反对,而它们的某些教义则大都出自一种或多种传统宗教,却又标榜唯独自己最纯正;或主张各宗教合一,出于同源,但又特别崇奉各自的创教人。按照这一界定,前面介绍的天帝教、天理教、轩辕教、天德教、巴哈伊教、基督教的统一教会及新约教会均可归入新兴宗教之列,但由于以上宗教大部分已在台湾正式登记为十二大宗教,而统一教会及新约教派则常常被人算作基督教新教之列,所以这里不再重复介绍,以下所列的新兴宗教是在台湾近年来新兴起的、而又难以归类的教派,以供参考¹。

一、现代禅

新兴宗教“现代禅”(Zen Now)的标记为“火中莲花”,创始人是李元松,号祖光,于1957年出生在台北县。幼年时曾加入一贯

道,还作过讲师。后来又研习佛教,并攻读印顺的《妙云集》、《阿舍经》、《般若经》等。据称,因经过四、五年后仍未找到得以解脱的满意答案,于是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每天 8 小时的打坐,其间又历经“大、中、小悟数十百次”,最后“彻见法胜,得大安心”。1988年3月,李祖光开始在台湾公开宣扬“从自我实现到禅定解脱的现代禅”。李本人自称是一个得解脱的“阿罗汉”,并以在家居士的身分收受了6、7名出家僧人为徒,1989年4月又以在家人为主,组成了“现代禅菩萨僧团”。其主要教义有强调“抱持经验主义的修学态度”,认为“人道性格与科学精神”可以作为修禅的基础,所以“未能成佛,先学作人”;强调人人都有开悟的可能性,都有解脱的可能性,所谓佛即是接近“乐、定、安、明、爱”圆满展现而已,因而要人们“学习做具有理性、民主、人道、爱心的现代精神和科学知识的人”。“现代禅”还主张修行科学化、生活化,体验内容无我化、慈悲化,宣扬佛法人道化、社会化,弘法组织议会化、制度化,道场经济公开化、自足化,师资阵容严格化、专业化。

对于这一佛教的新兴教派,台湾传统佛教界视之为异端,对其主张纷纷加以指责。因为“现代禅”已脱离了传统佛教的教义,劝人们“不要学佛”,也不要信佛经所说,认为佛经并非唯一的标准。

近几年,在台湾传统宗教复兴的形势下,“现代禅”借机也颇能吸引人,教务不断扩大,到1991年中,“现代禅菩萨僧团”已发展到200多人,还成立了现代禅出版社、杂志社、共修会、根本道场等附属机构。“僧团”的决策中心为“全体指导老师会议”,并推选“宗长”,为最高领导者,以下还有“传法老师”、“主七老师”、“助教”等,李元松为“传法长老”,负责指导老师的工作。“现代禅”的根本道场设在台北市,另有高雄、桃园、台中、彰化、鹿谷等5个“禅七地点”。据称上过“禅七”课的人中有90%的人为大学学士和硕士²。另外,

该教派还创办了《现代禅》月刊，李元松本人著有《现代禅系列》丛书(共 4 册)及《平常话》，并大量发行数种讲课录音带。

二、新使徒教会

该宗教是 19 世纪产生于英国的一个基督教派别，目前总部设在瑞士。其活动纲领为《新约时代基督使徒教会建造基础》，以“海面旭日照耀的十字架”徽章为标志，内部设立总部、地域本部、教区、教会四级机构，分布在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的“新使徒教会”由一名首席使徒统领。近年来，台湾的新使徒教会发展较快，但遭到基督教新教主流教会的反对，斥之为异端邪说。另外，随着海峡两岸民间交往的不断发展，新使徒教会的信徒也借到大陆访问与旅游之机进行非法传教活动。

三、世界红卍字会

原是一个民间教派，产生于民国初年的山东，1921 年 2 月 9 日在济南新街正式开馆，次年在北京登记注册，并设北平道院为总院，其下有 5 大主院，中央主院设在天津，东南主院在南京、西南主院设在武昌、西北主院设在张家口、东北主院设在新京。在总院之上另有宗坛与母坛，宗坛设在道院发祥地滨县，母坛就是济南的道院，称为世界道慈母院³。

该教的宗旨为“宣扬大道，劝世人明心见性，内以修己，外以度人”，并提倡“融合五教于一炉，以促进世界和平”。

大陆解放后，该组织将总院迁到香港，不久在台湾恢复传教，在全台各地设立道院，并在台北市复兴南路一段设有台湾省院，即“世界卍字会台湾省分会”，在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等地

成立县院，即分会，但信徒多为大陆来台的老年人。该组织在台湾着重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如每年都给台湾师范大学和台北医学院学生发放奖助学金等。

四、摩 门 教

摩门教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新兴教派，19世纪30年代产生于美国，由约瑟夫·史密斯 Joseph Smith, 1805—1844 创立，正式名称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其经典有《摩门经》。该教派在本世纪50年代末传入台湾，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发展一直较缓慢。过去的传教方式一般是身着白衬衫、打着领带、骑自行车，挨家挨户地访谈传教，而如今这一传教方式显然早已过时，故台湾本地人皈依的人数很少。到80年代末，台湾的摩门教传教士约有350人，其中约300多人是外籍人士，多半为美国人，本地的传教士仅47名。按其教义，教徒在年满18岁之后必须安排两年传教，所以每个教徒都要做传教士，有的还被派往异国他乡传教。经过长期的、不懈的努力，台湾人从最初的反感、拒绝，到因好奇以至有的逐渐接受；而摩门教传教士也在不断改变传教的方式及策略，近年来教务有所改善，但影响很小。

除上述介绍的几种新兴宗教外，台湾近年来更兴起一股新佛家思潮，代表了佛教在家居士们的思想，与出家人的意识分别越来越大，以至双方时有分歧发生。在这股新佛家思潮的涌动中，又产生出众多的佛教新兴团体，诸如台北文殊佛教文化中心、台北的佛教文化等等，在台湾的知识阶层影响很大，并掀起台湾的“佛教热”，处处可闻“禅”，人人在修佛。这种局面已引起了外来宗教如基督

教与天主教等人士的高度重视，并改变相应的传教策略，以迎接新兴宗教的挑战。

注 释：

1. 新兴宗教的概念学术界讨论的很多，但并未统一，本书的这一观念只代表作者本人。另外，随着台湾近年来各种宗教的复兴，所谓的新兴宗教也颇为兴旺，但它们并没有像世界其他新兴宗教那样反对传统主流教会，反而是借助传统宗教的教义，以迎合现代人的口味，不过因资料缺乏，在此仅介绍几种。
2. 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图书馆编写的《宗教情况·反映》总第58期。
3. 参见香港新兴宗教中的有关介绍。

中 篇
香 港 宗 教

总 论

一、概 况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两大部分，由香港岛、九龙、新界以及周围 230 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总面积为 1,069 平方公里。到 1994 年年中统计，香港地区人口稠密，总人口已超过 600 万，其中 98% 为华人，大部分原籍广东。

香港是一个介于东西方之间、兼容并蓄的多元化的社会，其宗教因同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而呈多元化特色，主要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各派、伊斯兰教、孔教（儒教）、印度教、犹太教、锡克教、巴哈伊教等，还有多种民间宗教信仰形式，近年来又传入一些新兴宗教，更使香港的宗教文化多姿多彩。

中国的传统宗教如佛教和道教等，在香港有数百年的历史，加上受佛教、道教影响下的众多民间信仰形式，香港有六成以上的人口信仰中国传统宗教。另外，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许多人有拜祭祖先的习惯，并将儒家思想看作是人际交往的道德标准。香港有 400

多间寺观，其中许多具有数百年的历史，多为渔民和早期的居民所建，因香港缺乏土地，有些寺庙就设在多层大厦里，以方便市区的信徒前往参拜。不过，佛教与道教、以及民间宗教常混杂在一起，有些民间信仰者也常声称信仰道教或佛教，所以难以统计确切的佛教或道教信徒的数字，有些学者所做的统计仅为估计数，即使这样也常常比实际数目低得多。例如，据1983年进行的一次全港性的社会调查报告中说，有半数以上的港人称自己无宗教信仰，另有1/4的人信仰中国民间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孔教等等，还有10%的人说自己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这也表明了宗教在香港社会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基督教新教各派和天主教均为外来的宗教，但在香港的历史也已有150多年，并深深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教会势力不可低估。目前，香港的基督徒总数已达其总人口的10%，而教会开办的众多的学校、医院、诊所、养老院等社会福利机构所影响的人口却远远超过这一数字。其他宗教人数较少，影响也较小。据《香港年鉴》(1992—1993年，香港政府主编)的统计，回教徒有5万人，其中半数以上为华人，其余为在本港出生的非华裔人士，还有来自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印尼、中东和非洲各国的教徒；供日常礼拜的清真寺只有4间，其中以港岛些利街清真寺历史最为悠久，最大的一间清真寺是位于弥顿道的九龙清真寺暨伊斯兰中心，可供2,000人礼拜。印度教徒在香港约有12,000名，在跑马地有一间庙宇；另外，还有1,000名犹太教徒等等。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世界各大宗教组织也纷纷在这里设立了分支机构和传教组织，同时香港的各种宗教团体也与国际宗教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香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宗教的传教士，仅基督教新教各派别就有数十种国际传教机构。近年来新兴宗教也纷纷传入香港，设立分会，而各大宗教的国际组织也注重利用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在香港设立了出版社、电台等，

发行大量的宗教书刊、音像制品，还举行大型的布道会，通过电视或电台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影响到中国大陆。随着大陆的开放，香港的宗教组织和个人不断到内地参观访问，或旅游探亲，加深了内地与香港两地双方宗教界人士的相互了解与友谊；另一方面，鉴于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及经济实力，西方的一些宗教组织也将香港视作是进入大陆的一个跳板，同时香港也是世界主要宗教向大陆及东南亚一带传播的重要基地。

为了全面了解香港宗教的状况，现将1982年出版的英文版《基督教百科全书》有关香港宗教的表格转引如下，以供参考，见表1。

表1是以基督教为中心所作的统计，严格地讲已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但80年代以前的数字仍有参考价值。80年代后因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人口成分改变很大，自80年代中期后香港开始进入后过渡期，向外移民的较多，这势必影响宗教的发展，尤其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徒的人数在逐年下降，两者人数相加才占总人口数的10%，远没有表中所列的那样高，其他宗教的变化多为估计的数字。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宗教的影响在逐年加强，信徒的人数不断增加。这里的“中国本地化教会”是指基督教中独立的教会，出现于本世纪30年代，近年来发展迅速，到1970年已经有100个独立的教会，较大的如“世界基督教灵粮布道会”和“基督徒聚会处”；其他宗教包括所谓的“萨满教”（即原始宗教崇拜，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灵魂崇拜等）及波斯教等。

此外，香港宗教的社会影响力较大。各主要宗教团体都通过开办教育、社会福利设施如医疗卫生、老人院、各类的青年中心，甚至开设商业服务业，如素食店、旅馆等，也开办有出版社、图书馆、报社、电台等社会舆论设施，在传教的同时，扩大各自的势力。最为著名的有天主教“香港明爱”，已发展成为庞大的、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教会慈善机构，直接受惠的达到数十万人。在开展社会救

表1: 香港各大宗教发展统计表

宗教类别	年代	1900 信徒数 %	1970 信徒数 %	1975 信徒数 %	1980 信徒数 %	2000 信徒数 %
中国民间宗教		339,900 89.4	2,050,000 52.0	2,101,620 49.7	2,145,550 47.4	2,207,200 39.2
佛教		30,400 8.0	630,000 16.0	701,350 16.6	777,800 17.2	1,091,000 19.4
罗马天主教		3,700 1.0	280,000 7.1	316,900 7.5	357,200 7.9	534,400 9.5
基督教新教		3,800 1.0	250,000 6.3	287,650 6.8	329,350 7.3	461,600 8.4
中国本地化教会		0 0.0	60,000 1.5	67,000 1.6	76,900 1.7	118,100 2.1
圣公会		700 0.2	25,000 0.6	27,000 0.6	29,000 0.6	45,000 0.8
基督教边缘教会		0 0.0	5,000 0.1	6,400 0.2	7,900 0.2	12,000 0.2
东正教		0 0.0	50 0.0	50 0.0	50 0.0	100 0.0
非宗教徒		0 0.0	300,000 7.6	329,600 7.8	361,800 8.0	495,000 8.8
无神论者		0 0.0	200,000 5.1	223,900 5.3	248,000 5.5	337,500 6.0
新兴宗教		0 0.0	110,000 2.8	126,800 3.0	144,700 3.2	225,000 4.0
伊斯兰教		1,000 0.3	18,000 0.5	19,200 0.5	20,500 0.5	26,000 0.5
印度教		300 0.1	7,500 0.2	8,000 0.2	8,500 0.2	9,500 0.2
锡克教		1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800 0.0
巴哈伊教		0 0.0	400 0.0	500 0.0	600 0.0	1,200 0.0
犹太教		0 0.0	400 0.0	430 0.0	450 0.0	600 0.0
其它宗教		100 0.0	4,650 0.1	7,000 0.2	12,000 0.3	50,000 1.0
总人口数		380,000 100.0	3,942,000 100.0	4,225,000 100.0	4,522,000 100.0	5,625,000 100.0

济及国际赈灾方面，尤其是1991年及1994年中国内地发生特大水灾，香港同胞包括教会均积极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支援灾区。随着内地与香港两地近年来宗教界人士的不断往来，各大宗教均组织过访问团到内地参观，加深了两地宗教人士的了解和友谊，也促进了香港人士对祖国的凝聚力；同时内地的宗教界人士也经常访问香港，加强了与香港宗教界的沟通与联络。

二、政 教 关 系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100多年来所贯彻的是“大英帝国”的法律，有两个具有宪法作用的文件：一是《英王制诰》，一是《王室训令》¹，此外，还有香港本地法。不过，香港没有专门的有关宗教的法律，仍标榜“香港的公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的自由”，这种自由又要受到其他各种法律的制约。例如，《华人庙宇条例》规定香港的华人庙宇均须注册，并成立一专门的管理机构——“华人庙宇委员会”，受该组织直接管理的公共庙宇约有40间，主要的收入来自信徒的捐献，用以保存和修建公共庙宇，及有历史价值的私人庙宇，余款归入一项慈善基金；该基金每年都拨出款项用于一般的慈善服务，如向清贫的大学生颁发奖学金，资助各地的福利机构等。其他的寺庙也大多向社会开放，并均须以财团法人形式登记注册。

另一方面，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口，近年来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居世界前列。然而，正如上文所说，香港人口中大部分是有宗教信仰的，因此宗教的社会影响还很广泛。同时，近年来因香港已步入后过渡期，各主要的宗教团体又十分关心香港的前途，倡导教徒也要积极投身到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六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孔教和伊斯兰教的领袖在1978年就成立了一个“六宗教领袖座谈会”，每年举行两次香港宗教界最高

层次的聚会,以回应不同国际年的呼吁,如举办过关怀老人、儿童、无家可归者等活动,促使香港政府在学校推行德育及宗教伦理,还在每年的新春之际以六宗教领袖的名义发布“新春献词”等。其次,各宗教也颇为关注中英谈判,并派出代表参与对“基本法”的起草和咨询等工作。天主教和基督教会还设立各种机构,配合教会的这类举措,并在其报刊上开展各类的讨论,如天主教的《公教报》就开辟了有关香港“基本法”和“人权法案”的讨论专辑,以督促基督徒关心香港的政治生活,鼓励教会人士直接参政,使教会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一些宗教界的领袖同时也是香港社会的“名流”,有的被敕封为“太平绅士”,有的则是拥有巨大资产的商人,有的则是有影响的社会慈善家等。

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实行“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以后,又吸收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和专家组成“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其中也包括了香港各主要宗教的领袖,经过草拟、咨询、政制的争论等阶段,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香港基本法》终于在1990年4月4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基本法”是香港未来的宪法,其中直接涉及的有关宗教内容的条款有第137条、第141条、第148条和第149条,具体如下:

第137条……宗教组织所办的学校可继续提供宗教教育,包括开设宗教课程。

第141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不干预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不限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没有抵触的宗教活动。

宗教组织依法享有财产的取得、使用、处置、继承以及接受资

助的权利。财产方面的原有权益仍予保持和保护。

宗教组织可按原有办法继续兴办宗教院校、其他学校、医院和福利机构以及提供其他社会服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宗教组织和教徒可与其他地方的宗教组织和教徒保持和发展关系。

第148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体育、专业、医疗卫生、劳工、社会福利、社会工作等方面的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同内地相应的团体和组织的关系，应以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为基础。

第149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教育、科学……等方面的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可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国际的有关团体和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各该团体和组织可根据需要冠用“中国香港”的名义，参与有关活动。

根据“基本法”规定，香港人民在1997年后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香港的宗教团体所开办的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事业仍可继续办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也不会在香港设立分局，即不会干涉香港的宗教事务；内地与香港的宗教组织在“三互原则”下互相往来；香港的宗教团体与外国保持的关系或联系亦将保持不变；外国传教士仍可自由到香港传教，香港的传教士也可自由出外传教。“基本法”公布以后，得到香港广大宗教界人士的支持和拥护，消除了一些人的疑虑，近年来更出现了一些外迁的移民重新回归的现象，许多教会人士也明确表示要“与港人同行”，以促进香港在后过渡期内社会的稳定、繁荣与发展。

三、香港宗教的发展趋势

进入90年代以来，香港的社会发展更趋向于环境的大都市化，

文化生活也更物质化与政治化，但民间鬼神崇拜，包括一些迷信现象却颇为流行。处于后过渡期的香港宗教呈现出以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1. 中国的传统宗教如佛教、道教、孔教及一些民间宗教多年来发展呈上升趋势，各宗教团体开始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如开办教育及社会慈善事业等，不但扩大了社会影响，而且信徒也逐年增多。

2. 受西方影响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不断减少，教会势力下降。但教会所经办的教育、医疗、慈善事业和社区服务等仍继续为香港大众服务，并提供了行政管理、人才的培训及部分经费，将来仍会发挥其社会作用。

3. 教会的本地化趋势正逐步加强。因面临回归，各个宗教团体尤其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会正推行本地化策略，教会学校推行双语教育，教牧人员开始学习使用普通话，并开设多种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讲座，以加深教徒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努力使教会办成一个“中国人的教会”。

4. 无论是西方宗教或是中国传统宗教都面临着神职人员缺乏的问题。例如，基督教新教各派在香港的教堂大约有1,000间，但教牧人员远远不够，并且有54%的堂主任在40岁以下，传道人也普遍年轻化，可是真正受过严格、正规的神学训练的神职人员却很少。而佛教和道教因世俗化明显，宗教领袖多数年事已高，寺庙里出家人很少，有的已从内地聘请法师或住持。伊斯兰教也正面临这一难题。

5. 各宗教走向联合，共同关注社会的政治生活。1972年香港的天主教会就成立了一个“香港教区联络委员会”，目的是联络其他宗教团体共同关注一些社会问题，1978年由天主教会发起组成了“六宗教领袖座谈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1992年该机构回应“加德满都”宗教和平会议，发表了“六宗教和平宣言”，就和

教育、人性尊严、环境保护等问题发表建议；同时，教会内部也在推广“合一运动”。

注释：

1. 1843年 1月在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签定之后,英国政府即制定了一个建立香港殖民地的英王敕书 (**Charter**),后以《英王制诰》的形式发布,同天发布的还有《王室训令》,作为统治香港的法律依据。该两份法律文件曾经数次修改,并载于《香港法例》(**Laws of Hong Kong**)附录的第一卷。

第 一 章

佛 教

一、历史与现状

佛教是香港历史最悠久、信徒最多的宗教,其历史可溯至公元428年,当时正值中国南北朝时期,据说一位著名僧人杯渡禅师(380—458)来港弘法,在新界屯门青山和元朗建立寺院,前者称青山寺,又名杯渡庵,后者名灵渡寺,至今仍保存有两寺的遗迹。以后,不断有寺庙建立,主要大乘汉地佛教为主,教徒日众。宋代有灵渡寺,明代有凌云寺(也称观音寺),近代则有宝莲寺、妙法寺、观宗寺等。鸦片战争以后,香港沦为殖民地,佛教也难以发展。直到本世纪初,佛教才有了一些松散的组织,如1916年由吴子芥、播达微等人创办了佛学会,这是香港最早的佛教社团,也是研究佛学的机构;1920年太虚法师到香港弘法讲经,大大推动了香港佛教的发展,不久又有一批佛教机构建立,如1925年成立了“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1929年创立了香港女子佛学院、1930年“香港佛教联合会”成立,“香港佛学会”和“佛教青年会”也相继于1931年及1932年成立,一时佛教在香港的影响大增,皈依的信徒日渐增

多。据统计，到1940年，香港已有佛教寺庙精舍上百座，僧侣100多人、佛教徒10余万人¹。1941年香港被日本占领后，佛教的发展受到遏制，抗战胜利后才得以恢复。1945年香港佛教各团体又组成了较大规模的组织“香港佛教联合会”，弘扬佛法，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佛教组织加强了联系，这更加促进了香港佛教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内地的僧人大批来港，使香港的佛教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建立了许多寺庙，社会影响也逐渐扩大，以后又成立一些佛教组织，逐渐创办一些社会教育及服务机构，使香港佛教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更大的发展。到70年代，香港佛教界创办的各种中、小学有40多所，在校的学生达4万余人，另外，还建立了10多所佛学院，重视僧伽教育，培养了一批有才学的青年僧人。

近年来，香港佛教发展较快，各个佛学会、佛教精舍、佛教团体林立，社会影响增大。据1990年有关资料统计，香港信仰佛教的人占香港总人口的70%，其中皈依的佛教徒约60万。近两年，佛教徒又有新的增加，使信徒达到65万。佛教是全港信徒最多的宗教，其信徒分布于社会工、农、商、学等各阶层；有比丘约300名，比丘尼2,000余人，他们接受常住及社会各界的供养；有寺院精舍400余所，主要分布在新界大屿山、屯门、荃湾及沙田等地，以宝莲寺最为著名；有佛教团体30余个，其中较大的有两个，一是香港佛教联合会，一是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还有一些佛教道场团体，以研究佛学、传播佛教、度己度人为宗旨。各佛教团体及寺庙积极举办各类弘法活动，如出版佛教期刊与典籍，开设佛教图书馆，开办佛学班及佛学讲座，举行佛教文物展览等。香港的佛教主要以大乘佛法为主，即中国大陆的汉地佛教。而汉地佛教也有许多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法相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香港佛教徒则多修持净土宗和禅宗，近年来密宗在香港的发展也很迅速。

另外，佛教团体或寺庙近年来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主要从

事佛教教育及兴办各类慈善事业。由佛教界兴办的各类学校有80多间,就读学生逾10万,其中佛教大专学校1间、佛教专修学院2间、佛教中学22间、佛教职业先修中学1间、佛教小学21间、佛教特殊学校1间、佛教幼稚园35间。在慈善事业方面,1970年由香港佛教联合会开办了一间具有相当规模的佛教医院,1977年就被列为港府分区医疗统筹计划的辅助医院,有医生职工300多人,设有病床358张;另有其他佛教团体开办的诊疗所2间,每年施诊2万人次。老人服务有安老院8间、护理院4间,均接受政府津贴,可收容无依老人2,000余名。青少年服务设施有青少年康乐营、青少年中心、佛教青少年团和5个佛教青年团体,经常举行佛教讲座、文艺汇演、佛学班等活动,吸引青少年对佛教的兴趣。幼儿服务开办了托婴、托儿所6间。此外,还设立了佛教慈善基金,以赈济灾民。如,1990年4月由李嘉诚个人捐资建筑的“佛教李嘉诚护理安老院”已于当年6月投入使用,设备先进,院务健全,可为252名住院老人提供服务,香港佛教联合会主席觉光法师担任了该院的院董会主席,并获得香港政府社会福利署资助的常经费。

香港佛教界普遍重视佛教的研究与宣传,设立各种机构,如香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院和佛教出版处是香港最大的佛教研究及出版机构,另有近10种佛教刊物。此外,香港的佛教学术活动很活跃,设有香港中国佛教文史研究所、中华佛教图书馆、宝筏图书馆、香港佛教图书馆等机构,还有香港佛学书局,发行佛教图书。因香港的佛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很大,不但佛教寺庙星罗棋布,各寺庙的香火也终年不断,进香礼佛者络绎不绝,节假日时尤多。所以,香港寺庙一般都很富裕,市民每逢红白喜事也常请法师去做佛事。1994年,香港佛教还发起了为争取获得佛诞日为公众假期的签名活动。

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香港已成为世

界不同背景的宗教的汇聚地，不断扩大对外交往，并已成为国外、内地和港澳台佛教界发展交往的中心地区和桥梁地带。香港佛教界与内地的往来近年来也大大加强，1979年宝莲寺董事会的主席源慧法师即率佛教旅行团到内地访问，1982年香港佛教联合会副会长黄允畋率团访问大陆，1984年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在北京出席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草签仪式后还回到了营口老家；与此同时，大陆的佛教团体，从中国佛协到各地方的佛教组织，也多次到香港访问，香港与大陆的佛教界通过友好交往，加强了了解与友谊。由于香港佛教界正面临人才危机，所以也从大陆迎请一些年轻的法师到香港，在寺庙里当住持。如1993年获得觉光法师天台宗传戒的照诚，原是东北楞严寺的监院，数年前来港的照明法师原是上海佛学院的讲师。1993年还在香港建成一座“佛光园”精舍，并请了大陆的高僧前去开光。随着1997年的临近，香港佛教界也积极关注香港的平稳过渡，香港佛教联合会作为佛教界的团体代表参加了六大宗教联络小组，参与香港的社会活动，如基本法的修改。最近，佛教界又致信给港府，在“九七”到来之际，力争使佛诞日（农历四月初八）列为公众日，以了却香港100多万佛教信徒的心愿。

二、主要寺庙

香港的佛教寺庙众多，据粗略统计，约有400多座佛教寺庙精舍，但不包括数百个较小的佛堂。最大的有大屿山的宝莲禅寺和荃湾芙蓉山的竹林禅院，较著名的寺庙还有西方寺、菩提学会、古岩净苑、证觉精舍、东普陀、安福佛堂等。现主要介绍如下：

1. 大屿山宝莲寺

位于大屿山，有香港佛教圣地之称，始建于1921年，1924年江

苏镇江金山江天寺的纪修法师担任该寺的住持，并新修了大殿，正式命名为“宝莲禅寺”，1926年筏可和尚继任住持后增修了地藏殿、般若禅堂、祖堂等，寺院的规模大大增加，以后又经数十年的修建，如今的寺庙规模已颇为壮观。1964年，宝莲寺又扩建了大雄宝殿，5年后落成，使之成为“香港第一禅林”。最近又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露天青铜佛像，大佛在宝莲寺旁边的木鱼峰上，坐南向北，稍稍偏东，遥对数千里外的北京。这座大佛是由宝莲寺筹建、中国航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公司承建的。大佛的座基是仿照北京天坛的圆丘而设计建造，故名“天坛大佛”。天坛大佛高26.4米，整具佛像连基座总高33.95米，重约250吨，是全球最高的露天青铜大佛。大佛于1993年12月29日开光，邀请了中外诸山长老、各届名流和1万余名善信来此观礼。开光当天的上午9时，钟鼓齐鸣，来自世界各地的13名高僧慢步走向天坛，其余高僧则簇拥着由斯里兰卡迎请回来的佛陀真身舍利子，安放在大佛第三层的纪念堂中。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宝莲寺筹建大佛委员会主席胡仙女士及港督彭定康共同主礼了开光仪式。这是香港开埠以来宗教界的一大盛事，大佛也已成为香港的标志之一，并将吸引中外信徒和游客前来朝拜。

此外，宝莲寺还是香港四大禅林之首，每三年传戒一次，授比丘和比丘尼戒。1993年秋期的传戒法会，有不少来自台湾、大陆以及东南亚、欧美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家人前来受戒，有比丘50人，比丘尼100人。该寺一向重视佛教僧才的培养，长期资助国内及港澳的僧人留学海外，提供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的经费；同时还赞助香港大屿山第一所中学“佛教筏可纪念中学”及在昂平村的“筏可疗养院”等。

2. 竹林禅院

位于荃湾北面，建于1925年，是芙蓉山上规模宏大的庵堂。因

历史上佛教在香港一直受到港英政府的压制，竹林禅院长期得不到承认，只以“曼华堂”这样的类似教堂的名字登记注册。该院属临济宗，开山祖师为广西籍的融秋法师，他自称是第三代，并依照广东鼎湖山的仪轨建制，而现任住持是意昭法师，祖籍也是广西，他是第五代。庙里有僧人 2 位、女尼 10 人，另有 600 多位常住人口，大多是孤寡老人。此庙占地 50 多亩，建筑设计宏伟壮观。入口处有一石牌坊，上书“竹林禅院”，院内有一重叠的巨石佛塔，还有妙莲洞、观音洞、罗汉洞、南天竺、紫竹林等名胜。

3. 观宗寺

位于新界上水，现任住持觉光法师。该寺的前身为静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造于新界粉岭，当年是一名法乳的僧人掩关修持的场所。日据时代，法乳滞留上海，而觉光也流落到桂林。香港光复后，觉光法师来到香港，筹款在该处建有宝公纪念堂，于 1980 年举行了开光揭幕礼，近年来又建了“宝静安老院”。观宗寺内有大雄宝殿，佛堂里供有西方三圣像，下堂设一大铜钟，冶炼工艺精湛。

4. 鹿野苑

是南京栖霞山寺在港的下院，创始人是栖霞山寺的住持舜若法师，其前任住持明常、大本均来自栖霞山寺，而上一任住持佛宗又是大本的法徒，现任住持超尘也是大本的法徒，因此，该庙与栖霞山寺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5. 青山禅院

位于屯门青山的北腰之上，是香港三大古刹中（另两处是灵渡寺和凌云寺）历史最悠久的。相传在南北朝时，有一名“杯渡”的奇僧，能踏木杯渡水，他于公元 428 年（即元嘉五年）时曾驻锡于屯门山，后人因之而改名为“杯渡山”，又因山木青葱而被叫做“青山”。杯渡禅师在此修行，并建有杯渡寺，也称杯渡庵，这即是青山禅院。

的前身。现在的青山禅院其主体据考证始建于宋代，是在已久废的杯渡寺原址上重建的。目前，山上还有杯渡岩，上面塑有杯渡禅师的石像；禅院内有一块一尺见方的化石，据说是一截龙骨化石，被看作镇山之宝。

6. 万佛寺

座落于沙田火车站西排头坑山腰之上，因供奉 13,000 多尊大小佛像而名扬海外。寺内建有玉皇殿、准提殿、弥陀殿、万佛宝塔、十八罗汉塑像等，建筑宏伟，雕刻精美。另外，庙里还供奉有月溪法帅肉身漆像。

7. 东普陀

在荃湾葵涌象山村之北，由内地高僧茂峰法师等人创立于 1933 年，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因与浙江的普陀寺庙布局相仿而得名“东普陀”。寺内以佛大、鼎大、镬大而著名，另设有茂峰法师纪念馆，内部陈列了镇寺之宝，也是香港佛教重要的活动场所。

8. 灵渡寺

座落于元朗的灵渡山下，香港三大古刹之一，相传在唐代以前就有此庙，南北朝时的杯渡法师还曾在此修法。这里环境幽雅，溪水回绕，是香港最著名的佛家修行圣地。

9. 西方寺

位于荃湾，1981 年在寺内创立了菩提佛学院，其学僧除来自香港本地外，还招收了新加坡、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等地的僧人，逐渐办成一所国际性的佛学院。住持是永惺法师。

三、主要组织

香港有 30 多个佛教团体，若以各团体的性质划分，属于国际性的组织有香港佛教联合会、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世界佛教友谊会

香港区会;属于比丘尼组织的有慈航精舍、般若精舍、佛教大光园、东莲觉苑等;属显宗组织的有香港正觉莲舍、菩提学会、香海莲社、普慧莲社等;密宗的组织包括金刚乘佛学会、香港佛教真言宗男居士林、香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葛玛迦珠佛学会等;香港佛教也有一些学术性的佛教团体,如佛教法相学会、佛教法住学会、三轮佛学会、明珠佛学社;另有一些弘法讲经的佛教团体,如香港佛教讲堂、圆明讲堂、光明讲堂等。近年来,东南亚的小乘佛教、日本的佛教等也传入香港,并建立自己的组织,如香港佛教日莲正宗、韩国佛教香港协会等。以下介绍几个较大的佛教团体:

1. 香港佛教联合会

位于香港湾仔洛克道**338号3楼**,是香港最大的佛教团体。它成立于**1945年**,由优曇、觉光、筏可、陈静涛、黄学仁等发起创立,并正式向香港政府注册为一佛教社会团体,从**1965年**起由觉光担任会长,是一包括佛教僧尼、男女居士四众的组织,现有个人会员万余人,团体会员则超过**200个**。该组织设会长、副会长及秘书长,还有**36名**董事组成董事会。佛联合会目前的会长仍是觉光法师,他是观宗寺的住持,曾任基本法起草委员、港事顾问;副会长黄允畋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与中英关系的转变,佛联合会与大陆佛教团体的关系日益密切。

香港佛教联合会自成立之初,就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开展医疗、教育等服务,**1970年**还创办了一间佛教医院,设有**500张**床位;另外,还办有**11间**中学、**10间**小学和**6间**私营不牟利的幼稚园,还开办了青年营、佛教坟场、青年中心、安老护理院、职业先修中学等。这些公益事业所需的资金每年约**1亿多元**港币,大多要靠政府的资助,其他则靠社会和信徒的捐助。日前,该组织还在不断扩大慈善事业,正在兴建佛教中心大楼。此外,佛联合会于**1960年**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会刊《香港佛教》(月刊)。

佛联会经常与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各国、中国大陆的佛教团体交流佛法，1972年正式加入世界佛教友谊会，成为香港地区分会，还是世界佛教僧伽会和世界宗教和平同盟会员，并与韩国佛教徒每两年定期举行佛教结盟联席会议，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佛教团体联系也很密切。

2. 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

这是由首任会长优昙及觉光法师倡议创立的，1961年筹组，1963年5月获准注册，全部由出家人组成，有会员近百人，内设弘法部等机构，1964年加入世界佛教僧伽会，也是世佛联、世界佛教友谊会的团体成员，1965年还加入了世界之华僧大会。该组织办有能仁书院等研究机构和学校，1972年开始发行《内明》佛教学术刊物，现任会长是宝灯法师，因体弱多病无法主持工作，日常事务由副会长超尘法师代理，他是香港妙法寺的住持，东北人。该组织与东南亚及台湾佛教关系密切。

3. 香港国际释迦文化中心

成立于1988年，创办人是郭兆明博士，会员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区，并邀请了世界知名的学者充当其名誉顾问。该中心以“阐扬释迦文化为宗旨，贯彻实践佛陀‘悲智双运，为根本任务’²，密切配合南传佛教的思想，倡导“立足香港，面对全球”，短短几年内就在国际文化交流、教育等方面做出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心的主席郭兆明博士几年来奔波于南亚、香港、大陆与蒙古等地之间，努力为该组织的运作展开了多渠道的外交活动，计划在斯里兰卡建一“佛牙寺宾馆”、要在前苏联筹建一“佛教文化中心”、在蒙古要创建一所佛学院等等，这诸多的活动已在香港佛教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4. 世佛联港澳地区中心

成立于1952年6月，同年10月正式登记注册，1969年11月成为

香港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开始获得香港政府的补贴，主要开展慈善工作。

5. 佛教日莲正宗

这是日本创价学会的一个海外分支机构，其成员主要是在香港的日资企业中的职员和工人，约有3万多信徒。该组织内部设有壮年、青年、妇女、女青四个部，另有6个区域性的办事处、27个分区办事处，还有110个地区办事处及数百个家庭式的小组，可见其组织的严密性。它在香港众多的佛教组织中较为活跃，如在1974年曾召开了“东南亚佛教徒文化节”，1975年还主办了“香港文化节”，极力扩大影响。

6. 香港佛光协会

这是台湾和尚星云的“国际佛光会”设在香港的分支机构。早在数年前，星云就在香港建立了“佛香精舍”，实际上是佛光山驻港的联络站。为了将佛光山的势力尽快扩充到香港，1990年11月，星云及其弟子投巨资在红磡体育馆举行大型的佛教弘法大会，吸引听众皈依其门下；1991年初，又买下九龙窝打老道的冠华园二楼，将“佛香精舍”进一步扩大，筹备成立“香港佛光协会”。1991年6月27日，“香港佛光协会”正式成立，并举行了大规模的成立大会，还利用香港传媒将星云的“人生佛教”思想广为宣传。

四、主要人物

明常 解放前由南京栖霞山寺派往香港，负责鹿野苑的寺务，1978年在台湾去世。

觉光 俗姓谷，辽宁营口市人，现为加拿大籍华人。11岁在营口的楞严寺出家，曾从戒圆瑛法师，在浙江宁波观宗寺及法学院学习。据称得到天台宗师宝静法师的心传，为天台第46代祖。1939

年他随宝静法师游化香江,并于1945年与优昙等人一起创立了“香港佛教联合会”,1960年6月创办《香港佛教》月刊,自任社长。1965年起觉光担任佛联会会长,还担任了世界僧伽大会副会长,他还是香港僧伽联合会的名誉会长、香港正觉莲社的社长、罗汉寺的住持、观宗寺的方长,他在香港的佛教界有很高的威望。观宗寺属天台宗,觉光是香港天台宗第46代“总持”。为解决后继无人之忧,于1992年12月27日在观宗寺公开举行天台宗传法大典,这在香港佛教界要算一创举,传法的弟子一是明义法师,任新加坡佛教总会的秘书长;另一位是愿炯法师,他曾任世界佛教僧伽会的执行委员;第三位是照诚法师,原为东北楞严寺的监院;第四位是果德法师,是观宗寺的监院。这次传法大会盛况空前,邀请了大陆和香港的高僧大德前来参礼。此外,他还担任了《海潮音》月刊社的社董、香港佛教青年会的导师等职,还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觉光法师曾多次回内地参观访问,1984年他应邀出席了国庆35周年的庆典,之后,又回到沈阳故乡看望乡亲。1992年觉光法师曾应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之邀率团访问大陆,与大陆佛教界增进了了解与友谊。

超尘 鹿野苑的现任住持,原上海玉佛寺住持震华的徒弟。他于解放初到港,后又去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华人区创建了龙华寺,在那里20多年,靠讲经和办法会为生。越南南方解放后,他回到香港,担任了鹿野苑的住持。目前他还担任了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的常务副会长。

洗尘 生于1920年,辽宁省复县人。11岁在复县潮海寺出家,后入沈阳万寿佛学院深造,毕业后接任清泉住持兼龙凤、潮海两寺的住持,此间创立了龙凤佛学院及小学、中学和孤儿院各一所。后到香港,在荃湾东普陀寺挂单。1950年他与金山法师在香港卫城道创办妙法精舍,不久开办佛学讲座及佛学班。1958年发起筹组

佛教医院,1960年与优昙、觉光等筹组“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1966年当选为该组织的会长。1969年他又创建一所私立大学性质的能仁书院,请香港及海外一些高僧大德前去讲经弘法,以吸引信徒。1970年在新界蓝地建妙法寺,内设学校及安养院。1971年他还在香港提倡短期出家制度,由“僧伽会”每年举办剃度传法大会,1978年在美国纽约创立“世界佛教中心”,还创办内明书院、刘金龙中学、佛教英文中学、佛教内明学校及幼稚园等,还主办《内明月刊》佛教杂志,在香港佛教界有一定的号召力。

黎曾植仪 香港佛教界知名人士。生于1907年,广东中山人,法号果成,字慧棠。她早年毕业于香港湘父女子中学,曾任香港佛教联合会常务董事兼妇女委员会主任、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副会长兼常务董事、香港佛教学校教师联谊会的顾问、佛教菩提学校的校董、佛教志莲安老院的永远赞助人等等,还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如黎氏宗亲会常务理事兼妇女部部长、曾氏宗亲会永远名誉会长兼妇女部主任等,在香港佛教女信徒中较具影响力。

郭兆明 香港的著名殷商,是国际释迦文化中心主席、香港显密佛学会会长,并因于1989年获得斯里兰卡佛教最高学府的荣誉博士学位而在当今的香港佛教界名声大嘈。郭氏的经历较富传奇色彩,40年代末他出生于一贫寒家庭,12岁时就外出打工,并曾露宿街头、沿街乞讨,后得到一亲戚的帮助才读书受教育,成年后做起了生意,不断发达。在而立之年又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和浸会学院,并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就皈依了香港的河清大师,后来还到五台山修持,又到斯里兰卡拜师取经,与斯里兰卡著名的佛学教授罗睺博士关系密切。1989年6月,斯里兰卡发生特大水灾,郭氏捐献了大批财物,为此他获得了佛学博士的荣誉头衔,斯国还赠他两颗佛祖舍利子,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私人拥有佛舍利子的人,他正筹划在香港建一流动的舍利塔来供奉这两颗

佛舍利。1988年他曾建立了“香港国际释迦文化中心”，将其影响扩展到世界；他本人还被蒙古国委任为驻港的荣誉领事，并在马来西亚筹建一座“世界和平文化中心”，在蒙古筹办一所佛学院，被印度菩提学会任命为香港区会的会长。近年，他还在北京农业大学设立“香港郭兆明博士奖励基金会”，向大陆的多所寺庙捐款，并向中国佛教协会捐献了一部巴利文英译的《南传大藏经》。目前，郭氏正在香港筹建Y.M.B.A，即佛教青年会，仿效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注重引导青年信仰佛教。

宝灯 香港湛山寺的住持，现任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的会长。

永惺原名演霖，生于1926年4月25日，祖籍辽宁，俗名刘克勤，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五，12岁出家，24岁（1949年）来到香港，先后创办了“东林净舍”等四座佛寺以及“菩提学会”等十几个佛教慈善事业。现任香港菩提学会会长、西方寺的住持，还担任了香港佛教联合会的副会长、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的会长、虚云和尚纪念馆董事长，也是东林安老院的创办人、美国德州佛教会的主席。1983年菩提学会创办四年制的“华夏中医学院”，为社会培养医学人才，所颁发的学士文凭已得到香港政府的承认。另外，他还担任了2所佛教学校的校监、5所佛教学校的校董，很重视青少年的教育。1992年6月他率团访问了家乡及哈尔滨当初他出家的观音寺，上海的龙华寺授予他名誉方丈的称号，他在香港佛教界享有较高的声誉。

愿炯 香港大屿山妙莲池的住持，俗姓林，曾获得香港大学的学士学位，还担任过香港政府劳工处的高级官员，后出家为僧，在台湾受戒，信奉密宗。

圣一 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的住持。1982年曾率领一个102人的“香港宝莲寺迎请大藏经代表团”到北京访问，迎请《龙藏》；中

国佛协专门从苏州调拨了一部保存较全的清《龙藏》赠送给宝莲寺，作为永远供养。

智开 山西五台县人，1948年定居香港，为香港佛教联合会的董事、法喜精舍的住持。近年来曾多次回家乡，并为家乡捐赠价值200万元的物资，还捐款19万人民币支援家乡修路。

智慧 香港宝莲寺的监院，香港人士，3岁入宝莲寺，9岁成为常住。除1926年第一代纪公老和尚外，从第二代方丈到如今的第七代方丈初慧大和尚，他都亲近请益。他还多次访问大陆，从80年代中期即发愿筹建香港的天坛大佛，经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建成，并在1993年底开光，这座天坛大佛的建成，智慧法师功不可没。

注释：

1. 《宗教工作基础知识》，第507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91年。
2. 《香港佛教》月刊，第18页，1992年6月。

第二章

道 教

一、历史与现状

(一) 道教在香港的发展史

香港的道教与民间宗教信仰互相混杂，并且历史悠久。若考证道教在香港的历史，就要追溯香港的历史。香港历史上属于广东番禺县，而据史籍记载，早在东晋时道教就传入番禺县，那时香港地区的民间很可能也已流行道教。但这只是一种推测，缺乏史料印证。到了南宋时期，香港已有了颇具规模的天后庙建成。目前，香港的天后庙共有 20 多处，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位于新界的佛堂门天后庙，也称北堂天后庙，俗称“大庙”，建于南宋，至今已有 700 多年。到明清时期，拜天后在民间更是一种风俗，同时，道教的各派在民间以各种形式流行，并建立宫观庙堂。如建成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的长洲北帝庙、建于同治二年（1863 年）的湾仔北帝庙等。

香港开埠以后，随着内地移民的增加，道教信徒日益增多。到民国和抗日战争胜利时，道教仅限于民间。从 50、60 年代以来，香

港的经济日新月异，人口剧增，道教同其他宗教一样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小庙宇纷纷建立，且信徒遍布社会各阶层。1961年6月，由香港各道堂筹组成立了香港道教联合会，香港的道教向组织化过渡。但是“道联会”仅为一联谊性组织，内部联系较松散，派别林立。作为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香港道教在社会中影响广泛，尤其是对光一辈人。道教界的大多数领袖也都是工商界的名流或社会威望较高的名士。

（二）现状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在香港普遍流行，信徒涉及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老一辈的居民。然而，由于在居民中道教常与佛教、儒教信仰相混，香港的道教信徒难以统计，据估计有数十万之多，道士女冠约千人；大小宫观有100多处，大多分布于闹市区，著名的有松荫园、圆玄学院、青松观等。香港道教派别林立，有纯阳派、全真教、先天道等。道教的团体众多，并且都要向香港政府申请注册，才可公开活动。香港道教联合会是香港最大的道教组织，其会员包括了香港道教团体中的一半以上，它还是香港六大宗教的代表组织之一。因信奉道教的人很多，道教在香港社会中的作用也很大，除为人们提供精神寄托外，道教团体也积极承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为市民提供医疗、教育、文化及社会公益等服务。道教在香港居民心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香港对道教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并著书立说。其中香港人学中文系高级讲师黄兆汉博士曾先后出版了《道教与文学》及英文版的《道教学者张三丰研究》等，有较大影响。

大陆改革开放后，香港道教界经常组团访问内地，并捐资修缮道教寺观。1994年6月，以赵镇东为团长的香港“道联会”高层成员赴京访问，并资助了“中国道教协会”创办的道教学院。

二、重要的宫观

香港道教庙宇大大小小共有120余处,有些是三教合一或与佛教、儒教相混,其中65个参加了香港道教联合会,它们是:青松观、蓬瀛仙馆、啬色园、圆玄学院、云泉仙观、竹林仙馆、省善真堂、九龙道会、龙庆堂、抱道堂、金兰观、翠柏仙洞、先觉祠、玉壶仙洞、通善坛、六合玄宫、信善堂、松荫园佛道社、万德至善社、华松仙馆、竹隐长春洞、纯阳仙洞、心庆佛堂、善济佛道堂、庆云古洞、行德佛道社、香港道德善庆洞、英庆堂、户林精舍、藏霞精舍、玉清别馆、玉琼阁、芝兰堂、宾霞洞、天启道坛、翠竹林、云鹤山房、永乐洞、明元仙馆、万佛堂、松庆苑、乾元洞、瑞霞园、崇竹阁佛道社、天真堂、飞霞精舍、慈善阁、赤园堂、普善佛堂、蓬鹤仙观、紫霞上园、葆真堂、飞雁洞、觉园、仁枫佛道社、金霞精舍、成德堂、灵霞阁、香港道德会福庆堂、蓉庆堂、九龙别院、六合圣室、圣明坛、真霞观、仁德善社,崇道堂等。另外还有60个较小的道堂没有参加道联会,其中有许多是私营的、或半公开甚至是不公开的,如:藏宝洞、紫霞下园、九龙藏龙宝洞、智园、明霞佛堂、金玉堂、锦田文道馆、信善紫关玄宫、信善紫关玄观、信善礼义玄观、进康堂、众生堂、生生堂、大仁样、至和坛、智园行德堂、阅云堂、同仁堂、永安堂、江永安堂、炉峰学院、鹿湖精舍、德教紫靖阁和同善社等。

香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道教宫观有以下几座: (1)元朗旧墟玄关二帝庙,内存康熙甲午年(1714年)“风调雨顺”钟、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香鼎、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聚宝炉。(2)元朗八乡元岗众圣宫,内有乾隆十五年(1750年)间的钟两座。(3)长洲北帝庙,建成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内存有乾隆四十九年的钟一座。(4)上环文武庙,今存有光绪二十年(1894年)重修时

的碑记，另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钟一座。（5）屯门青云观，内存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名碑。（6）湾仔北帝庙，建于同治二年（1863年），内存有当年钟一座。（7）红磡鹤园角北帝庙，建于光绪二年（1876年），原址在青州以东。（8）大屿山鹿湖普云仙院，内存有光绪九年的石刻。

以下介绍几个著名的道观：

1. 圆玄学院

位于九龙荃湾区，创建于1946年，是由该院现任董事会主席赵镇东的叔叔赵聿修等人创办的，因赵先生的父亲原为广东罗浮山的道人，他本人也曾此出家，所以圆玄学院与广东罗浮山有道脉相联的关系。目前是港九最大的一个道场，也是供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总坛，其宗旨是以忠、孝、仁、爱、礼、义、谦、耻八字为本，以善行行事，办有诊所、儿童医院、安老院等服务机构，是香港道联会的主要团体会员。院内布置集三教之长，尤以仿自天坛的三教大殿和高耸的牌坊见著。院内还办有素食馆，设有骨灰堂，每天吸引了许多香客及游人。近年来还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络，多次组团访问大陆，并捐资和多种教具，改建广州市朝天路小学，还捐助了“中国道教协会”创办的道教学院。

2. 青松观

又称青松仙观，位于新界屯门，成立于1949年，是由现任观长侯宝垣一手创立的，在香港的道教界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上都是较大的道观。青松观现为一道教法人组织，属全真宗龙门派，主祀吕纯阳祖师，社会服务工作办有男、女安老院、护理安老院各一所，西医赠诊所两间，气功治疗、中医成药派赠等，幼稚园2间、小学2间，英文中学1间，1992年还创办了香港道教学院，另办有一民俗展览馆，举办一些社区的文化、艺术、康乐、体育、民俗等活动。该观建筑仿照中国道教名山大殿建成，以壶天圣境牌坊、三清大

殿、九龙壁和九曲莲池最为著名，据称在港的皈依观员逾千人。另外，青松观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澳洲及加拿大设有分观或联系机构。

3. 蓬瀛仙馆

位于新界粉岭西南，创立于1929年，也是香港道教丛林之一，该道馆属全真龙门派，崇奉三圣，即太上老君祖师、吕纯阳祖师、邱长春祖师，主要建筑有二圣大殿。创立初期原作为道侣修行之所，1949年香港华民政务司署准予登记为道教社团，后于1972年注册为不牟利的宗教及慈善团体，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由理事会管理，除提供除宣道、奉祀、科仪等宗教服务项目外，还提供赠医、教育、安老、慈善、公益等社会服务。馆内以园林布局取胜，环境优雅。1990年还创办了太平幼稚园，该馆的全部收入皆用于慈善、公益及宗教活动，目前正拟重建。该馆曾多次组团到内地访问，1991年华东大水灾时，捐助了100万元港币，1992年3月组团访问了北京、白云观，并与白云观缔结了“同源友好宫观”。丘福雄先生为该馆的永远馆长。

4. 信善紫阙玄观

位于九龙，1964年在澳门开光，1973年搬到香港重新开光。该观属正一派，信奉吕祖，秉承尊师重道，渡人向善。设有非牟利安老院、道教学校等，还赠医施药，开办一些社会公益事业。但该观没有加入香港道教联合会，有信徒近千人。自1983年以来，该观曾多次组织来大陆参访，并与北京白云观互访，增进了道谊。

5. 玉壶仙洞

位于香港中环结志街，其经忏的声誉在香港道教界最高，经忏主任陈佩能是青松观观长侯宝垣的徒弟，曾组团多次到大陆来訪。该道观是香港道联会的主要成员。

6. 云泉仙馆

为广东南海县西樵山云泉仙馆的下院，1944年由现任馆长吴耀东之父吴礼和创办。在沦陷期间，吴曾提倡施衣派饭、赠医济贫。该馆办有吴礼和纪念学校，并捐助广州三元宫、冲虚观、九天观等的修建，是香港道联合会的主要成员。

7. 信善坛

位于九龙深水埗，也是道联合会的团体会员，与香港紫阙玄观、六合玄宫同属信善系，供奉吕祖，以“九美”为宗旨，劝人向善，坛主梁津曾多次来大陆作友好访问。

三、道 教 组 织

香港道教联合会是香港最大的道教组织，会址在香港深水埗。1960年由多间道堂发起，共同筹划组成“香港道教联合会”，1965年正式成立，并于1967年获注册为有限责任的合法团体。1975年12月新会址落成，该组织有了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目前，道联会有61个团体会员，占全港道堂总数的一半以上，香港著名的道教宫观大多是其会员。作为香港道教界最大的组织，道联合会努力通过兴办教育、宣扬道德及创办社会福利事业来发挥自己的社会影响，如办有中学4间、小学6间、幼稚园4间。另外，道联合会与大陆关系一直很密切，曾多次组织到内地参观访问。该组织还代表了香港道教界参加了“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座谈会”，与其他五大宗教一起同样受到社会的重视，并关心香港的世风及前途。道联合会每三年为一届，连选连任，1993年选出第十四届理事会，设主席若干，有汤国华、赵镇东、吴耀东、丘福雄、周铭、陈钦，会长若干，由侯宝垣、罗智光等人担任。

四、主要人物

汤国华 生于1908年,广东顺德人,他既是商人,也是位虔诚的道教徒。目前,他是香港道教联合会的主席,还任圆玄学院主席,在香港开有皇后洋行有限公司,任该洋行的董事长。他历任九龙总商会的永远会董、九龙总商会的副理事长、港九塑胶制造商联合会会长、香港津贴学校议会委员、华人庙宇委员会委员、香港道教联合会学校校监、博爱医院总理、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学校校监、孔教学院董事等职。其子汤伟奇是皇后洋行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做石油、玩具生意,每年与台湾有1—2亿美元的贸易。

赵镇东 香港道教联合会第十四届理事会的主席、圆玄学院董事会主席。生于1922年,广东东莞人。其父原为广东罗浮山的道人,他自幼随父亲在罗浮山出家,后来到香港创办了圆玄学院。赵先生除热心道教事业兴办慈善机构外,在香港还兼做大米、石油的生意,还曾任仁济医院癸酉年的总理、联丰祥有限公司及圆玄素食馆有限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他于1986年12月获得英女皇太平绅士的荣誉奖章,并曾多次访问内地,资助内地修复道观,目前还是全国政协委员。

吴耀东 香港云泉仙馆的馆长,广东南海县人,生于1930年,其父吴礼和原为南海县西樵山云泉仙馆的主持,后到香港创办今天的云泉仙馆。他是香港道教联合会的主席之一,香港道教联合会学校的校监,曾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委员。1986年应中国道教协会的邀请率领香港道教联合会访问了大陆。他还在台湾开有东阑实业有限公司。

侯宝垣 香港道教联合会第十四届理事会所选出的会长之一、青松观的观长,自称“道教青松派全球观长”“全真青松道派”

的开创人。他原籍广西省贵县城北镇，生于1912年，20岁时萌生皈道之念，后经商。1950年旅港时与其道兄易宝云等人一起创建了青松观。以后专心修道，并为青松观的扩建及发展颇费心力，终使该观成为香港道教界的一大道场。他本人精通道教科仪，并注重弘扬道教精神，从1981年起陆续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设立了青松观的海外道场。1984年10月还曾率40人的团到台湾与高雄指南宫结为盟会，同年还获英女皇颁发的荣誉奖章，1986年9月被台湾的“中华民国道教会”聘为第六届顾问。青松观在他的领导下开办了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如热心教育，办有幼稚园和小学各2间，中学1间，1992年更创办了“香港道教学院”，还聘请内地的一些著名学者前去讲学，以增进道谊。近年来他不断访问内地，并先后捐助惠州元妙观修建三清大殿及重建广东陆丰的紫竹观等，1993年9月率团参加了在北京白云观为祈祷世界和平、护国佑民举行的罗天大醮，并与白云观、台北的指南宫联合向“希望工程”捐助了100万元人民币。

丘福雄 香港道教联合会的主席之一、蓬瀛仙馆的永远馆长。生于1919年3月1日，广东梅县人。他曾担任香港道教联合会的副会长及蓬瀛仙馆的理事长，1993年“道联会”换届时被选为第十四届理事会的主席。1987年以来，他曾多次访问内地，捐助修建广州三元宫等。除热心道务外，他还经营商业，为香港南洋输出入商会的名誉会长、柏乐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及郭氏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等。

周铭 香港道教联合会第十四届理事会的主席，此前曾担任“道联会”的副主席及财经委员、香港省真善堂“道教善团”的总理、九龙乐善堂的常务总理。在热心道务的同时，他还从事一些商务，担任荣德纱布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香港布商业同业公会的名誉会长等职。

陈钦 香港道教联合会第十四届理事会的主席，曾多次到内地参访，增进了道谊。

附：

民间宗教信仰

香港华人社会因与大陆文化传统相同，中国民间信仰也颇为流行，甚至建立了众多的寺庙。实际上，道教及一些佛寺受到民间宗教的影响也显而易见，许多大的寺观多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很难分清是佛教或是道教。另外，因民间所信奉的道教的神灵众多，常与其他民间宗教信仰混杂，所以西方的学者习惯把道教归于中国民间宗教之列，将除佛教以外的中国传统宗教一律视为中国民间宗教，70年代中期时香港信仰这种民间信仰的人数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到80年代中，这一数字有所下降，达47.4%，若加上佛教徒，那么信仰中国传统宗教的人数占总人数的64.6%¹，可见香港民众受中国传统宗教影响之深。但是，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则将香港的许多民间信仰归之于道教之列。

香港的民间宗教信仰主要是受佛教、道教及儒家的影响。香火最旺的是妈祖崇拜，妈祖也称“天后娘娘”，是保佑渔民和海员的神灵，但如今信徒也包括许多陆上居民，多达25万，这大概与香港对捕鱼及海上贸易的依赖有密切关系。全港的天后庙不下24间²，其中以人庙湾的一间最负盛名，每逢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日，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善信前往朝拜。其次是对道教中一些神明的崇拜，突出的是拜关帝，他被认为是武功盖世而又义薄云天的神仙，也是万能之神，香港虽然专祀关公的庙宇不多，但供奉关帝的

神坛(包括神台、神位)的据称是众神中首屈一指的,许多寺庙里都供奉关帝,连各行业的店铺及住家也设有关帝的神位,如香港的警察尤其崇拜关帝,因他是武神;赌赛马的人将关帝视为“马神”,这大概因为他奇的赤兔马为神马的原因吧;另外在香港将专门奉关公的庙称为“关帝庙”“协天宫”等,也有例外,如长洲的“关公忠义亭”;“文武庙”里主祀的则是关帝。此外,还有长洲守护神北帝、司天气的南海之神洪圣、司医药的黄大仙帝等等。第三类为佛教的一些神灵,如观音菩萨、弥勒佛等。第四为祖先崇拜的神灵,将有巨大功勋的先人拜为神,来保佑后人,如车大元帅(武神)、鲁班(建筑业的保护神)、保生大帝(医药神)等。还有一些属于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现象,以及迷信风水、卜卦、看相、测字等,甚至形成了一支研究和实施风水学的“专业队伍”,还对某些数字颇为迷信,认为“8”与“发”同音,会给人带来好运气,而“4”与“死”字音相近会,给人带来晦气,等等。

另外,在香港还有一些一贯道徒。香港的一贯道也是从大陆传入的。1949年大陆解放后,一贯道“师母”孙慧明迁到香港,其他一贯道的重要人物也随之来港。目前,香港据称有一贯道的佛堂300多,信徒在5万以上,但至今没有一座庙宇向港府以“一贯道”的名义登记。在香港,一贯道的活动仍然相当隐秘。

民间宗教信仰者不单单信仰一种,也可能同时崇拜几种神灵,同时也可改变信仰,只看所拜的神仙是否灵验,所以,民间宗教往往带有很大的功利性。

以下介绍一些香港著名的民间宗教寺庙。

1. 大庙

又称佛堂门天后庙,位于鲤鱼门外清水湾半岛的南端,是一座有700多年历史的古庙,也是香港最著名的天后庙,数百年来香火不息,尤其是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圣诞日,是香港最为隆重

的传统节日之一，并要举行盛大的祭典，成千上万的香客前来朝拜，场面热闹非凡。在大庙的山上，还保留有一块南宋的石刻。

2. 文式庙

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建于1847年，曾一度为民间的审裁处，关公自然是“判官”之一。庙里供奉文昌帝和关帝。据《重修香港文武二帝庙堂碑记》载，该庙曾在1850年重修，至今香客不断，香火鼎盛。

3. 车公庙

位于车公庙路附近的新田围村，供的是香港本地的保护神车大元帅。传说他是古代一位解救沙田疫症的大将军，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三为车大元帅的诞辰日，届时，来朝拜的游人如海，香火颇旺。

4. 铜锣湾天后庙

位于铜锣湾东天后庙道口附近，建于18世纪中期。清乾隆年间原称盐船湾红香炉庙，据说当年在该庙位置上曾发现一铜制的红香炉，因而建成此庙，而港岛占名“红香炉”亦由此而得名。

5. 侯王庙

位于九龙城联合道，据称建于250多年前，供奉宋朝末年的皇舅杨亮节。该庙里保存有大的古匾和石碑，是研究香港历史的宝贵文献。

注释：

1. 参见前文所列《基督教百科全书》上的香港宗教徒统计表。

2. 《香港年鉴》1992—1993年，第281页，香港政府主编。

第三章

天主教

一、历史与现状

(一)天主教在香港的发展史

香港的天主教是从澳门传入的。在鸦片战争以前，香港没有澳门发达，只是一个小渔村。欧美的传教士都是以澳门为跳板，经广洲向中国大陆传教的。到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占领香港，传教士才于1841年由澳门转到香港。始有瑞士籍传教士若瑟 (Theodore Joset) 来到香港，他本是罗马教廷传信部驻澳门的代表，抵港后为英军中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服务。1841年4月22日，罗马教廷将香港列为监牧区，任命若瑟为首任监牧。根据《香港天主教手册》的划分，将150年的香港天主教会发展历史分为六个时期：

1. 监牧区时期 (1841—1874)：这一时期是香港天主教会的草创阶段，传教士很少，1842年1月22日，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纳华路 (Michael Navrro) 到港，成为第一位居港的天主教司铎。第一座天主教堂于1842年在威灵顿街奠基，定名为“圣母无原罪堂”，1858年扩建，1860年重建。1844年将传教工作扩展到赤柱与柴港。

1845年时据称香港已有1,200多名天主教徒¹。1846年,天主教会成立了本地修院(1888年称为“圣母无原罪修院”,1900年迁到主教座堂前),1847年,日本宗座代牧、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科蒙席(Mgr. A. Forcade)被委任为香港代监牧,该会的传教士们才首次到港,开展传教。1848年,沙尔德圣保禄女修会来港,这是第一间到港传教的女修会,负责照料弃婴、老人和病人的工作。1852年位于湾仔的圣方济各医院开始启用,到1869年改由嘉诺撒修女接管。此时的天主教徒以欧洲人为主,据1856年的统计,全港7万人口中,有教徒3,000人,其中除英驻军中的爱尔兰籍教徒外,还有印度籍的天主教士兵、澳葡人,另有600名左右是从广州或澳门来的中国人,其余是菲律宾人。1858年香港监牧区交由米兰传教会负责管理。1860年,第一批嘉诺撒修女抵港,开始从事教育和社会服务工作,随后有不少国籍女子加入,成为该会第三会会员(后为耶稣宝血会修女),当年5月1日、10日圣心英文书院、培青中文学校相继开办。1861年道明会神父来港传教。此时的香港监牧区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差不多整个新安县(今保安县),传教工作也扩展到了九龙半岛、大埔区、西贡半岛及蓝头等地区。各传教团体在传教的同时注重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以扩大天主教会在华人中的社会影响力。至1867年,罗马教廷委托米兰宗座外方传教会,开始全面负责管理香港监牧区,并任命高神父(Fr. Raimondi)为宗座监牧。

2. 代牧区前期(1874—1910): 1874年11月17日,香港监牧区升为代牧区,代牧区的范围扩展到新安县、归善县(即惠阳)和海丰县,委任高神父(Timoleon Raimondi)为首任“宗座代牧”,他在同年祝圣为主教。次年,召开了首次代牧区会议,将香港代牧区分为五个区,传教范围大大扩展。1877年9月22日香港天主教英文周刊创刊。1880年在香港召开了中国天主教会的第一届教会会议。这一时期,天主教教务发展迅速,教堂纷纷建立。1888年12月

7 日，圣母无原罪总堂落成，并作为主教座堂；而教会所主办的学校及慈善机构也不断增加。1891 年中国天主教会第五区第二届教会会议在香港召开。至 19 世纪末，香港人口约 30 万，其中天主教徒已逾 8,000，但外籍教徒仍占很大的比例。

3. 代牧区后期(1910—1946)：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局势动荡，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及香港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都使香港社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天主教会也不例外。但各国修会继续在港建立各自的机构或学校，1920 年更将教务推展到大屿山，并出版了天主教英文月刊《磐石》；同年，美国玛利诺传教会抵港，接管西环感化院和孤儿院，次年，该会修女到港，于 1925 年建立玛利诺修院学校；1923 年 2 月 2 日，安贫小姊妹会到港，在九龙开办安老院；1926 年爱尔兰耶稣会神父来港，于 1929 年开办利玛窦宿舍，在 1931 年开始管理华南修院，1932 年又开办了华仁书院，在香港教会早期教育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28 年嘉诺撒修女开办圣方济各医院，同年，加拿大圣母无原罪传教女修会到港，创办德信学校，等等。这一阶段，天主教会将教务的重点转移到华人中间，教会也开始走向本地化，1922 年成立的国籍宝血女修会（是一自立修会）及 1931 年开办的华南修院，都是为培养华人教牧人员而设立的机构。1928 年，创办了中文《公教报》，1934 年还成立了“公教真理学会”，1945 年 11 月 9 日又设立了公教进行社。1941 年 12 月 25 日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香港沦为日据，许多教徒逃离香港，大批的教士和修女也逃避到澳门，华南总修院和香港教区圣母无原罪小修院的大小修生也先后迁到澳门，传教士有的被拘、有的被逐，香港天主教会的活动陷入停顿，直到抗战胜利。

4. 教区建立期(1946—1967)：1946 年 4 月 11 日罗马教廷在中国建立了圣统制，香港天主教会纳入罗马天主教的圣统制内，香港代牧区升为主教区，恩理觉 (H. Valtorta) 于 1948 年 10 月 31 日升为首

任教区主教。这一时期，香港天主教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梵蒂冈视香港主教区为影响东南亚华人及中国大陆的重要基地，因而香港吸引了世界各种天主教的传教组织不断地来此传教，发展各自的势力，建立完善的教区组织。例如，在1949年1月25日九间市区教堂同时升为堂区；仅1950年到1951年的两年间，先后有高隆庞修会神父、母佑会修女、巴黎外方传教会修女、圣母圣心会会士、善牧会修女到港。1949年10月1日后，中国大陆解放，内地传教组织、教士及信徒随着移民纷纷来港，一时使香港的人口总数猛增，教徒的人数也激剧增加。天主教各修会及传教会集中力量在新移民区传教，仅1952年就先后建立了以下中心或小堂：京士柏—恩理觉主教纪念小堂、柴湾—海星小堂（1957年5月升为堂区）、东头村—圣母圣诞小堂（1957年5月升为堂区）、九龙仔—圣伯多禄小堂（1957年5月升为堂区）、钻石山—圣家小堂（1957年5月升为堂区）、牛头角—大神之后小堂（1957年升为堂区）、长沙湾—圣母中保小堂（1957年5月升为堂区）。

这一时期还建立了教会的社会福利机构及宣传组织，如1958年6月16日由白英奇主教（Bishop Bianchi）发起成立“香港明爱”，这是天主教会在港正式设立的社会福利机构，不久即开展了各类的服务活动。1959年1月8日成立“教友传教总会”（1974年改名为“香港天主教教友总会”），同年4月9日，“公教进行社”的新社址在于诺道落成。1962年“明爱”先后在香港仔、荃湾开设了两家社会服务中心，1964年又设立了苏屋村医疗中心。1963年3月7日，教区的教理中心也正式投入使用，以适应教会迅速增长的需要。到60年代中期，全港人口350万，天主教徒将近30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5. 更新与本地化时期（1967—1975年）：受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影响，香港天主教会开始走向内部的改革。

1967年7月1日,华人神父徐诚斌被委任为辅理主教,同年10月7日祝圣;1968年12月19日,白英奇主教辞职,罗马教廷委任徐诚斌为署理主教。1969年5月29日,徐正式出掌香港教区,10月26日就任为香港教区第三任主教,同时也是首任香港教区华人主教(1969—1973年)。以后,香港的主教均由华人担任。第二任为李宏基(1973—1974年),现在的主教胡振中为第三任,1975年7月25日祝圣就职。

受世界天主教会形势发展的推动,香港教会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更新与本地化运动,如1969年10月天主教会与香港圣公会一起首先进行合一运动,为海员服务;1970年召开了香港教区会议,促进教会内部更新运动的发展;同年12月19日,罗马教皇保罗六世访问香港,他认为香港教区是“一个成就超卓、充满活力的教会”,次年成立了亚洲主教团协会秘书处,香港成为罗马天主教会远东区传教的重要基地。1971年3月,亚洲13个国家的主教团团团长在香港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并成立了“亚洲主教团协会秘书处”。这一时期,香港教会自身的本地化色彩加深,并开展与基督教其他教会间的联系,发展了国际交往。

6. 富裕社会中的教会(1975年至今):70年代中期以来,香港经济发展迅速,社会逐渐走向富足,至80年代,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的天主教会也在稳步发展。

新的堂区不断建立,如1975年11月10日,建立了何文田圣神准堂区(1979年7月升为堂区);1976年1月祝圣了上水区基督之母堂(1979年7月升为堂区);1977年3月祝圣了沙田圣欧尔发圣堂;同年10月又建立了黄竹坑圣路加准堂区;1980年下葵涌圣斯德望堂区成立;1982年青衣岛设立了圣多默宗徒准堂区,等等。新的组织也相继成立,如1977年10月1日,成立了教区视听中心;1979年3月21日,“教区国籍司铎协会”宣布成立等。香港教区还加强

了与国际天主教组织的联系，一些修会或传教机构继续到香港开展各种活动，如1975年10月墨西哥外方传教会来港，1977年2月仁爱传教兄弟修会到港为伤残人士服务，1979年1月圣保禄孝女会修会到港传教，1983年仁爱传教女修会来港为被社会遗弃者服务等；另外，国际教会组织纷纷来港访问，如1978年德国的主教团、1984年“宗座教友参议会”的成员等。

1988年5月29日，主教胡振中被提升为枢机主教，香港教区更受到罗马教廷的重视。教会本身更关注社会生活，成立各种机构，联合香港其他五种宗教，组成“六宗教关注社会问题小组”，就香港“九七”回归与前途等问题，举行一些活动；1990年12月28日还举行大型的香港教区成立150周年纪念活动，其主题为“承担与同行”，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还亲致祝贺信。与此同时，随着1997年的临近，也更注意发展与大陆天主教会的联系，1985年3月25日，由主教胡振中带队的香港天主教五人代表团应邀访问大陆，这是香港主教首次访问大陆；此后，中国上海教区的金鲁贤主教率团访问了香港。

根据香港教务处1989年1月24日的统计：香港天主教徒人数约27万，有55个堂区、5个准堂区，约占当时人口的5%；神父有342名（其中国籍的142名），但大多数的堂区为中国神父负责管理，外籍神父一般是协助堂区工作；修士共80名（其中国籍的35名），修女共731名（国籍的有450名）。另有两所修院，一是教区开办的圣神修院，一是修会办的慈幼会修院，共有修生27名，其中有一名来自澳门。教会开办的各类学校共237座，学生有31万，占全港学生总数的1/4²。

（二）现状

根据《香港天主教手册一九九三年》的统计，到1992年中香港

天主教徒的总数为 249,182 人,其中香港区有 98,129 人,占教徒总数的 39.38%,九龙区有 103,033 人,占总数的 41.35%,新界区有教徒 48,020 人,占 19.27%;另有 9 万菲律宾人(其中大部分为菲佣),几乎全部为天主教徒,占全港总人口的 5%。堂区共有 54 个(香港 13 个、九龙 26 个、新界 15 个),其中 21 个属教区神父管理,33 个属修会神父管理;另有准堂区 9 个(九龙 4 个、新界 5 个)。大小天主教堂 110 间,其中圣堂 37 间,小堂 36 间,礼堂 37 间。神职人员:主教 1 名(另有 2 名在港居留的主教),还有 2 位副主教及 4 位主教代表,分别协助主教处理教务;神父共计 326 名,其中教区神父 73 名(国籍 71 人、爱尔兰籍 1 人、美国籍 1 人),修会神父 253 名(国籍 60 人、其他国籍的 193 人,分属 14 个不同的修会);修士共有 64 人,其中国籍 28 人,其他国籍 36 人,分属 10 个不同的修会;修女共计 632 人,其中国籍 384 人,其他国籍 248 人,分属 24 个不同的修会。修生共 20 位,其中属于教区的修生共 7 位,修会修生 12 位,另外 1 名是澳门教区的修生;初学生有 13 人,先修生 19 人。

香港天主教会遵从罗马天主教古老的礼仪传统。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后,香港教区教理中心及礼仪委员会根据梵二公布的新的“入门圣事准则”及本地的实际情况,在 1980 年制定了香港成人“入门圣事礼仪”。这一礼仪具有本地化色彩,也是香港天主教推行本地化的一个重要的改革步骤。一般来说,一个人若要皈依天主教,要经过慕道阶段,其间要经历信仰上的考查,并接受教导,还可参加主日的圣道礼及经常的聚会,时间大约三年,在每年圣诞节和复活节进行洗礼,成为天主教徒。领洗之前,还要参加聚会、守斋及祈祷,聆听圣经和训导,并接受主教的覆手及驱魔,即主教在其耳朵和鼻上划上十字圣号。香港每年受洗的成年入教者大约有 2,000 人。

(三) 社会影响

1. 教会的教育事业

香港天主教会与新教各派一样,自成立起就非常重视教会教育。一方面,注重教会教育,以培养神职人员,如1842年在拨地建堂的同时就建立神哲学院,1846年成立本地修院,19世纪50年代在皇后大道创立神哲学院,1896年成立嘉诺撒圣方济各书院;1936年玛利诺修院学校建立,1964年香港仔教区圣神修院(前香港仔华南总修院)成立等。另一方面,天主教会也十分重视世俗教育,如1843年2月1日开办了第一所中国男童学校;1848年沙尔德圣保禄女修会到港后,在从事社会服务的同时,也开办小学教育,如“英法学校”(即今天的圣保禄学校),这是本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学校;1864年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书院——救主书院;1877年香港公立学校、维多利亚英文女校及一所新成立的葡国学校均移交天主教教会办理;同年由香港圣类斯感化院出版了一本《香港教育史大事记》的小册子,追溯了1857年至1877年间港府、圣公会及天主教会有关教育活动的历史;1886年在新界西贡成立了第一间堂区学校澄波学校,以后,各堂区开始尝试办学;1919年香港华仁书院创立;美国玛利诺传教会于1927年开办圣神学校,即玛利曼中、小学之前身;1917年兴建了第一所教区中学南华中学;1969年教会开始兴办职业先修学校,明爱圣方济各职业先修学校及明爱圣高弗烈职业先修学校相继成立。这些天主教会在香港创办的教会学校,因历史悠久,学校的师资力量也较完备。到1989年底,各类学校共有280间,幼稚园占13.4%,小学占49.7%,文法中学占21.3%,工业学校占1.5%,职业先修学校占2.7%,职业学校占2.4%,成人教育占6.4%,特殊学校占2.4%。学生共有313,422人(其中天主教徒占8.85%)。创办学校的团体主要有教区(占52.7%),女修会(占28.7%)及男修会(占18.6%)。

到 1992 年中，教会创办的各类学校共计 270 间，其中包括：幼稚园 40 所、小学 100 间、英文中学 65 间、中文中学 6 间、职业先修学校 9 间、专业学校 10 间、成人教育（日校）26 间、夜校 7 间、特殊学校 7 间。这些学校中教区所办的有 101 间，明爱学校有 44 间，男修会经办的学校有 49 间，女修会经办的学校有 74 间，其他有 2 间。就读于这些天主教会学校的学生共有 315,353 人，其中入幼稚园的有 15,034 人，小学有 127,303 人，英文及中文中学有 77,566 人，参加职业先修学校的有 7,732 人，专业学校的学生有 7,126 人，参加成人教育的有 73,033 人、夜校有 6,014 人、特殊学校有 665 人，学生中天主教徒只有 27,200 人，占总数的 8.62%；教职员共 11,019 人，其中有神父 62 位、修女 120 位、修士 27 位，有男教员 3,924 人，女教员 6,886 人，其中有天主教徒 3,278 人，只占总数的 30.32%。可见，天主教会开办的教育事业面向的服务对象很广，在香港的社会教育事业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很大的。面临“九七”回归，教会开始将中文教育作为重点，开展各类中文教育的教学工作。

2. 教会的慈善事业

天主教会香港开办慈善事业已有 140 多年历史。1848 年 9 月 12 日第一个到港传教的女修会沙尔德圣保罗女修会即开展了照顾弃婴、老人和病人的工作；1852 年还建立了第一间教会医院湾仔圣方济各医院，这所医院后经整理与发展，再由嘉诺撒修女开办了许多慈善事业，其中包括设立一间小型医院，附有老人院及药房；1863 年，建立了第一所感化院西环教导所；1923 年安贫小姊妹会在九龙开办了第一间安老院；1958 年 6 月 16 日香港教区正式设立了第一间社会福利机构“香港明爱”；1962 年 5 月 28 日第一间社会服务中心香港仔社会福利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这些教会经办的社会服务机构，多年来发展为较具规模的社会服务系统，接受各类服务的对象遍布社会的各阶层。

据统计，到1992年中，天主教会所办的各种慈善事业及机构有：14个社会服务中心、6家医院、13个诊所、幼儿园及幼儿中心21间、2间女孩护养院、29间老人院、12个老人中心、6间康复中心、7间宿舍及旅馆。各种教会机构及团体近年来也积极投入到社会服务之中，借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来吸引信徒，扩大自身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是“香港明爱”，服务范围最广泛，影响也最大，近年来还到大陆，与有关部门合作，参与并设立社会服务项目，后面将作一详细介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服务是为全港市民提供的，受惠人士中只有5%是天主教徒。

香港天主教会的社会服务主要有以下方面：

(1) 幼儿服务：除开办幼儿园外，还为弱能儿童提供特殊服务，并透过学前教育资料中心，培训幼儿教师及家长。

(2) 儿童及青少年服务：服务对象是6—24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包括儿童及青少年中心、图书馆、阅览室、儿童护养院、儿童发展计划、儿童成长课余照顾、学校、社会工作及营地服务等。

(3) 家庭服务：包括家庭辅导、家庭生活教育、心理评估及输导、家务助理、妇女发展计划、移民及海外领养服务。

(4) 妇女服务：为妇女提供各项活动及培训，使她们关注社会及自身的权利等。

(5) 安老服务：为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服务，如设有老人中心、多元化社区服务中心、日间护理中心、安老院、护理安老院及家务助理服务等。

(6) 露宿者服务：为有困难而面临急切住宿需要者提供临时住所。

(7) 社区服务：社区中心有社区工作、小组工作及图书馆等服务，提供各种训练、教育、康乐等服务，并设有中心咨询委员会。

(8) 弱智人士服务，为弱智人士提供训练、教育、庇护工作、住

宿、康乐服务、家庭辅导及社区教育等服务。

(9) 戒毒康复服务。

(10) 劳工服务:包括为青年职工提供教育、劳工法咨询及训练等服务,还设有职工青年会及荔枝角职工服务中心等。

(11) 渔民服务。

(12) 菲籍人士服务:这是近年来随形势发展需要而新设立的,有辅导服务、热线服务、社交及教育庇护等。

(13) 越南难民问题。

(14) 医疗服务:现有 6 间医院,分别由不同的修会管理,香港区有嘉诺撒医院及圣保禄医院、九龙区有明爱医院、圣母医院、宝血医院及圣德肋撒医院,共提供 3074 张病床,另外,还有 13 间诊所。

(15) 社区及接待服务:有社区食堂、白英奇宾馆、明爱宾馆,还有宿舍、餐厅、小食店、工艺社、小卖部等。

3. 教会的出版及宣传事业:

香港天主教会为传教起见,特别重视出版及宣传,设有自己的出版机构。例如,早在 1877 年 9 月 22 日就发行了第一份英文周刊《香港天主教英文周刊》;1885 年 4 月 26 日创立了纳匝肋印书馆,这也是教会创办的第一所印书馆;1913 年“天主教妇女联谊会”成立时,即创办了该会的英文期刊 1920 年《磐石》英文月刊发行;1928 年 8 月 4 日中文《公教报》正式发行;同年《圣心报》(*The Messenger of the Sacred Heart*)的英文版在香港、中文版在上海出版;1934 年 8 月第一个教区出版机构“香港真理学会”(The Catholic Truth Society)宣告成立;同年又创办了英文的《公教报》,等等。这些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的天主教书籍、刊物,包括中英文的圣经等,对传教及扩大教会的社会影响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中以中文版的《公教报》周刊影响最大,是由香港教区主教公署负责出版的,其中有 1/3 的版面报道香港及国际教会的活动消息,其余版面为“音

乐少年”“学生园地”“文学副刊”等,还有“信仰生活”“伦理篇”等宗教专栏。另外,“香港天主教教友总会”还为中小學生编辑出版了《天主教教义函授课程》、《光盐丛书》等书籍。

目前,教会的出版及宣传机构包括:

香港公教真理学会(香港坚道16号11楼):出版及代售天主教刊物,主任为康健璋神父,主编为李国雄神父。

李嘉堂纪念出版社(九龙天道16号):1952年成立,出版及代售天主教书籍和教具,社长是高申禄。

圣保禄出版社(新界沙田下径口76号):1979年在港成立,出版及代售天主教书籍。

思维出版社(香港薄扶林道93号D座):1989年成立,出版天主教刊物,主任是嘉理陵神父。

良友之声出版社(香港柴湾道18号):1953年成立,出版《良友之声画报》(月刊)、《良友之声乐锋报》(月刊)、《青年良友》(月刊)3种青少年读物,社长是贺广慈神父。

另外,还有《驿》编委(1979年设立)、新天地出版社(1976年创立)、《示》编委会(1971年创立)、思高圣经学会(1945年创立)、公教真理学会(1934年创立)。

天主教主要刊物有:《圣经双月刊》(1977年创刊,主编为陈维统神父)、《天主教周刊》(包括中英文两种《公教报》,中文周刊1928年创刊,英文周刊1946年创刊,总编辑为尹雅白神父)、《主爱中华》(1988年创刊,专门介绍有关大陆天主教会的月刊,主编为杨祖媛女士)、《神思》(季刊,1989年创刊,是天主教有关灵修和神学内容的刊物,主编为吴智勳神父)、《鼎》(1981年创刊,圣神研究中心出版,主编为汤汉副主教)、《良友之声画报》等等。

另外,教会还开办有视听中心,制作录音带和影片,提供给各堂区及学校。而整个宣传工作则在“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处”的协

之下进行。同时，一些独立的机构如公教教研中心、圣母圣心会教研中心、东亚天主教报业协会、亚洲主教团协会、天主教国际视听协会、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天主教国际广播电视协会也是天主教会的宣传机构，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如办讲座、培训、开研讨会等。

4. 国际关系

在国际联系方面，香港天主教会作为罗马教廷的一个地方教会，它所信奉的教义、采用的《圣经》及宗教仪式、节日，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同，大部分教会均以中文作为宗教仪式和活动的语言媒介。此外，香港教区也与罗马天主教普世教会和其他的地方教会保持紧密的联系，承认罗马教皇为普世教会的最高牧者，并且香港的主教每五年必须要到梵蒂冈向教皇述职，呈递一份有关本教区的详细报告。

二、主要教堂

天主教香港教区目前共有 37 间圣堂，36 间小堂，还有 37 间礼堂。现主要介绍如下：

1. 圣母无原罪堂

这是天主教会在香港建立的第一座教堂。1841年香港脱离澳门成为监牧区后，决定在威灵顿街建立一座圣堂，于1842年6月7日举行奠基礼，到1843年6月11日建成，并举行了新堂祝圣典礼，奉无原罪圣母为主保，命名为“圣母始胎无玷圣堂”，故称为“圣母无原罪堂”。自此，“始胎无玷圣母玛利亚”也就成了香港教区的主保。后因教徒日增，于1859年进行扩建，但遇一场大火，将教堂夷为平地。1860年在威灵顿街重新修建了一座教堂，并在堂内设立了5个祭台。香港的首任代牧将此堂作为主教座堂，直到后来又

建立了一座总堂。

2. 圣方济各小堂

1845年在湾仔建立。

3. 圣若瑟堂

1872年11月30日在花园道建成并祝圣，这是专为英国教徒设立的教堂。该堂的建筑具有哥特式的风格。1874年9月22日，该堂曾遭飓风毁坏，1876年重建，1878年还在教堂前面附设了一间康乐室，名为“圣博德俱乐部”。以后，教堂内部不断装修，于1919年还装置了一座风琴，并建立了一间本堂宿舍。在日据时代，该教堂曾遭炮击。战后又经修复，于1949年1月25日该堂升为堂区。因原堂年久失修，破坏严重，后重新修建新堂，于1968年6月1日祝圣了新堂。

4. 圣母无原罪总堂

1880年因原圣母无原罪堂狭小，教徒又日益增多，香港当时的首任代牧高主教决定通过向西方教会及社会募捐重新建一座总堂。工程于1883年12月8日奠基，当时的香港总督宝云爵士及社会名流出席了典礼。历经五年的时间，耗资12万港元，终于在1888年落成。整座圣堂长达272呎，最阔处为180呎，高70呎，教堂内部可容纳4,000多人，内部的雕刻均采用哥特式的风格，祭台采用的是上乘的意大利式的大理石雕刻。在该堂的前侧，建筑了高主教书院，其中包括中小学、幼稚园，并采用了以前圣若瑟学校、教区小修院及南华中学的旧址。1937年一场飓风将圣堂中央的屋顶及尖塔的瓦面吹毁。1938年12月8日即在该堂落成50年后才举行了祝圣人典，场面宏大，参加者数以千计。日据时代，该教堂几经炮火的洗劫，正祭台右面的石柱被炮弹击断，钟楼里的大钟也被日军抢去制造兵器。1946年香港代牧升为教区时，这座总堂即成了香港教区的主教座堂。1952年，该堂进行全面维修；从1965年开始，在总

堂的左边兴建了香港天主教福利会总部——明爱大厦；1969年后再经多次装饰、修缮，始成目前的规模。1978年在该堂的后侧，又盖起16层楼高的教区中心。1988年还举行了纪念圣堂建立100周年的盛大仪式。该堂是香港天主教的主教座堂，既是整个教区信仰的中心、也是教区教育文化及福利社会事业的基地。

5. 圣安多尼教堂

原名为圣心小堂，位于西环，即今天“凌月他嘉诺撒修女院”的所在地，建成于1879年，并祝圣。1892年在该小堂附近又建立了一座教堂，名“圣安多尼堂”，原圣心小堂被新堂代替，而于1893年改成圣心学校。圣安多尼教堂曾于1918年遭地震破坏。如今的该堂是在1933年6月13日才奠基的，但因资金紧张，工期漫长，直到1953年6月13日才建成，并祝圣启用。不过，在1949年1月25日时该堂就已升为堂区。

6. 玫瑰堂

始建于1900年，位于九龙，1905年5月8日建成并祝圣。以后，该堂随着教徒人数的不断增长而逐步扩建。1913年增建了教堂两侧的通道；1947年6月堂区礼堂建成并投入使用；1950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以容纳内地来的教徒。

7. 圣玛加利大堂

1920年时天主教徒人数不断增加，教堂不敷使用。教会遂发动大规模的捐献活动，为建立新堂筹措资金。终于在1923年2月3日举行了奠基礼，并于当年建成新堂。1925年1月25日举行了教堂的祝圣礼。恩理觉主教曾为该堂的主任司铎，直到他于1926年3月被委为香港的宗座代牧为止。

8. 圣德肋撒堂

是九龙的第二座天主教堂。创建于1932年，于当年4月23日举行奠基礼，并在当年建成，12月18日由恩理觉主教主持了祝圣

典礼。

三、主要机构和组织

香港天主教会是罗马大主教普世教会的一个地方教会，承认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威，每五年必须向教廷述职，汇报本教区的情况。香港教会内部在经过 150 多年的发展历程后，组织与机构逐渐完善，主要介绍如下：

1. 主教会署

地址：香港坚道 16 号教区中心 12 楼，这是香港天主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主教是最高的权力决策人，负责治理全教区的事务。除设主教外，还有两位副主教：汤汉和陈志明，他们分别协助主教处理教务；三位主教代表：林焯炜神父负责修会事务，曾庆文神父负责社会事务，李永援修女负责教育。公署分设教区秘书处：除为主教的总秘书外，也是教区的官方秘书，负责撰写、公布和保管教区的各类文件和档案，现由李亮神父担任秘书长；教区法庭：即教区的司法部，通常只接受初审案件，但香港教区有权设立上诉法庭，教徒亦有权直接向罗马教廷上诉，而无须经香港的教区法庭，目前由刘胜义神父担任香港教区的首席法官；教区总务处：总务长由主教任命，康建璋神父现任总务长，负责监管、支配教区内的所有学校、堂区和机构上的经济事宜，而属于各修会及由修会直接管理的堂区、学校和机构的财务，则不属总务处的权下；还有教区谘议会、教区人事委员会、司铎议会、教区牧民议会。

另外，各堂区还有一整套的组织系统。教牧人员中主任司铎是堂区内的最高负责人，其下是助理司铎，以及协助传教工作的修女和教徒。各堂区设有堂区议会和各种善会组织。

2. 各种咨询性委员会

根据《一九九三年香港天主教手册》，教区委员会共有19个，它们按照各自的目标及工作范围向主教提供意见。包括：

(1) 推行“迈向光辉的十年”牧函委员会：主席由陈志明副主教担任，委员有夏其龙、汤汉、徐锦尧等人。1990年2月20日为实践胡振中枢机主教的“迈向光辉十年”的政策与方针，特成立一个“传播事务协调委员会”，成员由教区内担当传播及培育工作的机构负责人组成，并筹组“香港天主教传播事务理事会”。可见，香港天主教会对于迎接九七回归的重视，不惜设立重重宣传机构。

(2) 圣职人员延续培训委员会：主席由胡振中主教直接担任。

(3) 教区社会传播咨询委员会。

(4) 天主教教区坟场委员会：主席由陈志明副主教担任。

(5) 教区教理委员会：内部分堂区组、中学组、小学 / 主日学组（包括中文小组、英文小组）。主席：吴珊小姐。

(6) 教区医院牧民委员会：主席王秀玲修女。

(7) 教区宗教联络委员会：主席为冼梓林先生。

(8) 教区菲籍人士牧民服务委员会。

(9) 教区伤残人士牧民委员会：主席由陈肖龄女士担任，骆铿祥神父任顾问。

(10) 教区越南籍人士牧民服务委员会：主席由曾庆文神父担任。

(11) 教区教友培训委员会：主席由徐锦尧神父担任。

(12) 教区基督徒合一委员会：主席为魏志立神父，副主席为谭坤神父。

(13) 教区财务委员会：主席由胡振中主教出任。

(14) 教区圣召委员会：主席为林焯炜神父。

(15) 教区礼仪委员会：设立数名当然委员及委员，顾问为杨正义神父。

(16)香港天主教教育委员会:在1977年由霍理义神父创立,他本人任第一主席职,并在1979年兼任主教代表,负责教育,1985年还被委为主教教育代表。目前,该委员会的主席为李永援修女,副主席为陈佐舜博士。内部分教区学校中央校董会、香港天主教教区学校联会、修会学校联会。

(17)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1991年在新蒲岗正式设立,而新蒲岗是全港的五大工厂区。该机构的主要工作有六个方面:“一、支持及推动教会内关注劳工团体的发展;二、培育劳工领袖,支持整体工运发展;三、与关注劳工的团体合作,共同争取劳工权益及生活保障;四、与工人一起研究及影响有关劳工的政策及制度,维护劳工应有的权益及活动空间;五、推动教会人士及组织关心劳工;六、向劳工传福音,选用适合他们的表达方式、语言及慕道内容。”这一组织的设立充分说明了香港天主教会在后过渡期内尤为重视在职工中传教。现该机构的主席为吴伟杰先生。

(18)香港教区圣乐委员会:内部设立办事处,主任为蔡诗亚神父,委员会的主席为苏明村先生,还设有天主教香港教区圣咏团。

(19)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梵二”会议以后,罗马天主教会实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1967年1月6日由教皇保罗六世宣布正式成立“宗座正义和平委员会”,至今全球已有上百个地区成立了地区性的正义和平委员会。香港的正义和平委员会于1977年正式成立,第一届主席是苏国荣、副主席是张家兴,还聘请了李柱铭为该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委员会由胡振中主教任命,但没有全职的职员;其工作重点包括研究教会的社会训导,并分析教区的组织结构。现任主席为刘嘉华先生。

3. 香港明爱 (Caritas-Hong Kong)

“明爱”(Caritas)原为拉丁语,意为“爱”与“慈善”。该机构于1953年7月1日成立,1955年3月1日加入国际天主教福利社会

及国际天主教移民委员会，1957年12月18日正式成立为港九地区天主教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6月16日香港主教以文诰确定地位，1959年加入为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成员，1961年10月1日定名“香港明爱”。自1962年梵二大公会议后，罗马教廷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调整了天主教会的传教策略，决定天主教会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之中，尤其是利用大力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来争取信徒。于是“香港明爱”颇受教会的重视，1969年2月7日该组织还被接受为香港公益金之成员，1981年11月“香港明爱理事会”正式注册为立案法团，以提供社会福利为宗旨。教会宣扬“明爱”在本质上是一项了解与关怀、照料与服务、人类发展和团结的行动。香港明爱的工作主要是为个人、家庭、团体及社区服务，向不同阶层的人士提供多种服务，无种族、性别、宗教或信仰之分。

“明爱”内部设有理事会，由教区主教直接领导，其下还有社会工作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总部及秘书处、医院医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明爱与堂区联络委员会等附属机构。根据天主教香港教区社会服务机构出版的《香港明爱》手册的最新统计，到1993年中明爱在全港有服务地点100余个，共有近300个服务单位，工作人员超过5,000名，年度经费开支预算超过10亿港元，其财政主要由港府拨款及社会捐赠，西方教会的援助主要来自德国和瑞士的明爱机构。当然，明爱要配合教会的工作，在多个堂区设立服务组织或明爱小组，以协助提高堂区教友的社会意识，推动培育基督徒，并为堂区的义工提供训练。明爱主要开展社会工作、教育、医疗、社区的接待等服务，具体如下：

(1) 家庭服务：为个人及家庭协助解决日常生活上的问题，为在校的学生提供辅导，以发挥其潜能，提供移民服务、海外领养服务、女童宿舍、家庭指导服务等。

(2) 家庭助理服务：主要为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伤残人

士等提供服务。

(3) 安老服务: 办有 9 间老人中心、2 间多元化老人服务中心、1 所日间护理中心、3 所安老院、1 所临时宿舍。

(4) 康复服务: 为 6 岁以下弱智儿童及 16 岁以上的弱智成人提供服务, 设有 1 所特殊幼儿中心、2 所学前教育及训练中心、1 项自闭症儿童综合服务计划、2 所庇护工场、3 间展能中心、2 处宿舍、1 个家长资源中心。

(5) 小组及社区工作服务: 设有 6 个社区中心、10 个青少年中心、3 队外展社会工作队、图书馆及阅读室等。

(6) 社区发展服务: 设有 10 个社区发展计划, 如妇女发展计划、劳工发展计划、基层组织发展计划、菲籍人士社会服务计划、亚洲外地劳工社会服务计划等。

(7) 扶幼服务: 有 12 所幼儿园, 为低薪家庭及弱能儿童提供服务。

(8) 学前教育服务: 设有 2 所幼稚园及学前教育资料中心。

(9) 特殊教育及职业训练服务: 设有 5 所弱智特殊学校、1 所聾听学校、1 间职业训练中心。

(10) 职业训练及教育服务: 有 9 所职业先修学校。

(11) 成人及高等教育服务: 设有学术、职业训练、多元式教育、延展、文化及康乐、实用等课程。

(12) 医院服务: 从 1962 年起即在香港设立多处医疗诊所, 同时在九龙半岛的深水埗区办有明爱医院, 可提供 1,489 张病床, 还设有护士训练学校、社康护理服务、嘉诺撒医院(明爱)、宝血医院(明爱)。

(13) 诊所服务: 主要为市民提供廉价的医疗及牙科服务, 有 6 间西医诊所和 4 间牙科诊所。

(14) 社区及接待服务: 设有服务中心行政部、2 座宾馆、5 处

宿舍、办有餐厅、食堂、小食店、公众会堂和会议室。

(15) 营地服务:为儿童、青少年、家庭及各界人士提供各类营地游乐活动,办有明晖营、爱晖营、家晖营和小塘营 4 个营地。

(16) 越南难民服务:为滞港的越南难民提供移民辅导、社会保障计划、教育、社交、康乐等服务。

(17) 中国服务:自 1980 年开始,在内地多个省市如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协助地方团体推行多元化的服务计划,包括教育、社会工作和医疗卫生。其服务的形式计有咨询交流、成人和特殊教育、讲习班、实习训练、提供助学金、医疗和职业培训设施。到 1992 年初,“明爱”的服务内容遍及了大陆二十八九个省、市、区,并延伸到特区。

明爱通过以上社会服务的项目,在香港社会甚至国际上的影响巨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很高。教会也利用它的社会影响力为教区的工作服务。

4. 公教进行社 (Catholic Centre)

位于香港坚道 16 号天主教教区中心 11 楼,成立于 1945 年 11 月 9 日,创始人是“公教真理学会”的宗座外方传教士师人杰神父(Nicholas Maestrini)。该组织是香港天主教活动的中心机构,负责出版中英文《公教报》周刊,内设天主教期刊订阅处、公教真理学会、中英文编辑处、书籍及圣物售卖处、会计部等。现任社长为康建璋神父。

5. 香港天主教青年联合会 (Hong Kong Catholic Social Communications Office)

位于香港湾仔星街 1 号,成立于 1962 年,是一个教区性的联合会,由本教区内天主教青年团体联合而成。其宗旨是“本福音精神及圣教会训导,鼓励年轻人……负起应有的责任,……重视祈祷和圣事,促进各青年团体之联系及了解”。出版《时代青年》和《迈进》

刊物。神师由谭坤神父担任。

6. 香港天主教教友总会 (H. K. Central Council of Catholic Laity)

位于香港坚道16号教区中心10楼,1959年成立,其属会包括全港各个堂区议会或性质相同的堂区性组织及已向该会登记的教区性教友善会,起到联络、沟通、协调、传教等作用。其会徽是以总会的英文简写 C. C. C. L 构成一个十字架,右边欠缺的一部分表示了教徒以不同的身份,“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主要工作有举办领袖培训课程、组织教徒培训、推动传教、提供视听资料及宗教刊物,还要协助筹划教区的活动、联络各堂区及善会等,并组织了“迈向光辉的十年牧函回应行动”、关社活动等。“总会”内部设立有秘书处,定期召开周年大会、评议会、干事会。该组织是香港天主教界一个重要的机构。会长:罗应伟,指导司铎:骆铿祥神父。

7. 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处 (Hong Kong Catholic Social Communications Office)

设在香港坚道16号教区中心11楼,主要负责传教工作,主任是夏其龙。

8. 圣神研究中心 (Holy Spirit Study Centre)

位于香港仔黄竹坑惠福道6号,即“圣神修院神哲学院”内,1980年10月成立,名义上是由胡振中主教创办,实际上是梵蒂冈宗座外方传教会、美国天主教传教会和香港教区合作兴办的,并作为罗马教廷设在香港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直接接受梵蒂冈的领导,与世界各种天主教研究机构有密切联系。该中心设有图书馆,收集了世界各地、也包括中国大陆教会的资料,并进行剪报与分类,出版双月刊《*圣神*》(1981年出版第1期,主编是汤汉副主教),报导中国宗教及伦理的最新动向,研究中国天主教会史,还负责制作视听

资料。从 1987 年时发行《主爱中华》月刊(主编为杨祖媛女士),附于每月第一周的《公教报》内;还编写《神州桥梁》及《环宇之声》刊物。另外,该组织还负责联络、培训教徒,并出席各种会议,曾多次组团到大陆访问。中心的内部除图书馆及资料室外,还有办公室、会议厅、小教堂、休息室及客房数间。随着 1997 年的临近,该组织公开表示愿与大陆的教会对话,互相尊重,这一观点也代表了香港天主教会的官方态度。该机构设立有董事会,胡振中主教任中心董事会的主席,执行主任为汤汉副主教,另聘有数位研究员。此外,梵蒂冈罗马教廷还派特使彭慎灵领导该组织内的工作;其他成员还有梁作禄(意大利耶稣会士、梵蒂冈派往香港的观察员)、温顺天(美国的耶稣会士)、关俊棠(华人神父)、梁洁芬(香港宝血会华人修女)。再者,“利玛窦研究小组”也在该组织内经常举行聚会,研讨有关中国天主教的历史及交流探访大陆的观感。该组织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推动教徒研究神学,另一方面是研究教会的历史,所以经常举办有关的讲座,开设如“当代中国天主教”、“中国天主教史”、“基督教与国家民族”、“宗教与文化”、“礼仪本地化”等课程,也制作了一些视听资料,如“九七、九七幻灯片”等,在香港各堂区和学校放映。

9. 公教教研中心 (Catholic Institute for Religion and Society)

位于九龙窝打老道 130 号,名誉主席胡振中,现任董事会主席唐福雄。该组织于 1986 年底成立,主要负责教徒的教育及教义的宣传、研究,从 1990 年 9 月开始在《公教报》上刊登双月专刊《启》。另外,该中心从 1989 年初开始举办“基基团”领袖的培训班,并经常举行讲座,讨论香港天主教会在后过渡期内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还出版了如《基基团手册——建设小团体》、《天主教慕道手册——正式人生的信仰》等著作,紧密配合教区的工作。内部还设有执行董

事、课程主任、研究主任、行政助理及研究助理等,秘书由张家兴担任。

10. 天主教亚洲通讯社 (UCA News)

办事处设在九龙观塘翠屏道100号牧民中心地下,是亚洲各国天主教组织设在香港的一个通讯社,以便收集和报导各国天主教的信息。主任为乐耀星神父。该机构内部专门设立了“中国新闻部”。

11. 香港教区国籍司铎协会 (Hong Kong Diocesan Chinese Priests Association)

该组织由国籍神职人员构成,会长是刘德光神父。

12. 香港男修会会长联合会 (Association of Major Superiors of Religious Men in Hong Kong)

直接隶属于罗马教廷修道团体部,由执行委员会、全体修会人、永久性秘书处及其他工作小组共同开展会务,并密切配合香港教会当局的工作。主席:陈兴翼神父。

13. 香港女修会会长联合会 (Association of Major Superiors of Religious Women in Hong Kong)

1972年由教皇创立,直隶于教廷修道团体部,由执行委员会全体修会大会及其他工作小组推动会务,并配合教区的传教工作。主席:阮慧云修女。

14. 天主教会香港圣经协会 (Hong Kong Catholic Biblical Association)

“梵二”会议以后,于1969年4月在罗马成立了“世界天主教圣经协会”,随后,各地相继成立了圣经协会。“香港圣经协会”于1973年4月由徐成斌主教正式批准成立,作为香港教区天主教徒推行圣经传播的一个组织。1986年10月26日召开会员大会,并通过了新会章,明确该组织的性质是“一个公教信徒推行读经运动之

组织”，主要的工作有举行圣经讲座、培训及辅导教徒研读圣经、举办灵修和分享会，还要联络其他教会团体，共同组织或参与有关圣经的会议及各种活动。1993年10月17日该组织召开了第二十一届周年大会，选举了新的干事，任期两年，现主任指导司铎为冯赐豪神父，会长为林锦玲。其办事处设在香港坚道16号教区中心10楼。

15. 香港天主教教友传信会 (Hong Kong Catholic Lay Missionary Association)

该组织以传教为目的，倡导要协助传教区的本土人士独立自主，成为一个成熟的地方教会。联络人：何爱珠(女)。

16. 香港中国神学协会 (Hong Kong Chinese Theology Association)

该组织以推动神学本地化为宗旨，培训会员。会长：郑生来神父。

17. 香港天主教大专联会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Catholic Students)

位于九龙界限街134号6楼，成立于1961年，是一个联结各大专院校天主教同学会的学生团体。其宗旨是“团结同学，实践基督精神”，努力实现本地化教会的精神，“使信仰根植于具体生活中”。另外，积极在大专学生中间传教，每年还要进行大规模的募捐。现任会长：招日恒，出版刊物：《曙辉》；神师：谭坤神父。

18. 圣母军 (Legion of Mary)

组织严密，以祈祷及工作来促进其团员的信德、传扬福音为宗旨。内部设一个督察团：香港督察区团(有10个支团)；另外还有圣母领报区团(有12个支团)、教会之母区团(有13个支团)、圣母无原罪区团(下辖23支团)、圣母玫瑰区团(有7个支团)、天主之母区团(下辖14个支团)、圣母蒙召升天区团(有12个支团)、中国和平之后

区团(有 15 个支团)、中华母后区团(有 10 个支团)、喜乐之母区团(下辖 11 个支团)、大忠者贞女区团(有 9 个支团)、圣母母后区团(下辖 15 个支团), 拥有会员总数 1,500 多, 并创办了圣母军的刊物。

19. 在俗方济会 (Secular Franciscan Order)

地址: 香港九龙慈云山蒲岗村道 89 号。香港总神师: 梁雅明, 香港总会长: 李绮玲。

20. 利玛窦书院天主教校友会 (Matteo Ricci College Catholic Alumni Association)

位于香港九龙天光道十六号, 邓镜波学校。1972 年成立; 宗旨是增进会员的神修、社交及道德, 加强合作精神, 以助传教。会长: 卫熙枫, 指导司铎为余秉昭神父。

21. 圣鲍思高慈幼协进会 (Salesian Co-Operators)

位于香港薄扶林道 69 号 B。致力于青少年及平信徒的福音传教工作。修会会省代理: 何广凌神父; 现任会长: 梁筱堂。

22. 公教学生青年运动 (Young Christian Student Movement, Y. C. S)

位于九龙界限街 134 号明爱中心 6 楼, 简称“学青”, 以中大学生为主要传教对象, 并以培养基督徒领袖为其宗旨。会长: 马可欣(女), 神师: 范锦棠神父。

23. 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

成立于 1977 年, 聘请了身为天主教徒的法律顾问李铭柱, 耶稣会神父余理谦任教会顾问。该组织近年来多次参与香港所谓“民主派”反共拒中的活动, 并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或其他形式, 如集会、游行等散布其反共拒中的观点。

24. 圣十字架及主业社团 (Prelature of the Holy Cross and

Opus Dei)

该组织是一自治社团,1928年创立于西班牙,1982年被立为自治监督社团,1984年在香港设立组织。其成员为在俗的天主教徒,他们“借着职业或工作去追求成圣”,并进行传教。另外,附属于该组织下的“圣十字架司铎会”是由教区神父构成的,目前有四位神父,他们仍属其所在教区。

25. 祈祷宗会 (Apostleship of Prayer)

是一教徒的传教组织,内部还有“香港祈祷宗会学生联合会”,总监由戴雨谷神父担任,会长为李燕雯小姐。

26. 普世博爱运动 (Focolare Movement)

也称“玛利亚的事业”(Work of Mary),是一个包括教徒及神职人员的团体,1943年由卢嘉勒女士创立于意大利,宗旨是为了向现代社会传教,1947年正式得到教廷的承认,还一度掀起“新青运动”,目前已发展为一个国际性组织的运动,在全球185个国家中有500多个中心,8万多名成员,共180多万名附属成员,以及数以百计的赞助者。

1966年该运动传入香港,并于1970年开始在香港建立第一个男子中心,1972年成立第一个女子中心,以后逐渐组成两个“普世博爱运动中心”。20多年来已由当时的数百人发展到上万名的支持者。出版刊物有:《新城》双月刊、《生活圣言》、《新城丛书》。

27. 公教职工青年会 (Young Christian Workers)

地址:九龙红磡新柳街二号四楼。该组织是一“年青职工在公教内的宗徒运动”,注重在青工中传教。会长:张祖延,署理神师。华天禄神父(Paul Vallat)。

28. 新天地关社运动

该运动正式成立于1990年9月30日,其成员基本来自“天主教团体关注香港政制发展联席会议”,在该组织解散后重新组成“新

“天地关社运动”，宗旨为促进天主教徒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及香港的“民主改革”，以发挥教会香港后过渡期内的影响力。下设执行委员会，主席是张荣辉。

29. 神恩复兴运动

这是一种灵修运动，1975年始在香港兴起，当时是由嘉诺撒修女及高龙庞修女们分别组成两个小组，发展很快。1978年在九龙教区牧民中心成立了一个较大的小组，命名为“芥子神恩祈祷小组”，成员包括中、外的教徒及神职人员。到1993年10月，全港已成立了10个中文祈祷会及20多个英文祈祷会，祈祷聚会的内容通常是歌咏赞美、舌音祈祷、见证及圣经分享等。1993年10月30日还在教区中心举行了大型的祈祷、作证、讲道及感恩礼，其主题是“在圣神内合而为一”。该运动的指导神师是鲁易之（Luis Rey）神父。

30. 基督生活团（Christian Life Community）

这本是一个世界性的天主教徒的组织，其前身为“圣母会”，1540年由耶稣会士若望·洛伊纳斯（John Leunis）创立，1584年获得教皇额我略十三世的正式批准，以后在世界各地传播。1609年耶稣会士还在北京成立了第一个圣母会。1967年“梵二”会议后，为强调基督化生活，将“圣母会”改名为“基督生活团”，以促进基督徒的灵修生活，其行政中心设在罗马。目前，香港的基督生活团约有110多名成员，分14个小团体，每一至两星期聚会一次，聚会以祈祷和见证为主，以促进教徒“信仰与生活的整合”。目前，该组织的召集人是刘建熙。1994年7月21日还在香港召开了“基督生活团”第十二届世界大会。

以上仅介绍了一些主要组织，香港天主教会还有其他一些社团或机构，种类繁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附:

修会及传教组织

在香港的男女修会及各类传教会共计42个:

1、男修会及传教组织(18个):

(1) 基督学校修士会(Brothers of The Christian Schools)

1684年创立于法国,1875年到港,总会院设在意大利罗马。在港负责教育工作,有修士16人。会长:巴特修士。附属有圣若瑟书院(1876年由救主书院发展而来,如今的书院建成于1963年,现任院长:罗伦修士)、喇沙书院(院长:巴特修士)、陈瑞琪书院(院长:方济各修士)。

(2) 美国天主教传教会(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11年创立于美国纽约,1918年到港,总会院在美国纽约玛利诺州。在港负责堂区、学校及特殊传教工作,有神父32人,修士2人。附属有玛利诺神父会院、福德社、赎世主堂、圣母无玷之心堂、观塘牧民中心、玛利诺神父教会学校、玛利诺工业中学、露德圣母堂、圣母玫瑰堂、玫瑰堂、圣亚纳堂、圣本笃弥撒中心、圣若瑟堂、圣玛窦弥撒中心、圣博德堂、海星堂、秀茂堂坪(住所)。

(3) 天主教耀汉会(Congregation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28年成立于河北省安国县,1949年到港,设在香港铜锣湾兴发街40号维景花园A-1八楼。总务:刁喜乐修士。

(4) 圣母圣心会(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1862年在比利时创立,1951年到港,总会院设于意大利罗马,在港主要负责堂区及教育工作。有神父 8 人。会长:狄和诗神父。该会拥有圣母圣心会院、圣母升天堂、圣十字架堂、海员俱乐部、鸣远中学、天神之后弥撒中心、耶稣复活弥撒中心、圣雅各伯堂、圣云先堂。

(5) 道明会(Dominican Order)

1216年创立于法国,1587年首次派传教士到马尼拉和澳门传教,并创立了玫瑰圣母会省。1861年传教到香港,总会院设于意大利罗马。在港主要担任教士的教育工作,有神父 15 人。附属有圣若瑟会院及圣大亚伯尔修院。

(6) 墨西哥外方传教会(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of Mexico)

1949年在墨西哥创立,1975年来港,担任堂区、学校及特殊传教工作,有神父 5 人,修生 3 名,会长是胡雅明神父。附属有圣家堂、圣神修院、善导之母堂、圣方济沙勿略堂、圣保禄堂。

(7) 圣母小昆仲会(Marist Brothers of the Schools)

1817年在法国创立,1949年到港,总会院设于意大利罗马,在港负责教育工作。有会士 13 位,会长是孔纳德修士。附属有荃湾圣芳济中学、圣芳济英文书院、圣母会修院。

(8) 仁爱传教兄弟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 Brothers)

1963年由德兰修女创立于印度加尔各答,1977年到港,总会院设在加尔各答,在港主要从事公益事业。有修士 4 位,会长:艾卡(Ekka)修士。

(9) 献主会(Missionary Oblates of Mary Immaculate)

也称“无玷圣母献主会”,1816年在法国创立,1966年11月到港,总院设在意大利罗马,在港为地方教会服务,注重在下层社会中传教,附属有献主会小学、圣母院书院。有神父 6 位。附属有献

主会小学、圣母院书院。

(10) 严规熙笃会(也称“圣母神乐院”, **Order of Cistercians of the Strict Observance**)

1098年在法国创立,1950年到港,总会院设在罗马,在港有神父9人,修士8人,院长是赵本笃神父。

(11) 方济会(**Franciscan Fathers**)

1209年在意大利创立,1948年到港,总部设在罗马,有神父15人、修士2人、初学生3人。附属有思高圣经学会、方济堂、圣文德堂、圣文德会院、圣方济弥撒中心。

(12) 巴黎外方传教会(**Paris Foreign Missions**)

1659年创立,1847年来港,总部设在巴黎,在港主要参加地方的传教工作。有神父12位,并设有总务处。附属有圣神堂、圣神研究中心、圣母玫瑰堂、圣母堂、海星堂、圣若翰堂、公教职工青年会。

(13) 魁北克外方传教会(**P. M. E. Fathers**)

1921年在加拿大魁北克创立,1983年到港,总部在加拿大,在港担任传教工作。有神父5人,会长:德利亚神父。附属有圣方济各堂。

(14) 宗座外方传教会(**Pontifical Foreign Missions Institute**)

1850年在意大利创立,1858年到港,总部在意大利的米兰,在港负责堂区、学校、社会中心等传教工作,有神父37人、修士1人,辖下有“办事处”、圣母领报弥撒中心、华福弥撒中心、天主教明爱中心、明爱医院、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天主教教区中心圣神堂、圣母无玷之心堂、基督之母堂、圣母圣诞堂、永助圣母堂、高主教书院、玫瑰堂、圣心堂、圣爱德华弥撒中心、圣若瑟堂、圣玛利加利大堂等。

(15) 鲍思高慈幼会(**Salesians of Don Bosco**)

1869年在意大利创立,1927年到港,总部在罗马,在港主要从事青年教育工作,有神父58人、修士30人。下辖慈幼会办事处、圣安多尼会院、慈幼会修院、慈幼静修院、香港仔工业学校、圣类斯中学等。

(16)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

1540年在罗马创立,1926年到港,总部在罗马。香港有神父41人、修士1人、修生2人,附属有利玛窦宿舍、汤若望宿舍、基督君王堂、圣若瑟院、基督劳工堂、华仁书院、圣伯多禄圣保禄堂、圣若瑟安老院、思维静院等。香港的耶稣会直属于该修会的中华省,1991年4月正式成立了“耶稣会中华省”,负责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及台湾等地的使徒工作,并同时设立了香港及澳门的新的会区,由劳伯堦(Lo, William)神父出任港澳区的新区会长。

(17)圣言会(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1875年由德国籍杨森(Arnold Janssen)神父在荷兰创立,杨森本人曾在中国的山东传教,后来在大陆许多省市传教,培养了一批国籍圣言会士,第一位枢机主教田耕莘就是圣言会士。目前总会院设在罗马,该修会非常注重在第三世界传教,同时也很重视学术研究及学校教育,如在台湾开办了辅仁大学、辅仁中学,在日本创立了南山大学,还在菲律宾创办了两所大学。

该修会于1948年到港,在港主要从事传教工作,并开办了一所圣言中学。如今,圣言会在香港有神父8人、修士5人;附属除圣言中学外,还有一海外训练中心、圣十字架堂。

(18)赎主会(Congregation of the Most Holy Redeemer)

1732年创立于意大利的拿波里。1989年到港,总部在罗马,在港担任传教工作。有神父4人,院长为陆彼得神父。附属有圣母无玷之心小学。

2.女修会及传教会(24个):

(1) 圣母颂主女修会(Canonesses of Our Lady)

1597年在法国创立。1965年到港,总部在罗马,负责学校及社会的教育工作,有修女3人。下设晨曦之后女修院、圣母颂主女修院(2所)。

(2) 嘉诺撒仁爱女修院 (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

1808年在意大利创立。1860年到港,1868年曾到中国大陆服务,目前总部设在罗马。最初在香港兴办孤儿院及学校,现主要在港负责教育、医疗及社会服务工作,有修女112人,初学生3人。附属有嘉诺撒仁爱总会、嘉诺撒伯大尼修院、嘉诺撒修院、嘉诺撒医院等机构。

(3) 中华无原罪圣母女修会(Chinese 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1932年在广州成立,1951年到港,负责教育及传教工作,有修女14人,省会长是吴俊仪修女。下设中、小学校各一所。

(4) 默存会(Contemplative Missionary Fraternity)

1955年在意大利创立。1983年到港,总修院在意大利,主要注重为下层人服务,有修女4人,院长是张丁岳修女,下辖九龙城小团体和屯门小团体。

(5) 母佑会女修会(慈幼女修会, Daughters of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1872年在意大利成立。1952年到港,总部在罗马,负责青年教育及传教工作,有修女35人、初学生2位。下设进教之佑修院、圣若瑟修院、圣心修院、圣玛利亚玛沙利罗修院。

(6) 圣保禄孝女会(Daughters of St. Paul)

1915年创立于意大利。1979年来港,总部在罗马,从事传教工作,有修女7人,院长为张智蓉修女。

(7) 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

1877年在印度创立。1947年到港，总部在罗马，主要为教会服务，有修女28人。下设天主之母团体，爱明修院及圣言等3个小团体。

(8) 圣母痛苦方济传教女修会 (Franciscan Missionary Sisters of Our Lady of Sorrows)

1939年在中国湖南衡阳创立，1959年来港，总部在美国俄勒岗州，主要负责教育、医疗及教会服务工作。有修女13人，初学生1人；省会长为周学美修女，院长是成春儒修女。

(9) 耶稣小姊妹友爱会 (Fraternity of the Little Sisters of Jesus)

1939年在撒哈拉沙漠创立，总部在罗马。1954年到港，1956年在香港仔设立友爱之家，以后主要从事社会服务，有15名成员。下设大埔友爱之家、西贡友爱之家。

(10) 安贫小姊妹会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1839年在法国创立，1923年来港，总部设在法国，从事老年服务。1962年在香港仔开办安老院，现有修女37人，有安老院2所及1所初学院。

(11) 玛利诺女修会 (Maryknoll Sisters of St. Dominic, INC.)

1921年在美国纽约成立，1921年来港，总部在纽约。担任教育、医疗及教区服务等工作，有修女33人，下有玛利诺修女省会院、修女院(6所)。

(12) 仁爱传教女修会 (Missionaries of Charity)

1950年成立于印度的加尔各答，1983年到港，总部在加尔各答，从事为下层人民服务工作。有修女14人，省会长: Lucinaxn修女，院长: M. Lourdesxn修女。下设女修院1所。

(13) 天神之后传教女修会(Missionary Sisters of Our Lady of the Angels)

1922年在加拿大成立,1926年来港,总部在加拿大,主要负责传教工作。有修女11人,区会长:麦少颜修女。下设天神之后修院2所及东涌一梅窝修院。

(14) 圣高隆庞传教女修会(Missionary Sisters of St. Columban)

1922年在爱尔兰成立,1949年来港,总部在爱尔兰,主要负责传教。有修女28人,区会长是马修女。下设省会院及4所女修院。

(15) 圣母无原罪传教女修会(宗座外方传教女修会, Missionary 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1936年在米兰成立,1968年来港,总部在罗马,负责教育及传教工作。有修女11人,负责人是翟懿莲修女。下设耶稣圣心等3所修院。

(16) 圣母无原罪传教女修会(Missionary 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1902年在加拿大成立,1928年到港,总部在加拿大,负责传教、教育、医疗及社区服务。有修女19人,省会长为林大美修女。下设省议会、德爱、德望、法蒂玛圣母等3所修院。

(17) 圣母圣心传教女修会(Missionary 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1897年在印度成立,1954年来港,总部在罗马,担任教育、医疗、社区服务及传教的工作。有修女13人,区会长:陈颐德修女。下设有圣奥斯定修院及3所传教女修院。

(18) 善牧会(Our Lady of Charity of the Good Shepherd)

1641年在法国成立,1951年来港,总部在法国,从事社会服务工作。有修女17人,省会长是高修女。下设省会院及圣心玛利亚

等 3 所修院。

(19) 显主女修会 (Sisters Announcers of the Lord)

1936年在中国广东省韶州成立, 1953年来港, 总部在香港, 担任传教及教育工作。有修女13人, 总会长是戴振容修女。下设圣德肋撒修院及圣心修院。

(20) 沙尔德圣保禄女修会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
s)

1696年在法国成立, 1848年到港, 总部在罗马。在港负责教育、医疗、传教及社会服务工作, 是在港历史最长的女修院。有修女74人, 省会长是王德兰修女。附属有圣保禄修院、2所医院及 1所幼儿园和 2所中学等。

(21) 加尔默罗跣足女修会 (Sisters of the Discalced Car-
melite Order)

12世纪在巴勒斯坦成立, 1933年来港, 1933年12月4日建立赤柱会院, 修院的小堂公开对教徒开放使用, 1949年1月25日立为堂区, 但1959年由圣亚纳堂管理。现有修女11人。

(22) 圣母洁心会 (江门, 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Kongmoon)

1936年在中国江门创立, 1954年到港, 总部在香港。有修女10人, 总会长是陈玫瑰修女, 下有 2所女修院。

(23) 耶稣宝血女修会 (Sisters of the Precious Blood)

1922年在香港成立, 首任会长为谭加辣修女。1929年7月19日该女修会正式获得教廷批准为香港宗座代牧区的本地修会。总部在香港, 担任传教、教育、医务及社会服务工作。有修女87人, 下设宝血会母院, 总会长: 阮慧云修女, 另有 8所会院及各类小团体。

(24) 拯望会 (Society of the Helpers S.H.)

1856年在巴黎成立,1954年来港,总部设在巴黎,在港负责堂区工作,有修女5人。下有主顾会院、若瑟会院。

除以上修会及修院外,还有一些教区附属的修院和高等学院,如:

圣神修院神哲学院(Holy Spirit Seminary College)

位于香港香港仔惠福道6号。胡振中主教任校监,神哲学学院院长由林焯炜神父担任,神学部主任为刘赛眉修女,哲学部主任为周景勳神父。还设有学院议会、图书馆。内有讲师32位,神学生有32位,哲学生5位。另办有夜间神学课程。

圣神修院(Holy Spirit Seminary)

位于香港香港仔惠福道6号。其前身为“华南总修院”,建成于1931年,首批修生有11位。后因该修院年久失修,于1957年设立新修院,命名为“圣神修院”,代替了原修院,可容纳修生60人,1991年时有修生48人。现任院长:林焯炜神父,有神学生4人、哲学生1人、先修生1人。

香港天主教圣经学院(Hong kong Catholic Biblical Institute)

位于香港九龙窝打老道130号。主席:嘉理陵神父,学院院长:劳伯燻神父。

慈幼会修院(Salesian House of Studies)

地址在香港柴湾道18号,院长兼初学师:谢肇中神父,有神学生6位、哲学生2位、初学生1位。

思高圣经学会(Studium Biblicum)

地址在香港渣甸山轩德荪道6号。主任是陈维统神父。

四、主要人物

高主教(Timoleon Raimondi) 香港天主教会的首任宗座代牧。1827年5月5日生于意大利米兰,1850年5月25日晋铎,属米兰传教会。1858年5月15日到香港传教。1860年时他被委为香港监牧区的副监牧,1867年11月17日被委为代监牧。1874年11月17日,香港监牧区升为代牧区后,罗马教廷任命他为香港首任宗座代牧,同年11月22日被祝圣为主教。他在任内积极扩展香港的教务,亲自筹划了圣母无原罪总堂的建筑,主持召开了两届中国天主教会第五区的教会会议。1894年6月27日逝世。

和主教(Aloysius Louis Piazzoli) 香港天主教会第二任宗座代牧。1845年5月12日生于意大利,1868年9月1日在米兰晋铎,属于米兰传教会。1869年12月到港传教,1892年被委为香港代牧区的副代牧,1895年1月11日被任命为香港第二任代牧,同年5月19日被祝圣为主教。1904年8月4日因健康恶化返回意大利休养,同年12月26日去世。

师主教(Dominic Pozzoni) 香港天主教会第三任宗座代牧。1861年12月22日生于意大利,1885年2月28日在米兰晋铎,属米兰传教会。1885年12月19日到港传教,1905年7月12日被任命为香港代牧区第三任代牧,同年10月1日被祝圣为主教。据说,他经常到市民及村民中访问天主教徒,在最基层的教会团体中宣教,他还到过海丰县及西贡地区探访。1924年2月20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恩理觉(Henry Valtorta) 1883年5月14日生于意大利米兰,1907年3月30日于米兰晋铎,并加入米兰传教会。1907年10月5日被派往香港传教,1926年3月13日被委任为香港代牧区第四

任代牧，同年6月13日被祝圣为主教。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即发布一个“劝勉教友爱国的牧函”，号召教徒为祖国效力。1946年4月11日香港代牧区升格为主教区，恩理觉被委为香港教区首任主教，1951年9月3日逝世。

白英奇(Lawrence Bianchi) 1898年4月1日生于意大利，1922年9月23日在米兰晋铎，同时加入米兰传教会。一年后即被派往香港传教，于1949年4月21日被任命为香港区助理主教，同年10月9日自海丰返港祝圣为主教后，再回到海丰传教。1952年10月17日自中国大陆到港，10月26日被任命为香港教区第二任主教。1968年11月30日因香港天主教会已逐步走向了本地化及自立阶段，他便向罗马教廷提出退休辞呈，获准后于1969年4月19日回到意大利，1983年2月13日去世。

徐诚斌 香港教区第三任主教，也是第一位华人主教。1920年2月20日出生于上海一个卫理公会的基督教家庭，1936—1940年入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4—1947年到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取得硕士学位，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并皈信了天主教。1950年迁往香港，1955—1959年到罗马贝达学院(Beda College)攻读神学，1959年3月14日被圣为神父。1967年7月1日被任命为香港教区的辅理主教，于当年10月7日在香港主教座堂被祝圣为主教。1968年12月19日任署理主教，1969年5月29日被正式任命为香港教区的第二任主教，1969年10月26日举行了盛大的就职仪式。罗马教廷对他的任命，是在梵二大公会议影响下实现的，大大地推动了香港教会的更新与本地化。自此，香港教区的事务逐渐由国籍神职人员来处理。1973年5月23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李宏基 香港第四任教区主教。1922年3月29日生在广州，1939年进入教区小修院，1945—1952年在香港仔华南总修院攻读神哲学，并于1952年7月6日被圣为神父。1952—1955年在新界

西贡小修院任教,1955—1957年任湾仔圣母圣衣堂助理主任司铎,1957—1967年任主教座堂的主任司铎,1967—1969年任香港仔圣伯多禄堂的主任司铎,1969年再度任主教座堂的主任司铎,1969年升为副主教。1971—1973年任神修院的院长,其间于1971年7月3日被任命为辅理主教,9月8日祝圣;1973年5月23日出任署理主教,同年10月25日正式就任香港教区的第四任主教。1974年4月22日在香港主教座堂举行了就职典礼,于当年7月23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在任仅10个月。

劳达一(L. Ladany, S. J) 天主教耶稣会士,在华传教长达半个世纪。1914年生于匈牙利,22岁时加入耶稣会,1939年来华,后在上海晋铎。1950年从大陆迁到香港,1953年创办了《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周刊,1980年改为双月刊,直到1982年他一直任该刊的主编,30年来他利用剪报档案、电台的新闻笔记,发表了许多反华言论,关注大陆的消息。在辞去该刊物的主编之后,他撰写了一部长达五卷本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著作。1990年因肺癌去世。

胡振中(Wu Cheng-Chung) 香港教区现任主教,也是第三任华籍主教。广东五华县河口人,生于1925年3月26日,原属嘉应教区,早年曾在香港华南修院攻读神哲学。1952年7月6日在香港天主教总堂被圣为神父,后被派往九龙东头村福德中心(即后来的圣母圣诞节)服务,不久,被派往罗马传信大学攻读教会法律,1956年获得教律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纽约、波士顿及芝加哥的总教区秘书处任职,当他还在台湾苗栗的圣亚纳堂担任堂区司铎时,于1975年4月5日被教皇保罗六世任命为香港第五任主教,7月25日在香港天主教总堂举行就职典礼。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后,香港的前途大局已定,他作为天主教香港教区的主教,公开发表声明,表示赞同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1985年5月25日

应我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之邀访问大陆，他是1949年以来首位访问大陆的国籍及香港教区的主教。1988年5月26日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提升为枢机主教，他是继田耕莘、于斌之后第三位华人枢机主教。

汤汉(John Tong) 香港天主教教区的副主教、“香港圣神研究中心”的主任、香港新界教堂的神父。广东省南海县人，1936年出生于香港，1966年晋铎。“圣神研究中心”是梵蒂冈罗马教廷设在香港的主要研究机构，因香港处于远东的中心，同时又是中国大陆的前沿，所以，该组织一直受到教廷的重视。汤本人在香港天主教界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他曾任香港教区国籍司铎协会的会长、圣神修院校外课程办事处主任、教廷“政策研究咨询研究小组”的成员等职；目前担任天主教双月刊《鼎》的主编、香港教区“推行‘迈向光辉的十年，牧函委员会’”的委员，并经常访问大陆，如1982年曾陪同梵蒂冈特使来华，1985年3月陪同胡振中主教访问大陆等。他对香港的前途较为乐观，主张大陆与香港的教会应加强沟通，以促进香港的平稳过渡。

林焯炜(Gabriel Lam) 国籍神父，1967年晋铎。曾任香港天主教区的副主教、香港天主教圣神修院神哲学院院长、圣神修院院长、香港咨议会成员、香港教区人事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司铎议会的当然委员，还曾任教区圣召委员会的主席。他现是主教代表，负责修会事务。

徐锦尧(Tsui Kam Yiu Luke) 1971年晋铎，目前担任教区教友培训委员会的主席、圣德肋撒堂区的神父，曾任“公教教研中心”的主任。1993年9月他曾因编著一辑共六本的伦理教育丛书而获得由香港优秀教育工作者选举的一九九二专题贡献奖，这六本书分别为《蜕变》、《成长》、《群居》、《探索》、《修身》及《新民》，属于中学伦理教科书。1993年8月，还率团到大陆访问，增进了对大

陆教会的了解。

温天顺 (Peter Barry) 美国天主教传教会 (即玛利诺会) 的神父, 美籍华人。他在香港任美国天主教传教会属下的玛利诺工业中学的神父, 同时兼任圣神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是梵蒂冈派驻香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成员, 此前曾在台湾 7 年, 1979 年到港。他还曾多次到大陆许多地区访问, 如北京、上海、南京、福州, 呼和浩特、成都、武汉、沈阳等地, 了解大陆教会的情况。

杨鸣章 (Yeung Ming Cheng Michael) 1946 年出生于香港, 浙江省宁波人, 1979 年晋铎。曾担任香港天主教教区社会传播处的主任、教区发言人、香港教区咨议会的成员。他曾对“九七”问题反映消极, 中英谈判达成协议后, 逐渐改变态度, 并抨击港府的白皮书中忽视宗教团体的作用。1984 年代表胡振中主教出席了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仪式, 1985 年作为胡振中率领的香港天主教大陆访问团的重要成员到内地参访。目前, 他是“圣神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并担任了“明爱徐诚斌书院”、明爱圣保禄职业先修学校等数所教育机构的校监, 还任香港明爱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专责教育服务。

梁作禄 (Lazzarotto, Angelo) 意大利耶稣会士, 宗座外方传教会附属的天主教教区中心神父, 曾任梵蒂冈驻远东地区的代表, 现为香港天主教圣神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他曾写了《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一书, 反华内容较多。他自 80 年代以来多次访问大陆, 如到过上海、四川等。

关俊棠 (Kwan Tsun Tong Thomas) 毕业于罗马传信大学哲学系, 后进入罗马亚尔丰索学院学习伦理神学, 1970 年被祝圣为神父, 1975 年回到香港, 1977 年任教区修院神学系的讲师, 并曾担任香港圣伯禄堂的主任司铎。他现为“李宏基主教教友培育中心”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尹雅白 (Wan Nga Pak James) 现在香港天主教中英文《公教报》的总编辑,1964年6月27日晋升为神父,曾在加拿大教会服务,并创办了一老人中心“满地可中华安乐园”。他目前还兼任圣贞德小学的校监、《公教报学生文坛》的指导神师等职务。

夏其龙(Ha Ke Loon Louis) 1970年晋铎。他现任“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处”的主任、“推行‘迈向光辉的十年’牧函委员会”的委员、“教区宗教联络委员会”的委员;另外,还担任“东亚天主教报业出版协会”的秘书、“香港公教影视协会”的顾问、“天主教国际广播电视协会”的主席等职,是香港天主教会中较活跃的人物。他曾多次访问大陆,并经常发表有关大陆教会及社会分析的文章,曾对九七回归及香港的前途抱怀疑态度。

康建璋(Khong Kin Cheung Edward) 1969年晋铎。他是《公教进行社》的社长、“香港公教真理学会”的主任、香港天主教公教公署“教区总务处”及“教区谘议会”的总务长、“司铎议会”的当然委员,并兼任“教区宗教联络委员会”、“教区财务委员会”的委员等职,统管香港天主教会的财务大权,是教会的实力派人物。

曾庆文(Tsang Hing Mun John B.) 祖籍广东省五华县,生于广州,1950年离开广州,到澳门念中学,毕业后在香港修读了三年哲学,四年神学。他祖上四代皆为天主教徒,曾本人在1963年晋铎,担任过深水埗圣芳济各堂副本堂神父、中审主任、圣神修院的副院长及院长、学院院长、明爱副总裁及副主教等职。目前,曾庆文是香港教区的主教代表,负责社会服务。他也是教区“司铎议会”及“教区教理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并兼任“教区越南籍人士牧民服务委员会”的主席、香港教区教理中心的顾问、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的主任司铎、高主教书院的校监、公教童军协会的顾问等职务。1994年5月出任港事顾问,代表教会关注香港的政治生活,同时也表明了香港天主教会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动向,并发挥了教

会的社会影响力。他在公开对记者发表讲话时曾认为，对香港的平稳过渡充满信心，对“基本法”所给予的宗教自由表示满意。

陈佐舜 广东省南海县人，生于1923年，天主教徒。早年曾在上海接受教育，1946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获法学士及政治经济学文凭，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并获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起任上海震旦大学政治经济系讲师。1951年到港，任华仁书院教师。1956—1959年任老挝永珍新闻周刊的编辑，1959—1965年任香港亚洲协会业务主任。197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副校务主任，1973年任该校的教务长，1983年起担任香港岭南学院的副校长、校长。他在香港教育界较有影响，1984年10月还应邀赴京参加庆祝国庆35周年纪念，并对香港的前途抱有乐观的态度。

郑生来(Chang Sang Loy Anthony) 1970年晋铎，“香港中国神学协会”的会长，天主教刊物《驿》的主编。另外，他还是圣云先堂区“圣云先弥撒中心”牧职团的神父，并担任香港“优良电影介绍小组”的联络人。他主持的“香港中国神学协会”及《驿》杂志旨在研究本地化的神学，并报导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的情况。

陈志明(Chan Chi Ming Dominic) 1979年晋铎，现为香港天主教教区的副主教，是教区人事委员会的委员、司铎议会的当然委员，并担任“推行‘迈向光辉的十年’牧函委员会”的主席“天主教教区坟场委员会”的主席，另外，他还是教区学校中央校董会的委员、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的教区顾问、香港天主教圣经学院的财政主管、“明爱与堂区联络委员会”的委员等职。

李永援(Remedios, Marie) 香港教区的主教代表，负责教育工作。她是嘉诺撒仁爱修女会的修女，担任香港天主教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兼任“推行‘迈向光辉的十年’牧函委员会”的委员、香港天主教教区学校服务中心的委员、嘉诺撒伯大尼修院的院长、香港明爱教育委员会的委员等职。

劳伯堦 (Lo, William) 耶稣会士，1991年4月耶稣会成立中华省时，他于当年5月出任了港澳区的新区会长，接替原来港澳省会长吴智勋。他还兼任“教区教友培训委员会”的委员、香港天主教圣经学院院长、香港男修会会长联会的执行委员、香港天主教护士会的指导司铎。他本人为上智之座小堂（利玛窦宿舍）的主任司铎。

刘赛眉 (Lau, Goretti) 为耶稣宝血女修会的修女，香港教区教友培训委员会委员、圣神修院神哲学院神学部主任等。

李亮 (Lee Len Lawrence) 1975年晋铎。同时任教区秘书处、教区谘议会的秘书长，另外还是司铎议会的当然委员、“海外华人教友牧民服务处”委员会的成员、公教童军协会的顾问等。

谭坤 (Tam Kwan Stephen) 1971年晋铎。他本人为圣母圣衣堂的主任司铎，兼任教区基督徒合一委员会的副主席、香港天主教青年联会的指导神师、基立学校的校监、香港中国神学协会的秘书、香港天主教大专联合会及官立中学天主教同学会联合会的神师。

梁祐忠 香港天主教区的前主教代表。于1934年出生在广东海康，1957年进入华南总修院攻读神哲学，1964年晋铎。之后赴罗马主修教会法律，以后又到加拿大多伦多华侨中心服务，不久转往纽约长岛堂区服务。1971年回到香港，在长沙湾基督君王堂任助理司铎，两年后到香港仔圣伯多禄堂任主任司铎。从1985年起被委任为香港区主教代表，1992年12月因病休假。

五、后过渡期内的天主教会

面临九七回归，香港天主教会在后过渡期内采取了一些措施与准备。早在1987年香港教区就设立了一个特别小组，研讨教会如何向九七过渡及九七后的展望；1988年初又成立了“教区咨询委

员会”；同年 8 月 15 日提出一个香港天主教区《未来十年路向》的咨询文件，交付全体教徒征求意见。文件要求教徒要“植根于香港”，“参与香港的建设”，“维持香港的稳定”，要“与其他各教会共融”、“与大陆教会共融”，并鼓励教徒“关心、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准备承担中国公民的义务与权利”。总的来说，在后过渡期内，香港教会所持的立场主要是“与港人同行”。1991 年在纪念香港天主教会 150 周年时期，教区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即举办“教友大会讲座”，主题是“承担与同行”，讨论目前香港天主教会处于特殊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在讨论中，大部分教会人士主张应与香港市民一起“承担与同行”，促进香港社会的平稳过渡，以利于将来香港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在政治方面，力主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发挥教会的组织、动员力；在非政治领域，通过教会的各类社会机构，更广泛地发挥教会对家庭、学校教育、社会福利、医疗等方面的影响。另外，香港天主教会还加强了与大陆、台湾及澳门等邻近地区的关系，尤其大陆与香港教会间的交流近年来不断发展。

1997 年以后，为了保持香港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遵照《香港基本法草案》，香港与大陆实行“一国两制”，在宗教方面，也将遵循这一原则，大陆与香港的宗教组织与团体“互相独立，互相尊重，互不隶属”；在将来的特区政府管辖下，香港的宗教组织仍可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机构保持联系，教会在港的社会慈善事业也将继续保留和发展。实行“一国两制”及“三互”原则在香港受到教会人士的赞同，教会官方也一再表示在后过渡期内要力争维护香港的繁荣与发展，胡振中主教也曾公开表示“对中国政府有信心，香港的中国教会前景乐观”。大多数神父及修女也都愿意恢复中国公民的身份。

目前，香港天主教会单从人数上来讲正面临下降的趋势，近年

来有一些教徒移民海外，使教会有所削弱。其次，因香港的经济一直持续发展，物质与功利主义泛滥，年轻人对信仰缺乏热诚，到教堂里望弥撒的教徒也越来越少，对教堂的捐献大幅度下降。另外，教会内部神职人员老化，修生人数逐年减少。不过，近年来天主教会社会慈善事业、教会教育、医疗等方面却不断加强影响，在港人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无形间所显示的天主教会的实力在香港还是不可忽视的。以后，教会还将继续在这方面加大投入，扩大影响。同时，教会提出要加紧建设信仰小团体——“基基团”，使之成为以教徒为主体的真正的地方教会，并赋予它“草根教会、末梢神经教会”等性质，鼓励一般教徒积极投入基基团的活动。到1992年9月，全港已成立53个基基团，成员中大部分为青年，也有家庭主妇及老人，每个团体的人数为8—13人，而且大部分是在1990年以后成立的，目前发展很快。另外，还筹组了数十个信仰小组，其成员包括家庭主妇、教师及职员等，活动也主要侧重在社会生活方面，这类的基层教会组织也是为了适应1997年后的政局变化。教区还设立了一个“教友培育基金”，以推动整个教区的教徒培训工作，提高他们在信仰上的修养。再者，80年代中期，因九七回归，天主教教徒曾向外移民的较多，影响了香港天主教的发展，而同时菲律宾人大量涌入香港，尤其是菲佣在香港社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短短几年内菲籍天主教徒就已达10万。所以，目前香港天主教会的各个组织尤为重视菲籍人士的工作，并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在教区组织方面，为迎接新时期的到来，也进行了内部的重组。据1994年3月27日的香港《星岛日报》称，改组后的香港教区将由现有的三个总铎区划分为九个总铎区，信仰小团体和教徒的培育被确认为重点的“牧民工作”，并侧重于对新界堂区的投资建设。香港天主教现有65个堂区，改组是为了“促进临近堂区间的沟通，及牧民传教工作的合作，并让堂区间在人力资源

及牧民设施上分享互助”，同时“也有助于堂区司铎履行他们的牧民职责”。

近两年，香港天主教会为迎接九七，大力推行了本地化，如在语言方面采用中文或广东话，在人事方面加紧培训华籍神职人员。另一方面，教区注重在劳工阶层传教，近几年相继成立了劳工牧民中心、香港明爱荔枝角职工中心、善导之母堂职工发展小组、劳工事务委员会等等，加上原有的“公教职工青年会”等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向劳工阶层的传教活动，甚至制定了九七后的传教规划，要发挥教会的特殊影响力。同时，教会利用现代传播媒体大力开展传教，如“教区视听中心”在1993年制作了一系列的“公教录像”的影带式杂志，分析祷篇、灵修篇、人物特写、教会典故、儿童圣经故事、普世教会咨询等，向社会公开发行；良友之声出版社和“教区视听中心”共同利用圣经故事等内容制作了“宗教闪卡”，吸引了大批的香港青少年。

注释：

1. 《香港天主教掌故》，第33页，编著者田英杰，（香港）圣神研究中心暨圣神修院校外课程部出版，1983年12月。
2. 参见《香港天主教会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第91页。

第四章

基督教新教各派

一、历史与现状

(一) 基督教在番港的发展史

香港基督教新教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几乎与天主教同时由澳门传入的。那时的香港还是一个小渔村，割让给英国后，在澳门的传教士便陆续转来香港。1842年1月始有美国浸信传道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简称“浸信会”)的叔木士牧师(Jehn Lewis Shuck)及随后的美国浸信会(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罗孝全牧师来香港传教，并于7月21日在中环设立“皇后道浸信会”(The Queen's Road Chapel), 这是在香港建立最早的基督教新教教会，也是后来“香港浸信会”的前身。同年10月，美浸信会另一牧师憐为仁(William Dean)到港，在次年的5月5日另立“街市浸信会”。1843年11月伦敦传道会抵港，并将其在马六甲的总部迁到香港，还将马礼逊创办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迁到了香港，成为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不久在皇后大道建立“真神堂”(即今日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合一堂)在湾仔设立“福音

堂”（即今日中华基督教会湾仔堂）。同年，德国人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原荷兰教会牧师）来港任港督的中文秘书，于1844年创办“福汉会”（Chinese Union），以发展华人教徒，并积极向中国内地传教。他还同时请求德国三巴传道会（即巴勉会Barman Missionary Society、巴色会Basel Missionary Society、巴陵会Berlin Missionary Society）派传教士来华传教，1847年巴勉会（今之礼贤会）、巴色会（今之崇真会）及1851年巴陵会（今之信义会）先后派教士到港传教。因而，当今香港信义宗各教会（包括礼贤会、崇真会、信义会、路德会和港澳信义会）都承认郭士立为其在港传教的先锋。早期新教各派在传教的同时，还注重发展教育及出版事业，如由叔未士创办的“宏艺书塾”、马礼逊教育协会创立的“马礼逊纪念学校”、伦敦传道会建立的“英华书院”等，直接在华人中间发展教徒。出版事业主要是翻译、发行《圣经》。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即1843年8月22日，西方传教士就选定在香港召开了中国首次译经会议，这也更说明了香港在传教史中的特殊地位。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伦敦会台约尔牧师（Rev. Samuel Dyer）、合信医生（Benjamin Hodson M. D.）、理雅各牧师（Rev. James Legge）、麦都思牧师（Rev. Walter Henry Medhurst）、美魏查牧师（Rev. William Charles Milne）、施敦力亚力山大牧师（Rev. Alexander Stronach）及施敦力约翰牧师（Rev. John Stronach）；公理会有裨治文牧师、波乃耶牧师（Rev. Dyer Ball M. D.）；浸信会有彝为仁牧师（Rev. Willam Dean）、罗孝全牧师、叔未上牧师、马高温医生（Daniel Jerome Macgowan M. D.）；马礼逊教育协会有勃朗牧师；美国长老会有娄华理牧师（Rev. Walter Maccan Lowrie）。其他代表有来自马六甲、新加坡、雅加达、厦门、福州、宁波等地。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英美不同差会的传教士的会议，也是早期来华传教士举行的首次会议，其影响深远。随着五口

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便以香港为基地，深入中国内陆传教，或培养华人教士。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洪仁轩及国民党早期领袖孙中山等人都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有许多人还受洗入教。日本占领时期，各教会虽然受到很大冲击，但自抗战胜利后很快就恢复了生机，并且教徒人数成倍增长，各教派的组织也进一步完善。以致到现在，香港的新教各派虽然人数很少，但各派与世界各主要教派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香港社会中影响广泛。从基督教各派在香港发展的150年历史中，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 西教士治会时期(1842—1883年)

这一时期是新教各派在香港的初创阶段，先后在港设立教堂、学校及传教机构，如浸信会(1842年)、美部会(1843年)、伦敦传道会(1843年)、圣公会(1843年)、礼贤会(1847年)、崇真会(1847年)、巴陵会(1851年)等等。早期香港新教各派的教会都由西方教士掌管，华人教士极少，且多派往内地。因此，最初的新教各派都比较注重开办各类学校，以培养华人教士或吸收华人入教。1851年以前，教会所办学校多以宗教教育为主，后才与世俗教育结合，并得到港府的支持，建立教育委员会，发展初等教育，有的教士还直接出任督学，如礼贤会的卢威廉牧师是香港首任督学，崇真会的欧德礼牧师为香港首任教育司长。到1883年，在港的新教各教派共计13个，各类教会学校已达18所。如这一时期的“宏艺书塾”、“英华书院”、“马礼逊纪念学校”、“浸信会女校”、“圣保罗书院”、“美国公理学校”等，都是比较著名的教会学校，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就出自马礼逊学校。可以说，香港当今的教育系统渊源于昔日的教会教育。除开办学校外，各教派还设立孤儿院、图书馆等社会福利机构，以吸引华人入教。但这一时期香港教会的发展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当时正值两次鸦片战争

期间，有些西方传教士借传教之机直接参与或介入殖民侵略活动，或靠战争为教会赢得某些利益，上帝的“福音”在隆隆的军舰和炮火下传布，至今仍为人们所不齿。这一阶段的香港教会靠着各种各样的手段使教务有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1880年时的香港人口为16万，华人基督教徒有800多¹。不过他们受制于西方教士，经常在西方人的教堂里聚会。

2. 华人教会成立时期（1884—1914年）

自1884年圣公会按立邝日修为首任华人牧师始，便开启了香港华人基督教新教的历史。同年梁安统牧师自澳洲到港，建立了“循道卫理联合会香港堂”华人教会；次年，礼贤会的王煜初被聘为主任牧师，并于1886年建立“华人自理道济会堂”。随着内地移民的不断增加，华人基督徒的人数迅速增长，而华人教士的不断增长也是为适应这一形势所需，于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短短二、三十年间，华人的教会纷纷建立，并开始自立，华人教士也摆脱了西方教士的制约。1901年，建立了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902年圣公会邝日修牧师设立广荫院，照顾无依老人。到1914年，香港已有华人教会组织25个，分别属于圣公会、伦敦会、巴色会、循道会、礼贤会、公理会、浸信会、巴陵会、美以美会等九大公会。此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美国的五旬节圣洁会也传入香港。

3. 华人教会自理时期（1915—1940年）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香港政局动荡，基督教新教各派因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也对香港教会产生了不利影响。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从1915年起香港华人教会开始筹建香港基督教联合会，以协调各教会的关系。到1915年4月8日，正式成立了香港基督教联合会，并公布了联合会章程，规定凡有3年以上历史、有教徒50人、有自己的教堂和牧师的教会，都可以参加联合会。这一组织的建立，不但加强了香港新教各派的联系，也改变了教会各据一方的局面，同时扩

大了华人教会的社会影响力。自此，香港基督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奠定了港人自办、自治教会的基础。1918年成立了香港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始重视妇女的生活。1921年一些基督教徒在杨少泉、麦梅生、王爱棠等人的带领下成立了“反对蓄婢会”，要求港府禁止买卖奴婢，取消女婢的卖身契约，前后坚持了18年之久，终于迫使香港政府于1938年下令解放女婢，在香港社会及历史上引起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一阶段，香港基督教会稳步发展，传教范围扩大到香港附近的岛屿及九龙，到1940年新增教会27个，关注社会生活，并直接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此时救世军也传入九龙并建立第一个活动点。

4. 日治时期之教会(1941—1945年)

香港被日本侵占期间，基督教活动转入低谷，教会组织只剩下49个，并时时受到日军的牵制。为利于统治，日军在1943年2月27日成立“香港基督教总会”，以取代“香港基督教联合会”，该会虽然正、副会长及各部部长全由当时在港的牧师担任，但另设的参议一职则由日本人平冈贞、藤田一郎担任，后又委任了一名日本顾问。在这一时期，各教会的主要活动是救济难民。

5. 战后教会复元时期(1946—1949年)

战后，逃避战乱的居民重又回到香港，时值国内解放战争，大批的移民不断迁入香港，许多内地的教会组织也纷纷来港，基督徒人数成倍增长，各教会一面恢复，一面开创新的机构和教堂，以适应形势需要。到1949年时又新增了21个教会组织，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即摩门教)也在此时传到香港。

6. 香港繁荣时期的教会(1950—)

50年代时，大批内陆居民迁到香港，教会抓住时机，借慈善服务与社会救济来吸引信徒。随着香港逐渐进入繁荣阶段，基督教新教各教会也一直持续发展。因香港已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港口

及东南亚一带的经济中心，所以，各教会都极为重视香港的地位，将其视为向东南亚一带、以及向中国大陆传教的一个枢纽，利用现代高科技，如建立出版社、电台、电视，或开办学校和慈善机构，积极传教，扩大自身的影响，发展各自的势力。从50年代到90年代，香港各教会新办了60%的社会福利事业、新创办了40%的学校、新增了20%的医院病床。此外，华人教会发展迅速，由于人数剧增，教会的势力也大大加强，并坚持走“本色化”道路，宣讲本土化与处境化的信息；1970年有100多个独立的华人教会，其中最大的是“灵粮世界福音会”（the Spiritual Food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及聚会处。进入80年代，香港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城市人口迁移到新市镇，许多教会就乘此机会在新市镇借社区服务开设分堂。所以，各教会的数目在80年代急剧增加。据“香港福音二千”所发表的1990年《全港基督教华语教会普查报告书》中显示，全港的华语教会有861间，连同非华语的教会则约900间，与1981年的634间相比，增长42%。而新增教会中的一半以上是以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场地作基址的²。教会增长较快除了港府的扶持以外，各教会还积极布道传教，设立、健全传教机构。如1967年成立了“基督教工业委员会”、1973年设立“工业福音团契”，后来又成立了“福音戒毒团契”。80年代开始举办各式各样的大型布道会及福音训练等。如1982年“中国神学研究院”开始进行基层的福音训练课程、1987年的包乐布道大会、88年学园传道会的布道会、89年播道会纪念百周年的“爱与人生”布道会等，90年更邀请了美国布道家葛培里来港举行了香港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布道会，吸引了数十万人参加。这些布道会借助了现代化的传媒工具，扩大了教会的影响。

（二）香港基督教现状

1. 概况

香港基督教新教各派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只设立一些跨机构的教会联谊组织。1990年《教会普查》的统计表明，到1989年底，全港在册的教徒总数是258,298人，约占全港总人口的4.4%。居港的教徒数是168,746人，参加主日礼拜的人数约有12.5万人，占居港教徒的74%，其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53.4%，而20—29岁的青年人占教徒总数的32.2%；教徒中大多数是白领阶层，蓝领阶层只占11.5%；约80%的香港教堂主日崇拜人数在200人以内，信徒男女之比为40:60（香港人口男女之比为51:49）。全港现有1,668位教牧人员，包括牧师与男女传道，其中堂会的牧师约520多人。目前，香港的教堂总数为924间，其中中文教堂为900间，英文教堂24间；教牧人员仍较缺乏，21.5%的教堂没有堂主任，76.3%的堂会缺少男传道，48.9%的堂会缺少女传道³。

香港有50多个教派的180多个分支机构，分属英、美、德等不同地区的教会，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浸信会，其次为信义宗；其他主要宗派有中华基督教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宣道会、圣公会、循道卫理公会、五旬节圣洁会、救世军等，从70年代开始兴起许多独立的地方教会。因圣公会是英国的国教，它在香港享有特殊的地位。另外，香港约有400间堂会有差传事工，有150间教会有差传组织或宣教计划；有97名宣教士，大部分派往亚洲，非洲、欧洲，派往拉美和太平洋岛屿的各有两位。香港的差会有18个，其中10个是华人差会，7个是西方的，另有一福音广播机构。香港的各类神学院和圣经学院有15间，神学生有1,300多名；宗教出版机构有40多家，大专学院3所（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香港浸会学院和岭南书院）。

2. 教会的文化教育事业

新教各教会在香港开办教会教育的历史较早，各教派大多采取借用兴办教育的方法来传教，往往很成功。浸信会是香港最大

的教派,早年叔未士创办的“宏艺书塾”就很著名,其夫人还创办了香港第一所女校;1842年11月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接受资助,开办中小学教育;在1843年米彝牧师将英华书院自马六甲迁到香港成为中国第一所西洋学校以后,香港的教会便在香港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英华书院是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立的,迁港后于1845年11月由英华书院向英国派遣了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至今已有176年的历史(1865—1912年间停办,1913年复校)。另外,香港的官方教育也由基督教牧师帮助兴办或经营。如1862年由理雅各牧师帮助创办的皇仁书院,其最初的住址是美国浸信会的一座楼宇,经改建,于1862年2月正式招生,命名为“中央书院”,有300名学生;1889年改名为维多利亚书院,1894年才改为现名,而目前的院址也是教会的产业。1847年香港设立了教育委员会,当时主要主管三所港府资助的学校,但自施美夫牧师于1850年就任香港圣公会第一任主教后,教育委员会则由主教任主席,并负责管理学校。以后,还有一些牧师任该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孙中山先生早年曾入香港圣公会拔萃书室就读,后转入皇仁书院,由于他与公理会的喜嘉理牧师相识,遂于1883年在公理堂受洗,改名为“日新”,1887年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常受基督教牧师们提倡的“新知救国论”的影响。教会在香港早期教育史中的确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过,早期的教会学校多以宗教教育为主,1854年以后才实行改革,倡导社会教育。在今天的教会学校中,大部分都接受政府津贴,港府只规定各所津贴学校只要做好教育署所制定的基本要求,教学及行政管理方面由学校自主。所以,教会可以在学校内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如团契、教授圣经知识、甚至可公开讨论信仰等。另外,私立的教会学校由于不享受政府的津贴,就可以更多地进行不同模式的基督化中、小学教育。

据《香港一几八五》(香港政府出版)1985年的统计,当时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学生总数 34.2 万(其中包括幼稚园教育)人,开办的幼稚园有 200 间,占全港幼稚园总数的 25.8%,教会小学有 175 所,占全港小学的 21.9%,教会中学有 120 间,占全港中学的 22.7%,还有 3 所大专学校。此外,各教会也开办了社会教育,如办有 3 间失聪人士学校、10 间弱智人士训练学校,开展为聋哑、盲童、弱智、学习迟缓等青少年的教育,在社会中的影响很广泛。1985 年 9 月香港“兴学证基协会”还成立了“基督教教育研究所”,旨在研究教育、提供训练课程、领导教育改革⁴。到 90 年代初,在香港基督教界所办的中、英文中学、小学、幼稚园就读的学生有近 30 万人,约占全港学生总数的 20%。

除兴办教育事业外,香港基督教会还重视社会文化事业。如香港的第一份报纸就是由伦敦会在 1853 年 8 月 1 日于英华书院所办的月刊《遐迩贯珍》,该报先后由麦都思、奚礼尔、理雅各等牧师负责,主要报导有关西方社会的人文、地理、科技、医学,及世界各地包括香港本地、中国内地的消息。后来,由基督徒创办的报纸还有《中外新闻》、《华字日报》、《循环日报》、《世界公益报》、《德华朔望报》、《大光报》等。大陆解放后,由内地迁往香港的基督教组织也相继将自己的文化教育机构一起移到这里,继续发挥其特殊作用,如 1899 年创立于广西梧州的建道神学院,最近,又创办了《建道学刊》。据香港政府出版的《香港年鉴》(1992—1993 年)上的统计,基督教组织开办有 13 所神学院及圣经学院、16 间基督教出版社及 56 间基督教书店,如出版有《基督教周报》、《时代论坛》等。这些教会开办的文化教育事业,在香港社会中颇有影响。近年来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与对外交流,内地教会与海外之间的交往不断加强,在香港出现了许多研究中国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机构及传教组织,并创办了一些刊物、出版一些有关中国宗教的书籍,在国际上引人

瞩目,如“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等等,后面将详细介绍。

附表 1

教 会	中 学			小 学			幼 稚 园			总 数	
	学 校	学 生	教 师	学 校	学 生	教 师	学 校	学 生	教 师	学 生 总 数	教 师 总 数
圣 公 会	28	30000	1000	47	50000	1300	31	12000	300	92000	2600
中华基督教 会	21	22198	1031	43	36722	915	18	5603	182	64528	2128
循道卫理 联合教会	5	4143	162	8	10276	314	10	3317	72	17736	548
浸信联会	6	12528	433	4	1149	53	7	2165	87	15842	573
路 德 会	5	5191	246	5	8378	287	4	1140	27	14709	560
信 义 会	3	5132	177	10	4815	147	13	3900	100	13847	424
崇 真 会	3	2875	123	8	5713	200	7	1458	49	10046	372
礼 贤 会	6	3200	125	4	1850	110	7	1470	46	6520	281
救 世 军	1	926	37	5	3152	124	7	1527	25	5605	186
中华传道 会	1	1100	44	3	3900	134	3	520	13	5520	191
安息日会	4	2700	120	2	55	5	2	115	4	2870	129
男青年会	4	2806	108							2806	108
女青年会	1	706	33	3	700	25	1	200	7	1660	65
其他教会	12	12467	602	15	13119	596	23	17536	165	43121	1363
基督教会 (合 计)	100	106026	4241	157	139829	4210	133	50956	1077	296810	9528

说明:此表是香港基督教1979年的统计资料,在教会学校就读的学生共有296,810人,占当时全港中学、小学、幼稚园学生总数的23%;教会学校的教员总数有9,528人,占全港中、小、幼教员总数的25.2%。其中教会所开办的中学占全港中学的22.3%,小学占总数的17%,幼稚园占总数的16.45%。另外,中华基督教会的统计为1977年的数目,浸会联会为1978年的数字。

3. 医疗事业

香港基督教界历史上对医疗卫生事业一直投入较大，在教会初创时期，首先以办诊所来吸引华人入教，并赢得人们的信赖。香港第一间基督教医院是在中国五口通商之初由澳门医药传道会医生合信于 1843 年 6 月 1 日创办的，医院即今日的湾仔律敦治医院的现址，因 1847 年合信前往广州，此医院转为政府医院。1886 年教会创立了“雅丽氏医院”，即今日的“那打素医院”，其全名为“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是由三位女教徒的名字命名的。何妙龄是中国第一位牧师何福堂的长女、雅丽氏则是何的儿媳，那打素是当时任香港医务委员会主席戴维斯母亲的名字，这所医院在香港久负盛名。1887 年 10 月 1 日，在这所医院下附设了“香港华人西医学院”，是香港最早的医学高等学府，也是 19 世纪香港的最高学府，延用了英国式的教育制度，后改名为“香港西医书院”。到本世纪 80 年代中期，香港教会共开办了 5 间基督教医院，包括基督教联合医院、那打素医院、浸信会医院、播道医院和灵宝被院，共有病床 1,821 张；另外，还开办了约 60 间诊疗所⁵。

近年来香港各教会愈来愈重视医疗传教，利用在医疗工作的时机传播福音。例如，全港 45 间医院中有 16 间设立了医护人员的基督徒团契，除了可以联络医院内的信徒外，还可以向其他员工及病人传教。其次，各基督教医院近年来开始设院牧一职，一些医院还主动聘请教会人士到医院传教。教会开办的小诊所一般收费低廉，也吸引了大批的患者，尤其是社会下层人士。据《香港年鉴》（1992—1993，香港政府出版）的统计，由香港基督教团体所开办的医院共有 7 间，病床已达 2,126 张。

4. 社会福利事业

香港基督教会一直在社会福利事业上占有重要地位，创办了各类的社会福利事业，在社会中的影响很大。在大多数非政府的社会福利机构中，基督教会开办的福利机构几乎占 1/3。自 1967 年

香港发生暴动以来，港府也认识到青少年教育问题的重要性，但政府没有足够的人力及物力来解决这一难题。于是将大部分的社会福利事业交由志愿机构或教会团体去主办，由政府资助。1985年统计，香港有198个机构是“社会服务联会”的成员机构，有49间教会的福利机构加入了该组织，约占31%。此外，在香港86个公益金会员中有33个属教会机构，约占40%。具体来说，建有青少年中心、儿童服务中心、孤儿院、育婴院、老人院和各类宿舍等80多家，教养院和戒毒中心等50多个。这些社会服务机构的经费近年来来自海外的资助越来越少，而大部分的机构是依赖港府的支持，极少数依靠教会与信徒的捐献。例如：“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目前可以提供六大类、建有30多个中心、超过16种的服务项目，如婴儿训练、幼儿园、特殊教育、青少年中心、外展服务、学校社工服务、职业训练及延续教育、老人宿舍、老人中心、家庭助理服务、寄养服务、社区发展服务、健康服务、移民服务、中途戒毒中心及辅导和家庭生活教育等，该机构已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在社会中影响很大的社会服务部门。再如，香港基督教“突破机构”1993年斥资15,000万港币于年底兴建了一个面积逾8,000平方公尺的青少年村，将服务于来自破碎家庭的青少年，这是一个将辅导、家庭服务、中外及文化活动结合起来的综合性的机构。可见，各个教会借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是香港基督教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而同时这些教会主办的社会福利事业也确实解决了社会难题，对维护香港社会安定与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维护了香港政府的统治，得到港府的大力支持。

据《香港年鉴》(1992—1993年)的统计，到1992年底，香港基督教各派共设立了61个社会服务机构，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项目，办有108个社区中心和青年中心、35个日间护理中心、8个儿童院、27间安老院、78间老人中心、以及20个营地，基督教青年会及基督教

女青年会还开办了 5 间酒店式的国际宾馆。

除以上各种社会组织外，为配合传教，基督教各派还成立了 96 间辅导机构及基督教的行动小组，近年来一方面积极参与香港的社会生活之中，有些组织打出“民主”与“保障人权”的旗号；另一方面教会也介入国际上的一些援助计划，或支持第三世界发展计划，如举办大型的“我爱香港运动”，鼓励市民爱护香港；而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推行的“五饼二鱼运动”，为香港发起的首项海外援助计划。

二、主要教派

(一) 圣公会(Sheng Kung Hui)

英国国教会（即圣公会）海外传道会的牧师史丹顿（Rev. Vincent Stanton）从 1842 年开始在港活动，次年被委任为圣公会首任驻港牧师。1847 年开始建造香港最大的圣约翰教堂，以该堂为主教座堂，后又成为港英政府举行重要宗教仪式的地方。1849 年成立了维多利亚教区，同年正式成立了“圣公会港澳教区”，施美夫（George Smith）牧师被任命为港澳教区第一位主教，当时属于中华圣公会的一部分，在坎特伯雷大主教辖治权以外，且多为英语教堂，主要供外籍人士礼拜。到 1863 年才按立首位华人圣职人员罗心源，以后开始重视发展华人教会。于 1865 年建立香港第一个牧区圣士提反堂，1890 年九龙教区建立了圣三一堂，以后有 1891 年的诸圣堂、1906 年英语牧区的圣安德烈堂、1909 年的圣保罗堂及 1911 年的圣马利亚堂相继建成。在 1949 年以前，圣公会港澳教区一直是中华圣公会的一个教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将其对维多利亚教区的辖治权交予中华圣公会，使在香港和澳门的圣公会教堂同属一个教省。1951 年港澳地区的圣公会教堂脱离中

华圣公会，成为一独立的教区。如今附属于圣公会东南亚议会，并与全球圣公宗谘议会紧密联系。此外，圣公会还注重培养女牧师，1975年区玉君女士被正式按立为圣公会的女牧师，她是香港基督教界六位女牧师中第五个被按立的，她现在圣公会黄大仙圣十字架堂任主任牧师。

目前，香港圣公会港澳教区共有教徒 22,000 多人，神职人员 80 名，香港有教堂 35 座，其中 26 所为牧区，9 所为传道区，分布在香港、九龙和新界。教区以教区主教为首牧，而最高决策机构为教区议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负责制定政策，商讨教区内部事务及发展方针，休会期间则由常备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其下设有 14 个委员会，即常备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宪章委员会、礼仪委员会、文字委员会、青年事工委员会、圣乐委员会、教区福利协会、主日学委员会、工业委员会、广播委员会、医疗及惩教机构、牧养委员会。

港澳教区的主教视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为圣公宗最高的精神领袖，并参加全圣公宗主教的兰柏会议 (Lambeth Conference of All Anglican Bishops)，圣公会港澳教区现任主教邝广杰，1981 年被任命为港澳教区第九任主教，他也是圣公会港澳教区第一任国籍主教，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华圣公会港澳教区”的总办事处就设在主教府。主教以下设有主教代表、会吏长、法政牧师，另有教区干事若干，如教区新闻干事、教区宗教教育干事、教区教育干事、青年及妇女事工干事，还设有教区发言人、教区法律顾问、小学监委会主教代表。此外，教区的常备委员会，义务负责日常事务。

香港的圣公宗有固定的祷文、读经、认罪、启应文，如“赞美颂”、“尊主颂”、“求主颂”、“使徒信经”等，也以唱的形式来表达，按教会年历来举行崇拜，祈祷多采用《公祷书》，跪领圣餐。

最近, 圣公会港澳教区正在筹划建立教省。在 1993 年底结束的圣公会第 41 届教区议会上通过了 13 项提案, 为香港教区发展成为教省定下了雏型。圣公会港澳教区主教邝广杰指出建立教省的目的在于希望增加教徒的投入感与参与性, 以协助教会传教。据称, 将来的教省由香港岛教区、东九龙教区、西九龙教区和澳门传道地区组成。而将来的教省总议会将拥有教省的统治权, 教区议会通过教省议会由主法院、圣品院及平信院三院组成。港澳圣公会教省的成立将使教会更能独立地运作, 更便于与世界其他宗教组织及大陆教会的联络与沟通, 也淡化了原有的殖民色彩。

因圣公会在香港的特殊地位, 教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也较高。在教育方面, 教会开办有中学 33 间, 其中著名的有圣保禄男校、拔萃男校及拔萃女校, 小学及幼稚园分别为 47 间和 36 间, 分布在全港各区, 就学的学生约有 10 万; 还有 2 所学院: 圣约翰学院和圣公会宗教教育中心。在社会服务方面, 早在 1969 年就成立了教区福利协会, 主要为婴幼儿、青少年、老人及伤残人提供服务, 下属服务机构共 36 个, 其中包括各类服务中心、疗养院及诊疗所等, 服务对象遍及社会各阶层。

在国际联系方面, 圣公会港澳教区是普世圣公宗的一部分, 它也是东亚地区议会的成员之一, 与世界其他教会组织联系密切, 并定期参加国际圣公会的咨询议会和兰柏会议。

(二) 信义宗(Lutheran Churches)

香港的信义宗教会来自世界各国, 有着各自的背景, 但都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港传教最早的是信义宗牧师郭士立(Karl Gutzlaff), 他于 1830 年来到中国, 1842 年为香港政府服务, 曾任华民政务司。不久, 德国的礼贤会、瑞士的崇真会先后于 1847 年到港传教, 礼贤会以粤语居民为传教对象, 而崇真会则以

客家人为主。到20世纪初,美国、丹麦、德国、挪威、芬兰及瑞典的信义宗传教士也相继到港,建立自己的教会组织。1948年12月,信义神学院(成立于1913年)由湖北迁到香港,同年设立了信义书报部(The Lutheran Board of Publication),即现在香港道声出版社的前身;此时,美国信义会的李敦礼博士来港,设立了世界信义宗香港办事处及公所。1954年建立了基督教香港信义会(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Hong Kong),随后又成立了香港路德会(The Lutheran Church-Hong Kong Synod)及港澳信义会(The Hong Kong-Macau Lutheran Church)。不久,设立香港信义宗协会(The Lutheran Church Hong Kong Association),彭福任会长,下有五个成员教会,包括香港信义会、香港路德会、基督教香港崇真会(Tsung Tsin Mission, Hong Kong)、中华基督教礼贤会香港区会(Chinese Rhenish Church, Hong Kong Synod)及港澳信义会。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香港信义宗教会建立了100多个会堂,并展开各种社会服务工作,注重培养神职人员。1957年“香港信义宗协会”成为“世界信义宗联合会”的会员,同时也加入了香港基督教协进会。

香港的信义宗注重仪式,有认罪、祷告、读经和讲道,圣餐礼有“仰望颂”、“三圣颂”、“撒迦利亚颂”和“上帝圣羔羊颂”,均以唱的形式来表达,并以跪式领主餐。

据统计,截止到1986年,香港信义宗教徒共有43,000人,教堂及布道所128个,神学院2所,有神学生200多名,传播中心和出版社各1个,中小学及幼稚园90多所,各种服务机构65个。

由于香港信义宗有着各种教会的背景,包括信义会、路德会、礼贤会、崇真会等,内部派系林立,成立了各类教会组织,但各教会通常设有“总议会”,由各堂会代表组成。总议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选举会长、监督、或主席,任期一至三年不等;其下设立理事会,

在总议会休会期间推行会务，其成员包括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另外，除港澳信义会外，其他四个教会均为世界信义宗联合会（*The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的成员。以下介绍几个主要的教会：

1. 香港路德会

1949年11月由4名美国传教士创办，地址设在香港九龙又一村海棠路68号。最初称“香港福音道路德会”，1976年改为现名。1963年开办了协同神学院，目前该会与美国路德会有密切联系，是世界信义宗联合会的成员之一。香港路德会有教堂及布道所28个，中、小学及幼儿园23所，就读的学生超过21,000人。据称该组织有万名教徒，另设有2所青少年中心、1所老人中心，1985年落成的包美达中心，为一社会综合服务中心。

2.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

1954年成立，并在道风山举行的第一届总议会上通过了“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组织章程”。1957年加入世界信义宗联合会，同时也参加了“香港基督教协进会”，该会与另外6个教会组成了“信义宗东南亚基督教教育事工委员会”。现该会有教堂及布道所41个，神学院1所（信义宗神学院，院长肖克谐），中小学及幼儿园23所，社会服务机构4个，另有一信义宗联合文字部及道声出版社。1989年7月23日还打破传统，按立了第一个女性牧师——陈锡妹，她在沙田铜锣湾活灵堂服事了8年，终成为香港信义宗首位女牧师。目前，香港信义会的监督是盖英魁。现会址设在香港九龙窝打老道50号A。

3. 基督教香港崇真会

原称巴色会，现有教堂13所，学校及幼儿园21所。会址设在香港九龙界限街144号G座3楼。

4. 中华基督教礼贤会香港区会

也是世界信义宗联会的成员之一，现有教堂14所，学校、幼儿园十多所，另办有诊疗所等社会服务机构。

5. 港澳信义会

成立于50年代，但未加入世界信义宗联会。

香港的信义宗教会除成立了以上几个大的组织外，另有东南亚信义宗高等教育促进会（所属机构为香港信义宗书院）、信义宗东南亚基督教教育事工委员会、信义宗教会联络处、中华信义宗香港协会、香港信义宗传播委员会（为香港信义宗各教会的联合宣传机构）等。香港信义会的管理部门自1954年成立以来，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如内部管理13,000学员的传教士中以前多为西方人，现在几乎所有的牧师、甚至院长均为华人，可以说“中国化”在香港的信义宗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面对九七回归，香港信义会为促进信义宗教会与内地教会间的互相了解，正进行着各种活动，并准备为1997年在港召开世界信义宗大会奠定基础。“世界信义宗联会”与香港信义宗神学院共同创办了“中国研究中心”，该组织于1994年6月12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计划在未來三年内，致力于促进中国与西方教会间的互相了解，探讨内地教会近百年来的发展和存在形式，并协助香港教会定出1997年以后的正确路向等。

（三）浸信会(Baptist Churches)

浸信会教士在香港传教最早，已有150多年的历史。1842年美国浸信会牧师叔未士从澳门抵港，在皇后大道建立全港第一所基督教礼拜堂——皇后大道浸信会。1843年彝为仁牧师分别在上环、土瓜湾、坪洲及长洲等地开设几间布道所，因他通晓潮州语，集中在潮州人中布道传教。1845年由于美国浸信会内部分裂，美南浸信会主要在广州和上海发展，而香港则成为美北浸信会的“工场”，后因美北差会经济困难，缩减了香港教会的经费，美南浸信会

接管了香港教会的工作，并转向以粤语布道为主。到20世纪初，香港的浸信会开始走向自立，并建立了多处教堂和布道所。到1938年，已成立了香港浸信会、长洲浸信会、香港仔浸信会及油麻地、红磡、九龙城三间布道所，于当年建立了香港浸信会联合会，教徒人数达到1,178名。1939年，联合会向香港政府立案成为法团，但直到1961年才正式以“香港基督教浸信会堂联合会”的名称批准注册，1973年改名为“香港浸信会联合会”。

香港的浸信宗着重浸礼，采用全浸式，象征与主基督同死同活，但不接纳婴儿洗礼，关注内心和属灵上的本性，以祈祷和按手礼来分别为圣，认为浸礼和主餐并不代表救恩的获救。

香港浸信会目前有教会55间，福音堂26所，大部分教徒都参加了香港浸信会联合会，总数超过45,000人；有神学院1所，专科学校1所，中、小学共11所，幼儿园7所，医院1间，诊所2间，还设有其他社会服务机构多种。浸信会每一堂会皆为一独立单位，香港浸信会联合会是各堂会的领导机构，经费主要靠教徒捐献。香港浸信会有以下两个主要组织：

1. 香港浸信会联合会 (The Baptist Convention of Hong Kong)

成立于1938年，是香港各浸信会的联合领导机构。1939年时联合会曾向港府以“香港基督教浸信会联合会”的名称登记为法团，但因时局变迁而未果。直到1961年3月才正式注册，1973年改名为“香港浸信会联合会”。1956年浸联合会创办了“香港浸会学院”(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目前已成为香港著名的综合性大学。1983年浸会学院成为“大学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的资助成员，共设有5个学院、20个学系，包括4个本科院即文学院、商学院、科学院及社会科学院，另有一校外进修学院，1983年9月落成新图书馆，藏书量18.8万册；1990年时的在校生为3,300人，教师有224人，院长为谢

志伟。1991年,联会以“浸会二千”为题,制定“十年规划——堂会增长、会友增长、领袖增长、分区协作、传到地极而进发”的发展目标。该组织与世界浸信会联合会关系密切。现任会长是刘少康,他也是“教会复兴运动委员会”的主席。目前,该组织辖下有1所医院(浸信会医院)、2个诊所、22个幼稚园、6间中学、5间小学,一所大专院校(香港浸会学院);另外,还有多间社会服务中心、托儿所及图书馆。联合会属下的教会及聚会点有126个,教徒人数达4.5万。

联合会的组织采取民主管理的形式,各地方堂会享有行政、经济和人事各方面的自主权;有8名职员,包括1名会长、3名副会长,其最高权力机关为会员大会,各成员教会的主任为会员大会的当然会员,其他为各会员教会所派的会友代表。会员大会每年举行一次,由理事会决定开会的时间,理事会成员即各会员教会的主任及会友代表,任期为三年。联合会的内部设14个部,分别为传道部、海外传道部、神学部、助道部、圣乐部、主日学部、书报部、高等教育部、中等教育部、初等教育部、医务部、福利部、浸会园委员会及传道同工退休委员会,负责布道、文字、神学教育、基督教教育、医疗和福利等工作。香港的浸信教会绝大部分都参加了“浸联会”,因每一个堂会都是独立的,故其经费多从教徒中直接捐献。此外,该组织与“世界浸信会联合会”(Baptist World Alliance)保持了经常的联系,常出席国际宗教会议。

2. 港澳美南浸信差会

这是美南浸信会派出的传教机构,主要通过香港浸信会联合会推动传教,在澳门设有澳门小组,有50多名传教士。

(四)看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The Methodist Church, Hong Kong)

这一组织简称“循道卫理会”,是由香港循道公会(Chinese

Church Hong Kong District) 及香港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 Hong Kong)于 1975年 10月联合而成, 1983年12月正式注册为法人团体。

循道公会在香港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 当时有两名英国循道公会的教徒在英军中传教, 1851年又有一位英国的教士来香港, 后转往中国大陆传教, 建立中国循道宗。 1882年有12位来自广州及佛山的循道会教友在香港开始聚会, 并建立了“循道会香港福音堂”。1884年, 在一位从澳洲退休回港的牧师梁安统的主理下, 正式成立了香港循道公会, 当时名“惠师礼会”, 教徒只有十几位, 直属英国循道公会海外差遣部。发展到 1956年时, 有教徒近 3,500人; 次年, 正式成立了香港教区, 并划分为香港联区和九龙联区, 成为一个自立的教会。

香港卫理公会原属美国联合卫理公会, 是一差会, 实际上是由美以美会、监理会、美普会合并而成, 早在 1847 年就曾到福州、上海及北方等地传教。1949年后香港的大陆移民剧增, 中国卫理公会就在香港用国语传教, 但直到 1953年才在香港正式成立教会, 先后建立北角卫理堂、九龙安素堂等。

以上两教会在 60年代后开始走向联合, 因其历史同出一源, 遂于 1975年正式联合而成循道卫理会, 其组织仍沿用循道卫理宗的体制, 从上至下为总议会—(年议会/教区)—联区—堂区—布道所, 即设立总议会为最高决策机构, 下设文学、宣教、神学、青年等 16个委员会, 由牧师中选出会长, 任期 3年, 连选连任, 但不得连续超过两任, 现任会长是李炳光牧师; 副会长由平信徒担任。总议会内设有 11个委员会, 其中三个是宣教牧养部、学校教育部和社会服务部; 总议会休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执行会务。在总议会下设立香港和九龙联区, 负责各堂区的传教工作。联区只是总议会和堂区之间的桥梁, 本身没有多大的决策权力。堂区教会则

是基层单位，总议会的代表和联区的会议都要由堂区教会推举出代表参加。堂区教会除设堂主任牧师宣教士外，还有平信徒担任义务教士，负责主领崇拜及讲道。另外，各堂会要将每月主要奉献的45%上缴总议会，用来支付总议会成员和行政上的开支，补充有需要的堂会及布道所。布道所则是为教徒人数少的地区设立的聚会场所。

1959年，由循道公会、卫理公会和英语循道公会联合组成了“香港循道卫理宗妇女联会”，并成为世界循道卫理宗妇女协会的会员。该教会是一独立自治的教会，其经费来自教徒的捐赠。

据统计，到1986年循道卫理会有教徒11,402人，礼拜堂12个，布道所5个，聚会点1间，主要分布在香港九龙、新界。教会开办有中小学共13所，幼儿园11所，还有19家各种社会服务机构，设有出版及印刷部，定期出版宗教刊物。该教会已加入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及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同时与国际循道卫理宗教会有密切关系，如英国循道公会、美国联合卫理公会及循道卫理宗华人教会联络中心等，也接受世界循道卫理宗协会的领导。

近年来该教会经常到大陆参观访问，并资助内地教会或捐资助学。1993年10月，“联合卫理公会”主席李炳光率领一个五人的访问团到广东北部访问，后通过“五饼二鱼”活动捐款帮助内地修缮小学及教堂。

(五)香港救世军 (The Salvation Army)

香港救世军又名“救世军香港及台湾军区总部”，直接接受伦敦总部的领导，1916年就到了中国，开展各种救济工作。1930年在香港的九龙太子道成立了第一间中心，1937年成立香港第一个部队。1949年大陆解放后，大批的救世军来到香港，至1951年，在九龙弥敦道建成香港救世军的活动基地，至1960年，香港成为一个

独立的军区，但同时负责香港与台湾的传教及服务工作。1985 年将总部迁到九龙油麻地永星里 11 号 14 层高的大楼内，工作人员有 2,500 名。

目前，香港救世军设有 20 个部队（礼拜堂），用以传教；8 岁至 25 岁的会员有 1.4 万人，参加不同的小组活动；有 1 所中学、4 所小学，共有学生 6,500 人，幼稚园 9 间，可容纳 3,000 名儿童；青少年及社区中心有 10 间，另外还设有多处老人服务机构、3 间诊所、17 间托儿所及育婴院等服务设施。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公益金、社会捐献及会员自筹，每年的经费开支达到 1 亿港元。1993 年 4 月 1 日，香港救世军选出新的总指挥刘文健上校，负责香港和台湾的救世军，以实践行政的地区化。刘文健本人是香港出生的华人，已在香港教会服务七年多，是前任总指挥班维廉上校的继任人，也是 63 年来救世军首位华人总指挥。他作为救世军新的总负责人，现主理超过 100 多家的服务机构。在他上任不久，就公布了一项重新发展计划，以确保 1997 年后救世军的财政收入。

从组织上讲，救世军的总部设在英国伦敦，各地救世军的负责人要由伦敦的总部任命；其内部一般的信徒称为“军兵”，教会的执事称作“部队干事”，神学生称为“学员”，全职的传道员即为军官。作为一个独立的军区，香港的救世军受伦敦国际总部的委派负责香港和台湾的教会工作，同时与世界各地的救世军组织保持联系。

（六）香港五旬节圣洁会（Hong Kong Pentecostal Holiness Church）

香港第一间五旬节圣洁会是由田·安娜（M. Anna Dean）女士建立的，她于 1909 年到港，先在铜锣湾传教，后迁到筲箕湾，在渔民中间传教。1957 年五旬节圣洁会香港区会正式成立，到 1976 年该教会选出华人为执行委员会，下设港九五旬节传道会、基督教华

人五旬节堂、世界五旬节会、国际四方福音会、基督教华人神召会、神召会华南区议会及神召会港澳区议会等。该派相信由恩典得救和圣灵施洗，并相信神医和耶稣基督再临，但崇拜仪式各不相同。

目前，该派在港有教徒约 4,000 人，教堂 17 间，有 2 所小学、1 所中学及 2 所幼稚园，还设有为盲人开设的 1 所教堂和服务中心。教会属下的学校除香港区议会开办的雅歌幼稚园外，均命名为“永光”，另有两幢商业大厦，其收入归教会。该教会的经费来自属下两个商业大厦的收入，并计划自置地产和产业，现任代表是祁坚信 (Herman Princeton Cates)。

(七)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Seventh-Day Adventists)

1888 年，由美国传教士阿伯兰·拉路 (Abram Larue) 将该派教义传入香港。以后，又有许多传教士经港到大陆传播此派教义。其信徒以《圣经》为最高信仰及行为准则，相信二位一体，施浸礼、圣餐礼和婴孩奉献礼。

香港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设有港澳区会办事处，位于九龙尖沙咀山林道 26 号，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 389 个区会中的一个，其下设有 20 个地方教会，开办有大专、中、小学及幼稚园，还设有 2 间老人院，青少年中心及老人中心各 1 间，医院 2 间、诊所 1 个。各地方教会每年召开一次年议会，港澳区会则三年开一次代表大会，并与世界其它分会保持密切的联系。目前，香港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超过了 3,500 人，香港区会由杨健生负责，他曾担任安息日会全球总会的副行政秘书。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组织分地方堂会、区会和全球总会。全球总会是全世界安息日会的管理总部，会址设在华盛顿，其下有 10 个分会：非洲印度洋分会、东非分会、欧非分会、远东分会、中美分会、北美分会、南美分会、南太平洋分会、南亚分会、泛欧分会。而

港澳区会则隶属于“华南海岛联合会”，“华南海岛联合会”则是在远东分会的辖治之下。香港的地方教会每年召开一次年议会，而港澳区会则每三年开一次代表大会，任何决策均须经区会、联会向全球的总会报告，所以，香港的安息日会与世界其它地方的安息日会教会联系极为密切。

(八) 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

该教会又称“摩门教”，1949年高立马太长老来港传教，于当年7月正式创立教会，成立传道部，并在太平山顶举行奉献仪式，演变成今天的山顶崇拜。1955年，香港的教会纳入该教派南远东传道部的范围，并分成尖沙咀及深水埗 2 个分会，还购置了九龙塘歌和老街 2 号作为传道部的办事处。

到1988年，摩门教在香港发展成 25 个支分会，教徒 1.4 万人。在组织上，该教会分为两部分，一是传道部，有 150 名专职传教士，负责义务传教，为时 1 年半至 2 年，这些传教士有一半来自海外；二是支联会(包括支联会及分会)，香港有 4 个支联会，即新界、九龙、北九龙和港岛，每个支联会下有 6 或 7 个支会，各支联会均设会长 1 名和副会长 2 名，支会设立主教和副主教，所有的神职人员都是义务工作者，教会的经费主要来自教徒的奉献。该教派除信奉《圣经》外，还有自己的经典——《摩门经》，另外还有两部经典，即《教义和圣约》及《无价珍珠》。香港的教会各支会每年举行两次教友大会，一次山顶崇拜，以“纪念奉献香港成为传教地区”。该教会在港的最高代表是伍吉庆，由亚洲区域会长团和总会委派。教会的经费主要来自信徒的捐献，传教士均自费外出传教，妇女可授予圣职，担任传教士，也可组成妇女会。该教会位于香港中环卫城道七号。

(九) 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该会的前身是“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第六区会”。1918年本色化的神学思想影响到中国的教会发展，由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长老会、公理会和伦敦会的代表筹划组建中国教会的联合组织，并拟定一合一的计划书。不久即有美国、加拿大及英国的长老宗、归正宗差会等 17 个外国教会合并成立一个组织，1922 年在上海还召开了临时总议会。1938 年日军空袭广州时，广东协会迁到香港，许多内地的教徒也来到了香港。大陆解放后，内地许多教徒来港。1950 年成立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成为一独立的教会，其成员包括原第六区会在香港、九龙、新界及澳门的堂会、学校及机构，分为区会和堂会两级，但各堂会则相对独立。早在 40 年代末，香港的教会就开始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如建儿童院、福利院等。

1955 年“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靠外国传教士的支持在港设立会所，1958 年正式注册为法团，1960 年在今太子道马礼逊纪念会所自建会址，从 1960 年到 1965 年发动捐款运动，以增建教会学校，1966 年开始走向自养。到 1974 年时已完全自养，并增建 5 间中学，成立教会服务企业，并修订了宪章，1977 年加入了伦敦会改组的世界传道会，到 1980 年时自称为“自治、自养、自传”的自立教会，并成为普世教会协会、亚洲基督教协会、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及世界传道会的成员。

“香港区会”的内部架构设有：代表大会，其下为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由各学校校长、堂会的代表出席，主要听取过去一年的工作报告，并通过来年的预算。实际决策权在执行委员会，其成员由该会任职牧师、宣教师、各堂会、教育、医药、传道及专业机构所选出的代表组织而成，设正副主席、书记、司库、核数等

职，每年选举一次，主席一职不得超过三任。另外，内部还设有总干事及干事若干，三个部(教务行政、社会教育和事工程序)、三个委员会(学校牧养、神学、直属中小学管理)。该组织主张合一、民主，强调自立和男女平等。故各堂会均有高度的自主权，区会只扮演了联络与统筹的角色，并给堂会一些方向性的指导，各堂会的财产归自己所有。鉴于中华基督教会是一合一的教会，故中请任牧师的人不分其宗派，也不强制其转变会籍。此外，该教会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组有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其教徒就读此神学院，该会完全资助。据 1986 年的统计，该教会有 32 个堂会、华人牧师 40 名，教徒总数 25,500 多人，办有各类学校 64 间，3 间幼稚园，就读的学生超过 54,000 人，教师约 2,700 多人。至 1993 年，该组织所属机构有 6 家，堂会 41 家。书院有 9 所，幼儿园 17 所，中小学与夜中学共 44 家，另有一些社会福利机构。该会的会址设在香港九龙太子道 191 号马礼逊纪念会所。

因中华基督教会是一联合性的组织，其中有些教派如北美浸信会早有按立女牧师的传统，目前该教会内共有 5 名女牧师，著名的有李清词牧师，她还担任了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的副总干事。

(十)基督教宣道会

该会于 1887 年由加拿大人宣信在美国创立，是美国及加拿大的一些传教士组成的联合差会机构，向全世界传教，总部设在美国。

1887 年，宣道会由美国牧师宣信(Albert Benjamin Simpson)创立。次年便差遣了第一位宣教士前往中国大陆，先后到广西、湖南、西藏、蒙古、贵州、四川等地传教，并于 1898 年创立广西梧州圣经学院(即香港建道神学院的前身)。1945 年宣道会始在香港传教，大陆解放后，其宣教士也大多来到香港，使该教会在港的力量

猛增。

宣道会以传教为主要任务，虽然在香港的历史只有40多年，但所属堂会已发展到67家。宣道会目前在香港共有教徒11,000多人，另有神学院、出版社、海外布道会、宣道园、学校及其他社会服务机构等。1984年，该组织发动十年植堂计划，大力兴建教堂，1988年再次发动新的全面十年计划，注重教徒的培训、差传等。此计划的目标是在1997年底，堂会的数目增至120家，教徒增加到3万。宣道会的宣教人员要求至少是神学学士，但不分宗派，也不需要加入宣道会会籍。香港建道神学院的毕业生加入宣道会的很多，与该会联系密切。另外，宣道会有一半堂会是借用政府的房屋作基址的，既作教会，也作社会服务，如办老人中心、幼儿中心等。堂会的牧师除负责堂会的教务外，还要兼顾社区中心的行政工作。

宣道会在香港的组织机构有宣道会香港区联会、宣道会广播中心、宣道会西差会中国办事处，简要介绍如下：

1. 宣道会香港区联会

属下在港有35所教堂，小学2所及1所幼稚园，办有建道神学院。联会下属机构有宣道出版社、宣道书屋、宣道书局门市部、中华宣道会海外布道会，宣道会广播中心及宣道会中国办事处也参加了“区联会”。该组织的主席为滕近辉牧师，会址位于香港英皇道310号4楼。

宣道会香港区联会的组织机构可分为堂会与区联会两级，区联会的会员分为堂会会员、机构会员和联属会员三种，由各堂会派代表参加，专职的传教人员为当然代表。区联会设有执行委员会，由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各堂会的堂主任、机构主管及信徒代表参加，设主席和副主席、7位委员。执行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商讨会务，其下还设立一些功能性的小组，如教育培训、差传、传道、联络关顾、植堂等。区联会属下的产业权归区联会所有，

堂会若需购置或处理其房地产必须先得到区联会的批准。各堂会还要按规定向区联会上缴年费，并出席区联会的会议和一年一度的退修议事会。但每个堂会在行政上是独立的，区联会并非中央权力的核心，只是在属灵上起领导作用。区联会每年召集各堂会筹办分区布道会、布道训练、差传大会等。

2. 中华宣道会海外布道会

这是香港宣道会专设的向香港北外地区传教的机构，其主席由滕近辉牧师兼任。

3. 宣道会广播中心

此机构为宣道会美国总会广播部的下属组织，负责制作中文宗教性的广播节目，提供给“环球”广播电台播放。

(十一) 基督教圣约教会

香港基督教圣约教会源于“挪威圣约教会”(Det Norske Misjonsforbund)，其名称的原意为“挪威宣教联合教会”，成立于1884年。1889年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现名(海外基督使团)创办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到达挪威，主办机构借用圣约教会在奥斯陆的伯利恒堂举行聚会，讲到了中国教会的发展情况，引起圣约教会的极大兴趣，遂决定派传教士到中国。1900年首批圣约教会的传教士到达陕西。大陆解放后，一部分圣约教会的传教士转到香港，开始在香港建立教会。1953年该教会在中国传教多年的司务道教士(Sister Annie Skau Bernysen)在香港调景岭区传教，先后长达20多年，直到退休。其间，教会的主要工作集中于调景岭难民营、将军澳及清水湾一带，还与其他基督教团体合作创办了“将军澳医援会”(后改名为“基督教灵实协会”)，并兴办了各类社会服务设施。1969年，圣约教会在观塘开办了第一所学校——坚乐牧师纪念中学，1971年在校内成立了该组织的第一家

教会——坚乐堂，后来陆续开办了幼稚园、幼儿园、老人中心等。

目前，圣约教会在香港共有 9 家堂会、4 家教育及福利工作机构，参与崇拜的人数约有 790 人。实质上，该教会为一联会组织，其宗旨为“在信仰合一的基础上，促进各堂的合作及团结、联合各堂，同心传扬福音”。这样联会就负有监督、管理、协助各堂会及成员工作的责任。堂主任为堂会的领导者，但要服从会友大会及执事会的指引，执事会主席与堂主任共同商议会议的议程，教士还要参与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以便协调教会与服务单位之间各方面的合作。

(十二) 东方基督教会香港区联会

大约在 80 年前，美国差会在中国广州附近的水域传教，以数艘福音船为基地，向水上人传教，建立“华南水上教会差会”。到解放时，这些福音船被拖到香港。后因人口的剧增和居住形式的改变，教会迁到陆地上。20 多年前，华南水上教会差会与国际传道会合并，采用国际传道会为差会的名称；而同期，差会属下的各个独立堂会自发组成了东方基督教会香港区联会。联会的成立只是在各堂会之间起到联谊的作用，与各堂会并无实质上的从属关系。各堂会在行政、人事、财务等方面均能独立运作。

目前，东方基督教会香港区联会有堂会 7 家，另有 4 家已退出联会，但仍沿用“东方基督教会”的名称。联会由各堂会派代表组成，会员堂的堂主任为当然代表，再按堂会人数定出 3 到 6 人为代表组成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负责联会的工作，全部职位须经选举产生，而联会主席要求必须是堂主任。现任联会主席是何伟权牧师。另外，差会设立一笔基金，交与联会管理，其利息即为联会的主要经费来源。而每个会员堂每月须缴纳 100 元港币的会费。若遇特别需要，联会再向堂会及信徒征

集。同时，在经济上联会也会支持个别堂会的发展，如堂会建堂需资金时，联会会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协助堂会购买新堂。各个堂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会员大会，另设执事会负责各项教务，执事会的主席可由堂主任或教徒担任。

(十三)基督教神召会

神召会原是基督教五旬节派教会的一个分支，在香港成为一独立教派。目前，神召会在港有以下组织：

1. 神召会华南区议会

属下有13所教堂和布道所，还办有一所神召会圣经学院、一间国际函授学校，另外，开办有6所小学，幼儿园、诊所各1间。其中“国际函授学校”是一传教机构，将大陆作为其传教的主要地区，散发宗教宣传品，如《我们的信仰》、《你的新生命》等，也举办宗教函授课程。

2. 神召会港澳区议会

办有礼拜堂和学校各2所。

3. 基督教华人神召会

下设耶稣圣心小学及幼稚园。

4. 东南亚神召会港澳区议会

有14所教堂和布道所，还办有7所中、小学及幼稚园。

5. 美国神召会驻香港办事处

对外称“晨星教育基金会”，下设文字设计、栽培讲道、财务、“励青协会”等机构，主要从事传教活动。

(十四)香港圣经公会(**The Bible Society in Hong Kong**)

这个教会实际上是“世界联合圣经公会”设在香港的分支机构。“世界联合圣经公会”成立于1946年。据1986年的统计表明，

它使用了 544 种不同的语言翻译圣经，并向世界各地发行，拥有 70 个公会会员，在 32 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其工作范围遍及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香港的圣经公会创立于 1950 年，最初附属于英国圣经公会，经费也来自英国；后来改由“联合圣经公会”支持，并设有咨询委员会，辅助联合圣经公会的工作，还要受“亚洲太平洋区的圣经公会”之节制与督导。直到 1984 年才成为经济上“自养”的团体。1982 年，该教会向港府登记注册为独立的法团，并由 12 名中西籍教牧人员组成董事会，首任主席是赫健士。黄永熙曾担任香港圣经公会的总干事。

目前，圣经公会在香港的机构有两个，一是“香港圣经公会”，一是“联合圣经公会亚太总部”，主要从事圣经的印刷与发行，为亚洲、非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国家的圣经公会组织代印各该国和地区的方言圣经及有关的单行本，还为远东广播公司及环球广播电台提供向大陆传教的福音节目。

三、主要教堂

香港基督教新教教堂目前大约有 900 多间，因资料有限仅介绍以下 20 间。

1. 圣约翰大教堂

该堂又俗称“大教堂”，于 1847 年奠基，1849 年建成，是香港最早建立的基督教教堂，也是圣公会港澳教区的主堂。位于中环地铁站，可沿花园道前往。

2. 圣士提凡堂 (St. Stephen's Church)

建于 1865 年，是圣公会港澳教区第一间华人教堂。该堂曾先后两次易址，原址在荷李活大道，曾因修路于 1888 年搬到了薄扶

林道，后又因教徒增长及教堂的毁坏而决定搬往现新址。1959年开始募捐，到1965年6月落成新教堂。作为香港第一间华人教会，除传教布道外，还兴办教育，如于1950年创办一幼稚园，第二年增设一小学，1968年又开办了一间中学。另外，还组织了十余种团体，并经常举办退修会、福音布道会、研经班、聚餐会等。在80年代，该堂的守餐教徒为300人。

3. 宣道会北角堂 (North Point Alliance Church)

位于香港英皇道310号4楼，创立于1952年10月。原来堂的聚会场所较小，后改建，如今占地8,000平方呎，是香港宣道会最大的教堂，守餐的教徒约1,500名。从1961年开始，该教堂先后设立了7间分堂，分布在港九各区；1972年与九龙塘宣道会联合组成“中华宣道会海外布道会”，重视海外传教，到80年代初派往海外的宣教士有16人。此堂因教徒较多，主日聚会分早、中、晚三次举行，主日学的教职员逾90人，学生约500人。另外，还组织有17个团契，其中13个是青少年的组织。主任牧师：滕近辉。

4. 香港浸信教会 (Hong Kong Baptist Church)

这间教会的历史始于1842年，当时美南浸信会派往香港的第一对宣教士叔未士夫妇先在上环创立宏艺书塾，后在皇后大道建浸信会。以后，教务由广州牧师仕文协助办理，会址数度迁移，1901年建新堂，命名“香港浸信自理会”。到1912年教徒增加到300多人，并购荷李活道50号，开设香港仔、石岐、筲箕湾等基址立分堂，还推动成立香港浸信会联合会。除在本港发展分堂外，1964年还在马六甲开基，鼓励教徒到海外传教。该教会所开办的教育事业有显理中学，组织有各类的团体。守餐信徒有2,000人，主任牧师：刘少康。

5. 兴华浸信会

这是香港第一间华人自立教会，成立于1903年12月19日。

当时因受本色化神学的影响，一批华人基督教徒认为在中国传福音，华人自己应负起自给自足、自养自传的责任，于是就建立了这间华人教会，会址设在广州潮音街。

1950年后，教徒纷纷迁港，初时只有不定期的聚会，后租用房舍做教堂，在1962年11月20日正式成立教会。1966年7月终于设立新堂，1968年加入“香港华人基督教联合会”。

6. 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香港堂

该堂位于香港般含道2号，已有130多年的历史。1862年华人教会团体成立，于1879年靠募捐购得上环一楼为礼拜堂，由礼贤会的王煜初任主任牧师。1886年女教徒高三桂夫人将其在荷李活道的私产捐出，供建教堂及医院，即为华人自理道济会堂及雅丽氏医院。1910年教堂改长老制为堂议会制，1921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会，由华人自理会改为中华基督教会道济会堂。1926年开始建新堂，改称合一堂。日本占领香港时教会遭到破坏，光复后得以迅速恢复。1950年时在九龙开办分堂及学校工作。1963年起由翁钰光任主任牧师，不久，在北角又开设新堂。该堂的守餐教徒有2,400多人，另外开办有一所幼稚园。

7. 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

该堂始于1883年，当时是由美国美部会牧师喜嘉理开设汉文学校，并传教，逐渐形成一聚会所。1901年在楼梯街建立教堂，名“美华公理会堂”。1912年改称“中华公理会堂”。1919年因广东基督教五大宗派教会联合成立为“中华基督教会”，该教会即是五宗派之一，遂更为现名，但仍保留“公理堂”三字，英文名也仍用 **The China Congregational Church**。另外，在该教堂的三楼还办有公理女校，一所幼稚园。1950年因教务的不断壮大，堂址迁往礼顿道，而原堂重建成一分堂。

8. 中国基督教播道会天泉堂

该堂原属播道会广州小港堂，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一些教徒逃往香港，便在九龙的太子道开设了支堂，定名为“太子堂”。初时教堂的主要工作是在华侨中间传教，并扶危救灾。1950年，教堂实行自养。1952年又购得新堂址，改名为“天泉堂”。

9. 信义会真理堂

1950年元旦，信义会牧师彭福借九龙加连威老道 33 号信义宗社会服务部举行第一次主日崇拜，当时教徒仅有 8 人。后来主要在从大陆来港定居者中间传教，并于 1962 年 2 月在窝打老道建成一所新教堂，名“真理堂”。主持本堂的牧师先后有彭福、吴明节、胡雅各，此堂也是信义会各堂中最早实行自立自养的教会。

10. 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堂

该堂简称“循道卫理会香港堂”，始于 1884 年。原由大陆来港的几位教徒及家属借用威灵顿街的一所私塾聚会，名为“惠师礼会”，还请从澳洲来港的梁安统牧师任义务牧师。1930 年大力推行“归主加倍信徒运动”，教会发展较快。1934 年在湾仔轩尼诗道购得新址教堂，1936 年落成。该教堂外观具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红墙绿瓦，庄严而美丽，在当时的香港被称为最宏大的礼拜堂。参加主日礼拜的平均人数达 1,100 人，教堂组织各种的团契，活动丰富，主任牧师为李炳光。

11. 五旬节堂

该堂创立于 1907 年，创办人为嘉活力牧师，他是美国人，在港传教以“圣灵施洗”的布道来吸引信徒，不久，就有 30 多名教徒。这即是五旬节会的雏形。原来该堂只是借用或租用房屋作聚会所。到 1928 年一教徒奉献九龙的楼宇，遂成为五旬节支堂。1937 年又建成卫城道五旬节堂及窝打老道五旬节支堂，以后不断扩建，成为现在的模式。除主日礼拜及周三晚和周五晚的固定礼拜外，每年要举行 4 次灵修大会，注重教徒的灵修生活。

12. 礼贤会香港堂

香港的礼贤会最初是在 1847 年由德国传入的, 1858 年在西营盘第二街购得楼房一座, 作为牧师的住所兼传教所, 但后来售出给港府用作国家医院的院址。1901 年在香港般含道再购一处房屋作礼拜之用, 此教会也正式成立。1912 年经港府在般含道再廉价拨出一地段, 至 1914 年 7 月才建成今天的教堂。自本教堂建成后, 一切会务由华人自理, 王爱棠牧师为首任主任牧师。1961 年对该堂进行扩建, 到 1979 年时才完成; 守餐的教徒约有 2,300 人, 是礼贤会规模最大的一间教堂。

13. 香港潮人生命堂

此教堂创始于 1909 年, 座落于香港中环些利街 20 号。当时因潮州人教徒在港经商的较多, 但教徒聚会没有场所。于是, 在英籍传教医生怀敦干的促使下, 借“香港青年会”组织晚堂崇拜, 此为香港潮人教会之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因教徒纷纷外迁, 教务一度停顿, 直到 1923 年才得以恢复, 教会也搬到大道中 35 号商务印书馆 4 楼。1929 年至 1947 年 12 月, 形成香港、尖沙咀、九龙城三堂分立。1950 年本堂自置堂址, 设在现在的中环些利街, 1966 年 2 月开始动土, 1967 年 8 月建成新堂, 次年被港府批准为法定会堂。该堂的守餐教徒约 1,800 多人。

14. 香港崇真会筲箕湾崇真堂

该堂源于瑞士的巴色差会, 原址位于港岛东端鲤鱼门炮台山山下, 建于 1862 年, 是本港设立的最早的教堂之一。1933 年曾重修。因教堂靠近军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教堂被毁, 教徒也纷纷出逃。直到 1946 年才开始重修, 1949 年恢复办学, 1952 年设一所幼稚园, 1958 年又开办中学及小学。从 1950 年起, 汤兆奇任该堂的主任牧师, 历时 30 多年; 拥有教徒 1,200 人。80 年代中期, 又进行了扩建, 座位增加到 1,000。

15. 神召会礼拜堂

最初神召会在上海街尾用帐幕方式布道，后因信徒增多，才迁往弥敦道 698 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传教士被囚于集中营，传道人也相继离港，教务由教徒自行坚持。1946 年，信徒增加到约千人，于是筹划在亚皆老街建立新堂。1955 年 3 月新堂落成，以后又陆续建立了 3 所分堂及 1 所幼稚园。1974 年又设立恩慈书室，借文字布道，并注意向海外传教。目前，该堂的守餐教徒约有 1,250 人。

16. 中华传道会红磡基督教会

该教会建于 1951 年 11 月，当时是在马头围道 13 号的一片空地上建了一所木屋暂做聚会所。后经历三次搬迁，从木屋到租房，再由租房到自建教堂，并经常在红磡地区举办大型露天布道会，吸引不少群众。现在的教堂位于九龙土瓜湾道 237 号益丰大厦的三楼，守餐的信徒约 1,100 多人，是传道会的一所较大教会。

17. 香港灵粮堂

该教堂的全称为“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香港灵粮堂”，位于香港跑马地礼顿里 6 号，创办人是赵世光牧师。1949 年大陆解放后，赵将在上海的灵粮堂组织迁到香港，1950 年 1 月 1 日在香港中区的娱乐戏院里每逢主日的上午开始聚会，随着教徒的增多，陆续开设分区聚会。1959 年 5 月 31 日在跑马地礼顿道建成新堂。以后，又开办了灵粮幼稚园、九龙灵粮小学、英文夜中学、英专夜校等，还经常举办大型的布道会及聚会。

18. 中华圣洁会

该教会始于 1930 年，创办人为吴仲连牧师伉俪。他们最初在深水埗街头布道，吸引人们入教，后成为一自立教会，先租用荔枝角道一所车房作聚会所，50 年代初时才集资建新教堂，并开办一所名“中圣书院”的英文中学，1957 年同时启用。此教堂还派传教士到海外传教，如从 1977 年开始就派人到韩国推广福音广播工作。

19. 中国基督徒会堂

创立于 1903 年,自称“为华人的自立自养自传之三自教会”。初时教会的聚会所不定,到 1926 年时教会稍具规模,并正式加入“香港华人基督教联合会”。1930 年在旺角登打士街一号建立教堂,抗日战争时教务停顿,战后迅速恢复。1948 年注册为有限公司,成为一合法团体。1968 年在何文田石鼓街再建新堂,1972 年 7 月落成,曹恩保为本堂的主任牧师,并为独立的教会。1981 年王靖南牧师继任主任牧师,还开办一所幼稚园。

20. 香港基督徒福音广播团基培堂

1946 年 4 月,数位牧师及传道人组成“香港基督徒福音广播团”到乡村里传教。1972 年,在三门仔的一间石房里建立“广播团”的第一间教堂,1976 年 9 月又在大埔墟建成第二间基培堂,并开办了幼稚园、基培夜校。位于新界大埔墟广福道的教堂可容纳 1,500 多人。基培堂不属于任何宗派,是一地方教会,治会组织实行执事制。1990 年春加入“香港华人基督教联合会”,成为“联合会”第 257 间会员堂。

四、主要组织和机构

1.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

该会成立于 1954 年,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区域性机构,也是香港基督教各主要教派及堂会的联合组织,以宗派教会为组成单位,现有 11 个宗派会员、7 个独立基督教机构参加,也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区域性机构。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第 39 届大会已于 1993 年 9 月 24 日召开,选举出新一届(1993—1995 年度)委员及执行委员职员。主席由基督教香港崇真会会长薛磐基担任,第一副主席是李清词牧师,第二副主席是郁德芬女士,总干事为曹敏敬。协进会

的会员教会及机构代表有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基督教香港信义会、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救世军、圣公会、基督教香港崇真会、英语循道会、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香港圣经公会、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等十余个组织。协进会内部设有代表大会、总办事处、执行委员会。辅助机构有基督教服务处、基督教联合医务协会、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事工委员会包括财务、人事、合一、宣教事工、青年事工、社会关注、《信息》编辑、五饼二鱼、传播部十个分支机构。协进会的宗旨是联络、协调香港各基督教会的活动，出版和交流思想，关怀社会问题，参与各项社会政治事务和服务工作，致力于促进香港各教会之间及其与海外、中国内地教会之间的联系，如住房、教育、青年及劳动等。1980年该组织召开“80年代教会使命”的咨询会议提出向低薪市民心态等教会参与社会的新方向，积极关心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1986年面对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订，又举行“80年代中期的咨询会议”，提出面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挑战，“香港教会作为香港有潜在影响力的一群，应责无旁贷与市民一起挣扎”，并鼓励教会积极投入港英政府部署的政制改革，其中妈智活牧师参选进入了立法局。

另外，该会还开办各种服务中心24个，有雇员400多人，办有传播中心，通过电台向香港地区传教。出版《信息》，从1981年6月还开始出版《香港基督教协进会通讯》及《消息与观点》(News And Views)。“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是该会属下的社会服务机构，有40多年的历史，其前身包括世界信义宗服务处、普世教会移民服务组、香港世界教会服务委员会及香港基督教服务委员会等。在50年代该处侧重于救济难民，60年代才开始开展多种专业性服务，1976年由“世界信义宗难民救济处香港分处”和“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服务事工部”合并正式设立“香港基督教服务处”，下设婴儿服

务、幼儿园、特殊教育、青少年中心、老人服务、移民服务、学校社工服务、职业训练、延续教育、寄养服务、中途戒毒中心、家庭助理服务、社区发展服务、健康服务、辅导及家庭生活教育等14个社会服务部门。到80年代该机构已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服务机构,如开展老人、寄养、青少年中心等项服务,还开办家长及婴儿训练计划、医疗服务、社区发展服务、移民服务等等。另外,“协进会”下属的“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在香港社会中也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它成立于1967年,自专为工人提供福音、教育、辅导及争取合理权益的服务,近年来在香港工人中间影响日益增强,如关注“劳工法例”的制定及工业安全问题等。目前,该组织辖下的幼稚园146所、小学141所、中学122所、专上院校3间、医院7家、诊疗所24个、社会服务性的中心共176个、安老院20所等。

香港基协为了加强与内地的联系,于1979年11月26日成立一个“与中国教会关系委员会”,其宗旨是与内地各省市的基督教组织发展关系,推进对话,实现分享。该会曾邀请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丁光训主教和沈以藩主教到港主讲“中国教会情况分享会”,还组织青年教徒到内地访问,促进了内地和香港教会双方的交流。最近,协进会通过“尼希米工程”,在香港和世界其他地区为内地山区的穷困教会修建残破的教堂筹募经费,首间受资助的教堂是广东东北部翁源县的龙仙镇教会。另据悉,香港“基协”通过“五饼二鱼”计划已于数年前开始帮助内地农村发展,如修建水塘、水利设施及挖井等。1991年华东大水灾时,发动捐献赈灾款达160万港币。

2. 香港华人基督教联合会

此为香港基督教各教堂、会的一个联合组织,成立于1915年,以“联络本港华人基督教会,办理教会之共同事业,增进教友之互助精神”为宗旨。

该组织以各会员堂为基础,宣扬各堂会自理,既包括主流派教

会，也包括福音派。参加的堂会应具备以下条件，即堂会必须有自己的礼拜堂、必须有一个按立的牧师、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教徒、必须有健全的堂会组织。1941年时由该会负责出版《香港基督教会史》一书，详细论述了香港各教派及各堂会的历史、各教会的文化事业、慈善事业、社会事业及教会人士的传记等，当时统计加入该会的会员堂共计34间，教徒18,000人。至1983年，该组织又出版《会员堂会务概况》，其会员堂已多达228间。目前共有240多个属会组成，会堂达832间，分布于港九、新界及离岛各区，信徒逾十余万，是华人基督教会中最大的组织。该会仅是一代表机构，无实权，不能干涉各会员堂的事务，各会员堂将收入的2%上缴联合会。下设传道、教育、慈善、出版、调查等部，负责传教、教育、慈善、坟场管理等工作，注重实践宗教使命，传扬福音，造就信徒，服务社会。各个属下的教会都兴办有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如开办学校、医院、社会服务中心等。另外，出版机关报《基督教周报》（1946年创办），主席：梁林开。

3. 香港中华传道会

“中华传道会”是美国基督教的一个国际差会组织，总部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在亚洲、非洲及南美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有24个办事机构，以救助难民等方式进行传教及培训传道人。在香港设有东亚教区，负责管理香港、澳门及台湾等地的传教工作，并设有联络办事处。

“香港中华传道会”成立于1960年，附属有出版部、教育部、慈善福利部、青年部及妇女部等，有教堂14所，中、小学及幼稚园5所，开办有香港神学院、香港培灵学院，还有2个医疗设施，并办有“分享”书屋，出版《分享》月刊。

4.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YMCA）

1901年在港创立，是“世界青年会运动”的一部分。“青年会”

于1844年6月6日产生于英国,由乔治·威廉(George William)倡议创立,其宗旨是“事忠基督,敦品立行,本立己立人的宗旨,服务人群,改进社会”。当年“青年会”聚会是以查经、祈祷、演讲、布道等灵修活动为主,后逐渐在欧美发展。1855年还在巴黎召开了全球青年会的大会。1885年,“青年会”在中国的福州及北京成立。1899年美国纽约的青年会派苏咸(Rev. Walter J. Southam)来港筹组青年会,后又派路义思(R. E. Lewis)驻港,先后在西医书院、拔粹书院、皇仁书院、圣保罗书院开设青年会的组织。1901年还租屋作会所,1910年第一次招收会员,以信徒个人组合为基础。1912年筹建会馆,附设的学生宿舍、办事处、礼堂、餐厅、泳池、运动馆等也相继建成,1918年“香港青年会”会馆建成香港华人社区最完善的活动场馆。之后,青年会的工作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各方面。抗日战争时曾积极举办各种救国活动,香港光复后,青年会恢复活动。1949年以后,随着大陆移民的大量增加,青年会的工作也逐步社会化。如50年代在李郑屋村、石硤尾、黄大仙开办了天台服务中心;60年代又购置地产,在黄大仙开设社区服务会所;70年代开办青年中心及青年营;80年代在湾仔落成湾景国际宾馆。据《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983/1984年报》报导,“青年会”下有26个工区,其中包括中学、夜中学、幼稚园、社区中心、青年体育训练场馆、营舍等,服务的项目有学校社工、升学就业辅导、延续教育、职业及技能训练、旅舍服务、体康技能训练等等。目前,分布在港九新界的服务中心不下40处之多。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可以说是香港教会信徒的联合组织,它的历史比“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还早15年,在“联会”创立之前,由“青年会”担当香港基督教各教会的联络、联合工作,并在青年会的筹划下才有了“联会”。另一方面,该组织与国际基督教的机构保持密切关系,1962年加入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并在香港

常举办国际或洲际的宗教活动。目前，“青年会”的会员有 5.3 万多，其中 80% 以上是 25 岁以下的青年人，办有中学、幼稚园及其他社会服务机构，成为一综合性的社会团体，在香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5.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YWCA)

成立于 1920 年，主要以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来吸引会员，如开办文化、体育及职业训练等，非基督徒也可以参加。目前，该组织已开办 55 个工作单位，分布在港九、新界及离岛，会员达 19,000 多名，服务对象遍布社会的各阶层，每年服务人数超过 130,000 人。该组织的总干事是高若华。

6. 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

其前身是灵粮堂教会，1942 年由赵世光在美国宣道会差会的资助下成立于上海，1946 年改为现名。目前，该会在港有 12 所教堂，小学和幼稚园 3 所。此外，该组织在印尼设有 14 间教会，另在印度加尔各答、台湾的台北、美国的纽约、洛杉矶、加拿大和菲律宾各设 1 所分支教会。

7. 亚洲归主协会

成立于本世纪 70 年代初，旨在对亚洲各国传教，与美国国际福音中心有密切联系。香港分会于 1981 年 3 月成立，其经费主要靠西方教会提供。该会通过电台和电视传教，办有“真理函授课程”、儿童部、门徒训练部、中国圣经出版社、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广播部等部门，出版《亚洲报导》月刊。该组织曾制作宗教广播节目供远东广播公司和环球广播电台向大陆广播，散发大量的宗教宣传品。
总干事：王一平。

8.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1978 年 8 月成立，名“中国教会与文化研究中心”，原属于“中国神学研究院”的一个研究部门，出版《中国与教会》（双月刊，创刊

于 1978 年 11 月)和《莫忘神州》(中英文月刊, 1978年12 月创刊), 1979年 1 月又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国与教会》, 另外办有英文版的《中国新闻和教会报道》周刊 (China News and Church Report, 1983 年 4 月创刊)。1980 年以后, 该中心成为一独立机构。自称不但“研究中国教会的历史和概况”, 而且“研究中国大陆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 不过主要侧重于中国大陆的宗教与社会、宗教政策及教会的有关情况, 并通过电台办起了“空中神学”广播节目, 训练传道人到中国内地传教, 其经费主要靠西方的资助。该中心建有一个“中国教会研究图书馆”, 专门收集与中国内地有关的史料、中国当代的书籍、期刊、文件及幻灯片等, 还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宗教的书籍, 如《中共对基督教的政策》等。另外, 在台湾设立了“研究出版部”, 出版一些有关内地教会的书籍。此机构的负责人是赵天恩 (Rev. Jonathan Chao), 他曾获得美东 (Westminster) 神学院道学硕士、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博士学位。1994 年该组织在香港以“中国福音会”的名称重新登记, 同时《中国与教会》在 3 月出版 100 期后于 7 月更名为《中国与福音》。据称, “中国福音会”在今后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推行赵天恩称之为“三化”的计划, 即“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 并侧重于“研究→培训→差派”三个方面, “为中国训练工人, 出版适合中国的基督教的书籍, 要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播福音”等。

9. 中国神学研究院

1975 年由“基督教东南亚神学教育促进会”成立, 旨在为港澳和东南亚各地华人基督教会培养高级传教人员, 同时也研究中国内地教会的情况。该组织与“中华传道会美国总会”关系密切, 其经费主要来自美国。该院院长是滕近辉。

10. 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

1950年成立，得到世界基督教信义会的支持，有香港基督教和天主教方面的人员参加，主要研究中国内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情况，下设教育、卫生、广播等组织，出版《景风》（季刊）。主任：李景雄。

11. 中华信义宗香港协会 (The Lutheran Church Hong Kong Association)

1950年成立，这是香港信义宗各教会包括香港路德会、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基督教香港崇真会、中华基督教礼贤会香港区会及港澳信义会的联合组织，自称有教徒 43,000人。

12. 香港基督少年军

1959年成立，主要在香港开展宣教运动。其宗旨为“于青少年人之间，扩展基督的角度，同时促进服从、虔诚、纪律及自爱等良好行为，以达成基督化的人格”。到1991年，该组织在香港已有 30 多个分队，1,000多名成员，分别隶属于基督教教会、青少年中心和学校。其成员要求年满 8 岁及 8 岁以上的男女青少年均可加入，分为三个组别：初级组为 8 到 12 岁，中级组为 11 到 18 岁，高级组为 16 到 20 岁；由年满 19 岁的男女基督教徒担任导师。各分队每星期集队一次，主要活动包括基督教教育、操练及技能训练，如露营、急救、工艺、游泳、球类及军乐等。该组织也经常参加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包括教会的活动，如在布道大会上负责维持秩序。

13. 香港差传事工联合会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s)

这是一个由香港多家差会及差传机构组成的组织，主要负责华人教会的差传工作，其目标有推广差传异象、发展差传教育、发展差传策略，内部分别推广、教育、文字、辅导、宣教士服务、研究等部门。

14. 中华宣道会海外布道会 (Th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

ety of C. C. & M. A.)

成立于1973年,到1991年,该组织曾派遣宣教士前往印尼、越南、台湾、澳门、法国、泰国、东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澳洲、英国、南美、巴基斯坦、非洲等地传教,建立教会。目前,该会在海外的传教士共有17名,分布在泰国、印尼、毛里求斯、英国、南亚。

15. 中国基督教播道会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播道会”原为美国基督教的一个小教派,后在香港设立“基督教播道会美国差会”,1988年成立了香港“中国基督教播道会”,目标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现主要在台湾和日本传教。该组织在香港有教堂12所,还办有播教神学院,播道会文字部及书局、播道书室、播道书楼、播道医院及播道会儿童之家等。

16. 中国信徒布道会香港分会

“中国信徒布道会”是基督教海外华人的教会之一,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并出版《中国信徒》月刊。其设在香港的分会主要从事印刷、出版和散发宗教宣传品,1992年曾发动一场“福音传信鸽”运动,印发了大量的单张宗教宣传品,鼓动向大陆传教。其负责人是王永信。

17. 基督教中国布道会 (港澳区)

成立于1948年。目前在香港共有9间教堂,还办有学校及幼稚园3所及圣道出版社。这也是一个传教机构。

18. 香港学园传道会

成立于1973年,是“国际学园传道会”在香港所设立的分支机构,又称“国际学园传道会香港分会”。

基督教“国际学园传道会”是美国基督教的一个国际性的传教组织,于1951年由布莱特夫妇创办。其总部设在美国,目前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该组织的分会建立,在美国还设立“基督教校园基金会”,为各分会在各地校园传教提供资金。

香港学园传道会主要负责在香港各大学中传教，吸引青年学生入教，其基金也主要靠美国提供。该组织也曾力图向大陆传教。

19. 福音证主协会

成立于1971年4月1日，由原香港基督教内地会的“证道出版社”和“中国主日学协会”合并成立。其下设有总办事处、证道出版社、证道书室、基督教教育中心等机构。1973年专设中国研究中心，后改名为“中国福音事工部”，其宗旨是“负担起修筑桥梁的任务，促使中国大陆教会与海外教会彼此交通交流”。出版中英文《守望中华》及《为中国祈祷》双月刊，并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向大陆传教，散发宗教宣传品。该机构的下属机构“建华基金会”于1981年向港府注册登记，并通过募捐与大陆多个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原负责人王一平等现已脱离了该基金会的董事会。目前，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是薛孔奇。

20. 海外基督使团（海外传教团契）

其前身即基督教“中国内地会”，这是一个最早向中国传教的机构。目前该组织是基督教的一个联合传教机构，在东南亚9个国家派有900名传教士，其总部设在新加坡，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设有“中国事工部”，出版《为中国人民代祷》英文月刊。负责中国事务的是艾得理。

目前，该组织在香港的宣教士有十余人，设有“香港委员会”，有义务秘书、义务司库及委员共8人。该机构与香港的“福音证主协会”、“亚洲归主协会”等传教组织关系密切。

21. 香港天道传基协会

原名“天道书楼”，1976年12月由美国乐可门基金会、日本《生命》杂志社资助成立。该会于1982年11月改名为“天道传基协会”，其下设立有出版部、影音部、营业部、发展部、大陆福音事工部、行政部、服务部；还有一些附属单位：如环球华人服务团、中文圣经新

译会、新力出版社等。此会专责收集和研究大陆的宗教情况及宗教政策，向内地传教或散发宗教宣传品。其总干事是容保罗。

22. 葛培理布道会香港分会

该组织是美国“基督教葛培理布道会”（The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的分支机构，1972年成立，并由美国“葛培理布道会”直接派人负责管理。出版月刊《抉择》（Decision），由“世界华人福音会议”的滕近辉及容保罗等人负责编辑，发行人及主编是蔡胜蛇牧师，到1984年时，该杂志已用10种语言发行。1982年4月，该会进行改组，交由华人管理，并增加了人员和经费。主要工作是利用电视、电影及电台广播、出版各种刊物和书籍等向中国大陆及东南亚等地传教。

23. 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

该组织是“世界华人福音会议”（Chinese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的下属机构。1974年7月“世界福音会议”在瑞士洛桑召开时，应美国福音派布道家葛培理的提议设立一个专责华人福音的机构。于是在1976年的8月于香港九龙城浸信会正式召开了第一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同年10月在香港成立“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提出“华人教会要合一增长”。“华福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会议，1981年6月17—24日在新加坡召开了第二届“华福会”，1986年8月6—13日在台湾召开第三届大会，1991年7月10至17日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召开第四届大会，其主题是“跟随基督，同得万民，迈向二千”，大会还专门讨论了有关大陆的文字传教、福音广播、关注少数民族、培训传道人员等。而“联络中心”在“华福会”休会期间主持其日常的事务，负责向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传教。其经费主要得到世界福音团契、香港宣道会、海外基督使团、葛培理布道团、播道会、宣明会、信义会及浸信会等福音派的资助，下设文字部、中西合作部、会议部、教会资料服务及电脑、拓

展、财务、事务等辅助部门。1984年7月该组织还成立“香港教会更新运动委员会”，主持“香港福音两千”活动，通过“远东广播公司”设在世界各地的电台，向各地华人播放基督教的节目。另外，该组织的机关刊物为《今日华人教会》(Chinese Church Today)，创刊人是王永信，发行人刘少康，其内容多是有关大陆、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信息，并注重宣教，还出版《教牧分享》(双月刊宣教性属灵的小册子)、《普世华人》英文月刊；该组织于1990年在香港发起的“香港福音二千”运动，目的是要使香港的教堂由900多间增加到公元2000年时的2,000间，使教徒由22万增加到55万，该运动的董事会主席由卢家駁(中华基督教会基道第三堂牧师、远东福音广播公司的执行主任)担任，副主席为薛孔奇及朱荫康。“华福香港区委会”的总干事是陈喜谦。

24. 道风山基督教丛林

传说道风山从前是一所佛教的寺院，后因那里的一个和尚信了基督教，就将寺院献给了一个外国牧师，也就成了今天的道风山。实际上道风山的创办人是挪威传教士艾香德博士(Dr. Karl Ludvig Reichelt)，他生于1877年9月1日，1904年来到中国，在湖南、湖北传教，1912年在湖北浠口信义神学院做教授时开始对中国的传统宗教尤其是佛教产生浓厚的兴趣。1922年在南京创立“景风山”，并设立宗教徒招待所，接待四方的教徒。1930年艾香德来到香港后即在沙田创办了“道风山基督教丛林”，1933年开始动工修建，1934年9月圣殿建成，其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式样，礼拜仪式也是中国式的，成为一间专门向中国教徒布道的教会。当时常有着僧衣道袍的内地人来此，故有以上传说。艾香德于1952年3月13日逝世，并葬于道风山基督徒坟场内。50年代因常受一些人的指责而再没有与佛教人士来往，60年代与新亚书院的基督教文化研究院合作，成立了“基督教宗教文化研究社”，后改名为“基督教丛

林”，不久又成立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宗教的研究室。目前，道风山内设有礼拜堂、基督教中心、福音绘瓷部、爱道团妇女退修院、何文田宗教友谊社、道风山福音部等。其主要任务是推进对中国宗教问题的研究，并为香港各教会提供一个活动场所，出版研究资料，制作并出售基督教的艺术品。该组织的管理委员会由香港信义会、圣公会、基督教协进会等派代表组成。1993年11月8日香港基督教界召开“新纪元在香江”的讲座，主讲人是道风山“基督教中心”当代宗教研究部的主管马恩羚女士，该讲座的目的是对“新纪元运动”进行剖析，并从社会学、教牧及神学等角度来分析“新纪元运动”。另外，由大陆去香港的学者刘晓枫也在该研究部受聘，负责出版一系列的有关基督教的书籍。

25.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该出版社是香港基督教的一家出版机构，由“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支持，出版《圣经》及各种宗教类的书刊。1982年创办《文艺杂志季刊》，是教会文艺性的刊物。下辖的附属机构有文化学会、循道卫理中心文艺书室。

26. 香港基督教远东广播中心

“基督教远东广播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世界性福音广播机构，原是为了向那些传教士难以到达的地方如中国内地广播福音，1948年终于在菲律宾成立电台，1949年7月29日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开始向中国大陆广播，到80年代中期在世界各地已拥有28家电台。1958年，在香港设立制作中心，负责中英文节目，供给属下电台。70年代中期，该公司陆续在韩国的济洲岛、菲律宾的衣巴建立25万瓦的特强力中波电台，将大陆作为传教的主要目标，每天以中波、短波向中国大陆播放超过35个小时的节目，据称可以覆盖中国大陆的所有省份。该广播公司致力于传教，设有专事培育信徒的“空中教会”、专为培训教会传道人的三年一循环的“农村圣经学

院”等。还出版《福音广播》、《天讯》杂志。远东广播公司香港区的负责人是卢家駁。

远东广播公司目前用120多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福音，直接参与中国大陆福音广播的人员就约有100人。香港的节目主任是汤镇华。

27. 崇基学院

这是香港中文大学下属的三个学院之一，它也属于香港12个神学院之一。其中又分宗教系、心理系、音乐系，这三个系在香港的大学中是独有的；而宗教系是1978年开始设立的，其中又分为二组，一是宗教知识组，学生毕业后可到教会中学教授宗教知识课程，一是神学组，主任是欧礼彰博士，聘请各教派牧师任教，为教会培养牧师，毕业后仍回教会，出版刊物《神学组通讯》。

香港的基督教除以上介绍的各派和组织外，还有许多其他有着不同背景的基督教组织或机构。因基督教新教本身有着复杂的教派特点，所以香港的基督教组织也各种各样，各自反映了本教派的特点，使香港基督教呈现多元化。

五、人物简介

叔未士(Rev. Jehu Lewis Shuck) 是最早来港定居的基督教牧师。他于1812年9月4日出生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后入浸信会神学院学习神学，决志海外传教，1835年被按立为牧师，不久即被派往中国传教。1836年8月29日到达澳门，后往来于广州、澳门与香港之间。因清朝严禁传教，他先学习汉语，再在华人中间传教。1842年他接受《华友西报》的聘请出任主编，并于同年3月29日携夫人何显理及罗孝全牧师从澳门乘船到香港，一方面从事报

业，一方面开始在香港传教。同时，叔未士也是美国浸信会第一位到达澳门传教的牧师。他在香港以中环作为传教的基地，并于当年的 5 月 5 日靠捐资创立了“皇后大道浸信会”，有教徒 5 人，这是香港第一间教会，堂址即座落于皇后大道中和雪厂街之间，不久他又在中央街市附近创“街市浸信会”。叔未士可以说是香港新教教会的开创人。除传教外，他还建立了香港第一所教会学校——宏艺书塾，这所学校就设在皇后浸信会内。1843 年 8 月 22 日至 9 月 4 日他代表浸信会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首次译经会议，为 baptism 等词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有价值的意见，为翻译中文圣经做出了贡献。他还培养了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杨庆，杨因听叔未士的讲道而逐渐皈依基督教，后成为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学生，在美国接受神学训练，并被按立为中国第一位华人牧师。其次，叔未士的夫人何显理(Henrietta Hall)也是一位传道人，她曾应美国波士顿传道会(The Boston Board)的派遣，与其丈夫一起来中国传教，她是美国第一位来港的女传教士，也是西方基督教会来港最早的女传道人。她还在皇后大道浸信会内开设一所女校，这是香港第一所女子学校。现在香港柏道有一间显理中学，就是特为纪念她而命名的。

罗孝全(Rev. I. J. Roberts)美国浸信会的传教士，也是在港定居的最早的牧师。1842 年 3 月 29 日他同叔未士夫妇一起受美国浸信会的派遣，由澳门转到香港，后以赤柱为中心，侧重在英国人中间传教。他还参加了 1843 年 8、9 月间首次在香港举行的译经大会，前往广东等地传教。1847 年春，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和洪仁轩还曾到广州拜访过他，希望向其学习基督教的教义，但罗孝全拒绝了他们。

郭士立(又译郭实腊, 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原为德国普鲁士人，1826 年在荷兰读完神学后被派到爪哇传

教,因向往中国,于1829年脱离荷兰传道会到中国沿海传教。1830年—1833年他曾三次乘船从广东、福建沿岸北上,但因清朝严禁外国人传教而被迫返回香港,并于1834年写成《三游中国海岸记》(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风行欧美。后因为生计被聘为英国在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翻译。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充当英方的主要官员,参与中英条约的签订,在英国人占领舟山时还出任过行政长官。1843年到香港因马儒翰(马礼逊之子)病逝而任职抚华道(Chinese Secretary,即日后的港府华民政务司,专门负责管理一切华人事务)。郭士立很有语言天才,他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官话,还可说流利的福建话、潮州话、广州话和客家话等地方方言,同时时刻不忘布道,被称为“信义宗第一位来华宣教师”,吸收华人入教。1844年2月14日创立“福汉会”(The Chinese Union),这是一个培训华人传道人的中心,初期的学员就有20人,除郭士立和罗孝全外,其余均为中国人,并选华人为主席,所以该组织也是最早的由华人主持事务的教会机构。后来,他又致信德国巴勉传道会(Barmen Missionary Society)、巴陵传道会(Berlin Missionary Society)和巴色传道会(Basel Missionary Society),呼吁派传教士到香港传教,直接促成“三巴”会派大批传教士到中国。以后,西方差会所派的许多传教士首先来香港投奔其门下,或在其领导下学习汉语、向华人传教。他还协助其他传教士建立华人地方语系的教会,如客家人教堂、潮州人教堂等,向西方传教士传授布道经验。另外,他定期回欧洲,向各国教会报告中国传教的近况,并在欧洲各地筹划组织“中国传道会”(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郭士立于1855年8月9日在香港逝世,并葬在此地。在其生前,港府为表彰他在鸦片战争中曾对英殖民者效过力、对香港及教会做出的贡献而给他加官晋爵,并将现香港中区皇后大道中央市场对面、阁麟街和嘉咸街中间一条较窄的街道以其

名命名为“吉士笠街”。如今，香港信义宗各教会均认为郭士立是在港传教的开山祖。他一生中著作近 70 余种，如《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及《道光皇帝传》等。不过，因他从商、充当英军译官及福汉会后来陷于分裂等，他在历史上也成为一个人物。

韩山明 (Rev. Theodore Hamberg) 德国巴色会的来华传教士。1819 年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学生时代就有志于传教，1844 年入巴色城攻读神学，1847 年被派往香港，在郭士立的门下学习客家话，后专向客家人传教。先在沙头角开办诊所，后又建立一所客家学校，并开办神学训练班，成为第一个向客家人传教的牧师。1851 年 2 月开设了第一所客家人的教会，并协助郭士立负责“福汉会”的工作。1853 年他还为太平天国将领洪仁轩施洗，并协助洪撰写太平天国的历史，名为 *The Vision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1935 年将该书译成中文，定名为《太平天国起义记》，书中对洪秀全的家庭背景、获得梁发《劝世良言》的经过、到广州拜访罗孝全的经过、起义的过程等都有记述，对研究太平天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韩在华传教仅有 7 年的时间，1854 年 5 月 13 日病逝于香港，但其影响很大。洪仁轩在《资政新篇》里特意称赞他的人品。

彝为仁 (Rev. William Dean) 美国浸信会首位来华的传教士，也是第一位向潮州人传教的牧师。生于 1807 年 6 月 21 日，曾就读于美国哈密尔敦文学院暨神学院，1833 年毕业并按立为牧师，次年派到亚洲，首先在泰国传教，因曼谷当时的人口有一半为华人，遂非常重视在华人中间传教。1835 年成立了华人教会，1842 年还开设了神学训练班，培养华籍传道人。他于 1842 年 10 月定居香港，与叔未士和罗孝全一起传教。1843 年 5 月创立了一个潮州人教堂，因他通晓潮语，还前往长洲向那里的潮州人传教，并设立布

道基址，1982年长洲浸信会兴建的“甸威廉楼”即对他表示纪念。1843年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召开翻译中文《圣经》的会议期间，他作为正式代表出席，所提出的许多建议被会议采纳，如对 **Baptizo** 词的翻译，他主张用浸信会的观念，即译为“浸礼”最为恰当，到1853年各差会签署协议书时他又坚持将 **God** 译为“神”、**Spirit** 译为“圣灵”等，可见他在圣经翻译上有突出贡献。此外，他还曾到厦门、上海、汕头等地传教，先后在华传教50年之久，于1884年退休回国，1895年逝于美国加州。代表著有《使徒言行传》（1849，香港）、《真道入门》（1849）、*The China Mission*（1859，纽约）等。

马儒翰 (**John Robert Morrison**) 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的长子，生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中国澳门，中国史书上又称秧礼逊、马里臣等。幼习中文，后到英国接受短期教育。因精通汉语，道光十年(1830年)在广州作英商翻译，并于1834年继任英驻华商务监督处的中文秘书和翻译官，后出任港督的抚华道，负责管理华人事务。1840年曾随英国全权代表及侵华总司令懿律等到天津，与清政府代表、直隶总督琦善会晤，从事搜集情报及翻译的工作。1842年他参加了《南京条约》的起草工作，后与传教士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等合作，完成了圣经新的汉译本，为统一订定圣经翻译做出了贡献。香港割让给英国后，他曾任香港政府议政局和定例局委员，并兼代辅政司官职。1843年8月29日患疟疾去世，后葬于澳门基督教坟场内他父亲的墓旁。其著作有《英华行名录》、《对华商务指南》等。

理雅各丁 英国的传教士、著名的汉学家。1814年出生于苏格兰，1839年受伦敦会布道会的派遣前往马六甲，任英华书院的院长。1844年他随该院一起迁到香港，继续主持院务。1853年在他的协助下由该院的印刷所印行的《遐迩贯珍》创刊。1855年他开始担任此刊物的主编，但该刊于次年5月停刊。他还在王韬的帮助

下将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因而在西方名声大震。1873年他回到英国,1875年被牛津大学聘为教授,设立汉学讲座,直到逝世。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人关于鬼神的观念》、《孔子生平和学说》、《孟子生平和学说》、《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较》。

艾香德(Dr. Karl Ludvig Reichelt) 挪威人,生于1877年9月1日,1904年来到中国,起初在湖南宁乡县传教,1912年在湖北信义神学院任教授。他在传教过程中对中国的佛教产生浓厚的兴趣。1922年在南京创立景风山,附设宗教徒招待所,接待四方的教徒。1930年他来到香港,开始在沙田创办了“道风山基督教丛林”,1934年9月23日落成,其建筑颇有佛教寺院的风格。他还倡导基督教礼仪中国化、教堂中国化。1952年3月13日逝世,葬在道风山基督教坟场内。

白约翰(Gilbert Baker) 第八任圣公会香港教区主教,生于1910年,英国人。他早年曾在牛津大学、西敏寺和基督学院就读,并任伦敦大学基督徒学生会运动干事。1934年他来到中国,在云南传教。1935年在广州救主堂获奉为会吏,1936年被按立为牧师,曾在圣三一堂中学及岭南大学任教。1939年至1945年在云南昆明文林堂任职,兼做大专学生工作,后回英国,并到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读书。1947年重返中国,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主任牧师。1949年到1952年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1952年到美国任职,1955年再回到英国任联合海外传教会总干事及伦敦圣尼古拉堂主任牧师。1966年来到香港,出任香港道风山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道风山基督教丛林董事会的主席,同年11月30日出任圣公会港澳教区会督,到1980年任职届满。他还曾任香港基督教联合会的会长,并于1981年1月应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中国基督教协会的邀请率团访问大陆,参观了上海、北京、西安及广州等地的教会及宗

教活动场所，尊重我三自教会。他在香港基督教界及国际圣公会中有较大的影响力。

何世明 香港基督教教育家。生于 1911 年，广东顺德人，曾获国立中山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后成为圣公会的牧师。历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中学校长、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董及校务委员等职。现任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的董事、基督教文化学会会长等。主要著作有《基督教十二讲》、《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人的教育》、《基督教儒学四讲》、《基督教徒看中国孝道》等。

屈武圻 香港基督教著名人士。1916 年出生，广东番禺人。他曾获得岭南大学学士学位，历任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及名誉会长。他还是章记公司的董事长，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循道中学及华英中学的校董，另外也兼任一些社会职务，如东华三院的总理、那打素医院的执行董事、建筑商会的董事、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的副会长和董事等。他的著作也颇丰，如《成功学》、《生命之光》、《丰盛生命》、《信心》、《希望》、《梦想》等。

邝广杰 (Rev. Peter Kwong) 现任香港圣公会港澳教区主教。原籍广东台山，生于 1936 年，曾就读于圣公会中学，后升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以后又赴美国学习神学，1965 年回到香港任圣保罗堂主任、法政牧师等职。1970 至 1971 年再次赴美深造，1972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师，直到 1979 年被聘到圣公会港澳教区主教府工作，并被任命为教区干事，也是香港大学圣约翰书院院士及院牧。1981 年他被任命为港澳教区第九任主教，成为圣公会港澳教区第一任国籍主教。他还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主席，也是港事顾问。他在圣公会港澳教区成立 135 周年庆典会上发表演说时呼吁教会及教徒积极参与社会，承担责任，共同为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而努力。他曾于 1983 年、1985 年到中国内地访问，赞成大陆的三自教会，促

进了中港两地基督教会的交流与友谊。

罗恒理 是在香港的美国路德会即美国密苏里信义会亚洲教会中国部的负责人。最近在香港成立了“中国联络中心”（简称:CCC），专门负责向中国大陆的传教及社会服务工作，还制定了1992—1997对华传教服务的五年计划。

梁林开(Lincoln Leung Lam Hoi) 生于1932年，原籍广东南海县，现已入英国籍。1951年到香港，1956年就读于新加坡三一神学院，1959年至1961年在美国读完大学后返香港，先后任香港华人基督教联合会传道部长、调查部长、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书记等。1977年他筹备成立一个“新生命运动”，并任大会的主席。他现是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北角卫理堂的主任牧师，曾任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第一副主席、循道联合教会会长。他曾多次到大陆访问，拥护我收回香港主权。

萧克谐(Andrew K. H. Hsiao) 前任香港信义宗神学院院长。湖南省益阳县人，1926年出生，初中毕业后曾入湖南省立第五师范，毕业后到信义中学高中部任办公室文书，抗战胜利后到教会中服务，1948年入湖北浚口神学院读书，1949年随神学院迁到香港，1952年毕业。1954年赴美留学，1958年回到香港，主编本色主日学教材。1964年再次赴美攻读博士学位，1970年曾代表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参加在法国召开的世界信义宗第五届大会，并选为“世信联会”教会的合作部委员。1971年获美国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后返港，不久被聘为信义神学院的教授，继而担任神学院的第八任院长，也是第一位华人院长。1977年他参加了在坦桑尼亚召开的“世信联会”第六届大会，并被选为执委和副会长。他还曾担任东南亚神学院协会(设在马尼拉)的主席。从1979年起多次到大陆访问，增进了与大陆教会的了解，并积极向海外介绍中国当代教会的情况，力主向大陆传教。他还代表“纽约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

事会”赞助大陆的陕西师范大学及四川大学。同时，他与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组织联系密切，其神学观点自称是“中间派”。面对九七，他对香港的前途持乐观的态度，并主张教会应为维护香港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做贡献，同时也要参与香港的民主进程。

林汝升(Frank Lin) 原籍广东番禺,1927年出生。幼年时在上海居住,1932年“一·二八”事件前去广肇中学读书,1952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化学系学习,不久到香港,再转澳洲攻读化学、神学等,毕业后回到香港在圣公会担任传道人。60年代中期到澳门接任莱高中学校长及圣公会的区代表,1980年到香港圣玛利亚堂任主任牧师。他还是香港圣公会港澳教区法政牧师,主张教会参与社会,并充任大众交往的桥梁,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1981年、1984年曾到内地访问,促进中港教会间的交流与沟通。

王作炯 字字明,教名约翰,生于1928年,江苏阜宁人,香港浸信会的主任牧师。他早年曾获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学士学位、道学硕士学位、协同神学院硕士学位,曾任香港浸信联合会传道、助道、海外、宗教、书报、浸会园等部员、书记、司库、副部长等职,还是香港培基英文书院的董事及院牧,并兼任基督教基立圣工学院副院长及实用神学讲师,还任香港复兴祷告团总干事、世界华人全体福音联合会书记等。著有《圣经主要抄本简说》、《牧师在崇拜中的责任》、《基督徒与春节》、《宗教之浅谈及基督教徒应过圣洁的生活》等等。

盖英魁(Rev. Koy Ying Kwei) 是香港信义宗的牧师,任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的监督,也是信义神学院董事会的主席。

薛磐基(Simon P. K. Sit) 基督教香港崇真会的会长,新当选为93—95年度“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会长,他也是香港中文人学崇基学院的校董、基督教联合医务会及信义宗神学院的董事。

刘文健 救世军香港及台湾军区的新任总指挥。1935年生于香港的华人家庭,早年在香港接受教育,曾于1967年、1969年先后在香港和加拿大的救世军军官训练学院受训,后在香港救世军的教育、宗教、社会服务等部门中工作,1987年和夫人一起被派往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并于1991年出任该军区的总指挥。1993年4月1日,他正式被任命为救世军香港及台湾的总指挥,开始主理100多家的服务机构,包括学校、老人及青年中心、幼儿园、老人宿舍、庇护工场、男童之家、女童院等。

保罗·考夫曼(又名高保罗,Paul E. Kauffman)美国人,香港基督教《亚洲归主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主编《亚洲报导》(Asian Report)刊物。他本人在中国出生,其父原是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考夫曼17岁时才离开中国,前赴朝鲜,后回美国,并在加拿大担任多年的牧师。60年代他来到香港,专门研究中国情况,1969年在港设立一个“亚洲研究中心”,并组织“亚洲前沿公司”,出版《亚洲报导》月刊,还著有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如《中国大陆的教会》、《孔子、毛与基督》、《中国问题》等。他还是国际“亚洲扩展组织”(Asian Outreach)的主席,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宣教组织,总部就设在香港。

高荅华 原籍广东顺德,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曾出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第二副主席及该会服务处的管理委员会主席。她毕业于燕京大学,自1952年起就加入女青年会的工作,1954—1955年曾在英美接受社会工作训练,并在瑞士女青年会世界协会接受行政管理课程的训练。1965年荣获英国女皇颁授的MBE勋衔,1969年又荣任太平绅士。在负责教会工作的同时,她还积极介入社会政治领域,曾于1972年12月到1974年11月被任命为市政局议员,1974年7月到1978年8月被委任为立法局议员,1976年又获OBE荣衔,并曾任香港社会服

务联会主席、香港社会服务协会会长、香港信乐妇女会会长及创办人、香港国际妇女会的执行委员等，还出任过基督教联合医院的主席、香港儿童福利会会长等近50个社会公职。近30年来，她一直致力于香港的基督教会、社会福利、青少年和妇女方面的事业。目前任香港儿童福利会会长，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在香港基督教界有较大影响力。

李景雄(Peter K. H. Lee) 生于1930年，广东人，现已入美国籍。曾在美国学习，回香港后任香港中文大学的校牧，还曾任循道卫理联合会的牧师、道风山基督教丛林研究社的主任。他现任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的社长，他主张基督教本土化 Contextualization, 而不只是本色化 Indigenization; 赞成中国的三自教会，反对台湾独立。在对香港九七回归的问题上，他主张教会应坚持中立的政治立场，不支持任何党派，但希望香港社会逐步民主化。

曹敏敬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总干事，在美国华盛顿居住了22年，任卫理公会牧师。目前其家人仍在美国，他一人在香港。1991年底访问大陆后对大陆的教会发展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郭乃弘(Kwok Nai Wong) 生于1940年，广东人，已入英国国籍。他于1964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后到美国的耶鲁大学神学院学习，1968年回港在中华基督教会深爱堂任多年的主任牧师，1979年起任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总干事，1980年还兼任香港基督教服务处代主任。1984年被选为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的主席。他一向重视神学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的神学教育，面对九七回归，主张以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为基础，教会要参与过渡期香港的社会生活。

李清词 是香港中华基督教会的女牧师，任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的副总干事。她一贯重视香港的教会教育，1984年曾应邀访问大陆。

黄永熙(W. Heyward Wong)生于1917年,浙江杭州人,1947年10月15日离开上海到美国,现已入美国籍。自1947年起先后在伯仲尼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裘丽亚特音乐院的暑假学校攻读,于196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曾任香港圣经公会总干事、香港华人基督教联合会名誉董事、世界华人基督教圣乐促进会理事长、世界华人福音会议香港区委员会副主席。从1975年8月1日开始担任香港圣经公会的总干事,直到1983年8月退休。他还曾任香港圣乐团的指挥、世界华人基督教圣乐促进会的理事长,亲自指挥著名歌剧《中华魂》。1978年他在香港主持召开“第二次中华福音座谈会”,研究如何向大陆传教。1979年曾回内地参观。

吴明节(Wu Ming Chieh)河南确山人,解放后去香港,并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是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的牧师,也是香港基督教的教会领袖、基督徒作家,曾担任多年的世界华人福音会议董事会的主席、香港信义宗神学院副院长,从1960年起任信义会的监督,后被任命为香港信义会的永远名誉监督。1981年退休,1990年9月9日去逝,终年75岁。

滕近辉(Philip Teng)山东潍县人,1923年生于一个牧师家庭,已入英籍。他在194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的外文系,1947年在英国爱丁堡神学院就读,并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到香港,曾任职于设在香港的广州圣经学院,1953年任该院教务主任,后又应邀兼任伯特利神学院的讲师。1956年到建道神学院任神学科主任,1974年香港差传事工联络会成立时他被选为主席,同年创办了“中国神学研究院”。次年出任建道神学院义务院长。他是宣道会北角堂主任牧师、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董事会的主席、宣道会香港区联合会的主席,他还担任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院长、并曾任建道神学院差传系的代主任。1980年任建道神学院董事会主席,

1982年任该院荣誉院长。他在香港及海外华人基督徒中因神学修养水平高而有一定的影响力。

陈佐才 (Alan Chan) 圣公会港澳教区法政牧师。生于1940年，早年毕业于香港崇基学院，又先后在香港协和神学院及美国太平洋神学院接受过神学训练。1962年被按立为牧师，1979年开始任法政牧师，他还出任过圣公会港澳教区的发言人、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干事、亚洲基督教议会的会长。1985年5月美国太平洋神学院还授予他荣誉神学博士学位。他还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系的主任，也曾到大陆来访问，增进了对内地三自教会的了解。

丘恩处 (Andrew Chiu) 原名丘美仲，别字美仲，生于1929年，广东丰顺县人。解放前曾任国民党军的上尉，1950年到香港。他曾获美国圣路易协同神学院神学博士学位、九龙协同中学的训导长、九龙协同堂的牧师、香港协同神学院教授、教务长、香港路德会会长、信义宗香港协会会长、路德会亚洲协会主席、东南亚神学研究院香港分院教务长、亚洲信义宗通讯社的社长。他现任信义宗中国教会联络处董事会主席、香港协同神学院院长、东南亚神学研究院香港分院院长、香港信义宗书院监督、香港圣经公会董事、香港教师会名誉会长等。他曾多次访问内地，力主向大陆传教。著有《教会与社会》、《圣经与敬祖问题》等。

李伟韬 (Titus Lee) 香港路德会锡堂的牧师。原籍江西，生于1929年。他曾当过国民党兵，1949年去香港，就读于香港调景岭圣经学院，1964年被按立为牧师。他担任香港路德会会长，1985年任“香港基督教关注基本法筹备委员会”的顾问。1984年曾回内地访问。

谢约翰 (Tse Chiu Man, John) 中华信义宗香港协会的会长、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的监督。他原籍广东，曾毕业于信义会神

学院,1970年被按立为牧师。他与台湾教会关系密切,近年来也不断到大陆访问。

杨健生 安息日会海岛区会的主席,并兼任安息日会全球总会副行政秘书。

江彼得 曾任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总干事,1982年9月率团访问了大陆,赞同我三自教会,支持广东教会开办神学教育。1984年退休,同年5月病逝。

王永信(Thoms Wang) 原籍北京,已入美国籍,现任“中国信徒布道会”的会长、“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的总干事。他在解放前夕到台湾,曾在台湾卫理公会工作,1958年到美国进修神学,并在当地的教会中服务,后组织“中国信徒布道会”,担任会长。1972年,他开始筹备“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任该中心总干事,主张向大陆传教。

王一平(David Wang) 生于1946年,浙江定海县人。1957年到香港,毕业于香港新法书院大学预科,后到美国纽约简理机学院学习。他现任“亚洲归主协会”总干事、董事会董事、民师公司经理、建华基金会董事。主张向内地传教。

何培基(Andrew Ho) 台湾省人,现已入美国籍,牧师。现任香港“学园传道会”的会长,同时兼任“国际学园传道会”华人福音事工联络处的主任、美国基督教校园基金会亚洲区执行干事。他曾在菲律宾教会中任职,后到美国。他还曾受国际学园传道会的派遣到大陆商谈援助事宜,力主向大陆传教。

薛孔奇(Theodore Hsueh) 1940年出生,江苏常州人,已入美国籍。1950年到香港,1959年赴美国,1963年返港,后从事宗教书刊的出版工作。他曾担任九龙尖沙咀浸信会的执事、第一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常务委员会的副主席。目前任“福音证主协会”的总干事、建华基金会的董事、海外基督使团驻香港中国大陆事工联

络人及香港委员会的义务秘书。他主持下的香港基督教“福音证主协会”下设“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中英文双月刊《守望中华》及英文版的双月刊《为中国祈祷》，主张向内地传教。

赵天恩 (Jonathan Chao) 生于1939年，辽宁铁岭人，已入美国籍。1948年东北解放时到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1951年至1958年在日本神户学习，后赴美继续深造。1964到1965年在台湾基督教学院任教，1967年到1970年在美国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70年至1972年分别在台湾及香港从事传教及教会教育工作，1975年任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教务长。1978年该院成立“中国教会与文化研究中心”(简称“中国教会研究中心”)，他兼任主任。该中心不久即脱离了“中国神学研究院”而独立出来，并出版《中国与教会》双月刊、英文版《莫忘神州》，经常发表文章，鼓吹“中华民族福音化、中国文化基督化、华人教会国度化”的“三化”理论，开办“田野神学院”，培训巡回传道人，向大陆传教。1987年又创办了“中国宣道学院”(China Mission Seminary)。他还力图重整福音会，将港、台、英、美、澳等地的福音会组织起来，成立“福音会国际总会”；香港的“中国教会研究中心”于1994年3月重新以“中国福音会”的名义登记，《中国与教会》杂志也于同年7月开始更名为《中国与福音》。

容保罗 (Paul Yung) 1933年出生，广东中山县人。是香港宣道堂尊主堂主任牧师，曾任天道传基协会总干事，中文圣经新译会的总干事、“葛培理布道会香港分会”总干事、香港华人基督教联合会书记等职。他于1948年到香港，毕业于香港宣道会神学院，曾任宣道会北角堂的主任牧师。他还曾与美国基督教广播网有限公司筹划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经办香港天道书楼，发行宗教卡通片，主张向大陆传教，并协助办理美国布道家葛培理在香港的办事机构，是“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为香港

基督教福音派的代表。

邓肇明 香港基督教会刊物《桥》的主编。1935年出生，广东高要人，自幼到台湾，后留学西德，获神学硕士学位。1970年加入“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并曾任该社有关大陆教育制度方面的研究员、信义会道声出版社的编辑。他在道风山主办的双月刊《桥》主要报导有关中国大陆教会的动态及香港方面对大陆教会的反应。1983年5月他曾率团访问浙江，并多次到大陆旅游观光，与内地教会增进了了解。

李志刚香港著名的基督教研究学者、香港礼贤会湾仔堂主任牧师。他著有大量的有关中国基督教教会史、传教士、香港基督教方面的文章及书籍，如《中国基督教思想史》、《香港教会掌故》等，在香港基督教界有一定知名度。

艾得理 (David Adeney) 为“海外传教团契中国委员会”的北美负责人，其办事处设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他早年曾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30年代来中国传教，主持“中国学生福音团契”(即“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曾到过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及华北许多城市。解放后到香港，任灵光堂的牧师及“国际学生福音团契”远东副总干事，还任新加坡“门徒训练学院”的院长，专门培训高级基督教传道人，主张向中国大陆传教。

六、发展趋势

从80年代以来，香港基督教主流教会的发展受香港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呈现下降后又逐渐上升的趋势，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80年代中期面临九七回归，香港市民对未来存有种种疑虑，向海外移民较多，教会信徒纷纷外流。

2、面临九七，西方各教会对香港的资金投入减少，传教士的数量也逐年下降，教会的数量虽然增加不少，但教徒的人数却不见增长，甚至有的堂会还在减少。

3、信徒中虽然女教徒人数多于男教徒，在校的女神学生也普遍多于男神学生，但因多数教派受传统的束缚，征聘牧职人员的广告的男女比例却是5:1，女性比男性站到讲坛上讲道的机会要少得多。在某些传统的教会里，女性甚至不能在讲坛上讲道，更不可能得到牧职。即使女性被聘有牧职，其薪酬及受按立的机会也会大大低于男性，以致于香港目前的女神职人员也很缺乏。现时，在全港只有 22 位女牧师，她们大部分属于圣公会、循道会、中华基督教会及信义宗。某些教会还公开声明不按立女牧师，可见在香港的教会里，女性的角色仍处于次要地位。1993年10月由“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妇女事工委员会举办的“九十年代女传道在堂会的角色”座谈会，就女性牧职问题展开广泛讨论。争取女性在教会中平等地位的问题已引起香港教会人士们的关注，尤其是女性教徒们的不满。

4、90年代后，随着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及政治形势的稳定，使香港市民对未来增强了信心，近两年来香港向海外的移民数量逐步减少，并且有回流的趋势。另一方面基督教各派教会也大力宣传要与港人同行，并且传教机构大力布道、宣教，尤其是福音派教会在香港开展大型的布道会，如1993年的8、9月间就举行了20多场规模不等的布道会，据称参加的人数数以万计。1994年初还成立了“香港联合布道事工”，由柳镇平担任主席，以协调各类的布道会。所以，据香港《星岛日报》1994年6月19日报导，香港的基督教徒出现增长势头，已突破30万。

不过90年代的香港社会，除经济仍呈现高速发展外，其社会发展趋势有以下特点：如社会政治化、环境大都会化、文化物质化及

生命迷信化等。现代香港人由于物质利益的刺激，整日为生活所迫，追逐功利，于是迷信泛滥，当代香港社会流行信风水、信命数，而对传统的宗教则趋于冷淡。教会面对这一社会形势，提出几项应对措施，如办好社会慈善事业、重塑道德标准、反映社会的需要及保证人权，并培养社会的人才等。目前，各教会所面临的重大难题即是解决教牧人员的短缺问题。90年代初开始的“主后二千福音运动”已在香港基督教界广泛展开，这是由“华福”组织的一个大型福音运动，计划除将香港的基督教会由目前的900多家增加到2,000家外，还要在未来几年内促进港、九、新界的21个区教会积极合作、推动牧灵更新，并且将“主后二千福音运动”、普世差传、关怀中国三方面统筹计划，而“华福”香港区委会、“主后二千福音运动”、教会更新运动、香港差传联合会等机构将联合推动香港的福音事工，准备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资料研究中心。迹象表明，香港各教会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已出现联合的趋势。

注释：

1. 参见《宗教工作基础知识》，第516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91年。
2. 《第四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参考资料》，第77页，（香港）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1991年7月。
3. 同上。
4. 《当代华人教会》第二册（香港、澳门），1986年6月出版，第71页。
5. 同上，第72页。

第五章

伊斯兰教

一、历史与现状

香港的伊斯兰教最初是从东南亚各国传入的，这大概是由于香港的地理位置所决定，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即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那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在香港停泊，船上就有不少印度籍的穆斯林商人和海员，他们即是首批踏上香港这个岛屿的穆斯林。到1830年（道光十年）4月，英国再次派遣六艘汽船强行在港停泊，觊觎这个天然良港，船上大部分的海员是在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和孟加拉等地招募的穆斯林。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就定居在这里，其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也留传下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香港被割让，从此，这个岛屿逐渐演变成英国在远东的重要港口。香港的伊斯兰教自此也有了发展，其穆斯林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外籍穆斯林，包括三部分：首先是英国及其原殖民地的一些穆斯林海员，并逐渐在如今的“摩罗庙”一带形成聚居区，按照教法和教规在港过宗教生活；其次是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士兵，多为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殖民地招来，在港长期驻

扎,有些还把家眷从原籍接来定居,每天礼拜、履行宗教功课,还修建了清真寺;再者是被香港当地人称为“摩罗”的穆斯林,他们大多来自南亚、东南亚,香港开埠后来此谋生,以当警察、守门人或小商人为生,并携家带口在港定居,逐渐形成以外籍穆斯林为主的聚居地。1896年,由香港外籍穆斯林集资在九龙丰岛尖沙嘴弥敦道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并附有一个伊斯兰中心,成为在港的外籍穆斯林的活动中心。由于受到港英政府的支持,这些外籍穆斯林与香港上层社会关系密切,在香港政治、经济生活中享有重要地位。随着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穆斯林也相继来港,更使香港的外籍穆斯林社团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并在商界有一定的影响力。香港伊斯兰教的另一大系统是华人穆斯林:鸦片战争后,香港首批华人穆斯林是来自临近地区的广州与肇庆等地的回民,他们大多数是下层群众,在港社会地位低下,与外籍穆斯林并无联系。但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穆斯林社团,1870年还在些利街建了一座清真寺,这是香港最早的清真寺,并兴办了回族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内地尤其是广东的回民大批逃往香港,一时香港清真寺里的回族难民激增。抗战胜利后,香港各大宗教发展迅速,此时从内地又涌入许多回民,他们多来自上海、南京、北京,以经营珠宝和手工艺品为业,这些内地工商界回民的迁入,刺激了港九伊斯兰教的发展,同时也大大加强了香港华人穆斯林社团的势力,建立了自己的伊斯兰教组织,扩大了华人穆斯林的社会影响。50年代初,又有大批内地的阿訇和穆斯林来到香港,使华人穆斯林的人数超过了外籍穆斯林的数目,内地阿訇到清真寺主持教务,也使香港伊斯兰教获得稳步发展。以后,中外穆斯林不断加强教务和各种社会联系,并相互通婚,发展与国际其它地区穆斯林组织的关系。到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潮流,香港穆斯林组织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经常举

办一些伊斯兰教的活动，如 1981 年在香港举行了一次亚太地区的伊斯兰研讨会；1983 年一些伊斯兰复兴主义者还组织了一个“国际伊斯兰服务团”，进行宗教服务，等等。

目前，伊斯兰教在香港虽是六大宗教之一，但人数最少，势力相对其他宗教也较弱。据官方统计，香港 1985 年共有 545 万人，估计穆斯林人数不足 5 万，即不到总人口的 1%，其中华裔穆斯林共约 3 万，占穆斯林总数的 70%，大部分来自广东、广西、上海、南京、北京、云南等地；另有 1 万多为外籍穆斯林，其中有巴基斯坦籍信徒 5,000 多，其余为印度、马来西亚、孟加拉、伊朗、甚至非洲和欧洲的穆斯林；还有外籍穆斯林与华人穆斯林通婚所生的后代，俗称为“土生”人士。香港穆斯林人数虽少，但影响却不小，因教徒中有许多商人，经济实力较强；同时由于穆斯林组织内部比较严密，凝聚力也较大。近十年来，穆斯林的团体开始注重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每年参加香港六大宗教联络小组的各项活动，并开办了 6 所学校，其中中华回教博爱社辖下有 1 所中学、1 所小学和 2 间幼稚园。此外，香港的穆斯林有两处坟场，一是黄泥涌道回教公共坟场，19 世纪时就开始启用，其中原有一清真寺，后因建隧道天桥而拆除，但在爱群道得到补偿的地段，建成爱群道清真寺作为代替。另一处是柴湾回教坟场，于 1963 年 8 月启用。

香港的回教社团和穆斯林与内地的清真寺和穆斯林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友谊和亲缘关系，40 多年来绝大多数的香港回教社团均曾组团访问过内地。近年来，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与内地穆斯林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一方面香港的穆斯林不断组团回内地访问，发展与内地的友好关系，如 1982 年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主席脱维善率团访问内地，受到杨静仁副总理的接见；1985 年香港回教信托基金总会主席扎希亚率团访内地；1987 年包承礼教长应上海伊斯兰教协会的邀请访问了上海、南京、扬州等地；1988 年香港

伊斯兰教各团体负责人访问了北京等地。另一方面，内地的伊斯兰教组织和政府官员也应邀回访了香港，加强了香港与内地的友好关系。

香港的穆斯林组织除与内地保持亲密关系外，还与世界各大穆斯林团体关系密切，尤其是与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伊斯兰组织及太平洋地区的伊斯兰议会，另外，与世伊盟等西亚各国的伊斯兰组织也经常往来。

二、主要的清真寺

香港主要有五座清真寺：

1. 些利街清真寺

历史最悠久，创建于 1870 年，1915 年重建，位于港岛中环些利街，内部有养老院、孤儿院、洗澡更衣处和做小净的水房等设施。该寺的现任伊玛目是张广义。

2. 九龙清真寺

位于九龙弥敦道上的“黄金地带”。创建于 1896 年，1902 年重修，但原寺由于常年失修及穆斯林人数的增长，原有的规模已显狭小，需要扩建。1980 年香港穆斯林筹得巨资对该寺重新扩建，历时 4 年，于 1984 年落成，并举办了盛大的“九龙清真寺正式开幕圣纪庆祝活动”，据说这座清真寺是目前东南亚一带最雄伟的清真寺。该寺占地面积为 1,500 平方米，楼高 4 层，顶部是桃形大圆球状，另有四座尖塔，大殿的拱门均以大理石筑成，为典型的阿拉伯风格；内部设备完善，设有大礼拜堂、男女礼拜殿，可供 2,000 多人同时礼拜。“伊斯兰中心”也设在寺内，经常举办教务活动。现任的伊玛目为巴籍戴益普教长。

3. 爱群道清真寺

全名为“艾马尔清真寺暨伊斯兰中心”，于 1981 年 9 月落成启用，大厦为八层建筑，清真寺只有一高尖塔，没有圆顶。内部设施包括聚会厅、会议厅、餐厅、医疗室、青年活动中心、接待室、以及办公厅等，香港伊斯兰联会的办公厅也设在此处。该寺现任伊玛目为包承礼教长。

4. 柴湾清真寺

位于柴湾回教坟场之内，建寺的目的是为方便前往扫墓的穆斯林在该处礼拜，无专职的阿訇。

5. 赤柱清真寺

位于港岛南部的赤柱半岛，主要是供驻守在此地的外籍穆斯林军警礼拜之用，无阿訇。

除以上五座清真寺外，一些社团、学校及军营里也设有礼拜殿，主要有中华回教博爱社礼拜殿、伊斯兰英文中学礼拜殿、博爱社小学礼拜殿、跑马地回教坟场礼拜殿（后拆迁到爱群道）、达吾德·布哈里协会礼拜殿及粉岭军营礼拜殿等。

三、主要组织

由于香港穆斯林的国籍及语言的不同，分别组成了不同的伊斯兰教组织，展开各自的宗教生活及社会活动，但彼此之间有合作关系，人员与活动也有交叉。主要有以下 11 个组织：

1. 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 (The Chinese Muslim Cultural & Fraternal Association)

这是香港华裔穆斯林成立最早、势力最强的组织，早在 1918 年就获香港政府批准立案注册，1927 年正式以“中华回教博爱社”的名字登记，最初的社址位于湾仔道 255 号 2 楼，第一届会长为金逸卿。日本占领香港时，博爱社的活动受到很大影响，并临时改作收

容所,忙于救济难民。1950年脱维善先生担任了该社的主席,并在1951年改建成四层楼的新厦。现社址位于湾仔陈东里7号。博爱社除致力于宗教事务外,积极推广文教及社会福利事业,附属有一小礼堂,两所幼稚园,中、小学各一间,中学据说是东南亚唯一的伊斯兰英文中学。半个多世纪以来,博爱社最有成就的就是办教育,前40年是办小学教育,从70年代开始增办中学教育,办学的历史几乎从创社的那一天就开始了,起初办经书小学,后有义学,再到完全小学。1970年又创办了一间伊斯兰英文中学,由脱维善主席亲自筹办。1970年9月1日,这所中学正式开学,校舍楼高十层,课室有18间,可容纳学生近千人,并设有礼堂、饭堂、影音室、图书馆、理化生物地理室自修室、球场等。日前,这所中学在香港乃至东南亚穆斯林中间已颇有名气。进入本世纪80年代,该组织又分别于1982年和1989年创立了屯门友爱邨的伊斯兰幼稚园及青衣长安邨的伊斯兰教博爱幼稚园,为香港的穆斯林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博爱社还负责与国内外有关组织的联络与沟通,每年由会员推选15名执委,再由执委选举主席,连选连任,现任主席为哈耀恩。

2. 香港中国回教协会(Hong Kong Chinese Islamic Federation)

该组织是另一大华人穆斯林组织。1938年自崇禧在内地成立“回教救国协会”的同时,亦在香港设立了分会,当时叫做“香港中国回教文化研究会”。抗战胜利后,在长老白洁之、脱维英等人的筹备下,于1949年重新登记,正式改名为“香港中国回教协会”,在香港还参加过“反英抗暴”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协会即提出“爱国爱教”,一直与大陆保持友好的密切关系,不断组团回内地参观访问,还捐赠财物给内地,并邀请内地的穆斯林访问香港,以增进双方的友谊。该会有百余名会员,主要由中小商人、知识分子组成,与博爱社关系较紧密,其会员可自由参加双方的组

织。协会还负责出版不定期刊物《回民通讯》，宣传教义，沟通教内外的信息。现任协会主席为白建中，名誉会长沐成芳。

3. 香港回教妇女会(The Islamic Women's Association)

位于香港湾仔宝灵顿道八号宝灵大厦 5 楼 A 座，附属于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1953 年成立，会员包括不同种族的穆斯林妇女，除与其他伊斯兰教组织合作举办宗教活动外，还参与社会服务，如经常举办康乐性的武术、舞蹈训练班。其骨干多为香港穆斯林名流的主妇，每届主席轮换。现任主席是马蝶文女士。

4. 香港伊斯兰教青年会(The Islamic Youth Association)

由华人穆斯林主办，1973 年成立，会址设在爱群道清真寺，经常举办由不同种族的穆斯林参加的宗教学术讲座，并设立服务奖，奖励穆斯林中热心服务信仰的义工；还曾负责在港召开的亚太地区或国际伊斯兰研讨会及夏令营的筹划工作，如 1977 年该会在香港召开了东南亚回教少数民族会议，出版季刊《力行》。现任会长萨成显，名誉会长沐成芳，名誉顾问为张广义阿訇。

5. 香港回教信托基金总会 (Incorporated Trustees of the Islamic Community Fund of Hong Kong)

成立于 1849 年，历史最悠久，其成员多为印、巴穆斯林或香港土生的印巴穆斯林的后裔，是香港势力最大的穆斯林组织，自称领受了香港政府委任的“法人”资格，负责香港所有清真寺和穆斯林坟场的建筑、行政、管理和维修事宜。信托基金总会设有一个委员会，由它联络的四个伊斯兰教组织即香港伊斯兰联合会、香港巴基斯坦协会、香港印度穆斯林协会及达会协会（也称达吾德·布哈里协会）选出 5 名代表组成，现任主席裴祺。其主要资金由伊斯兰联合会提供。

6. 香港伊斯兰联合会(Islamic Union of Hong Kong)

20 世纪初成立，由从印度次大陆及马来西亚等地来港经商或

工作的穆斯林创办，它是香港穆斯林大商业、企业资本家组成的有数千人的联谊性组织，会员包括印度、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土生及其他国籍的穆斯林。该会还是一个机构完整、基金雄厚的经济实体，内设投资委员会、宣教会（负责出版《古兰经》、《伊斯兰展望》杂志等教务）、福利委员会，还设有多项奖金及教育慈善基金，组织朝觐、选派穆斯林青年去到国外进修。1981年后，受信托基金委员会委托，管理林士德伊斯兰中心和回教坟场，还办有一间回教老人院。其辖下的马达五图书馆是香港储藏伊斯兰教书籍最多的地方。其成员为外籍或土生的穆斯林，现任主席由裴祺先生兼任。名誉会长是林世德先生。

7. 香港巴基斯坦协会 (The Pakistan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于 1950 年成立，这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后由居港的巴籍穆斯林发起成立的组织。据称，目前已有会员近 1 万，还设有一俱乐部。会长是尼曼里，他在香港工程局任工程师。

8. 香港印度穆斯林协会 (Indian Muslim Association)

19 世纪末，由随英军前来香港的印籍穆斯林士兵、商人及文职人员发起，于 1924 年正式成立，目前有会员约 1,000 人，组织较松散，主要以九龙清真寺为活动中心。

9. 香港达吾德·布哈里协会 (Dawoodi Bohra Association, 又称“达会协会”)

主要是香港穆斯林什叶派中伊斯梅利运动的成员，大多属伊朗和巴基斯坦籍的商人及其雇员，是一商业性组织。该会的历史可追溯到 1841 年，其商人首次踏进香港，1842 年开始以轮渡服务为业，至今发展到有约 50 个家庭、成员达 250 人的规模，并有自己的礼拜场所，但很少对外活动。

10. 香港国际伊斯兰教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Islamic So-

ciety)

这是一个由不同国籍穆斯林在本世纪 70 年代末发起组织的，中华回教博爱社也参与创办了该组织。平素活动较少，每年举办一些国际宗教活动，如邀请一些国际伊斯兰教著名学者来香港讲演等。另外，该组织还起到联络工商界穆斯林参加学术会议的作用。主席是脱维善先生。

11. 国际伊斯兰教服务团

1983年成立，是一些伊斯兰教复兴主义者组织的，热衷于弘教事业，兴办教育，进行宗教服务等活动，如办有教义讲习班、经文班，平时义务为教徒的红白事进行服务。

四、主要人物

包承礼 原跑马地回教坟场礼拜殿的教长。解放前夕在北京成达师范学校学习阿文，1950年到香港，曾在台湾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工作多年，后又去美国，60年代回到香港，在伊斯兰英文中学教授阿文及教义多年。爱群道伊斯兰中心建成后，他在该礼拜殿内做教长。1987年曾率领香港穆斯林代表团访问上海、北京等地，加深了香港与内地穆斯林之间的了解。

哈耀恩 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的主席。从1976年起任博爱社校董会的主席兼校监，曾多次访问内地，并邀请内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到香港访问，促进了两地穆斯林的友谊，支持内地的改革与开放。

张广义 香港最古老的清真寺些利街清真寺的阿訇，广东省广州市人。他自称是香港的总教长，也是个商人，只在主麻聚礼、大节日会礼时才回寺领拜，平时应邀也到人家里念经。不过据称他是香港政府唯一经注册的阿訇，历届港督都会见过他，并与台湾

的伊斯兰教界关系密切，因此他在香港伊斯兰教界有一定的影响力。1986年他曾应广州市伊协的邀请访问了内地，著有《回教真理》。

白建中 香港“中国回教协会”的主席，也是香港新华国货公司的经理，曾多次回内地参观访问。

脱维善 前任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的主席，并任香港国际伊斯兰协会的主席。他原籍广东番禺，1917年出生。他从1950年起就开始担任主席一职，在博爱社新社址落成后曾离职数年，但为筹办伊斯兰中学而再度出任社主席。1968年筹办香港第一间回教中学时，他还担任了建校筹委会的委员，经多方联络与努力，终于在1970年建成伊斯兰英文中学，张维善先生任第一届校董会主席，以后又连选连任，他还是伊斯兰小学及幼稚园的董事会主席，为香港穆斯林培养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他还是香港六大宗教联络组的负责人之一。他本人是商人，在香港开设了服务公司、地毯公司等商号，并经常在报章、电台和电视台发表施政建议，担任过香港公民协会香港地区的主席、香港基本法咨讯委员会的委员，也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在香港伊斯兰教界人士中有较高的声望。他曾率领香港穆斯林代表团回内地访问和国庆观礼。

刘有信 博爱社小学礼拜殿的阿訇，广东肇庆人。解放初曾在广州濠畔寺当阿訇，1951年到香港，并任香港回教博爱社的小学校长，著有一些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编译了《伊斯兰教的信仰》等。

裴祺 英国人，香港伊斯兰联合会主席，同时兼任香港伊斯兰信托基金会的主席。他的妻子是一华人穆斯林，他本人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现已退休。据称，他是在其妻的影响下皈信了伊斯兰教。

本章主要参考资料:

1. 《香港的宗教》，香港圣神研究中心及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处出版，1988年9月。
2. 香港《香港中国回教协会四十年特刊》。
3. 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金禧纪念特刊》。

第六章

其他宗教

一、孔 教

孔教也称儒教，尊孔子为教主，推崇儒家思想，其教义则以“仁”为中心，被称为人道宗教。在香港孔教是六大宗教之一，但信徒的人数无法统计，因为它将推崇儒家思想的人均视为儒教徒，主要集中在香港上环的文咸东街一带，这一带的商人多为孔教信徒，常集资庆祝每年的孔圣诞。

因香港中国传统宗教的寺庙大多为儒释道三教合一，所以，孔教的寺庙数量也难以统计。最著名的是黄大仙祠，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三教合一的寺庙。黄大仙祠位于九龙啬色园，创办于1921年，原为一私家修道场所，始称“赤松仙馆”。据说它是由广州芳村和黄大仙祠分立出来，1915年因中国内地军阀混战，一个叫梁仁生的人将黄大仙神像及一些法签迁到香港，先后在中环、湾仔设坛供奉，到1921年才搬到现址。不过，黄大仙祠直到1956年才对公众开放，1965年注册为一慈善团体。园内大殿供奉赤松黄大仙师，三圣堂供观音、关帝、吕祖，麟阁奉孔子及其弟子。传说黄人仙原名黄初平，公元328年出生在浙江金华县一个贫穷的家庭，8岁时就开始

在赤松山上牧羊，15岁遇一仙翁授以静修和提炼草药之术，以后修成神仙为村民们医病。为纪念他的功德，在金华修建一座道堂，香火一直很旺。宋朝的皇帝还赐书“有求必应”，自此，黄大仙祠更成为中国江南最大的寺庙之一。但金华的黄大仙祠在1957年毁于水灾，仅剩一口古钟。而香港的黄大仙祠不仅建筑规模大，香火旺，仅香火钱据说每年就达八位数。这里环境优美，正殿横额上有“赤松黄大仙祠”五字行书，据称为吕洞宾的“降笔”。另外，作为慈善团体，黄大仙祠还办有中西医药局，每年有20万人次受惠；1969年开办了第一所中学，至今有3间中学、3间小学及1间幼稚园，可容纳学生约8,000人，14所社会服务单位如老人院舍、中心等；新近设立了一所职业训练学校，还有一个附观察台天文中心，以帮助青少年观察大自然和宇宙的秘密。黄大仙祠实行董事制，园务由5个小组分别处理，即财务及发展小组、人事及行政小组、教育小组、医药及社会服务小组、宗教小组。园内高台水榭，景色宜人，1991年将建成的花园对公众开放，这里成为香港一大名胜。因其影响深远，黄大仙这一名称被命名为港岛的一个区名。

香港有四个主要的孔教组织：孔圣会、中华圣教总会、孔圣堂、孔教学院，均有数十年的历史。这些孔教团体互相之间联系密切，亦曾联合庆祝孔子圣诞，但没有一个最高的代表机构。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和四月初二举办孔子和孟子诞辰的盛大庆典，并参加了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座谈会。孔教学院是香港孔教组织中最活跃的一个，它由陈重远博士于1930年创立，以兴学育才、弘扬孔道为目的。设有董事会，选出院长、副院长各一人。首届院长是黄允畋先生，副院长陈钦先生；有常务董事若干人，设主席、副主席，首任主席是朱梦昱教授，副主席是顾思聪先生。目前，孔教学院开办的学校包括政府资助的孔教大成中学、孔教大成小学、三乐周勿桅学校，及大成夜中学，共容纳学生4,000人。另外，孔教学院还举

办宣道月会，作专题演讲，周日还举办公开讲座，并出版孔学书籍及专刊，在《星岛晚报》还按月出版孔学专刊，以弘扬孔教。1974年，孔教学院代表孔教界加入了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座谈会，定期参加六大宗教的思想交谈会等活动。其经费靠各董事捐献，但与外界的联系不多。

孔教组织在香港的主要活动是经办教育，共有四间学校，均为孔教学院所经办。其次，孔教团体还要弘扬孔道及儒家思想，吸引人们信教。香港某些教育机构还以孔圣诞日为教师节，一般是公历9月28日，并举行庆祝活动。近年来，孔教界人士与内地之间的往来大大加强，尤其是孔教学院，与内地的关系较为密切。

主要代表人物：

黄允畋 全国政协委员，啬色园(黄大仙祠)的主席、孔教学院的监督，他同时兼任香港佛教联合会副会长，还是“世界佛教友谊总会”的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的校董、“佛教黄允畋中学”的校监，还曾第一任孔教学院的院长。除忙于宗教事务外，他还经营商业，是香港本德置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很关心香港的政治与发展，被选为黄大仙区的议会议员。因他对香港社会的贡献而被封为“太平绅士”。

汤恩佳 现任孔教学院的院长，也是商人。他与内地的关系密切，并被选为广东省的政协委员。

二、印 度 教

印度教在香港的历史大概始于鸦片战争前后，英国殖民者割占香港后，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与香港的贸易往来日益增多，有一些印度教徒随商船来香港，其中一部分就定居下来。不过，大批的印度教徒移民香港还是在1947年印巴分制以后，主要是来自巴

基斯坦印度籍信德人。为了迎合教徒信仰上的需要，1952年就在跑马地黄泥涌道建成香港唯一一座印度教庙。随后，马温尼(F. T. Melwani)又创立了“香港印度教协会”(The Hindu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70年代中期，香港有印度教徒7,500多人，到80年代中期大约有8,500名。目前，全港有印度教徒近万名，其中大部分是商人。印度教庙是教徒社会活动及宗教生活的中心，该庙由“香港印度教协会”负责管理，现任主祭是沙尔(Mahesh Shastr)。印度教的祭师要由香港印度教协会委任，他是香港印度教的最高代表，要精通梵文，在他离职期间有一位或两位非正式的祭师代行其位。在印度教庙里开办一间医务所，星期日为患者服务。礼拜在每天上午的11:30—12:30，有唱诗、读经及讲道等内容，教徒在礼拜后还有午餐聚会。

“香港印度教协会”是香港印度教唯一的一个组织，登记为免税的及非商业性的不牟利宗教团体。协会内设一委员会，由15名成员组成，包括主席、副主席及秘书等，另有500多名会员。其经费主要是向每位会员收取年费150港币，另外的部分是捐献。该组织每年选举一次，委员会的主席一职由15位委员中推举出来，任何教徒只要年满21岁就可成为会员。印度教协会还负责开办两个儿童班，每班50人，教授印度文化，以加强他们在异质文化中的生存能力。

在香港，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往来密切，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印度教组织，特别是印度及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也有联系。

三、袄 教

在香港袄教俗称“白头教”，始于19世纪初。那时，主要是作为

商人的祆教信徒到澳门和香港一带经商，有些就定居下来。1842年创立了“港澳白头教慈善基金会”(Zoroastrian Charity Fund of Hong Kong and Macau)，以后又成立了“白头教联合会”(The Parsee Association)，最初的会址设在依利近街49号，后来迁往礼顿道101号，即今天的白头教中心(Zoroastrian Building)所在。

现在，香港的祆教教徒仅有170多人，也有一些教徒与非祆教教徒通婚，但其家眷是不会接纳成为教徒的。因为，祆教不主张转教，只承认五种宗教，除祆教外还有印度教、犹太教、基督信仰和伊斯兰教。祆教在香港只有一位祭师——巴菲祭司(Ervad Rustom Rantom Ranaji Pavri)，他要由白头教联合会来委任，而且必须是祭师出身的人。由于信徒人数较少，教徒的社会影响力不大，其活动仅限于做一些慈善事业，创立了维多利亚银禧基金和一慈善基金，以推动教会的社会福利工作。

目前，“白头教联合会”由五名信托人组成一委员会，他们是祆教信徒中的代表人物，该委员会自给自足，负责支配基金的使用。而白头教中心的经费和慈善工作则由会内的慈善信托基金所提供。祆教教徒在香港商界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如服务于怡和公司及香港汇丰银行的麦化华拉先生(MR. Mithaiwalia)、香港大学重要拓展人之一的摩地爵士(Sir Hormasil Mody)、赞助兴建疗养院的律敦治先生(MR. Ruttonjee)等人。在跑马地还设有一个祆教教徒的坟场。另外，香港还有二条街道是以杰出的祆教信徒的名字来命名的，如摩地道(Mody Road)、旭和道(Kotewall Road)及碧荔道(Bisney Road)，这说明了祆教教徒为香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香港的祆教与印度的祆教组织保持了较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与孟买的祆教教徒，每年都要拿出资金供应印度的祆教团体。

四、巴 哈 伊 教

巴哈伊教是一新兴而独立的宗教，从创立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香港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一商埠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因巴哈伊教鼓励经商，所以巴哈伊教徒在1880年时就曾到达这里，据说还是先知巴布的表亲，他们于1880至1887年居港，是来自伊朗的商人。以后，不断有巴哈伊商人路经香港，渐渐地港人才了解巴哈伊教的教义。

1923年至1938年间香港的华人中间开始有少量的巴哈伊教徒，如任职于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贝志伟、及九龙的刘灿松均是香港巴哈伊教的早期教徒。不过，那时称之为“大同教”，也没有正式的组织，隶属于英国总灵体会。从1953年开始，香港的巴哈伊团体参与了守基·阿芬第所策划的十年传教计划，不断有巴哈伊教徒到香港，如来自美国的贝尼斯·务德女士从1949年起就到香港，服务香港教会40年，1990年初才退休回国；伊朗的希思玛·亚兹兹从1954年就开始定居香港，直到1985年才离开。1956年还发展了三位华人教徒，同年4月21日蕾兹万节时成立了香港第一个巴哈伊行政机构——香港地方灵体会，但当时以“巴海”为名。此时香港共有14名教徒，其中一位爱尔兰裔的美国人被委任为香港第一位洲际顾问助理。从1957年开始，香港的地方灵体会属于巴哈伊东北亚区总灵体会的领导，其中心设在日本的东京。

1958年5月29日，香港的巴哈伊社团注册为宗教团体，首次得到港府的承认。到1965年时，香港共有37位教徒，分布在五个地区。1969年香港的巴哈伊教设立“总行政委员会”，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个体，并购置房产，总行政中心设在九龙尖沙嘴中间道汉口中心C座十一楼第六室。同年的11月28日还获准成为宗教慈善团

体，教徒捐款可免税。1971年时香港已成立了巴哈伊教的三个地方灵体会，即香港地方灵体会、九龙地方灵体会和沙田地方灵体会；教徒共有80多位，次年在大屿山又吸收了30多人入教。

1974年巴哈伊教香港总灵体会成立，并在港府正式注册，成为一非牟利的宗教慈善团体。此时，香港的教徒已达270人，成立了六个地方灵体会，并选出9位委员组成第一届总灵体会。1976年12月在香港召开了巴哈伊教的国际传道大会，近千名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促进了香港巴哈伊教的发展。

80年代初，世界各地的华裔教徒将名称统一为“巴哈伊教”。1988年巴哈伊教会在香港立法局正式登记为一个立案的宗教团体，获得社会的确认。由于巴哈伊教在香港和澳门两地区的发展较为缓慢，两地又相临，原来只成立一个“港澳巴哈伊教总灵体会”。直到1989年，澳门成立了自己的总灵体会才与香港分开，而香港的总灵体会改称为“香港巴哈伊信徒总灵体会”（The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a'is of Hong Kong），地址在香港九龙尖沙嘴中间道汉口中心十一楼C座六室。

自80年代以后，香港的巴哈伊教发展迅速，教徒人数增长很快。到1993年底，香港有地方灵体会22个，有教徒2,500多名¹。由地方灵体会每年选出38名区域代表，从中推选出9名总灵体会的成员。

巴哈伊教目前在香港岛铜锣湾区有一巴哈伊会堂，并将布置为巴哈伊结婚礼堂及重要的活动中心，还要在新界大埔设一中心，并计划在南丫岛购置房产建成香港的灵曦堂，作为教徒崇拜的圣地；另外，在深圳的大鹏湾已购置了一块土地，作为巴哈伊的墓地。

随着教徒近年来在香港的成倍增长，巴哈伊教开展了各种社区服务活动，如设立“香港人群服务奖”，以奖励长期不懈地为人类利益而工作的人。由于巴哈伊教一贯重视社会发展及家庭，香港

的巴哈伊社团还组织儿童文化舞蹈表演、母亲节展览、国际书展等,1992年9月17日还成立了“巴哈伊专业人士联谊会”,以促进专业人士间的交流。

香港的巴哈伊信徒虽然占其总人数的比例很少,但鉴于香港的地理位置和它的重要性,巴哈伊教的国际组织及机构都将其视为传教的重要基地,由此辐射到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所以,巴哈伊国际社团(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香港设立一新闻处,位于香港九龙尖沙嘴中间道1号,汉口中心11楼C座6室,负责人是黄元环女士(Rosalie Tran)。该机构主要负责传教、出版和发行巴哈伊教的书籍,如出版季刊《天下一家》,可免费赠阅。另外,香港的巴哈伊教团体近年来广泛联络,广交朋友,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1992年在纪念巴哈伊创始人巴哈欧拉逝世一百周年时于香港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向人们宣传巴哈伊教的教义及信条,还派代表到美国纽约参加了全球的巴哈伊大会,另派19名代表前往以色列参加纪念仪式。虽然在内地没有巴哈伊教,但香港的巴哈伊信徒以个人旅游等身份经常来内地,还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历届国际图书展览,努力将巴哈伊教的著作介绍给内地的学者。

五、犹太教

150多年前,香港就有犹太人定居。1850年英国女皇将香港跑马地一块墓地拨给犹太人,他们因此得以立足香港,这即是香港犹太教的肇始。

随着香港的开发与经济的发展,许多经商的犹太人来到这里,为了解决他们宗教生活的需要,1901年香港建立了第一座犹太教堂,这是当时亚洲最宏伟的建筑之一。在此之前,香港犹太人的宗

教活动都是在各个临时会所里举行的。俄国十月革命时，移居香港的犹太人大增；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在欧洲掀起屠杀犹太人的高潮后，大批的犹太人逃离，其中有许多是经香港到美洲、澳洲，甚至转往中国内地，虽然他们大多是过客，但把香港作为一个自由的中转站，并可以进行商业和贸易活动。1947年在犹太教堂原址上重建了犹太俱乐部，开展各种宗教活动，成为香港犹太人社会活动的中心。

目前，香港大约有 300 个犹太家庭，1,000 多人，分属近 20 个国籍，其中有不少是久居香港者，他们是香港犹太人社团的核心。现任拉比巴以信(Heyer Bensoussan)，原籍美国，由以色列的总拉比委任。犹太会堂名叫莉亚会堂(Synagogue Ohelleah)，座落在香港罗便臣道七十号。香港的犹太教徒大多属正统派(Orthodox)，也有改革派(Reform Jews)的教徒，还有其他派别的。但作为同一个民族，香港的犹太人能团结融洽，和睦共处，礼拜时均采用希伯来文。香港的犹太人大多属工商界，生活较富裕，却很少参与香港的社会活动。只在犹太教会堂内部设有犹太康乐会，组织一些娱乐活动。香港的犹太人还设立一组织，名“香港犹太历史学会”。该组织的发起人是香港犹太康乐会的会员伊兰伯格先生（是一家荷兰银行的总经理），他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机构，以便对香港犹太人及中国历史上的犹太人进行研究，并出版一些专题性的文章。在 1984 年 1 月 9 日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后出版了一本介绍香港犹太人社会的小册子。该组织的执行委员是陈瑞璋先生，他是研究中国犹太人的专家，曾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发表有关“中国开封的犹太人”的演说。

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东南亚各国的犹太教徒在互通信息时多以香港为重要的据点。另外，香港的犹太教与澳大利亚的犹太教有密切联系。

六、锡 克 教

锡克教在香港的历史较长，19世纪中叶，就有锡克教徒从印度的旁遮普邦来到香港，充当警察或到港府任公务员，有的投身于商界。后来，因教徒不断增加，遂于1901年在湾仔皇后大道东建成一座锡克庙，以满足教徒的宗教生活之需。

目前，香港的锡克教徒约有5,000多人。锡克庙是教徒社会生活的中心，可容纳200人食宿，任何信仰的旅客皆可在这里免费用餐或短期居留。庙内的主祭由13人的小组委任，并要求主祭必须是旁遮普望族出身，能充分理解锡克教的教义，还要能懂得乐理和弹奏乐器，以便主持祭礼。而这小组的成员要由600人参加投票选出。另外，还设有副主祭，可直接由庙里的小组选出。

锡克庙位于香港皇后大道东371号，其中设有图书馆，收藏了许多有关锡克教的书籍；其次还在庙内办有一间幼儿学校，主要收容4至6岁的印度籍的学龄前儿童。因锡克教比较重视妇女问题，香港的锡克庙里还专设一小组，负责处理妇女事务。

在国际联系方面，香港的锡克教庙与印度旁遮普邦的总部金庙保持密切关系。同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锡克教徒如英、美、法、日、德、伊朗和中东等也有联系。

注释：

1. 参见《香港的宗教》第90页，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处编辑，1988年9月。

第七章

新兴宗教

香港是一个多宗教的地区，因受东西方文化的交互影响，所以，宗教的种类比较复杂，既有传统的宗教，近年来又有一些新兴宗教传入，纷纷创立属会。所谓“新兴宗教”是指19世纪中叶后产生的新的宗教派别，往往带有反传统宗教的特色，却又标榜自身的教义为正统，并格外崇拜其教主¹。它们多以年轻人作为传教对象，信徒中中学生占相当比例，兼之多数新兴宗教有反传统的倾向，所以常遭到正统宗教的抨击，同时也遭到社会舆论的非议。因为这类宗教往往聚会十分频繁，一星期每天都组织有不同形式的聚会，并且聚会的方式常带有神秘色彩，已引起官方教会的广泛关注。不过，新兴宗教自6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并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加入，到70年代中香港已有11万新兴宗教的信徒，占当时人口的2.8%，到80年代中人数达到了14万多，所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为3.2%。

这些新兴宗教中有一类是源于基督教的教会，主要来自菲律宾、拉丁美洲及美国等地，在传入香港后，常标榜自己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派。如有的教派以吸收读师范的学生为主，待日后其教徒再影响他们的学生。有的教会租用了修顿中心为崇拜的地方，以大专学生为传教对象，吸纳校园内非基督徒加入该教会。这些教

会独立性强，不与其他教会接触，并规定教徒须参加每次的聚会，认为教会的权力大于一切，带有强烈的权威主义特色。另外，香港还有被称为“邪教”的新兴教派传入，如“天父的儿女”，传统宗教抨击它违背了社会伦理与道德法律，已遭当局的取缔。为避免人们误入歧途，香港的天主教会还设立了一个“关注邪教小组”，组织青年人进行专门的讨论，以提高他们“辨别善恶”的能力。

以下介绍几种香港现存的新兴宗教。

一、国际克里希那知觉协会

该宗教的英文全称为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于1965年正式在美国创立，创始人是 A. C. 巴帝史丹达·史华米·巴布巴，他被称为世尊。该教认为 KRISHNA 是神的知觉，同时又是永恒、全知、全能而无处不在。其主要经典是《博伽梵歌原本》及《圣典博伽瓦谭》，这些均属印度教的经典。所以，此教派来源于印度教。其教义又有所创新，宣扬要培养灵性科学，以获得纯粹、永恒及快乐的知觉，相信人是永恒的灵魂——神 (Krishna)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人类皆兄弟。该教派的信徒很早就起床沐浴，早上 5 点在庙里聚会，7 点 15 分谨见神像，要守四条戒律，即戒肉、戒赌、戒麻醉品、戒婚外性行为。总部设在美国的洛杉矶，其协会则分布在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庙宇、灵修院、农庄、文化中心及学校等。

该教派于 1980 年 12 月以 ISKCON 的名称在香港正式注册登记为一宗教慈善团体。目前在香港建有一所庙宇，设有主持一人、副主持一人，还有一名干事，有修持者和修持女 23 名，教徒大约有 1 万名，多为印度人和华人，来自中层社会及知识分子家庭。信徒要捐献其收入的一半给教会，用来出版书籍、派发素食、修缮庙宇等。

主要的庆典是在 7 月，纪念神的显现，信徒要在这天禁食，并进行娱乐活动。

二、天德圣会(Heavenly Virtue Holy Church)

1920 年由一个中国佛教徒创立于云南，直到 70 年代以后才广为传播。该教试图将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融合为一，注重社会的道德与伦理的作用，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的社会秩序。它用这种宇宙论的历史观发展成为一种经过“重新修缮”的民间宗教的形式。目前在香港已成为一种广泛的、综合性的新宗教运动，自称在香港已有 10 万名信徒。

三、创价学会

这是来自日本的一种新兴宗教，属佛教系统，它也是日本目前最人的一支新兴教派。1964 年从日本传入香港，并发展很快。1970 年时香港有 3,000 名教徒，其中有 500 名为日本人，其余的 2,500 名为华人；到 1975 年时，该教派的信徒已猛增到 25,500 人²。

四、世界红卍字会(香港分会)

1921 年 2 月 9 日在中国内地山东的济南新街正式开馆，次年在北京登记注册，实际上是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儒教相结合而成的、新兴的中国民间宗教。以后又分成五院：统院、坛院、经院、坐院及慈院，不久又成立了宣院，统院管辖道院的全盘道务；坐院即道场；坛院负责祭祀、坛训等；经院负责经典的印刷及保管；慈院执掌慈善事业；宣院负责布教宣传。实际上，该组织在当

时是由道院乩坛发展而来,刘绍基、洪士陶、周德锡等人还著有《滨坛纪要》一书,在刘绍基家中最早成立了箕坛,并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以北京的北平道院为总院,其下有 5 大主院,中央主院设在天津,东南主院在南京、西南主院设在武昌、西北主院设在张家口、东北主院设在新京(长春)。在总院之上另有宗坛与母坛,宗坛设在道院发祥地滨县,母院就是济南的道院,称为世界道慈母院。

1936年在新加坡开始以“南洋总主院”(道院)在当地政府注册,而使用“世界红卍字会”的名称至今则已有 58 年的历史,其下还有一个分会。而世界其它地区,如马来西亚,在 1949 年就已登记注册,还设有 5 个分会;韩国则有 3 个分会;英国、香港及泰国各一个分会;加拿大有两个分会。

其宗旨为“宣扬大道,劝世人明心见性,内以修己,外以度人”,还提倡“融合五教于一炉,以促进世界和平”。

大陆解放后,该组织将总院迁到香港。目前,香港只设一分会,开有两间诊所。

注释:

1. 参见《世界宗教总览》(东方出版社,1993年12月)第 123 页有关新兴宗教的介绍。目前,学术界对新兴宗教的概念尚未形成定论,这里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
2. 参见英文版 1982 年的《基督教百科全书》,第 361 页有关香港新兴宗教的介绍。

下 篇
澳 门 宗 教

总 论

一、概 况

澳门位于珠江三角洲南部，包括澳门半岛和凼仔、路环两岛，总面积约 18 平方公里，人口近 60 万，其中大部分为大陆移民。

澳门宗教历史悠久，并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主要有中国本土的佛教、道教及一些民间宗教，还有从外国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和巴哈伊教等。在 1535 年葡萄牙人来澳门以前，澳门就有妈阁庙，崇拜妈祖。相传英文澳门称 Macou(音妈角)，即因妈祖庙而得名，天主教在澳门的历史也有 400 多年，而基督教则在上世纪初才传入。居民中大部分信仰佛教或道教。据 1981 年人口普查的资料统计，在年龄超过 5 岁以上的人口中，信仰天主教的为 7.4%，信仰基督教新教的为 1.3%，其他为信仰佛教、道教及民间宗教者，或是无宗教信仰者。另外，澳门还有伊斯兰教，历史近数百年，但教徒只一、二百人。还有巴哈伊教，近年来发展很快。

澳门无论“洋教”或“土教”都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其宗教主

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信教的比不信教的多。据 1991 年澳门政府按各人所填的信仰一栏统计,信教人口达 61%,各种宗教组织约 150 个。居民中大部分信仰佛教、道教或民间宗教。

2 宗教成为澳门风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宗教势力较强,社会影响广泛。宗教团体所办的社会慈善机构、学校、医院等在社会中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全面了解澳门宗教,表 1 为转引 1982 年出版的英文版《基督教百科全书》中有关澳门宗教发展的统计表,可供参考。

二、政 教 关 系

就澳门政府来说,在法制上尊重宗教自由,各种宗教只要不违反澳门的法律,就能按其教义和活动能力而生存、发展,因此有的宗教在澳门发展较快,而有的则较慢,甚至正在衰落。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在澳门大部分居民心中打下较深的烙印,并且大多崇奉佛教、道教和儒教,但毕竟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熏陶了数百年,天主教和基督教在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十分突出。所以,澳门可谓融东西方文化为一炉,宗教繁多,教派林立。近年来,澳门政府比较重视宗教的社会功能,如与教会合作办学、办社会福利事业、医院等;1984 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条例》中就包括许多寺观庙堂,如古天主教堂、妈祖庙、康公庙、观音古庙、普济禅院、莲峰庙、大三巴牌坊、哪吒庙、包公庙、凶仔观音庙、路环谭公庙、天后庙、宝血修院及妈阁山。

根据 1987 年 4 月 13 日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我国政府将于 1999 年 12 月 20 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届时将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我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

中明确指出，澳门居民有宗教和信仰的自由。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其中第三十四条规定：“澳门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开传教和举行、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第一百二十八条详细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不干预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不干预宗教组织和教徒同澳门以外地区的宗教组织和教徒保持及发展关系，不限制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没有抵触的宗教活动。宗教组织可依法开办宗教院校和其他学校、医院和福利机构以及提供其他社会服务。宗教组织开办的学校可以继续提供宗教教育，包括开设宗教课程。宗教组织依法享有财产的取得、使用、处置、继承以及接受捐献的权利。宗教组织在财产方面的原有权益依法受到保护。”澳门的宗教组织与大陆其他地区宗教组织的关系应以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为基础。

澳门的居民在宗教问题上将来可以依照基本法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也受到法律的约束。基本法的颁布无疑对安定澳门宗教界人士的心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其次也规范了澳门各宗教在将来的发展架构。

第一章

中国传统宗教

澳门的居民大多信奉中国的传统宗教，主要包括佛教、道教、儒教及一些民间宗教，并且往往儒释道三教混杂，信徒人数也难以统计，一般将烧香拜神的人均视为佛教徒，因此，“佛教徒”多达数十万人，占人口总数近八成，其中以供奉观音、天后、关公最为普遍。目前，澳门有庙宇40多间，还有数十间的土地庙神舍，其中有妈祖庙、观音堂、莲峰庙三大古刹，历史约有四、五百年。妈祖阁在1988年7月举行500周年纪念庆典，又名妈祖庙，由妈祖阁、弘仁殿、正觉禅林和观音阁四部分组成。

一、佛 教

(一)历史与现状

佛教在澳门有500多年的历史。澳门居民信仰佛教的最多，但具体人数无从考究。1970年统计，信佛的人占居民的76.7%，这是一般的调查，凡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均视为佛教徒，这其中包括了道教、儒教及一些民间宗教信仰者。所以，澳门的庙宇，有不少是将佛家、道家、儒家的菩萨神灵一起供奉的。佛教徒登记的有6

万多,大小庙宇共40多间,僧尼约60余人,现在大多已年老,只做一些日常的杂务和法事,无力参与更多的社会事务。佛教寺院主要有普济禅院(观音堂)、莲峰庙、菩提园、竹林寺、乐山寺、功德林等,除了莲峰庙现暂由普济禅院代管外,其余的寺院均是独立经营,其中功德林为女尼集中地。澳门的佛教界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也从事一些社会慈善工作,如莲峰小学即由莲峰庙开办,普济禅院每年都向社会捐献,近来正拟开办一所中学。此外,澳门各庙的维修大多是靠社会的捐赠。

(二)主要宗派

澳门的佛教主要有禅宗和净土宗,历史都很悠久,尤以禅宗为最盛。40年代广东禅宗大师虚云及50、60年代原南华寺的高僧观本法师先后到过澳门弘法。普济禅院(俗称观音堂)就是澳门甚至中国南方少数至今保存得极好的禅宗寺院之一。其次,净土宗在澳门也是重要的一支,最初是由智圆法师传入的。1960年,智圆法师购进位于凼仔西沙的菩提禅院,把这间有近百年历史的寺院加以扩建,使之成为现今澳门佛教净土宗最重要的道场。此外,日本的日莲正宗、密宗、缅甸和泰国的小乘佛教也有流传。日莲正宗是本世纪60年代传入澳门的,经大力推广,得以迅速发展,并于1989年12月设置会址,成立了日莲正宗佛教会,在居澳的日侨间有一定的影响力。1992年,日莲宗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获得澳门大学颁授的荣誉博士学位,这也可视为日莲宗在澳门获得肯定的象征。泰国的四面佛信仰80年代开始在澳门兴起,目前在凼仔赛马会门前广场、凼仔菩提园和新口岸国际中心内都各塑了一座四面佛像,供人参拜。四面佛信仰的流行适应了澳门的泰籍人士逐渐增多的要求,但也吸引了不少华人。密宗是抗战时期传入的,当时在大三巴设有梅花精舍,传授密宗佛法。1992年初成立了“国际联密慈

航会”，创立者是香港以密宗秘法闻名的陈果济。该会在澳门设有会址，经常举办法事活动，并曾于1992年6月邀请了密宗白教之督般宁波本到澳门说法，这可谓澳门密宗佛教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二、民间宗教信仰

澳门的民间信仰往往儒释道三教合一，地方色彩浓厚，一般将烧香拜神者皆视为佛教徒，但又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没有明显的界线。据称道教在3世纪时就传到了澳门。因澳门原属香山县（即广东中山），而道教在宋朝时就已广泛传播于香山地区，并建有规模宏伟的道观，崇拜三清。而经考证，澳门的道教至少可追溯到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那时就建有妈祖庙，据今已有500多年，以后又有天后圣母殿（建成于1792年前）。据粗略统计，澳门自明以来共有8处拜天后的庙宇，历史多在500年左右。因此，从总体上说澳门民间信仰其实是一个属于道教系统的妈祖信仰圈，传统的道教目前只限于超度、拜忏，一些民间信仰如拜妈祖、土地等神舍也可归在道教之列。澳门民间主要是供奉观音、天后和关公，妈祖庙、观音庙及土地神舍遍布于澳门，约有几十间之多。澳门岛、路环和凼仔均有供奉观音的庙宇，如木澳的观音古庙、路环的观音古庙、观音庙、凼仔的观音岩庙、观音堂等。澳门还有一独特信仰，即崇拜海神三婆神，1845年在凼仔建有三婆庙，现已废；另外还供朱大仙，据说可以保护水上人不受海贼的伤害。一般的居民还信奉其它一些道教神灵，如土地、财帛星灵、鲁班、洪圣爷，有的则拜哪吒、女娲、包公、谭仙等。1883年建成路环九澳三圣宫，供奉洪圣爷神，后加上关帝与谭仙。1974年成立“澳门儒释道教联合会”，办有凼考思墓园。历史上澳门也有先天道传播，主张三教合一，也流传过一贯道或称“天道”。另外，著名的妈祖阁早已成澳

门的象征,而莲峰庙、康公庙、包公庙、沙梨头土地庙等也都被澳门政府列为重点保护的文物建筑之列。

三、主要寺庙

1. 观音堂

观音堂又称普济禅院,位于美副将大马路东端,邻近有望厦山,是澳门三大禅院中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占地广阔、建筑宏伟的一间。这座寺庙建于明末天启年间,1623年投入使用,因明代崇奉观音菩萨,所以原名“观音堂”。创院祖师是循智大师,距今约有360多年。寺庙建筑呈中国古刹之特色,共分三座大殿,逐步拾级而上,首座是大雄宝殿、次殿为长寿佛殿、后殿是正殿观音殿,院后是一幽静的花园。大雄宝殿庄严宏伟,供奉三尊三宝佛像,殿旁悬一铜钟,据称已有350年的历史。次殿供长寿佛,一尊贴金佛像置于殿后,象征佛教普渡众生的精神。主殿供观音,为樟木雕塑,两旁排列有十八罗汉,其中位于左前方的一尊眼睛浮突,胡须卷曲,据称是元朝来中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大雄宝殿的西面列有天后殿、地藏殿、语清室、龙华堂、乐静堂、祖师堂等,东面列有关帝殿、大客堂、檀越堂等。此外还建有报恩堂、妙香堂、斋堂、方丈室、藏经楼等。观音殿旁有一小庭院,内有一莲花池,中间栽有弯成“寿”字型的盆景。从庭院过一个大厅是寺僧举行法事及超度仪式的场所,仪式进行时有中国传统的箫笛、锣、鼓等乐器伴奏。这里每逢观音诞期或春节、假日,便香活鼎盛,热闹非凡。观音堂闻名遐迩的另一原因是这里曾签署了中美《望厦条约》,就在院落内一侧的花园里,保留了当年的石凳和小亭。该禅院目前只有3个出家人,其他皆为临时过客,现任方丈是释机修法师。机修法师是本澳人,60多岁,于本庙出家,在广东顶湖山庆云

寺受的戒。他曾 4 次到大陆,还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在赴京参加中葡澳门问题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仪式的 49 人观礼团中,他是澳门佛教界的唯一代表,在澳门佛教界也是较具影响力的人物。因观音堂座落在澳门半岛,环境优美,所以这里还是澳门的名胜。

2. 菩提园

位于凼仔离岛,虽然是凼仔的最大寺庙,但相对大陆的佛寺规模较小,依山势建筑,殿堂均呈阶梯式排列。此庙的历史仅有几十年。却是澳门佛教净土宗的最重要的道场。在大雄宝殿供奉有全澳门最大的佛像,是一盘膝青铜佛像。这尊佛像身高 5 米,连同莲花座及基座高达 7 米,重 5 吨半,香港大屿山的天坛大佛就是以这尊佛像为模、按比例放大的。此外,庭院内还有一尊泰国四面佛像。庙内开有菜田及斋堂,对外供应时鲜甘美的素菜。该庙主持释智圆老法师已 80 多岁,浙江金华人,来澳门已有 60 多年,现在澳门佛教界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此庙也只有 4 个出家人,且常往来于港澳之间。

3. 妈祖庙(又称妈阁庙)

澳门最古老的名胜古迹之一,也是澳门三大庙宇中最古老的。它位于澳门的东南方,俗称天后庙,建于 1488 年,正值明朝,那时澳门还没有开埠。该庙背山面海,依山建筑。入山门是“南园波恬”的牌坊,迎面即是建于明代弘治元年(1488 年)的石殿,殿里置一洋石船,上面镌刻着中国古代帆船,船上的大旗上写着“利涉大川”。据说,这象征了当年妈祖娘娘乘船从家乡福建莆田湄洲湾出发到澳门的情景,妈祖就从这里登上山顶,成仙飞升了。整座庙宇主要由妈祖阁、弘仁殿、正觉禅林和观音阁组成,另有石狮镇门。庙里古木参天,风光优美,飞檐凌空,是一座富有中国传统的古建筑。相传 400 多年前葡萄牙人抵达澳门,于庙前对面的海峡登岸时,注意到有一间神庙,询问当地居民该地名称时,有人误指妈祖庙,葡人以

其音将此地译成“Macau”，这即是澳门葡文名称的由来。每年春节和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期，这里香火鼎盛。从除夕午夜开始，就有不少善南信女纷纷来拜神祈福；而诞期前后，庙前空地还要搭起大竹篷，作为临时舞台，上演神功戏，热闹非凡。1988年7月，妈祖庙举行了盛大的500周年纪念庆典。

4. 莲峰庙

位于提督马路，是澳门三大古庙之一。建于明朝，距今已有400年的历史。该庙原来称“天妃庙”，规模也较小，供奉天后娘娘，从清朝起经过多番扩建，成为现今占地辽阔、庙貌庄严宏伟的大庙。日前，主庙供观音、天后，另外有武帝殿、仁寿殿、医灵殿、神农殿、金花娘娘痘母殿等。19世纪中叶，林则徐到澳巡阅时曾在莲峰庙接见澳葡官员。如今庙前空地上还建有林则徐的全身石像，以示纪念。

5. 康会庙

位于十月初五街中段，已有200年的历史。庙内正殿供奉康公真君，即汉代大将李烈，因他保国有功，后受封成为康公。左面供奉的是南海广利洪圣大王，右为西山金圣侯王，偏殿前为六祖圣佛，后面是汉代神医华佗。此庙专主民间喜庆法事，殿前中央放置有“酒船石”，是清代咸丰年间雕刻而成的，专为善男信女们向神礼拜奠酒时用。

6. 莲溪庙

位于新桥永乐戏院内，已有200年的历史。庙名以其所在地为名，因澳门地形宛如莲花，古称莲岛，由大陆通澳门之路即被视为莲花径，径尽之处有山拔起，称作莲花山，又叫莲峰，莲峰之阳处有一条溪水，称为莲溪，庙则建于溪的右岸，故称莲溪庙。该庙始建于道光年间，所供神像颇多，有华光、北帝、财帛、文昌诸神。此庙历经数次破坏、修葺及扩建，始成今日的规模，香火很旺。

7. 观音岩

位于东亚大学的山脚下，供奉望海观音。据传说庙内安放观音像的位置，就是当年未建庙时观音显灵之处。后来由一名福建商人在此斥资建成庙宇，崇奉观音。此庙规模不大，但环境清幽，从殿外的空地上可远眺海湾及澳凼大桥的迷人景致。

北帝古庙

位于凼仔市区中心嘉妹前地，是凼仔最古老的庙宇，供奉北方真武玄天上帝。据说建庙至今已有数百年，但确切的年代已无考。据该庙内石碑的记载，至少有150年的历史。整座庙宇外形庄严肃穆，建筑古色古香，佛像及浮雕、碑匾等都是近百年的艺术品。此外，还可以依据门外的石刻碑文了解百多年前的凼仔的历史。

9. 天后古庙

座落于路环民国马路的山腰处，是路环区最大的一座庙宇。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供奉天后妈祖。在庙内存放了许多牌匾，显示出该庙的香火历来就很兴旺。另外，庙里还存有一些逾百年的文物，包括石记碑文，可从中了解路环的发展史。

10. 谭会庙

位于路环十月初五街尾，建于清朝同治年间，距今已有120年的历史，是路环香火最盛的庙宇。据说，谭公是广东省惠阳县人，年幼时为人放牧牛羊，后入山潜心修道，得道后屡次显现神迹，后人便立庙供奉。该庙内除供谭公外，亦有一只由鲸鱼骨雕刻而成的龙舟，也有100多年的历史。据说，摸过鲸骨的人会交好运，所以来进香的善信们必要来摸鲸骨。在庙外有一刻着“鹅”字的巨型大石，已成为区内的一个特色标记。

11. 妈阁山

因山上有一座妈祖庙而得名，是澳门最古老、也最负盛名的古迹。该庙依山傍海，内有一明代弘治元年修的石殿，还有一“洋石

船”。传说宋代的护海女神妈祖娘娘从家乡福建莆田湄洲出海到澳门，就从这里登上妈阁山而成仙飞升了，庙里建有三座殿堂，都供奉天后娘娘座像，终年香火不断，朝圣者络绎不绝。这座山也因这妈祖庙而成为了澳门的名胜。

四、主要组织

澳门的中国传统宗教，包括民间信仰没有统一而严密的组织，只有一些小的联谊性的团体，如国际联密佛教慈航会，澳门佛教青年中心等。1974年成立的“澳门儒释道教联会”只是一个联谊性的组织。1988年成立了“佛教联合会”，但内部较松散，一直没有活动。澳门佛教青年中心成立于1991年，常举行一些活动，吸引年轻人参加，不断扩大影响。

第二章

天主教

一、历史与现状

(一)传入和发展

在澳门,天主教有400多年的历史。葡萄牙人在澳门登陆后不久即于1557年获得明嘉靖皇帝批准,在此交租建屋居住,以后传教士便接踵而来。1562年开始,在澳门陆续修建了3座简陋教堂:疯王堂(望德圣母堂)和花王堂(圣安多尼堂)、风顺堂(圣老楞佐堂)。当时澳门的天主教会隶属于马六甲教区,由苏神父任主教代表,驻望德圣母堂。1563年澳门人口增加到5,000人左右,其中葡人就近900人,耶稣会传教士至少有8人。1565年澳门建立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中国人中间传教。1576年1月23日教皇额俄略十三世正式立澳门为教区,领辖日本、中国、安南等处的教务,从此澳门成为罗马天主教会最早的远东地区传教中心。罗马教廷任命的澳门第一任主教是费神父(D. D. N. de Figueira),但他没有上任,1578年改派沙主教(D. L. de Sa,任期是1578—1591年),而他迟至1581年才上任。从教区成立到这时6年间,澳门的教务则由贾耐劳(M. Corneiro S.J)主教负责,实际上人们均认为贾主教是澳门第

一任主教。利玛窦在 1583 年由澳门进入中国，以后又到了内陆许多地方，并定居北京。澳门历史上曾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天主教享有比其他宗教优先的地位。沙主教的任期内，澳门的教务有了较大的发展，修会修士纷纷来澳门设立会院。1594 年在澳门创办了远东第一所大修院，是远东天主教信仰的传播站。1608 年皮主教 (D. J. P. de Piedade, 任期是 1604—1626 年) 到澳门接任主教职，那时由于西葡战争的影响，澳门教会内部纷争不断，妨碍了教务的发展。1644 年澳门天主教徒增至 4 万多人。1690 年教廷派嘉撒神父 (D. J. de Casel, 任期是 1690—1733 年) 来澳门任主教，他在任长达 43 年，澳门教会得以稳步发展。1834 年，葡萄牙政府下令解散一切修会，没收教产，放逐会士，致使澳门 13 年空缺主教，教徒人数降至 3,000 人。而此时，远东传教会的会员大减，原由这些传教会会员负责的南京及北京教区也交给了法籍传教士。1843 年，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任命法国传教士孟振生为北京教区主教，从此“保教权”落入法国殖民者之手。1845 年马主教出掌澳门教区，他上任后重建大堂和地方教会，并设立华人独立传教区，邀请修女来澳发展社会福利服务，修建新坟场，到 1857 年回国隐退。从 1857 年到 1887 年，因葡国政府的阻挠，不但没收了许多会院，还阻止教廷委派主教到澳门，澳门教区只由本地神父选任署理主教负责教务。到 1887 年，教廷与葡国达成政教协议，澳门天主教才又正常发展，此时的主教是明德禄，于 1883 年上任，不久，重修了望德堂，1897 年逝世。之后，嘉惠劳和鲍理诺主教先后任主教，尽力扶持地方教会，培育修生和修女。本世纪 20 年代，澳门教区进入现代史，其第一位主教是高若瑟，他上任后大力扩展教务，大兴土木，先后建造了圣罗撒学校、圣嘉辣圣堂、主教寓所、圣若瑟中学、圣心书院、鲍思高纪念中学(慈幼学校的前身)、培贞学校、望德学校等。同时，望德堂不但成为独立的华人教区，而且教徒的人数也大大超过葡人，华

籍修生的人数也大大增加。1941年,高主教离任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罗若望接任澳门主教,但直到战争结束后澳门教区才得以恢复。1954年高德华任主教职,建立许多社会服务机构,以救济难民,还创办了利玛窦、晓明、永援、圣德兰等学校,开设了红十字医院、贫民窟、公教中心、高德华图书馆等机构。1960年戴维理主教来澳就职,他创办及扩建的学校和社会服务机构多达40个,1965年在台山区建立了第二个华人堂区,1966年又改组本澳的5个堂区,建造合山花地玛圣堂及澳七苦圣母堂。戴主教于1973年病逝后由高秉常任署理主教,1976年正式出任澳门教区主教。直到1988年林家骏才成为澳门第一个华人主教,澳门天主教会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澳门天主教会长期以来保持稳定的发展,并保存特兰托公会议(于1545年12月由教皇保罗三世召开,1563年结束)的色彩,即“强调圣事多于圣言,圣统多于职务,爱德多于关怀社会,个人多于团体,诵经多于默想,敬礼多于礼仪,感性多于理性的教会”(见“澳门天主教与一九九九”,《鼎》,1989年,总第50期)。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后,教会内部着手改革,并开始关注社会事务,扩大了社会影响,教徒人数大增。在1960年至1990年的30年间,教徒人数的增长率是15%,年龄结构也由过去的老年化转向以年轻人占大多数。1960年本地的教徒有16,000人,到1990年,接受领洗的入教者有28,000人,其间有4,000名教徒死亡,约有20,000教徒移民外地。60年代时澳门的神职人员有500多人,到80年代末仅剩250多人。过去,澳门教会虽是远东传教中心,但只是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陆、中南半岛和日本等地区的落脚点。目前,澳门教区也仅限于澳门本身,但毕竟它在中国天主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二)现状

1. 教区的概况

澳门的天主教会分为华人和葡人两大教友团体，华人教徒占大多数，其次还有土生葡人。至 1993 年 1 月为止，教徒人数约 21,000 人，占本澳人口的 6.5%，此外，外籍教徒约有 2,000—3,000 人。教徒中以年轻人居多，文化程度以中等为主，多属中产阶级。面临九九回归，澳门的天主教徒每年移民他方的也不少，但每年仍有新领洗者 600 人加入教会，这样流失与新增加的数量基本持衡。

澳门教区包括澳门半岛及凼仔、路环，共分六个堂区，其中 5 座在澳门本区，一座在离岛，包括主教座堂、圣安多尼堂、圣老楞佐堂、望德圣母堂、花地玛圣母堂、凼仔嘉模圣母堂。另外，澳门还有一个路环传道区和九澳、岗顶、葡光、望厦等四个传道中心，在其中可举行感恩祭及主日学慕道班、入门圣事等。堂区的组织主要包括各“善会”，如圣母军、信友互协会、祈祷宗会、辅祭会、圣咏团、青宗会、圣体会、公教青年会及堂区的职员等，财政主要靠教徒的捐献和基金。1992 年 3 月重建了澳门主教公署，现任教区主教是林家骏。在公署内保存有教区 400 多年历史记录的档案室、主教及神父寓所和小堂、礼堂及会议厅。

目前澳门教区有神父、修女共 280 多人，其中本地神父有 23 名，服务于各堂区。教区神父中有 10 位是葡籍司铎，另有 32 名男修会会士，大部分从事非堂区性的工作，有修女 178 位，主要从事教育及社会服务工作。澳门天主教会正在面临神职人员年龄老化、人员缺乏的问题。本澳具有 260 多年历史的圣若瑟修院仅可提供为期 2 年的神学初级课程，修生完成此项课程后还需到香港或国外深造神学及哲学达 7 年才可成为神父。1992 年 12 月一名叫袁伟明的 27 岁学生被晋铎为神父，他是澳门教区在葡萄牙把澳门主权交给中国前的最后一位晋铎的神父，因为，目前澳门教区并没有修生。为解决“司铎荒”的问题，教会一方面加强本地化宣传，培育人才，另

一方面经办教区修院，从1978年开始举办“教友生活训练班”，一年三期，每期三个月。宗教活动多以敬礼圣母为中心开展。每年5月13日(或10月13日)，教区举行花地玛圣母像出游，参加者多则逾3,000人。其次，每年4旬期第一主日，举行耶稣苦像出游。另外，在每年圣周星期四，纪念耶稣在最后晚餐中的圣事。

澳门的天主教会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非常重视出版及传教工作。教区办有《教区月刊》(由主教公署教务行政处出版，杜家铭神父任社长兼编辑)、《号角》周刊(欧秉诺神父为社长兼编辑)、《晨曦》周报(设在主教公署内，由李冠章神父任社长兼编辑)、《教区青年牧民中心通讯》、《堂区通讯》(葡文)。教会还大力兴办牧灵服务，办有教区青年牧民中心、望厦牧民中心、黑沙环天主教牧民中心、教宗若望牧民中心、望德青年中心、圣安多尼中心、澳门美满家庭协进会、普世博爱运动、基督活力运动(葡文组)。

2. 教区的公益事业

因葡萄牙历史上奉天主教为国教，并且政教合一，因此天主教会在澳门享有比别的宗教优先的地位，澳门政府过去批给教会大量的土地，至今教会仍保存有很多地产。此外，教会一向很重视社会公益事业，参加了政府实施的各项教育、救济、医疗和社会福利事业，主要参与三个方面的社会服务，包括人员培育即教育、参加社会工作和提供社会性服务。教区及各堂区都大力兴办学校教育，使教会学校成为社会教育事业中一支重要的组成部分。最近几年，教会先后支持属下多家学校扩建校舍或兴建新的校舍，并致力提高教会教育机构的素质。据统计，目前澳门共有天主教学校34所，其中19间为中学，除圣若瑟教区中学及5所分校外，其他全部为修会学校。在天主教学校就读的学生有4万人，占全澳学生总人数的五成。另外，教会还办有20多间幼儿园。由于澳门未推行义务教育，教会学校就成为教育事业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回

时因为教会学校的师资力量雄厚，所以教学质量也较高，许多神职人员也在学校兼任教师。另外，为迎接“九九”，使澳门能平稳过渡，使澳门的青少年能尽快地适应未来的社会环境，“天主教学校联合会”与澳门“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共同研究和改善澳门的教育制度；教会还将关闭多年的圣若瑟修院改建成训练本地领袖的机构，培育葡语及中文双语人才。

天主教会作为澳门社会的一个组织，积极参与社会的各种活动，通过鼓励教徒关注社会事务如关心选举、关心基本法、关心劳工问题、青少年教育等，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林家骏主教就是基本法起草委之一。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90名委员当中有20多人是天主教徒，天主教的代表在咨委会中差不多占1/3，其中包括10名华人、15名葡籍天主教徒或土生人后裔。1991年澳门的天主教徒成立了“澳门基督徒关注基本法小组”，后又有“澳门天主教教友协进会”，经常举办活动，如举行“澳门教会的透视及前瞻研讨会”等。1992年澳门政府直选8个议席时有三名天主教徒当选，其中两名是华裔，一名为土生葡人，他们代表了澳门的“民主派”，虽然在立法会内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会起某些影响。其次，教徒大多是社会中上层人士，其中土生葡人约有1万多人，绝大多数为天主教徒，他们大多服务于政府部门，社会地位特殊。因澳门的高级公务员是由葡国聘来（1999年回归后将改由澳门人担任），而中级官员则以土生人居多，华人在公务员中仅约占两成，且只是低层职位，所以土生葡人的地位就显得很特殊，他们世居澳门，有的还与华人通婚，但他们既懂得葡文，也能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又多在政府部门任职，无论在教会中或是在社会里他们都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

澳门天主教会举办的社会福利服务项目较广，包括老人院、孤儿院、青年中心、伤残中心、医疗所、寄宿、社区服务机构等32个组

织单位,收容人数约 3,000 人,直接接受服务的人口达 7 万,可影响社会上一半以上的人口。此外,还有六个牧民中心和三个堂区牧民中心也开展社会服务。具体的社会服务概括如下: (1) 扶幼服务:包括培幼院 2 所(收容幼儿),学生宿舍 8 所、托儿所 8 所(提供口托);(2) 安老服务:包括老人中心 3 所,安老院 5 所;(3) 康复服务:包括伤残儿童疗养院 2 所、弱能青年中心 2 所、庇护工场 1 所;(4) 教育服务:除兴办普通教育外,还提供特殊教育,办有商科学校,多设在普通中学内,还有 1 间工业学校、2 间职业先修学校;(5) 医疗服务:办有 6 间诊所、1 间麻疯病院。除以上服务外,教会还有两个多元化综合性的服务机构:

澳门明爱

成立于 1951 年,至今已有 40 余年,其创办人是耶稣会士陆毅(L. Suarez),他首先开始了教会为澳门社会下层及中国大陆的移民服务。澳门明爱的宗旨是“为需要及被遗弃的人、为灾民提供救助,促进及辅助各项自力计划,培育个人的友爱精神”。目前,明爱的服务项目主要有家庭服务、难民服务、社工训练、生活援助计划、助学金计划、助膳计划、急需与自力计划(包括医药援助、紧急援助、房屋修葺等)、夏令营计划等。澳门明爱通过经常举办以上各种活动,在澳门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

澳门天主教福利会

其主要工作有居屋服务,提供廉租屋舍、领养计划、移民服务、难民服务、人类发展计划(资助社团或学校改善教育及培训人才)。

二、主要教堂

澳门开埠以后,最先到达的神父就开始建筑教堂,不过那时的教堂很简陋,多以木材、草席做材料,从 17 世纪开始,教堂便以石灰

及灰泥作大规模的修建。澳门教堂的建筑形式多以欧洲巴罗克式的为主，再结合东方及热代地区的建筑特色，但由于历史悠久，多已破旧，大部分经过了重修或重建。目前，澳门有公开和私用的教堂共 20 多间，以望德堂、风顺堂和花王堂历史最长，都已历经 300 多年。这些古老的教堂大多已成为澳门的名胜，而花地玛圣母堂是全澳最年轻的一座教堂，只有 25 年的历史。下面介绍几座主要的教堂。

1. 大三巴教堂(ST. PAUL'S)

正名为圣保罗教堂，即今天大三巴牌坊的前身，1594 年由罗马耶稣会意大利神父发起筹建，1602 年奠基，1638 年建成，设有耶稣会的修道院。教堂占地广阔，并筑有城墙，内部建有祭坛，是教堂城墙出入口的门户，称为“三巴门”；另外，院内还有大炮台，建于 1616 年即明神宗年间，是教士为保护教堂内、防范海盗之用，炮台上还有一古塔。教堂修建之初，成为南部中国最著名的教堂，许多外国教士来此研修教义，利玛窦和汤若望都曾在此居留过，据说明代的徐光启也曾在此研习过教义。1835 年该教堂被一场大火毁坏，只剩下前壁，即如今的大三巴牌坊。此牌坊由意大利神父设计，日本天主教徒工匠雕刻、建筑。门顶上是高高的十字架，其下再分三层，第一层是鸽形铜像，据称是代表圣神；下面是一个耶稣圣婴雕像；第三层是圣母雕像，旁边刻有牡丹和菊花，前者代表中国，后者象征了日本；再下面就是教堂的三面大门。本世纪 70 年代，澳葡当局曾在牌坊后面发掘出一些枯骨及陪葬物，据称是教堂和教士们的遗骨。如今，人们看到的只剩下该教堂的前壁，即大三巴牌坊，这里成为当今澳门的名胜之一。

2. 主教座堂(The Cathedral)

位于大堂前地，又称大堂或大庙，是澳门天主教的主教座堂，教会的中心，也是中区葡人望弥撒的教堂。该堂始建于 1576 年，原

为一幢小型木造的建筑，后毁于台风；1849年教徒捐款重修，1850年2月14日由澳主教马达主持初祀典礼；此后，马达主教还设立华人独传教区，并首次倡议修女到澳门进行社会福利服务工作，建造西洋坟场等。1937年大堂再次改建成三合土建筑，成为今日的外观。教堂外貌富丽堂皇，正面是左右双塔式建筑物，富有西班牙风格，内部则是装嵌了多彩的玻璃，显得精丽巧饰。大堂内还存有許多天主教的遗物和古迹，祭坛下埋有一些古墓，贾耐劳、华年达、嘉沙尔等16、17世纪主教的骨殖或遗体都葬在此地。另外，在大堂的墙壁上挂有《圣约翰受洗图》、《日本天主教徒在长崎被钉十字架图》等多裱名画。这里是本澳教会举行大庆典的地方。大堂周围的建筑、地名、街道等均与之有关，如大堂前地、大堂街、大堂巷、大堂石级等等。虽然后来西望洋山上的主教寓所建成后已陆续迁出一部分，但现任主教仍喜欢在此居住。另外，大堂旁边就是主教公署和教务行政处的办公室。

3. 望德圣母堂(St. Lazarus)

位于圣母堂前地，这是澳门教区成立后的第一座主教座堂，又称圣拉匝禄堂，也是澳门华人最早的一间教堂，因教堂后侧曾设有一麻疯院，故葡人称之为“麻疯人主保圣堂”，俗称“麻疯庙”、“疯堂庙”。1568年，贾耐劳辅理主教来澳门后就在此工作。1576年1月，罗马教皇额我略十三世宣布成立澳门教区以后，就将该堂升为主教座堂，每逢新任主教到澳就职，必先到这里领取权杖。但后来发现主教座堂不宜设在麻疯病院附近，就另建大堂为主教座堂。1847年，华人神父廖玛谷曾在此堂专责华人教务。后来，因华人教徒超过3,000人，无法容纳，就拆除旧堂，于1885年改建成新堂，1957年又重新修葺，保存至今。

4. 圣奥斯定堂 (St. Augustine's)

位于岗顶前地二号。该堂于1586年由意大利奥斯定教会修

建，三年后归葡国人所有，也是澳门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并且是澳门首间以英语传教的教堂。教堂于1825年重修，以外观庄严、雄伟，内部装璜宽敞阔大著称，在大理石祭坛上有一座耶稣被负十字架的雕像。

5. 三巴仔

即圣若瑟修院圣堂(*The Church of the Seminary*),位于三巴仔街。该堂由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兴建,据称1657年就已有了三巴仔,但现今基石上刻的是1748年重建时的年代。在1762年至1784年因罗马教会推行改革,三巴仔一度大门深锁,停止活动达20年之久。后划归葡国神父接管,继续兴办,教士们在此研究神学、学习拉丁文、葡文、英文。直到1893年这座教堂重归意大利耶稣会神父管理,但到1910年时,因葡国推翻帝制,实行共和,又再次驱逐在此的耶稣会士,交归葡萄牙天主教会管理。该堂于1903年、1953年先后修葺,采用假云石祭台,堂内设有古老而富艺术性的告解亭;圣堂右边的高塔上有大小铜钟各一,也已有200年的历史。其外观的建筑属古代依巴伦式,如门面的柱头及庙顶的圆塔等。这里还保存有许多文献及占物,圣约瑟修道院也设在此地,后又建利霄中学,专研神学,本世纪60年代重新修建。

6. 风顺堂

位于风顺堂街,又称圣老楞佐堂(*St. Lawrence's*)或风信堂,是澳门最古老的天主教堂之一。据说该堂的建立早于1569年,期间数度重修,而1618年的修建较具规模。这里是葡人聚居区,而以该堂命名的“风顺堂街”则是澳门最古老的街道之一。1979年此堂再进一步全面修葺,才使这一古老的教堂倍添光彩。这座教堂占地广阔,门前是两排石级直达大门,宏伟气派;左右有两座钟楼对峙,屋顶是中国式的金字瓦面,堂内有巨大的梁柱和精美的吊灯。祭坛上供奉的是圣老楞佐神像,在葡国人心目中,他能使航海之人

得庇护,保平安,是赐予风信之神。

7.花王堂

位于花王堂前地,也是全澳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其正名为圣安多尼堂(ST. Anthony),始建于1558年,由耶稣会士所建,因教徒信奉安多尼是“婚姻主保”之神,故称此堂为“花王堂”。在这座教堂门前的饰板上简单记载着它本身的历史:“于1608年建成,于1809年被焚,于1809年重建,于1874年再度被焚,于1875年修建”。可见该堂屡毁屡修,1874年9月22日是遭雷击起火而毁的,澳门人就定9月22日为天灾节。1930年,又对此堂重新修建,保持至今。

8.圣母雪地殿教堂(Chapel of Our Lady of Guia)

位于东望洋山顶,是东望洋山望洋台上最古老的建筑,建于1626年,所祀的是葡国人奉为护卫航海之神。教堂内部建筑富有17世纪葡国修院的特色,天花板呈拱形,旁有唱经楼。在教堂的右边有一古钟,上面刻着“此钟为澳门市最高首长狄西亚总队长于1707年为东望洋山圣母隐修院而制于1824年重铸”字样。

9.圣雅各伯小堂(Chapel of St. James)

位于圣地牙哥酒店内,兴建于1629年,1740年重建。教堂内有精致的圣雅各伯雕像以及圣母花地玛、伊莎贝皇后的瓷砖图像。据称圣雅各伯是澳门的军事保卫者。

10.嘉谟圣母堂(Our Lady of Carmel)

位于凼仔嘉路士米耶马路,是凼仔唯一的天主教堂,建于1885年,于1985年重修。这座教堂面临大海,风景优美。教堂旁建有公园,可供人休憩。

11.望厦圣方济各小堂(St. Francis Xavier)

位于望厦山附近的俾利喇街,建于1907年,1938年重建。这座教堂规模较小,但环境优雅,内设一座黑色大理石祭坛,临近有一所老人之家。

12. 路环圣方济各圣堂 (Chapel of St. France Xavier)

地址在路环计旦奴街，建于1928年。教堂的建筑形式类似澳门一般教堂的巴洛克风格，外观是白色正门，椭圆形的窗户，一座钟楼，堂前还有一座纪念碑，以纪念1910年打败海道一役。堂内保存有圣方济各的手骸圣镯，据说圣方济各在400多年前随传教士自日本到中国南部沿海，于1552年在澳门附近的一个小岛上逝世。

13. 玫瑰圣母堂 (St. Dominic's)

地址在板樟堂前地，位于营地街市一侧，正是闹市的中心。该堂又称板樟堂或多明我堂，始建于1587年，据说1585年多明我会教士约40人初到澳门时因生活困难，因陋就简，辟地架椽，结板为障，建造了简易的传教场所，当时被称为“板障庙”。1828年经一位西班牙神父筹划重修了该堂，成为今天典雅壮观的规模。该堂供奉花地玛圣母，堂内保存了许多油画和雕像，天花板布满装饰性图案，大门雕刻精美，祭坛上是圣母圣婴像，富于西班牙色彩。教堂后面有一小博物院，藏有圣保禄大教堂所遗留下来的早期著名雕刻和一些遗物。每年5月13日澳门举行花地玛圣母出游的活动，即由此堂为起点。

14. 主教山小堂 (Chapel of Our Lady of Penha)

位于西望洋山顶，又称海崖圣母小堂，1622年建于炮台旁，1835年重建，1892年扩建，始成今天的规模，另有钟楼高耸，古树花径，游人如云。堂前的高台上是大理石的圣母雕像，面向大海，俗称望海观音。下面有一路德圣母岩洞，洞内亦设立了圣母像，象征古时圣母在法国路德城显灵的情景。在路德圣母岩洞前有一刻着葡文的古铜墓碑，这是20世纪初天主教澳门主教埋骨之处。约翰鲍连那主教于1918年2月18日逝世时就埋葬于此。

三、主要人物

罗明坚 号复初,1543 年生于意大利那波里,明末来华传教,1572 年加入耶稣会,1579 年到澳门学习汉语,后到广州传教,曾居住在肇庆的天宁寺,但不久就被逐回澳门。1583 年他与利玛窦一起到肇庆建堂传教,1585 年还到杭州传教。1588 年从澳门经里斯本抵罗马,企图游说西方国家与中国互派使节及向中国大规模传教,未果。他于 1607 年在罗马去逝。著有《圣教实录》,是欧洲人最早用汉字写成的教义纲要,还首先使用了“大主”词。

高秉常(A. R. daCosta) 天主教会澳门教区主教,1976 年至 1987 年在任。葡萄牙人,1924 年生于亚苏尔群岛,1938 年来澳门,在圣若瑟修院攻读文学及神哲学。1949 年晋铎,并留校任教。1955 年到 1956 年曾任圣若瑟修院的代院长。1956 年返回亚苏尔,1957 年保送罗马一大学深造,后获教会法律硕士学位,1960 年 10 月 15 日再度来澳门,任圣若瑟修院法律及哲学教授,并曾多次出任署理主教。1968 年曾在香港圣神修院任哲学教授。自 1973 年 6 月前任主教戴维逝世后他一直任署理主教,1976 年 1 月 21 日被梵蒂冈委任为澳门教区的主教,同年 3 月 25 日就职。在管理澳门教区期间,他任用年轻的华籍神职人员担任教区的行政要职,成立“教区青年牧民中心”,重视青年教徒的工作,倡导积极参与社会事务。1984 年 6 月 10 日曾获得葡萄牙政府颁发的“殷皇子级大十字勋章”(高级慈善勋章)。1992 年率领澳门天主教代表团访问大陆,曾受到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接待。

林家骏 字少彬,是首位华人主教,也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28 年生于香港,自幼定居澳门,由教会抚养。其母亲是广东番禺人,而林则是澳门的第七代。他小学就读于澳门鲍斯高

学校(即今天的慈幼学校),于1941年进圣若瑟修院攻读,1947年在该校攻读哲学及神学,1953年12月27日完成神学院课程后晋铎,并留院任教职,先后在小修院和圣若瑟中学任教。1955年任《院声月刊》(后改名《晨曦月刊》)主编,1959年被委任内仔嘉模圣母堂主任司铎,同时兼任 RALLY 英文月刊的编辑及经理。1962年初到新加坡传教,期间曾4次被委为圣若瑟修院院长及署理主教执行秘书,1973年底回澳门。1976年4月20日晋升为副主教,1987年6月被任命为澳门教区助理主教,1988年9月受委为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1988年10月6日接替高秉常出任澳门教区主教,成为澳门第一位华人主教。林主教上任后,积极促进澳门教会的本地化,重视教会中文出版事业,还改组教区直属学校的领导机构,委派华籍神职人员管理教务。林主教也是新近成立的澳门基本法协进会副会长,关心澳门的前途与发展,他曾表示自己既是澳门的主教,也是澳门的普通居民,要与澳门人民同甘共苦。他还强调要珍惜和保持澳门安定的社会环境,培养公民的社会意识及责任。

罗玉成 广东肇庆人,1947年进圣若瑟修院,1960年9月晋铎,曾任小修院训导主任。1962年至1965年到罗马深造,获教廷额我略大学教义学硕士,以后又专攻伦理神学。回到澳门后先后任修院训导主任、神学院伦理神学教授、圣母军团神师、教理委员会及书刊审阅委员会成员,1970年前往马六甲传教,1975年5月回澳,1979年被委任为红衣司铎,同年任圣若瑟教区中学校长。1988年10月18日被委任为澳门教区副主教。

四、主要组织及机构

1. 澳门主教公署

位于大堂前地主教座堂内,是澳门教区最高的行政领导机构,

主教林家骏，副主教罗启瑞。下设有公署办事处（罗启瑞神父任公署主任、秘书长）、教务行政处、教区事务统筹秘书处（李冠章神父任主任），有职员若干。

2. 主教座堂参议会及教区参议会

位于大堂前地三号，团员有何志仁、高天予、罗玉成、罗启瑞、李顺宗、罗启丰、丁守仁、刘炎新、黎鸿升等神父，1993年选出的新一届干事，主席是何志仁神父。

3. 澳门教区司铎咨议会

1986年6月选举至今，主席由林家骏主教担任，罗启瑞、李顺宗神父为当然委员，参加该议会的还有修会及红衣会的代表，三名应选委员、两名候补委员及两名主教委任的委员。

4. 修会团体

澳门天主教历史悠久，各国修会大多都曾派传教士经这里到香港、中国大陆、东亚及东南亚一带传教，至今这里仍有许多修会或修院，加上本地的修会团体，其地位也不容忽视。主要有以下会院：

修会会院

(1) 耶稣会神父会院 位于岗顶前地4号，院长是吕硕基神父，另有8位神父和2名修士。

(2) 无原罪圣母会院 位于风顺堂街16号，院长是孔智刚神父，还有7名神父及7名修士。

(3) 圣鲍思高会院 位于亚玛喇马路6号，院长是罗轼道神父，还有4名神父和1位修士。

(4) 圣类斯会院 在得胜马路18号，院长是华近礼神父，另有7位神父和一名执士。

修女会院

(1) 嘉诺撒会院 在白鸽巢前地4号，院长为高志慈修女，还

有 3 名修女。

(2) 圣心会院 在高士德马路 46 号利嘉阁 24 楼 B, C 座, 院长是叶慧明修女, 另有 4 位修女。

(3) 望厦圣方济各院 位于俾利喇街 116 号, 院长为白德贤修女, 另有 7 名修女。

(4) 路环圣母圣心会院 在路环罗渣花园, 院长是康凤贞修女, 还有 1 名修女。

(5) 圣嘉辣会院 位于嘉辣堂街 4 号, 院长是 I. N. Mugarza, 另有 18 位修女。

(6) 晓明会院 在罗理基博士大马路 367 号, 院长是范桂芳修女, 另有 7 名修女。

(7) 圣嘉俾厄尔会院 在学院斜巷 5 号 A, 郑健怡修女为院长, 还有 10 名修女。

(8) 母佑会院 位于得胜马路 28 号, 龙丽珍修女为院长, 有 7 位修女。

(9) 永援圣母会院 分别设在安仿西街托儿所巷 7 号 2 楼 D, E 座、安仿西巷 6 号 2 楼 C 座, 院长是 I. B. Noguez Lugo, 有 6 名修女。

(10) 仁爱传教修女会院 位于青州大马路 58 号, 院长是 I. R. M. de Castro, 7 名修女全部为外籍人。

(11) 圣安妮会院 分别设在伯大尼安老院、圣母安老院、圣类斯公撒格之家、圣路济亚中心内, 共有 16 位修女。

5. 澳门明爱

国际明爱组织的成员, 下设 A: 主席团, 名誉主席是林家骏主教, 主席陆毅神父, 5 名成员; B: 监事会, 总监为陆毅神父; C: 执行委员会, 主席是潘志明; D: 行政总署, 由潘志明担任总干事, 另设有 6 名顾问。

6. 利玛窦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位于岗顶前地一号 A, 陆毅神父担任总监, 潘志明为总干事, 下设安老服务部、家庭服务部、康复服务部、青少年服务、澳门外展青少年义工团、失聪人士社会服务、文书处、牧灵服务, 还设有特殊计划, 包括派驻镜湖医院医务社会工作服务、明爱生命线辅导中心、派驻望厦天主教牧民中心教育及康乐服务、伤残人士驾驶训练服务、北区社区发展服务、家居服务、失聪儿童语言训练中心。

7. 教区社会传播中心

位于南湾街113号, 署理主任是罗玉成神父, 下设总秘书处、教区广播中心、电影小组、传理中心小组、电视制作部、文化艺术促进小组、宣传组、高德华主教纪念图书馆、圣保禄书局、澳门大会堂、“沙龙”视听中心、文化促进小组。

8. 澳门教友协进会

于1992年11月15日在澳门主教公署宣布成立, 是澳门天主教徒的联谊性组织, 目的是“发展澳门教友对教会及社会的投入及归属感”。在成立大会上选出了理事及监事, 首任理事长是陈伟智, 他也是“基督徒关注基本法小组”的主席。该组织的近期任务是建立会员之间的联系与沟通, 在神修方面将成立圣经小组, 加强信徒在神学和礼仪方面的修养。面临九九回归, 该组织在1994年5月筹备了训练课程, 注重祈祷和礼仪的培训, 并协助教会建立信仰小团体。澳门教区委任了钟志坚神父担任该会的神师。

9. 澳门天主教圣经协会

1994年4月30日宣布正式成立, 在澳门主教府举行了成立典礼, 其宗旨是“要加强信徒通过圣经与天主的沟通, 并推动澳门教徒阅读圣经的热情”。创办人是花地玛圣母堂主任司铎钟志坚神父。该组织还同时加入了“世界圣经协会”及“天主教华语圣经协会”, 其个人会员在创办之初包括一位修女、两位神父及8名教徒。

第 三 章

基 督 教 新 教

一、历史与现状

澳门是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地方。首位来华的新教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ison, 1782—1834), 于1807年来到澳门, 他是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 1814年发展了中国第一个基督徒蔡高, 1823年任命梁发为第一个华人牧师。马礼逊于1839年11月4日在澳门创办了中国第一座西洋学堂——马礼逊学堂, 开设中文、算术、代数、几何、地理、生理学、历史等课程, 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具有西化知识的人才。澳门更成为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基地。以后, 西方基督教新教各派均派传教士来此地, 发展教徒, 建立教堂, 开办教会, 但教徒人数增长很慢。很长一段时间, 澳门不过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一个跳板, 尽管先后有20多位传教士在此驻足, 但最终都经此地到了其他地方。直到19世纪下半叶, 澳门的基督教才有一些发展。

澳门基督教的历史虽已有187年, 但始终发展缓慢。根据《当代华人教会》统计资料记载, 澳门1940年以前有3间教会, 1980年

有20间,1981年至1985年新成立的教会有13间,其中有8间是由香港或西方差会开办的,其余5间是本地教会发展的,此时全澳门共有教会33间,其中18间分属于10个不同的派别,建立的时间较长。至1990年澳门的教会便增加到54间。从1980年到1990年,教牧人员则由24位增加到60位。信徒人数,从1980年的1,200人增至1985年的2,468人,增加了一倍,到1990年已达3,500人,只占人口总数的0.6%¹,其中新移民中的信徒占有很大比例;从年龄构成上看,青年信徒占多数,以20—29岁的青年为最多,占信徒总数的30.1%,其次是30—45岁的成年人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分别占17.8%和17.7%。近年来独立教会发展比较快,由1980年的7间增至1985年的15间。澳门教会70%属小型教会,会友50人以下的有24间,51人至100人的有7间,101人至200人的1间,201人以上的也只有1间。教会会友人数最少的7人,最多的共计328人。据1990年1月14日香港《基督教周报》报导,澳门基督堂会及布道基址共41间。各种传教组织77个,所属的不同教派有48个,其中大多数是香港基督教的分支,其余是欧美教会的差会。到1993年,澳门共有55间教会,参加主日礼拜的人数约2,000—3,000人,平均每间教会不足50人。虽然注册的教徒人数远远超过礼拜的人数,这也许是因为移民的缘故。目前,澳门有16位牧师及50位传道人,其中10位为女性²。大多数女传道是新堂会的开拓者,她们在教会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有的还担任领导职务。不过,现在澳门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仍是传道人员缺乏,总共尚不足100人。

近十余年间,澳门各基督教会非常重视神职人员的培训,1982年澳门成立第一所圣经学院,学制3年,但因学员多来自香港地区,学成后又多返回香港发展,而本澳学员则出外升学,或从事其他行业,而使服务于基督教会的学员严重不足。目前,澳门有4个培训教牧人员的机构,一是1981年成立的“门徒训练中心”、二是上

面提到的澳门圣经学院，三是1985年成立的“大使命训练中心”，四是1990年新创办的圣经学院，其宗旨均是尽快为澳门培养宣教人员。为了教会的布道工作，各教会采用传统的布道形式，积极向社会传教，尤其是注重在青年人中间布道，吸引他们入教。近十年来澳门最突出的布道工作是1978年由学园传道会发起的“福音遍传运动”、“清洁澳门运动”(1984年开始)、1985年的“少年儿童归主运动”、1986年的“全澳门布道大会”，1987年在澳门举办了一连串的纪念“基督教来华180周年”的活动，都收到了预期的社会效果。1990年，澳门还转播了三场在香港举行的葛培理布道大会，数千人次出席了大会。可见，澳门基督教福音派目前的影响越来越大。另外，在澳门的29家传教组织中，主要从事青少年工作的有学生中心、大学生团契、学园传道会、青年归主协会等七、八家；在新兴的教会中，也多注重发展学生及青年工作，而历史悠久的教会，则希望以吸引青年人入教来带动整个教会的增长。因此，发展学生和青年入教是目前澳门各教会的中心任务。同时，为了解决澳门教会人才缺乏的问题，香港青年归主协会还于1989年开始，在澳门举办“初级栽培员训练班”，1991年该组织在澳门设立办事处，专责培训传道人。

基督教在澳门除传教外，还关注社会需要，致力于社会服务，兴办多项公益事业，各教会主要以社会服务和教育工作为两大主题。如进行儿童、学生、老人服务，办聋哑学校、戒毒服务、青年中心、图书馆或阅览室及教育事业。这些机构所属的教会各自独立，有的是本地的，也有的是香港或是欧洲的教会组织在这里兴办的，各有独立的行政和财政。其实，早在19世纪基督教在澳门就开始办教育，设立一些私塾性质的学堂。20世纪初，开办一所志道幼稚园，这是澳门最早的幼稚园。现在，澳门基督教所办的教育机构有13家，就读的学生逾万人；办有8个青少年活动中心，还设有一家

特殊学校,已有20多年的历史,为聋哑人士提供服务。除儿童院、老人院外,又增加了“挪威信义差会恩耆中心”和“天道传基协会澳门分会”,出租录像带或录音带,并与教会合作举办综合性的文艺演出。各基督教组织兴办的慈善机构约有十余个,如办有6间图书馆或阅览室、3个托儿所、还有福音诊所、牙医诊所等。福音戒毒是近年澳门基督教会开办的社会服务项目,目前已有两家福音戒毒中心,名叫“应许之家”和“耶稣家庭”,前者成立于1987年,后者于次年成立。这些服务机构的经费主要靠教徒的捐献和各教会所属海外母会资助,缺乏政府和澳门社会的支持,目前均面临着财政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问题。

进入90年代,随着教会及澳门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尤其是在1999年回归的这段后过渡期内,预计各教会将更加重视开展社会服务,增加教育机构,吸纳更多的传道人及培训更多的社工人才,以缓解教会用人之急,并求得教会稳步的增长。

二、主要教堂

由于澳门的基督徒人数较少,所以教会也多是小型,每间教会不过一、二百人,但各教会彼此独立。据统计澳门的基督堂及布道所共有40多间,著名的有圣公会圣马可堂、白马行澳门浸信会、志道堂及宣道堂等,介绍如下:

1. 宣道堂

1950年设立教堂,创办人主要有三位,即计志文牧师、陆镜辉医生和许公遂牧师。1956年开始建新堂,后逐渐发展,成为澳门基督教的最大的一间教会。从1976年到1990年短短的15年间,宣道堂就在澳门和香港设立了9间分堂,并成为一自立教会,不隶属任何宗派或团体。1990年10月宣道堂改名为“基督教会宣道堂港澳

区会”。目前,该组织统管澳门的 7 间分堂,包括函仔宣道堂(1976 年成立)、祐汉宣道堂(1978 年成立)、下环宣道堂(1980 年成立)、新桥宣道堂(1982 年设立)、青州宣道堂(1983 年成立)、闽南宣道堂(1985 年设立)、筷子基宣道堂(1985 年设立)。另外,在香港也有 2 间分堂,即旺角宣道堂(1981 年设立)和梨木树宣道堂(1985 年成立),还有几个聚会点。该教会组织设有堂牧、堂委会和各堂主任,下设宣传部、青年部、少年部、主日学部、布道队部、训练中心、总务部、探访部、文书、司数司库及助学金部等。但该堂没有参加“澳门基督教联会”。在宣道堂内开办了宣道中心,是新近翻修的,内设一老人中心、儿童夏令营。蓝钦文是现任澳门宣道堂的主任牧师。

2. 志道堂

全称“中华基督教会志道堂”,位于澳门马大臣街,由当时绅士崔诺权介绍李星泉医生,购置了蕉园围的两间小屋,并向政府申请房前屋后荒地于 1917 年 10 月建成的,内设有小学。后经募集资金,扩充校舍,发展为蔡高纪念学校,包括中学、小学和幼稚园,70 年代改由圣公会办理蔡高中学,搬迁到白马行街,旧校舍被拆,建成大厦。

3. 马礼逊教堂 (Protestant Chapel)

位于旧基督教坟场内,即与东方基金会新会址相连的永久墓园内。这座基督教礼拜堂建于 1821 年,是澳门最古老的基督教堂,曾于 1922 年重修。教堂的门窗为拱形设计,门前放几张小圆凳,周围环境清静而优雅。教堂内只有十张长椅,顶部还保持了原来的屋梁、屋椽和两把长吊扇,富有古朴的风格。教堂的后面是基督教的墓地,葬有许多西方基督教会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及其子也葬在这里。

三、主要组织和机构

1. 澳门基督教联会

1990年1月14日正式成立，当时有12间教会和7个教会机构加入成为会员，首任主席是澳门唯一的女牧师萧卓芬，她也是澳门基本法的咨询委员会委员。联会的成立，使澳门各自为政的基督教会有了一个联谊性的组织，各宗派可以携手合作，互通信息，共同为澳门的社会做贡献。“联会”第一届执委会，主席肖卓芬牧师，副主席陈映灵牧师，司库杨学义先生，司数黎美贤，文书徐济时先生，传道部左羽翔先生，宣传部王康弼牧师。该会设在澳门神召会（东望洋街15号）。

2. 澳门学园传道会

隶属于美国的“国际学园传道会”，即美“校园十字军”。该组织专门培训传道人，1977年在澳门开始招收学员；次年在澳门发动教会举办第一届新生命“福音遍传运动”，开展一系列的福音传教工作，包括街头布道、个人布道、逐户探访等形式；1980年又举行第二届“福音遍传运动”，在各地张贴此运动的标志或海报，散发布道传单，扩大教会的影响。1981年学园传道会还正式成立了“门徒训练中心”，学制3年，学员在导师的引导下，可边学边做，第一年协助堂会工作，第二年开始负责新堂会或布道所的工作，7年后即可按立为牧师。到1985年时，已有7人毕业，缓解了教会的人才之急。1988年又发起了第三届“福音遍传运动”，动员了数百名信徒，以十万名新移民为对象，用一周时间以“饱和布道法”向所接触到的市民布道，以吸引新移民入教。学园传道会是澳门最大的一个福音传教机构，有20多位工作人员，其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母会的提供，会长是蓝钦文牧师。

3. 澳门读经会

1989年7月成立,目的在于督促信徒每日读经、训练同工及向儿童布道。该读经会得到了香港读经会的大力支持,提供了许多辅助儿童布道的器材,如布偶、盒带、挂图、幻灯片等。

4. 澳门福音事工中心

隶属于澳门圣经学院,是一传教组织,设立了儿童流动图书馆、“澳门基督教资料中心”,其资料大多为香港的福音机构提供的,如录音带、录像带、幻灯、电影等。

5. 澳门基督徒协会

1990年成立,主要成员是一些基督徒的专业人士,其目的是联系澳门各行各业的基督徒,在社会中发挥影响。

四、主要人物

马礼逊·1782年生,英国人,是第一个来华传教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他受英国伦敦布道会的差遣于1807年来到澳门,后定居于此。1813年,马礼逊经过多年的努力,翻译出版了《新约圣经》汉译本,在华人中间布道。1814年他终于秘密吸收了第一个华人基督徒蔡高,并为他施洗。1815年他编写出版了《汉语语法》英文版。1815年—1823年出版了巨著《华英字典》,共6本,达4,595页。后来,还刊印了《传教士学中国杂记》,并担任了中国第一份英文日报《广州纪事报》(又称《澳门杂录》)的副编辑。1828年编辑出版了《广东话土话字汇》。1834年任英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秘书兼翻译,7月病逝,葬在澳门。

伯驾 美国来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医生,还是美国驻华外交官。1804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834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并被封为牧师,同时被任命为传教士,1834年10月23日到达澳门,次年到达

广州,于当年11月4日创立眼科医局,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史上创立的第一所西医医院。不久回国,于1842年携夫人再次来华。1844年以顾盛为首的美国使团抵达澳门时聘请他和裨治文作陪同,在与清朝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迫使清钦差大臣看英于1847年7月3日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他即于当年被任命为美国驻华代办,1855年又成为美国驻华的全权委员,以后与英法各国联合提出“修约”要求,扩大对华侵略,并第一个主张占领台湾,充当殖民者的先锋。他于1857年回国,1889年在华盛顿去逝。

裨治文 生于1801年,为美国首批来华传教士之一。1830年3月22日抵达澳门,不久就到广州任英文《中国丛报》(旧译《中国文库》、《澳门月报》)的编辑。他往来于澳门和广州之间,并于1839年2月在澳门创办了马礼逊学堂,在同年11月4日开学。1839年他与其他外国人向清政府提出未来中英不平等条约中的基本条款,而且提出了领事裁判权的要求。他还在当年获得了纽约大学授予的神学博士学位。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充当美国海军副少将的翻译及助手。1844年以顾盛为首的美国使团到达澳门及香港时他充当翻译及牧师。1856年他在上海外国人中组织了一个学术性的团体,名叫“上海文理学会”,并任会长。1861年11月2日在上海去世。著有《广州市及其商业介绍》等书。

蓝钦文 宣道堂的主任牧师,原籍广东省兴宁县,毕业于香港基督教“中国神学研究院”,已在澳门传教近20年。他是澳门基督教福音派的主要代表,本人属长老会,任澳门学园传道会会长,“世界华人福音会议”(简称“华福”)董事,“华福”澳门区会董事兼主席。他所负责的宣道堂是澳门基督教界最大的一间教会,统管包括香港在内的9所分堂和几个聚会点。蓝牧师在澳门及东南亚地区的基督教界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家人包括其妻子、儿子及

儿媳也都在教会中服务，均为虔诚的基督徒。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他曾多次来内地参观访问，同内地教会广结联系，捐资捐物。1987年还作为澳门宗教界人士来北京出席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签署仪式的观礼，并利用“华福”和“学园传道会”的经费向内地教会及文化部门提供资助。

注释：

- 1.《第四届华人福音会议参考资料》，第92页，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香港)。
- 2.《今日华人教会》月刊(香港)“香港、澳门与台湾女性现况介绍(下)”，1993年8月。

第四章

巴哈伊教

巴哈伊教虽然有 100 多年的历史,但在澳门却只有 40 年。1953 年巴哈欧拉的曾孙守基·阿芬第就曾提到澳门是当时 130 个还没有巴哈伊教的地区之一。也就在这年的 10 月 20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位名叫法兰西斯·希拿的女教徒来到澳门。不久,又有两位巴哈伊信徒到澳门拓荒,他们是卡劳和露伟达·奈勒夫妇。这三位巴哈伊在澳门定居之后,就开始向周围的人们传播巴哈伊信仰,奈勒还成为巴哈伊教的圣护委任的亚洲九位顾问之一。1954 年 10 月 15 日,一位来自广东省名叫严沛峰的华人宣布信仰了巴哈伊教,他是第一位澳门华人巴哈伊。以后,澳门又有了首位葡人巴哈伊,名 Manuel Ferreira,他曾向希拿太太学习英文。1955 年 1 月唐童容小姐成为第一位女性巴哈伊,并介绍了她的丈夫张绍载先生也信仰了巴哈伊教。1956 年张先生翻译了一些巴哈伊的祷文,并出版了第一本巴哈伊的书籍,不仅在澳门使用,还流传到其他地区。不过,50 年代巴哈伊在澳门的发展很缓慢,而且信徒的流动性也较强。直到 1958 年,澳门第一个巴哈伊地方灵体会宣告成立,是由 4 个葡国人、3 个中国人和 2 个美国人组成的。1959 年的灵体会由 6 个中国人和 3 个葡国人构成,而 1960 年的地方灵体会的成员第

一次全部由中国人组成。到1974年，澳门的巴哈伊信徒才增加至50多位，在湾景楼设立了巴哈伊中心，此时，香港和澳门在同一个总灵体会的管辖之下，澳门的两个信徒还被选为总灵体会的成员。至1978年，澳门的巴哈伊信徒还只有数十名。

澳门巴哈伊教的转变期是在80年代初期，当时有大量的渔民入教，并于1984年成立了巴哈伊中心，同年在凼仔成立了一个巴哈伊地方灵体会。这是澳门发展的第二个地方灵体会。至80年代后期，巴哈伊教在澳门出现了一个高潮，信徒增加到2,000多人；1988年在路环成立了澳门的第三个地方灵体会。到1989年4月在澳门成立了总灵体会，与香港总灵体会分离而独立，成为世界上第150个总灵体会；澳门、凼仔、路环和渔民四个地方灵体会也同时成立。

“总灵体会”成立之时，世界巴哈伊教的精神领袖罗巴尼夫人特意从加拿大赶来祝贺，澳督也派代表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

由于信徒的增多，澳门的巴哈伊教社团在80年代后期开始注意参与社会活动，如开办了一间幼稚园。进入90年代，澳门的巴哈伊开展了许多公开的活动，积极传教，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澳门巴哈伊教总灵体会也于1992年初正式登记为一个合法的宗教社团。其信徒通过在公共场所张贴广告、组织文艺演出等向市民宣传巴哈伊的教义，扩大自己的影响。另外，在1988年开办了一所“联合国学校”，这是一所非谋利的中学，也是澳门唯一一所教授英语和普通话的双语学校，招生的对象主要是新移民，并注意在新移民中间传教。学校成立之初只有6名学生，第二年就有学生100名，1990—1991年有学生220名，1991—1992年学生达到262名，来自24个不同的国籍，学校接受了澳门政府的资助。

总灵体会一共由9位成员组成，在每年的4月21日至5月2日的蕾兹万节选举。1993年至1994年度总灵体会的成员是何启桦、庄媚雁、周丽娟、卜晓旭、李棣荫、何斯利、李崔少卿、沙露和巴拿。

该会的领导人是崔绍卿女士，她除专职在总灵体会工作外，还进行贸易方面的英文翻译工作。此外，巴哈伊的其他领导人的文化程度也很高，多从事科技或商业工作。

澳门的巴哈伊社团与世界其他巴哈伊组织的关系较为密切。罗巴尼夫人曾多次到澳门访问，澳门的巴哈伊组织在1989年2月派了6名信徒前往以色列海法“朝圣”；1993年9月澳门的巴哈伊代表团首次访问了大陆。

第五章

伊斯兰教

澳门的伊斯兰教历史上曾较兴盛，穆斯林多为印度及巴基斯坦人，有一座清真寺。但目前信徒只有 100 人左右，清真寺有待重建，还成立了一个伊斯兰会，新移民中亦有穆斯林前往伊斯兰会做礼拜，会长石也谷，是巴基斯坦人，但出生在澳门，能讲一口流利的粤语。伊斯兰会的旁边有一穆斯林的坟场，准备用来修建新的清真寺。

主要参考资料

图书类:

1. 林胜俊著《台湾寺庙的职权与功能之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6月初版。
2. 李志刚著《香港教会掌故》(古今香港系列,梁涛主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6月。
3. Pablo Fernandez O.P. 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光启出版社,1991年5月初版。
4. 《台湾天主教手册》1990年、1992年。
5. 《香港教会名录》1993年,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6. 唐曼珍、王宇主编:《台湾事典》,1990年,南开大学出版。
7. 田英杰编著、游丽清翻译:《香港天主教掌故》,圣神研究中心/圣神修院校外课程部出版,(香港)1983年。
8. 蔡相辉编著:《复兴基地台湾之宗教信仰》,华侨协会总会主编,正中书局印行,1989年(台北)。
9. 陈国少、肖星、常工主编:《台港澳手册》,华艺出版社,1990年9月。
10. 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处编辑:《香港的宗教》,圣神研究中心出版,1988年9月。
11. 《香港华人基督教联合会会员堂会务概况》,1983年。
12. 《香港1985》,香港政府出版,1985年。
13. 《香港便览、名类统计》,香港政府新闻处,1985年4月。
14. 《当代华人教会》第一册(台湾)、第二册(香港/澳门),1986年6月出版。
15. 《香港法律大全》,法律出版社,1990年。
16. 台港澳编委会编,《港澳台大词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3月。
17. 《基督教百科全书》(英文版1992年)。
18. 《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92年)。
19. 《宗教工作基础知识》,中国旅游出版社,1991年。

20. 邢福泉著:《台湾的佛教与佛寺》,台湾 万务印书馆发行,1981年5月。
21. 蔡相辉著《台湾的祠祀与宗教》(台湾),台原出版社,1989年9月。
22. 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基督教论文集》中史文森/罗曼华编译的“基督教在台湾”一文,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12月。
23. 李达著:《台湾宗教势力》,香港广角镜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
24. 《香港中国回教协会四十年特刊》(香港)。
25. 《中华回教博爱社金禧纪念特刊》(香港)。
26. 《第四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参考资料》,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1991年7月。
27. 《澳门日报》,1993年版《澳门手册》。
28. 李志刚著:《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
29. 阚正宗主编:《台湾佛寺》(导游四),台湾菩提长青出版社,1982年1月。
30. 《香港天主教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特刊》(香港)。
31. 《台湾基督教会1991年教势报告》,基督教归主协会,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2000年福音运动)联合出版,1992年12月。

·报刊类:

1. 《世界宗教研究》(季刊1990年第3期/1992年第3期)
2. 《世界宗教资料》(季刊)
3. 《中国穆斯林》(双月刊)
4. 《中国道教》(双月刊)
5. 《中国回教》(双月刊,台湾第193期—224期)
6. 《中国与教会》(月刊,香港)
7. 《今日华人教会》(月刊,香港)
8. 《香港佛教》(月刊,香港),1992年6月/1993年2月/1994年1月
9. 《公教报》(周刊,香港)
10. 《台湾教会公报》(周刊)
11. 《善导周刊》(台湾)
12. 《教友生活周刊》(台湾)
13. 《法音》(月刊)

14. 《上海道教》(季刊)
15. 《当代宗教》(双月刊)
16. 《铎声》(双月刊,香港)
17. 《关系我》(季刊,台湾)
18. 《阿拉伯世界》(双月刊)
19. 《明报月刊》(香港)
20. 《广角镜》(月刊,香港)1989年5月;“星云大师答《广角镜》记者问”
21. 黄兆汉、郑炜明著“香港道教概说”,《星岛日报》(香港),1993年8月29日/
9月5日/9月26日/10月3日
22. 台湾《远见杂志》1991年8月15日,星云著:“不见不闻的世界”。
23. 《亚洲周刊》,1990年8月5日
24. 《联合月刊》,1987年3月

后 记

编写此书的最初动因，完全是出于工作的需要。毕业分配到“宗教研究中心”后不久，就负责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宗教研究工作，1991年曾到福建、浙江一带进行调查研究，当时两岸的宗教交流只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并且是单向的。那时，我对台湾宗教的情况一知半解，工作中深切地感到极有必要了解台湾的宗教现状。以后开始注意从海外的报刊、杂志及书籍中搜集有关的信息与资料。1993年11月底随团到香港和澳门访问，广泛接触了宗教界的人士，但因时间仓促，未能就一些问题作全面而深入的探究，只是搜集了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在惊诧港澳宗教界的社会影响之大、寺观庙堂分布之密的同时，开始萌发编著此书的想法。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国内并没有类似题材的书籍出版。之后，我到处借阅有关的图书、资料，参考了大量国内学术界的有关文章，并请教了台湾、香港等地的学者和专家，始成此书。“宗教研究中心”的赵匡为主任，认真地审阅了书稿，还提出了一些中肯的修改意见，并极力促成了该书的正式出版，在此谨表我诚挚的感谢。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张新鹰老师为我借阅有关的书籍提供了诸多的方便，并不吝指教；同时还得到港澳办、社科院台湾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宗教研

究所等单位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资料的匮乏及本人知识上的欠缺，有些宗教及教派无法详细地介绍及论述，有些内容或许会因此出现某些疏漏与偏差，望学者和专家们批评和指正。

李桂玲

1994年11月于北京

序

张 声 作

近年来，随着 1997、1999 年的临近，海峡两岸的交往日益频繁，大陆同台湾、香港和澳门同胞的相互了解也日益加深。宗教方面的交往正在逐年增加，大陆与台港澳三地宗教团体及宗教界人士的互访，已成为大陆和三地之间交往的一个重要部分。宗教研究中心李桂玲同志编写的《台港澳宗教概况》一书，对台湾、香港、澳门三地的当今宗教情况、宗教组织、宗教人物、主要寺观庙堂以及宗教与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做了一个概括的介绍，这无疑对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台湾、香港和澳门三地的民俗风情，会有很大的帮助。

，台湾、香港和澳门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地的人民同大陆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着“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其民俗和宗教信仰也大致相同，特别是同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等省关系尤为密切。但是，由于 40 多年来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也产生了一些不同于大陆宗教的特征。例如宗教、教派门类众多，佛教、道教在人民日常生活中影响深远，各宗教团体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并经办各类福利事业和经济实体等等，这些都是有别于大陆宗教的种种特点。

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宗教政策方面，我们党与中央政府确定了“三互”的方针，即在台港澳三

地回归祖国后,在宗教方面实行互相尊重、互不隶属、互不干涉的原则。中央政府不把大陆实行的宗教政策推行到台港澳三地,但也不允许三地的教会把它们现在的一套办教、传教方法强加给大抽宗教。这一点现已写入香港与澳门的基本法条文之中。

李桂玲同志是宗教研究中心一名年轻的研究人员,主要负责研究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宗教问题,几年来积累了一些资料,也对某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然而,总的说来,由于宗教研究中心成立不久,这方面情况了解不多,大陆可以借鉴的材料更少,因此这部书只能是一次探索,介绍的情况也只是一个轮廓,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我相信,随着大陆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了解与研究的深入,随着两岸及同港澳交往的不断发展,我们对这三个地方的宗教的了解也会不断充实与丰富。我希望将来能有更全面、更详尽、更准确的介绍台港澳宗教情况的资料。

1994年11月26日

前 言

台湾、香港和澳门是我们祖国三个不可分割的地区，与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宗教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台、港、澳三个地区虽然有着不同的地理与历史环境，但都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大陆有着人缘和地缘的契合关系，所以，中国本土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及一些民间宗教信仰在这些地区广泛传播。另外，16世纪以来，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大多通过海路，经台、港、澳地区传播到大陆。当然，台湾、香港和澳门三个地区的宗教也各有特色。台湾受中国本土宗教影响较深，佛教与道教的历史悠久，而西方的天主教与基督教也早在17世纪就已传入，并广泛传播，甚至影响到山地民族；而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治时期，也使台湾的宗教留下一些日本文化的烙印；大陆解放后，又有一些教派传到台湾，使各个宗教在台均有发展；目前，台湾各大宗教信徒及民间宗教信仰者估计约占总人数的90%，可见宗教在台湾影响之广，而且宗教团体所经办的医院、教育、文化及慈善事业在社会中的作用也很大，寺庙教堂可谓星罗棋布，传统宗教在近年来更有复兴之势。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宗教因受其殖民地统治的影响而呈现出另一特征：因港澳的地理位置特殊，早年西方传教士将港澳地区作为向大陆传教的前沿，而今这两个地区尤其是香港仍为世界各大宗教向东亚、东南亚地区及中国大陆传教的一个重要基地。目前，香港和澳门宗教种类繁多，教派林立，教会团体的社会功能显著，特别是“洋

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虽然教徒人数较少，但因教会组织严密而显示出较强的凝聚力，社会影响面大，教会医院、教会学校、文化设施及慈善机构的社会地位也较高。这样一方面，因台、港、澳地区与大陆宗教上的历史渊源，我们若要了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就很有必要了解宗教在台、港、澳地区的传播史，否则，中国的宗教史就会有缺憾；另一方面，由于台、港、澳地区的宗教组织与大陆及海外各地的宗教组织至今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了解台、港、澳地区的宗教状况对我们考察中西文化的交流历史与现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海峡两岸的交流与发展，台、港、澳宗教界人士也不断组团到内地参观访问、探亲旅游，与大陆的宗教界人士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和友谊。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因长期的隔绝，我们对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宗教状况却缺乏全面的了解，尤其是当代的发展特点。同时，香港和澳门将分别在1997年和1999年回归大陆，我们也有必要了解这两个地区的宗教状况，为保持港澳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促进平稳过渡做些有益的工作。同时，我们还要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努力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贡献，在宗教交往中也很有必要了解宗教在台湾的历史和现状。

毕竟我们身处在一个少数人信教的文化环境里，很难想象在一个多数人信教的地区宗教的社会影响力，而且，台湾、香港和澳门三个地区的宗教文化与大陆有着较大的差别。我在本书中引证了一些统计数字，如九成的台湾人信仰某种宗教；香港仅基督教新教的教堂就有924间、50多个教派；在澳门这样一个面积仅18平方公里、人口60万的弹丸之地却拥有150个宗教组织，仅寺庙就有40多间，可见宗教影响之大。另外，书中还专门就几种主要宗教的社会影响、主要的寺观庙堂、主要的人物及组织等作了专题介绍，

另外还就一些民间信仰和新兴的宗教作了简要的概述。宗教在当今世界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宗教的社会影响也更广泛,宗教的功能也更趋复杂。台、港、澳地区的宗教也体现了宗教发展的普遍性的特点,与此同时又有其各自的风格,如台湾的民众为何普遍崇拜妈祖?一贯道为何在台遭禁,而今又开禁?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又为何支持“台独”?香港的慈善机构中教会的影响有多大?在经济发达的当今香港为何宗教甚至迷信能大行其道?澳门的名称曾与妈祖崇拜有关,而近代史上外来的“洋教”和传教士们的举响又如何呢?这些问题在书中均有所涉及。另外值得说明的一点是,本书中一些专有名称或译名与大陆学术界及宗教团体的称谓有许多差异,但这里均按台港澳各宗教团体本身的习惯书写,文中不再说明。本书虽不能将台、港、澳三个地区的所有宗教及教会团体一一详述,但希望能使读者明晰地了解这三个地区宗教的一般状况,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